



#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 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

Irish:  
ers 1928—1946

】以赛亚·伯林 / 著 陈小慰 叶长缨 / 译

林出版社

#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

（上册）

【英国】以赛亚·伯林 / 著 陈小慰 叶长缨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 1928—1946 / (英)伯林(Berlin, I.)著, 哈代编; 陈小慰, 叶长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47-2596-5

I. ①以… II. ①伯… ②哈… ③陈… ④叶… III. ①伯林, I(1909—1997)—书信集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955号

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by Isaiah Berlin,  
Letters ©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04  
'Freedom' copyright Isaiah Berlin 1928  
Introduction to *Washington Despatches* © Isaiah Berlin 1981  
'Zionist Politics in Wartime Washington' © Isaiah Berlin 1972  
Quotations from diaries, incoming letters etc. © their several authors 2004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2004  
Article from *Evening Standard* copyright *Evening Standard* 1942  
Lyric excerpt of 'My British Buddy' by Irving Berlin  
© copyright Irving Berlin Inc., 1943, © copyright renewed by Irving Berlin  
'Third and Last' from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 translated by Judith Hemschemey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oberta Reeder, copyright © 1989, 1992, 1997 by Judith Hemschemeyer,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92 by Canongate Books, Edinburgh,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anongate Books and Zephyr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021号

书 名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 1928—1946
作 者	[英国] 以赛亚·伯林
编 者	[英国] 亨利·哈代
译 者	陈小慰 叶长缨
责任编辑	李瑞华
特约编辑	许 昆
原文出版	Pimlico,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a href="mailto:yilin@yilin.com">yilin@yilin.com</a>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62.7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96-5
定 价	89.00元(上下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编辑：亨利·哈代

助理：塞琳娜·摩尔

档案研究：迈克尔·休斯

补充资料：詹妮弗·霍姆斯、凯特·佩恩

俄文顾问：海伦·拉帕波特

一位有造诣的作家，所作注释尽可以不成体系，杂乱无章，甚至离题千里，随意旁征博引，处处暗藏玄机，但若是评注家，不论是哪一位，却万万不可如此。

——塞缪尔·约翰逊

纪念詹妮弗·哈特  
1914—2005

过而无度

——十六岁的以赛亚·伯林<sup>1</sup>

过度赞美——这是你的短处！

——约翰·斯帕洛<sup>2</sup>

先生们，重要的是，千万不可热情过度。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sup>3</sup>

---

1 此处伯林原文为：“παντα αγαν”。仿拟希腊谚语“抑而有度”（μηδὲν ἄγαν），伯林1925年写于圣保罗学校的日记的首页。

2 对伯林手稿《理查德·佩尔斯》的评注。这是一篇讣告，刊登于《巴利奥学院年鉴》（1958）。“无度”即“过头”，这里指在评价人时好用过度赞美之词——例如，将佩尔斯描绘成“我所认识的最好和最受敬仰的人”（伯林《个人印象》第2版第124页）。

3 此处伯林原文为：Surtout, Messieurs, point de zèle。这一格言常被伯林视为座右铭，相关的文献信息，见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92页注2。

## 征信启事

亲爱的读者，您拥有与以赛亚·伯林往来的信件吗？您听说过哪里有此类信件吗？在此，我谨向各位发出最热切的请求：只要您觉得有哪些信件我可能尚未读过，敬请告知。

自1990年末，我辞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职位，全力以赴编纂伯林未曾公开发表的作品以来，为了编辑本书，我一直致力于收集以赛亚·伯林的书信。虽然多方追寻各种线索，有时甚至因为过于穷追不舍，到了惹人厌烦的地步，但一定还会有些信件我鞭长莫及，甚至全然不知。与伯林有过书信往来的人不胜数，必定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不曾了解到。原因有很多：或者是已经过世的人把文件交给了家人或某个机构，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或者是信件在毫不相关的人士手中；又或者是某些信件至今仍待在最初搁置的地方，尚未被人发现。

希望《以塞亚·伯林书信集》第一卷的出版，可以唤起读者们的记忆，以便将来陆续出版的几卷能够更具有代表性。新发现的书信，只要属于本卷时间段，可以在将来重印时加入本书，也可以放在第二卷之前。为此特为刊发本启事，征求信件和相关信息。伯林本人没有保存自己手写信的复印件，他的秘书一般也不会保存打字稿的原稿，即便他们把原稿保存下来，打印的正本也往往会有添加或修改的内容，这些他们是不会再抄到原稿上的。因此，有赖于信件拥有者们慷慨相助，我们得以从浩如烟海的伯林书信中精选出上佳之作，并确保用到的是最终稿（假如它们还幸存于世）。

对我看到的信件,我保证会谨慎对待,并且尊重通信人的意愿,不引用甚至不发表某些信件或信中段落,或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不予引用和发表。如果信件主人不愿借给我信件原件,复印件也完全可以(我很乐意承担复印费用)。所有暂借的原件一经复印,将迅速返还。

这一请求还包含一个动机,那就是,尽可能及时完整地搜集伯林的信件,以免错失良机。同时把补充收集的材料(必要时可以适当限制使用)与目前存放在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伯林著作文件一起保存,该图书馆同时也拥有这些著作文件的所有权。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一些通信人的离世,已经有大量信件流失或销毁。

ix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想同时征集其他类型的档案材料——例如,以赛亚·伯林网上图书馆<sup>1</sup>目录中未曾收入的照片、访谈记录或讲座材料(录音或文字稿),以及任何可以为现有资料增色添彩的趣闻逸事。

我的通信地址: **Wolfson College, Oxford, OX2 6UD, UK**; 我的电子邮箱地址: **henry.hardy@wolfson.ox.ac.uk**。

---

<sup>1</sup> <http://berlin.wolf.ox.ac.uk/>, 以赛亚·伯林著作托管会的官方网站。



## 插图目录

### 插图

现存的最早书信	2
贝拉·沙立特二十一岁生日宴会请柬	26
现存的伯林回英国前写的最后一封书信	720

### 当代地图

汉普斯特区局部图	4
牛津大学	16
曼哈顿	366
曼哈顿中城局部图	367
华盛顿中心区	(中文版未收入)
莫斯科市中心	690
列宁格勒市中心	702

xi

### 图片来源说明

除非另有说明,全部图片均来自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以赛亚·伯林书信文件,以及2004年成立的以赛亚·伯林著作托管会。下表中所列项目如有斜线号,则斜线前为摄影者,斜线后为照片或图片所有人。

致切斯特顿的信件:大英图书馆,馆藏手稿补遗,73232A号,由大英图

书馆扫描。

贝拉·沙立特聚会邀请函, 由朱迪·塞巴出借。

## 地图

汉普斯特: 详图来自《汉普斯特, 1915年》[旧英国地形测量图, 伦敦27] (康赛特, [2002]: 阿兰·戈德弗雷地图出版公司)。

牛津: 来自E.A.格里宁·兰伯恩著《牛津: 历史景点导游画册》(牛津, 1928), 经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复制; 牛津大学图书馆影像中心扫描, C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来源于牛津大学航拍图8°1056(3)。

曼哈顿: 来自《纽约曼哈顿》(纽约, 1946: 哈蒙德股份有限公司), 哈蒙德世界地图公司版权所有。12605号; 国会图书馆扫描, 来源: G3804.N4: 2M3 1946.H 31。

曼哈顿中城: 经大英图书馆许可复制, 来自《内斯特纽约城市地图》([伦敦, 1952]: 内斯特出版公司); 扫描自地图34.a.1.(4)。

华盛顿中心区: 详图来自《埃索华盛顿特区及周边地区导游画册, 1942年》([纽约, 1942]: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综合绘图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纽约州, 纽约市, 威斯特大道21号; 国会图书馆扫描, 来源: G3850 1942.G4。

莫斯科中心区: 扫描详图来自《莫斯科军事地理平面图二》(市中心), 来源: 欧洲国家军事地理数据, 地图H: 莫斯科(柏林, 1941: 军事总参谋部, 战争地图与测量数据中心[军事图四]),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影像中心, 来源: C40 e. 1/H\*。

列宁格勒中心区: 详图来自《列宁格勒平面图, 1939年》([列宁格勒, 1939], 列尼查特), 由位于圣彼得堡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博物馆从地图副本扫描。

## 照片

4 小拉塞尔父子公司, 温布尔登, 1927/8。

- 5 沃克摄影公司制作的明信片,公司地址:伦敦北19区,彭伯顿花园15号。
- 6 瓦伦丁父子有限公司制作的明信片,公司地址:敦提及伦敦。
- 7 明信片。
- 9 托马斯照相馆,底片64703/全灵学院。
- 10 牛津,乔治·莱斯利照相馆。
- 11 照片由克莱丽塔·冯·特罗特出借。
- 13—15 聚会成员拍摄/诺尔·沃斯威克。
- 16 约翰·沃德—帕金斯拍摄。
- 17 奈杰尔·弗朗西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爵士。
- 19 明信片。
- 21 E. C. 霍奇金拍摄。
- 22 奈杰尔·弗朗西斯/爱德华·莫蒂默。
- 23 照片由南希·尼科尔斯出借。
- 24 拉斐尔,伦敦西南1区,骑士桥,威尔顿1号/露西·加斯特。
- 25 拉姆齐与马斯普拉特,牛津,1943年7月7日/黛安娜·霍普金森。
- 26 照片由潘尼洛普·纽萨姆出借。
- 27 照片由亚当·里德利爵士出借。
- 28 克里西达·里德利/亚当·里德利爵士。
- 29 由玛丽·费希尔拍摄。
- 30 托马斯照相馆? / 新学院图书馆,来源:A. H. 史密斯,《牛津大学新学院及其建筑》(牛津,1952:牛津大学出版社)。
- 31 托马斯航摄照片,1948/洛克菲勒中心档案馆,图像1163号。
- 32 哈勃曼真实摄影公司制作的明信片,公司地点:纽约,198号信箱。
- 33 照片由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出借。
- 34 照片由阿曼达·奥品斯基所有并扫描。
- 35 由《每日电讯》提供复印照片。
- 36 来自《英国使馆:华盛顿1号》,《田园生活》,1939年1月14日,38—42页, xiii  
在第39页;新版由《田园生活》从原照底片冲洗提供。

38 摄于1950年7月或8月；来源：外务及英联邦摄影图书馆馆藏资料；皇家版权所有，经英国文书局允许复制。

39 摄于1920年；由位于圣彼得堡喷泉屋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博物馆所有并扫描。

# 序 言

## 餐前酒

没有序言的书向来令我失望。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序言是私人的，充满个性特点，而书的正文却往往相反。通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对著作所倾注的情感，至少是部分情感。那些希望与作者保持距离的读者尽可以跳过序言不看而没有任何损失，但对有心近距离了解作者的人而言，我觉得，他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权利的。

——迈克尔·达米特<sup>1</sup>

我第一次向以赛亚·伯林提起出版其书信集的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俩在牛津大学的全灵学院刚吃完午餐。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话题是我打算离开牛津大学出版社，专门来整理出版他的书信文集。谈到书信时，我说要出版的话得经过精心挑选。主要出于几点考虑，一是信件数量庞大，二是出版商对该书投放市场可能持有的想法，再就是一些书信比较乏味，或有重复，没有必要收入面向普通读者的集子。当时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令我颇感意外，因为这完全不像他惯有的作风。过去对待有关出版其学术著作的意见，他总是态度谦和，耐心听取。而这次不同，他对我精挑细选后再予出版的建议完全置之不理，说此事要做就一定要做彻底。书信集“必须有大容量”，决不让步。

---

<sup>1</sup> 见弗雷格，《语言哲学》（伦敦，1973），序言的第一段。虽然达米特这里用的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口吻，但同样适用于本书。

总体而言，此后我便根据他这一明确的态度开展工作，当然也不是轻率地盲目遵从。以上提到的那些编选因素确实不得不加以考虑，但是具体贯彻起来却可以灵活掌握，既可严苛死板也可委婉巧妙。死板的做法是按照一些出版商的要求，出一卷本的选集。但那样不仅有悖伯林的愿望，也有损原始素材的质量。即便是目前这样的编选，也已经要求极大的自我克制了。

目前的出版计划暂定为三卷本。以1966年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或者也可能以1975年伯林从学院院长一职退休为界，分为二、三卷。但这些计划均未最后确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以此第一卷为例，最初我打算以1940年伯林离开英国首次赴美作为结尾，但出版商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少出几卷，把伯林战时与战前的书信一起收编进来，使读者对伯林有更完整的印象。因此，我把收入年份延长至1946年。

## 书信来往

[伯林]之所以享有国际威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所作出的赫赫成就，还因为他跻身于众多不同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接触往来，同时还参加过许多意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导师。<sup>1</sup>

毋庸赘言，伯林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位他所在时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确切地说是战后时期最著名的英国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是各种会议以及许多用不同语言撰写的书籍和出版物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重要思想以及记录这些思想的别具一格的文章，还在于伯林其人的风范。这里不是要讲他的生平故事——稍后会有一篇小传交代他的主要生平情况<sup>2</sup>，此外，迈克尔·伊格

1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伯林书信文件编目资助申请的匿名审阅人。

2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见本书）是我为伯林写的讣文，发表于1997年11月7日伦敦《独立报》。在此略有修订。

纳季耶夫得到普遍认可的传记<sup>1</sup>以其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已经为我们奉上了一部经典之作——不过，这里还是要谈谈伯林通信往来的情况。

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无人可比的多产书信作家。至今仍有数量浩大的书信幸存于世，使我们得以出版一套多卷书信选集，全面反映他视角纷呈的书信话题和多姿多彩的人格面貌。我知道的第一封现存书信写于1928年3月，当时的伯林是圣保罗学校的一名十八岁男生，信是写给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请他为新创办的校刊投稿。最后一封信则写于1997年10月底，离伯林去世前不到一个星期<sup>2</sup>，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在两者之间大约七十年的跨度中，共有数千封其他信件，贯穿伯林充满活力、著述丰硕的漫长一生，涉及其中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牛津大学的本科生、研究员、教师、讲师、教授，直至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时的第一任院长；对北美、欧洲、巴勒斯坦/以色列及其他地区进行过的多次访问；二战期间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从事的工作；作为行政管理人员、作家、批评家和广播员开展的各种活动。贯穿于信件中的主题有些是反复出现的，包括父母在世时伯林与他们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1950年代起与妻子艾琳的关系；庞杂而广泛的社交圈子；评头论足、讲述趣闻逸事的爱好；以及后来越来越多就他的作品与学生和批评者展开的交流讨论。这些信件远远超越了牛津大学和学术问题，进入许多国家的许多其他领域，尤其是艺术和政治领域。

xvi

他的通讯录中包括众多杰出人士，这些人不仅活跃在学术界，而且活跃在政治、新闻、社会、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领域：这中间包括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作家诺埃尔·安南、英国语言哲学家艾耶尔、美国著名女演员劳伦·巴考尔、英国摄影大师塞西尔·比顿、美国思想家马克斯·贝洛夫、社会活动家维奥拉·伯纳姆·卡特、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牛津大学教授兼校长莫里斯·鲍拉、奥地利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英国苏俄史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伦敦及纽约，1998）。

2 此信日期为1997年10月31日，11月5日伯林去世。给人强烈印象的是，这封遗信他是用俄语签的名，而且用的是儿时在家人和朋友当中常用的教名“沙耶”。

专家E.H.卡尔、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家装业潮流领先人物西比尔·科尔法克斯夫人、美国女富豪爱默拉·卡那夫人、历史学家阿巴·埃班、美国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芭蕾演员玛格·方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及其遗孀玛丽安·法兰克福特、英国哲学家汉普希尔爵士、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导演泰迪·科莱克、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英国史学家L.B.纳米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牛津大学全灵学院院长约翰·斯帕洛、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斯蒂芬·斯彭德、美籍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著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威尔士亲王、作家艾娃·维文丽、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美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等许多人。但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最富有真知灼见的信件收信人只是一些无名之辈，这表明，伯林是一位不问来头、有信必回的慷慨之人，待人诚恳，细致认真。当然，对挚友近交他更是不惜笔墨。

贯穿所有信件（和几百张明信片）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淡的事件。”<sup>1</sup>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这一点在本卷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像闲聊一样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sup>2</sup>他常常下令说“把这封信撕掉”，幸运的是，这种命令往往被置若罔闻。

在最初的这段时期里，伯林从坐落在伦敦海默史密斯镇的圣保罗学校毕业，来到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在那里，他分别于1931年和1932年获古典

---

1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1936年6月3日。其他信摘自伯林网上图书馆“伯林语录”。

2 致默顿·怀特，1970年5月7日。



学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一等学位。<sup>1</sup>1932年10月，伯林在新学院得到了哲学讲师的职位，后来，很快又在全灵学院举行的绩优奖学金考试中获奖——他是首位获选进入该学院的犹太人。1938年，在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写作后（这是他在全灵学院从事的主要工作），他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1940年7月初，伯林与朋友盖伊·伯吉斯前往美国，打算从那里前往莫斯科，但最终留在了美国，直至1946年4月初。本卷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告一段落。中间他回过几次国，并在1945—1946年完成了著名的访苏之行。

战前的书信均为伯林亲笔书写，不过在美国，他学会了使用秘书。而他的秘书也必须学会如何为他工作。以下这些文字可以为证，它们摘自一位叫蕾丽亚·布洛德森<sup>2</sup>的秘书给朋友的信件，信写于1952年：

他说话带牛津口音，口齿不清，不会发r音<sup>3</sup>，delivery（发信）一词说得飞快，除了急口歌，在其他场合我还从未听到有谁说得这么快。[……]星期二，我手里提着打字机，满心绝望地来到他所在的院长办公室。[……]我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入他口述的信件内容，这样可以让他不得不稍加停顿，因为打字机的声响本身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他很高兴看到内容写上去，或者画掉，几乎所有信件他都亲自签名。他的书信妙语连珠，偶尔哀婉动人。他害羞无助，文质彬彬，总是主动认错。星期四，我再次去他办公室，正好他出去接电话，于是我拿起他放在书桌上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重印本<sup>4</sup>翻看。立刻被书中内容吸引。他回屋后，我问他是

xviii

- 
- 1 指牛津大学的古典人文学科课程，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古典历史和哲学研究，在本科学位课程中贯穿最后七个学期。该课程优等文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内容涵盖希腊语、拉丁语和文学，全部上完要五个学期。由于伯林在古典语言上不是很强，他选择了普通文学士学位，在第一学期末参加了第一次考试，并在三年后参加了结业考试（完整的课程为四年）。PPE综合课程（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即哲学、政治学加经济学综合课程，通常为三年，但伯林仅用一年时间便全部修完。
  - 2 蕾丽亚·布洛德森，后来成为布林·马沃儿童心理诊所的主治心理医生。伯林在学院任教时，她曾短暂担任过秘书工作。当时她正在那里读硕士学位，由于手头拮据，就利用各种机会挣钱。这些信是她写给西玛·Z.布恩的，邮戳日期分别为1952年3月2日和17日。信件全文见伯林网上图书馆“有关伯林的信件”。
  - 3 这两点不足后来已改正。
  - 4 该文初刊于《牛津斯拉夫民族研究论文集》第2期（1951），第17—54页；后重印，增补了一些论

否可以借阅几天。“尽管拿去，拿去，”他满口答应着，一边手忙脚乱地翻找文件，“我拿来就是送人的，拿去吧，留着。”于是我拿走了书。读完之后，我彻底被折服。此人即便不是真正的伟人，但至少与伟人相差无几，这一印象从此铭刻在我心中。[……]

我越来越喜欢他，这种感觉颇为奇特。结束秘书工作我不会感到遗憾，但他的离开却令我依依不舍。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温文尔雅和非同寻常的魅力，让人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喜欢他。那的确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经历。

## 工匠与管家

我看不惯你家仆人的举止。[……]他谈笑风生，仿佛与我们平起平坐……<sup>1</sup>

要想说服编辑，让他相信自己无足轻重，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威廉·哈兹利特<sup>2</sup>

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哈兹利特以上针对编辑所说的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个让人烦恼、靠文字过活的寄生虫，只要牢记自己的位置，有时却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至于这一位置意味着什么，答案可能千差万别，大不一样。确实，编辑这一概念无所不包，有时不由得让人惊叹它的作用究竟能有多大。一个激扬文字、指点国际大事的《泰晤士报》编辑，与整理古希腊悲剧

---

文，更名为《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伦敦及纽约，1953），该文同时也收入《俄国思想家》和论文集《对人类的适当研究》。

1 对亚历山大·赫尔岑母亲路易莎·海格说的话，见英国现代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沉船》（伦敦，2002）第28页。《沉船》为三部曲剧作《乌托邦之岸》的第二部。

2 引自《论编辑》（1830）：P.P.豪编，《威廉·哈兹利特全集》，卷17，第361页（伦敦及多伦多，1930—1934）。

作家埃斯库罗斯剧作的编辑，或是出版社孜孜矻矻地校对标点的编辑之间，有何相似之处？所幸的是，各个编辑所处的环境大致能决定他在广阔的编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对具体工作职责的进一步详细阐述，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责。

每当思忖自己所承担的编辑任务，我总会想起两个大相径庭的比喻。在我看来，它们似乎体现了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许多最重要的特征，至少按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石匠，他用一块块石头，速度缓慢地建造着某座宏伟大厦，例如大教堂。给他的石料中有切割齐整的，也有需要修琢加工的。另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管家，他总是沉默寡言地藏身于绿色粗呢门之后，由于局限于家中的有限空间，他目光狭窄，但同时又因为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格外敏锐。

建造一座教堂，虽然石匠比不上建筑师（当今而言更是如此），但建筑 xix  
师的思想必须靠建筑工人领会，在实际建造中利用所给的材料予以实现。例如，建筑用的石料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需要石匠砌得严丝合缝；一旦有什么预料之外的问题出现，有时还必须反复调整加工；接合处的砂浆必须按比例调配，边角要琢平，不容许出现一点缝隙。工作完成之后，若是石匠活儿干得出色，整个建筑将成为一座纪念碑式的作品，展示的不仅是使之成为可能的艺术构想，同时还有赋予这种构想以形体的精湛技艺。换一个石匠也许一样能够把活儿干好甚至更好，但耸立在众人眼前的这座建筑却是“这一位”建造的。

管家的活动范围在楼下，这既给了他特权，同时也使他目光受到局限，所见失真变形。主人家发生的一切，除了纯属隐私的部分，多数他都能目睹或耳闻。但视野狭窄的他往往只能关注到自己小圈子里林林总总的细节，不会以巧妙或神通广大的方式将其与广阔的外界联系起来，那对他而言不要说难，简直完全不可能办到。他对自己操办的各类社交聚会的程序了如指掌，无所不知，但往往容易就此断定所有宴会都是同一模式，因为他根本没见过别人家如何操办。主人的所作所为，他无不了解，就连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也悉数尽知。但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简单看待，体会不到其内在涵义，无

法感受它的弦外之音，也不能与之产生共鸣。再有，和主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家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要保证整座房子的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却全都得靠他一手掌控。

至于说编辑，至少是本书编辑，本质上而言是作者的副手，负责处理作者的作品。在编辑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不希望过分突出自己的作用，因为这不是他行使职责的目的。编辑者的目的，是建构一座精神大厦，实现设计者内心怀有的梦想，即便有些设想直至设计者去世，还只是些模糊的碎片。编辑者的目的，是安排一场社交聚会，充分展示主人的个性，而不是极尽夸张，耍噱头突出自己，分散客人们的注意力。聚会上的酒杯，似乎是自动斟满。谁会欢迎一个打断客人谈话的侍者？而倘若这个侍者企图加入谈话，那更是无法容忍，除非他的话别开生面，并且说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谁又会邀请一位建筑工匠来主讲一场关于建筑学的讲座，或者邀请一位管家来讲授家政管理课程？

在本卷书信集中，看不到一只强有力的批评之手引导读者，除了全然不胜任而外，以上所述便是根本原因。比如说，有些人或许会试图通过简介性文字寻找20世纪30年代牛津生活的美妙插曲，或者是战时美国社会的概况。即便此类辅助确有用处，我也无从提供，因为我不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甚至什么类型的历史学家都不是。<sup>1</sup>此外，在本书附录中收入的两篇文章里，伯林本人已经详细描述了他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及背景，而信件本身则不但清晰地展现了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揭示了作者的性格。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愿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设置眼镜，这么做仿佛意味着我能够教他们如何阅读伯林的文字。我的目的，如下文中将要稍加详述的那样，就是要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解放”读者（这是伯林的说法，同时也是伯林的精神），使他们多元的意愿能够在伯林的著作中得以实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读者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真实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伯林的著作，让读者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反应。<sup>2</sup>本书提供的是原

---

1 “我什么类型的历史学家都不是”，有时伯林本人也这样说，但显然缺乏可信度。

2 不可避免的是，我未能时时都遵循这一克己的既定规则。例如，卷首用的引言就是一个例子。

始素材,而不是一本经过预先加工评论文集。

## 电子革命

我认为,有两个要素构成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其中之一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毋庸置疑,这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成就。

——以赛亚·伯林<sup>1</sup>

以上这句话是1988年伯林题为“追求理想”的遗嘱式演讲的开头。自那时起,技术进步不断发展和扩大,其中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就是因特网和电子邮件这样包举一切的发明。二者早已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彼此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我们对通信者的选择,以及有效开展各种研究的手段。如今,个人书信急剧减少(这既是由于电脑的影响,也是由现代生活日益加剧的压力所致),从前在图书馆寻找研究资料要花上数小时,如今运用电脑搜索引擎只需数秒即可完成。

伯林的书信,以及为出版他的书信所做的全部编写工作,顺乎天意而又适逢其时地遭遇了这一人类学分水岭所划分的两个时代。在书信艺术遭受电子时代的突变性影响之前,伯林是这门艺术最后也是最好的支持者。而编辑这些信件,则是第一批从电子研究和电子交际方式的不断变化发展所激发的潜能中获益匪浅的工程之一。对此,我深感幸运:一方面,我所使用的素材的质量,不仅是由作者非凡的天赋,也是由这些素材形成于电子革命到来之前这个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倘若在准备出版这些书信时,这场革命尚未积聚势能,那么整个工作就很可能大大减缓,甚至大打折扣,无法像

---

那些文字一样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想提出几个要点,也许会对解读有所帮助:(a)伯林在风格和概念上的洋溢丰赡,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洞见加诸观点相异者的令人震惊的能力,二者独具魅力而又引人入胜地结合起来;(b)伯林的文字逐渐发展成熟,从年少青涩的本科时期所写的不拘谨、词藻华丽的散文,蜕变成他在华盛顿时期所写的游刃有余、庄重稳健的篇章(魅力丝毫不减)。

1 见《对人类的适当研究》第1页。至于另外一个因素,伯林写道,“在于改变了几乎全人类生活的强大的意识形态风暴”。

如今这样进行得迅速、及时、充分。<sup>1</sup>

## 给批评者

我书桌前面钉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精准/切题/简洁/有趣；这些就是我的目标。

——安娜·奥丽维娅·贝尔<sup>2</sup>

理解他书信的困难之一，就是信中旁征博引极多，含义难以捉摸。如果不详加注释，普通读者恐怕难以把握精髓。

——约翰·希尔顿<sup>3</sup>

要编辑出版这样一位多产且涉猎广泛的写信者的信件，尤其是在他的信件还没有搜集整理完整的时候，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绝非一位耐心不足或有着完美主义性格的人可以担任。这一工作耗时长，进展缓慢，整个过程充满了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探寻和疑问，对那些习惯于一切按部就班、习惯于让每个细节都各得其所的人而言，这些探寻和疑问几乎会令人绝望，甚至精神崩溃。要找到多少封信件才算足够？关于信件中提到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的背景信息，要提供多少才算可以？如果对这些事实根据附带一些点评或议论，那么这个度要如何把握才算合适？在信件中，作者说了关于一些人的不那么中听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这些当事人或是他们仍然在世的亲友们，这样的段落，又该如何处理？

这些只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众多难题中的主要几个，对于这些难题的处理，我作了既是实用主义又带有原则性的选择，这么做可能不会令所有的评论者都感到满意。为了方便这类评论者，同时也为了引入接下来要作的有

---

1 与这一革命的开端更为接近的时期所产生的有关思想，可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我的“观点”专栏，1980年12月26日，1464版。

2 安娜·奥丽维娅·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的编辑经历》（伦敦，1990），第22页。

3 给本编辑的信，1991年11月1日。

关本书编辑过程的介绍，这里有个段落，来自一篇假想的持批判态度的书评，这类评论者会乐于借鉴的： xxii

读者从编辑那里获取的帮助少之又少。这一点表现在几个重要方面：脚注中提供的信息，绝大多数都干巴乏味，就事论事，这使得注释越发空泛苍白；书中零散出现的一些背景知识或介绍性的段落，也存在同样问题，看不出编辑是在何种原则的驱使之下如此操作。具有传记性质的一些细节单调死板，叙事淡而无味，就像一份官方报告，全然不像出自传记作家之手。我们本该读到苏格兰著名散文家詹姆斯·鲍斯韦尔风格的文字，可是我们却遭遇了苏格兰“最糟糕”的诗人威廉·麦戈纳格尔夫支离破碎的散文诗，就仿佛用报纸充当桌布，准备上桌的却是烹饪大师烧制的佳肴。对于这位常常被过高估计和过度赞扬的作家，编书者可以使用人性的眼光来看待他，可以作出感性的反应，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书弥漫着使人腻味的、丝毫不加批判的谄媚气息。就算是按照编书者自己的标准，其编辑也缺乏一致性：所提及的个人言论，多数都有相关日期说明，但不是所有的都有；信件中提及的地位同等的人物，编者所给的相关资料数量不一；少量的遐想猜测和逸闻趣事好比零星的葡萄干，随意而莫名其妙地嵌入事实的生面团里。还有无数错误，使人们不敢轻信编辑工作的可靠性。[这里可插入两三个错误例子，最好是令人难堪、滑稽可笑的错误。]<sup>1</sup>不过，终究是聊胜于无，但是错过了把这样一本书编好的机会，的确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一旦编纂者听任自己信马由缰，某种程度的平庸便不可避免，但即便是平庸也有高下之分。

至此，人们应该已经清楚，本书中低调的解释性文字是编者的有意之举，这些低调解释文字的不足之处，在上面的段落中被夸大了（希望这样的夸

---

1 完成这样一项艰巨庞大的工程，发生此类错误不可避免。对每一个话题，都有人比我了解更多，并且常常来自第一手资料，所以会作出比我更好的注释。资料来源可信度有高有低，誊写错误在所难免。一旦得知出错，我会把错误记录在伯林网上图书馆中，欢迎读者发现错误并帮助我纠正。

大仅仅只是我的假想)，用伯林的话来说，这是“让挑剔的读者接受或者反驳”。<sup>1</sup>依照我所奉行的编辑者的首要原则和解释惯例，这些低调的解释文字仅供介绍有关章节和段落之用。

## 筛选

本书信集为首卷，其中所选的书信，会比以后几卷更加全面，这是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信件保存下来的数量较少；其次，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些书信一旦保存下来，整体质量比后期的书信要高（尽管后期高质量的书信依然数量众多，而且日趋成熟），因此，早期的书信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就没有经过太多筛选；第三，如果要控制书的篇幅，后期总体数量巨大的书信，需要更加无情的筛选，而在本卷中，被略去和删节的书信并不多。如有删略，也许是出于我对相关信件或段落本身重要程度的判断，或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某些依然在世者免受敏感问题的打扰。但是，省略的素材可能会对本书中伯林的整体印象造成影响，这一点我当然要无条件地加以考虑。在本书中，要让伯林充分地展现自己，包括他的致命弱点，一切的一切。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有一类伯林书信并没有收集在本书中。伯林在英国驻华使馆任期间<sup>2</sup>，写了不少信件，显然属于“公务”信函的范畴。除了一两封比较有代表性的被收入本书之外，这些信函的大多数更适合另外集结出版，面向研究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的专家们，并可作为由H.G.尼古拉斯编辑<sup>3</sup>、伯林为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起草的官方快讯的合集的补充。虽然这些信件往往既生动有趣又不乏洞见（除了很少的时候，伯林的工作信函

1 《来自北方的先知》一书作者前言的结尾。见伯林《启蒙的三位批评者》，第252页。

2 这个时期伯林的许多私人信件经他本人口授、由他的办公室秘书打字记录，所以这些信件只是作为副本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副本上常常会有错误以及一些辨识不清的文字，在正本上可能都校正过了。一些明显的错误，我已经改了过来，但是如果不确定，我则保留原样，在日期后标以“[副本]”的记号以提醒读者。这些信件与最终实际发送出去的可能不太一样，更何况伯林总是亲笔修改（常常还是大量地修改）这些口授信件的最后定稿。

3 H.G.尼古拉斯（编），《华盛顿快讯，1941—1945：来自英国大使馆的每周政治报告》（伦敦及芝加哥，1981）。



中一般都带有他的个性特征),普通读者还是可能觉得这些信件过于晦涩,不是内行根本难以读懂。一些当时无足轻重的人物和事件在信中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大大超乎比例的注释的帮助,多数现代人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几乎一无所知。由于伯林那个时期和H.G.尼古拉斯有着“夹带私货”的通信,他的工作信函“预设对美国政治局势较为了解,而大多数[……]读者不一定拥有这么多相关知识”。<sup>1</sup>

## 编排

这些信件,我尽可能地按照时间顺序编排。<sup>2</sup>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要把信件按照话题分类,或者至少分成私人信函和学术信函两类,但我很快就决定放弃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因为就生性热爱写信的伯林而言,他的信件是很难分门别类的。此外,如果以时间顺序来编排,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信件具有连续性,可以相互参照;反之则会失去这种连续性和参照性,还不得不额外添加标志以作弥补。而以时间顺序来编排,如果有读者不喜欢某个题材或者某个通信人,要跳过相关信件、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也并非难事。 xxiv

## 编辑

我时不时在书中插入伯林称之为“结缔组织”的段落,为紧随其后的信件提供背景信息。至于何时以这样的方式提供背景信息、何时在脚注中提供背景信息,我没有遵循什么严格的规则。不过,我会本能地选择使用脚注,因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条件下,读者更喜欢直接接触第一手资料,而不是被插入的评论分散注意力,使用脚注可以更加方便这类读者。尽管如此,有时候,给出几句提要,或者在一组信件之前加入一两段对这些信件共同背景的介绍,这种做法更经济,而且我想对读者也更有帮助。有时候,这样的介绍文字由我本人撰写,有时候,我会从别的来源引用一些相关材料,比如,

1 见下文第772页。(凡参见本书的页码,未特别注明的,均指中文本页码。——中文编者注)

2 伯林的许多信件没有日期,为了确定日期,编者必须多方寻找可能获得的线索。有时只能作出近似的猜测。欢迎读者提供任何可以帮助我确定这些信件日期的有关信息。

伯林父亲门德尔·伯林1946年及以后所写的家族回忆录；1971至1972年由玛丽·伯林口授的自传体文件；还有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录制的内容丰富多彩的伯林访谈录音。如果在伊格纳季耶夫所写的《伯林传》<sup>1</sup>中已经有了附加的背景信息，就没有必要进行价值不高的信息解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放心地让读者直接查阅《伯林传》中的相关内容。事实上，每一位想从伯林信件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读者，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都应该先读过这本《伯林传》，或者至少读过相关章节。

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结缔组织”，当然来自伯林本人。这类材料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也许，某一天足以凑成一本差强人意的自传——但是这些材料比较分散，在风格上也很不一致。在伯林的《个人印象》中，这类资料最为集中，伯林另外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同类的资料，本系列随后出版的集子中，肯定会收入从这些伯林著作中节选的相关材料。作为伯林书信集的第一卷，伯林本人出版的回忆录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为H.G.尼古拉斯编选的他本人在华盛顿起草的官方快讯集（上文提到过）所作的序，以及伯林1972年所做的雅各布·赫佐格纪念讲座，题为“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由于这些材料与本书收入的伯林后来所写的书信关系十分密切，而对于那些想参照材料所提供的背景来阅读信件的读者，获取材料并非易事，因此我在附录里面收入了这些资料。

## 注释

关于本卷的注释，在前文我曾引用了安娜·奥丽维娅·贝尔的话，与其说是本书注释的预期目标，不如说是我的个人希望，与其说是对贝尔的仿效，不如说是出于对她的敬仰。尤其是贝尔提到的“有趣”二字。<sup>2</sup>总体而言，我只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来帮助读者确认信件日期，基本上，我不会在注释中着力描绘信件中提到的某个人或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除非我认为某些信息

1 按页码提供，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79页。访谈部分按档案号查询，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7。

2 贝尔编辑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以及由奈吉尔·尼科尔森和乔安妮·特劳特曼编辑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信件集，在许多方面的确是我的榜样。

与某一特定背景相关。我并没有打算在读者和他们所拥有的百科全书之间长期插足（在那些人物和话题已经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空间和时间上的因素都排除了我插足的可能；我也不喜欢细述或者浓缩在任何一个普通图书馆都可以找到的有关信息，因为对信息的选择往往免不了厚此薄彼。只要我所说的足以让读者自己动手，快速查询到相关资料，我便心满意足。<sup>1</sup>

关于信件中的当事人，在以下情形中我就不加注释了：当事人的姓名（尤其是全名）；无需过多的查证就可以确认的有关日期<sup>2</sup>；通信时当事人的职业以及之前相关的职业；本书截稿之后发生、伯林本人和他的通信人在通信时期内并不知晓的事件等。这些情况下，本书一律不提供相关注释，除非这些事件对确认信件内容比较重要。在书中我时不时会加入一些逸闻，即使这么做会使注释内容混杂不一，但这正是伯林喜欢的风格。上述的注释原则同样适用于重要人物生平的条目（下文对此有进一步说明），此部分内容通常不是对当事人的素描，而只是集中了基本信息，重点选择介绍主要人物以及（或是）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人物，以便读者查阅。

## 信件抬头

信件抬头的人名、地址和日期的格式，本书中一律统一，最常用的地址<sup>3</sup> xxvi 缩略方式如下：

圣体学院

牛津大学圣体学院

新学院

牛津大学新学院

1 对少数名人，本书未提供注释。

2 为了找到那些不曾在公开信息来源中出现过、只是在信件中匆匆带过的当事人的有关日期，而这些具体日期对他们并不重要，为此开展广泛的家谱调查，并因此大大延迟本书的出版，这么做是否值得？我希望，这不是懒惰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因过分拘泥于面面俱到而受束缚。只要出于必要（偶尔也不一定如此），我会不厌其烦，令人满意地列出一长串复杂别致的调查结果，足以令时间管理专家瞠目。

3 信笺抬头所示地点，不一定就是作者写信时的所在地：以赛亚·伯林常使用从别处拿来的印刷办公用纸。

全灵学院	牛津大学全灵学院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	伦敦西北3区,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自1928年起为伯林居所)
英国情报处	纽约, 洛克菲勒广场30号, 英国新闻处和英国情报处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道3100号英国大使馆

一些信的原件存在档案馆, 存档地点和查询方法本书在信件文本的末尾都一一给出, 以免人们误会, 以为这些信件、信件的复印本或副本都保存在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伯林文件中, 或以为这些信件由原收信人或其后人提供。

## 补充事项

需要注释的人物和其他事项, 本书通常只在首次出现的时候以脚注方式提供。如果在后文中该人该事重新被提及, 读者可以通过索引很快找到相关注释。前面已经提到, 对伯林格外重要的人物, 以及一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人物, 在书后会有篇幅较长的生平简介: 在索引或是脚注中, 此类人物姓氏前会加上星号, 提示读者在书后的重要人物生平中有其词条。

本书正文前提供的伯林家谱, 由家谱学家詹妮弗·霍姆斯整理编辑, 其调查能力令人惊叹; 这份家谱可以方便读者查找伯林的亲戚, 本书后面附录的年表, 由塞琳娜·摩尔和詹妮弗·霍姆斯汇编, 读者可据此确认伯林写信时所在地和所从事的职业。

## 编辑程序

标以“伦敦”、“牛津”和“纽约”字样的信件原稿均为手写稿, 除非特别说明。其后专题中收入的信件除非特别说明, 原件均为打字稿。手写信件一般完全照原文打出<sup>1</sup>, 而打字信件则稍作编辑处理, 删去打字员由于打字

---

1 下划线部分用斜体表示。(中译文用楷体表示。——中文编者注)

风格、习惯和自身不足所添加的一些会干扰读者、与信件无关的内容。手写信件的分段<sup>1</sup>错误数不胜数：伯林常常在窄长的纸张上面写信，很自然地会用加大行间距、换页或者分行等方法来表示分段，而不是采用首行缩进的格式，如果过度拘泥于原稿的布局安排，这样的分段标示就会消失殆尽。同样，伯林对标点符号的运用颇为随意，带有很强个人风格，（有时）甚至让人不明就里<sup>2</sup>——手写稿中，往往到了行末，标点符号便踪迹全无；尽管如此，总的说来，我并不会补上伯林遗漏的标点，因为根据上下文，哪里该有什么符号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无视这些遗漏的确于读者无益，我会不动声色，悄悄加上标点；有时候，一些在我看来尤其会产生误导作用的标点，我会删除或者修改它们。

### 缩略语及其他统一标示

注释中收件人的姓名也采用了首字母缩写的方式。在注释中，为了避免 **undergraduate**（本科生）这个长词的重复出现，不使用这个词：但是“本科生”这一身份可以从“1929—1933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这一注释格式推断得知。同样，为了节约版面，注解中也不会列出牛津大学教授冗长的（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头衔全称：我认为读者主要想了解的是这位教授所教的课程和所属的学院，以及他（她）是否是研究员（如果是，那么就得称为“导师”）；其他差别微妙的职称称谓，比如说他（她）是否是大学讲师或者拥有别的什么职位，本书就略去不加说明了，不过教授职位的正式称呼本书依然保留。对于此类信息，我在注释中采用的格式是“研究员及哲学导师”，科目与“导师”职位放在一起，因为从字面上严格说来，“研究员”并不受特定科目所限；这个职位的正式说法，应该是“研究员及哲学课程的导师”，因其过于含混，略显冗长，我在本书中就避开不用了。

本书中尖角括号“〈〉”内插入的是手写信件补充内容、打字信件的旁注和附言，纯粹属于简单更正或事后补充的内容除外，这些内容若再加上“〈〉”

---

1 伯林极少使用的一种手段。

2 例如，他经常单引号和双引号同时使用。

就未免显得繁琐。不管是因何缘故省略的文字，都以“[……]”标示，作者自己使用的省略号则不作此类标示。

xxviii 上述缩略方式以及其他缩略方式都列在后面几页，包括伯林自己习惯使用的姓名缩写，这些在书中出现时就不一一加注了。

如果信件中提及的人物事件未加注释，这可能是由于无法确认所涉及的人或事，或是因为从上下文来看，确认这些人或事意义不大。如果有人能够提供相关信息，对此予以弥补，我将不胜感激。

## 致谢

我知道，在这类书的末尾，按惯例是要由在书名页上署名的那个人做些说明，这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实际上是另外的好些人，而所谓的作者和编者不过是做了一些曲解剽窃，插入一些错误的引文而已。

——R.D.道<sup>1</sup>

我非常感谢多年来与人们的对话[……]我不会恣意于例行惯例，愚昧地宣称这些人士与本书可能包含的错误无关。不错，一切错误是要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如果我能够发现这些错误，我原本可以改正它们，可是，既然我不能发现这些错误，由于客观原因，我也无法知悉这些错误是否可以追溯到那些对我发生影响的人士所持的观点上。

——迈克尔·达米特<sup>2</sup>

这个问题太琐碎，恐怕这次我们无能为力。

——丘吉尔协会秘书<sup>3</sup>

---

1 R.D.道，《埃斯库罗斯手稿之校对与研究》（剑桥，1964），序言，第viii页。

2 出处同前（上文第7页注1）。引用的目的相同。

3 2003年3月6日致凯特·佩恩的电子邮件，对要求确认丘吉尔某篇演讲中部分内容的信件的答复。

伯林的其他十四本著作，迄今为止我编辑或者参与编辑了大部分，从合作这一点来看，本书表现得最甚。它的确是一个多方合作的项目，而我不过是让各方专业人士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合作的渠道。如前所述，网络资源，尤其是神奇的Google搜索引擎，还有牛津的图书馆综合电子系统的资源，尤其是牛津大学图书馆信息系统（它的电子目录）和网络版的《名人录》以及《英国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这些资源改变了我的工作性质；但我还是要大量地求助于众多学者的专业知识和伯林的朋友提供的信息，他们慷慨地为本书奉献出他们积累多年的知识和智慧。叙述他们善举的文字，足以写成一篇独立的长文。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对几位主要人物说几句话，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即便这种做法不免厚此薄彼。

xxix

首先我要感谢收信人、他们的继承人以及受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就无信可编了。从各方面来看，无论是向我提供背景信息还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对我非常有帮助，也非常友善。他们所作出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和我在收集资料中偶尔遭遇到的一些人的沉默回应和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是要抱怨那些不愿提供信件的人，但是我很高兴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

接下来要感谢的人是伯林的著作管理人。<sup>1</sup>伯林夫人一直都非常亲切慷慨，富有耐心，偶尔我和她对一些事情的判断起初并不一致，即便这时候她也很耐心。她还对信件选集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彼得·哈尔本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帮助、支持和建议。由于伯林夫人的慷慨，我还得以一直享有我的出色助手塞琳娜·摩尔的服务，她化名萨莉·登霍尔姆—扬，1972年时曾经是伯林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秘书。除了对本书的信件整理作出直接贡献外，自1998年塞琳娜成为我的助手起，她还以圆通的工作方式和圣徒般的执著管理着我的办公室，在她的概念里，她的职责范围涵盖面极广，这使我得以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编辑工作，我每天都意识到自己无比依赖于她的忠诚支持。

要感谢的人中还包括帕特·乌特钦，伯林的私人秘书。从我认识伯林以

---

1 1996年，以赛亚·柏林指定伯林夫人、彼得·哈尔本和我为他的著作管理人。2000年伯林夫人指定了第四位著作管理人阿兰·莱恩，莱恩知识广博，非常乐意向我提供帮助。

来，她就一直担任这个职位。正如我在自己先前出版的有关书籍的鸣谢辞中记载的那样，在那些年里，她是伯林和他的创作活动之间的主要纽带。她一样也成为了我最亲近的朋友。她无微不至地为我所做的一切，难以用寥寥数语概括。我这个宏大出书计划主要就是依靠她的专业知识和热情。她对我的支持始终如一，即使是在伯林去世之后，伯林的遗作全部移交给了博德莱安图书馆，她的日常事务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但影响仍在继续。她不辞辛苦地阅读那些信件打字稿，提出了无数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特别要提到的是伯林的四位老友，他们成为不可取代的私人信息来源，尤其是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伯林早期的背景信息，这样的帮助已经越来越难得，因而弥足珍贵。玛丽·班纳特，婚前姓费希尔，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熟xxx识伯林；詹妮弗·哈特，婚前姓威廉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1935年成为伯林的朋友；琼·弗拉德认识伯林较晚，但是同样对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所知颇多。他们都乐意向我解释伯林引用的典故，并回答大量问题。詹妮弗·哈特帮助更大，她花费大量时间为本书脚注查找材料，并记录下来给我。出于对她无私侠义协助的感激，当艾琳·伯林向我建议这本书应该献给她的時候，我感到格外欣喜，因为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另一位无可匹敌的与伯林同时代的第一手信息来源是小阿瑟·施莱辛格，他于1943至1944年冬在华盛顿与伯林相识。尽管他还有其他许多事务缠身，还是读完了伯林在战时所写的信件，为我注释信件中出现的许多名字提供了帮助，让我节省了大量时间。他还告诉我许多我尚未发现的信息。苏珊·布鲁尔（著有《为了赢得和平：二战期间英国在美的宣传活动》）和尼古拉斯·卡尔（著有《推销战争：二战时期英国反对美国“中立立场”的宣传活动》）同样慷慨地用专业眼光阅读了这些信件，他们解释了信中许多典故的出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查找这些典故将非常艰难耗时。

2000年末，伯林研究专家乔舒亚·彻尼斯，当时还是耶鲁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在访问了伯林著作托管会的网站后，通过电子邮件毛遂自荐。如今他已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坚持不懈的通信者，一位富有效率且善解人意的协助者。如今他愉快地来到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只要有可



能，我可以比以前更加无所顾忌地使唤他了。

迈克尔·休斯，博德莱安图书馆伯林文件的保管员，在精明强干的马修·尼利的帮助之下，兴高采烈地投入这项工作。对于他所负责保管的文件，凡是索取相关信息和文件副本的来函，他都耐心予以答复。在为文件编目分类时，他发现了一些被我忽略或者遗忘的文本（有的非常重要），并且提醒我留意其重要性，这对本书的编辑非常有益。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的传记作者，把他和伯林谈话的录音和文字记录，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文稿，都捐给了我负责的伯林著作托管会，这些资料最后都移交给了博德莱安图书馆。我非常感激他堪称典范的开放胸襟，毫无保留地让我享用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工作成果。

大约十三年来，贝蒂·科洪一直在为我打字录入伯林（和其他人的）难以辨认的手稿，以及伯林历任秘书记录的口述稿，她解读伯林潦草笔迹的能力无人能及。这本书所需的大部分录入工作是她完成的。对她的优秀技能、xxxix坚韧毅力、不懈意志和谦恭态度，我赞赏不已。

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我的工作得到了众多捐助人的慷慨支持。他们默默奉献，不求回报。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他们也是如此，我像以往一样对他们心怀感激和依赖；我还要感谢已故的布洛克勋爵，开始时是他为我筹措启动资金，后来又一直关注该资金的情况。而最近，在肯尼斯·B.威尔逊的促成之下，福特基金会又给予帮助，我得以开展一些长期压在我心头、琐屑耗时的补充工作，我的电子资源也得以补充改善。为此，我热忱地感谢肯尼斯和基金会的雪中送炭之举，他们的帮助所产生的主要成果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会有描述。

两位不知疲倦、认真细心、富有想象力却谦逊低调的研究学者，詹妮弗·霍姆斯和凯特·佩恩，在最近几个月不仅挽救了这项出书计划，也救了本书编者一命。我还没开始编辑，凯特就在位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完成了调查，并且发现了几份之前我从未听说、极为重要的文件。她还耐心复核了本书的大量注释，使我在想要无限期地延后填补注释的缺

漏之时，能够不懈地坚持原来的标准。她还草拟了许多遗漏的注释，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给本书带来巨大的帮助。而且，她和詹妮弗还找到了许多人的下落，这些人躲过了先前我和其他人对他们的所有查访；关于她们某些寻访经历的传奇故事，若不是亲耳听到，真是难以置信。除了担任本书的家谱学家之外，詹妮弗还补充了遗漏的注释，在我心有旁骛之时，她着手填补了一些导致过多知识空白的缺漏之处。特别要说的是，她草拟了本书大部分编辑方面的“结缔组织”，还检查了之前出现严重错误的信件日期和排序。的确，在编写本书的最后阶段，我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协助，尤其是这两位能力出众的研究者，她们成为我们这个编辑团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对伯林在二战期间所写的那部分信件的编辑起了很大作用。

有关俄文方面的问题，我主要还是求助于海伦·拉帕波特，在编辑伯林的其他著作时，她已经提供过帮助。而且我还像以往一样依赖于（就像依赖于詹妮弗·霍姆斯和凯特·佩恩那样）她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堪为典范的工作效率。关于希伯来文/犹太语方面的问题，我主要求教丹尼尔·弗兰克，以及像他的名字一样富有智慧的诺曼·所罗门。意第绪语方面的问题，我求教根纳季·艾斯特赖。

虽然我本该继续一一说明每个人对本书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如何为本书提供协助，但是人数众多，这里只能列出一个名单以表谢意。这个名单里的许多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本书提供了具体协助，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此，我谨向名字被我遗漏的人表示歉意，希望他们向我投诉，好让我有机会采取补救措施。我要感谢的其他人是——当然，还包括本书的读者——保琳·亚当斯，戴维·阿兰，布丽吉德·爱伦，苏姗·玛丽·艾尔索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苏姗·阿什克罗夫特—琼斯，诺尔玛·奥贝坦—波特，琳达·贝利，西蒙·贝利，克莱尔·贝克，贡纳尔·贝克，凯特·贝拉诺瓦，理查德·贝尔，鲁斯·本·艾里，玛格丽特·本特，贝里尔·布莱尔，伊丽莎白·波德曼，约翰·波德利，玛丽·波恩，彼得·博斯维尔，巴鲁克·布兰德尔，迈克尔·布洛克，蕾丽亚·布洛德森，杰弗里·布朗，萨莉·布朗，伊恩·布伦斯基尔，菲利普·伯纳姆—理查兹，罗恩·布什，贝奇·凯普，厄休拉·卡莱尔，特

瑞尔·卡弗, 约翰·卡森, 唐·查普曼, 伊丽莎白·奇尔弗, 玛丽·克莱普森, 杰瑞·科恩, 珍妮特·科里尔, 朱迪思·科索伊斯, 朱丽·柯蒂斯, 卡罗琳·达尔顿<sup>1</sup>, 西尔维亚·丹尼尔, 罗宾·达尔沃尔—史密斯, 凯特·戴, 提摩西·戴, 杰奎琳·迪恩和她的同事, 厄内斯托·德尔·瓦尔·莱纳, 约翰·唐纳德森, 詹姆斯·道格拉斯, 罗斯玛丽·邓希尔, 马斯坦·伊博特哈伊, 瓦莱丽·艾略特<sup>2</sup>, 肯沃德·埃尔姆斯利, 罗伯特·伊万斯, 琼·法斯曼, 儒勒·菲尔德曼<sup>3</sup>, 扬·费勒乐, 塞夫·弗勒斯, 罗伊·福斯特, 奈杰尔·弗朗西斯, 露西·加斯特, 约翰·格迪斯, 古德哈特勋爵, 西瑞尔·古德曼和马丁·古德曼, 阿兰·戈登, 斯蒂芬·高尔, 米查·格罗斯, 斯特芬·格罗斯, 约翰·戈内, 塞缪尔·葛滕普兰, 阿德莱安·黑尔, 安·哈代, 爱伦·哈代, 罗宾·哈兰德, 伊恩·哈里斯, 布赖恩·哈里森, 斯蒂芬·哈里森, 塞琳娜·哈斯廷斯, 罗杰·豪泽尔, 彼得·西尔斯, 乔安娜·海恩斯, 艾米丽·海伦斯, 里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瑞文斯, 帕克·霍南, 戴维·霍普金森和黛安娜·霍普金森, 吉尔·休斯, 罗杰·哈钦斯, 阿拉斯戴尔·詹姆斯, 彼得·杰伊, 约翰·詹金斯, 杰里米·约翰斯, 迈拉·琼斯, 亚历山大·卡比谢夫和他的家人, 吉姆·凯茨, 多弗—伯尔·柯勒, 查尔斯·L.科克, 莱昂内尔·科尚, 芭芭拉·克拉夫特, 克里夫·莱西, 尼古拉·莱西, 菲利普·兰伯特, 约翰·兰德斯, 马特·兰德鲁斯, 斯蒂芬·拉萨姆, 米吉·列维, 安德鲁·罗尼, 亨利·卢斯三世<sup>4</sup>, 保罗·鲁纳, 克里斯·麦克道尔, 彼得·麦金纳利, 理查德·麦凯恩, 阿奇·麦肯兹, 约翰·马蒂科特, 布赖恩·马吉, 亨利·O.马龙, 克里斯蒂娜·梅森, 道格拉斯·马修斯, 德温特·梅, 玛丽·梅瑞, 克莱尔·米勒, 戴维·米勒, 安·米切尔, 盖尔·莫纳汉, 珍妮特·莫里斯, 爱德华·莫蒂默, 阿纳托利·奈曼, 彼得·内尔森, 奥布里·纽曼, 琼·纽曼, 佩内洛普·纽萨姆, 希拉·诺贝尔, 朱迪·诺克斯, 欧诺拉·奥尼尔, 韦雷娜·昂肯—冯·特罗特, 阿曼达·欧平斯基, 彼得·奥

1 这里我得打破自己的规则, 补上牛津大学新学院档案管理员卡罗琳的名字。我没完没了地向她咨询了无数问题, 她都耐心、宽厚、娴熟地解答了。

2 蒙其许可, 我得以出版来自费伯档案馆的、伯林给T.S.艾略特的信件。

3 以色列一位养牛的农夫, 感谢他愉快地回答了伯林网上图书馆提出的问题。

4 感谢他允许我发表1945年8月13日他父亲给伯林的电报。

xxxiii 本海默, 波利·彭伯顿, 克里斯·佩尼, 约翰·佩尼, 欧弗拉·佩尔穆特, 埃利奥特·菲利普, 罗兰德·菲利普斯, 杰拉德·菲利普森, 埃琳娜·派克, 莱斯利·皮特曼, 简·波特, 奥利弗·雷迪, 戴维·瑞克特, 詹姆斯·里德, 朱丽安·瑞德, 菲尔·瑞德, 马里奥·里哈尔第, 迈克尔·赖尔登, 克里斯汀·里奇, 罗伯特·里特, 提摩西·罗宾斯, 加雷思·罗伯茨, 本·罗杰斯, 肯·罗斯, 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 乔迪·鲁塞尔, 阿兰·瑞安, 米奇·萨切尔, 珍妮特·桑普尔, 露比·桑斯特, 罗纳德·舒哈德, 索菲亚·舒茨, 伊冯娜·斯科特, 朱迪·塞巴, 萨姆·塞巴, 米拉弗·西格尔, 艾维·施莱姆, 罗伯特·西尔弗斯, 本·辛普森, 罗伊纳·斯科尔顿—华莱士, 吉尔·斯基德莫尔, 安·帕斯捷尔纳克·斯拉特, R.E.F.史密斯, 乔安娜·斯内林, 娜塔莎·斯彭德和斯蒂芬·斯彭德, 迈克尔·斯坦斯菲尔德, 罗伯塔·斯特普尔斯, 威尔·萨尔金, 约翰·萨瑟兰, 马乔瑞·苏尔科, 阿兰·塔迪艾罗, 沙伯泰·特福斯, 卡斯帕·提阿克斯, 迪尔德丽·图米, 布伦达·特里普, 克莱丽塔·冯·特罗特, 杰夫·瓦尔登, 朱利安·瓦尔顿, 贝尔纳德·瓦塞尔斯坦, 斯蒂芬·温德霍斯特, 奈杰尔·韦斯特, 克里斯多夫·威克姆, 玛丽—凯·威尔玛斯, 迈克尔·沃尔夫斯, 麦克·乌丁, 克里斯蒂娜·伍德兰德, 玛丽·约。在本书酝酿形成的数年中, 上面提到的人中有一些已然辞世, 但我仍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 跋

艺术, 以及像夏日闪电般短暂的个人快乐: 这些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亚历山大·赫尔岑<sup>1</sup>

在本该对读者表示欢迎的前言部分, 我却在结尾列出一份感谢名单, 虽然这份功劳簿非常有必要, 而且出自我的真心, 但是这样的结尾还是给人

1 A.I.葛特森,《我的过去和我的思想》(莫斯科, 1954—1966), 卷16, 第135页, 伯林在《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中翻译并引用, 见《对人类的适当研究》, 第524页。

以苍白无力之感。所以，接下来我要为自己说上几句。

我认识以赛亚·伯林长达二十五个年头。了解他这样一个完美的人<sup>1</sup>，成为他的朋友，与他合作编辑出版他散落各处的文字，这都是我从未敢奢望或追求的目标。我生性喜爱周密再周密地事先计划，喜欢理性再理性地照章行事，可是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却花在了了一项不可预测的任务之上。由于接二连三的意外变故，我出过错，如果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别的地方，我可能就失去如今这份职业了，这真可谓既有趣，又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伯林是一位圣人，我得说他是邈邈鬼的守护神；在许多方面，我感觉这个身份很适合他。 xxxiv  
不管怎么说，幸运之神最终向我绽开了笑靥。而说到与伯林的相处，蕾丽亚·布洛德森的结论真是再好不过，那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经历的确非同寻常。

亨利·哈代

丹麦，诺斯加兰德，提斯维尔德·伦德，2002年8月

牛津，沃尔夫森学院，2004年2月 xxv

附言：我怀着悲伤谨记于此，本书所题献的詹妮弗·哈特，于2005年3月19日去世。

---

1 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遭遇记录下来，也许可以用来支持我的这一评价。我偶遇讽刺作家约翰·威尔士（1936—1998），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那是在1996年2月17日，伦敦布鲁克斯俱乐部，伯林四十周年结婚纪念庆祝会之后，当时他正要离开。他已经知道自己患有淋巴瘤，活不过两年。我们相互说明了和伯林的关系，临别，他戴上围巾，转向楼梯，对我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我怀疑，这是否也属于过度赞美？



##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

以赛亚·伯林是其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这位俄裔英籍犹太人，既是一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和教授。他充满智慧，对人类的各种动机、希望与恐惧有着与生俱来的非凡洞察力；他精力充沛，善于享受生活，喜欢结交各类朋友，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气质。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也情有独钟。

他捍卫并发展了在他看来是自由思想的精髓，并使之取得了经典地位。这一思想在现代思想界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他还率先提出和发展了关于人类终极理想的多元主义观点，这个观点支持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值得我们将它牢牢植根于自己的世界观中。与人类已产生的大多数思想和信条相反，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人的一生中，或是在某个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实现，许多理想甚至根本无法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因而也就不存在唯一客观的目标等次和唯一正确的生活准则。

基于以上这一点，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人生观的自由（在纯粹由人性需求所设定的重要而广阔的范围之内）。同时，或许更加极端的看法是，一个完美和谐、没有摩擦的社会原则上应该是以各种不同观点并存为理想的，虽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类似观念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可能不足为奇，但是正如伯林所言，它们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早就提出来，也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和牢不可破。这些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中伯林功不可没。

像其他伟人一样，伯林有一种促成事物趋向完美的才能。有幸认识他

的人都可以证明，与他相伴，倾听他滔滔不绝的精彩谈话是一种特别鼓舞人心、催人向上的愉快经历。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谈话者，一方面是因为他那语速飞快、音节含糊的讲话方式，这是可以模仿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广博知识，这个谁也模仿不了。他阅读过大量的各国作品，认识（并深深影响了）英国本土和本土之外的许多名人雅士，他的谈话和作品中经常夹杂着众多人名，多到令人困惑（但不是借此抬高身价，而是为了方便起见，用人名来代表他们的观点）。

除了二战期间为政府服务的一段经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一位牛津学者的身份度过的，但他从来不把自己束缚在这个领域。他常常同时活跃在许多其他领域，游刃有余，却不事张扬。他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不同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日复一日，毫不倦怠。他曾经在许多国家向学识渊博的名人发表演讲，与学生社团（不仅是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和大学预科班的学生进行交谈。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他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乐于回答。在这些人中，有正陷于困境的他从前的学生，有研究他作品的学者，有就自己从事的工作向他征求意见或寻求帮助的陌生人。他经常在广播里做演讲，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他频繁接受采访，尤其是外国记者的采访。对于其他人觉得难以承受的压力，他总能积极面对，在需要的场合他会一本正经，但也会时不时调侃一下。

他不是圣人，也从未想过成为某一类圣人。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充满了在别人身上他会称之为“道德魅力”的东西。这种魅力在他的谈话方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时这会使不了解他谈话方式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他在谈话时不会紧扣一个话题，他会时不时地往椅背上放松地靠靠，抬起头，然后随兴而至地谈下去。他总是饶有兴致地岔开话题，漫无边际地扯开去，然后猛地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或者干脆换个话题，显然完全忘了对方在这期间所说的话，即便是颇为深入的交谈也是如此。

以上这个特点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会显得缺少礼貌，但他显然完全出于无意，同时也反映出他全神贯注于思考头脑中的问题。他总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思考，经常不循常轨。与他交谈，你需要飞速思考，但你要是想搞清楚问



题，进而得出清晰的结论，只会感到沮丧。他并不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讲话，有时这是因为对方尚未开口，他已经清楚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他不喜欢（也不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智慧无人可比。他理解问题异常迅速，而且能够同样迅速地给出富有启发性的答案。他直言直语，令人耳目一新；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格外开放。牛津体制中某些过于谨慎的做法与他比起来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和缺乏活力。他喜欢说东道西，满肚子逸闻趣事，但都不带恶意。实际上他不善于讽刺挖苦，也不想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即使他发表不喜欢某人的议论，对他来说也更像是棋局中的一步，而不是什么诋毁性的断言。他喜欢评价别人，并将他们分门别类。众所周知，他将人分为两类：刺猬和狐狸——刺猬指那些自以为无所不包、自成一统的人，狐狸则指那些乐于兼收并蓄的人。事实上，他这种轻松随意地将人分类的爱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善于挖掘和展示一个人或者一个深奥作家的本质的能力。

xxxviii

作为一位演说家，他对所讲内容了如指掌，他的演说引人入胜（令人庆幸的是他的部分演说留有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国家声音档案馆听到）。<sup>1</sup>他始终牢记自己是犹太人，但从不对此感到不自在。他终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建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伦敦皇家歌剧院的监事，是一位忠实的歌剧迷，也是国家美术馆董事会的成员。他荣誉等身：曾被授予爵士称号、英国功绩勋章和许多名誉博士头衔，任过梅隆讲席教授和不列颠学会主席，获得过耶路撒冷奖、伊拉斯谟奖、阿涅利奖和利平科特奖，但他总是谦虚地认为这些荣誉大于自己的实际成就，觉得人们高估了他。他超越生活，特立独行，是一位无法替代的杰出人物。

以赛亚·缪杰列维奇·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父母是讲俄语的犹太人。里加当时归俄国统治，后来才成为拉脱维亚的首都。他父亲门德尔开了一家木材公司（主要是为俄罗斯铁路提供枕木），母亲玛丽性格活泼，富有教养，对艺术特别痴迷，她把这种痴迷全部传给了自己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伯林对音乐的偏爱，尤其是歌剧，当然不仅是歌剧，是从孩提到长大成人贯

1 伯林1965年所做的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讲座录音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也可听到。

穿他一生的一条主线，对他起着深刻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明显。

1915年，德军包围了里加，伯林一家于是搬到俄国境内其他地区，先是住在安德烈亚波尔，从1917年起住在彼得格勒。那一年，以赛亚先后目睹了社会民主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惊恐万分、脸色苍白的人在街上被一群暴徒又拉又打，这次经历使他后来痛恨任何形式的暴力。

1920年，伯林一家与共产党人签订了协议，重新回到里加。但是父亲决定将全家迁往英国，他在那里有朋友和生意伙伴。1921年初，他们到了英国，先是住在瑟比顿，后来搬到伦敦，住在肯辛顿区，几年后搬到汉普斯特区。xxxix 他先在一所预备学校上学，后来进入圣保罗中学。在保持自己俄裔犹太身份的同时，他将自己完全融入英国社会，这使他能够成为那个时代英国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

192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学习，1931年和1932年，先后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上获一等学位。之后他去《曼彻斯特卫报》面试，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又准备攻读法律。但是时任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的理查德·克罗斯曼给了他第一份差事，让他教哲学。几乎同时，他被遴选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他一直在此工作，直到1938年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正是在全灵学院的最初几年，他为霍姆大学图书馆出版社写了著名的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193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在挑选作者时，首先考虑的对象并不是伯林。

二战初期，伯林继续教书。1941年他被英国情报部派往纽约，1942年又被转派到位于华盛顿的英国使馆，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46年（中间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月）。他领导一个团队，负责起草有关美国政治舆论变化的报告。从华盛顿寄往白厅的报告虽然没有署他的名，但大部分都由他起草，这些报告一直以文笔优美著称，并引起了丘吉尔首相的注意。报告的部分选集于1981年出版（《华盛顿快讯：1941—1945》，H.G.尼古拉斯主编）。

伯林曾经深情地追忆那段经历，其中有关他在苏联之行中与鲍里

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作家会面的描写尤其感人。他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对他影响特别深远，而阿赫玛托娃在其诗作的许多段落中提到他也证明了伯林对她的深刻影响。她写道：“他不会是我深爱的丈夫/但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我与他/将惊扰二十世纪。”她坚信斯大林对他们1945年会面的反应与1946年开始的冷战有直接关系。

到二战末，伯林决定放弃哲学，改为研究思想史——“一个你在生命结束时有可能比在生命开始时了解更多东西的领域”。<sup>1</sup>抱着这个想法，1950年他回到了全灵学院，并于1957年接替G.D.H.科尔成为牛津大学社会学及政治理论齐契利讲席教授。他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当然也最有影响力。在演讲中他以奔放的热情和巧妙的言辞，明确表态支持“消极”自由，即免受他人干涉以及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择的自由，并向 x1 我们展示了“积极”自由，即自我控制的“自由”（人们通常向往的自由），如何轻易地转变为根据那些自认为是人类生活目标的仲裁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标准而进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对自由的讨论成了此后其他人思考自由时必不可少的参照，并且已经渗透到对这个话题的所有讨论当中。但是，或许他过于低调，或许他的思想有意不成体系，或许他拒绝提供任何类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严格说来，他没有思想继承人，也没有创立什么思想学派（他自己对此深感欣慰）。

在当选齐契利讲席教授的前一年，他放弃了显然已经习惯的独身生活，娶艾琳·哈尔本为妻（婚前姓德·甘茨堡）。在将近五十岁时，他找到了人生伴侣，妻子从此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三个继子（他自己没有生育）也使他体会到了家人之间的关爱之情。他经常建议别人结婚。

1966年，伯林成了牛津大学新成立的研究生院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于次年辞掉了教授职位。这之后，他一直在沃尔夫森学院工作，直到1975年“退休”。要不是他善于筹集资金，积极倡导建立新的体制，发扬优良传统和忠诚作风，沃尔夫森学院不会有如今这个规模，也不会有现在这个院名（最初叫作艾弗利学院）。沃尔夫森与福特基金会能够慷慨捐资兴建教学

1 伯林，《概念与范畴》，第viii页。

楼, 捐赠物品, 都与他个人的亲自参与有直接关系。

除了沃尔夫森学院, 伯林留给后人的主要遗产是他的著作: 他写了大量风格各异、个性突出、富有洞察力的作品。据他自己客观评价,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对四个领域进行研究探索, 即自由主义、多元主义、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以及浪漫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他在这些领域里阐明了许多问题, 即使在今天, 他阐述这些问题的方式仍像当年他的观点首次公开发表时那样令人振奋。

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伯林作为作家的声望远不及他的实际成就, 大多数作品只是应景之作(他说, “我就像一辆出租车, 等着人们招手搭载”), 而且匿名发表。以书的形式出现的很少, 主要有《卡尔·马克思》、《刺猬与狐狸》(这是一本关于托尔斯泰历史观的长文)以及《自由四论》, 这本文集里收录了他的就职演讲。但他在1976年出版了《维柯与赫尔德》, 之后不久又出版了四卷选集(1978—1980)。基于这些力作, 当伯林在1971年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时, 他的朋友莫里斯·鲍拉说: “他就像耶稣和苏格拉底一样, 问世的作品不多, 但是思考得很多, 讲得也很多, 他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1</sup> 他的其他作品发表于1990年代, 包括两部当初写完没有马上发表的作品, 还有一部在他去世那一年的年初出版的回顾性文集, 书名叫“对人类的适当研究”。

令人高兴的是, 与莫里斯·鲍拉不同, 伯林的许多讲话方式记录在他已发表的论著当中。他讲话很有个性, 经常通过分析别人的思想来阐述自己思考的重要问题, 而且条理清楚, 新论迭出。其著作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是, 他从来不超然世外, 始终牢记思考探索的最终目的是增进理解、深化对道德的认识。他的朋友诺埃尔·安南说, “在一个词不够的时候, 他总是要用两个词”<sup>2</sup>, 如果不去掉他的表达特色, 就根本无法总结出他所要传达的信息——他不喜欢“信息”这个词。但中心内容还是显而易见的。

1 致诺埃尔·安南的信, 摘自安南的《一位我热爱的人》, 休·劳埃德—琼斯主编, 《莫里斯·鲍拉颂》(伦敦, 1974), 第53页。

2 伯林, 《个人印象》第2版, 第xxiii页。

伯林曾经说他作品的主旨是“不相信任何宣称掌握全部有关人类行为已知事实和理论的言论”。<sup>1</sup>他的基本观念是，对于“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普遍的、最终的、完全的、显而易见的答案。他在别人的作品中看到这个观点，十分认同，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采用并发扬光大。西方思想界最古老、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是18世纪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旗帜下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姿态提出来的，而他的观念否定了这个命题。

与启蒙家们认为存在一个最终囊括所有目标和理想的不受干扰的有序综合体不同，伯林坚持认为存在无限多的相互竞争、互不相容的终极价值和理想，每个人经常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择。我们无法为这些选择做出最终的理性辩护，因此不管我们多么相信自己的选择，都不能将其强加于人。“人们可以透过多扇窗户观察生活，并不存在哪一扇看得更清楚，哪一扇看得更模糊，哪一扇看到的更真实，哪一扇看到的更失真的问题。”<sup>2</sup> xlii

每个人，每个文化，每个国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目标和标准，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能将这些目标和标准合并为一个能够实现全部目标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妥协和冲突的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每个人的意识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冲突。更多平等意味着不够优秀，或不够自由；正义会阻碍仁慈；坦白会排斥善良；自知会危及创造和幸福；高效会阻碍自然。这些都不是暂时的局部问题；它们是道德领域里普遍的、无法回避的，有时甚至导致悲剧的特征；悲剧实际上远不是由可避免的错误引起的，它是人生状态的一个特有现象。不存在完美的统一体系，存在的只是一个永恒的、有时令人痛苦的、对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进行无序选择和审慎权衡的渐进过程。

人们有时将他的多元主义误认为相对主义，对此他予以否认，实际上两者差别很明显。与多元主义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自由不应该受到干涉，特别是不应受到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可以替我们作出更明智

---

1 伯林，《俄国思想家》，第viii页。

2 伯林，《个人印象》，第4页。

选择的人的干涉。伯林的多元主义佐证了他一直以来奉行的态度，坚决反对由任何独裁者和极权者进行的压迫和操纵，包括法西斯分子、官僚主义者、传教士、恐怖主义者、革命者、暴君、平均主义者，以及“有组织的幸福”的组织者和提供者。伯林眼中的英雄之一是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出很多赫尔岑的特点，跟赫尔岑一样，他害怕为实现在遥远未来的某一未知时刻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而做出牺牲：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不应该为了最终的共同幸福这个幻想而受苦乃至送命。

伯林知道观念只有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才有意义，因此他总是从具体的个体而不是从抽象的角度来阐述自己以上这些观点。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在思想上认同那些彼此之间观点迥异、同时也与自己观点悬殊的人，这使他受益匪浅，使他能够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进行丰富翔实的描述，这些人包括别林斯基、哈曼、赫尔德、赫尔岑、马基雅维利、迈斯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维柯、丘吉尔、纳米尔、罗斯福、魏茨曼等。他对那些与自己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描写经常带有自传的味道。写别人时他总是称赞有加，对自己却十分低调，似乎觉得自己不具备这些优点，其实他对别人的称赞有时完全适合他自己。只要他对自己的一生和言行予以足够的关注，他完全可以成为替自己生平立传的最合适人选；不过，这样的话，他也许就不成其为我们认识的以赛亚·伯林了。

人们常常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以赛亚·伯林，特别是在他晚年岁月里，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谈话者”、“本世纪最富于灵感的读者”、“当今时代最高贵的心灵之一”，人们甚至说他是“天才”。也许现在相信这些盛誉为时过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多个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潜力的无限可能，展示了人类正确使用聪明才智，以一种既不敢故作正经、又不含糊其辞的方式阐明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道德问题的巨大力量。

## 缩略语

<>	在打印稿处附上底稿
{ }	附上错误的底稿
[?]	对原稿不确定(放在可疑文字后,中间不加空格)
[ ]	打印稿中的空格,系打字员不清楚伯林的口述
[……]	编者略去的材料

xlvi

以下为本卷书信集中最常出现的人名。左栏为他们的姓名缩略,除第一次出现加注外,不再另外加注。除非特别说明,这些人名即指右边栏相应人士。

艾耶尔	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
奥博雷	奥博雷·摩根
巴特勒	哈罗德·巴特勒爵士
本	本·尼克尔森
大法官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戴维	戴维·塞西尔勋爵
黛安娜	黛安娜·哈贝克(后姓霍普金森)
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杰伊(也称“道格尔”)
“瞪羚羊”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迪克	理查德·克罗斯曼

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
弗雷德	弗雷德里克·劳
弗雷迪	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
福斯特	约翰·福斯特
盖伊	盖伊·奇尔弗
戈伦韦	戈伦韦·里斯
哈伊姆/查尔斯	哈伊姆·魏茨曼
汉茨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赫伯特	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哈特
华莱士	戴维·华莱士
霍奇金	托马斯·霍奇金
杰里米	杰里米·哈钦森
xlvii 卡梅伦夫人	伊丽莎白·鲍恩
康	康丝坦斯·摩根
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拉什	所罗门·拉什米利耶奇
罗斯	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
里德利/杰斯帕	小杰斯帕·里德利
罗宾	罗宾·克鲁克香克
罗莎蒙德	罗莎蒙德·莱曼
罗伊	罗伊·哈罗德
玛丽	玛丽·费希尔(后姓班纳特)
莫德	约翰·(雷德克利夫—)莫德
莫尔	莫尔·科洛思维特
莫里斯	莫里斯·鲍拉
佩尔斯	理查德·佩尔斯
佩吉	玛格丽特·杰伊, 婚前姓加内特



奇尔弗夫人	萨莉·奇尔弗, 婚前姓格雷夫斯
奇普	查尔斯·波伦
史密斯(先生)	阿利克·哈尔福德·史密斯
斯蒂芬	斯蒂芬·斯彭德
奥斯汀	约翰·兰索·奥斯汀
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索尔特	阿瑟·索尔特爵士
托尼	安东尼·安德鲁斯
威廉斯小姐	詹妮弗·威廉斯
维克多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伍德沃德	欧内特斯·卢埃林·伍德沃德
西勒	西勒·林德
“小宝贝”	莫伊拉·林德
谢拉	谢拉·格兰特·达夫(后姓纽萨姆, 再后姓索科洛夫· 格兰特)
亚当	亚当·冯·特罗特
伊达	伊达·萨姆诺夫, 伯林姨妈
伊内兹	伊内兹·斯彭德, 婚前姓珀恩(后姓玛吉)
伊切克/伊扎克	伊扎克·萨姆诺夫, 伯林姨父
约瑟夫	霍勒斯·威廉·布林德利·约瑟夫
詹妮弗	詹妮弗·威廉斯(后姓哈特)

这些人中大多数和其他一些经常提到的人名一起, 收入索引前的“重要人物生平”。在正文中, 这些人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作简短解释, 并用星号在姓氏前加注标示, 说明在“重要人物生平”中可以找到相关条目。如“斯蒂芬·哈罗德·\*斯彭德”。

\* \* \*

本卷卷首的引言引自塞缪尔·约翰逊为《威廉·莎士比亚戏剧选, 八卷本, 附不同评注者的勘误及说明; 以及塞缪尔·约翰逊对评注所作的评注》(伦敦, 1765)所作的序。此文收入阿瑟·谢比奥主编的《约翰逊评莎士比亚》, 卷1, 第103页(纽黑文与伦敦, 1968) [见《塞缪尔·约翰逊著作(耶鲁版)》, 卷7]。

末页(索引之后)引言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该文收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全集》第37页, 由赫尔曼·格洛克纳 xlvihi 主编(斯图加特出版社, 1927—1951), 卷7。我本人翻译。

## 家 谱

以下注释说明了下文所示三份家谱图依据的惯例。

楷体人名在别处有详细的介绍。

家谱图中仅列出部分家庭成员。入选者主要是伯林提及的亲戚。

19世纪之前，东欧犹太人一直没有固定姓氏；所以家谱图中施内尔森家族最初几代人没有姓氏。即使在19世纪以后，他们的姓氏还是不断改变，比如在弗拉德金家族中，有一些成员使用的是“雷迪埃”这个姓。

名字则更加复杂。任何一个名字，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希伯来文的、意第绪语的、俄语的与英语的都有，在每一种语言里还有不同的昵称。在家谱图中“艾萨克”的许多变体就是这种变异的体现。家谱图中早几代人的名字主要为意第绪语，包括伯林的祖父母。后来的名字就是伯林所使用的。

施纳尔·扎尔曼（·巴鲁乔维奇）  
（鲁巴维彻尔拉比一世，  
也称阿尔特拉比）  
1746—1812

多夫·贝尔  
（鲁巴维彻尔拉比二世，  
也称  
米特勒拉比）  
1773—1827

德沃拉·李  
与  
沙龙姆·沙奇尼  
结婚

米纳切姆·纳彻姆·  
施内尔森

查娅·穆希卡

与  
米纳切姆·门德尔·  
施内尔森结婚  
（鲁巴维彻尔拉比三世，  
也称  
泽玛赫·泽德克）  
1789—1866

施纳尔·施内尔森 与 拉达·弗雷德·施内尔森结婚

其他子女

梅耶·祖克曼

与本杰明·祖克曼

与 弗露玛·施内尔森结婚  
约1840—1916

查耶塔·施内尔森  
约1842—1917  
与  
老以赛亚·伯林结婚  
1841—1908

瑞夫卡—斯拉塔·  
施内尔森  
与  
摩西—伊利泽·  
列文结婚

巴鲁克·施内尔

（通过收养）

肖恩·祖克曼  
与  
西蒙·雅可布森结婚

（多弗·）贝尔·祖克曼 与 西芙拉·弗  
（后姓伯林） 拉德金结婚  
1865—1942

罗莎—弗洛伊德·祖克曼  
约1866—1930  
与  
萨尔蒙·伊兹乔克·沃什诺克结

门德尔·伯林  
1884—1953

与 玛丽·沃什诺克  
结婚  
伊芙杰尼亚·伯林  
约1890—1954  
与  
艾萨克·兰多伯格  
结婚

玛丽亚·伯林  
1891—1933  
与  
索尔·多布金  
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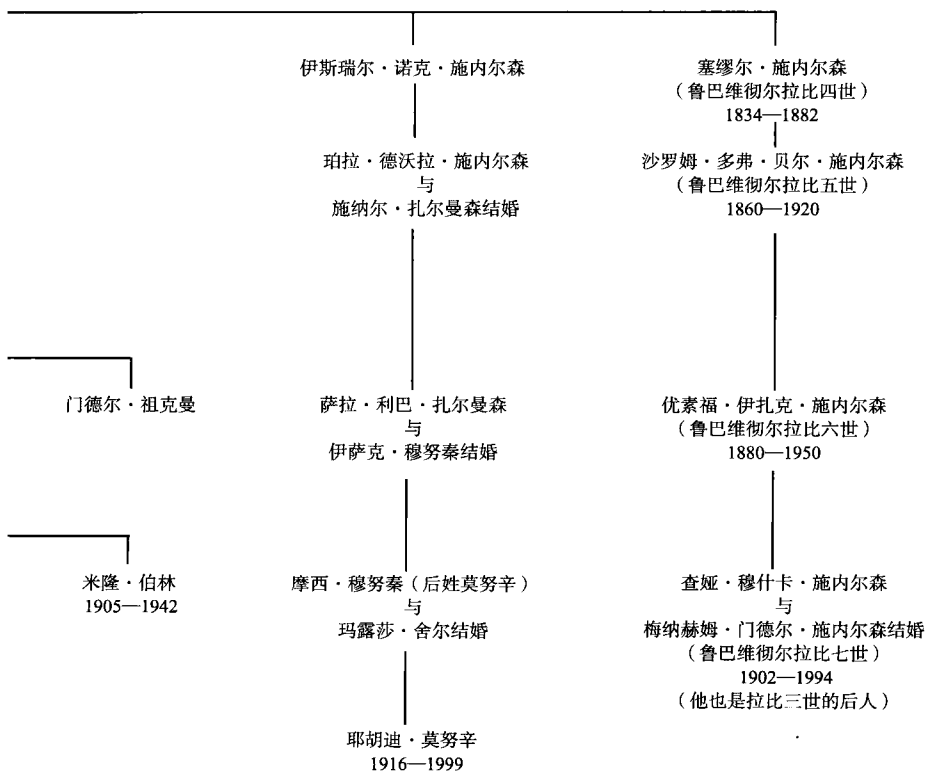
所罗门·伯林  
1893—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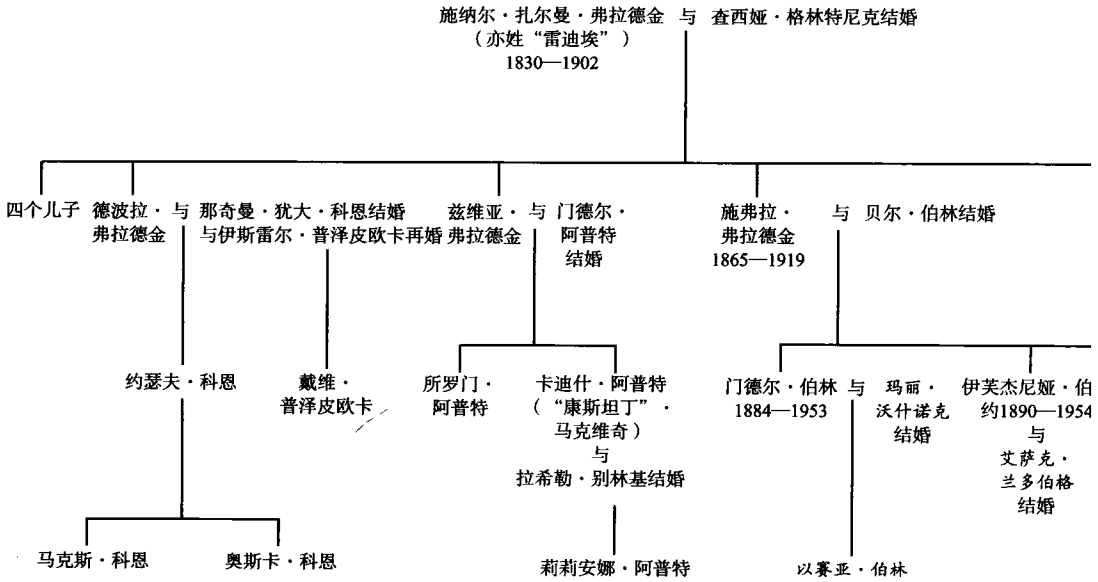
列奥·伯林  
1897—1955

塞缪尔·伯林  
1897—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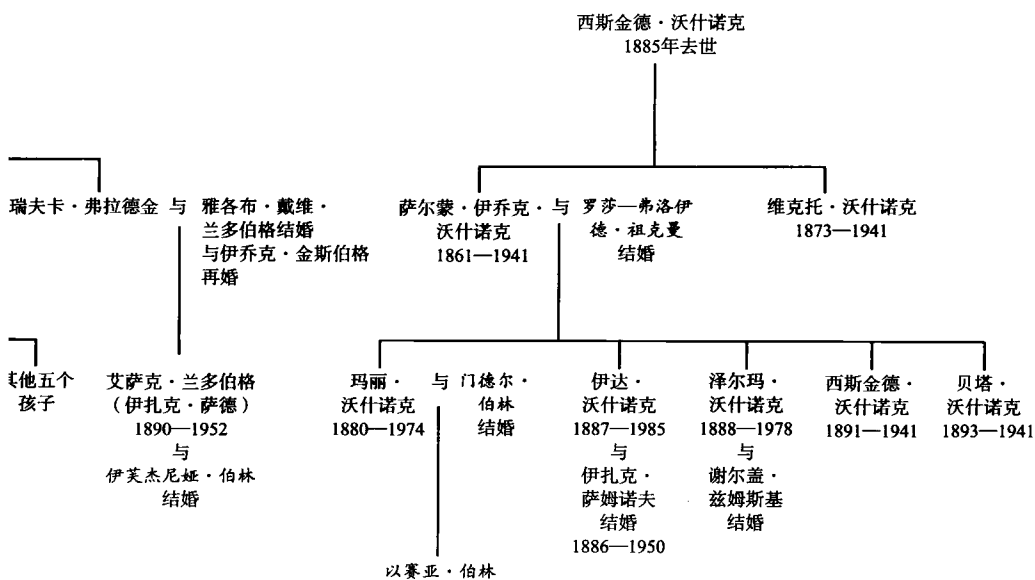
以赛亚·伯林  
1909—1997

伯林家族





弗拉德金家族



沃什诺克家族

# 目 录

征信启事	/ 1
插图目录	/ 3
序言	/ 7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	/ 33
缩略语	/ 41
家谱	/ 45
书信	
伦敦	/ 3
牛津	/ 15
纽约	/ 365
华盛顿	/ 471
莫斯科	/ 689
列宁格勒	/ 701
华盛顿(再访)	/ 719



## 附录

论自由 / 741

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告 / 749

华盛顿快讯 / 766

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 / 775

补注 / 809

年表 / 811

重要人物生平 / 820

索引 / 850

# 书 信

Called  
me

Promise  
given

17/5/28

33, Upper Addison  
Gardens<sup>105</sup>

W. Kensington W. 14

31/3/28

Dear Mr. Chesterton

My friends and I were bold to address this letter to you because we regard ourselves as, in a sense, continuing a tradition which you and your friends had started at St. Paul's School. The boast and peculiarity of St. Paul's has so long time been that it did not produce a uniform type of men for export to the universities, — that Paulines are totally unlike men from any other school, and totally unlike each other; this fact in itself is not remarkable in a day-school; what is remarkable is that this peculiarity finds no articulate expression anywhere: the Spraying societies, the Union and the Junior Debating Society, both of which have now all the force of tradition behind them, are normally anæmic and languishing bodies. 'The Pauline' magazine is still an arid and gloomy publication, which reflects no side of school life whatever. 'The Debater', which in theory represents the rebels, has been declining into a tame collection of writings of the prize-essay type; and has all b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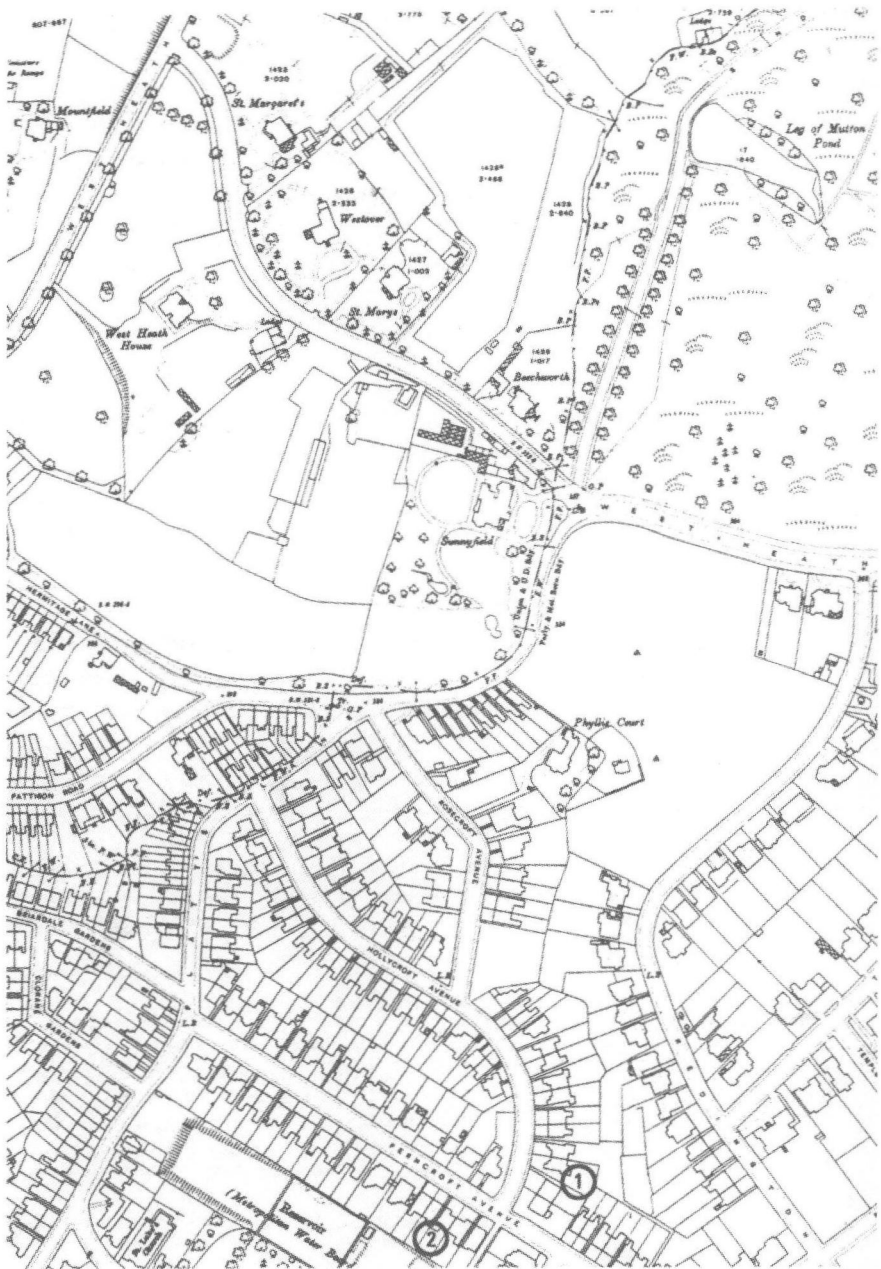
## 伦 敦

儿子健康成长，在视他为聪明善良的人群中读书学习，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大满足。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玛丽·伯林，自传注释<sup>1</sup>

---

<sup>1</sup> 玛丽·\*伯林(1880—1974, 星号表示收入“重要人物生平”), 以赛亚·\*伯林的母亲。



汉普斯特区局部图：伯林一家于1928年10月搬到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1），  
菲利普一家（见下文第301页注4）住在冯克罗夫特大街33号（2）

伯林于1927年7月<sup>1</sup>在位于伦敦哈默史密斯区的圣保罗学校首次参加高级证书考试。他通过了考试，但成绩一般。1927年12月，在被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学院拒绝两次后（一次是申请奖学金，另一次是申请入学资格），第二年春，他得到了圣体学院的奖学金<sup>2</sup>，去那里读“现代课程”，即先参加古典学第一次考试<sup>3</sup>，再读历史，不久以后他同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的研究员G.B.格伦迪<sup>4</sup>进行了一次面谈，格伦迪向他确保奖学金没有问题，于是改历史专业为古典学。

致G.K.切斯特顿<sup>5</sup>

1928年3月31日

伦敦西14区，西肯辛顿，上艾迪逊花园33号

尊敬的切斯特顿先生：

我和我的朋友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

- 
- 1 他提出修古典学（拉丁语、希腊语、古代历史、文学），以英国文学作为副科。见牛津、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证书考试，1927年7月录取名单（剑桥大学，1927，剑桥大学档案中心，合订本编号10/43），第21页。
  - 2 据伯林说，“我可能是在作文上占据优势。作文题目是‘历史的偏见’。我们是伦敦一所颇为前卫的学校，学生常常读一些高雅杂志，如T.S.艾略特的《批评标准》。那上面不久前刚登载了一篇反西方的文章，是一个印度人写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文章题目叫‘历史的偏见’，它正是作文的命题，于是我凭着记忆如法炮制，就这么选上了”。这段话出自他给布赖恩·哈里森主编的投稿，《颗粒：牛津大学圣体学院20世纪院史》，由其成员编写（牛津大学，1994），第44—50页，在第44页上。他提到的文章作者是维苏狄欧·B.梅塔，其《历史的偏见》登于《批评标准》卷6，第5期（1927年11月），第418—425页。作为奖励，牛津大学赠给他一本英国语言学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编的《乔治·桑塔亚纳小品文选集》（伦敦，1920）。
  - 3 关于牛津大学文学士第一次考试和古典人文学科，见“序言”，第11页注1。
  - 4 乔治·贝尔多·格伦迪（1861—1948），1903—1931年任圣体学院研究员及古代历史学导师，1928—1931任高级导师。
  - 5 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1874—1936），新闻记者、小说家、文艺评论家、诗人。与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共同编写《首部克莱里休诗选》（牛津，1982）并负责其插图。此为笔记本传真版，收集了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见下文第573页注1）和圣保罗学校同窗一起收集的一些最早的克莱里休四行体诙谐诗（其格式为首句包含一个名人的名字，四行，长度不一。——译者注），包括G.K.切斯特顿所作的两首（有关塞万提斯和托马斯·卡莱尔），后来以本特利之名发表。G.K.切斯特顿十六岁时在圣保罗学校创办了高中一年级辩论俱乐部，以及同人杂志《辩论家》。G.K.切斯特顿与伯林分别于1887—1892年和1922—1928年就读于圣保罗学校。

正在延续您和您的朋友们在圣保罗学校开创的一个传统。长期以来，这所学校一直引以自豪的特色是，它从不向大学输送缺乏个性、千篇一律的学生：圣保罗人与其他学校的学生完全不同，而且圣保罗人之间也各不相同。这一点就其自身而言，在一所日校里并无什么卓越之处，不同寻常的是目前这个特色完全没有得到表达。各类演讲协会，也就是学生会主办的演讲协会和高中一年级的辩论协会，虽然两者背后都有强有力的传统作为支撑，现在却几乎变成了松软瘫痪的团体。《圣保罗人》杂志仍然死气沉沉，丝毫没有反映我们的校园生活。《辩论家》从理论上说应该代表反叛的声音，现在却沦落成了温顺听话、专门登载获奖文章的刊物，与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完全失去了联系。<sup>1</sup>毫无疑问，与往昔一样，这所学校仍然到处充满富有原创力的天才，但是他们特别害羞，不愿意公开展露自己的才华，因此有必要耐心细致地引导他们。鉴于此，我们觉得应该创办一份新的杂志，这份杂志的唯一目的是发表由学生提交的各类文章。只要稿子写得漂亮，有真情实感，不管看起来多么不负责任，多么幼稚或多么疯狂都可以发表。我们并不看重文风是否优美，主要看稿件是否言之有物、充满朝气。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从学校最不循规蹈矩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一个编委会，这份杂志将代表学生会和低年级学生。我们自然希望稿件由在读的学生，而不是已经毕业的校友提供。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辐射》杂志应该一炮打响，一发行就吸引很多读者。要是您在上面发表一些东西，必将大大提高杂志的销售量，为此恳请您帮助我们实现目标。《辐射》的第一期会在6月1号左右发行（校长<sup>2</sup>已经允许出版一份“新的讽刺期刊”）。不管您寄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十分感激。不论是诗、散文或公开信，我们都十分欢迎。富有活力、敢于直言将是这份杂志的鲜明特色。让我再一次以我们

1 1928年，伯林自己也给《圣保罗人》和《辩论家》投过稿。其中一篇（见下文第741页注1）收入本卷，其他可在伯林网上图书馆阅读，栏目为“未结集出版的作品”。显然他为第一期《辐射》（卷1，第1期，1928年夏，稿费6便士）也写了一些其他文字以及下两页上的文章，但均未署名。

2 约翰·贝尔（1890—1958），1927—1938年任圣保罗学校校长。

杂志的名义, 恳请您支持我们!

您始终诚挚的

以赛亚·M.<sup>1</sup>伯林

(合编者)

大英图书馆, 馆藏手稿补遗 73232A号

切斯特顿先生给这封信加了以下注解: “收到约稿信后, 于1928年5月17日答应供稿。”《辐射》的第一期出版于6月5日, 由于时间太紧, 没能发表切斯特顿先生答应提供的稿件, 但其中刊登了下面这篇描述与切斯特顿先生见面情景的未署名文章(作者显然为伯林)<sup>2</sup>:

#### 访G.K.切斯特顿先生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目的地——位于比肯斯菲尔德<sup>3</sup>的托普梅多, 路程不算长。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 先生的房子微微闪着光, 呈现出一幅安逸舒适的画面。我们感觉有点胆怯, 沿着石板路几步一停地走到那扇橡木门前, 毕恭毕敬地按了电铃, 向开门人客气地说出了我们的来意。开门人说先生现在很忙, 但答应接见我们。听到这里, 我们都抢着往前站, 想第一个和他握手, 情急之中大家差点跌倒。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知从哪里走出来), 他招手示意我们坐下, 于是大家慌乱地挤坐在垫着橙色大垫子的沙发边上, 上身挺得笔直, 手杖在宽大的地毯上无意识地划弄着。屋里似乎到处都是垫子, 橙色的大垫子。我们感觉恍恍惚惚。先生挥了一下手, 也许这就是那只曾经写出某部巨著的手。我们正幻想着, 突然被一个声音唤醒, “美国人……”, 我们侧耳倾听, 听他讲述某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如何异想天开地想到说切斯特顿家族中世纪时就已兴建了这座房子, 以后切斯特顿家一代代后人又如何继续修整扩建, 一直到切斯特顿先生这一代, 此刻坐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写故事, 讲述被称为

1 M全称Medelevich(缅杰列维奇), 后为伯林弃用。

2 在第24—25页。

3 切斯特顿和妻子弗朗西丝(卒于1938年)余生一直住在这里。



“星期四”的人和天真的布朗神父的趣闻逸事。<sup>1</sup>他身子埋在沙发里，一边说，一边发出轻快的笑声……“不过，这是我们十二年前自己建造的……”<sup>2</sup>是的，橡木看起来确实挺古老；但我们想象着天花板很低的都铎式房子，还是禁不住战栗了一下。

这就代表着舒适。我们为美国人感到可怜，就像某个人可怜一个不为啤酒唱颂歌的民族。

“当我再看到月亮的影子，”（多么惬意的词！）从沙发里传来先生轻柔的声音，“我总会想起迪格比·拉莫特先生。<sup>3</sup>他还是那么年轻，依然像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我真想把他带在口袋里到处走，随时可以拿出来：‘看啊，我多么年轻！这就是我，一个声名狼藉的老记者，而这位是我的老校长！’”他咯咯地笑个不停。

大家握手告别。

我们最后听到的是他洪亮的声音：“十字路口……温莎……穿过镇子……

## 7 走好，再见……”

我们觉得自己见到了真正的伟人，而伟人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切斯特顿先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寄了一首诗，叫作“别为战争感到自豪”<sup>4</sup>，发表在杂志的第二期<sup>5</sup>，这时杂志改名为《圣保罗校刊：辐射》，因为位于格拉斯哥的阿尔比恩电动机公司的行业杂志也叫《辐射》，他们向学校提出抗议。

1928年5月到10月，伯林一家从肯辛顿区搬到汉普斯特区，暂时住在肯辛

---

1 切斯特顿所著《被称为星期四的人》出版于1928年，《天真的布朗神父》出版于1911年。

2 房子的确是切斯特顿夫妇根据自己的设计建造的。

3 迪格比·拉莫特（1861—1946），切斯特顿在圣保罗学校读书时的年轻校长。

4 该题目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6，第853页。这首诗未收入《G.K.切斯特顿诗集》第3版（伦敦，1933）。伯林曾对该诗集第1版（伦敦，1927）发表过评论文章，在1928年2月号的《圣保罗人》上匿名发表——卷46（1928），第13—15页。该诗也未列入约翰·沙利文《切斯特顿作品目录》（伦敦，1958）。

5 1928年冬季号，第39页。

顿的王宫酒店。在此期间，伯林的父母和姨妈伊达<sup>1</sup>去里加探访亲戚，帮助他的另一个姨妈贝塔<sup>2</sup>照看年老体衰的外婆。<sup>3</sup>伯林的时间似乎分为两半，一半住在酒店，一半住在位于辛克莱路的伊达家，那里靠近圣保罗学校，而且他姨父伊扎克<sup>4</sup>（伊达的丈夫）可以陪他。伊扎克也是他父亲门德尔·伯林<sup>5</sup>的生意伙伴。他父亲显然比母亲早回到英国：参看后面寄自鹿特丹的信。<sup>6</sup>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天 [1928年6月3日]

辛克莱路57号

亲爱的爸爸、妈妈：

伊切克<sup>7</sup>和他姐姐都认为我越来越会照顾自己了。比如我不会在饮食方面犯什么大错，我自己熨衣服，起床睡觉也很准时。我原来一直就像个施莱米尔<sup>8</sup>，现在我的表现总的来说比他好，比如，今天我就给I.戈德斯顿先生寄了七封信，告诉他要是他能给伦敦新西区的犹太教会堂<sup>9</sup>捐1000英镑的话，爸爸就会高兴得跳起来。不过爸爸现在不在，他可能要回来以后才能高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妇女协会里的那些女同胞<sup>10</sup>，我写信告诉她们，只要妈妈不在，她们就甭想干成任何事，因为您就是她们的头脑、她们的灵魂、她们的力量、她们的智慧、她们的能量（哦，妈妈，您真伟大！）。对于阿

1 伊达·萨姆诺夫（1887—1985）。

2 贝塔·沃什诺克（1893—1941），伯林母亲玛丽的姐姐，终身未嫁。

3 罗莎—弗洛伊德（“罗莎”）·沃什诺克（约1866—1930）。

4 伊扎克·萨姆诺夫（1886—1950）。他的姓“萨姆诺夫”有时会按德语发音念作“柴门霍夫”，发明了世界语的那位波兰犹太人名字就叫柴门霍夫（1859—1917），他也说俄语，伯林一度认为自己与他有某种亲戚关系。

5 门德尔·\*伯林（1884—1953），伯林父亲。

6 下文第13页。

7 希伯来语“艾萨克”在意第绪语中的音译（在说希伯来语的人群中通常读作“伊扎克”或“伊切克”）。

8 伯林此处原文为：Schlemihl。意第绪语，意为“不幸但又可爱的笨拙者”。

9 一座时尚人物经常光顾的犹太教会堂，位于圣彼得堡街区（伦敦西2区）。戈德斯顿先生似乎在发起募捐。

10 玛丽一直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多年来担任布朗代斯伯里和区妇女协会主席。该协会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分会。

瑟·豪伊特议员<sup>1</sup>，我则写信告诉他你们将无法参加他为刚开办的犹太礼拜日学校<sup>2</sup>举行的典礼，或许他可以延期？没有你们，场面会冷清很多。至于圣约协会<sup>3</sup>，他们已经决定，要是你们不帮他们，他们就只能盘点解散。一千个斯诺曼家族<sup>4</sup>的人也比不上你们中的一个，更何况其他人。你们的社会义务似乎从阿伯丁夫人<sup>5</sup>延伸到哈罗斯先生，他很生气，父亲好像向他购买了一些香水和古龙水，他要求付款。圣体学院<sup>6</sup>院长P.S.艾伦<sup>7</sup>先生写信向我要高级证书，我只能回信说暂时拿不到。也许爸爸能给伊切克写信，告诉他证书在哪里，毕竟没有人愿意让大学久等。看到爸爸有这么多的衣服和鞋子，酒店服务员一脸吃惊的表情，但他没说什么，只是恭恭敬敬地服侍我（我不等于也拥有这些东西吗？）。

酒店门卫把自己当作我的养父，一收到信就打电话通知伊切克。我们之间的关系，即便不是真的那么亲密无间，也应该算是非同寻常了。<sup>8</sup>我现在住在两个地方，生活很舒适。大部分时候我和伊切克一起住在这里，有时会在酒店过夜。昨晚我和艾廷豪森<sup>9</sup>去看戏，为了不打扰别人，我就睡在酒店。有课或周末时我都在这里吃饭。斯旺太太<sup>10</sup>对哈勒维的婚约<sup>11</sup>特别高兴，她对我的照料也无微不至。现在他们俩的婚约已经正式公布（我也可以在信里口气肯定地说这事了，但是请在一天后发祝贺电报，一定要记得

---

1 伦敦西南部里士满地区的议员，曾任里士满市长（1924—1925）。

2 专门为犹太儿童开办的中等教会学校，在礼拜日上学。

3 著名的犹太慈善协会，机构遍布世界各地。

4 汉普斯特一个著名的犹太家庭。参见下文第623页注5。

5 （伊丝贝尔·玛丽亚·）阿伯丁夫人（1857—1939，婚前姓马奇班克斯），其夫为第七代阿伯丁伯爵及第一代阿伯丁和特麦尔侯爵约翰·坎贝尔·戈登，第一代崔德默男爵的小女儿。

6 1928年10月伯林进入该校学习。

7 珀西·斯塔福·艾伦（1869—1933），1924—1933年任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

8 伯林此处原文为：деликатность。

9 沃特·乔治·艾廷豪森（1910—2001），生于慕尼黑，一位出色书商的儿子，兄弟姐妹三人。1923—1928年与伯林同在圣保罗学校读书，后来又同学于牛津大学（主修标准现代语，1928—1932）。战后他改姓伊坦，并成为以色列外交部总干事（1948—1959）。

10 极可能是管家。

11 指伊扎克姐姐里维卡和埃拉扎·哈勒维的婚约，两人生下的孩子埃弗拉姆·哈勒维后来成为以色列情报局局长（1998—2002）。

哦)。今天新郎和新娘<sup>1</sup>去听贾沙·海菲兹<sup>2</sup>的音乐会，算是度准蜜月。他们都很高兴，伊切克最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因为哈勒维穿了一套新衣服，衣领的款式也是新的。我打趣说我要经常去他们家接受他们的款待，他们听了似乎也没怎么紧张。真是美满的一对，只是年龄都有点大。他们会有小孩吗？哦，我真是越来越没谱了。里维卡正在进度缓慢地学习英语，但她坚持不让我说土耳其语，好像她特别讨厌土耳其语。俄语属于土耳其语，英语也是，法语也是，希伯来语几乎也是，但意第绪语不是，为什么呢？真搞不懂。回来时记得带上贝莎。（我消化功能很好，伊诺用水果腌制的饮料特别好喝，我的气色也越来越不错。）

爱你们的

沙耶

又及：看到哈勒维和里维卡在彼此面前脸红的样子真是一件浪漫又奇妙的事，没见过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以赛亚·门德尔·伯林

致伊达·萨姆诺夫<sup>3</sup>

[1928年6月]

[伦敦西14区，辛克莱路57号?]

亲爱的伊杜莎：

最近我们新办了一份难以出版的校刊<sup>4</sup>，我担任编辑，可以说正忙着追求文学声誉，这令我很是兴奋。这是一份完全办给低年级学生看的报刊，

1 伯林此处原文为：Braut和Bräutigam。

2 贾沙·海菲兹（1901—1987），俄裔美国小提琴家。1928年6月3日星期日下午，他在阿尔伯特剧院举办了个人演奏会，当时担任他伴奏的是伊斯多·阿赫龙。演奏曲目有格里格的C小调奏鸣曲以及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

3 此为附言，回复伊扎克致伊达的信，该信仅存最后一页（第2页）。

4 指《辐射》，见上文第6—7页。

甚至张贴到美术馆，感觉十分快乐有趣。没有人可以一直飞翔在智慧的高空：有时哪怕只是过得平常一点都会让自己放松。我也给你寄了一本。跟往  
10 常一样，我还是写自己，老实说，我找不到更有趣的话题了。我对甘地<sup>1</sup>的崇拜与日俱增，他真的非常伟大。我的获奖文章<sup>2</sup>是关于莎士比亚和卡莱尔的。

爱您的

沙耶

又及：我对哈勒维的婚约非常高兴。亲眼看到他们恋情的发展令人高兴，同时也是难得的经历。整个过程相当完美，犹太人的婚姻方式还是挺不错的。<sup>3</sup>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sup>4</sup>的事。斯旺太太觉得这是她个人的功劳，为此特别自豪。现在全家都在欢喜地期待着，大家心情都很好。本来就应该这样。不管怎样，尽管我发誓终身不娶，现在却很高兴，这就足够了。当然这对佳偶也很高兴，这就好上加好了。

您的

沙耶

---

1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84），当时正全心致力于和平解决印度社会的暴力冲突。他对种族暴力行为采取的应对方法为绝食。

2 巴特沃斯文学奖（7月25日颁奖典礼上颁发），授予在复活节假日后专题考试中成绩出色的学生。该考试在复活节后（4月4日—5月1日）举行。考试内容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第一场和第二场，以及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创作的《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全名为《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卡莱尔为英国历史学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在他看来，勇敢坚强的个人，能够以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影响力，对民众发挥重要领袖作用。乔舒亚·怀特黑德·巴特沃斯（1817—1895）为办公用品公司掌权人，同时还是舰队街著名法律出版公司负责人。他于1828—1832年就读于圣保罗学校，1889年以自己的名字设立英国文学奖。伯林还获得过英国政府大法官奖和特鲁罗奖章（由特鲁罗男爵，有时也被称为“大法官”的托马斯·沃尔德捐助。他曾就读于圣保罗学校）。获奖文章以自由为主题，规定在夏季学期开学第一天（5月2日）上交。见本书后面重印的《论自由》一文。

3 此话暗示由媒人介绍。

4 伯林此处原文为：Mazal Tov。该词既有“祝贺”之意，也有“好运气”的字面义。

1928年7月,伯林再次参加了高级证书考试,拉丁语和希腊语两门课程成绩突出,英国文学<sup>1</sup>再次通过。同月,圣保罗学校的董事会为其举办了古典人文课程成绩毕业展。<sup>2</sup>在给伯林的毕业评语中,校长这样写道:“他极有可能在牛津大学有突出表现,这是他班主任们的看法,对此我完全认同。他在英语语言领域的表现证明他是古典人文学科的一流人才:他的思想远比年龄成熟。”<sup>3</sup> 11

致玛丽·伯林

[1928年?]

鹿特丹,威玛大酒店

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参观了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感触很深。我打算明天去伦敦(爸爸星期五从比利时奥斯坦德过去)。总之,我们都会到伦敦,我是在上午9点到,他比我迟12个小时,晚上9点到。也许我会与他同行,到时再看吧。不管怎样,星期五我们都会到伦敦。贝莎她怎么啦?<sup>4</sup>是外婆的身体状况让她走不开,还是她根本不想走?如果是第一个原因,我只能说您最了解她

1 见牛津和剑桥考试委员会1928年7月证书考试的通过者名单[剑桥,1928,牛津大学档案馆合订本(10/44),第22页]。

2 见圣保罗学校董事会《会议记录》卷16,1925—1930(内部印制),1928年7月25日(伦敦绸布商公司档案室)。伯林的“第二名毕业展”奖励为连续四年每年60英镑(第13页)。伯林在总分为1350分的古典人文学考试中,获得1001分,并且在圣保罗学校九名考生中名列第二(第11页)。

3 这一说法与伯林对自己的看法不太一样。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与其他学生别无两样。在同一份成绩单上,他的英语老师莱斯丽·亨利·斯达沃顿·马修斯(1875—1946)也写了类似的评语:“虽然他可能缺乏潜心研究的耐心,但他的文笔却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美、最动人的。”1927年秋,马修斯写道:“他有时喜欢直奔结论,而不是有针对性地解决眼前的问题。”此外,伯林还曾获得多种奖项,包括1923年低五年级一等奖、1925年低八年级一等奖,以及中八年级一等奖。见里伦纳德·韦伯利(主编)《希腊语研究指南》(剑桥大学出版社,1916)。1926年,他还与他人同时获得作文奖。1928年,他获得八年级二等奖。奖品多为图书,其中好些书他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去世。由于多数书没有藏书标签,无法将赠书和奖项一一对应。

4 原文happened一词的正确拼法为happened。早年伯林常常拼错这个词,还有其他类似的错误。

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如果是第二个，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对她说这是她最后的机会这样残忍的话，您就劝她说您觉得她和加贝[?]挺配的，让她权当只是一次旅行，离开目前这种阴暗的环境，不要把它看作是一次相亲之旅。即使她觉得加贝有什么毛病，谁也不会说她什么，事情会顺顺当当了结。跟她说她必须结婚的事不是我们家的负担。这个想法令她在过去备受折磨，因为她觉得自己为了父母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跟她说我们每个人都对她心怀感激。我知道您的处境有点尴尬。但是，您心灵高尚，个性非凡，应该比我们这些人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您即使心中充满痛苦，也应该义不容辞地减轻别人的痛苦，这很不容易。好在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您心中没有痛苦，您心中永远不会有痛苦，因为您无比坚强，不会被任何困难吓倒。

- 12 不过，您应该抚慰像贝莎这样的人，也让伊达和外公变得开朗起来，同时保持您所说的来自于希望而非绝望的人类本性。我知道您会说现在情况一团糟，没工夫听我的长篇大论。也许的确如此。不过我知道，您单凭直觉就能意识到我所说的或想说但没说出口的话：我知道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了。爸爸非常需要您{的}（以后我把他称作“爱人”，把您称作“远方的爱人”）<sup>1</sup>，您知道该做什么。

我所说的似乎都是老生常谈。记住，生活是美好的，不管它外表有多么丑陋，它永远是美好的，但美好并不一定就是美妙。好了，空洞的大道理我就不再说了。

吻您、爱您的儿子

- 13 沙耶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An die ferne Geliebte（《致远方的爱人》）。此为贝多芬创作的组歌。

## 牛 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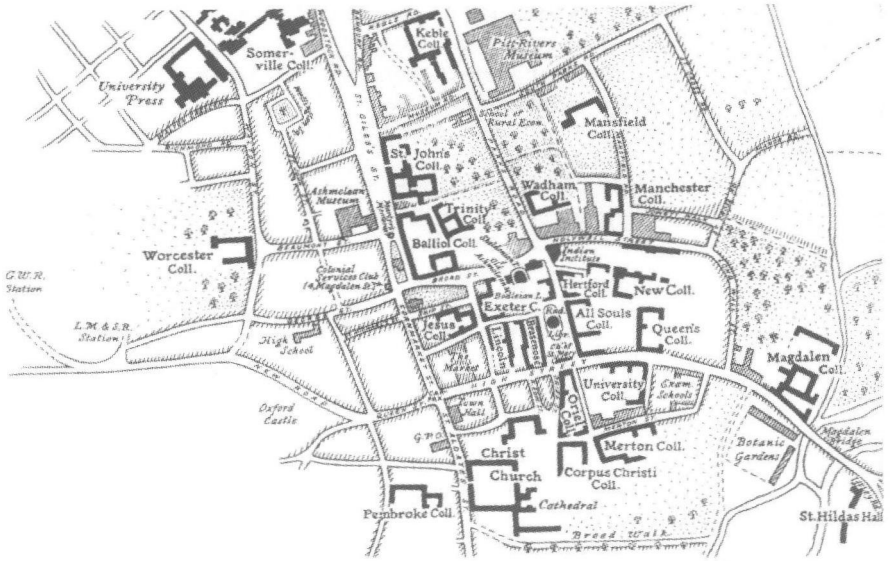
我喜欢闲聊，喜欢描述事物，喜欢观察事物，对人类及其本性有浓厚的兴趣，也喜欢探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天性使然，完全独立于我在知识方面的追求之外。

——以赛亚·伯林与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的谈话<sup>1</sup>

---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1。





1928年的牛津大学

以赛亚·伯林于1928年的圣米迦勒学期（10月14日开始）来到牛津大学。10月16日，他被牛津大学正式录取。伯林到来之际，正值牛津大学所谓的黄金时代末期。据伯林日后的描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两大学生派别之间的对立：

当时学生分为两派，运动派和文艺派。运动派们身体强壮，肌肉发达，围着宽大的羊毛围巾，喜欢喧闹争吵，常常在校园里成群结队，上酒吧喝酒闹事。而文艺派则喜欢独来独往。他们身穿做工考究的昂贵服装，行为举止中充满刻意表现的脂粉气。因此，运动派们见到文艺派们的时候，总是恨不得上去将他们痛打一顿。[……]而文艺派们则通常把从厕所卸下的链条绑在手臂上充当武器：把它从手臂上解下挥舞，便足以将运动派们吓跑，不敢靠前。[……]我敢说，这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与你知道的任何其他大学都不相同。我入学的时候，牛津已开始进入衰落期。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31年——在那场著名的经济危机中期，牛津完全败落。[……]要想在校园里当一个文艺派，你必须每年有400英镑，因为你知道自己将会被开除出校。你知道要是不能在这里获得学位的话，你最好能有一些收入。但是到了1931年之后，家长们再也无法支付文艺派们那些昂贵的衣服或为他们提供私人收入了。

接着[……]出现了共产主义者。比起文艺派，他们给教授们造成的麻烦可要多得多。文艺派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醉酒闹事且行为不端，顶多就是被开除而已，而这些共产主义者却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给教授们出了更多的难题。[……]文学学会似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学会。我在牛津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整个生活都被政治化了。<sup>1</sup>

幸运的是，圣体学院是一个小型、内敛的学院。相对而言，它并没有受到这些对立活动的影响。正如伯林后来回忆的：

在我那个时代，圣体学院是个包容的社会。[……]总体气氛安逸而友

---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2。

好。本科生几乎个个都喜欢穿深蓝色的套装，全都一副教授或校长的模样。校园里感觉不到太多的浮躁：总体气氛安逸而友好。在圣体学院里，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没有人特别突出自己或是指使别人。我在圣体学院过得十分开心。<sup>1</sup>

17 然而，这种生活与他和父母共同度过的日子还是大不相同。

致玛丽·伯林

星期天 [1928年秋]

圣体学院

亲爱的母亲：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以及您的善解人意。您对我的心思如此了解，字里行间，将我内心的想法揣摩得淋漓尽致，读来几乎令我感到诧异。非常感谢您，妈妈。我在学院的生活十分惬意；艾廷豪森也表现得十分开心，唯有哈尔彭有点不太满意。<sup>2</sup>上帝保佑，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的学习。我非常希望您或父亲能在下周日过来与我共进午餐，请来信告知您和父亲谁能来，因为我不可能同时见你们两人<sup>3</sup>，但我确实非常希望在下周日和下周周日能见到您和父亲。所以，请来信告知到达时间，我会去车站迎接。至于钱的问题，这里先简单汇报一下：父亲给我的钱还有6英镑没有花掉。银行存款中，我也只用了1英镑5先令<sup>4</sup>买书，还用17先令6便士买了一条旧的保罗牌领带，一顶学士帽，还有一条白领带。每周的膳宿及学杂费<sup>5</sup>是2英镑7先令1便

1 见布赖恩·哈里森主编，《颗粒：牛津大学圣体学院20世纪院史》，第49页。

2 沃尔夫·阿比兰（“阿贝”）·哈尔彭（1909—1943），出生于德国，与伯林同时期求学于圣保罗学校（1923—1928）以及牛津大学（1928—1932，在埃克塞特学院主修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以及PPE专业），于1932年加入英国国籍，毕业后为德比公司以及伦敦金属中介公司工作。后与芭拉·斯特雷奇结婚，1943年执行飞行任务时遇难。

3 可能因为玛丽太能说，使得伯林和他父亲门德尔没有机会交流。

4 伯林对于货币单位英镑、先令、便士的写法有点与众不同，但十分清楚。

5 大学的内部账单。

士, 与其他同学相比, 开销并不算多。这些费用可以等到下学期再交, 但其中并不包括参加学院和大学学术团体的费用以及学习费用, 等等。<sup>1</sup>

致门德尔·伯林

星期二 [1928年秋?, 明信片]

圣体学院

亲爱的父亲:

我的膳宿及学杂费开销如下:

伙食费: 15英镑1先令6便士

其他食品 (如苹果酒、饼干、奶酪、黄油等): 16先令7便士

大学和学院的会费及其他规定费用: 1英镑18先令8便士

公共服务: 7英镑

邮差: 2先令6便士

逾时返校的罚金: 7先令1便士

邮费: 5便士

洗衣费: 1英镑15先令2便士

房租: 5英镑6先令8便士

燃料费: 2英镑11先令

学费: 9英镑

学生活动室费用: 5先令

家具租赁费: 1英镑6先令8便士

电灯: 1英镑

学院俱乐部费用 (体育活动): 5英镑

保险费: 2先令

捐赠教会: 1先令

考试费: 8英镑

18

---

<sup>1</sup> 信的其余部分丢失。

《鹈鹕记》(杂志)<sup>1</sup>: 5先令

总计: 59英镑19先令3便士

除去奖学金: 10英镑

共计: 49英镑19先令3便士

这些费用需要在两三天之内交清。此外,我买书还需要很多钱,大约10英镑。因此,总共需要59英镑19先令3便士。如果您寄给我30英镑的话,那么交了这些费用后剩下的只有9便士。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寄给我40英镑或者50英镑。

1928年12月5日伯林开始了他的《圣经》文句考试<sup>2</sup>,12月10日通过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的第一次正式考试<sup>3</sup>,其中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希腊文学,以及逻辑学考试。<sup>4</sup>伯林顺利通过了这两项考试。1927年入学的学生需在下一个学期(即春季学期)参加文学士学位第一次正式考试。因此伯林比大多数学生早一个学期开始修读古典学课程。

---

1 见下文第23页注5。

2 所有本科生均需参加此项考试,但允许犹太教学生考《圣经》之外的文本。1928年考试内容为柏拉图的《申辩篇》和《美诺篇》。

3 见“序言”第11页注1。学生可以选择在三个学期中的任何一个学期参加这门考试。

4 包括西塞罗的《反腓力辞》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2,4,6卷的论文和随堂翻译;荷马的《奥德赛》第7—11卷的随堂翻译;公元前5世纪希腊悲剧历史,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德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以及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巴克斯》的相关章节内容;以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相关内容,详细地说,包括托马斯·福勒编纂的《演绎逻辑原理》和《归纳逻辑原理》前五章(除去分类、学术用语、术语以及每章节后的注释等)中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相关章节的内容;这一科目的学习可以参考福勒或W.S.杰文斯的《逻辑学基础教程:演绎法与归纳法》,或S.H.梅洛的《逻辑学简介》,或课程的其他任何相关书目。以赛亚·伯林挑选的参考书目来自于牛津大学的手写本《大学生入学须知》(1928—1929年卷A—C)。他所选读的书目列于《考试章程》[……]牛津大学1928年7月7日修订,第43—45页(通过文学士学位第一次正式考试的规定)和第39页(《圣经》文句考试的规定)。考试日期在同一卷的第7页。

致玛丽·伯林

1929年5月18日 [原信为印有好莱坞明星鲁道夫·瓦伦蒂诺头像的明信片]

圣体学院

亲爱的夫人：

我打算在下个星期左右把我们学校最杰出、最有天分的电影明星介绍给您认识，其中有些人可能您已不再感兴趣。这套精致漂亮的照片就是由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即我向您推荐过的沃尔华兹的先生们发行的，这是一家有着独特品位和魅力的商店。很快会给你们去一封好好写的信。

以赛亚·伯林大学生活的前两年，主要活动都在校园内进行。但是他的社交能力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他回忆道：“我想我属于圣体学院的每个社团。我和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朋友。自认为是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种在择友方面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人。”<sup>1</sup>如同圣体学院的院长后来描述的：“他的房间简直就是一个热闹场所。”<sup>2</sup>里面通常挤满了想要找人说话或是找个玩伴的学生。尽管圣体学院的学生们在校内相互之间走动不多，他们常常有外来的访客。例如，路易斯·麦克尼斯<sup>3</sup>就曾计划带一些游客到牛津参观：

他告诉了他圣体学院唯一认识的人——约翰·希尔顿<sup>4</sup> [……]，说他准备带游客来牛津大学参观。游客们很喜欢观看典礼，如果他能在学校举行典礼的时候带他们来，一定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些游客颇为富有——他们有可能为牛津大学或是伦敦大学捐款。因此，我和希尔顿 [还有其他一两个同学] 就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站在学院的鹈鹕雕像<sup>5</sup>前，把一只小银壶扔来

20

1 《颗粒》，第50页。

2 同上，第49页。

3 (弗雷德里克·) 路易斯·麦克尼斯 (1907—1963)，诗人、剧作家；1926—1930年就读于默顿学院古典学专业，1930—1936年在伯明翰大学教授古典学，1936—1940年在伦敦贝德福德大学教授希腊语，1940—1949年为BBC做新闻特写记者和制片人。

4 约翰·罗伯特·希尔顿 (1908—1994)，1926—1929年就读于基督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后成为建筑师和考古学家 (1934—1936年任塞浦路斯古遗址部主任)；1933年与玛格丽特 (“佩吉”)·弗朗西丝结婚。

5 石雕鹈鹕是圣体学院的象征，原雕像位于前方院的一根立柱上。

扔去，每次接到银壶我们都要鞠躬，接着把它扔给另一个人。我们围着鹤鹑雕像一共扔了四十四次，最后像举行宗教仪式一样迈着庄严的步子离开。这只是一个为了迎合旅游者而自创的“仪式”，但是游客们却睁大眼睛看得十分入神。<sup>1</sup>

以赛亚·伯林对大学生生活记忆犹新：“我在圣体学院所享有的快乐和舒适[……]的确给了我从别处得不到的安宁。”<sup>2</sup>

致门德尔·伯林

1929年10月20日[明信片]<sup>3</sup>

[圣体学院]

您身体都好吗？我一切安好。就此。

孝敬您的儿子

以赛亚·伯林

于牛津大学圣体学院

以赛亚·伯林成为与牛津大学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分子始于他与别人共同担任《牛津展望》编辑一职，“这是一份品位颇高的大学期刊”<sup>4</sup>。尽管伯林接受这份编辑工作的前提是他不用和投稿人（其中一些很可能是文艺派）见面，但是他所担任的新角色使他与牛津大学以及校外的名流和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正如他自己后来坦言的那样，担任《牛津展望》编辑一职

1 1992年10月19日为《颗粒》采访布赖恩·哈里森。

2 同上。

3 在明信片的另一面，地址的上方，伯林用他最熟悉的六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和希伯来语）分别写了“明信片”一词。

4 为撰写《颗粒》进行的采访。以赛亚·伯林共编辑了这份大学本科期刊中的六期：从1930年5月第10期（总第52期）到1932年2月第12期（总第57期），其中第52期与阿瑟·卡尔德—马歇尔合编，第55期（1932年6月出版）与理查德·古德曼合编。他自己为《牛津展望》写了12篇稿子。

“让我自身也得到了发展”。<sup>1</sup>

21

致T.S.艾略特

1930年5月27日

圣体学院

亲爱的艾略特先生<sup>2</sup>：

谨将一份《牛津展望》期刊寄给您过目。因为我们想您或许会对它所写内容感兴趣，这些内容是目前的热门话题，极有可能也是牛津学人信奉的东西。该刊最为显著之特色是几乎全部篇目均为评论文章，而三年之前，这本期刊只登载诗歌和短篇小说。希望您不会因为贸然给您寄书而怪罪我。

您忠实的

以赛亚·伯林

费伯档案

致约翰·希尔顿

[1930年11月]

圣体学院

我和哈迪<sup>3</sup>为您获得约翰·洛克奖学金<sup>4</sup>而感到由衷高兴。为了庆祝，我们刚才在中庭里跳了一会儿快步舞。《鹈鹕记》<sup>5</sup>也正准备刊发一篇有关您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2 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1888—1965)，诗人、出版商、批评家、剧作家。1922年起担任《标准》杂志主编。

3 威廉·弗朗西斯·罗斯·\*哈迪(1902—1990)，1926—1950年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研究员和导师；1950—1969年任基督圣体学院院长。

4 当时约翰·罗伯特·希尔顿刚刚获得精神哲学学科约翰·洛克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根据考试成绩颁发一次，主要对象为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和大四学生。1931年以赛亚·伯林和默顿学院的西德尼·布登同获这一奖项。

5 《鹈鹕记》为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学报。以赛亚·伯林曾是1929年第4期(总第19期，1929



的特别报道。哈迪不愿意用黑体印刷“前主编大获成功”这几个字，但同意用小字号印刷。无论如何，您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此话只是纯粹的恭维，实际上我们对您的成功丝毫不觉惊讶。

您的

22 以赛亚·伯林

致约翰·希尔顿

1930年12月

圣体学院

亲爱的约翰·洛克奖学金获得者约翰·希尔顿：

迟复为歉。我很喜欢那个故事和那首诗。喜欢那个故事主要是因为我曾尝试写过类似的东西，但没有成功，太不成功了。那首诗则内涵深厚，富有张力。不知您是否承认这一点。

但愿<sup>1</sup>这两件作品都能顺利发表。<sup>2</sup>

同时，我和哈迪决定在《鹈鹕记》上为您做一次宣传介绍<sup>3</sup>，为的是能够小小地伤害一下格伦迪博士<sup>4</sup>的感情。哈迪和亨德森<sup>5</sup>删去了我原本打算

---

年12月出版)到1932年第4期(总第20期,1932年6月出版)的编辑之一。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hoffentlich。

2 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31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总第54期)《牛津展望》上,一篇名为《拍击声》(第4—7页),一篇名为《诗》(第16—17页)。

3 所写的介绍没有标题,全文如下:“我们的学长J.R.希尔顿先生获得了精神哲学学科约翰·洛克奖学金,在此谨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希尔顿先生在1929年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获得这一奖项。也许我们的读者中有些人会记得希尔顿先生是我们学院第一个学‘近代古典历史和哲学课程’的人(但决不是最后一个)。我们确信他也是本校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现代派。之前,这个奖项都一直被攻读‘古代古典历史和哲学课程’的人所占有。希尔顿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更为伟大之处在于,他去年一年都在伦敦大学为成为一名建筑师而做准备,而以往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后来都成了哲学教师。我们再次为希尔顿先生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获奖而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载1930年12月第1期(总第20期)《鹈鹕记》。以赛亚·伯林后来成为圣体学院第二个主修PPE专业的本科生。

4 格伦迪博士强烈反对开设PPE专业。(这些科目是“近代古典历史和哲学研究”的一部分。)

5 查尔斯·戈登·亨德森(1900—1933),1928年任圣体学院历史学讲师,1929—1933年任研究员和导师;与萨莫维尔学院的古代历史研究员和导师伊索贝尔·蒙罗结为夫妇。

单独印在一页上的一小段引文，即：“听着，狄基先生<sup>1</sup>将要取得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考官们对他论文的印象。”哈迪态度坚决，但我还是觉得要是能把它单独印在一页上会非常精彩。<sup>2</sup>

您会如何使用获得的100英镑奖学金，如何应对获得的荣誉？您会不会把奖学金捐助给学院，设立一个近代古典历史和哲学的小额研究奖，要求获奖者必须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背诵该奖项设立者的故事，讲述他当初如何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如何战胜了学院的黑暗势力，才最终得以维护光明和真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23

我听说A.H.H.M.狄基刚刚答应，下学期会来宣读一篇有关亨尼克·西顿<sup>3</sup>的论文，H.保罗·金登<sup>4</sup>将为其有关某前总统的珍贵回忆的文章进行答辩，哈迪也会说几句话。我认为H.D.的胡来有些过了头，不仅会严重损害他人名誉，而且非常可笑。据说他(H.H.)父亲曾对别人说他的儿子有着拜伦式的外表。

就此搁笔。祝好并提醒您在闲暇时予以回复。

以赛亚·伯林

- 
- 1 亚历山大·休·哈蒙·马西·狄基(1907—1987)，1926—1930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后成为伦敦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该律师事务所后来专门代理以赛亚·伯林的法律事务。
  - 2 J.R.希尔顿对此评论道：“伯林和哈迪两人任何一点‘疯狂’的想法都无法获得编辑的首肯(也许根本就没有到达编辑那里)，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也许这是因为编辑认为在格伦迪博士(他的槌球打得极好)快退休时开这个高级导师的玩笑不太得体。格伦迪博士和菲尔普斯院长是我改修PPE专业的主要反对者。学院应该清楚，在它发给我数学奖学金时，我就已经有了改修其他科目的打算。但是他们却取消了我的奖学金——后来得以恢复——只保留了我的荣誉。”见1991年11月21日J.R.希尔顿与编辑有关女生修读古典历史和哲学课程、避重就轻的选择等话题的长谈。
  - 3 彼得·约瑟夫·亨尼克·西顿(1907—1976)，记者，1926—1930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1929年任鹈鹕写作俱乐部主席。
  - 4 亨利·保罗·金登(1907—1989)，神学家，1926—1931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1934年成为牧师。

致贝拉·沙立特<sup>1</sup>

[1930年12月13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信写于该月的13号,它反过来看的话就是31号,是《圣经》中决战的日子,如果用圣文希伯来语的计算方法,两个日子相隔的是整整一生。此处有意写得模糊不清。



24

贝拉·沙立特二十一岁生日宴会请柬

贝拉·沙立特小姐对适合以赛亚·伯林的发展方向发表了鞭辟入里的建议,伯林先生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并不得不承认这一方向适合自己。<sup>2</sup>

他十分后悔在前一个星期没能及时回复。那时他正在反思自己的命运,并为所剩不多的时日做好最后的打算,导致心情十分压抑。

---

1 里加的里普曼·沙立特之女。其父为伯林父亲的生意伙伴和朋友,同时移民到英国。她的生卒年为1909—1997,与伯林相同。

2 这封信是回复贝拉·沙立特二十一岁生日宴会请柬的(她出生于1909年12月30日)。请柬内容如下:入此门者,莫怀希望(无聊的希望)/贝拉·沙立特小姐诚邀阁下与其共度新年前夜。地点:地狱(为此庆典特移至西北3区,阿克赖特路28号)/按照礼节,适合冥府的各类服装均可入内。当然,只要彬彬有礼,就算身穿晚礼服,冥府守门犬刻尔帕洛斯也不会阻拦/时间:晚上9点到凌晨,备有扫帚(女巫乘骑的)和轻便马车送客/请回复。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掩饰自己的身份是没有用的；他认为犯罪和放荡不羁的生活（谁能说他的生活不是这样呢？）已经使他成了地狱判官眼中的突出人物。但是，比起他一些笨拙的行为，简朴的着装更能给人留下愉快的印象，使判官的心肠软化。因此，无论他衣着如何，冥府守门犬刻尔帕洛斯\*都不会剥夺他进入这个环境的权力，更何况他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在两种选择之间，他希望能给他一辆轻便马车。即便他不能出人头地，流芳后世，还是希望身后留下的一点点东西可以在冥府里被虔诚地记录下来，再加上一些说明文字。因为他在坟墓里把自己的真实本性隐藏得如此巧妙，普通人无法觉察……

\*或许一块蘸蜜的饼干会起作用，至少文字记载中有一个例子证明它发挥了作用。<sup>1</sup>

以赛亚·伯林在1931年夏天取得了古典学课程的一等学位。<sup>2</sup>因为在圣体学院四年的奖学金还剩下一年，因此他计划在开始学术或法律职业生涯之前，再修读一门本科学位课程。他曾考虑修读历史，但最后还是选择了PPE课程。在其间的长假中，他第二次去音乐圣地萨尔茨堡<sup>3</sup>聆听美妙的音乐。

25

---

1 古神话中，刻尔帕洛斯是一只长着三个脑袋、守卫着通往冥界大门的狗。但是，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库马的女巫陪伴埃涅阿斯来到此处，她将一块蘸了蜜和罂粟果的饼干扔给了冥府守门犬，使它昏昏睡去，他们顺利进入了冥界。

2 牛津当时的学位分为四等，此为一等学位。

3 有关伯林去萨尔茨堡的内容见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4—55。

致查尔斯·亨德森

1931年8月14日

萨尔茨堡；波斯坦大街6号墨索尼膳宿公寓等地

亲爱的查尔斯<sup>1</sup>：

从信中可以感觉到您心情极佳。这一好心情<sup>2</sup>的力量如此之大，就连不可言喻的乖戾天气也不会使您败兴。我无意破坏您的好心情，只是想让您略为羡慕一下我们所在的萨尔茨堡的迷人风情。要说这个地方的弊病，显而易见：无休无止的暴风雨，还有为躲雨拥进咖啡屋和小餐馆的一群群游人，踉踉跄跄的人流和令人心烦的大雨令它显得纷乱无序。尽管如此，它却不乏种种令人赞美之处：世界上没有哪个交响乐团演绎的莫扎特第41号《朱庇特交响曲》的最后两章可以与这儿黑格<sup>3</sup>指挥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相媲美。也没有哪个单簧管演奏者的颤音可以像艺术造诣无以伦比的维克多·波拉茨切克<sup>4</sup>教授那样震撼整个卡宾大厅<sup>5</sup>的所有听众。最引人入胜的是莫扎特《女人心》在市剧院的表演<sup>6</sup>，从未有人给观众的视听带来如此可爱、动人、和谐的完美享受。那种感受简直无法言传。遗憾的是，演出的幕间休息却被一个来自新学院的年轻人给破坏了。此人曾经以司空见惯的方式致人死亡，即在一年一度的校庆舞会结束后开车碾死了人，这次显然是得到特批来到萨尔茨堡。一见面，他就高声大嗓地向我介绍自己，以我和他来自同一所大学为幌子套近乎，还抓住机会把他的姐妹们一一介绍给我，那群女人一个比一个乏味，一个比一个丑，一个比一个更难以诉诸笔墨。她们和那些在萨尔茨堡大街上、咖啡吧或其他娱乐场所<sup>7</sup>单独或成群结队地拦住我的女人别无两样。不过莫扎特《女人心》的表演实在太棒了，哪怕有

1 伯林此处原文为：Чарльзъ。

2 伯林此处原文为：Stimmung。

3 罗伯特·黑格（1886—1978），1930年代在萨尔茨堡任客座指挥。

4 维克多·波拉茨切克（1889—1948），曾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执教，同时在维也纳歌剧院和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后赴美成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席单簧管演奏者。

5 伯林此处原文为：Karabiensaal，但该词应为Karabiniensaal [原文如此]：字面义为“卡宾大厅”。

6 伯林此处原文为：Aufführung。

7 伯林此处原文为：Vergnügungsort。

一百个杀手，带着一千个奇丑无比的姐妹再来剧场休息室和我攀谈，我还是会来的。

除此之外，我十分享受自己的安逸生活（的确非常安逸）。我天天睡到将近9:30，只有一个早晨例外，那是因为我们学院的沃森<sup>1</sup>来访。他与一位慕尼黑女男爵一起生活，并且与神秘莫测的人类学家克拉克洪<sup>2</sup>有过多次严肃的探讨。克拉克洪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表面上说是因为怕热来避暑，但你我都清楚，事实上是为了避开那些人。他朝着沃森喋喋不休，大肆谩骂剑桥哲学欠缺生理学解释力，说得沃森一头雾水。沃森即将成为爱丁堡的一名事务律师，但他似乎对自己的事业深感不满。我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律师，他的回答是从来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所以想当然地认为他也应该成为一名律师。他说话时语调低沉，很不开心，当时我立刻意识到不知有多少人都是这样草率地陷入同样的境地，我也不再为此费神了。

我们会在这儿待到25日，而后我就回去，去伦敦或梅兰<sup>3</sup>。

全民公决<sup>4</sup>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纳粹的模样：一个臃肿的大胖子穿着一件褐色的制服，袖子上戴着红底黑字的纳粹党徽，头戴一顶镶着银色刺绣的小羊羔皮帽子。他醉得厉害，当时我正在一间咖啡屋里，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之后便被三个侍应带了出去。桑迪·兰德尔<sup>5</sup>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十分开心，可惜我没有他的地址，如果你写信给他，请代我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若是您觉得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sup>6</sup>可以给您的个

1 约翰·帕克·沃森（1909—1989），律师，1927—1931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

2 克莱德·凯·梅本·克拉克洪（1905—1960），人类学家，美国罗氏奖学金获得者（Rhodes Scholar）。1928—1932年在圣体学院修读古典学专业；1948—1954年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第一任院长。以赛亚·伯林对其不抱好感。他身受多疑症的折磨，一直幻想自己遭受不知名的敌人的追杀。

3 即蒂罗尔南部的意大利小镇梅拉诺。

4 纳粹分子发起全民公决，希望借此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但未能取得多数同意票。

5 亚历山大·迈德斯·兰德尔（1910—1991），1929—1933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先后担任外交官与事务律师，战时曾任克里特希腊抵抗力量的特工。

6 伯林此处原文为：Umgebung。

性带来重要改变，请您务必告诉我，因为环境确实有此功效，而且它所带来的远不止于此。

您的  
沙耶<sup>1</sup>

致玛丽·伯林

1931年9月2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妈妈：

爸爸昨晚启程去了荷兰（今天是星期三），星期四晚到柏林，星期天回  
27 伦敦。临走前他的心情一般，但比我来时要好。真正承受压力并坚强挺过来的人是比克<sup>2</sup>，他的处境真是令人绝望。总体来说沙立特一家的处境看上去令人担忧，而我们则好得多，我将您鼓励父亲的信寄给了他，希望他可以收到。我读了那封信，觉得您写得很好，除了您在信中提到比克，这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的伙伴关系注定将很快走到尽头。

告诉您一条比较有趣的消息，也是最重要的消息：

院长先生写信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是《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sup>3</sup>，目前需要为人事部门招聘一名“优秀的古典学学者，对外国事务感兴趣”，问我意向如何。这真是个诱人的机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好了。我回信告诉他，我十分感谢他的好意，更不会拒绝，只是我目前正在考虑准备走学术道路。

所以我会写信给哈迪，我的哲学导师，看我能否在某所高等学府获得研究员职位，如果他认为这不可能，我才会考虑去《卫报》工作。正如院长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Шая。

2 梅耶·奥斯卡·比克（1865—1940），伯林父亲门德尔的生意伙伴。他们与沙立特一家合资在俄罗斯木材市场做生意，当时生意陷入窘境。

3 查尔斯·普雷斯特维奇·斯科特（1846—1932），1865—1869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当时严格地说他担任的是《曼彻斯特卫报》的经理（1872—1929年任编辑）。

所说，它看上去是份好职业，《卫报》是欧洲最具权威的报纸之一，对我而言，二十二岁就成为这家大报的员工，每月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很遗憾父亲和您都不在我身边，无法给我指导。所以我只能自己拿主意。我刚才说了，我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在得到哈迪的答复前，拖延一周回复《卫报》。“对外国事务感兴趣”，我认为这意味着我必须读法语或德语报刊，还要能写得出简短的读报摘要，这很吸引我。但同时它也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我在牛津第四年的学业。请好好帮我想想，回家时给我些建议。当然，我在为《卫报》工作的同时可以继续攻读法律课程。<sup>1</sup>这么一想就不由得有点兴奋。

爱您（我一切都好，乔安娜的厨艺棒极了，家里一切井然有序。）

沙耶

28

致查尔斯·亨德森<sup>2</sup>

[1931年9月20日前几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最亲爱的查尔斯<sup>3</sup>：

给您写这封信时，已是夜半过后。想到您和桑迪·兰德尔在奥地利近代政治史上所扮演的震惊世人的角色，我辗转难眠。据当地媒体报道，兰伯格伯爵<sup>4</sup>入狱了。您告诉我说您（a）和他的一位近亲住在一起，而且（b）与城堡主人来往密切，这些人显然已经牵扯其中。这种情况下，您又如何能不陷入旋涡？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美丽绝伦的国家，在平淡乏味的统治下慢慢消亡。我一点也不怪您。这是无法避免的事。任何一位开明绅士都

1 以赛亚·伯林当时曾考虑在律师界发展。

2 此信由奥地利兰伯格伯爵夫人转交。

3 伯林此处原文为：Милейший Чарльз。

4 卡尔·奥托玛尔·康士坦丁·安东·雷蒙德·麦克尔·兰伯格伯爵（1898—1942），住在奥地利斯提里亚的施泰因巴赫小镇旁的匹齐兰城堡，与沃尔特·普里墨领导的政变有关。沃尔特·普里墨为地方保安团领袖，该团体是奥地利内战时强大的右翼准军事组织。1931年9月12和13日，普里墨试图接管斯提里亚及其周边地区。兰伯格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会这么做。我明白，我都明白。最初，您毫无热情，只求太平，牢记法国路易十八的做法，谨慎为上，小心做人，但在双目炯炯有神的桑迪·兰德尔怂恿下介入了此事。施塔恩贝格亲王<sup>1</sup>和兰伯格伯爵夫人十分了解你们俩在世界观方面的差异。先从他入手，您就不会甘居其后。司汤达的著作，您烂熟于心，现在的情形多么相似；而桑迪·兰德尔则对詹达堡与卢宫<sup>2</sup>等耳熟能详。你们俩出于不同的目的投身其中。要是您此刻坐在破旧的小车厢里被押往联邦监狱会怎么样？要是您因破坏禁令<sup>3</sup>而遭审判又会怎么样？但我认为这一切都值得，特别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您心目中美好的奥地利，于是您以自己的权威号召民众起来反抗。

[如果您不是蛛网后的蜘蛛，为什么单单“他”没有被政府拘捕？显然是您无疑。我承认您的布局巧妙至极。]<sup>4</sup>

29 您从监狱里寄出的信件在教师休息室里备受关注，众人争相阅读。目前您在这里已经臭名远扬。我肯定老拉格比俱乐部会对此采取行动。但我已经准备打印您寄给《牛津展望》的所有稿件；因为它有一天必将热卖；就像美味蛋糕等美食佳肴一样，以独特的风味大受欢迎，等等等等。

您一定注意到我思路混乱不堪，很显然，这都是因为我近来过度兴奋的缘故。院长先生突然超乎寻常地关心起我的前途，并由此引起我疯狂的举动。我开始与他和别人频频书信来往，激动人心的事件连续不断（最近这件事子虚乌有，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创意）<sup>5</sup>。我整个人目前纠缠于忠诚、情感、深思等一团乱麻之中。如果您在近期有相对固定的确切地址，我迫切需要向您请教。不用您费神追根究底，虽然我的确是有些焦虑不安，但我明白这实在不是什么大事。一切问题都围绕着去报社工作还是继续在牛津攻读PPE专业、去全灵学院深造这一对矛盾，没什么别的事情。如果实在忙，

1 恩斯特·吕迪格·施塔恩贝格亲王（1899—1956），奥地利内战中著名的政治家，法西斯武装家庭卫队总指挥。1934—1936年在舒斯尼格总理领导下任副总理。是右翼政坛中最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他后来与希特勒政见不合，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后逃亡。

2 安东尼·霍普的小说《詹达堡的囚犯》与《卢宫秘史》。

3 伯林此处原文为：verboten。

4 方括号为以赛亚·伯林所加。

5 伯林此处原文为：bene trovato。

您完全可以等到回英国后再和我联系。

不知您最近是否有机会读到《泰晤士报》，如果您读了，相信生性保守的您也会对一些主打文章大感震惊：其中有两三篇简直厚颜无耻，虚假谄媚，反动至极，毫无价值。以至于这些文章见诸报端后<sup>1</sup>，不仅《新政治家》大光其火，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就连一贯保守的《周末新闻回顾》<sup>2</sup>，甚至更保守的《曼彻斯特卫报》<sup>3</sup>也对这些报道表示不满。从内容上看，这些报道有可能出自布伦特福德勋爵<sup>4</sup>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sup>5</sup>之手。但即便对他们而言那些报道也未免过于恶毒。政治变得如此有趣，就连我也开始带着几分迫切追随其后；我们平静的城郊生活将被甘地先生的到来打破。他将成为离我们距离不太远的邻居。<sup>6</sup>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影响超过这二十五年来任何一位名人，就连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查理·卓别林<sup>7</sup>也不能望其项背。

30

杰瑞<sup>8</sup>的事业看来已经完全稳定，对此我的喜悦无以言表。倒是意外收到一封克鲁克香克<sup>9</sup>关于非洲的来信，内容让我感到有些悲惨。

1 1931年9月12日出版的《新政治家与国家》第302—303页“伦敦日记”中的《评论家》（第303页）用这些字眼提到《泰晤士报》“城市”栏目的报道，以及有关“周二论战的主打文章”。很可能指的是头版文章《反对案》（1931年9月8日出版，第13页）。

2 可能指《周末新闻回顾》中一篇言辞温和的未署名文章《本周评论》。1931年9月12日出版，第293页。

3 所指不清。

4 威廉·乔因森—希克斯（1865—1932），1924—1929年任内政大臣；1929年成为布伦特福德子爵一世，极端保守主义者与反共产主义者。

5 温斯顿·雷奥纳德·斯宾塞·丘吉尔阁下（1874—1965），先后任士兵、记者、作家和政治家（政治立场变化无常）。1924—1929年任财政大臣；1939—1940年任海军大臣；1940—1945年出任首相；1945—1951年出任反对党领袖。在希特勒兴起、法西斯主义成为主要威胁之前，丘吉尔坚持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

6 有一个夸张的说法：甘地在1931年底与英国政府谈判印度未来期间，曾在伦敦东区堡贝门利的金斯利馆居住区住了三个月。

7 道格拉斯·埃尔顿·托马斯·厄尔曼·费尔班克斯（1883—1939），美国著名演员，出演了众多著名无声影片，例如《佐罗的面具》（1920）和《三剑客》（1921）。其子为演员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查尔斯（“查理”）·斯宾塞·卓别林（1889—1977），英国出生的电影演员、制片人、导演。主演《寻子遇仙记》（1921）、《淘金记》（1925）等。

8 约翰·弗雷德里克（“杰瑞”）·科纳斯，1928—1931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历史专业；1931年加入殖民地公职机构。

9 约翰·奥古斯塔斯·库克本·克鲁克香克，1927—1930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历史专业；1930年加入

我最终得到一本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sup>1</sup>的书。书的作者是政治哲学家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德波林<sup>2</sup>。这部著作冗长、枯燥，缺乏睿智，但我兴趣十足地埋头阅读，它的论点越是糟糕反倒越让我感到趣味盎然。它的风格与其他在英国出版的哲学、经济领域的书截然不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它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那里的环境条件比地球更加残酷。但它宣传的信条却似乎比卢梭<sup>3</sup>的思想更富有影响力。这本书除了作者令人乏味，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和令人兴奋，但它显然不适合外国人阅读。我相信罗斯<sup>4</sup>应该会被它吸引，尽管他一看到便会着手对它进行重写。我希望你在奥地利见过克拉克教授<sup>5</sup>：他在奥地利美丽田园风光的映衬下应该更可爱了吧。

您的

31 沙耶

为了方便奥地利警方出于无意打开此信，特此申明，这里所述的一切

尼日利亚殖民地公职机构。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ВВЕДЕНИЕ В ФИЛОСОФИЮ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1922年莫斯科出版。
- 2 艾布拉姆·莫伊谢耶维奇·德波林（1881—1963），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 3 让·雅克·卢梭（1712—1778），瑞士籍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作曲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法国生活。他宣称现有的人类社会体系正在侵蚀人类善良的本性，倡导对政治、社会及教育领域进行重大变革以应对此危机。他的理论对政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在浪漫主义时期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理性认识）。
- 4 （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1903—1997），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925—1974年任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早年为社会主义者，晚年成为保守派。他坚决反对绥靖主义；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以赛亚·伯林对其深恶痛绝。
- 5 阿尔伯特·柯蒂斯·克拉克（1859—1937），1913—1934年在圣体学院任拉丁语教授。在《颗粒：牛津圣体学院20世纪院史》（第48页）中，以赛亚·伯林曾提到克拉克是“一位朋友。他年老、古怪、难以捉摸。我曾带他去看电影。每个人，尤其是哈迪和罗纳德·希姆，都模仿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洪亮。最常被引用的话是‘我住在意大利的一个饭店里，与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在一起。一次她来到我屋里，说她被一只苍蝇叮了。我说：‘哦，多么幸运的尤物啊！’以及‘新鲜的番茄可以成为一首诗；而炖番茄则是宿舍的肮脏环境中最肮脏的东西’。克拉克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对圣体学院的生活深感无聊。我与他常常在全灵学院共进午餐。‘我讨厌盐，’他尖着嗓子高声说，‘但我对胡椒情有独钟。’”

不过是一个愚蠢至极的笑话——抱歉！<sup>1</sup>

以赛亚·伯林

致查尔斯·亨德森

1931年9月20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查尔斯：

我想这将是一封内容丰富的长信。我要说的是，我会尽可能地压缩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我怀疑自己的表述是否真的能忠实于我的本意。

—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劝告，也是一个道歉和请求。几天前，我在清晨两三点的时候起床给您写了封信。<sup>2</sup>我当时一定十分疲惫，或者也许是因为听了一晚上古怪的现代音乐让我有些暂时性的疯癫：无论怎样，总之我写了一封完全缺乏理智、荒唐可笑的信：信的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确信它是满纸荒唐愚蠢的胡说八道。我把它寄给了兰伯格伯爵夫人，十有八九她已将信转寄给了您：多么希望您没有把地址留下：因为我并不希望您读到它：我确实认为那是竭力表现幽默，但却弄巧成拙，表现得尴尬、枯燥而又笨拙的一封信。没有这种无聊的风趣，那封信可能还好些。然而我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您已经收到此信，那么，假如您不去读它，毁了它，我会感谢您帮了一个大忙。若是这个要求太过分——毕竟信寄给您后便合法地成为您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我只能请求您忘了它。我将以您选择的方式惩罚自己表示忏悔。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此。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Alles was darin steht ist ja nur ein dummer dummer Witz—Verzeihet!

2 指上封信。

## 二

虽然有些语无伦次,但我确实想尽量告诉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关于院长如何让我心神不宁的事。我现在试着按照时间顺序向您讲述这些事,间或会夹杂一些心理活动。

## 第一章

大约十天或更早以前,艾伦<sup>1</sup>来信告诉我说,《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斯科特给他写了封信,提到他正在招募一名员工,要求此人必须是“优秀的古典学学者,对外国事务感兴趣”。因为他需要的人必须处理“外国事务”并且具有“能够轻松写作的技能”。艾伦告诉我,他认为这是我“进入公众生活的一个大好机会”,值得放弃我第四年的学业;并要我尽快回信告知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当时我孤身一人在伦敦,没有亲友在身边给我指点,而我偏偏又是一个优柔寡断、没有自信心、总需要别人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与鼓励的人。因此,思考了一整晚后,我写了一封信(1)给艾伦,在那封信里我告诉他虽然我之前从未思考过类似问题,但我获得的一等学位却使我的自负陡然膨胀,让我开始考虑,虽然只是模模糊糊的想法,自己是否应该从事学术事业。目前我对学术的兴趣主要在哲学上,对此我兴趣极大,超越了任何其他领域。我还问他我是否有可能获得研究员职位。如果不可能,与其成为一名律师,我更愿意投身新闻业。我很喜欢新闻业,但在那方面的尝试却总是半心半意。我在言辞上极尽夸张做作之能事,然后颤抖着手将信投寄出去。

(2)我还写了另一封信给爱丁堡的哈迪,这封信写得好得多也更直接,开诚布公地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也请求他就我的哲学潜能给我一些私人建议。

## 第二章

(1)院长回复我说,不一定拿得到研究员职位,这一点与拿到PPE学

---

1 P.S.艾伦。

位、获得约翰·洛克奖，以及在其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一样，每个人都仅仅是有望获得。然而《曼彻斯特卫报》的工作却是一个现成的大好机会，他还说了这份工作的许多好处。很明显他在鼓动我接受《卫报》的工作。

(2) 哈迪回了我一封长信，出乎我意料的是，一贯冷静沉稳的他会如此热情洋溢地帮助我。对此我真是万分感激。他也说，考虑到牛津哲学家们的平均年龄，我取得研究员职位的几率虽说不是完全没有，但也微乎其微。然而他鼓励我继续PPE专业，因为无论我将来做什么，这都有帮助。他还提到了全灵学院和《泰晤士报》的编辑<sup>1</sup>，但他并没有试图阻止我从事自己喜欢的事，只是十分睿智地告诫我接不接受《曼彻斯特卫报》的工作完全取决于这份工作的性质。 33

于是我在两个世界间徘徊不定，拿不准是选择宁静的哲学家书斋生活（如果这是现实可行的话），还是继续读PPE专业，然后到全灵学院谋职，最后一个可能就是立刻前往《曼彻斯特卫报》应聘，之后或许会被派到国外，莫斯科甚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写信给院长，请他让斯科特为我安排一场面试，并告诉他在面试中我将请教斯科特是否允许我在报社工作之余找个恰当的时候回牛津读完我的PPE专业，在学习期间我可以到全灵学院谋职，同时与《卫报》继续保持联系。毕竟作为一份报纸，《卫报》是我一直敬佩和喜爱的。

院长写信告诉我他已经写信给斯科特，并转告哈迪的建议，在牛津大学最古老的默顿学院有一项考试，可以申请三年的研究员职位。（我谢绝了，因为对我毫无意义。）事情暂时就这么了结，情况大体来说就是这样。艾伦一直想劝服我去《卫报》，虽然表面上他保持中立。哈迪竭力支持我继续PPE专业的学习。我自己则举棋不定，在苦苦挣扎。

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大约一周前。第一集故事结束。

---

1 杰弗里·道森，原姓罗宾逊（1874—1944），历史学家，时任《泰晤士报》编辑；1898—1906年和1911—1944年任职于全灵学院。哈迪这里可能是在暗示作者道森在为编辑部招募合适的年轻研究员（道森于1917年由于继承权问题改姓）。

## 三

我在汉普斯特又逗留了一周，偶尔去汉普斯特野外的池塘喂喂天鹅。本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一种平静无波的俄国气氛越来越浓烈。院长明确表示，下一步就是等待斯科特回复。但迄今为止，斯科特却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步。天知道艾伦给斯科特的信中是怎么描述我的，另外我肯定，他一定也让哈迪写过信，介绍我的情况。

在空等一周后，我在上周二晚写信给艾伦，告知他现在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并表示《卫报》显然不打算聘用我，我是否应该继续PPE专业的学习。还有，无论如何，斯科特不明确通知我而让我空等的做法是不礼貌的。所有这一切我都尽可能婉转地表达，艾伦在周五便该收到我的信，但一直到周六（也就是昨天）我还是没有收到回信；可能他去外地了，或许整周都不在，而斯科特又偏偏写信给他而不是我，导致那封信和我的信一道，搁在  
34 在牛津圣体学院无人问津。或许我在周一便可以得到答复。也许斯科特是希望我直接写信给他并附上一份自吹自擂的个人简历？在这种情况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我明年预租的房间又出了点小麻烦。如果我行动迅速些，这些麻烦都是可以避免的。而我却白白拖延了一周的时间，这些便成了不大但颇具破坏力的麻烦，让我坐立不安。

正如您所见，我现在处在充满矛盾的情绪、处境与希望中，这种不快的感觉，由于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知就里而变得更加强烈。

不过，好好权衡一下这些事实，其实我也应该十分满足与感激。（我想我已经说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需要，还可以告诉您更详细的信息，但我认为没有那种必要。）请您回信告知，您觉得我该怎么做，或者如果您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会怎么做。

您让我写一封内容详尽的信，我想您不会否认这的确是封洋洋万言的信。虽然我们不久前已达成共识，认为过分地关注自己和自己的需求，不考虑他人感受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不得不在信里通篇说我自己的事，应该情有可原。您看，我又拿处境来做借口了。

\* \* \*

我非常同意德国越往北越腐败的事实：我不太喜欢巴伐利亚，拿维尔茨堡与萨尔茨堡做比较简直就是污辱。维尔茨堡是一座沉重、黑暗而又无聊的城市，虽然它曾经风光一时。萨尔茨堡却是一颗年轻美丽的新星。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它。但科隆的居民令人反感，街道也不例外。无论何时何地，比利时总给人说不尽道不出的感觉。但在维尔茨堡与科隆之间，法兰克福附近的巴登与符腾堡州，却居住着一个迷人的民族，那里的男人们快乐善良，虽然女人们有点丑。

我的确为杰瑞感到十分高兴。他一度因为自己的成绩<sup>1</sup>而抬不起头，但自从在我这里得到了出于道义上的夸奖和缺乏根据的评价（热情洋溢并假我之名）后，目前他已渐渐回复本性。我屏住气息，焦急等待您的回信。请速回。

您的  
沙耶

35

**致查尔斯·亨德森**

1931年9月24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查尔斯：

匆匆落笔，告知您关于《曼彻斯特卫报》问题的暂时解决方案：斯科特来信称情况有所变化，虽然他们仍希望见我，但职位需求不再迫在眉睫。我如释重负。这意味着我赢得了一年。只要他们想见我，必会怀有好奇心带来的愉悦，尽管我怀疑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对您论点的基础，我表示强烈怀疑，不然的话，那只没能爬出船舱的老鼠怎么就成了鼠洞满员的原因，而这个洞原本是指望我去填补的。难道这只老鼠就是人们曾经和我

---

1 杰瑞·科纳斯获得二等学位。



说起过的某个艾尔斯特？<sup>1</sup>奥里尔学院的那位？难道我的假设缺乏证据？如果这些问题均属无稽之谈，那您一个都不用回答。<sup>2</sup>

知道吗，杰瑞终于被列入ICS<sup>3</sup>人员名录，虽然他如今已不再想要这个职位。还有克罗夫顿<sup>4</sup>和狄克逊<sup>5</sup>。

我特别欣赏不左不右的人，就我所知，那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我扪心自问，发现自己很高兴可以在牛津再待一年——虽然远离奢华的惠灵顿广场<sup>6</sup>。

您的

沙耶

10月，作为PPE专业的组成部分，伯林开始学习政治学（主要靠自学，因为这门课他没有得到正规的授课）。此举恰逢一段有趣的历史时期。1931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作为牛津现象的文艺派宣告终结，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里，掀起了大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潮，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一直以或快或慢的速度持

36 续着。

如今好多伯林的同学已经离开牛津开始创业。而伯林则在为出版商们撰写报告，就他们的出版计划提出建议。现存下来的最早的样本（可能也是他写的第一篇）是受杰弗里·费伯<sup>7</sup>委托，费伯是费伯出版社的创始人，他当时在全灵学院，后来成为伯林的同事。虽然这些报告有时以书信的形式写成，但因为篇幅和独有的特点，还是以附录形式印刷出版，而非按照它们原先在文中的先

1 大卫·乔治·奥吉尔维·艾尔斯特（1904—1992），1923—1926年就读于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历史专业；1929—1931年和1932—1934年任《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后撰写《卫报小传》一书（伦敦，1971），编辑《卫报汇编，1821—1971：卫报一百五十年作品选》（伦敦，1973）。

2 这些问题即便是本书的编辑也无从作答，甚至很难完全理解。

3 印度公职机构（Indian Civil Service）。

4 丹尼斯·海斯·克罗夫顿，1927—1932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

5 阿尔杰农·德鲁·狄克逊，1926—1930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

6 当时和后来许多牛津大学本科学生的宿舍。

7 杰弗里·卡斯特·费伯（1889—1961），律师、记者，1919—1961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23—1951年任校区财务主管）。

后顺序。第一篇报告写于1932年1月。

以下这封信展现了伯林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天赋。

致戈伦韦·里斯<sup>1</sup>

1932年7月4日 [明信片]

萨尔茨堡，波斯坦大街6号墨索尼膳宿公寓

我抛开自尊，先给您写信。我坚持认为在这点上有必要开诚布公地表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对您的作品<sup>2</sup>，所有评论者正面和反面的表述都不够正确。开学第二周我读完了您的小说，说真的，我认为这本书确实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 不够成熟；(2) 形式上有点古怪做作；(3) 部分内容枯燥乏味；(4) 哈米什那部分索然无味，我记得是那个部分。<sup>3</sup>但是，这部作品也有优点，表现在：(1) 绝非寻常之作；(2) 不存在过于自省一说；(3) 不干巴巴，具有浪漫色彩，思想丰富，既不过于呆板，也不墨守成规，是早期的一种极具潜力的原创作品；(3) [原文如此] 对话有趣、亲切、令人愉快<sup>4</sup>；(4) 平淡无奇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冗词赘句，而是未能充分体会或挖掘原始素材，这些素材本身生动真实，如果您的阅历多一些，会处理得更富有感染力，更能够激起读者兴趣。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您确实大量依赖于亲身经历，这部作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真实性，这么说并非认为您属于自然主义流派或要您去尝试自然主义。但即便运用象征手法，您要做的也是象征性地表现现实的本来面目<sup>5</sup>——将其用作象征符号，而不是考虑它 37  
应该如何，或可能如何，不可能篇篇都像童话故事。每当我读某部作品，从

1 (摩根·)戈伦韦·里斯(1909—1979)，历史学家、记者。在完成第一年PPE课程后，1928—1931年到新学院改修历史学；1931—1946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2 里斯刚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夏日洪水》(伦敦，1932)，他的勇气使其获得“盖人威·里斯”的绰号。

3 指书中一段精彩的章节，关于主人公欧文·摩根和其牛津大学朋友萨沙间的同性恋。伯林推断，这一情节基于戈伦韦·里斯与詹姆斯(“哈米什”)·亚历山大·魏戴本·圣克莱尔—厄斯凯恩(1909—1973)的关系。他1928到1931年左右就读于新学院(未获学位)，是南希·米特福德的初恋，但未结婚。详见第四章“草莓般香甜的恋人”。

4 伯林此处原文为：sympathisch。

5 伯林此处原文为：wie es eigentlichist。

中对作家有所了解，我的评论都会因无法将作品与作者截然分开而有失偏颇，这也影响了我对您和斯蒂芬·斯彭德<sup>1</sup>的判断。我边读边看着作者的面孔，听着他的声音。因此我的评论往往有失客观。这么说是因为您曾经问过我对您作品的看法，我当时无法作答，原因就是那会儿我尚未读过您的小说。我敢断言针对您作品的那些评论者们和汉弗莱<sup>2</sup>很可能都对，我却大错特错。但假如我的观点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也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写作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不适合评论所谓真理。我喜欢您的小说，还会再次拜读。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1932年夏获得PPE专业一等学位。理查德·霍华德·克罗斯曼<sup>3</sup>为他提供了一份讲师职位，在新学院教哲学。这份工作将在10月开始。这之前，他按照计划，前往萨尔茨堡进行一年一度的旅行。

致约翰·希尔顿

邮戳日期1932年8月11日

萨尔茨堡，墨索尼别墅

[……]

这里一切正常，英国味十足。西勒·林德<sup>4</sup>由费利克斯·马卡姆<sup>5</sup>陪同来

- 
- 1 斯蒂芬·哈罗德·斯彭德(1909—1995)，诗人、评论家；从1929或1930年开始成为以赛亚·伯林的终身朋友；1927—193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PPE专业。
  - 2 (亚瑟·)汉弗莱·豪斯(1908—1955)，1925—1929年就读于哈特福学院古典学专业，1929—1930年修读历史；1930—1931年在雷普顿学校任教师；1931—1932年在瓦德汉姆学院任牧师、研究员兼英语讲师(因信仰危机辞职)；1933—1935年任埃克塞特大学学院古典学特别助理讲师。
  - 3 理查德(“迪克”)·霍华德·斯塔福·克罗斯曼(1907—1974)，1926—1930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0—1937年任哲学研究员和导师。
  - 4 西勒(Sigle/Sheila)·林德(1910—1976)，1929—1930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化学和生物学专业，四个学期后辍学(忙于跳舞)；俄国共产党员；在维克托·戈兰茨出版公司工作，直到1939年，同年嫁给彼得·惠勒。
  - 5 费利克斯·莫里斯·希皮斯利·马卡姆(1908—1992)，1931—1973年任哈特福学院研究员和历

到这里，并请我转达对您的问候。这里私下告诉您，我很喜欢她。无论如何，她的到来给我很大的宽慰，一是因为哈迪昨天离开了，最终<sup>1</sup>还是以无聊收场；二是我领略了牛津全灵学院和新学院年轻一代女生与众不同的理想追求和高尚情操。她们不停地讨论美好生活（最后都落到新学院和约瑟夫<sup>2</sup>身上），寻找奋斗目标。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告诉卡赫纳先生<sup>3</sup>（他在遥远的记忆中迅速成为一头固执乖戾的青红色怪兽），他的书在我这儿十分安全，一回去就替他给您，或是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我着实对他感到极度敬畏。但我估计这是我熟知的英式风格在充满生机的大陆派面前受到惊吓所致。不过不要对我的话过于认真。我没有读过《毁灭之日》<sup>4</sup>，但我见汉弗莱·豪斯读过，并在他身后瞄了几页。看上去的确是本好书。我16号离开这里直接回去。这些天我正在选购各种德国哲学书籍，专门挑那些封面设计与众不同的，准备把它们打开放在我的桌子上，此为我不得已的最后一招，希望能就此镇镇那帮温切斯特学院<sup>5</sup>派头十足的学生。我正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与您相关的所有事情，回来后我会就这一方面尝试给您一些有趣的建议。一到家就会给您写信或打电话。

爱您

以赛亚·伯林

10月份，以赛亚·伯林开始了大学教师的新生活。他对新学院同事的第一

史学导师。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höchstens。
- 2 霍勒斯·威廉·布林德利·约瑟夫（1867—1943），哲学家；1891—1932年任新学院研究员，1932—1943年为临时研究员。一些朋友称他“约伯斯”（音同“工作包”——译者注）。
- 3 J.R.希尔顿写道：“尤利尔·卡赫纳（1903—1965），是我在巴特利特建筑学院的同学（伦敦大学学院）。经过选拔考试（1933年），我们成为合作伙伴，直到第二年我去了塞浦路斯。他出生在俄罗斯，来伦敦之前他一直在柏林工作；我走后他去了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的公司工作，在那里干得并不愉快；后来在以色列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完成沙洛姆—阿莱赫姆楼‘98%的制图’后于1965年9月1日去世（该楼献给他妻子的‘杰出的祖父’，一位著名作家）。说话雄辩有力，实力超群。”见J.R.希尔顿1991年11月7日写给编辑的信。
- 4 D.H.劳伦斯的作品（佛罗伦萨，1931；伦敦，[1932]）。
- 5 指来自英国最好的公学（也即私立学校）温切斯特学院的学生。

印象不是很好。他后来这样描述他们，“我所遇见的最乏味、最古板、最自负的一帮人”。<sup>1</sup>虽然他很喜欢教书，但对当时新学院缺乏学术氛围感到失望：“这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第一次发现自己不能畅所欲言。那里的人太传统。他们顾左右而言他，谈论汽车，谈论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但绝不可能发表任何独到见解。”<sup>2</sup>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sup>3</sup>

星期四 [1932年10月13日]

新学院

亲爱的谢拉：

（虽然戈伦韦有他称呼的方式，我还是必须称您为格兰特·达夫小姐。但另一方面，亚当·特罗特<sup>4</sup>又认为我跟您已足够熟悉。我绝对相信他，这让我消除了疑虑。）

我听说您不能参加今晚在仓楼<sup>5</sup>举行的晚宴，真是失望至极。毕竟，其他出席宴会的人我有机会常常碰面，本期望在宴会开始之前和您聊聊。您不能来真是太遗憾了。不仅如此，这还让我没有机会用无可辩驳的逻辑和道德诉求证明给您看，为什么您必须来考察一下斯蒂芬·斯彭德。我不打算此刻就这个话题长篇大论一番，只是送上我直接、诚挚而淳朴的请求，期待它能打动您的价值观，让您意识到周六如能来吃午餐我们会多么感激。

---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0。

3 谢拉·\*格兰特·达夫（1913—2004），1931—1934年就读于玛格丽特夫人学院PPE专业，后成为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通讯记者；1939—1941年供职于对外研究和新闻处；1941—1944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外机构工作。

4 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亚当·冯·特罗特是“一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德国学者，他参与了1944年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被希特勒残忍杀害。他在牛津时，我们成为了朋友，我非常喜欢并崇拜他”。他还提到“他的某些观点和行为对于他当时的一些挚友来说不可思议”。见伯林登载于1968年12月22日第17期《观察家》“年度最佳图书：个人选择”栏目的文章，推荐克里斯托弗·赛克斯写的关于特罗特的传记《被困扰的忠诚》（伦敦，1968）。

5 位于新学院路的一座新学院建筑，当时为理查德·克罗斯曼和他的德国妻子艾丽卡的家。

不过如果您真的不能来，我也无能为力。期盼尽快见到您。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去散散步。

您忠实的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对新学院的不满使他愈加向往全灵学院研究员的职位。他的父亲后来回忆起那年发生的事：

[1932年]春，我去牛津看你。当时你正在为是否申请埃克塞特学院（如果没有记错）的教职而烦躁不安。你不是非常向往埃克塞特学院，但觉得任何你渴望去的学院都不会接受你。不过你仍决定等待，随后便有到新学院执教的机会，于是便接受了。 40

不久，全灵学院开始选拔考试。我不知道你怎么打算，但很可能是在一些朋友，特别是哈迪<sup>1</sup>的鼓励下参加了考试。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所学院以选拔优秀人才著称，因主教和政治家云集而闻名，不会欢迎一个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人。我确信在全灵学院很难找到犹太人成为学院研究员的记录，同时还敢肯定全灵学院的院长<sup>2</sup>在你考试后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希望他进入我们学院”。<sup>3</sup>我记得，为了减轻预料中的拒绝对你的打击，我还专门写信给你，说你若能入选<sup>4</sup>只能是奇迹，而如今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第二天你回了一封电报说：“奇迹真的发生了。”我想在里斯<sup>5</sup>被派去通知你被选中的那一刻，一定是你生命中最感自豪的时刻。我记得，弗伊·摩根公司的老列纳顿<sup>6</sup>打电话来祝贺。他以为我不清楚成为全灵学院研究员的荣耀和意义，向我反复解释其中的含义以及这件事令他多么兴奋，特别是他十分熟悉你的背景。《犹太纪事》为此专门发表了一

1 指W.F.R.哈迪。

2 弗雷德里克·约翰·内皮尔·塞西格（1868—1933），切姆斯福德子爵一世，1932—1933年任全灵学院院长。

3 关于他的第一反应，伯林通常的说法是“至少我们不必非得要那个人”。

4 选拔结果在11月3日公布。

5 指戈伦韦·里斯。

6 威廉·雷·列纳顿（1863—1944），杰拉德的父亲。弗伊·摩根公司是伦敦一家木材经纪公司。

篇文章<sup>1</sup>，庆祝这一犹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拉比写信来祝贺你（如果我记得  
41 不错的话，他称你为：“欧文”·伯林）。<sup>2</sup>这次入选确立了你在牛津的地位。<sup>3</sup>

没几天，伯林便从新学院搬到全灵学院<sup>4</sup>，过度的兴奋使他无心睡眠，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之后便患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回家休养。

致斯蒂芬·斯彭德

12月5日 [1932年]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斯蒂芬：

感谢您的来信。我好多了，尽管生活无聊，但心满意足，将来再回首这段时光，别人一定厌恶非常，而我却欣然自得。最近我兴致忽来，开始阅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原著，沉醉其中。已经读了《罗亭》、《前夜》、《春潮》（重读）、《烟》、《初恋》和其他十五篇短篇小说和戏剧。接下来准备欣赏他的诗歌。《罗亭》对人们（为什么我要说“人们”？我说的就是自己）有一种可畏的抑制和约束力量，我偶尔会做一些有关书或人物的演讲，想起那些热情洋溢却轻率任意的言谈，便不禁感到羞愧难当。一口气读完《罗

---

1 《一位牛津的犹太人》，1932年11月11日，第8版。文中指出，以前这所大学唯一的犹太人研究员是“五十年前的塞缪尔·亚历山大教授。西尔维斯特教授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入选是因为他的教授职位”。剑桥则不同，已经有五位犹太籍研究员。研究哲学的塞缪尔·亚历山大教授（1859—1938），1882—1893年在林肯学院任研究员；数学家詹姆斯·约瑟夫·西尔维斯特（1814—1897）是几何学萨维里安讲席教授，从1883年到去世一直是新学院的研究员（年老后光荣退休）；两人人格、智慧都很出众。

2 确实如此。信写于1932年11月25日，写信人为约瑟夫·赫尔曼·赫兹（1872—1946），他从1913年开始任大拉比。收信人为“新学院，尊敬的欧文·伯林”。

3 门德尔·伯林，《家族传记》。这份手稿日期为1946年3月11日，是写给以赛亚·伯林的。写作原因在开头就已说明：“我几次为了儿子，动笔写自己的经历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在一战期间，我无暇集中精力写作。现在已经证实我妻子和我们家的几乎所有成员都被纳粹杀害，深感有必要真实地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而这根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活着的纽带，这根仍然牢记过去的纽带，实际上就只有我。”

4 虽然换了学院，他仍然在新学院教授哲学。

亭》的几个章节后，我感到越是如愿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心里就越加不安。我相信屠格涅夫本意并非如此。他所写的作品比他的本意要出色得多。一开始，他是要笼统地勾勒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俄国人类型，在此过程中，他情不自禁地留意到和这些类型毫不相关的各种个性，最终创作出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相比，托尔斯泰总是有意识地，甚至刻意地不让自己湮没在笼统的描写中，不断成功地在塑造的人物中注入性情和血肉，这一切都是有意识地完成的。<sup>2</sup>屠格涅夫雄心勃勃地希望创造出普遍适用的人物类型，但是他更像一位艺术家，而不太像知识分子，因此他不能避免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而普遍适用性则退居其后。我想这对于这些书籍的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仅仅是发现了这个事实而已。很遗憾你离开了马拉加，我正在试图说服我的父母去那里，快要劝说成功时收到了您的第二封来信。于是说动他们去法国南部，那里正是烈日炎炎，想想都让人害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让他们买去那不勒斯的车票，我会让他们在阿马尔菲待上一阵，然后带他们去西西里岛：准备带他们去看看陶尔米纳。真希望您能乘上一艘游艇，漂洋过海，穿越马略卡岛和撒丁岛，来到西西里。但我知道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很高兴您喜欢举止优雅的赫尔慕特。<sup>3</sup>我对下个学期要去牛津心怀恐惧：使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的并非整体枯燥的学术作风，而是因为我的同事们，特别是年轻人沉湎于口角之争的轻浮言行。因此，我打算大量阅读黑

---

1 使屠格涅夫一举成名的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罗亭》（1856）。据说中心人物罗亭的原型是他的朋友巴枯宁。巴枯宁是19世纪40年代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书中，罗亭的激情被浪漫的理想主义和他在大学里所经历的哲学辩论点燃。他竭力鼓吹人生和自由，但收效甚微。面对美丽少女娜塔莉娅的追求，望而却步、不敢告白，充分暴露了他政治和情感上的软弱。在俄国终日漂泊流浪，最后投身1848年的巴黎革命，在巷战中无谓地牺牲，很快被后人遗忘。

2 这个论题是伯林论文《刺猬与狐狸》的早期轮廓（“序言”，第11页注4）。

3 赫尔慕特·施罗德，一位年轻的德国人，斯彭德与其在西班牙交往甚密。



格尔<sup>1</sup>、马克思<sup>2</sup>、恩格斯<sup>3</sup>和俄国人的书籍，借此抽身进入一个虽谈不上更加广阔但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当然，约瑟夫等人肯定会对我提出质疑……这是件好事。

恳请您复活节留在西班牙。<sup>4</sup>

我想下学期得为“小宝贝”（即林德<sup>5</sup>，那个充满诗意的女孩）和谢拉·格兰特·达夫开哲学课。这让我颇感惊恐。对我而言，哲学偶尔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每当讨论陷入分歧，闹得不可开交时，我便会诉诸学生的内在意识。尽管不无尴尬，对我却可能是件好事。我虽对人明显存有过多兴趣，但更倾向于生活在一种美好却显然空洞浅薄的抽象空间中。迄今为止，我经历了一些挫折，例如我发现学生没有如实说出他们的所想所感，抑或他们的感受和我完全不同等等，这类现象令我兴奋不已，同时也让我思考，并对过去自己在牛津学哲学时对公众意见持有的想当然的看法得出独立的个人见解。只要这些女孩不害怕（天知道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可就连西勒·林德——想象得到吗——也有好几小时感到惊恐不安），只要她们不紧张，诚心诚意学，那就太好了。<sup>6</sup>

---

1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伯林《自由及其背叛》中相关章节。

2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德国社会学家、共产主义创立人（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创立）。1849年起定居伦敦，参见《卡尔·马克思》。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867—1894）详细阐述了他的经济、社会、政治观点，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广泛传播。

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德国社会学家、商人。与马克思合著《共产党宣言》（伦敦，1848），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卷2、卷3。

4 这句话之前删掉了一段话，内容如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可以让父母去西班牙，但我不能要求你在任何时候都按我的意志安排行程，尽管我还是这么做了。”接下来的内容是：“我再说一遍，我确实非常想去马拉加，我会和父母商量，但是去的几率很渺茫，我们等等看吧。”

5 莫伊拉·\*林德（“小宝贝”是林德幼时的爱称）（1912—1990），1930—1934年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走读生，之后成为著名的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特约审稿人，1938年与杰克·加斯特结婚，俄国共产党员。

6 信未写完？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星期四8日 [1932年12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谢拉:

您的信充满忧郁和同情。几星期来我一直沉浸在让人萎靡不振的屠格涅夫的佳作中,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对这样的我,即便是一丝丝鼓励也让我渴望无比。这是一种如此罕见的状态,无法划归于正常内省的范畴(正常的内省没有必要,并且总体而言不是一种好的日常消遣。对此我们看法相同),而是真正客观好奇心的观察对象。然而,这一切绝非你的过错。现在不是去维也纳的好时节,那里很冷,很可能像牛津一样。科林伍德<sup>1</sup>善于活跃气氛,喜欢冒险,是一个非常机灵乖巧的大陆型哲学家。我想如果他对您感兴趣的话,您也会发现他很有趣,甚至很煽情。实际上,我对[他]了解很少,不过我总是看到他对人幽默风趣,足智多谋,招摇撞骗,一肚子坏水。在牛津,他是唯一一位真正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哲学导师。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希望他也能教我。我很高兴富尔顿<sup>2</sup>喜剧终于宣告结束。就连像我的好导师哈迪那么谨慎的人,也公开断言他是一位可笑的哲学家。

如果戈伦韦能够认真对待他的工作<sup>3</sup>,就目前来说,应该做得比任何其他工作都好。为了他,我真希望哪里能够发起一场战争,那么他一定能写出精彩的报道。或者发生骚乱也行。他老是那样,过着赚多少用多少的生活,我一直这么说他,到现在还是这么说。但显然,那种能将精力集中在所有事情上的能力,对于任何一个描述实际事态的人来说都十分有用。我不安地意识到我又要开始对某人的性格进行冗长的描述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有共识,就此打住。您看过您未来导师的杰作《知识考古学》吗?我当

---

1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1889—1943),1912—1935年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大学学院哲学和罗马史讲师。他的作品《知识考古学》于1924年出版。

2 约翰·斯科特·富尔顿(1902—1986),1928—1947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和导师(1928—1935年,哲学;1935—1947年,政治学),曾做过谢拉·格兰特·达夫的导师(据说不太令她满意)。

3 新闻记者。

学生时读过，现在已全部忘记了。我认为这是一部肤浅和令人兴奋的作品。

- 44 也许我这么说太过偏颇。至于和您讨论哲学，可以完全根据您的所好，因此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您写信给戈伦韦，请告诉他斯蒂芬·斯彭德已经离开马拉加，目前正在他不喜欢的巴塞罗那逗留。我怕会忘记，但我想他对此事十分关心。他的地址是巴塞罗那，由库克斯转交。我希望您能来西西里，在这里随便聊什么，甚至聊哲学家洛克都会比在牛津更加愉快。当然您是不会来的，而鲍恩<sup>1</sup>他们会来。希望您在周三的晚会上玩得开心。诱骗我参加的计谋惨遭失败，任何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最终肯定是这个结果。但今天上午我在去牛津的途中，看到对面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那里对人评头论足，说的都是我熟悉的人，我竟然听得兴致勃勃。最后，我终于无法抵制诱惑，把遮住面孔的《泰晤士报》移开，向他们问了一个相关的个人问题。他们又惊又喜，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到站了，他们只来得及问我是否认为西勒·林德看起来不太像惠灵顿伯爵。这封信里我原本打算为您提供我查到的关于《童年》、《少年》<sup>2</sup>等的大量资料，另外就是要好好赞颂一下亚当·冯·特罗特。不想却成了闲聊。真是对不起。

沙耶

说到托尔斯泰，请注意，关于以下两点的描述非常重要：（1）他怎么老是觉得自己的脸孔非常丑陋；（2）对于他自杀后人们如何评论的推测。两者都是我早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指（艾弗·）伊恩·鲍恩（1908—1984），经济学家；1930—1937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1—1940年任牛津大学布雷斯诺学院讲师，1940—1945年任建筑工程部首席统计员，1946—1947年任哈特福学院讲师；1934年与艾丽卡·贝利结婚（1959年离婚）；与约翰·克雷西合作，以笔名“查尔斯·霍格斯”创作了《拉尔戈岛上的谋杀》（伦敦，1944）。

2 托尔斯泰自传体小说（于1852—1857年陆续出版，1886年结集出版），通常翻译为《童年》、《少年》与《青年》。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星期一12日 [1932年12月]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谢拉:

我希望附信<sup>1</sup>没有太过时。信是几天前写好的,放进口袋后就忘了。今天早上才又发现,内心里我反倒对自己的心不在焉暗暗感到几分高兴。我不记得里面都写了哪些内容,只记得写信时心里充满温暖和感激。我甚至不知道值不值得寄出去。后天我去西西里,无人陪伴。无趣和长时间不说话对我而言显然是件好事。我突然发现笛卡尔<sup>2</sup>的东西棒极了。过去我一直不喜欢他的作品,总认为他写的东西不过是一些零散碎片的拼凑,每一个事件都要来回引证,很多出自责任感的说教,读起来令人厌烦。而现在,我却觉得他的作品像一块完整坚固的磐石。这种感觉着实不错。我真真切切地产生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感受,这种感受很少有。我甚至记不得之前什么时候曾有过这种感受。

您的

沙耶

致约翰·希尔顿

26日 [1932年12月]

阿马尔菲,圣卡泰丽娜酒店

亲爱的约翰:

您的担心毫无来由。我不可能去西西里。父母亲完全赞同莫尔<sup>3</sup>的观

1 指1932年12月8日的信。

2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科学家、数学家及哲学家,常被称作当代哲学之“父”。他通过解构和重构人类信念,努力调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同时也不抛弃宗教),这一巨大变革在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庞森比·)莫尔·\*科洛思维特(1907—1989),1926—1930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1931—1932年任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初级研究员;1932年起在外交部任职。

点：除非回家，他们哪里都不愿动，而三四天后我们就准备打道回府。途经的线路是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准备一路上优哉游哉，不赶时间。我没去散步，不能怪我，因为每次散步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折磨。父母亲切地与每个人交谈，我则像修道士一般阴沉着脸。在人们眼中，我是一对受人尊重的父母的不肖之子，提到我，他们总是小心翼翼，面带怯色，这使我乐不可支。我停止了所有锻炼，脸色反倒一天天好起来。我读了许多坏书，蛮开心的，赴圣诞晚宴也不用衣冠楚楚。圣诞晚宴、圣诞树、阿马尔菲的孩子们从慈爱的英国贵妇人那里收到丰盛的礼物，所有这一切如期而至。遗憾的是，整个喜庆活动被一个喝醉的美国人给搅黄了。这位老兄喝过了头，丑态百出，弄得舞会都没法举行。因为夫人太太们都害怕他酒性大发，做出更为不端的举动。此人最终强拉住我无奈的父亲，拿了一瓶香槟（我敢肯定他把香槟叫做泡泡酒）坐到一张小桌子旁，两人旁若无人地对饮起来。随后，他又开始侮辱酒店老板，用挑衅傲慢的态度说他比老板要富上四倍。如今，我是唯一一个与他打过招呼的人（我绝不是喜欢追求轰动效应，但似乎

46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确实在让自己讨人嫌），他告诉我说，我是一个见过世面、通晓世事的人。他太太企图说服我同意她的观点：生活就像旋转木马，周而复始，一成不变。我说我的生活不是如此，说完便转身离开，把她也得罪了。看到这里，你会猜出个大概，我们这里是一套英美膳宿公寓，一对倒霉的意大利夫妇曾经走错门，误入客厅，里面全是说英语的人，英国移民正在举办晚间聚会，结果当晚他们被赶了出去。（客厅里还有一两个丹麦人或挪威人，他们只敢说英语。）

至于我，生活得非常开心：日子过得安逸而闲散，比在牛津时舒服多了。对不起，就写到此。实在太困了，准备看点书小睡一会儿。书是埃米尔·梅尔森写的《身份与现实》<sup>1</sup>，此书平淡乏味、合情合理、文词优美，用来催眠再好不过。

晚安。

---

1 埃米尔·梅尔森，《身份与现实》，第4版（巴黎，1932）。

我7日左右返回? 到时给我电话?

以赛亚·伯林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在柏林)

星期二 [邮戳日期1933年4月 [?]]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谢拉:

感谢您优美动人的来信, 它让我倍感安慰。当时我正为一些事焦躁不安, 但这封信很快就让我平静下来。我对荷兰的记忆十分奇特。去年夏天, 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正在等待参加PPE专业的口试。每天, 我或是倘佯在海边, 或是去听音乐会, 我还收到了莫里斯的多封来信, 那会儿他好像正在意大利的维罗那。我喜爱荷兰, 这个国家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战前的气氛: 到处流行的是令人愉悦的曲子, 音乐会票价低廉, 且都是高水平的演奏。我想1912年应该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吧: 每个人都单调乏味却快活惬意; 一切都老式、舒适、朴素、好客、古板, 且带有令人感动的童真; 那里有风车、木屐以及来自马来国家患疟疾般抖动个不停的种植机, 这一切都名不虚传。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的时光, 我喜欢荷兰人, 因为他们小资味十足, 举止文雅, 穿着整洁。但与此同时, 我又有一种极强的恐惧感, 因为我突然发现他们正是我一直以来唯恐自己会成为的那种人。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战前温和的自由世界, 这个世界里, 任何一点激烈活动都被压制, 没有生机, 没有活力(一切都如您所言, 除了您对新楼房的形象描绘, 说我所在的西部城市海牙附近最好的建筑是一座疯味十足的多边形精神病院。在我看来, 海牙是一个舒适且具有维多利亚气息的地方, 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英国没有一个城镇像海牙一样端庄秀丽。它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发现了这一点后, 原来的我当即回到我身上, 审视

47

---

1 (塞西尔·)莫里斯·\*鲍拉(1898—1971), 1918—1922年在新学院读古典学专业; 1922—1938年在瓦德汉姆学院任研究员和导师, 1938—1970年任瓦德汉姆学院院长。

起像荷兰人的我，我立刻感到难为情和闷闷不乐。于是，我马上离开了。在我对此浑然不觉之前，我还是很喜爱这个地方的。一个天性容易激动的波兰指挥家教给我许多音乐方面的知识；一个头秃得厉害但热情友善的荷兰人开车带我转遍了整个国家。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开心。特别是年纪大的女士，其中有两位是德国人，她们按铃要茶（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在荷兰语中意为“按铃”的词，在德语中却是狗叫的意思），侍者出现时会说：“您按铃了吗？”听起来就像“您刚才汪汪叫了吗？”<sup>1</sup>这让我忍俊不禁，因为实在是太滑稽了。那里的饭菜很不错，也只有这一次与父母共度的时光是完全称心如意的。其间遇到一位贵宾，也就是被人们称为伍德爵士<sup>2</sup>的音乐家，当地媒体形容他“才华横溢”<sup>3</sup>。我和他聊了几句，人是不错，但愚蠢至极。不，不，不。我已经不再担心您和戈伦韦。为什么非向西勒等人说这事呢？和斯蒂芬倒可以说说，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最富同情心的人，深知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对道格拉斯<sup>4</sup>我不是很熟。不管怎样，我警告自己将人际关系这片领域视为近似于神圣，当然也害怕去踏及，因为这是人们平时闲聊时常提及的话题。我开始对政治进行思考。政治是极其令人生厌的东西。我对政治一无所知，只知道我得尝试以某种方式让步；唯有忘我地投身其中，才能彻底了解内幕。但那样做的话又会与我原来的立场产生矛盾。所以我打算先让自己出尽丑态，遭人嗤笑。没人做过比这更大胆勇猛的事。这是人们根本不想去做却不得不选择去做的正确举动。尚未收到戈伦韦的信，但既然您说我会收到，就肯定没错。

至于这次的音乐会，我很可能会同汉弗莱·斯彭德<sup>5</sup>一起去，因为他真

1 伯林此处原文为：Haben Sie gebellt。

2 指挥家亨利·伍德爵士（1869—1944）。

3 伯林此处原文为：mächtig。

4 道格拉斯·帕特里克·托马斯·杰伊（1907—1996），经济学家；1930—1937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3年与玛格丽特（佩吉）·加内特结婚；1929—1940年任新闻记者。

5 斯蒂芬·斯彭德的弟弟，（约翰·）汉弗莱·斯彭德（生于1910年），建筑师、摄影师和艺术家。当时以“摄影人”之名在《每日邮报》担任摄影师一职；1937—1938年是社会调研项目——“大众观察”的首席摄影师，其间他拍摄了八百多张照片，详细调查并记录了博尔顿和布莱克浦两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1938—1942年担任《图片邮报》杂志的摄影记者，之后加入英国情报局从事照片判读工作。

的是个很不错的人。

48

戈伦韦若是和您一起去的话，可能就会取消学院里那场不无重要性的会议。但您一定要让他跟您去，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休谟的因果论至关重要。他的所有言论，或者说几乎所有言论，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提出的这一观点，使整个讨论为康德所接受，并因此变得不同寻常、令人兴奋且意义无比重大。<sup>1</sup>我想多了解一些那个玩具商。他来自纽伦堡吗？如果他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肥胖，皮肤白皙红润，坏脾气，像只身披羊毛的羊，羊毛般的白色头发十分浓密，从中间分开），那么他的孩子全都很丑。

很期待再次见到您，这个夏天将是个非常不错的夏天（对此道格拉斯一直都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而且我不会再举止不当了，会变得温文有礼。

爱您

沙耶

又及：如果在柏林有时间，（1）一定要去听听布勒希<sup>2</sup>指挥的卡门或是莫扎特曲目的音乐会。（2）原本说是要换克伦佩勒<sup>3</sup>指挥，但现在不是。

致约翰·希尔顿

星期三 [1933年6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约翰：

这里无声无息，一片静寂。我本打算为您写一篇关于上帝追踪其预言

- 1 休谟指出因果关系不可通过对自身的观察得出，只能通过对陆续出现的、我们认为有一定因果联系的现象进行观察而得出。这就表明我们有一种把因果关联归因于某种一直与之联系的现象的倾向。这一观点反过来又导致了之后康德理论的产生。他认为人的思想与“先验”范畴密切相关（正如我们现在的说法），它（如对时间与空间的经验）促使我们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认识我们的经历，这样才使这些经历为人类所理解。
- 2 莱奥·布勒希（1871—1958），犹太指挥家、作曲家。1913—1923年和1926—1937年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 3 奥托·克伦佩勒（1885—1973），指挥家。



的故事,但因为一直在瞎忙碌,尚未找到片刻凉爽闲暇。我正被这里的炎热小小地折磨着,而您恰恰是喜欢这种炎热的,所以为什么不来呢?来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牛津,到其他地方去。如果您有车的话更好。没有也没关系。这里唯一令人兴奋但又不宜议论(一定要小心保密)的传闻是,院长身体虚弱,奄奄一息,急需输血。<sup>1</sup>学院的教师们挺身而出,纷纷捐献自己的鲜血。查尔斯·亨德森也想献血,但遭到他未来岳父的阻挠,理由是如果真这么做,将来也许会断子绝孙。人的血就那么多,这是他岳父的想法。哈迪的血不能用。彼达克和菲尔普斯<sup>2</sup>的血管里虽然奔涌着流动的物质,但这种物质不是血液,而是某种不好的、质量低劣的液体。这种液体充斥着他们的血管(您觉得我这种极端虚假做作的文风如何?),但不是血液。所以布莱克威<sup>3</sup>捐了两品脱的血。现在他们是血脉相通的兄弟了。布莱克威也将被邀参加各种家庭聚会。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您一定要来。要不要我写封信给达尼丁<sup>4</sup>或鲍拉,说服他们来,鲍拉是真心想干点事呢。

爱您的

沙耶

---

1 补充说明: 艾伦于1933年6月16日去世。

2 他们均为圣体学院的研究员: 弗雷德里克·伯纳德·彼达克(1883—1952), 数学家, 1921—1950年任学院研究员; 威廉·菲尔普斯(1882—1963), 古典学者, 1906—1950年任学院研究员, 1924—1950年任导师。在《颗粒: 牛津大学圣体学院20世纪院史》(第48页)中, 以赛亚·伯林写道: “彼达克为《泰晤士报》撰写牛津成员的讣告, 并且说每当他改变对某人的看法时, 会修改写好的讣告, 改为轻蔑的口吻[……]菲尔普斯知识渊博、聪明能干、出类拔萃、人品很好。他喜欢有绅士气度的运动派, 不喜欢书呆子和文艺派。他是一个性格直率、保守老派的典型英国人。”

3 布莱克威, 阿兰·艾伯特·安提斯代尔(1898—1936), 古希腊考古学家。1931—1936年任圣体学院研究员和导师; 1936年任雅典不列颠学校校长; 1935年与艾丽森·霍普(后成为安东尼[托尼]·安德鲁斯的夫人)结婚, 于1936年10月1日在温切斯特学院死于败血症(1924—1931年他任该院院长)。“既令人生畏又讨人喜欢”(玛丽·班纳特1996年9月2日致编者的信)。

4 如果此人是法官安德鲁·格雷厄姆·穆雷爵士, 达尼丁子爵(1849—1942), 那么, 以他和以赛亚·伯林的关系, 为什么伯林要写信让约翰·希尔顿说服他来, 我就不清楚了。但更有可能是“Dunbabin”的笔误(原文为Dunedin)。如果事实如此, 应该是指权威考古学家托马斯·詹姆士·丹巴宾(下文第251页注1), 他才是能够帮助希尔顿圆梦考古梦的人。

1933年6月下旬(以及1934, 1935和1938年), 以赛亚·伯林和他的三位牛津朋友去爱尔兰度假。这三位朋友分别是: 当时新学院的院长H.A.L.费希尔<sup>1</sup>的女儿玛丽·费希尔<sup>2</sup>; 伯林的学生莫伊拉·林德, 外号叫“小宝贝”, 在牛津时与费希尔一家同住;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sup>3</sup>, 牛津新学院古代世界史的导师。他们最后去了戈尔韦郡曼高仕附近的安尼朗湖, 住在这片小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小岛归马塔莎伯爵夫人所有, 她是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一个朋友的岳母。这位伯爵夫人就住在那里附近一个叫奥特拉德的地方。此次旅行北上时, 他们临时决定拜访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sup>4</sup>(即艾伦·卡梅伦夫人), 鲍恩宅邸是 50 鲍恩在科克郡基德里附近的家(她在牛津附近的海丁顿也有一座房子)。此次拜访是伯林的朋友汉弗莱·豪斯的提议, 他是瓦德汉姆学院的一位英语导师, 也是鲍恩的情人。他当时住在鲍恩宅邸。后来, 伯林和鲍恩成了好朋友, 经常通信。1938年, 伯林在鲍恩宅邸完成了马克思传记。

玛丽·费希尔6月27日在鲍恩宅邸给她母亲去了一封信, 由于之前她不清楚汉弗莱·豪斯教名的拼写, 在信中还更正了人们对汉弗莱在鲍恩宅邸地位的误解, 并对此行作了生动的描述:

附近18世纪建造的的房子中, 至今尚未被烧毁的<sup>5</sup>只有这一幢了。这幢大房子十分宽敞, 但样子丑陋, 就像一个灰色的石头盒子, 坐落在到处是树林、绵羊和苍鹭的辽阔的公园里[……]顺便说一下, 这幢房子不太可能为汉弗莱·豪斯(有点驼背, 神情严肃的年轻人)拥有, 更可能是伊丽莎白·鲍恩, 也就是卡梅伦夫人的。她非常可爱, 而且热情好客, 虽然妆容糟糕得让你无法想象: 整张脸都擦了白白的湿粉, 胭脂也涂得乱七八糟[……]一路开车过来, 到

- 1 赫伯特·艾伯特·劳伦斯·\*费希尔(1865—1940), 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 1925—1940年任院长。
- 2 玛丽·利蒂希亚·萨默维尔·\*费希尔(1913—2005), 1931—1935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古典学专业。
- 3 克里斯托弗·威廉·马切尔·\*考克斯(1899—1982), 古代史学家, 1926—1970年任新学院研究员。
- 4 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 小说家。
- 5 在十多年前的动荡年代, 许多盎格鲁—爱尔兰式的房屋被爱尔兰人视为强权压迫的象征而被烧毁。

达时我们的样子可谓狼狈不堪、体面扫地：地图、雨衣和克里斯托弗牌布帽都滴着水，真把人吓坏了。下车后一眼看到的便是两位女士[伊丽莎白和她的朋友布朗小姐]，穿着美丽的条纹丝绸连衣裙，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动作优雅地摘除莓果上的梗蒂[……]这两天充满惊险刺激，我从未笑得那么多，林德和我一直都在咯咯地笑，以赛亚则在汽车的后座上用假嗓子引吭高歌。

两天之后，在克莱尔郡海边的柯尔克度过了沮丧的一天后，玛丽在基拉卢小镇写了一封信（基拉卢位于利默里克的东北部，德格湾的南端，香农河的岸边），信中她写道：“‘小宝贝’让以赛亚来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即便是在最阴郁的时候，他也是大家的开心果。”周五，在戈尔韦郡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灾难”（接下来的信描述了这场事故）后，她又补充道：

以赛亚真的是上帝的恩赐。他做事极有效率，同时不断逗大家开心[……]他真的很可爱，一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讨人厌。如果没有他，天知道“小宝贝”和我在这次小小的灾难中会怎样[……]身边有个可以依靠的男士真是令人心安。

51

##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3年6月30日

戈尔韦郡，南方大酒店

亲爱的卡梅伦夫人：

我想告诉您，对于在您家中度过，并且有您陪伴的一天一夜，我真的心怀感激。因为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这次旅行也成了少有的美好经历。与汉弗莱<sup>1</sup>度过的清闲日子舒服惬意，和平时一样，我大多沉浸在自导自演

---

1 按照以赛亚·伯林的描述，汉弗莱·豪斯当时“闷闷不乐，没有工作，为对宗教的怀疑所折磨，随时准备恋爱”。他第一眼就觉得莫伊拉·林德具有“让人无法抵抗的魅力”，“像一条害相思病的大狗”般在鲍恩宅邸围着莫伊拉转，几小时之内就说自己“深深地、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伯林对此持反对态度）。第二天，他们继续旅程时，豪斯坚持要陪同一段路。见伯林1982年1月致莫伊拉·加斯特的信。

的温柔白日梦中，而其他人则一直在谈论鸟类的话题。之后，我们的车撞上了一个小个子老妇的驴车，她的驴车散了架。那是一个完全无人居住的地方，但很快就聚集了七十几个人。相比受伤，那位老妇人更多是受了惊吓。但她却开始不怀好意地夸大自己的伤势。

如果您对这种事有兴趣的话，就让我告诉您接下来发生的既严肃又滑稽的一幕吧。爱尔兰警察<sup>1</sup>都是些热情可敬的人，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接着到警察局做笔录（“林德小姐努力保持小姐派头，伯林先生则眼冒金星，恍然间看见一只驴身上插着断箭向他冲来……”等等），这番情景完全就是雷内·克莱尔《最后一个百万富翁》<sup>2</sup>的翻版，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被一条坏消息破坏了。考克斯的一根手指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于是其他人一直在沮丧地奔波，从修车铺到警察局，从警察局到医院，再从医院到铁路宾馆。整个小镇的人好像都知道了这件事，因为我们老是被陌生人拦住，问我们一些表示同情的问題。我们尽力不让此事见诸报刊，您知道我们这两位年轻小姐是极具新闻价值的，而且她们非常害怕让父母知道，所以必须将此事高度保密，并且编出一个巧妙的谎言来解释为什么考克斯的手指短了一节。我只能解释说我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手指咬断了。我的语气声调应该恰如其分，不让别人看穿其中的真假，否则会成为一个人让人怀疑的烂笑话。因为绝不能让这次事故走漏风声，“小宝贝”表现出超凡绝伦的智慧，打点一切大小事宜，没有任何人协助，便营造出一种真实（有点像战争时期）的浪漫氛围。在其中，我只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没用，52 但对这种氛围很是欣赏。

对不起，我没想扯远：原先只想告诉您，对您的盛情款待，我们真的不甚感激。如果您愿意，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在牛津再次见到您，尽地主之谊。顺便说一句，马塔莎伯爵夫人是个身材高大、善良慈祥的人，而她的儿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Gardai。

2 雷内·克莱尔（1898—1981），于1931年写了《最后一个百万富翁》的电影剧本，并导演了这部早期经典电影。

子却热情过头，十分令人生厌。

您极为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西勒·林德

星期六〔邮戳日期1933年7月1日〕

戈尔韦郡，南方大酒店

亲爱的西勒：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并且令人愉快的旅行团队。对于其间发生的种种趣闻逸事，我只希望能够尽可能多记住，以便回去后向您一一述说。现在我确信，意大利之旅将会获得圆满成功：如果之前的旅行没有失败，接下来的就更不必说，一定会十分顺利。“小宝贝”变得日益温柔可爱，玛丽也愈加活泼开朗，越来越有北欧人之风。

克里斯托弗一直兴高采烈，片刻也安静不下来，我则长时间保持沉默，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中。那晚和我们共度时光的卡梅伦夫人很有魅力，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若是在牛津，她肯定大受欢迎。我们在那里没吃别的，成天就是大量的茶、鸡蛋和培根。当地人都很可爱浪漫，没什么时间观念，但有时比较务实，因为说话意思含糊，有点烦人。不过对此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我要结婚，一定会选择爱尔兰人做妻子。我差不多可以完全确定我会去参加您的聚会，是6号还是7号举行？对于这次旅行，我并不期待它会是一段多么有收获的经历，只把它当作繁忙工作中一段令人愉悦的间歇，一个轻松的无所事事的真空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什么也不干，也没有人要求我干什么。您看我啰啰嗦嗦，肯定会破坏我对意大利之行的描述。考克斯组织的这个旅行小队真的很有意思。

您的  
沙耶

第二天，玛丽·费希尔从安尼朗湖写了封信回家，内容如下：

53

好开心呀！我们住在湖心岛中央的两座小木屋里，湖的四周群山环绕。刚进去时，木屋里简直肮脏透顶。尽管如此，它还是像个天堂。想不到以赛亚在做家务方面居然是个能手——昨天进去时，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就已迅速脱下大衣，把水槽清洗好了。之后又欣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挖了一个坑，把蛋壳、罐子之类的东西掩埋掉[……]清晨，趁他们还在阳台熟睡之际，我和“小宝贝”脱去衣裳在幽深清冽的湖水里游了个晨泳，感觉真不错。

他们在岛上又待了两个晚上，于7月5日星期三乘坐往返爱尔兰首都柏林与荷利赫德之间的轮船回家。之后，以赛亚与父亲共度了一段假期，才与牛津同伴们再次踏上旅途。

致玛丽·伯林

[1933年7月]

乐图凯，大西洋酒店

亲爱的妈妈：

我把父亲送到赌场玩，自个儿待在这里看信写信。我很好，明天要出发去巴黎和意大利。您发的电报迟迟未到，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不安，不过随着今晨电报到达，不安情绪立刻一扫而光。我们的假期非常愉快。至于瑞士，在父亲眼中，是个物价过于昂贵的国家。但他真正担心的是连比克都走后，银行放假时他有什么事可做。他正处在既没有朋友，又必须依赖别人陪伴的丢脸处境中。我也依赖别人的陪伴，但至少不会没有朋友。希望您经过德国时一切顺利。<sup>1</sup>这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有天晚上，我们曾透过一家咖啡店的窗户看到苍老疲惫、穿着褴褛的弗丽达·马可夫娜正和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快速走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爸爸看起来神采奕奕，精力充沛，

---

1 自希特勒1月份成为德国总理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掀起反犹太人运动并颁布反犹太人的法令，受纳粹主义鼓动的人们开始公开压迫犹太人。

我也不错。在我和科洛思维特去布拉格之前，会在意大利或瑞士等地待上十天。科洛思维特让我转达他对您和父亲的问候。在某些方面，他是个标准的美洲人，到四十岁时他会成为自命不凡的人，但现在还好。

到波多菲诺之后我会再给您写信。父亲还没回来，所以我会把这封信寄出，而不让他知道。和他度假期间根本无法工作——他阅读的时间从不超过三刻钟，而且讨厌一个人待着。但他是个很好的人。偶尔我会对他做出客观的评价，不是从儿子的角度，而是纯然出于客观，他确实是个优秀的人，就连他的自我中心都是带有人情味的，是和蔼可亲的。看到他没有被生活侵蚀的确是件快事。您会说是您撑起的保护伞使他避免与外界产生摩擦。或许是的。但有些人却专门要找棱角磨炼自己。<sup>1</sup>您不让他经历风浪，他自然也就不会竖起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对于这一点，我要感谢您，祝愿您和比克先生玩得愉快。他是个十足的多愁善感的人。

爱您

沙耶

在波多菲诺，与以赛亚·伯林结伴度假的人包括罗伊·哈罗德<sup>2</sup>和他的母亲弗朗西丝<sup>3</sup>、托马斯·霍奇金<sup>4</sup>以及林德姐妹。但之后大家发现所住的旅馆有诸多不便，而且波多菲诺实在太拥挤，所以于8月2日搬到了加尔达湖的圣维基里奥饭店。德瑞克·凯恩<sup>5</sup>和爱德华（“泰迪”）·霍奇金<sup>6</sup>原计划不久后与他们在波多菲诺碰面，所以托马斯给泰迪写了封信，告诉他们计划变更，但未能

1 伯林此处原文为：потереться о них。

2（亨利·）罗伊·福布斯·哈罗德（1900—1978），经济学家，1924—1967年任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学者（研究员）和导师。

3 弗朗西丝·玛丽·迪赛里·哈罗德（1866—1956），小说家。丧夫。演员约翰斯顿·福布斯—罗伯逊的妹妹。

4 托马斯·莱昂内尔·霍奇金（1910—1982），1928—1932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3年在莫德林学院读研究生，1932年12月26日到1933年7月24日作为实习考古学家居住在巴勒斯坦，之后经由欧洲回到英国。

5 德瑞克·爱德华·沃特·布莱基（1912—1944），原姓凯恩，1930—1934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3年更改姓氏，1944年2月14日于缅甸阵亡。

6 托马斯·霍奇金的弟弟爱德华·克里斯蒂安·霍奇金（生于1913年），家里人称他“泰迪”。1932—1935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历史专业，之后（1969—1972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

联系到德瑞克，于是德瑞克去了波多菲诺。8月4日德瑞克发电报让大家在博尔扎诺与他碰面，但未说明具体会面地点。以赛亚、托马斯和泰迪在博尔扎诺四处寻找德瑞克未果。之后，伯林途经茵斯布鲁克到达马里昂巴德城，接着前往萨尔茨堡。此前，他已邀请霍奇金兄弟8月20日在那里会面。

致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1933年[8月]<sup>1</sup>14日

寄自萨尔茨堡邮政总局待收保管处

亲爱的X:

最近好吗? 怎么都不来信呢? 对于牛津的古典人文学课程, 您还满意吧? 您的手指怎样了? “小宝贝”自意大利回来后是不是变得更消沉了? <sup>2</sup>还是恰恰相反? 能告诉我古典人文学课程的一些详情吗? 福特<sup>3</sup>的大房子是否正在举行葬礼? 您是否觉得我慢慢变得像伊夫林·沃笔下的首相<sup>4</sup>一样, 常常抱怨说别人什么都瞒着他? 很显然, 对此问题, 我想您的答案很多, 那就填完以上问卷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对我的地址您一定要保密。如果让林德她们知道, 后果就严重了。在这里, 我正迅速变成一名斯拉夫哲学家: 当地的名流均为教授, 极有智慧。对于邮票上的这个人, 您不觉得他既拥有院长的严肃高贵气质, 又拥有克拉克教授温文尔雅的魅力吗?<sup>5</sup>

沙耶

古典人文学课程成绩应该还不错吧?

新学院档案

1 原文误写为7月。

2 其中的原因不明, 据推测与恋爱有关。

3 爱德华·威廉·斯宾塞·福特(1910年生), 1929—1933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 1934—1935年获哈姆斯沃思奖学金, 成为中殿律师公会法律系学生; 之后(1975年)担任勋位册授登记者和书记官; 出身显赫, 可惜未能取得新学院古典人文学科大考的一等学位。

4 即“愤怒先生”, 见伊夫林·沃的小说《邪恶的肉体》中“上个星期的首相”(但很快官复原职)一章。

5 这张捷克邮票印着当时的(也是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沙利克的画像。这里的院长指伍斯特学院院长弗朗西斯·约翰·利斯(1863—1947); 克拉克教授指A.C.克拉克。



致罗伊·哈罗德

1933年8月15日

马里昂巴德, 克林格G.饭店

感谢您热情洋溢的来信。我的财务问题确实日益突出<sup>1</sup>, 而且金钱问题带来的忧虑我想您也非常清楚。但和您比起来, 我需要补充钱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博尔扎诺是个舒适的好地方, 但完全找不到德瑞克·凯恩的踪迹, 这里姓凯恩的人很多, 就是没有叫德瑞克的, 我想德瑞克一定会觉得自己被人冷落了, 原本忧郁的心情会变得更加阴暗。从博尔扎诺出发, 我们又去了茵斯布鲁克, 在一个荒凉的高坡上与汤米·霍奇金兄弟道了别。他<sup>2</sup>的订婚吹了, 但仍表现得十分洒脱。马里昂巴德因中欧各种思想的交汇而大放异彩。这里到处是流亡者、革命家、煽动家和反煽动家。实际上, 这也是一座宜人的城市。在茵斯布鲁克, 我与斯特雷奇小姐<sup>3</sup>和她的年轻男友不期而遇, 他们居然也在马里昂巴德旅游, 令我惊讶不已。真是太巧了。之后我们便结伴同行。我们在她那位年轻男友的父亲<sup>4</sup>面前出演了一幕荒诞剧, 我不得已将斯特雷奇小姐以琳达·格莉尔<sup>5</sup>的身份介绍给他。我很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您, 但信里实在写不下。在这里, 一名来自洛克菲勒家族的叫迈克尔·安吉洛·黑尔普林<sup>6</sup>的学生很想见您。请转告您母亲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心愉快, 谢谢她的关心。

沙耶

- 
- 1 从这封回信可以看出似乎罗伊·哈罗德的母亲不知何故介入伯林的财务问题, 认为他在国外旅行时应该再补充些现金。
  - 2 “小宝贝”林德曾和汤米订过婚, 但在汤米去巴勒斯坦之前两人解除了婚约。
  - 3 芭芭拉·斯特雷奇(1912—1999), 奥利弗(利顿的兄弟)和雷·斯特雷奇的女儿。1930—1933年就读于剑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院历史专业; 1940—1941年在情报部工作; 1940—1974年在BBC任职(1942年任国际新闻助理); 1934年1月17日与奥雷夫·休尔汀结婚(两人于1937年离婚), 后与沃尔夫·哈尔彭结婚, 即文中提到的所谓“年轻男友”。
  - 4 指乔治·格德·哈尔彭(下文第110页注2)。
  - 5 大概是想到了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的校长琳达·格莉尔的名字(下文第297页注2)。
  - 6 迈克尔·安吉洛·黑尔普林(1909年生), 经济学家。1935—1938年任日内瓦国际研究所国际货币关系学教授。

希望您注意到了这张邮票上的人物长得与克拉克教授以及/或那位院长是多么惊人地相似。

大英图书馆, 馆藏手稿补遗, 71191号

致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星期五26日 [即1933年8月25]

萨尔茨堡, 普兰斯塔斯街59号

理查德·艾德勒·冯·科萨茨基中校宅邸

不过最好把信直接寄往邮政总局

亲爱的X:

一直没给您回信, 我的无礼还请您原谅。个中原因是我这里的邮局送信服务糟糕透顶, 您的三封信<sup>1</sup>在同一时间到达。把三封信按日期顺序一气读完后, 我的整个感觉是受宠若惊, 深受感动, 喜悦万分, 虽然孤身一人也不再惶恐不安。但临到末了, 还是对眼前明摆着的困难深感苦恼。这些困难或许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 具体包括(我一贯的专业化做法就是把它们用1, 2, 3罗列出来):

1) 钱。因为手头太紧的缘故而根本去不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不能确切地说我手头还有多少钱, 但我不想一到那里便开始借钱。

2) 我已在外漂泊太长时间, 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是浪费时间, 是精神折磨, 这个行程使我的思乡之情不断滋长。而我最多只能在那里待上两天左右, 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

1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邀请柏林到“黑人”厄克特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乡村木屋度假(位于欧洲第一高峰勃朗峰山麓的圣日珥维勒邦)。在那里他接替身体抱恙的厄克特, 组织了一场新学院的读书会。

57 我现在已经不太想去鲁塞尼亚<sup>1</sup>了,但是G和S<sup>2</sup>已经抵达这里(这仅仅是因为之前我坚持他们俩从不同的道路出发,在不同的时间抵达。S在G来之前非常忧虑不安,现在他们公开的爱意已经融化了每一个人的心,只有我除外。我冒着极大的危险试图制止他们),我觉得自己应该遵守诺言。真是左右为难呵:我们都认为萨尔茨堡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地方(我过去四年的梦想),所以想留下来;可是如果现在不去鲁塞尼亚,以后也许就再也去不了了,并可能会因此错过一些东西。而且谢拉一直渴望去那个地方。我试着用鲁塞尼亚人被各种可怕的疾病缠身、政局动荡等种种传闻来吓唬他们,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前往那里。我们将于周一早上离开这个天堂般的地方,由水路前往并于周二抵达伯拉第斯拉瓦,周三抵达科希策以及乌日霍罗德,这些地名都很吸引人。我不想在那里停留超过三天。如果我4号,即周日出发,可能会在5号晚些时候抵达苏黎世,如果要去木屋别墅,可能就会在6号的某个时间抵达,然后可以待至8号或9号。不知这么做是否值得?当然,不可否认以下事实:

(1) 我很想见您。夏初和夏末都有您相伴,会让我的夏天变得圆满而且回味无穷。

(2) 倘若我不在哪个地方终止这趟旅行,到最后它只会变成折磨。因为连续四十小时待在三等车厢里无疑会使人变得形容枯槁,不成人样。花费、良心,还有我父母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都令我心情沉重。您收到这封信后,如果想空邮一封信到科希策[koschau]<sup>3</sup>的邮局待领处,请在信中告诉我信从苏黎世或巴塞尔寄到你处的路径,是否两天左右能寄到,因为相距遥远,路上存在各种困难。如果您能那么做,我想就可以开心地给您发电报了(顺便说一下,您的电报昨天下午才收到)。有很多话想对您说,但这里

1 乌克兰鲁塞尼亚现在分属斯洛伐克和乌克兰。

2 指戈伦韦·里斯和谢拉·格兰特·达夫。谢拉对此次前往乌克兰鲁塞尼亚旅行的评价很高(是以赛亚·伯林建议他们去的:“他希望深入了解‘基础斯拉夫语’。据他所知,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流行的语言。”)。在她的书中,曾提到匈牙利于1920年把乌克兰的鲁塞尼亚归还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分道扬镳:30年代之我见》(伦敦,波士顿,1982),第50—53页。

3 此标注和括号号为伯林本人所作。这里及上文的正确形式是“Košice”。

只能简单说说，以免打扰您的工作。霍奇金兄弟此时也在意大利。我和汤米不熟，但他性格随和，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和“小宝贝”的关系那么甜蜜，那么守规矩，有时还不免冒些傻气，真让人心动。罗伊·哈罗德认为年轻人就是应该享受生活，但西勒却不同意，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小宝贝”不值得他那样。光是哈罗德夫人就值得写上六七十页，她总是一惊一乍，问遍所有人她的背是否露得太多。想当年，她可是个富有且身材出挑的美人儿。现在这么做与其说好笑，倒不如说令人厌恶。

所以，一定要写信给我。

不管怎样，大约在9月4日左右，我会在某个地方给您发电报的。

58

我同意，古典人文学科还是很公平的。假如斯多福<sup>1</sup>获得哲学一等学位，哲学的水平肯定会下降。

谢拉和戈伦韦今天爬山去了，就剩我一人和艾德勒·冯·科萨茨基相处。他谈论着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的丰功伟绩，谈论着他的前任院长约瑟夫大公<sup>2</sup>(?)。这座小城从哪方面看都像天堂，但是政治的阴影已经逐渐开始笼罩这里，这极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此地。我在这里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一定想不到吧。显然我该就此搁笔了。

您的

沙耶

非常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书单，但我已有康德的书，也就别无他求了。

离开萨尔茨堡后，伯林和戈伦韦·里斯以及谢拉·格兰特·达夫在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短暂停留。回伦敦的路上，他在维也纳(9月3日)和苏黎士(9月4日)各逗留了一天，之后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厄克特的一处乡村木屋别墅，

1 爱德华·肯尼迪·斯多福(1911—1983)，1930—1933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6年加入英国战时国防部。

2 应该指约瑟夫·卡尔大公(1833—1905)，奥地利皇室匈牙利分支的家族成员。

与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等朋友聚了几天。<sup>1</sup>

致门德尔·伯林

星期天 [1933年9月3日, 明信片]

日利纳 (离维也纳五小时车程)

我已踏上归途, 但行程缓慢。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是一个自然景观贫乏的地方, 所以我计划在萨瓦省圣日珥维的一所小木屋住两三天。新学院有好些人在那里买了避暑小木屋, 他们发了七八封信和电报邀请我到那里度假。希望周六或周日能回到伦敦。

爱您的

59 沙耶

致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12日 [邮戳日期1933年9月]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X:

同您一样, 我也在身心疲惫地日夜兼程。关在七英镑换来的三等卧铺车中, 车上乘客很友好, 上车或到站离开时都会礼貌地相互握手。和我同座的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骑兵军官, 对意大利威胁论发表了颇为有趣的见解, 提及那些大人物时总是骂骂咧咧。谢谢您邀请我到小木屋度假, 我在那里过得非常开心, 它使我从长时间的抑郁与疾病中恢复过来。总之, 我对那里的一切心怀感激, 每位住客都那么友好,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诚意。

---

1 在木屋的访客留言簿里, 伯林记录的日期是9月5—10日(克里斯托弗·威廉·马切尔·考克斯的记录日期是9月2—22日, 而且伯林在那里照了很多相: 参见图13和14)。伯林逗留此地期间(显然他仅此一回到过木屋), 当时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奇尔弗(下页注1)、赫伯特·\*哈特、弗雷德里克·沃尔特·豪、托马斯·乔治·欧德林、马克·戴尔科·坦南特、理查德·韦尔伯弗斯(下文第75页注5)、奥利弗·弗雷德里克·约翰·布拉德利、伍兹、夏恩·怀利。后六人均来自新学院(韦尔伯弗斯如今不在新学院)。

请转告理查德<sup>1</sup>，他的长信已经安全寄出。道格拉斯带头撰写的关于《棕皮书》的文章<sup>2</sup>，使《经济学家》杂志在德国遭到没收，为此道格拉斯兴高采烈，大家都心情舒畅，就连雷顿<sup>3</sup>也没那么暴躁了。戈伦韦和谢拉也在这儿，他们原准备同杰伊一家出去共度周末，但现在闹翻了。目前我们个个都很开心，听说“小宝贝”也不例外。一切看起来都不错。至于我，接下来不会和什么人见面，准备埋头工作。希望我能在这里待得久一些。最近这里阴雨不断，除了几场婚礼<sup>4</sup>，其他乏善可陈。上帝，真是无聊透顶。抱歉。

沙耶

新学院档案

致伊索贝尔·亨德森<sup>5</sup>

1933年9月28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亨德森夫人：

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想说的话。直至现在，我仍无法使自己完全明白昨天几乎是偶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的几行消息。为此，我请求您的宽恕。看到这则消息，我才意识到我对查尔斯是多么依赖。意识到他为我并与我一道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一觉悟居然要靠这种方式唤醒，真让我感到羞愧难当。他与我同年同日进入圣体学院，我们俩曾经都很失落，终日郁郁寡欢。此刻我多么希望自己在过去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真

1 理查德·克莱蒙森·奇尔弗(1912—1985)，1931—1934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4年成为公务员，1937年与萨莉·格雷夫斯结婚。

2 指《经济学家》1933年9月2日刊出的未署名的文章《恶魔希特勒》(第440—441页)。《棕皮书》全称为《关于恶魔希特勒与国会纵火案的棕皮书》，由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国际委员会”撰写(伦敦，1933)。有趣的是(鉴于后来不确定伯林对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了解程度)，该书第8章“迫害犹太人”中有一小节(第283页)标题为“犹太人问题的清算”，这里是指“针对六十多万犹太人的灭绝之战”。不知伯林是否读到了这一小节？

3 沃特·托马斯·雷顿(1884—1966)，1922—1938年任《经济学家》杂志编辑。

4 包括查尔斯·亨德森与伊索贝尔的婚礼。

5 查尔斯·亨德森于9月24日在罗马度蜜月时死于胸膜炎。

的很感谢他在芸芸众生中选中我成为他的朋友。在教师休息室里，他是唯一真正有人情味、有教养的人。他的高雅品位、他的羞怯、他的温和、他的亲切使他在那冷冰冰的气氛中倍感孤立，但他却拒绝被同化。他的居室是当时唯一能让我，想必也让他后来在牛津结识的朋友们，找到温暖和同情的地方。而这在牛津的其他地方几乎不存在。同时，他也极其理智成熟（当然，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从未感到两人年龄的差距。想必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我自己也十分老成。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显得十分幼稚愚蠢，是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每当我冒傻气或情绪低落的时候，总是他为我指点迷津。是他力排众议，为我安排好在全圣学院的整个职业生涯，同时送我到全灵学院，从各方面支持我，扶持我。很抱歉，我这样似乎是硬拿我自己和自己的事叨扰您。但我确实对他心怀莫大感激。这份感激之情超过了四年大学时光里对牛津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这是我表示感谢的唯一方式。在其他方面，您比我更了解他：他的敏感和典型的欧洲人特征，对资产阶级迂腐的厌恶与不适应，以及对牛津大学里呆板、狭隘的学术兴趣的不满，让他在整个四年中闷闷不乐。实际上，这一切直到他遇见您之后才有所改变。想当年，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可悲可怜，同时也变得像普通人和贵族阶层一样保守。尽管与他关系甚密，但我不会也不想为他写讣告。我所能做的只是写下这封冰冷而又笨拙的信，其中原因或许将来某一天会告诉您。他订婚后我遇到过他几次，那时他幸福洋溢，深陷爱河，整个人也发福了，一副有钱人的模样。他的离世是我人生当中遇到的最感悲伤的事。虽然我生性害羞，口拙笔笨，未能用适当的言辞来表达我的慰问，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体会并理解我力图表达的同情之心。很抱歉，原谅我辞不达意。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认为离开言论贫瘠的新学院是一种“彻底解放”。<sup>1</sup>全灵学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那里的人个个朝气蓬勃、充满智慧且活泼健谈。年长者都得小心处事，因为他们的人数少得多。”<sup>2</sup>这里所说的年长者是指那些在学术界和大众眼中身居要职、颇具影响的老一辈学者，他们大都持保守观点。那些平常不在牛津的往往会在全灵学院度周末。虽然他们和年轻一辈学者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因为年轻学者绝大多数持“左翼”观点，这群人还是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于辩论的热爱，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辩论，国际政策、英国的治理、欧洲的未来都是拥有敏锐头脑的他们辩论的焦点问题。听他们的对话就仿佛上了一堂堂精彩的政治学课。<sup>3</sup>当然，下一封信所记载的对话显然并未达到这一水准。

致亚当·冯·特罗特

10月26日 [1933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亚当：

早该给您写信的。此刻写这封信时，全灵学院的一切如常运转。炉火旁罗斯和里斯正在谈论德国的政治前景。我实在听不进去，因为罗斯又在老调重弹。他们的对话一直在原地打转，同样的问题讨论了三四遍甚至五遍。候选人都很差劲。（您为什么不来呢？大家心情郁闷，以至于谁都不想选。）汉弗莱·豪斯没写出好论文，恐怕他的身体要为此遭罪了。卡西尔也来了，正饶有兴味地与不同学派的年轻哲学家们分享他的成功故事。受他的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0。

3 见伯林与弗朗索瓦斯·索比尔的访谈，“以赛亚·伯林先生，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出自《牛津，1919—1939》（巴黎，1991），第66页。



影响，我逐渐恢复了精气神。福斯特<sup>1</sup>、赖尔<sup>2</sup>、普莱斯<sup>3</sup>和艾耶尔<sup>4</sup>懒洋洋地并排躺着听他高谈阔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对您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您不会认为这只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在我看来，它们绝非小事。卡西尔思路清晰，言谈风趣，而且博学多才。此刻，我总算渐渐可以专注于某件事了。

我的暑假过得十分痛快。从爱尔兰到意大利，从意大利到奥地利，从奥地利到鲁塞尼亚（一个狂妄的国家，那里的人肮脏卑劣，同时又十分有趣，雄心勃勃。不存在什么占大多数的东西。他们有五种主要语言，七个分支语言，七块边境地带，性格独特而又狂热的犹太人，还有爱争吵的心胸狭窄的乌克兰人），从鲁塞尼亚到瑞士，之后还去了法国，最后才回家。中欧人口拥挤，个个野心勃勃，妒贤嫉能。巴尔干式各自为政、分裂敌对的特点丝毫未见减弱，不久肯定要再出事端。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自作自受。我没法继续写了，因为罗斯在我身边喋喋不休，说个没完，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让我觉得头脑发晕，想象力迟缓，精神疲倦。他的观点或许都很正确，只不过需要证据支撑。比如“我亲爱的戈伦韦，重要的不是听人们说他们在想什么，而要看他们在做什么。马克思说过，人民之所以下决心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建立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的民族精神使然，这种意识是根据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而产生，而不是靠他们认为自己打算做什么而形成……”，等等，等等。我写不下去了。务必写信给我。我需要从思想活跃的人们那里得到支持，任何形式都欢迎。

您的

沙耶

- 
- 1 迈克尔·贝瑞斯福德·福斯特（1903—1959），1930—1948年为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和哲学导师。
  - 2 吉尔伯特·赖尔（1900—1976），1925—1945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毕业后留任哲学导师；1945—1968年是韦恩福利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莫德林学院研究员。
  - 3 亨利·哈勃雷·普莱斯（1899—1984），1924—1935年任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兼哲学讲师；1935—1959年成为逻辑学威克汉姆讲席教授，同时担任新学院研究员；1939—1940年任心理研究协会的会长。
  - 4 阿尔弗雷德（“弗雷迪”）·朱尔斯·艾耶尔（1910—1989），1928—1932年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古典学专业；1932年与（格雷斯·伊索贝尔·）勒内·里斯结婚；1932—1935年任基督教堂学院哲学讲师，1935—1944年为研究学者；1944—1946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兼哲学讲师。

查尔斯<sup>1</sup>的死让我悲痛欲绝，好一段时间无法平静。没想到我这么喜欢他。我真的无法接受再也看不到他的事实。

致黛安娜·哈贝克<sup>2</sup>

星期一 [1933年10月30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黛安娜：

真希望能在更合适的场合见到您。那次我身边到处都是人，而且我不太喜欢斯佩里小姐。这也许是我的错，因为大家都说她拥有一双美丽且充满智慧、如天鹅绒般温柔的眼睛。但事实是，她和讨人喜欢但与我们毫不相关的人物——哈德森<sup>3</sup>的出现，使整个场面过于张扬。我想您应该不会在短 63  
时间内再来牛津吧，我也不在伦敦。因此，要想再次见到您（除了这门课的种种优点外，上次的会面令人遗憾，我们绝不能让它成为最后的记忆），只有到12月，中间还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圈子非但没有扩大，反而正急剧缩小，圈中富有生气、待人热情的人因为稀缺而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您那篇关于马丁·库珀<sup>4</sup>的评论有结果吗？我能写信问他吗？这么做的话会怎样？请一定告诉我。<sup>5</sup>他迫不及待地想赚钱，肯定会回伦敦来为这些写字幕。不管怎样，他圣诞节也会回来。另外有件事我忍不住要告诉您，就

1 指查尔斯·亨德森。

2 黛安娜·玛丽·哈贝克（1912年生），简·奥斯汀的第五个兄弟弗朗西斯的曾侄孙女；1931年就读于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的圣保罗女子学校；亚当·冯·特罗特的好友；受过专门培训的广告撰稿人；1936—1940年受聘从事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德国以及捷克儿童难民的救助工作；1939年与戴维·霍普金森结婚。

3 杰弗里·弗朗西斯·哈德森（1903—1974），东方学家，1926—1954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4 马丁·杜·普耶·库珀（1910—1986），音乐评论人兼音乐家；1928—1931年就读于圣埃德蒙德学院现代语言学专业；1934—1939年担任《伦敦信使》杂志音乐评论人，1942—1950年担任《每日先驱报》的音乐评论人。

5 库珀似乎请求黛安娜·哈贝克做了某种形式的推荐。

在十分钟之前，在我写这封信时，恩斯特·卡西尔教授<sup>1</sup>过来问他的专题研讨会是否准备在圣诞节举行，我真是搞不明白。我希望自己没有对他失礼，可他看我的眼神就仿佛我是个疯子。正如您猜到的，圣诞节最后成了基督堂市。<sup>2</sup>原谅我，告诉您这么一件乏味的琐事，只是因为它刚刚发生，而且这里的人实在缺乏欣赏能力，我才顺便提提。请回信告诉我关于马丁的消息，以及随便其他什么事情。很遗憾，您没能来与[A.C.]克拉克教授共进午餐，那次经历真是令人难忘。

您的

沙耶·伯林

致托马斯·霍奇金

[1933年11月初]<sup>3</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T.H.:

在不违反保密誓言的前提下，我将尽可能把一切和盘托出。您没能入选我们学院<sup>4</sup>，因为审查委员会只推选了奥斯汀<sup>5</sup>一人。于是，那些没有机会  
64 看到您的论文或是相信审查委员会的人把票全投给了奥斯汀。但是有很多人是站在您这边的，包括您求之不得一见的大人物。整个评选过程为时漫长，严格保密，您的失利只是分毫之差而已。好长一段时间里，老老少少，不管是想选您还是不想选您的人都替您说了话。说您是个非常不错的人，说您与认识的人都能相处融洽，说您讲话富有见地且趣味盎然。还说每一

1 思想史家恩斯特·卡西尔(1873—1945)，德国难民，1933年9月受全灵学院的邀请，以及全灵学院和圣体学院的资助，与其妻托妮来到牛津，担任齐契利讲席讲师(主讲“法律原理”)，1935年离开；他的《启蒙运动的哲学》一书于1932年出版。

2 此处伯林犯了他很少犯的错误，将牛津的学院“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误写为“基督堂市”(Christchurch)。新西兰和多塞特郡才有基督堂市。该错误在其他地方还出现过。

3 托马斯·霍奇金的回信日期为1933年11月8日。

4 指申请全灵学院研究员一职。

5 约翰·兰索·\*奥斯汀(1911—1960)，1933—193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5—1952年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兼哲学导师。

个认识您的人都非常喜欢您。院长<sup>1</sup>在得知结果后甚至难过得流了泪。格兰特·罗伯逊<sup>2</sup>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伍德沃德<sup>3</sup>和佩尔斯<sup>4</sup>也对此结果暗暗表示不满。许多很可能会投票给您的人那天因种种原因缺席。总之，您在每个人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个人认为您应该再次申请进入这个学院，虽然您可能会怒不可遏地拒绝接受这一提议。因为兰格大主教和韦尔伯弗斯<sup>5</sup>当时也是反复申请后才进来的。我已把我能说的都告诉您母亲了，但我没敢对她说我心里的想法，那就是，我认为学院让您再来申请的做法对您太不公了。没人敢说您的论文不如从前，似乎是这些评审委员们的评判标准变了，我只能这么解释。而且我要告诉您，没有一个第二次申请的人成功通过（如菲利克斯、豪斯、普利斯顿、菲格斯、巴格等）<sup>6</sup>，但那些申请了三次的人都成功了（如前提及的）。真是这样，我想您完全没有必要难过或就此放弃（我希望您并未感到难过，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荣耀）。尤其是想到您可以像瑞里<sup>7</sup>一样，通过写现代史买通他们，进入学院。

至于我个人，我确实觉得在您的论文中，一些地方，特别是那篇文章，您没有尽力做好（您并未请我提意见，我却如此妄加评论，您也许会认为我太

- 
- 1 威廉·乔治·斯图尔特·亚当斯（1874—1966），1933—1945年任全灵学院院长。
  - 2 查尔斯·格兰特·罗伯逊爵士（1869—1948），历史学家，1893—1948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27—1938年任伯明翰大学校长。
  - 3 欧内斯特·卢埃林·伍德沃德（1890—1971），历史学家，1919—1944年为全灵学院研究员，1922—1939年任新学院讲师，1944—1947年任国际关系学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
  - 4 理查德·佩尔斯（1902—1958），历史学家，分别于1921—1945和1954—1958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29—1939年任新学院的讲师，1945—1954年任爱丁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1958年任《英国历史评论》的编辑；伯林在《个人印象》一书中回忆过他。
  - 5 科兹莫·戈登·兰格（1864—1945），分别于1889—1893和1897—1938年任研究员，1928—1942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仅在1886和1889年两次申请成为全灵学院研究员，而不是伯林接下来所说的三次，所以他是在第二次申请时就成功了。这是伯林所说的“没有一个第二次申请的人成功通过”的规律的特例。理查德·欧姆·韦尔伯弗斯（1907—2003），1964年成为韦尔伯弗斯男爵，大律师，1932—2003年为全灵学院研究员，但1930和1931年两次申请未获成功。
  - 6 菲利克斯·马卡姆（1929和1931年申请）、亚瑟·汉弗莱·豪斯（1930和1933年申请）、塞西尔·赫伯特·参孙·普利斯顿（1932和1933年申请）、弗兰克·爱德华·菲格斯（1931和1932年申请）、艾弗特·休·巴格（只在1932年申请了一次，伯林显然是笔误，把他也概括进了两次失败的名单里）。
  - 7 达西·帕特里克·瑞里（1909—1999），历史学家、外交家，1932—1939和1960—1999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好为人师。千万别这么想。否则我向您道歉。愿意怎么做就看您的了)。

- 65 我不知这样的安慰对您而言是否有任何作用。但不管怎样，您应该知道那些曾经失败过的人都进行了极其漫长而且顽强的斗争。如果您希望在牛津谋职(上帝，我说话的口气俨然自己就是肯尼思·贝尔<sup>1</sup>或什么大人物似的。原谅我，那太可怕了)，您至少可以从当地权威人士那里得到十到十五条左右的宝贵建议，就不要说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如果这学期中间您回来，请来找我。愿上帝无数次保佑您。这封信真是写得一团糟。

以赛亚·伯林

### 致托马斯·霍奇金

[1933年11月]<sup>2</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托马斯：

我希望能去，但实在去不了。您提到的莫尔小姐也许是最最天才的钢琴演奏家，可是，唉，我被诊断不出的莫名病症缠身，躺在床上已经四天了。现在这病才刚刚好转，根本无法经受旅途颠簸。真令人扫兴，我深感遗憾。而听您信中的口气，您不会来牛津了，这更让我觉得遗憾。您的信比我写得好——但愿我没给您留下逞英雄却无功而返的印象。我本应该付出努力的，却没能做到。上帝保佑，比起您的其他崇拜者，我的行为无知多了。说出这些话，想着因为这场大病造成的后果，怀揣不要等到太久之后才见到您的希望(对不起，“不久”的反义词是什么?)，我心情更郁闷(院长隔天就会打电话来，但除了说“您一定要继续吃橘子，亲爱的朋友，它们对您的身体的确很好”之外，就没有其他话了)。回家后没怎么看书，所以，校工在

1 肯尼思·诺曼·贝尔(1884—1951)，1903—1907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历史专业；1907—1914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14—1941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和历史导师；1946年被任命为神职人员。

2 此信是对托马斯11月8日和13日来信的回复。古典钢琴家维拉·莫尔于11月16日在伦敦举行音乐会，托马斯邀伯林一起吃饭，然后去听音乐会。

我生病期间从我的书当中清理出了一大捆信，让我很是惊讶。它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我想是弗劳·俄伯斯列特南<sup>1</sup>打的包，本想留着自己看，却发现这些信晦涩枯燥，或者是读完后为了减轻负罪感而送回我家。

您的

以赛亚·伯林

66

这段时间，以赛亚·伯林接受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占据了他接下来五年的主要时间，也使他的兴趣转向一个全新的、持续一生的学术领域：

1933年，新学院的院长H.A.L.费希尔叫我为家庭大学丛书<sup>2</sup>撰写其中的“卡尔·马克思”卷。起初是邀请拉斯基<sup>3</sup>，但他拒绝了。又请弗兰克·帕肯汉姆<sup>4</sup>，同样被拒绝。后来还请过科尔<sup>5</sup>，也被拒绝。我猜想他之后至少还请了四五个人。<sup>6</sup>他最后一筹莫展<sup>7</sup>，才来找我。嗯，我想，在学PPE专业时，自己读过一些马克思的书，当时他的《资本论》是必读书。但我怎么也无法读完，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很明显，马克思会[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要写这本书，我是永远读不完的，也就永远无法了解其中说了些什么——就像我没有读完弗洛伊德<sup>8</sup>的书，也就永远不了解其中内容一样，因为他的书太长太枯燥

- 
- 1 伯林8月在萨尔茨堡期间的女房东，理查德·艾德勒·冯·科萨茨基的妻子。
  - 2 家庭大学现代知识丛书当时由桑顿·巴特沃思公司出版，费希尔为主编之一。
  - 3 1932年2月的事。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1893—1950），自1926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
  - 4 弗朗西斯（“弗兰克”）·安吉尔·帕肯汉姆（1905—2001），1945年成为帕肯汉姆男爵，之后（1961年）封为朗福德伯爵七世；1924—1927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1932年任基督教堂学院政治讲师，1934—1946年任研究员；之后成为工党领袖，是刑法改革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 5（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1889—1959），社会主义者、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工党运动历史学家、记者。其妻为侦探小说家玛格丽特（下文第185页注3），费希尔资料中存留的信件中未见有邀请科儿的记录，但确实有邀请帕斯菲尔勋爵西德尼·韦伯的记载。
  - 6 没有证据表明事实如此。
  - 7 1933年11月6日费希尔在给一位合编者的信中说：“伯林是我们这里年轻学者中最优秀的，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写出一部好书。”
  - 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后转变为心理学家，创立了全新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弗洛伊德患口腔癌晚期，伯林曾到他在伦敦的

[……]所以我回答说：“好的，可以。”之后，我开始读共产主义先驱们的著作，开始读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百科全书编撰者<sup>1</sup>写的《百科全书》，它们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认为写得真是不错。普列汉诺夫<sup>2</sup>用吊人胃口的方式描写了这些人。我还看了爱尔维修<sup>3</sup>、霍尔巴赫<sup>4</sup>、狄德罗和卢梭等人的书，也看了很多德国作品[……]罗德伯图斯·冯·施泰因[……]斐迪南·拉萨尔<sup>5</sup>，让我对他们有了大致的了解。最后在伦敦，我到了伦敦图书馆，在那里纯属偶然地读到赫尔岑<sup>6</sup>的书[……]我先是看到一位长胡子的哲人像——19世纪，很厚的一摞——接着看到他的名字。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拿出一卷，从此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成了占据我生活中心的人物。[……]后来，我的讲课内容开始围绕这些法国百科全书的编撰者。牛津没人对这个感兴趣，不过我还是有听众。天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就这样，为了写一部关于马克思<sup>7</sup>的书，我进入了这个世界。

---

家探望。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91—92。

- 1 指当时的一群哲学家和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位编辑，德尼·狄德罗(1713—1784)和让·勒朗·达朗贝尔(1717—1783)，他们编撰了极具影响力的《百科全书》(1751年初版)，广泛介绍科学和人文知识，是启蒙运动的《圣经》式读物。这部巨著提倡理性、俗世以及怀疑精神，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 2 格奥尔吉·瓦伦丁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可参见伯林在其《观念的力量》中发表的一篇研究他的文章。伯林在录音采访中还对他补充评价，说：“普列汉诺夫是一位笔锋尖锐、思想清晰敏锐的作家，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他的著作最具可读性。”
- 3 克劳德·阿德里恩·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介绍了他。
- 4 保尔·亨利·西瑞·霍尔巴赫男爵(1723—1789)，出生于德国，生长在法国；《百科全书》编撰者，对宗教持强烈反对态度。
- 5 卡尔·约翰·罗德伯图斯(1805—1875)，经济理论家，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洛伦茨·冯·施泰因(1815—1890)，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在《卡尔·马克思》中有论述。
- 6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思想家、新闻记者兼作家。1852年起侨居伦敦，创办《钟声》(1857—1867)等革命报刊，对俄国的政治改革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作品为政治文章，后以《彼岸书，1847—1850》为名结集出版。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在伯林看来是世界文库中最伟大的巨著之一；伯林为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译本(1968)所作的序均重印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和《对人类的适当研究》两本文集中。
- 7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6。

月底，弗吉尼亚·伍尔夫<sup>1</sup>到新学院赴宴。以赛亚也在被邀的客人当中。在以下两封信中他讲述了两人的见面经过，并且在1989年撰写的纪念伍尔夫的文章<sup>2</sup>中又补充了一些细节（某些地方存在矛盾之处）。院长夫人莱迪丝·费希尔的资料中还保留着晚宴的座位安排表<sup>3</sup>：

### 院长

伍尔夫夫人	伯林先生
约翰·斯帕洛 <sup>4</sup>	“小宝贝”
玛丽	克罗斯曼先生
阿兰·科尔 <sup>5</sup>	刘易斯先生 <sup>6</sup>

莱迪丝·费希尔

68

伍尔夫本人则在12月3日致其侄子昆丁·贝尔<sup>7</sup>的信中写道：“参加的人中有了了不起的以赛亚·伯林，牛津的重要人物，外表看起来像葡萄牙犹太人；我想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一个玩吞火把戏的人”；但在1934年给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她却写道：“我搞不清（150名本科生当中）哪位是伯林先生，唯有从后来对他的种种描写中，他的形象才逐渐在我眼前完整丰满起来。”<sup>8</sup>

- 
- 1 (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婚前姓斯蒂芬，作家、短篇小说家、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不堪间歇性精神疾病的长年折磨，于1941年3月31日溺水自杀。
  - 2 《追忆弗吉尼亚·伍尔夫》，《个人印象》(第2版)。
  - 3 莱迪丝·\*费希尔(1875—1856)，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1899年嫁给H.A.L.费希尔。
  - 4 约翰·汉柏里·安格斯·\*斯帕洛(1906—1992)，律师、古典学家。1929—195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著有《维吉尔的射线和叠影》(牛津，1931)，后(1952—1977年)成为全灵学院的院长。
  - 5 阿兰·科尔(1904—1967)，1923—1927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1—1946年任牛津布雷斯诺学院研究员。
  - 6 克利夫·史戴普·刘易斯(1898—1963)，1925—1954年任牛津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及英语导师，著有《天路回程：为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义辩护的寓言》(伦敦，1933)。
  - 7 昆丁·克劳迪安·斯蒂芬·贝尔(1910—1996)，伍尔夫姐姐维尼莎与克莱夫·贝尔之子；艺术家、陶匠、作家、评论家；后(1972年)成为伍尔夫的传记作家。其夫人安娜·奥丽维娅·贝尔(参见“序言”，第16页)编辑了伍尔夫的日记，日记中并未提到这次晚宴。
  - 8 《弯月的暗影，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之四：1932—1935》，奈杰尔·尼克森编(伦敦，1979)，第255，360页。



致玛丽·费希尔

[1933年11月30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回家的途中，X<sup>1</sup>一路搞笑。他说：“院长谈起罗斯伯里<sup>2</sup>，兴致勃勃。弗吉尼亚不时口气温和地提出疑问。突然，桌子那头响起一声高喊——您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个叫克罗斯曼还是克罗斯帕奇或其他什么名字的——‘阿宾汉姆是一所亲切友好的学校，我喜欢阿宾汉姆学校’。”等等。<sup>\*</sup> 我确实认为弗吉尼亚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另外，我也能想象她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偶尔她也会生气。我真是开心死了。明天晚上在克拉克<sup>3</sup>家里要有一半好玩我就谢天谢地了。

您的

沙耶

于凌晨1点

69 \*很不真实吧？我是指X和他的声音，不是说阿宾汉姆学校。<sup>4</sup>

- 
- 1 玛丽·班纳特认为这是指约翰·斯帕洛。（以赛亚·伯林通常喜欢用“X”指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虽然他后来也一同被介绍给了伍尔夫，如下封信所述，但那天晚宴并不在场。）
  - 2 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斯·罗斯伯里伯爵五世（1847—1929），1894—1895年任英国首相。
  - 3 这里可能是指乔治·诺曼·克拉克（1890—1979）。1931—1943年任全灵学院经济学史齐契利讲席教授和研究员，1943—1947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席教授，1947—1957年任奥里尔学院院长。其妻为芭芭拉。
  - 4 在接下来这封致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伯林说的是费希尔夫人滔滔不绝，大谈特谈阿宾汉姆学校。这么做可能是在暗示斯帕洛把那些关于阿宾汉姆学校的话错安在了克罗斯曼的头上（此人也被称为“X”，有点令人困惑但也很自然）。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3年11月30日，凌晨1点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这是拖延回信的最不值一提的借口，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因此原谅我。事情是这样的：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咨询和反复安排，伍尔夫夫人最后同意拜访新学院院长——她的嫡表兄弟，并逗留一晚。主人本来希望她能在此度完周末，但她对此建议感到惶恐不安，只肯待一晚。约翰·斯帕洛专门从伦敦城里赶来，由我从中介绍引见。7：45，晚宴开始。我问前晚见到的费希尔太太，伍尔夫夫人是否如传闻所说，非常害羞，尤其是在见到生面孔的时候，费希尔太太回答说：“的确如此，这种场合伍尔夫夫人得强打精神，勉力应付，一直是这样。上一次我见到伍尔夫时，她只有十七岁，当时我认为她非常古板，性格乖僻，希望她自那时起有所改善。不管怎么说，今晚生面孔不多，只有二三十张而已。”

晚餐时我坐在她对面，不发一言，惊讶而又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她超凡脱俗的美丽。院长轻声细语，谈了不少关于罗斯伯里的话题，伍尔夫夫人文雅巧妙地鼓励他继续说，约翰·斯帕洛时不时插话，嘟哝个只言片语，但既不是要争论，也不是想打岔。然后我们成群走出餐厅，费希尔太太尖叫着说她爱死了阿宾汉姆学校，这所学校对学生无比真诚热情。几名男女本科生等候在餐厅外面，都是经过挑选的，其中一两位是有贵族头衔的富家子女，还有一两位真正出身卑微的学生，后者因为是穷学生并通过自学饱读诗书而拥有了更大优势。（“光是有关莎士比亚的书他就读了七百本，其中有的书非常好，弗吉尼亚，您一定得和他聊聊，”院长说，“他非常贫穷。”）这些新学院男女生（其中有考克斯）睁大眼睛，带着仰慕的神情，围坐在伍尔夫周围，听她气定神闲地谈论梅瑞狄斯。<sup>1</sup>（她言谈举止非常高贵。）但是我们没法在一旁听，因为躁动不安、无所事事的费希尔太太让大家玩随着音乐抢椅子的游戏，大家彼此间的交谈不超过两分钟。我没和他们一起

1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小说家、诗人，伍尔夫认为他对自己早年创作的作品有影响。

玩，由于对此感到厌倦，而且和伍尔夫的谈话又不断被人打断，我感到绝望，郁郁不乐地退到角落，和一个叫路易斯的人谈起了上帝、莎士比亚以及生活喜剧。（不夸张地说，此人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坚信上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戏剧家，这一点很令人兴奋，真的。）玛丽·费希尔、“小宝贝”，还有其他人逛到我们旁边，又被如此令人敬而远之的话题和我们兴高采烈的声音给吓跑了（我让对方的声音提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费希尔太太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娜·帕夫洛夫娜·什热尔，不断改变着她那个不安分的小群体，结果却使组合变得越发不和谐了。只有弗吉尼亚他们那个角落笼罩着圣洁的气氛，但我却找不到什么机会可以加入他们。就这样聊到了10:30，费希尔太太开始坐立不安，我对自己度过的这个意兴阑珊的夜晚感到生气，不过也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很欣赏弗吉尼亚的外表和她的仪态（虽然这听起来粗俗，但我的确觉得她赏心悦目，的确）；11点，我们终于站起身，主人传递饮料，我想那应该是水。伍尔夫夫人和斯帕洛交谈着：“……鲍恩夫人”（原文如此），她说道，“小宝贝”和我不由自主地转向她，“我们也认识她”，我们俩都想这么说，好把握住这个交谈的机会。借助上帝的力量，这里应该记上一笔，因为我做出了令我汗颜的举动。当时我走上前。“鲍恩夫人在美国。”“小宝贝”说。我则说：“我收到了她的明信片。”我说话的时候脸红得厉害，您想象它有多红就有多红。伍尔夫夫人问：“她说了什么？”我嘟哝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很快又把话吞了回去，转而问了“您认为哪一位诗人将得到国王新颁发的勋章？”等等类似的问题。我无法告诉您，明天我会怎样认为自己说出那样的谎言有多么善意，但今晚我肯定不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就像那些荒唐可笑的爱写自传的俄罗斯人一样，我所编造的谎言在头脑中翻来覆去。我真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毫无道德原则的人，做了胆大妄为之举，却为此得到了片刻的极大欢愉。我这是尽可能用契诃夫的方式来记叙整个事件（我确实认为这个主题值得一写，而这个作家由契诃夫来当最合适）。这么做是要让您心软，不仅原谅我（虽然我不值得原谅，但我希望，看在我如此谦卑的分上，您能宽恕我所做的事），而且不觉得此事过于可笑，不要像我那样，倘若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定会冷

酷无情地加以耻笑。相反，您倒要为此感动不已。我说了谎话之后，这个故事就戛然而止了，我们就希腊诸神在奥林匹斯山的话题谈了大约三分钟，我告诉自己必须听从意志安排，院长已经打起哈欠，这提醒我得在大家都筋疲力尽之前告辞，于是我僵硬地鞠躬告别。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像俄罗斯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将所经历的一切细微的情绪变化无限地戏剧化，其中，哪怕是一桩小小的罪过，都会一直逼迫他，纠缠在他的心头，最后变身为复仇之神。<sup>1</sup>伍尔夫夫人真是一位最美丽的女神般的人物，很遗憾人们只能在小圈子里认识她。我希望能够再见到她。

我既没有见到汉弗莱<sup>2</sup>，也没有给他写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也没有给他发过电报或是别的什么，因为我卧病在床两个星期，得了一种连医生都诊断不出来的病：我的邻居莱昂内尔·柯蒂斯<sup>3</sup>认为我是被一种可导致 71 不育的杆菌感染，这种细菌侵入牲畜的体内时可导致不育，无其他危害（请原谅，我写信就像说话一样没个完，这总是令人厌烦，但是我不能因此停笔），我的症状在温特顿夫人<sup>4</sup>那里就开始有了。我希望他没事（我指的是汉弗莱，不是指这种细菌），就像我现在一样健康，而且打算用两年时间写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sup>5</sup>：罗伊现在同意了这个计划，只要我和他一起担任经济学课程的导师，并且（在书中）吸收他的观点。能够在书中借用他的观点，并写上“对此我负全责”，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自豪。说到这里，我想起曾对伍尔夫夫人说您三周内就会回来，对此我当然要负全责——我希望对这样一个我盼望已久、结果却有点死气沉沉的夜晚的描述能够让您觉得有趣，但是也许我絮叨得太多了：我话题的中心，我的重点，就是我所编造

1 伯林此处原文为：alastor。

2 汉弗莱·豪斯当时住在埃克塞特（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德文郡首府）。

3 莱昂内尔·乔治·柯蒂斯（1872—1995），公务员、历史学家。1921—1955年为牛津全灵学院研究员，当时正在写《上帝之城》，该书在1934—1937年分三卷出版，书中他讨论了世界民主统一；（他是）“一个大英帝国的狂热信徒，作为一个在幕后很有影响的决策者，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他并不富有，也无意权势，但是他可以操纵人：如果你想要两位大主教给你的信件签字，只需一天工夫，他独自一人就能办到”（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8）。

4 （塞西莉亚·）莫尼卡·温特顿（1902—1974），爱德华·特诺·温特顿伯爵六世之妻。

5 他五年后完成该书。

的关于您的谎言，毕竟，这是由于您承诺要给我写信，结果却食言所致，或者，也许是由于信件在路上走得太慢，唯有如此，通过把我的负罪感转化成对您的不忿，我才能解脱。

我在读哲学家马勒伯朗士<sup>1</sup>，他说一个比我们现在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也许存在，但是它要复杂得多，上帝是个好心人，希望给我们一个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世界，所以就建造了这样一个介于简单和美好之间的折中的世界，因为他认为简单和美好二者不可调和（多么奇怪而有趣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我们如今这个悲惨的、权宜的世界。的确，如果我们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上最好的，那么其他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贴切。）康德不是说过吗？“以扭曲的人性之材，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sup>2</sup>这句话似乎无甚关联，但是令人印象深刻，您同意吗？我真诚地希望您回来[时]能告诉我您的看法，来信就寄到我上面这个地址，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会在哪里，也许是在伦敦吧。为了填补信纸的空白，我抄写了18世纪的法文版法国戏剧，这会有助于您记住这些法文词，这段戏在普希金<sup>3</sup>的作品中也出现过。

您的

沙耶·B.

- 
- 1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试图调和科学和基督教神学。
  - 2 这是柏林现存的对这句话最早的引用（他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科林伍德的讲座上），这句话由于他后来常常引用，如今已经为人熟知。由我整理出版的他的一本文集就用这句名言作为题目，《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这句话和科林伍德的渊源，见该书前言倒数第二段。这句名言引自康德《世界公民观念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参见《康德全集》（柏林，1900—）卷8，第23页，第22行。（也可参见《圣经·旧约·传道书》7章13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
  - 3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俄罗斯民族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小说中的关键事件是一场由于决斗所导致的死亡，这也成为普希金自己的命运（下文第680页注1）。这里提到的“这段戏”是在普希金的《三十卷全集》中，由M.A.恰亚夫洛夫斯基编辑（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卷5，第454页。柏林在《牛津展览II》（1931）中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引用了这出“悲剧”的另一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正确的“amant”（情人）一词，取代了错误的“aimant”（喜欢着），但是柏林没有用正确的“hache”（斧头）来替换不正确的“hâche”一词，普希金的错误各有不同。

悲剧

独幕

独场

人物：厄诺王子，公主的情人；卡埃拉公主；修道院长佩索，王子的情敌；埃克斯，伊格瑞特，塞得，书童。

厄诺王子：“院长！靠边站吧！”

修道院长：“呃？呼呼呼……”（因为愤怒而喘不过气来）

厄诺王子：“我有斧头！”

公主：“伊卡埃拉爱厄诺。”

厄诺王子（转向修道院长，后者剧烈颤抖）：“佩索没走？（厌恶地）嗨！埃克斯、伊格瑞特、塞得，抓住院长先生，把他扔到窗外去！”

剧终

凌晨2点

致黛安娜·哈贝克

[1933年11月]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黛安娜：

我将要跟您说的事令我极其羞惭：上帝保佑，希望您不会像我一样感到这件事很严重：因为我不得不向您承认，我和贼差不多。我从心头卸下这份负罪感，现在我可以恢复平静，重新开始了（最近我一直在读奥斯汀小姐的书，所以就拙劣地模仿了她的风格）。您会记得，我亲爱的黛安娜，您会

73 记得，上星期六您亲切地举办了让大家兴高采烈的生日派对<sup>1</sup>，派对中我突然发现自己与一个仅有一面之交的男人不期而遇，而且那次见面是在五年前。他非常热情友善地向我打招呼，问长问短，我有点紧张，心不在焉地拿起了桌子上一只外形精巧、银质框架的小火柴盒把玩。我把弄着这个小玩意儿，不时从里面拿出火柴，自己用也给别人用。过了大约四十分钟，也许更久，和斯蒂芬·斯彭德聊天时，我伸手到自己衣袋里摸火柴，于是就拿出了前面说到的这只银质火柴盒。我佯作厌恶地惊呼，告诉斯蒂芬我有这种古怪的盗窃癖。结果引来斯蒂芬一阵大笑，无拘无束就像自然之子，有洞察力的德国人常常称这样的人是“阳光儿童”<sup>2</sup>。他从我手中抢过火柴盒，发疯似的咯咯直笑，把它放进自己里层衣服的胸前口袋。我以为（多鲁莽啊！）他很快就会玩厌，把它还给我，但是我想错了。整晚余下的时间我都和他在一起：心中一直很有负罪感，后来他还是拿出那只要命的小盒子，还给了我。我温和地向他抗议，并且决定第二天送还火柴盒，同时附上一封得体的道歉信。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们都去了皇家咖啡馆，同伴越来越多，火柴盒又被我拿出来用了，因为它所装的火柴实在是很多（您说它的大小是不是2.5英寸×1.5英寸？）。后来我们就回家了，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到了星期一早晨，我一觉醒来，心中怀着对某件事的强烈负罪感，猛地想起了那只盒子，赶忙焦急地四处搜寻。但翻遍所有的衣袋，它不见了。昨天我给斯蒂芬打了电话，给皇家咖啡店也打了电话：他们都不知道火柴盒的下落。昨晚，这只火柴盒在我的噩梦中非常恐怖地出现，我快要精神崩溃了。我对家人吼叫，对女佣很无礼，我像白痴一样，一见到闪着银光的东西就扑过去，像极了埃德加·爱伦·坡<sup>3</sup>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现在我该怎么办？我真希望你们没有留意它的遗失（它太小了），而且希望你们还没有怀疑到我。我本该早一点告诉您的，非常抱歉，我想我最好去另买一只尽可能相似

1 黛安娜·哈贝克生于1912年11月26日，这场她二十一岁的生日派对有可能是在1933年11月25日举行的。

2 柏林此处原文为：Sonnenkind。

3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短篇小说家，经常在作品中描述有负罪感的神经质人物的狂乱行为。

的火柴盒，再寄给您的祖母，并附上一封道歉信：我心中充满愧疚，怎么赔礼都愿意。

同时，星期五1:30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比如说）商业街吃午餐？然后帮我挑一只相似的火柴盒？就是说，如果我还可以和自重的人继续往来。请答应我。

您的陷入深深痛苦之中的

沙耶·B.

74

“小宝贝”说自己总是私底下提建议，她建议我恳请您什么也别和您的祖母说，如果她还没有产生怀疑：我买的那只作为替代的盒子，希望没人注意到它是掉包的。

黛安娜·霍普金森（后来改名）在她的自传《香树》（伦敦，1968）的第121页引用了这封信，但是她应柏林的要求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因为柏林对自己写信的语气感到难为情。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凌晨1点 [1933?]

全灵学院

亲爱的S.:

我想我做了错事，而且令人厌烦，我常常会突然感到抑郁和孤独无助，这不能成为我做错事的理由，不过至少可以权当解释。我猜想，可能是我患过疟疾，身体比较虚弱，面对一桌精美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午餐，不论你还是我都不能好好享用，不管怎样，这使本来就不太好的心境变得更糟糕了。整件事情仅仅是我生命中所做的又一桩蠢事，而我却想要因此责怪你，现在我觉得自己大错特错了，而且不可原谅：我极其抱歉，你表现得非常得



体,我完全忠实于你。

你的

沙

一

如果你把这封信给戈伦韦看,我会很不好意思。他只会说,我这么做是由于爱上了你或是出于别的什么愚蠢的理由,我有时候希望自己的确爱上了你:如果我没有爱上你,原因不在你身上(你可以说“如果我爱上了你,原因也不在你身上”<sup>1</sup>)。

二

75 你有没有发现一本《贸易与工业》,一个名叫马歇尔<sup>2</sup>的人写的书?

三

星期一。<sup>3</sup>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3年?]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S.:

我坐下来给我的亲友们写信时,原没有打算给你写:然而想给你写信的冲动愈来愈强烈,变得难以阻挡。这是一个无礼的恭维:你肯定会把它理解成一种伤害,可是这不会改变这封信的本质。无论何时,当你要误读我的意思时,你要对自己说,就像你对戈伦韦说:“不,不,不!”

1 这是以赛亚·伯林和谢拉·格兰特·达夫的通信中常说的一句话,后者认为这句话来自她七岁起照看她的保姆,她总是因这句话前后矛盾而觉得有趣。

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贸易与工业》(伦敦,1919,第3版,1920)。

3 伯林忘了把这封信写完吗?

我现在必须谈谈我很少触及的话题，那就是我自己。

我花了许多时间读书，记笔记，就像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那样，那是我快乐无比的一段日子。因此即便到现在，读书记笔记的时光还是宁静而舒心的。这一回吸引我的人卡尔·马克思、海因德曼（他和托尼有点亲戚关系）<sup>1</sup>，还有你们家的J.鲁伯克爵士<sup>2</sup>，最后这位一定不会让你吃惊。很奇怪，也很有趣，所有这些在自然科学方面著书立说的人，文笔居然都这么好。赫胥黎<sup>3</sup>的文字很优美，达尔文（你知道他还要给他写的每个故事都加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吗？他说，既然这个主人公是个美丽女子，那么何不不让结局更美好一点呢？）、华莱士<sup>4</sup>、丁达尔<sup>5</sup>都很出色。大众科普这个题材是讨厌的最低级写作门类，但是他们都写得很好：J.鲁伯克爵士不像他的朋友们那么有趣，但是却更加可亲：所以我更喜欢他。他驳斥了勃洛克<sup>6</sup>关于整个19世纪处于神经过敏和恐慌状态的描述，尽管这显然符合俄罗斯和德国的情况。我从来不知道卡尔·马克思是一位爱国者：普法战争中，他拒绝在一份和平宣言上签名，除非宣言上写明德国打的是一场自卫战争。J.鲁伯克爵士的乐观主义如今会令人无法接受：但是他一直都是个敏锐的人：想想吧，想想他对伯格森<sup>7</sup>的评论，那是多么富有才华，他一定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伯格森的书的：伯格森写的东西论及理智的怪异本质和信赖直觉的必要性，对此你的祖父评论说，这让他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在黑暗的森林中

76

1 亨利·梅尔斯·海因德曼（1842—1921），社会学的领袖人物和作家，1881年（后来的社会）民主联邦党的主要创立者。托马斯·亚瑟·洛维特（“托尼”）·海因德曼（1911—1980）在20世纪30年代是斯蒂芬·斯彭德的男友，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了战斗。

2 谢拉·格兰特·达夫的祖父，约翰·鲁伯克爵士，埃夫布里男爵一世（1834—1913），科学家、自由党下院议员。

3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生物学家，达尔文和不可知论的拥护者、教育家。

4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23—1913），自然主义者，和达尔文共同提出自然选择进化论。

5 约翰·丁达尔（1820—1893），科学家、科普作家，鲁伯克的好友，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

6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勃洛克（1880—1921），备受尊崇的革命时期象征主义诗人，其叙事诗《十二个》（1918）最为著名，该诗生动描述了十月革命的动乱时期。勃洛克被十月革命激发了灵感，梦想着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道德政治秩序，但是他的梦想在1917年之后很快就破灭了，他陷入深度抑郁，作品很少，死于贫困。这里，伯林提到的是勃洛克的史诗《因果报应》（写于1910—1921年）。

7 亨利·伯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

凭借着手中一盏灯发出的微弱灯光摸索道路，“熄灭你的灯”，恶尔精说，“相信你的直觉，你会更容易找到道路”，此话说完，接下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每个人都跪下了，对恶尔精顶礼膜拜。

我承认每次想起他，我就想起巴纳特牧师<sup>2</sup>，我为什么要对你写这么多呢？你一定会认为我很傻。

你必须哲学地思考。假如，你说一张椅子变了，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意思肯定就是说，这张椅子的一些特征消失了，被新的特征取而代之，一些原本就有的特征还在。那么，是什么改变了？改变的不是这些特征，它们只能消失或者产生：它们的消失或者产生让你认为椅子变了：比如，这张椅子1929年的红色消失了，现在它是1933年的红色，但是椅子已消失的特征不是改变，而是消失了。现在椅子所具有的特征也没有改变，它只是依然存在着。但是，也不能说特征的拥有者发生了改变（即便有什么改变，贝克莱也加以否认，你记得的）。因为，如果如今的这张椅子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和1929年那张椅子是同一张，“它”一定没有变，尽管它可能失去了某些特质，又得到了另一些特质。如果它没有保持不变，那么什么也不会保持不变，如果什么都没有保持不变，“改变”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之所以说一些东西改变了，那只是针对另一些相对而言没有发生改变的东西。所以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是，改变是确乎存在的吧？布莱德利<sup>3</sup>曾经大胆地否认改变的存在，着实大胆，因为他的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我希望这么说能使你有所领悟。现在我想知道罗素小姐<sup>4</sup>是从哪里听说，你和我两个人给伊恩[·鲍恩]写了表示同情的信？我想不出答案。那真是很令人尴尬的时刻。我大声吼叫，但什么也没有说。我不小心将道格拉斯的克里斯多夫<sup>5</sup>踢了一脚，现在它

1 在德国神话故事中，恶尔精是个邪恶的小妖怪，它在森林里游荡，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人诱向灭亡。

2 塞缪尔·奥古斯特·巴纳特（1844—1913），神学、社会学改革家，英国汤恩比馆（世界上第一个社区公社——今天遍布全球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前身）的首任馆长。

3 弗朗西斯·赫伯特·布莱德利（1846—1924），英国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4 贝蒂·帕尔·罗素（1912—2000），1931—1934年就读于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现代语言专业，1941年与威廉·H·怀特布瑞德结婚。

5 可能指的是道格拉斯·杰伊养的猫（他讨厌狗，但喜欢猫）。佩格（通常称佩吉）是杰伊的妻子玛格丽特。

伤愈了，道格拉斯私底下跟佩格说，如果他的小猫好不了，他就不再和我说话。真是万幸。但是想到他是否与我说话维系于如此纤细的一线，我觉得颇为尴尬。 77

斯蒂芬关于符号和诗歌的观点颇为有趣。他认为诗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诗人以散文方式思维，通过诗歌来转化和强化他的散文思维；另一类利用诗歌来传递情感，就像可以用散文或者药物，即一种并列独立的手段，来传递情感那样。这两种诗人永远都不会相互转换，除非出于偶然。我要把斯蒂芬的这个发现告诉我那些理想主义的学生。你知道詹姆斯<sup>1</sup>把哲学家和普通人划分为讲求实际的和理想主义的两种吗？斯宾诺莎、康德、[T.H.]格林是理想主义的，休谟、密尔和詹姆斯是讲求实际的。你呢？我想，对我而言，确切的说法是，就像海岸，一部分是细沙，一部分是砂石，一部分是美丽的贝壳，捡到贝壳的人是你，而我只能碰巧捡到那些鹅卵石，而且还不是最光滑的。但是我已经感到难以名状的快乐了。

沙耶

致伊丽莎白·鲍恩

1月2日 [1934年]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伊丽莎白：

十分感激你的来信<sup>2</sup>：它正好在我有些郁闷的时候到来，让我郁闷的原因是我收到两三封老朋友寄来的信，他们在信中以尽可能友善的方式坦白地指责我，指责我完全不理解他们以及他们与其他的老朋友之间过去、现在和将来可能存在的关系。这种指责常常发生，每次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先是感到愤怒，而后做出一些任性之举，随后就感到悲伤，然后是矫揉造作

1 威廉·詹姆斯(1842—1910)，哲学家，他的《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简单地)划分了空想式的理性主义者和讲求实际的经验主义者。

2 在其1933年12月18日给伯林11月30日信的回复中，鲍恩写道：“它使我——我是指你的来信——不像我原先料想的那样茫然思家了”[想纽约，她最近才从纽约回到英国]。

同时又不无自负地决定承认：我自身的不近人情是不可忽视但也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将自己归类于我特别借鉴了笛卡尔的动物即自动机器的论点所抽象出来的概念，并将此假说延伸到我的几位通信者身上。我可以冷静地指出，我身上被他们如此粗俗地指责的所谓缺点，正是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一项美德。不幸的是，我总是没等自己表明态度，就先将了自己一军。我发现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兴趣，和对数学预设条件的兴趣差不多一样索然。这既令人羞愧，同时也令人高兴。你的信到了，这起了决定作用，它真的很令我愉快，我不再介意人们说什么了，尽管我这样刀枪不入、麻木不仁，有时似乎蛮吸引人，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却粗鄙、渺小和粗俗。

不不，你说的关于美国的事一点也不乏味，那两位林德小姐也许这么说过，但是这一次你所说的真的很吸引人。我现在第一次真的很想去那个国家了：尽管我总是太害怕，不敢真正成行，除非被谁拖去或者拽去。人们在牛津遇见的美国人大多滑稽可笑，我记得最清楚的两个，一个发疯地在女子学院寻找情妇，他说（是对A.H.史密斯说！）<sup>1</sup>，以前他一直都是找同校女生，但是在这个该死的地方，他不得不挑一个堕落的女子。（后面这几个字是对史密斯特有言辞方式的绝妙让步。）另一个美国人是个有趣的疯子，名叫克拉克霍恩，他怂恿两个牛津校队球员去了美国，结果一个差一点自杀，另一个立即去了英国人的聚居地。他（那个美国人）英俊有趣，和弗洛伊德以及阿德勒<sup>2</sup>定期通信。我所知道的第三个美国人是疯子，在巴利奥学院，他写了一本愚蠢的书《病态社会》<sup>3</sup>，在寒冷的季节，他在牛津跑来跑去，只要见到两个说话的人，他就把两人挤在一块儿，往他们口袋里塞绿苹果。第四个美国人是我的学生，他每个学期都以相同顺序交给我四篇相

- 
- 1 阿利克·哈尔福德·史密斯（1883—1958），1914—1944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及哲学导师，1940—1944年任执行院长，1944—1958年任院长。
  - 2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心理学家，早期和弗洛伊德有联系，后来两人对人类行为解释的分歧日渐加深。
  - 3 亚瑟·詹姆斯·以色列·克劳斯（生于1896年），1928—1930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写有《病态社会》（芝加哥，1929）。

同的文章，每次交作业都像第一次一样充满新鲜感，还咧开嘴冲我笑。每次辅导课结束，他就向我表示感谢，告诉我他能够聆听我的教诲，是多么荣幸。我正在四处游荡。但我还是非常想去美国，只是很担心会在那里见到和我极其相似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发现自己和荷兰居民脾性极其相近的时候，我是多么恐惧。

你对伍尔夫夫人非常好，我一直都很敬仰她，但我非常非常害怕见到她。<sup>1</sup>她在感到紧张和难堪的时候，态度很是简慢生硬，就像一只受惊吓的猎犬会紧张地吠叫。由于见到她我多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我的感受也许会传染给她，那将是悲剧性的。我害怕遭遇这种结果，所以差不多宁愿不见她了。不不，这个想法很愚蠢，很幼稚。在这里我忍不住要插一句，“小宝贝”和她一起吃过饭，结果头脑空空，只是一味地被伦纳德·W.<sup>2</sup>揪住谈哲学，不怀好意地搞得她居然说出哲学虽然晦涩难懂，却神圣无比的蠢话。西尔维亚·林[德]<sup>3</sup>被“小宝贝”强烈的激情给吓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身为人母，她甚至比费希尔太太更蠢些。

亲爱的伊丽莎白，我非常想尽快见到你。我在伦敦会待到11号，然后回牛津，你会在伦敦吗？我住在西北3区，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我的门牌号是“汉姆 0912”。别的就交给你了。至于汉弗莱：我手上有一张简短的、疲倦的、语气宽容的字条，说他有太多累，对结婚日期<sup>4</sup>稀里糊涂。这张字条之后，我又收到他一封表示歉意的长信，曲意迎合，典型的汉弗莱口吻。信中宣称他很幸福，充满了对玛德琳(?)的爱。典型的汉弗莱文体：“最后我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做我的工作了，过上平静的生活，逗号，硕果累累的生活。”庄严的男低音，节奏感，全都有了。明天我得把我的哑仆人<sup>5</sup>送过去。

我今年冬天看书不多，除了一些专业哲学家的书（噢，你不能想象，美

1 指在一次由伊丽莎白·鲍恩主办的私人晚宴上。

2 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弗吉尼亚的丈夫，出版商、作家、编辑。

3 西尔维亚·林德(1888—1952)，婚前姓德莱赫斯特，诗人、小说家，爱尔兰记者罗伯特·林德(1879—1949)的妻子，西勒和莫伊拉的母亲。

4 豪斯和玛德琳(原文如此)·伊迪斯·丘奇(1903—1978)于1933年12月结婚(此事令伊丽莎白很不高兴)。

5 可能是给豪斯夫妇的结婚礼物。

国一个名叫雅各布·康托<sup>1</sup>的人发明的超限数字符号 $\aleph-1$ ，或者甚至是一个 $\aleph$ 形的符号<sup>2</sup>，能够让人多么兴奋)，我强迫自己抛开俄国人的书（在订购了一本附有65张屠格涅夫照片的书之后），集中精力只读简·奥斯汀和亨利·詹姆斯的书。奥斯汀小姐全部注意力都在婚姻，全部（这是不是自明之理？），无论是分析感情，描述情景，一切都服从于婚姻这个唯一的目的：很可怕，太可以拿来进行精神分析了。很奇怪莫里斯·B.读不了她的书（“是的，是的，奥斯汀，我受不了她，别说她，她根本就不算个话题……”）。至于《大使》，这本小说是斯蒂芬胁迫我看的，这是一本极其忧郁、过度自怜、充满悲剧色彩、令人恐惧的书。我认为每个人都会由詹姆斯想到普鲁斯特；<sup>3</sup>但是普鲁斯特的经验更广阔、更深刻，当他的语言像绳股一般被拆平分平放在桌上的时候，他的分析不仅仅是展开再展开，而且产生了犹如蛛网一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相交。也许是因为詹姆斯的书我读得不多，

80 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具有缓慢地、文雅地、无情地抽取每个场景的精华的天赋，但是却不能从他的直接体验中找到足够真实的素材来满足他的写作技艺。他常常写些附录式的文字，我对此不满，这些文字虚假而了无生气，而普鲁斯特，甚至是托尔斯泰，他们说得越多，向读者揭示的也越多，他们隐匿不说的越多，读者就越发能感受到精准细微的差异，读者就越能[读出小说中?]丰富的、似乎互相渗透的、流动的体验。而在詹姆斯的小说中，一切都太粗糙，分析也太随意，就像验尸，即使你等待，你的研究材料也不会流失或变化，而且还有望彻底地进行分析和分辨，毫发不剩。一场心理胜利：一旦真正的体验终结，想象力本身就有意识地通过类比添加了更多东西：不过人们会立刻感到裂缝的存在，“真实”和艺术家的成就之间的差距，虚假的“真”的延续，这“会欺骗所有人，除了最老练的眼睛”。所以自我意识是上层结构，然而它不能欺骗任何人，它越完美，越能实现它的目的，越接近自身的最初形态，就越没有生气，越令人忧郁。

1 实际上是乔治·费迪南德·路德维希·菲利普·康托（1845—1918），创立集合论。

2 伯林这么说，表明他不知道这个符号是希伯来字母“aleph”， $\aleph$ 。

3（瓦伦丁—路易—乔治—欧仁—）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

我真的不能一直写下去了。请原谅我。下一次我要看看在一张明信片上我能写多少东西。

你的  
沙耶

致玛丽·伯林

无日期 [1934年1月中旬?]

新学院

我亲爱的妈妈：

我按顺序回答你的问题：

- 1) 我在吃药。
- 2) 我觉得好多了。胃的毛病不那么严重了。我一直都注意饮食。
- 3) 就我所知，我没有拿那些新手帕。我会再找找，但是我想我没有拿。
- 4) 我洗了两次澡！
- 5) 指甲等，还好，不是非常干净，我尽力而为。
- 6) 请继续提醒我注意形象。但是我不敢保证都能按照你所说的去做。
- 7) 如果有可能，请在星期二送斯达德们过来，但是如果你只在星期三送他们过来，也不要紧。

8) 我不确定星期五晚上是否要陪弗里德曼<sup>1</sup>吃饭，因为我可能得和卡梅伦夫人一起吃晚饭，如果她也请了伍尔夫。所以我建议，你最好在邀请名单上加上弗里德曼的名字，在星期五之后，这样等我们定下来就可以立即邀请他。

9) 衣服已经送到，但我还没有穿。牛津现在一派雪中梦境的景象，就像19世纪俄罗斯的油画。<sup>2</sup>

---

1 可能指乔治·弗里德曼(1902—197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2 这封信没有写完，而且/或者没有签名。



致玛丽·伯林

星期二晚10点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你走后十五分钟（你走得太早了！），我还没服用帮助通便的马里昂巴德盐，消化系统的毛病就突然好转了<sup>1</sup>，不管怎样，我还是会找一点来服用，但这说明在这一点上我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我没法跟你说，你走以后我有多么难过，你在这里又是多么好，没有你在身边我有多么忧伤，我是多么地期待在星期五见到你。这几乎是封情书了，尽管它的开头缺乏诗意，可是它既不是“几乎”，也不是“像”，它就是一封情书。

沙耶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4年3月14日之前不久]

全灵学院

亲爱的谢拉：

在走之前，你一个字也没有给我，一句话也没有给我，至少我以为你已经离开牛津。这是为什么？即便是恩索尔先生<sup>2</sup>，虽然我和他的交情最浅，在他离开之前还会给我留下一张友好的便条。你真不该对我如此薄情，不论你可能[有]多忙，但你应该不会比我更忙吧。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желудок。该词字面意思是“胃”，但在这里显然是消化系统问题好转的委婉语。

2 罗伯特·查尔斯·柯克伍德·恩索尔（1877—1958），记者、历史学家，在亚当斯辞去全灵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于1933年秋季学期和1934年第二学期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政治理论与制度研究方向的代理格莱斯顿讲席教授（全灵学院附设的一个教职）；1934年第三学期该教职由阿瑟·索尔特爵士接任。

你能帮我个忙吗？告诉我戈伦韦的电话。我星期三进城，计划去看BBC交响乐团的歌剧《沃采克》<sup>1</sup>，想知道他想不想去。卡[梅伦]太太告诉我，她见过他，还有另外一个我从来都没有碰过面的人，叫西瑞尔·康诺利<sup>2</sup>，听说他是世上最恶毒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戈伦韦，说话要格外谨慎，尤其是提到帕尔斯或莫里斯的时候。争吵的确是令人难受的事，希望此信平安到达。知足常乐。

你的  
沙耶

1.《泰晤士报》真恶心：它这个层次的其他报纸不会像它这样，一方面拒绝刊登克里普斯<sup>3</sup>这样身份的人的信，另一方面却刊登了罗斯的信，就因为罗斯是全灵学院的研究员。它刊登的那条奥地利新闻<sup>4</sup>，是疯狂而且讨厌的家伙阿瑟·巴克——厄内斯特<sup>5</sup>的儿子写的，比《早报》上的报道更虚情假意、更反动。相形之下，《早报》反而保持了一定的高贵姿态，没有公开表现出狂喜。

2.我已经八年没有读《前夜》<sup>6</sup>了。昨晚我在床上读了它的开头。关于给予和接受的内容似乎要表明，幼稚而絮叨[?]的理想主义费力而贴切地

---

1 《沃采克》，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的歌剧，1934年3月14日在女王音乐厅由BBC交响乐团演奏，阿德里安·博尔特指挥。

2 西瑞尔·弗农·康诺利（1903—1974），记者、作家。

3 （理查德·）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1889—1952），1931—1950年任东布里斯托工党下院议员，1940—1942年任英国驻苏联大使，1947—1950年任英国财政大臣。“政策和政党”是罗斯写的一封信，论及克里普斯关于宪法改革的提案，登载在《泰晤士报》1934年1月26日第8版。那段时间该报的确并没有登载克里普斯的信件。

4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1892—1934），为了让奥地利免受纳粹和共产主义的统治，1933年在奥地利建立一党原则；社会主义者对这项措施的反动，导致了1934年2月一场短暂而激烈的内战，政府武装轰炸了维也纳的一个住房建筑项目，政府和保安团镇压了“保护同盟”（原文为德语，即“保护武装”，社会民主党民兵组织）。社会党领袖纷纷逃亡或者被捕。数月后，陶尔斐斯被纳粹刺杀。

5 厄内斯特·巴克（1874—1960），1928—1939年任剑桥政治科学教授。

6 屠格涅夫1860年的小说。

表达了我对这个话题的思考——人们很少会感到自己被小说家一眼看穿，这真的非常尴尬，不，别再说了。以赛亚·伯林。

这一时期，众所周知，德国纳粹政权开始迫害犹太人。所以，当亚当·冯·特罗特1934年2月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信驳斥有关德国法庭对犹太人歧视的报道时，伯林非常愤怒，并且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他和特罗特共同的朋友，而朋友们大多对特罗特抱有同情。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4年3月]<sup>1</sup>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S.:

写这封信是因为碰巧读到你关于亚当的便条，我突然感到，虽然你为他所做的辩护并不见得有理，但我还是必须收回对他的指责。我时不时想，是否自己真能不偏不倚地审视所发生的事，我对他的批评是否有客观依据。我用了一分钟时间诚实地内省，证明我的批评并不乐观。在纳粹和犹太人的问题上，我不可救药地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这也许影响了我对纳粹的基本态度。我对意大利人就几乎没有这样强烈的情绪，而实际上，他们玩世不恭，更坏。我唯一可以说亚当的，就是他并非英雄，事实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我或多或少更相信所有报纸的记者所达成的共识。自然，他会寻找他提及的那些更有声望的人——在一切情况还没有明朗化时，他这么说是出于爱国。我不能说自己认为他是一个道德水准非常高的人。我

1 日期为谢拉·格兰特·达夫所注，亚当·冯·特罗特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信在1934年2月14日发表，驳斥有关德国法庭歧视犹太人的报道，她对此也是支持的。见克里斯托弗·赛克斯所著《被困扰的忠诚：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传》（伦敦，1968），第104—111页。在这个插曲之后，伯林对特罗特的看法通过保罗·戈尔—布斯1944年9月25日发自华盛顿的信件传达到英国外交部：“以赛亚·伯林非常了解亚当·冯·特罗特，对他的评价曾经很不错，可是1934年的事情发生之后，证明特罗特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显然要比他对社会民主党的忠诚来得更加强烈。”外交部文件371/39066。

喜欢他这个人，并仰慕他的非凡气度，虽然这样的气度会土崩瓦解，但在瓦解之前，它确实是很有震撼力的。他的确很有魅力，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诚实度却一般。不过我对德国人的所为怀有偏见：这点我很难自控，我请求你了解这种偏见有夸大的成分。我的愤怒是事实，和我自己有关。我对你和克里斯托弗表达了我的愤怒，虽然我的愤怒是经过了对事实的冷静思考的，但是无意间会有一些不诚实的因素在作怪，而且，我想，显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很清楚自己这种情绪及会导致的后果，我也肯定亚当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我的情绪。虽然，我曾猜想他看待此事的眼光应该不像我这样有局限性，可事实上他的见解却很狭隘。但是我这样把对他的看法暗中强加于他，相较他的局限性而言，更不可原谅。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是，他应该像我一样，在一些我所能区分辨别的领域，和我一样黑白分明，我坚信他应该永远如此，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目前我还是喜欢他，我想。）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我独自在家，无事可做（也没有书看）。而且，我的洋洋千言显然要比对一个朋友所犯错误的小小不悦强烈得多，我发现自己是如何恶劣地欺骗了自己，我迫不及待要立刻忏悔。如果，或是当你给黛安娜写信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她在这个问题上我很难保持理性。明天我们一起去散步！

你的

沙耶

致玛丽·伯林

星期三 [1934年3月21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游荡了一周之后，我回到全灵学院。莫扎特的两部歌剧令人非常非常愉快，天籁之音，和汉弗莱·豪斯一起去德文郡也非常愉快。在那里，我发现豪斯一家人情绪忧郁，于是不得不扮演起打碎坚冰的角色。你知道，即

便是在你的儿子和丈夫感到忧郁并需要恢复心情的时候，想让他们开心一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呢。但是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愉快一点，你就得让你的主人快乐起来。回到牛津我筋疲力尽，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见面吃饭，她对我很有吸引力：非常美丽、非常冷漠，也非常友善。现在我得坐下来，工作一个月。父亲对你的沉默不语感到十分焦虑，他总是打电话，发电报，每年如此，如你所知，尤其是我不在他身边分散他注意力的时候，对此你不要介意。你跟我说过“就是寄一张小小的明信片什么的也好”，现在这对爸爸也适用，因为他也是一个人。<sup>1</sup>我在这里很高兴，这里很安静，我可以工作。布莱顿那里可能就不行。写信告诉我有关医生的事，简短一点，但是一定要写。我还遇见了诗人T.S.艾略特，他也是个很好的人。

爱你的  
沙耶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4? 年5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谢拉：

85 你的信（我是在辅导课的间隙读的）突然让我非常快乐，它将我心中最后一点忿恨都冲刷得一干二净。是的是的，我会带你和戈伦韦（他一定想去）去看歌剧，我之前所说的和所提议的一切是愚蠢的，我感到不无羞愧。至于星期天，为了让你看看我有多么感动，多么充满深情，我宣布我会早早起床——9点或者差不多的时间，然后和你一起去阿冰顿——或者随便什么地方都行——甚至是杰伊禁猎区。<sup>2</sup>但是如果我真的做到了，你一定要推迟午餐时间。我不能，真的不能让一项活动的结束时间如此逼近它的开

1 这可能是伯林家每年的固定安排，春季门德尔留在伦敦料理生意，玛丽则一个人在布莱顿的旅馆休假一段时间。

2 在伯林这封信所回复的来信中，只注明了“星期二”，谢拉·格兰特·达夫写道，“[星期日]在阿冰顿和你一起吃早餐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你不喜欢早起”。

始，无论如何，这都要由你决定。读完你的信之后，原本令人昏昏欲睡的辅导课一下子充满了活力，无拘无束，我那些反应迟钝的学生们也几乎兴奋起来了。

说到歌剧《奥赛罗》，除非你来，和我一起去，否则我是一定不去的。我把你的伤感情绪进一步放大，觉得不和你一起去要比不去看歌剧更糟。像往常一样，我成功地使自己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我现在买了我所听过的唱片中最棒的几张。你能否告诉我早晨几点在哪里接你？你坐公交巴士过来吗？

你的  
沙耶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二 [1934年7月6日之后不久]

多内加尔，班贝格，布雷斯林饭店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不能就着烛光写日记，但是我发现在烛光下读一两个小时的书感觉很好。通常我看书很快，在这儿考克斯和玛丽睡得早，就剩下我和“小宝贝”两个人，所以我也得早早上床睡觉，否则，我就得要么殷勤地向“小宝贝”示爱，要么像理想主义者似的和她说话，温柔地奉承她，不这么做她就会变得忧郁，变得像《凯尔特的薄暮》<sup>1</sup>中描绘的人物，而且还是最浅薄、最矫揉造作的翻版。为了避免如此，我也早早休息，然而我难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是睡不着：于是就读叶芝先生的自传<sup>2</sup>，非常喜欢，经过在牛津的一个学期之后，他的自负和自然很对我的胃口。考克斯则抱怨叶芝没有幽默感，而且，考克斯突然愤愤地说，作为男人他鄙视叶芝。考克斯记得，

86

1 W.B.叶芝，《凯尔特的薄暮：男人和女人，恶魔和仙女》（伦敦，1893，以及后来的增订版）。

2 《自传》（伦敦，1926）。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22年叶芝在牛津的时候<sup>1</sup>是多么虚荣，多么爱炫耀，多么愚蠢而怯懦，多么迫切要沉醉在人们对他滔滔不绝的恭维之中。我总是喜欢玩一种游戏：先是强词夺理支持另一方，然后突然收回观点、改变立场。这一回考克斯被我激怒了，他抱怨说叶芝的模样多么难看，他应该多到户外活动，只谈论他的本行就行。考克斯最后的话让我不再妄求这是一次开心的谈话了，我们几乎吵了起来，但是玛丽和“小宝贝”的惊骇神情让我住口了。现在所有老生常谈的笑话再次成为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又和好如初。他们去爬山，我和美丽迷人但乏味无趣的年轻人一起聊天，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论政治和自己的私生活。很快我们会到达我们的岛屿和亲爱的伯爵夫人那里，我要让自己适应收获甚丰的独居生活。汉弗莱，“收获甚丰”这个词总是让我想起他，在贝尔法斯特我们看见他和玛德琳在一起。她更活泼，更无忧无虑，更有人情味了，也快要做妈妈了；<sup>2</sup>汉弗莱消瘦了，我想他心情很不好，整个人垂头丧气的，温顺得不太自然，像是被拔去了利齿的雄狮，和善得很，简直让我心中发怵。他显然希望我们叫他出来寻欢作乐，但是不同时叫上玛德琳，我的伙伴们认为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很失望。不管怎么说，他已经结婚了，怎么能允许他忘了这一点？听起来这有点狠心，可是人们不该故意引诱他，让他抛开自己的妻子。毫无疑问，现在他过得不幸福。

乡下疏落的小村庄和潮湿的天气舒适宜人，我发现我喜欢爱尔兰的村庄，星星点点的房屋蜿蜒排开，中间时不时可以看到几乎是18世纪的老房子，这类房子很多。村民有着美丽的脸庞。很难理解，他们奇怪地畏惧海洋，去海边的路很少，爱尔兰人令人诧异地不尚海事，连渔村都为数不多。我想，他们的冒险精神可能在16世纪被扼杀了，但是在一个岛上看到居民如此一致地无视海洋的存在，还是一种怪异的现象。我发现[我]极其喜欢玩沙子，在海浪间嬉戏，我堆起巨大的沙堡，等着海浪淹没它们，淹没我。我注意到“小宝贝”吃惊而又鄙视地看着我，仿佛不情愿地发现了我身上也有

---

1 叶芝是牛津大学的常客，1919年在布洛德大街租下一所住房。

2 此时玛德琳正怀着第一个孩子。

最为人所不齿的阿喀琉斯之踵，考克斯则带着体育教师般的赞许看着我，至为感人，两者的态度让我快乐得难以言说。但我只是喜欢孩子气的行为，而不是为了寻求新鲜刺激或是人们的惊叹，尽管没有人相信我，包括你在内，哪怕只相信片刻。我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昨晚“小宝贝”给我一本你写的新书，题目是《猫跳和其他故事》<sup>1</sup>，她是从她姐姐那里拿到的。接下来的一周，我就看你写的书，不读叶芝了，读完你的书我再提笔写点什么。87  
昨晚我朗读了《猫跳》，吓坏“小宝贝”了，以至于她要玛丽陪她去卧室。我很喜欢这个短篇。在我看来，小说成功地实现了所有效果：开头很有趣，很精彩，恰到好处地制造了模糊而尖锐的不适之感；小说真切地让人恐怖，不是因为它已经说出来的话，而是因为它省略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结尾既恐怖又有趣。读者想得越多，这些元素就益发相互作用，相互加强。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又不害怕后果，我应该会半歇斯底里地咯咯直笑，而且事实上我也会这样，然后拒绝把这本书给家人看。就是现在我也没有缓过劲来——我真的很容易受惊吓，我陷入令人愉快的抑郁的沉思中，引起考克斯善意的取笑。这一回这个有同情心的人就像铁皮烟盒上面广告里的人物，帽子遮眼，叼着烟斗，衬衫的前后襟被风吹得鼓起来，脸上是邪恶而满足的神情。我不能这么恶毒，我很喜欢他，根据私立学校的校规，他能和我一起出来是很大的让步了。但是他不像我所喜欢的那类人那么中立，我很尊敬他，毕竟他自己发现了关于戈伦韦的真相。我的伙伴们在叫我，我必须走了。我会从岛上再给你写信，我十分喜爱爱尔兰。

你的

沙耶

---

1 戈兰茨出版社1934年7月出版，西勒·林德在那里工作，书中和小说集同名的短篇故事的背景是一所发生过一起恐怖谋杀案的房子，小说中的歇斯底里愈演愈烈，在小说结尾，所有人物都恐惧地把自己锁在卧室中。



致约翰·希尔顿和佩吉·希尔顿

星期二 [邮戳日期1934年7月, 明信片]

爱尔兰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村子看着很可爱,一切都令人惊叹,居民相貌非常俊美,性格比较乏味。我们很快就到了岛上(在安尼朗湖)和亲爱的伯爵夫人那里。

你们的英格丽·沃伯格小姐<sup>1</sup>真的研究了17世纪卢克莱修的译本吗? 我那天在牛津见到了路易斯·麦克尼斯<sup>2</sup>, 我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88 我很喜欢。我要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打个电话。

致亚当·冯·特罗特

[1934年7月底]

德罗伊特维奇

亲爱的亚当:

请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你的来信让我十分感动, 不仅是因为信的内容, 而且因为你给我写信这个事实本身。我向来无意在你我之间引发争执。我承认, 《曼彻斯特卫报》的事件导致了我这边一次小小的爆发, 这是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有害的, 而不是因为你要坚持你的个性和信念,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你的所有其他朋友以不加辨别的忠诚态度为你所做的愚蠢的辩护。后面的这个原因一定让你很高兴, 如果是我处在你的位置, 这会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我认为自己仅此一次是以毫无私心的热诚来争论的, 没想到我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个人背叛的证据, 不值一提<sup>3</sup>, 对

---

1 英格丽·\*沃伯格(一斯宾纳里)(1910—2000), 父母来自汉堡, 1932年在萨莫维尔学院以非正式学生身份修过英文, 1941年她和维尼埃罗·斯宾纳里在美国结婚, 约翰·罗伯特·希尔顿是她的表哥和堂兄。

2 麦克尼斯后来在与W.H.奥登合写的《冰岛来信》(1937)中的《奥登和麦克尼斯: 最后的遗嘱和声明》一篇中, 遗赠给伯林“一碟牛奶”, 从那以后伯林对他的评价就没有那么高了。

3 “以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此我感到恼怒。你本人要比你的同盟更加清楚这种行为的利弊。如果我是你，我真的该宣布“这种场合不需要那样的辩护者的帮助”<sup>1</sup>。我非常乐于见到你：在8月末我可能会经萨尔茨堡去威尼斯，有机会见个面吗？我非常非常想见你。想见你的理由各种各样，因为我依恋你，因为我想要学习你对各类问题的看法，因为人需要定期见见面，说说过去和将来，因为一想到要见到你，我的心就感到激动。只要有哪怕丝毫的见面机会，就请告诉我，好吗？我打算从威尼斯乘船，和我们学院的约翰·福斯特<sup>2</sup>一起，先去埃及，然后从那里去耶路撒冷，在那儿我要拜访汤米，你的表亲汤米。<sup>3</sup>他似乎已成为耶路撒冷督学的秘书，写一些反对帝国主义的信件。至于牛津，我应该尽一切努力让你在下个学期回到那里，明年那里要成为一个巨大的陵墓了，固定人员留下来，流动人员走了。这个最后的夏日标志着一段中断，一段个人生活时期的结束。所有的年轻姑娘们都将离校，比如谢拉，她已体面地获得PPE专业第二名（我在她面前表现得十分讨厌）；还有“小宝贝”（不，你叫她莫伊拉），她在古典人文学这门课上得了个了不起的3<sup>0</sup>。比起来，她们的离开也许会使考克斯的生活产生空白，而不是我。戈伦韦不会在牛津，不会让人着迷也不会让人烦了——他的无礼行为持续时间之久已经超出了我们认为可能的限度。我还真积累了一定的写书的素材，10月，一条漫长、黑暗、我希望是温暖和连续的隧道，将在我面前开启。每晚我都会谦恭地和霍兹沃思<sup>4</sup>谈话，会经常被亲爱的院长拥抱，我每次说完一句话，他就会说，“了解到你的想法，我真高兴”，他对其他人也是这样。我将见不到哈罗德，更没有什么必要见到鲍拉先生。这一切让我心满意足。就时间和情感精力而言，1932—1934年是一个花费颇多的时期，它留下了一些美好回忆，但是对平凡琐事的体会被夸大了，变成了一派因循守旧的道德主义前

89

1 拉丁文，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卷2，第521页，第二行开头。

2 关于约翰·福斯特，见下文第809页。

3 这里提到的可能是冯·特罗特和霍奇金两人共同的朋友圈子；据我所知这些人之间并无亲戚关系。

4 威廉·塞勒·霍兹沃思爵士（1871—1944），1922—1944年任英国法弗尼林讲席教授，全灵学院研究员，以所著十二卷《英国法律史》（伦敦，1903—1938）而著名。

景,以及严格遵守生活规则的需要,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靡费的夏季之后被令人遗憾的一系列小危机所打断的秋天。没办法见到你吗?你一定得在全灵学院告诉我。我非常看重我们的相见。

我认为,你的英格丽·W.小姐是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女孩。我应该去中东一趟,为一些她大加赞赏却不甚了解的事物收集实物图片,而这也正是我去那儿的目的地。

我们的朋友们都好,至于我反对你的行为,在这点上我以前从未如此激烈。我的确认为无需瞒骗,你是在允许一种必将导致严重伤害的事态发展,你本人也了解这一点。但是我确实向来对人际关系比较迟钝,而且我也几乎总是做错,我不能忘记自己有这样的毛病,所以我就暂停对你的评判了。对于你的私生活,我真的没什么好议论的,而且也永远不会去议论。请原谅,我得停笔了。为了探望我的母亲<sup>1</sup>,我住进这家可怕的饭店。我原打算住两个星期的,可是待了三十个小时之后我再过五分钟就要离开——这里的食物是李子虾冻和大米布丁,整个餐厅的人都在我的头顶上大声说话——我坐在中间,两个独立的通风系统的交汇处——他们谈论天气、过去、现在和将来,谈论荒谬可笑的、可怕的、未能满足的事情,谈论贝德灵顿和西里汉姆幼犬的死亡率,而我却属于地中海文化。我还没有真正充分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让人写东西是多么令人不愉快,收到你的信我又有多么宽慰(我是多愁善感的,你使我非常感动),我是多么想见到你,牛津的一切是多么不可动摇、不可更改,你是多么应该在假期时来这里待上一个星期,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就来,在全灵学院。我得走了,一定给我写信。

90 沙耶

以赛亚·伯林后来在巴黎对谢拉·格兰特·达夫再次重申了他的感受,她9月4日从巴塞尔给亚当·冯·特罗特的信中说:“我在巴黎见到了沙耶和斯图尔

---

1 可能玛丽正在德罗伊特维奇享受水疗。

特·汉普希尔。<sup>1</sup>关于你，沙耶谈了许多——他是多么仰慕你，认为你所做的一切是多么高尚和善意！我说我们谁也不相信他或者他的仰慕之情，他表示抗议，但是他知道你不相信他，而且似乎希望你不相信他。”<sup>2</sup>

致玛丽·费希尔

星期六 [1934年8月]

布莱顿，大都会酒店

亲爱的玛丽：

这个酒店今晚一片欢歌笑语。我相信，我的父母正在疯狂地饮酒、喧闹、作乐。这意味着我，以一种严肃和老式的方式，应该休息去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喜欢这个镇子，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它的快乐粗俗而毫不做作，这个酒店既粗俗又炫耀，既消沉又花哨，我难以用语言形容。“花哨”这个词我过去不常用到，但它十分贴切。我强烈地怀疑外喀尔巴阡地区的鲁塞尼亚、耶路撒冷的现代部分和我此时置身其中的环境属于同一种现实存在。

我的旅程越来越艰难了：对我必须绕道去萨尔茨堡的事，我不得不欺骗父母，我想同伴们已经在那里了。像卡西尔教授说的那样，我精心编织的托辞现在是如此复杂，以至于要麻烦比尔·艾特肯<sup>3</sup>和约翰·彭特兰德<sup>4</sup>。我想他们俩应该是比弗布鲁克勋爵<sup>5</sup>的外甥和儿子，也许彭特兰德本人就是勋

91

1 斯图尔特·纽顿·\*汉普希尔 (1914—2004)，1933—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文学专业，1936—1940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6—1939年任女王学院哲学讲师，1940—1945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2 引自克里斯特贝尔·别兰伯格记录的信件，我未能找到这封信件如今的下落（如果它依然存在）。

3 也许是威廉·特拉文·艾特肯 (1905—1964)，报人、政客。

4 亨利·约翰·辛克莱 (1907—1984)，凯思内斯郡里斯的彭特兰德男爵二世；其父男爵一世为约翰·辛克莱。

5 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 (1879—1964)，1917年成为比弗布鲁克男爵一世，报业所有人；1940—1941年任飞机制造大臣，1941年任国务大臣，1941—1942年任供应大臣，1943年9月—1945年7月任英国掌玺大臣。

爵。你听了一定会高兴，他们就是西瑞尔·斯特劳斯<sup>1</sup>的朋友。所有这些人都是以某种含糊不清的方式充当我的代理人，帮我寄出蒙骗父母的信。也许你应该见见这些人？比弗布鲁克的亲戚们也许有点落拓不羁，但是彭特兰德勋爵呢？你已经见过他了，他被人带来一起喝茶，“小宝贝”试图让他对G.M.霍普金斯<sup>2</sup>的书感兴趣却没能成功，她可很少遭遇这样的失败。也许我把名字弄错了……

我这封信是真诚地感谢你寄来的帕金斯<sup>3</sup>的照片。我们的关系，就我所知，如果不算非常密切，也算是很好的，我坚决地把这归因于我的羞怯。这里是一条消息：斯蒂芬·斯彭德[顺便说一下，他也会在萨尔茨堡。你的朋友，我的学生<sup>4</sup>想见他吗？或者是那个前近卫团士兵？他很讨人喜欢，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行人，包括他、斯蒂芬、托尼·海因德曼（前近卫团士兵）、另外一个托尼<sup>5</sup>、沃克小姐，还有西勒和J.小姐，以及五位少不了的老相识——都是温切斯特学院的学生，你比我更能想象，我只会迟疑躲闪]写信说他遇见一个年轻人，叫拉斐特，他不太喜欢，此人议论别的事情的时候说到，自从莫伊拉·林德变成共产主义者，牛津当然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牛津了。我把这事告诉了“小宝贝”，但是我怀疑这样的话不那么让人高兴。远处依稀的乐曲，我想是伦巴（我喜欢这老式的姿态，我希望它不会让我

1 可能指西瑞尔·安东尼·斯特劳斯（1913—1944），其日记由德里克·帕特摩尔编辑为《士兵向后看》（伦敦，1951）一书。

2 诗人杰拉德·曼雷·霍普金斯（1844—1889）。

3 约翰·布赖恩·沃德—帕金斯（1910—1990），1931—1934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4—1936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高级半公费学生，是伯林的同龄人和朋友，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后来成为英国驻罗马研究院院长（1946—1974）。这里提到的照片是1934年6月19日星期二参加新学院一年一度的校庆舞会的朋友们所拍的照片，其中有：理查德·奇尔弗、盖伊·奇尔弗（下文第131页注1）、沃德—帕金斯、赫伯特·哈特、玛丽·费希尔、“小宝贝”、茱莉亚夫人（阿格涅斯·辛西亚）、帕肯汉姆（1913—1956，朗福德伯爵五世的女儿，1931—1934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PPE专业）、雷切尔（“小费”）、沃克、普丽西拉·奇尔弗（盖伊和理查德的姊妹）和伯林。其中一张照片为本书图16。

4 雷切尔（“小费”）·沃克（1913—1992），1931—1934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PPE专业，伯林的学生和亲密朋友，后来罹患精神疾病。

5 安东尼·安德鲁斯（1910—1990），古代史学家；1929—1933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3—1946年任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和艾丽森·布莱克威（婚前姓霍普）结婚。1941—1945年在谍报队任职；后来（1953—1977年）成为古代史威克汉姆讲席教授，新学院研究员。

觉得无趣), 慢慢地渗入这个房间, 房间里面只剩我和一对俄罗斯夫妇。我认为男的是哥萨克人——富裕、成功、圆滑的哥萨克人, 这是我的奇怪印象。他此时正忙着告诉自己那个小个子、先天愚型的妻子, 她太胖了, 必须节食。她答非所问地回应道, 她“今天下午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找他, 可是没有找到, 绝望中她错把伯林当成自己的丈夫, 还跟伯林说话(这就更奇怪了), 而他却到了偏僻的小酒馆, 点了双份威士忌和苏打水”(她是语调甜美、吐字清晰地说这番话的)。我发现要想看起来很严厉, 并且表现得对所发生的事情不理解, 并不容易。伦巴(兰巴? 隆巴? 仁巴? 费希尔小姐, 我说得对吗? 是的, 是的, 我肯定你知道)的旋律让我想起艾耶尔太太<sup>1</sup>, 很奇怪的是, 我还想起了你那位香衣小姐, 还有她唱过的歌, 那首歌让我至今依然心怀感激。<sup>2</sup>再也没有比她唱那一首歌更美好的时刻、更感人的情景了。什么时候一定要替我再次谢谢她。我真是说个没完。

你的

沙耶

我要告诉你, 普莱斯写给我的信末尾说: “你当林德小姐[此话不要告诉“小宝贝”]的老师一定很有趣——要我说会给她个 $\alpha\delta!$ !” [是成绩报告单吗]?<sup>3</sup>

伯林在他的直系亲属中是赴巴勒斯坦第一人。由于他的母亲是忠诚的犹

- 
- 1 勒内·艾耶尔, 见上文第72页注4。
  - 2 这首歌是《弗兰奇和约翰尼》。据玛丽·班纳特说, 她记得谢拉·邓巴·香农(1913—2002)(于1945年和帕特里克·迪金森结婚)曾在新学院路唱过这首歌(但具体在什么“情形”下, 两人却都不记得了)。
  - 3 附言中的两个方括号均为伯林所加。至于其中的希腊字母, 牛津的考试常常以头几个希腊字母作为评分等级——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相当于英文字母A, B, C, D, E。希腊字母中G排第三, 而英文字母中C排第三)。它们以各种组合和排列出现(例如, 1936年7月29日致盖尔斯·罗伯逊的信), 这一字母标识体系当时(现在也仍然如此)在口头评判中使用较多, 所以这里的“ $\alpha\delta$ ”说明学生的卷子既具备一等的特征, 也具备四等的特征(哪个字母顺序居前则以哪个字母所表示的等级为主)。

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还是犹太复国主义妇女联盟的积极成员，像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所加入的圈子一样，他的家人在伦敦可能也加入了同样的圈子。（凯伦·海伊索德基金会，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中央财政机构的基金会，于1920年设立于伦敦，一直到1926年才迁至耶路撒冷。它的首任董事有：伯索尔德·费韦尔<sup>1</sup>、乔治·哈尔彭<sup>2</sup>、施马尔亚·列文<sup>3</sup>和西列尔·兹拉托普尔斯基<sup>4</sup>。）伯林的访问恰逢种族暴力冲突双方短暂的和平期，他似乎对犹太复国主义名流进行了一轮礼节性的拜访，他寄回家中的信件如实记录了他的所见。但是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强调了这些信件中的别的方面：他热切地吸收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新世界为他提供的所有不同体验，他热切地、尽可能多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见面，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官员、政客、学者、商人，还有普通人。

### 致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1934年9月5日 [明信片]

埃及

我从来都不知道天能热成这样，动一动都是痛苦的折磨。到处都是抢劫犯：我坐的这艘船<sup>5</sup>很奇怪，船上坐满了大声喧哗、俊美高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女性，埃及代理高级专员<sup>6</sup>和他的一行，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我通过

- 
- 1 伯索尔德·费韦尔（1875—1937），诗人、犹太复国运动领袖。
  - 2 乔治·格德·哈尔彭（1878—1962），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犹太复国运动领袖，1921—1933年任犹太殖民地信托基金董事，凯伦·海伊索德基金会的创始人；1933年从伦敦移民至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成立米格达尔保险公司。
  - 3 施马尔亚·列文（1867—1935），犹太复国运动政治家、作家。
  - 4 西列尔·兹拉托普尔斯基（1868—1932），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实业家、慈善家，生于俄罗斯，1919年离开俄罗斯，在巴黎遇刺。
  - 5 “奥索尼亚”号汽轮，1934年9月4日下午停靠在亚历山大港。
  - 6 莫里斯·德拉蒙德·皮特森（1889—1952），在埃及高级专员请假期间代理高级专员一职；1938—1939年任驻伊拉克大使，1939—1940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40—1941年任英国情报部海外宣传负责官员，1942年任外交部副国务大臣，1944—1946年任驻安卡拉大使，1946—1949年任驻莫斯科大使。

福斯特结交了他们！非常奇特的经历。）还有国王<sup>1</sup>的朋友。福斯特的阿拉伯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赛亚·伯林

新学院档案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二 [1934年9月6日]

耶路撒冷，乔治王大道，隆姆公寓

我亲爱的父母：

从开罗到耶路撒冷的旅行确实令我非常开心。对巴勒斯坦的第一眼印象真是美极了，这里不是太热。我正常的作息时间准备这样：早晨8点到12点工作，然后休息，下午4点至晚间，甚至也许是7点到11点工作。在这样的天气，人很容易醒来，也很容易睡着。我同伊扎克和伊达<sup>2</sup>住在一起，福斯特住在大卫王饭店<sup>3</sup>。那里有点麻烦：由于劳资纠纷，所有的犹太雇员突然被遣散了，所以此时在此逗留的犹太人是太受欢迎的。我住的公寓很好，房间通透凉爽。我想在哪里吃饭就去哪里。我得说开罗相当炎热，但是我顺利地挺过来了。这里首先迎接我的是艾廷豪森和马摩斯坦<sup>4</sup>。后者在《巴勒斯坦报》有份工作，非法的\*，他没有居留权，他快乐极了。艾廷豪森也许没有那么开心，他正生气呢，他的母亲竟给他寄来一件衬衫，他觉得她很可笑。纽塔·施内尔森<sup>5</sup>居然问伊达我何时结婚！显然戈尔德伯格太太编了一个谣言，说我订婚了，而且很快就结婚！真烦人，但是我不打算费神辟谣，只

94

1 福阿德一世（1868—1936），1917—1922年任苏丹，1922—1936年任国王。

2 萨姆诺夫夫妇都是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1934年就伦敦移民至巴勒斯坦，在有自己的住所之前住在公寓里。

3 大卫王饭店，1931年建，中东最著名的饭店，耶路撒冷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后来（1946年7月）该建筑的一翼被伊尔根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炸毁，当时该建筑是英国军事和行政管理所在地。

4 埃米尔·马摩斯坦（1909—1983），圣保罗学校伯林的同代人，在BBC欧洲部工作。

5 伯林此处原文为：Нюта Шнейерсонь，也许是A.M.施内尔森，希伯来大学财务长的妻子，可能是伯林的远亲。





致门德尔和玛丽·伯林

יָרִי

罗许·哈沙纳 נֶרְשֵׁי

星期一 [1934年9月10日]

发自耶路撒冷, 乔治王大道, 隆姆公寓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每个人都很和蔼友善。这三天里我见到了以下这些人:

1. 英国官员, 级别不高, 但是很友好。伊扎克认为他们都是反犹主义者, 不用说伊达也这么认为。霍奇金<sup>3</sup>很乐于助人。

2. 我和布卢姆斯伯里本地人, 即罗斯教授<sup>4</sup>, 一起喝茶吃晚饭, 他让一些人来见福斯特和我, 这些人有:

阿哈德·哈姆<sup>5</sup>的儿子, 大学教务长; 施马尔亚·列文; 卡巴拉主义者肖勒姆博士<sup>6</sup>; 阿文诺亚姆·耶林<sup>7</sup>, 戴维·Y.<sup>8</sup>的儿子; 还有一位政府官员, 维特雷斯先生<sup>9</sup>, 他是美国大商业、犹太代理机构<sup>10</sup>和巴勒斯坦、卢森尼亚、罗马

1 这些希伯来文笔迹不是很清晰, 可能是惯用表达“借着上帝的帮助”的简写, 通常用于信件开头。

2 意为: “第二天”。犹太新年在提市黎月, 即犹太教历7月的月初, 一般相当于公历9月。

3 以赛亚·伯林的朋友托马斯·霍奇金当时为英国派驻的高级专员工作。

4 莱昂·罗斯 (1896—1963),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首位哲学教授, 历史学家塞西尔·罗斯的哥哥。

5 阿哈德·哈姆 (阿谢·赫施·金斯伯格, 1856—1927), 杰出希伯来语散文家,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 他的儿子是莫尔德赛·扎尔曼 (·施罗莫)·金斯伯格。

6 杰肖姆·杰哈德·肖勒姆 (1897—1982), 希伯来大学犹太神秘主义和犹太教神秘哲学教授。在以赛亚·伯林记忆中, 他“年轻、活泼、略带疯狂, 四处乱窜, 显然是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 [……] 他很有天分, 浪漫, 是个有趣的男人”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1)。

7 阿拉伯语教师 (1900—1937), 在犹太教育机构大力推广阿拉伯语教学的主要人物; 后来是托管政府的学校督察。1937年10月被阿拉伯恐怖分子杀害。

8 戴维·耶林 (1864—1941), 希伯来语言文学、犹太复国主义者、教育家, 之前是耶路撒冷的副市长, 该城首家公共图书馆的创办人。主要因其在德国和希伯来民族之间的“语言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而留名, 在这场运动中, 他的名望仅次于“希伯来语复兴者”埃利泽·本·耶胡达。

9 哈利·维特雷斯 (1894—1971), 写了大量有关合作性组织和以色列合作农场的著述。

10 巴勒斯坦犹太代理机构 (现在是以色列犹太代理机构), 一个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国际机构, 主要职能是支持世界各地希望直接或间接参加以色列定居和发展的犹太人。

尼亚、波兰等国合作性组织的负责人。在咖啡店我见到了工党领袖们和费伊·奥格尔<sup>1</sup>，我向后者承诺去特拉维夫时会和他联络，我还没有去。两天前我亲眼见到纳布卢斯的警察运动会！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sup>2</sup>巍峨壮观，在境内；今天早上我和H.E.去了奥马尔清真寺<sup>3</sup>，这令伊茨乔克不是太满意，高级专员的阿拉伯秘书喜欢大学里的巴内斯。<sup>4</sup>巴内斯带我看了大学图书馆，馆藏十分丰富，很好，哲学类书籍比牛津还多。罗斯蛮讨人喜欢，纯粹的“布朗德斯布里的约柜子孙”<sup>5</sup>，他的妻子有过之无不及，他有点儿疯疯癫癫<sup>6</sup>，但对我很好。

施马尔亚·列文告诉我一个笑话：他和一个英国人聊过，对方说自己完全同情犹太复国主义，除了以下三点：

1) 为什么要有希伯来语？难以使用、费解难学，完全不同于欧洲语言，等等（韦奇伍德<sup>7</sup>也这么认为）。

2) 如果开拓殖民地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选择巴勒斯坦？贫瘠、

- 1 费伊·奥格尔，父母居住在伦敦，为黎凡特交易会宣传局工作，1937年在特拉维夫与加布里埃尔·莫斯科维茨结婚。他的父亲卡尔曼·奥格尔（卒于1946年）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 2 紧挨着纳布卢斯南边的双峰山（《圣经》里的示剑），见《圣经·申命记》2章29节。五十五年之后伯林依然记得这个情景：“我们受邀去观看纳布卢斯警察运动会。我们去了，坐在那儿，警察运动会开始了，乏味得难以置信！一种竞技表演，人们骑着摩托车，汽车嗖嗖开过。我坐在一个穿着短裤的男人旁边，他显然是个英国官员[地区专员]，我对他说：‘我们在望着两座山：我想它们一定是《圣经》中的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哪一座是以巴路，哪一座是基利心？’他说：‘我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它们只是山，问我这样的问题没有啥意义。’后来，1964年他成为卡拉东勋爵[休·麦金托什·伏特（1907—1990），1964年成为卡拉东男爵]。”（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1）
- 3 7世纪穆斯林圣地，今天被人们称为圆顶清真寺，耶路撒冷著名地标式建筑，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之一。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从这块岩石上升天，于是就在这块石头上建造了圆顶。以赛亚·伯林的描述在当时是普遍的说法，但显然不当：这里是朝圣的地方，而不是清真寺，尽管这里在过去有时和耶路撒冷的第一位征服者奥马尔哈里发联系在一起，但它实际上是奥马尔去世半个世纪之后由阿比德·艾尔·马里克哈里发建造的。
- 4 这位高级专员是陆军中将阿瑟·格伦菲尔·沃乔普爵士（1874—1947）；戴维·哈特维格·巴内斯（1893—1973）是希伯来大学阿拉伯语讲师。
- 5 “布朗德斯布里”是讽刺的说法，指的是英裔犹太人，民族同化主义者，当时市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中在伦敦布朗德斯布里、基尔伯恩、梅达谷等地区。
- 6 此处原文为希伯来语：Meshuga。
- 7 乔塞亚·克莱门特·韦奇伍德（1872—1943），1906—1942年任纽卡斯尔安德莱姆下院议员（1919年起为工党成员），是一个“非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34年访问巴勒斯坦。

乏味、炎热，到处是阿拉伯人？

3) 如果英格兰决定开始实验，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民族中，偏偏选择犹太人？别的就没有什么异议。

昨晚我们拜访了梅耶·伯林<sup>1</sup>，一个聪明狡猾的男人，有个不讨人喜欢的念法律的儿子，在大学里教《塔木德经》<sup>2</sup>。

我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厄斯<sup>3</sup>的反犹的叙利亚人一起吃了午饭，他有魅力，有教养，受过很高的教育，聪明、肆无忌惮，是个非常难对付的敌人。97  
如果我能够和穆夫提<sup>4</sup>吃午餐，我会去的。今天我将拜访杜坎<sup>5</sup>，我在街上碰见他，他问起你们两个；我要拜访费韦尔，他和我联系了；我还要拜访雷波维茨一家；最后我还要见著名的沙亚·L。<sup>6</sup>。星期四我可能要去圣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旅行，如果能够成行，我就至少有四天不能给你们写信。这里的邮政和电话服务糟糕透顶。我还没有去殖民区那里看看，等合适的时候再去。耶路撒冷、西方墙<sup>7</sup>等，棒极了，非常美丽，这片土地的其余地方也很美丽，风景如画。圆顶清真寺，还有矗立在摩利亚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雄伟壮观。<sup>8</sup>有趣的是寺院下面的所罗门马厩。沃乔普不在，所以我可能不会穿小礼服。

1 梅耶·伯林（·巴里兰）（1880—1949），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米兹腊希”（先发生在欧洲后又发生在以色列的宗教犹太复国运动）的首领。

2 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的《塔木德经》。

3 乔治·安东尼厄斯（1891—1941），《苏醒的阿拉伯》（伦敦，1958）的作者。

4 哈基·阿明·阿尔—侯赛尼（约1895—1974），耶路撒冷和阿拉伯国家主义者的宗教领袖。

5 也许是摩西·杜坎，来自圣彼得堡的专门律师，担任巴勒斯坦土地部的副主任，直至1936年。

6 耶沙亚胡·雷波维茨（1903—1994），科学家、哲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是希伯来大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教授），是伯林所写的一篇颂辞中的称赞对象（以希伯来文出版的译本为《以色列的良知》，发表于1983年3月4日 *Ha'aretz* 的第8版），书中还提到了雷波维茨的姐妹内查玛，一位很受欢迎的《圣经》学者。这家人都非同凡响：虔诚、博学、直言。

7 原文为希伯来语，希律王建造、后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圣殿遗迹。传统上以“哭泣墙”之名而为人所知，是全世界犹太人朝圣的集中地。

8 在《创世记》22章中，上帝拜访亚伯拉罕，要以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牺牲，供奉在“摩利亚地”一座无名的山上。传统上这个地方被确认就是这座山，并定名为“摩利亚山”，这里建有耶路撒冷第一座和第二座犹太圣殿。今天残留的遗迹是座巨大的平台，犹太人心目中的圣殿山，穆斯林心中的崇高圣地。圣殿山现在的主体建筑物是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地方，穆斯林认为这里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地。附近的一段石阶把人带向所谓的所罗门的马厩，一个巨大的穹顶区域（曾被十字军用作马厩），支撑穹顶的立柱支撑了圣殿山的东南角。

我现在热情洋溢，身体健康，心情舒畅，一点不觉得热！（这里的炎热可以忍受，不会比伦敦更热，一天只热三个小时。）

你们的  
沙耶

在以赛亚·伯林访问期间，他和托马斯·霍奇金一起去了外约旦，他记得，霍奇金“是左翼的、强烈地持反犹太主义观点的本地人[……]我想他可能会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反犹太的[……]我们骑在驴背上回到耶路撒冷，那是星期98 五下午，虔诚的犹太人向我们投掷石块，我们像耶稣似的——‘和撒那！’”<sup>1</sup>

致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1934年，明信片]

巴勒斯坦

自从福斯特走后，我陷入了传教士的圈子。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市政选举非常激动人心，选票交换的过程<sup>2</sup>悬念迭起，令人惊叹，我差点也被给予了投票权。考古界的人正焦急地期待着你的到来。我在哈德良的杰拉萨<sup>3</sup>的有趣铭文上度过了一晚，那个字母“D”巨大无比，但还是很精

- 
-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11，这里伯林引用了《圣经》典故：在接受审判前，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人们热情地欢迎他，喊着“和撒那”赞美他（具体细节在基督教诸多《福音书》中各有不同）。
  - 2 这里提到的是犹太街区选票和阿拉伯街区选票的交换。市政选举以选区投票的方式举行，选区是根据种族界限划分的，每个选区占主导地位的种族通常推出一位大家同意的候选人，所以在这样的选区并不要求选举。虽然如此，1934年耶路撒冷的种族团体没能达成一致，在有的选区两位候选人互相反对。有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占主导的种族团体就在本选区的少数派种族社区寻求支持。结果不同的选区之间犹太人的选票和阿拉伯人的选票就“交换”了。
  - 3 今天约旦的罗曼·杰拉萨（低加波利的一座城市）。这里有一座为纪念哈德良大帝公元130年造访该地而建的凯旋门。在它建成后不久，也许是由于地震，凯旋门上的铭刻掉了下来，一直到1934年6月才在废墟之下被发现。它躺在地上等待被重新竖起期间，以赛亚·伯林似乎将它当床在上面睡了一晚。后来伯林解释说，在安曼（往南约20英里）他找不到床位，“因为我站在那里看了太久杰拉萨的遗迹，结果只好睡在一方石刻上，石刻上记载了哈德良大帝访问这座城市的经过，经过一整晚，上面的每一个字母都印在了我的背上”（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由于铭文是希腊语，“D”也许是“Δ”；但是整个铭文都有环形饰纹，尤其是

美。每个人都把艾立夫<sup>1</sup>称作“博物馆公务员”。

爱你的

以赛亚·伯林

新学院档案

致门德尔和玛丽·伯林

星期一 [1934年9月24日]

[耶路撒冷, 大卫王饭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的巴勒斯坦之行结束了,我要在这里休息一周,乘坐皮尔斯纳号离开(船长是犹太人斯坦得勒先生),艾廷豪森也和我一样,3号走,9号抵达伦敦。我将和你们一起住两天,然后我就去牛津,争取回去前返回度周末。 99  
我身体状况很好,现在我要跟你们好好说说我自伦敦的这次旅行。我的行李最终给我招致的麻烦比我当时让你们想象的还要大,它在意大利与瑞士的边境被拦住,经过无休止的谈判,我不得不从维罗纳回去取它,还有[托尼·]安德鲁斯带来的我的钥匙。晚上我和安德鲁斯一起到达那里,安德鲁斯非要我和他一起返回萨尔茨堡,在那里逗留一晚,听一场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会<sup>2</sup>,而不是返回维罗纳,那里我们已经待够了。也许你们注意到了,我的信件中间隔了三十六个小时,这是由于我秘密地去了萨尔茨堡并在那里住了两夜一天。我本来会写信说这事的,可是害怕爸爸因此担心。听那场音乐会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得的经历,托斯卡尼尼是位了不起的天才。

-----  
这些字母刻得并不深,字体也不太大。

- 1 约翰·亨利·艾立夫(1902—1960),1931—1948年任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以受托的“保管人”而闻名)。
- 2 阿图洛·托斯卡尼尼(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1934—1937年担任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客座指挥,因反对纳粹而在道德方面,同时也在音乐成就上成为伯林敬仰的英雄之一。托斯卡尼尼1934年8月23,26和30日在萨尔茨堡指挥,第一场似乎最有可能是“[伯林]有生以来最难得的经历”,因为演奏曲目包括莫扎特、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第二场音乐会是瓦格纳专场,伯林向来不太喜欢,最后一场是大杂烩式的演奏会,而且与伯林9月初到达埃及的日子非常接近。

谢拉·林德离开了，我所有的朋友也走了，除了哈迪兄弟<sup>1</sup>和J.帕肯汉姆夫人之外，他们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我对你们隐瞒了这件事，感到可怕的负罪感，所以我尽可能地缩短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就一天，在这一天里我见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我很乐意见，另外一个我就不太乐意了。一个是福斯特！虽然他是坐汽车来的，我只是在威尼斯见到他。另外一个施内尔森太太！<sup>2</sup>她说她是微服私行。问我能否不要让她的孩子们知道她也在。于是我说我也是微服私行——你们知道我在中欧，但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人们认为奥地利不安全，我不想让你们为我担心，如果她想要我保守她的秘密，她能否也为我保守秘密。当然，我这么说是开玩笑的。但是如果你们见到她，不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她会觉得我背叛了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躲躲闪闪，而且她会想报复的，人不能挡了坏人的路。我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这次短暂的越轨，当时这件事让我有强烈的负罪感，但是萨尔茨堡很安全，安德鲁斯非常急迫，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天。那里很可爱，到处是犹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托斯卡尼尼——第二天我和我的行李一起出发前往威尼斯，威尼斯简直奇妙无比。一定要给我写信，说原谅了我的萨尔茨堡之行，否则我将饱受折磨。威尼斯像天堂，简直像玩具一样不真实。海上的旅行平安无事。巴勒斯坦有趣极了：我不介意没有入住大卫王饭店，它没有什么客人，费用昂贵，但我还是常常在这里吃饭。我目前见到的人有：移民部门负责人米尔斯<sup>3</sup>，聪明、绝望、愤世嫉俗的一个人，对英国人进行的这项种族实验既不相信也不感兴趣，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怀有深深的蔑视，他认为他们都只有二等智力。我和霍奇金的关系很亲近，他带着我到处去：我遇见了一个重要的叙利亚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安东厄斯，如果我可以见伟大的穆夫提，我会去。艾廷豪森在巴勒斯坦快乐地游

1 也许指的是W.F.R.哈迪和他的弟弟科林·格雷厄姆·哈迪（1906—1998），后者1936—1973年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古典学导师。

2 L.施内尔森太太是布朗德斯布里和区妇女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委员会成员，伯林母亲熟知这个团体，施内尔森太太是主要人物。

3 埃里克·米尔斯（1892—1961），1934年4月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移民和统计署专员（早前被称为“移民署长”）。

荡,我想罗斯柴尔德的皮卡<sup>1</sup>也许会给他一份小差事。特拉维夫很可怕,像(曾经被发现金矿的)克朗代克,想象一下吧,一大帮犹太淘金者突然降临此地,他们有的住楼房,有的住棚屋、简陋木屋或是铁皮屋子,吵闹、肮脏,街道因缺少空间而变得狭窄。犹太人没有品位。哈达尔·哈卡梅尔<sup>2</sup>也一样。然而虽然氛围繁忙,但还是美妙的:犹太人,到处都是犹太人。假日让你感到安宁:在耶路撒冷的市郊,许多希伯来人一起歌唱,歌声既不过于响亮,也不粗俗,人们披着“塔里斯”<sup>3</sup>公开四处走动,等等。

我和萨姆诺夫一家一起拜访了乌西斯金和杜坎,后者非常热情,她是个很和善的女人。我们还拜访了费韦尔一家。伯尔索德没有下来,推说自己病了,第二天却又在街上见到他,他非常无礼,不是对我而是对萨姆诺夫,显然伯尔索德不想见他。我想他们经受了不冷不热<sup>4</sup>,伊达总是不开心。等我回去我会告诉你们关于他们的一切。伊扎克很乐意待在巴勒斯坦,但是无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让他分心,我和他一起去北方旅行,去梅图拉<sup>5</sup>等地,他极其有趣,真是优秀的人。小集体农场<sup>6</sup>的人们非常温厚、好客,没有无礼的无产阶级式傲慢。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各种气候和形形色色的人都很迷人。在海法的赎罪日。卡梅尔山顶<sup>7</sup>,不是哈达尔,很美。如果要建一所房子,那要么就在里哈维亚<sup>8</sup>,那里就像建成之前的乐图凯——白色房子的周围有着连续、开阔的大片空地,要么就在卡梅尔山顶。如果有点

101

1 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地开拓协会,由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1923年成立,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因为“I”几乎可以和“J”互换使用,PICA中的“I”由此而来。两个字母起源相同。事实上,作为缩写名称,“PICA”也比“PJCA”更上口。)

2 地中海港口海法的中心区域,是那里最早的犹太社区,同时也是购物和商贸中心。

3 犹太人祷告时披在肩上的有穗饰长方形披巾(今天通常音译为“塔里斯姆”)。

4 伊扎克·萨姆诺夫,和梅耶·伯林拉比是远亲,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走得最近;但是他似乎是个令人生厌的钻营拍马之徒,他移民到此,似乎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对他事业上的帮助。

5 位于黎巴嫩边境的小镇(在国境的最北端),1896年俄罗斯移民在这片由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购买的土地上建立农业定居地。

6 小型集体农场是巴勒斯坦的一种集体定居点,一般要比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小,小型集体农场的建立始于1909年。

7 海法城有三层:老城区、港口区、主城区哈达尔,上面是更高档的卡梅尔山居住区。

8 耶路撒冷的时尚住宅区,1920年代至1930年代建造,是知识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家和许多逃离了纳粹统治的德国犹太人的居住地。



钱——只要一点，比如两百英镑，那就可以在贝尔谢巴<sup>1</sup>投资，很不安全。我回去再向你们报告。伊扎克现在不能来，准备来过逾越节<sup>2</sup>，我希望他能通过考试。在赎罪日的晚上<sup>3</sup>，福斯特和我正好都离贝鲁特很近：在那儿发现有一群逃离了妻子和犹太公众舆论的丈夫们（还记得哈尔彭的事吗？）来度赎罪日，他们一行四人，有范·福莱斯兰德<sup>4</sup>、斯莫瓦拉（律师）<sup>5</sup>、普弗罗姆（语文学家）<sup>6</sup>和一位医生，我和他谈了话。碰见我们他们很吃惊，但是很有礼貌。雷波维茨夫妇也是（我的意思是他们也很有礼貌），我还看见穆利亚·沙立特<sup>7</sup>和他们在一起——他很好，很满足，还有梅耶·伯林<sup>8</sup>，他对我特别彬彬有礼。犹太人对英国人的看法很尖锐，不是对英国人的总体政策有看法，而是对他们所犯的一些粗鲁、残暴、侮辱人的小过错有意见。英国人是三等入。

明天我要拜访舒克雷·贝·塔基·艾尔·法如吉，我的阿拉伯学生的百万富翁父亲<sup>9</sup>，他把土地卖给犹太人，然后又写文章反对这样的行为。所以你们看，我谁都见。回去时我将收集到大量的素材。当我见到《圣经》中的遗址时我并没有什么感慨，它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也许父亲会有感慨。你们一定要来。我非常健康，非常快乐，没有贪图美食佳肴！我期待着和米尔斯再次交谈，期待着在特拉维夫逗留三天，我将拜访路希亚·沙立特<sup>10</sup>和帕思

1 内盖夫沙漠边缘的城镇，距耶路撒冷西南约五十英里，《圣经》中经常作为以色列领土最南端的边界标志。

2 伯林此处原文为：Peisach。

3 伯林此处原文为：Erev，意为“[在]……[的]晚上”。

4 扎多克·A·范·福莱斯兰德（1886—1939），1923—1938年巴勒斯坦迫塔什公司总经理，后为海务信托基金总经理，该基金机构管理特拉维夫港，自1929年起为荷兰总领事，后开枪自杀。

5 摩西·斯莫瓦拉（1888—1961），犹太律师协会主席，后为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法官。

6 海因茨·普弗罗姆（1900—1962），生于柏林，1925年移民至巴勒斯坦，后（1949年）改名为希拉姆·佩里；1934年10月起在希伯来大学担任罗曼语和中世纪文学讲师。

7 塞缪尔（“穆利亚”）·沙立特，伦敦的马克（·默多克）·沙立特（早先来自里加）之子，莱昂内尔和贝拉·沙立特的表亲，穆利亚移民到巴勒斯坦，终身居住在那里。

8 就是1934年9月的信件中提及的梅耶·伯林。

9 阿布杜尔·马吉德·塔基·法如吉（1912—1986），先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就读，1932—1935年在新学院读PPE专业，他的父亲艾哈迈德·舒克雷·塔基是来自巴勒斯坦埃奈因谷地的土地所有人。

10 莱昂内尔（“路希亚”）·利奥波德·沙立特（1906—1985），伦敦里普曼·沙立特（早先来自里加）的儿子。莱昂内尔1934年迁居巴勒斯坦，但是1937年因其父生病又回到伦敦。

茨<sup>1</sup>，然后就回家。我没法每天记日记。我晚上太累，早早就睡了。

爱你们的  
沙耶

致莫伊拉·林德

邮戳日期为1934年10月26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小宝贝”：

我太富有同情心了，也就是说，无论何时，我想到那些必然发生的既无意义又消耗精力的情景，自己便陷入了抑郁。我该想到你的母亲会面对实际，坦然接受这种情况；你的父亲<sup>2</sup>则会表现出我强烈地渴望自己也能拥有的那种老派的高贵。因此，照目前的情况，你对P太太<sup>3</sup>的造访完全是对的，是一种慰藉，等等。

这里的人在等着戈伦韦到来，我想，那时学校里会挤满人，我讨厌这样。此外，我想以此事为由来见你，总而言之我想见你。至于要做什么，我唯一能提议的就是星期天午饭之前，大约12:15，一起在新学院花园散步。我会让勤杂工提前半个小时提醒我，否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的记忆和心智正变得支离破碎。如果我在房间里，和朋友们一起胡吹海侃，或者没有在适当的时间起床，那我就需要最紧急的提醒，提醒我要做的事，而不是无限地延续现状。我知道我是冒着冒犯你的危险，但这是一个心理事实：在正常情况下我的行为表现都是负责任、忠诚和理智的。如果我和六

---

1 阿齐瓦·帕思茨（1912—1983），1930—1933年就读于大学学院法律专业，后来在特拉维夫当律师，他的母亲肖沙纳是西列尔·兹拉托普尔斯基（上文第110页注4）的女儿，是特拉维夫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

2 罗伯特·林德（上文第93页注3）。

3 指皮尔金顿太太。她的儿子（爱德华·塞西尔·）阿诺德·皮尔金顿（“皮尔克斯”）（1907—1994），1926—1929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小宝贝”和他有过一段不甚强烈的感情纠葛——就是这封信开头几句话的背景。皮尔金顿一家是圣海伦一个制造玻璃的家族的成员，住在野猪山，牛津城外西郊。

个人以上在一块儿，就会变得稀里糊涂、昏头昏脑、高兴满足、醺醺然，把什么都抛到脑后。虽然我写了这么多，现在倒真的不会发生我忘记和你会面的危险了，无论如何都不会。因此如果你在12:15到新学院，12:30就更好了，我就会在那里，分秒不差，如果你不回复，我就认为你同意了。

爱你的

103

沙耶

致玛丽安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sup>1</sup>

1934年12月7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安和F.F.:

这几周的时间，我都在努力从夏日的旅行中恢复过来，此刻，那段经历似乎已经无限遥远，就像你说牛津对你很遥远那样。那是非常特殊的一次旅行，旅行之初我很恐惧，旅行结束的时候我松了口气，在这次旅行中，我没有一刻感到沉闷乏味。我唯一知道的记事方法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这会让我的记录很长，但是能让我记住所有不能抗拒的事，因而带给我如此多的快乐，这么做就像生活在过去一样。我短暂地造访了萨尔茨堡，听了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会，由于我父母对流弹的恐惧，我不得不安排让我所有的信件都从维罗纳寄出；之后，我去了威尼斯，那里奇妙极了，我压根儿就不能把它当作城市，只是把它看成堆簇在水里的一团干土块：人们，尤其是女人，美丽而堕落，一切的节奏都如此缓慢，就这点而言我几乎觉得自己回到了牛津。我在那里遇见了福斯特。他快乐、好脾气、宽容，如果需要，他就可以变得严肃、实际、乐于助人、嘲讽，甚至友善，一直如此。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旅伴。不管莫里斯怎么说，他都不是讨厌的人。但是他喜欢

1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882—1965)，1914—1939年任哈佛大学行政法贝尔纳讲席教授，1933—1934年任牛津乔治·伊斯特曼客座教授。关于法兰克福特和他的妻子玛丽安·A.法兰克福特(1890—1975，婚前姓丹曼)访问牛津的详情，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第82页，以赛亚·伯林《个人印象》第112页。

无赖男子，我们一路上总遇见这类人，他欣赏他们，而他们越是俊美斯文，我就越恨他们，我受过的所有传统和严格的宗教教导这时候都冒了出来。最后我们坐船来到亚历山大港，如果一个人没有来过这里，他不会知道什么是噪音。突然来了一大帮黑鬼——类属名称，他们穿着彩色的长睡衣冲上甲板，其中一个抢下我的包往前冲去。我忧心忡忡，没有护照，热得要命，跟着人们缓慢地前进。突然他把我的包扔到我脚下，说“我不是搬运工，我是生意人”，他是一个搬运工的代理，而这个搬运工只能送我一段路，然后把我交给另外一个搬运工，诸如此类。最后我发现自己和三个搬运工一起坐在出租车里走了一段相当于从全灵学院到瓦德汉姆的距离<sup>1</sup>。我们讨价还价，他们大声尖叫，一切就像喜剧中描述的那样。开罗炎热却无比壮观。博物馆令人兴奋。但是整个埃及却可怕得很，污秽、消沉、腐败，什么都可能发生，你什么也不能依靠，谁也不能依靠，一切都油腻、黏糊、衰败、野蛮，一切就像在精疲力竭之后沉浸在永远的宿醉之中，哦，真是无耻之极。乘坐筏子经过运河的体验激动人心，凌晨一点钟，我看见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阿拉伯人、希腊女人、警察，以及难以名状的一切。东堪塔拉<sup>2</sup>的海关颇有油水可捞，由于海关官员得到承诺，他们以及家人可以得到他们所发现的违禁品的90%，所以他们把你的包当成了摸彩袋，搜完一遍，如果没有发现什么，他们就重新搜一遍——时间没关系，火车可以等——然后就搜身检查有没有武器。轮到我时，福斯特说“哦，我建议你们仔细地搜搜他，他是臭名昭著的走私犯，身上至少有四五把手枪”。埃及人没有幽默感，他们把他的当话当真。你不知道身侧被一个埃及海关人员上下抚摸是什么滋味，累死人了。我承认，那一晚我整夜没睡，福斯特窃笑不已，但我其实是因为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国家而感到激动。在加沙和艾尔—阿里什之间出现的第一片绿洲简直就是舞台布景，虽然不是那么浪漫，但是迄今为止，我的所见所闻都是琐屑小事。我一到那里就找到了一些亲戚，从那时起我过着

104

---

1 不到400米。

2 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伊斯梅利亚以北30公里，位于从伊斯梅利亚至萨义德港的主干道路上，是去往巴勒斯坦的铁路线的起点。

两种分裂的生活，一种生活是和福斯特、英国官员霍奇金。（他是我所知的最诚实的伪浪漫主义者，孩子气、正直、善于循规蹈矩而拙于把握全局，也是最幼稚和最恼人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人非常好，友善、慷慨，阿拉伯人喜欢他认真而磕巴的阿拉伯语，犹太人喜欢他，因为他透明而真诚，两派的人都认为他很容易受骗，又很容易犯大错。每个人都爱他，却没有人尊敬他，有些人想利用他，有些人又想保护他，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他根本不该来这里，但是他又比表一上的他的继任者好得多。关于他，我说得够多了。）表一中有一些享受官方恩惠的阿拉伯人（关于他们后面再接着说），还有一些官方喜欢的犹太人。我在一次由哲学教授罗斯先生为我们举行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的派对上见到了后者。派对上，维特雷斯一家、耶林一家、各类商业巨子和老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来了：他们都很拘谨，没啥意思。由于他们和福斯特的英国人长相，官方导游J.戈登被指派给我们，带着我们四处看。这次观光官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很和善，我们确实从他的车上看到了一切，但是这样看到的一切都属于第一种生活。第二种生活是和我的亲戚们在耶路撒冷和殖民地的私宅中度过的。两个巴勒斯坦完全不同，官方的生活情景就像由私立学校的教职人员管理的一所巨大中学——还要低一等，甚至还不如温切斯特学院的学生们——这些私立学校的教职人员敏锐地感觉到等级的差异，而且形成了只有中下阶层才有的那种势利。高级专员（总是休假不在）显然被看作是校长，起着装点门面的作用，充满了真诚和高贵的情感，略微有点落伍，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家长以及督学（殖民军官和贵宾）关系甚好，但由于过于超凡脱俗而不能清楚地了解日常问题，因此他总是需要受到适度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操纵。殖民局由督学董事会组成，他们富裕、愚蠢、冷漠，不断地派遣督察员，而这些督察员不得被领着四处走走看看，然后就被尽快打发回去，偶尔督学们会事先提示当地的助理教员如何回答问题，从而使检查过程变得容易些。男生们全是阿拉伯人：快乐、充满爱心、情绪高昂、强硬，时常容易发脾气，来点恶作剧，打破一些犹太人或者英国人的颅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校方就罚他们抄写，或是对他们处以禁闭，以期教化他们，加深他们对英国式公正

原则的认识。而这，我要补充一下，不是虚伪的而是当地政府真诚的信念。问题在于犹太学生：他们比别的男孩们更有能力也更富裕，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过多的零花钱，他们无礼、自以为是、丑陋、炫耀，人们怀疑他们以不公平的方式和别的男生交换邮票。他们往往自以为是，勤勉过人，不和别的孩子玩耍。这就是我在这里看到的总的氛围。政府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政策：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行使一下正义，仿佛没有委任统治权，只有两个容易激动的民族，他们都高度缺乏理智，不诚实，企图欺骗政府。当然犹太人一点也不让人省心，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可能存在单纯的动机。如果一位英国官员取消了约见去打网球，这不会被看成是普通的无礼，而是被看作和殖民局之间复杂的勾结，于是犹太人立刻采取相应措施。这些，当然，就没完没了地使一切复杂化了。在大多数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人看来——在我有些亲戚们看来依然如此——法律制定出来仅仅是为了被规避的。我遇见一个愤怒的男人，当地护照机构挑剔他护照的漏洞，因为护照上他五十三岁，他的妻子五十四岁，而女儿是五十九岁。他申辩说，在俄罗斯，每个人都提高自己的年龄好避免征兵，这样的理由对女人来说有点奇怪——他解释说由于男人提高了年龄，女人为了和他们一致也提高了自己的年龄。当他的申辩被认为是令人不满的答复时，他很愤怒，非常愤怒。但即便有这种情况，那些官员们的态度还是冷漠、无礼和不公正的。一般的官员或是像我所遇见并且谈过话的米尔斯那样，是不满、忧郁、忿恨而聪明的失意者；或者就像热切、愚蠢地寻找上帝的年轻传教士，什么也不懂，以为会见到这里的人们举止殷勤谦恭而泰然自若。他们想去黄金海岸，因为那里人们非黑即白，身份和责任都简单明了。我遇见了许多后一种类型的人，并和他们一起去死海野餐，那里美丽而动人心魄。苏格兰犹太人的“卡利亚”咖啡馆使风景大为减色，那里有肥胖的阿拉伯人领着新入境的德国犹太妓女，缓慢而且带着压抑的兴奋感，走进肮脏的水中，走进外约旦的杰拉什。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希腊式城市，到处都是留着长须的古怪的切尔克斯人，我一度以为切尔克斯人都是女的。杰拉什离安曼不远，阿布杜拉

埃米尔<sup>1</sup>住在那里，那是一座装满了古板的维多利亚时期小饰物的宫殿，一幅巨型歌手牌缝纫机[原文如此]广告贴在宫殿背后。在这些野餐会上我真正了解了他们，他们高贵正直，相当快活，但是在巴勒斯坦他们是不被接受的：过于简单愚蠢，缺乏耐心。他们说他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很神秘，但是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犹太人的有趣和可爱要甚于他们的粗俗，另一派的观点相反。至于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最奇怪和最迷人的，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不自在，不和他们在一起也觉得不自在，就像那些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亲戚，你知道甚至感觉你和他们是亲戚，但是你又从未真正认识他们，你害怕他们，又必须以一种奇怪的熟悉的方式对待他们，即使你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害怕他们。耶路撒冷是最美丽的城市，你会同意这一点，圆顶清真寺的美难以名状，老城区就像《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景象。小毛驴、铃铛、慢条斯理地干活的制陶工、灯光昏暗的洞穴、蒙着眼缓慢地拉着磨磨芝麻的骆驼，这一切都会让最狂热的中世纪研究专家感到高兴。有时候阿拉伯人非常美丽，他们就像学生一样你插我一拳、我插你一拳；犹太人严肃一点，在德国人的新公寓区，他们克制而出人意料地流露出高贵的快乐心情。特拉维夫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我印象中的克朗代克一样，到处是淘金的人流，整座城市从各种意义上看都建在流沙之上。这里的人打电话比纽约人还勤，虽然只有十万多人，生活节奏却像一座有六十万人口的城市，炎热，黏乎乎的，海里挤满了人，你都看不见海了。德国难民到处都是，他们腋下夹着公文包，在所有的地方做生意——咖啡馆里、公共汽车上、洗浴房里、海里，所有地方，除了他们的办公室。警察们像挥动指挥棒一样挥着棍子，让车流停下来，冷静的时候他们说希伯来语，但激动的时候就大声而充满激情地说意第绪语。汽车司机都在大声嚷嚷，提出建议，咒骂，像已经黎凡特化的希腊人或者叙利亚人那样大笑。车流突然又被一支长长的骆驼队拦住，这样的景象美得就像旅游广告，领头的是一个小小个子波兰犹太人，戴着一顶黑色的圆顶高帽，对骆驼发出恰如其分

---

1 阿布杜拉·伊本·侯赛因(1882—1951)，1921—1946年为约旦埃米尔，后来成为外约旦国王(1946—1950)，而且是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国王；在耶路撒冷遇刺。

的阿拉伯式吆喝，这是他一夜之间学会的，后面跟着一群官方知识分子，有诗人、编辑等等，一个漫步中的学园，争论着造出一个新词汇的可能性，等等，等等。难以置信，就像在俯瞰摩押群山和死海的大学剧场里，用希伯来语演出的佩尔戈莱西的《管家女仆》<sup>1</sup>。佩尔戈莱西一定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剧本用希伯来语来演出的命运。后来我参观了一座十字军教堂，用磕磕巴巴的法语和一位无比斯文的修士聊天。你看我正在跑题，我的脑子里装了太多印象，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到殖民地，或者是北方的瀑布区，或者是加利利海，以及《圣经》中那座令人难以置信的被拯救的迦南城市和它的神秘传说。我得停笔和卡梅伦太太喝茶去了，我还要弄清楚弗兰克尔<sup>2</sup>是不是当上拉丁语教授了——投票就在今天。我一回来就接着和你再叙。

107

12月8日

有人刚刚带来弗兰克尔选上拉丁语教授一职的消息，真是好极了，至少是暂时，所有黑暗力量都被打败了。我刚刚给德国的莫里斯发去电报：他读了布希奥斯的来信感到非常高兴和有趣，同样读了来信的罗伊、西尔维斯特·盖茨<sup>4</sup>、艾耶尔等人也是，大家觉得“热爱生活的希腊人”很好。莫里斯愿意为任何人写任何东西，如果报酬很高，他这么说。能够开得起这样的玩笑是好的。同时艾耶尔越来越忧郁了<sup>5</sup>，勒内肯定不能继续在牛津生活

1 《管家女仆》，传统意大利短小喜歌剧，这种剧主要在大剧的幕间演出。该剧由乔万尼·巴蒂斯塔·佩尔戈莱西（1710—1736）作曲，杰那若·安东尼奥·菲德里克（卒于1745年）编剧。1733年第一次演出。

2 艾德瓦德·戴维·莫蒂尔·弗兰克尔（1888—1970），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1935—1953年任牛津圣体学院拉丁文教授。

3 希腊学生巴西尔·尼古拉斯·海伦纳葛拉斯·布希奥斯1934年11月5日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20世纪教育界领袖”，写了一封带点喜剧感的信，请他参与编写一本关于古希腊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的书。法兰克福特12月8日回复，推荐鲍拉是更适合的人选，同时给柏林寄去往来信件，请他确认鲍拉是否留意此事，并建议“在一个亲密的小圈子内，比如说罗伊、西尔维斯特·盖茨和艾耶尔等，一起阅读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

4 西尔维斯特·格威特·盖茨（1901—1972），英国专门律师，（后为）银行家。1925—1927年任哈佛大学联邦基金研究员（国际私法），时为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学生；1941—1944年任英国情报部国内宣传部门负责人；1944年，被委派至重建大臣办公室。

5 艾耶尔希望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得到的奖学金被授给了弗兰克·帕肯汉姆，而他的讲师职位只能延续到1935年6月，由于看不到可以得到更好的哲学方面职位的确切前景，艾耶尔正在考



了, 不管发生什么, 她将住在伦敦, 让弗雷迪选上极为重要, 如果现在被排斥他就会被彻底毁掉——唯一的出路就是得到美国的教职: 也许有些进展了? 那么这对他、对文明、对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有益的(以此顺序), 如果

108 他能够在美国某个地方得到什么, 他们立刻就会来, 我想即使是和他最对立的敌人现在都会认识到他的确很好——即使那些四五个月之前否认这点的人也不例外。你很快就会见到弗兰克尔, 他真的很优秀。我有次问他对莫里斯怎么看, 他很快回答道“他是一个非常博学和温柔的人”。当听到别人使用具体的形容词, 而不是像“迷人的”、“可爱的”或“很好”这样的模糊通用词语, 你知道, 牛津人是会微微发抖的。弗兰克尔会告诉你, 所有人都因为艾耶尔家的状况而感到烦恼, 他将直接继承基督教堂学院的智慧和才华, 而我就得不到。罗伊坚持要把他的一些作品寄给怀特海<sup>1</sup>: 重要的是, 这些成果理应得到赞扬, 也许你能够解释这种情况, 这件事比我们的任何人所必须经历的都要严酷。我不知道为什么弗雷迪要受到这样的惩罚。不论怎样, 我希望你能为他做点什么, 也许为他推荐一个哲学职位——除了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价值, 他比一般的在职哲学老师都更催人上进, 或者为他说点什么, 以免怀特海把他当成一个有着不良思想态度的枯燥无味、生硬渺小的诡辩家而将其弃之不用。这真的很重要。而且——我如此声泪俱下, 简直就像在为自己写一封恳求信——你是他在美国唯一的朋友。

回到关于巴勒斯坦的话题: 住在殖民区的人要比那些快活的小个子城里人更英俊、更坦率、更有趣、更稳定, 在危机中也更可靠。我非常喜欢和那些来自俄罗斯的前社会民主党人谈话, 他们是老式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不管怎样, 他们真的是白天在地里干活, 晚上阅读诗歌, 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却一点不让人觉得他们附庸风雅、装腔作势、令人难以置信。我从来都没有如此喜欢过一群人, 虽然我不能生活在他们中间, 他们太高尚、太单纯、太压抑而又太可敬, 但探望他们的经历令人愉快。

从朱迪亚陡峻的红色山脉到相对丰饶的撒马利亚起伏地带的旅途本

---

虑改行, 虽然他正非常投入地写《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

1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861—1947), 英国数学家, 1924—1937年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身就很有趣，人们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各族系是如何形成的。所有的出租车司机谈论的尽是他们走私贩运非法移民时有多么勇猛，以及手中有多么便宜的土地可以出卖，他们的外表和举止都像西西里的匪徒。叙利亚是个奇妙的地方：大马士革肮脏邈邈，但是在巴尔贝克、贝鲁特和通往南边的大路上，左边是黎巴嫩绵延的绿色壮丽山坡，右边是大海——真的是这样美丽，以至于我这样有眼无珠的人都彻底地感到惊叹，停下来不说话了，即使像福斯特这样讨厌大自然的人都被打动了。西登是最可爱的渔村，红色和黄色的船帆在深蓝的海面漂浮，渔夫们头上包裹着雪白的头巾，把刚捕获的一网网鳞光闪闪的海鱼倾倒在岸上——对我本人而言，我变得诗意了，因此感到难为情，该适可而止了。我的确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我所遇见的最快乐、最有安全感的。我并没有感到和他们有血缘上的绝对联系，唉，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我肯定就会有那样的感觉了。我得走了，要赶火车，等过几天我会再接着写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更严肃，更不带个人色彩，写政府、大学和越来越地中海东部化的人们，但是现在我得停笔了。

109

谢谢斯彭德的书评<sup>1</sup>：就连《纽约客》都开他的玩笑，没有人希望遭受如此过分的嘲笑。我真希望你能信守诺言，6月份来这里。请来吧，我在学期结束之后在这里待上多久都可以，如果你来，我会等你，我庄严承诺我不会编出荒谬的借口缺席，而是待在这里，你所有的朋友也一样。关于他们消息不多：莫里斯坚定地安下心来，说服自己研究中世纪；罗伊在和玛丽·斯都普斯博士<sup>2</sup>通信，谈论关于生育控制的问题；里斯已经放弃研究，现在在《泰晤士报》任职，可真热闹啊；克罗斯曼又在试着出卖他的灵魂了，但是即便是在相信他拥有灵魂的人中，他也没有找到买主。

我为自己的长篇大论道歉，这封信东一榔头西一棒，内容又空洞。我希望我能写一封更好的信，我很快就会试着再写一封。弗兰克尔刚才自己打来电话，他不能去美国，他说那些老家伙不让他去，为了投他的票，他们已

---

1 关于斯彭德作品的评论还是斯彭德所写的书评？此文无处查找，《纽约客》的玩笑也无从查找。

2 玛丽·夏洛特·卡麦克尔·斯都普斯（1880—1958），科学家、性改革家。

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所以现阶段他不能制造摩擦。

6月一定要来，我很抱歉写了这么封信，我甚至不能把它重读一遍，它传达的意义是这么少。

爱你的

沙耶

### 致玛丽·费希尔

[1934年，前六页遗失]

全灵学院

[……]至于基希小姐<sup>1</sup>，我希望她的文章对你而言能够像它们对我一样，是新奇信息的宝库。她真可以写一本关于哲学奇事的书，但我觉得她有关历史的文章非常出色。她过去常常笨拙地挑动布莱克威和我相斗，最后反而是我们两人互通意见，联手将她逼入困境，这是最迫不得已和令人不齿的行径了。

“小宝贝”每天早上都看《泰晤士报》，她告诉我可能会有考克斯先生<sup>2</sup>的讣告。我非常粗心，什么消息都会错过，如果这真的发生了，你能告诉她吗？我对我从未见过的人没什么感觉：除非他们的确非常伟大，我刚刚收到他<sup>3</sup>写的一张善意而愚蠢的便条，里面流露出带有死亡意味的欢乐情绪，我希望他没事。除了一次茶会的片断之外，这里没有什么新闻，茶会上的客人有：奥托琳·莫瑞尔夫人<sup>4</sup>，但是我还没有充分核对信息，好细细描述此事。一等积累了足够的素材，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寄给你一篇花边小短文，不然我的日子就过得正气凛然、波澜不惊了（这个学期末真是累死

1 伊夫林·迈拉·基希(1912—1945)，1931—1934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古典文学专业，1933年在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之后转学音乐。

2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父亲正在弥留之际。

3 即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4 奥托琳·薇奥莱特·安·莫瑞尔夫人(1873—1938)，戴维·塞西尔(下文第182页注6)在《英国名人辞典》中描绘她是“一个波希米亚人和知识分子圈子的中心和女赞助人，圈中人包括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她曾经的情人伯特兰·罗素。

人),直到我7日去佛罗伦萨,在那里见到盖伊<sup>1</sup>。我对他很和气,因为他受到了最差的待遇,却抱怨最少。

星期三我和迪克一起坐火车回伦敦,遇见的那位戴着无框眼镜、坐在餐车角落的老夫人就不同了。迪克很大声地用德语引用他的纳粹朋友所说的话,接着为了强调真诚的情感还以手捶桌,老夫人见此就没有目标地抱怨道“我希望外国人在英国的火车上要注意言行”,然后她的脸就涨成猩红色,一头扎进菜单中,极其难为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迪克,但是,我想他既没有听也没有听进去。

我从来不知道林德太太竟然这么迷信,但确有其事。“小宝贝”的蛋白石耳环或是别的首饰得扔进白石池<sup>2</sup>,让她的女儿们感到烦恼的是,她的脸颊突然就好转了。

你的  
沙耶

我没有从头再读一遍,不过你是非常慎重的。

111

致玛丽·费希尔

[1934年12月16日之后]<sup>3</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显然你喜欢巴黎,我真的好羡慕你。我已经开始热爱这座城市。我强烈地想听到关于拉兰德先生<sup>4</sup>的外貌和个人习惯的介绍。请感谢我先前的学

1 盖伊·爱德华·法夸尔·\*奇尔弗(1910—1982),1932—1934年就读于默顿学院古典学专业;1934—1963年任女王学院研究员和讲师。

2 位于伦敦西北3区汉普斯特的一处水库。

3 在圣诞节假期,玛丽·费希尔拜访了巴黎的雷切尔·沃克和她的法国朋友。

4 安德烈·拉兰德(1867—1963),自1904年起为巴黎大学教授,科学哲学家。

生<sup>1</sup>，谢谢她所写的庄重、友善、文雅以及措辞得当的便条。唉，我刚刚冒犯了赖尔先生，我在一场婚礼上遇见他，他把头埋在双手中，看上去非常虔诚和感动。事实上他是感到厌烦，而且（真的）睡着了。我认为他的手势和表情总是不知不觉地传递比实际内容更加丰富的意味，使人更加迷惑。不管怎么说，当别人问我为什么不想和他一起去婚礼后的招待会时，我说我的衣着不够好，只有在说那话时，我才注意到赖尔先生穿着色彩艳丽的格子衣服。赖尔先生脸红了，生气地说“你衣着没有问题”，然后离开了。我要请他吃饭，请一定来。

关于弗兰克尔的消息太棒了，他冲进我的房间，感谢我给他写信，他非常感动。你是否看到《每日电讯报》上登出的针对他的那些可恶的信件？先是一个叫阿瑟·J.M.科恩的卑鄙小人，他像英国犹太人和老牛津人一样被感情用事的因素占据了头脑，而反对牛津所做的决定；而后一位梅小姐，其实就是雅利安人，但是跟巴勒斯坦有点血缘联系，恰当地回应道，一个英国犹太人要向后倾斜很大幅度才能够看起来比较挺拔。<sup>\*</sup>我赞同这样的情  
112 绪。<sup>2</sup>不论何时如果你得到一本巴林<sup>3</sup>写的书，不要告知收悉。

#### 社会新闻：

1. 我确实看见盖伊和欧佩<sup>4</sup>小姐显然是在进行热情而友好的谈话。这

1 雷切尔·沃克。

2 这个通告在12月13日的《每日电讯报》第16版登出，标题为“德国人当选牛津教席：纳粹难民营”，文章开头是这样的一段话：“牛津大学依照有关建议采取行动，在有才华的学者被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大学拒之门外时，有人建议应该在英国的大学里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职位。”直到1933年辞职前，弗兰克尔一直都是弗莱堡的教授，他现在接替A.C.克拉克担任圣体学院拉丁语教授；阿瑟·科恩的来信是在12月14日第14版上登出的，D.H.C.梅的来信在12月15日第10版上刊登。多丽丝·赫敏·克洛克斯顿·梅（1899—1968），1917—1920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现代语言专业，1929—1948年任哈伊姆·魏茨曼的秘书。她的来信开头是这么说的：“一个英国犹太人要向后倾斜很大幅度，才能够看起来十分挺拔，如A.J.M.科恩先生……”12月17日第9版，还有三封支持梅小姐的来信。

3 莫里斯·巴林（1875—1945），英国外交官、记者、作家，写过小说、评论、散文、诗歌和一本自传；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俄国革命前是忠诚的亲俄分子。伯林对他写的书甚为推崇。

4 阿米德·莱昂内斯·托勒马奇·欧佩（生于1910年），1928—1932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古典学专业，雷切尔·沃克的妹妹玛丽的朋友。

时，一位瑞士外交官，也是法国神秘主义者比画着手势，对我慷慨陈辞，评说基督徒圣约翰（被称为圣让·德拉·克鲁兹）和J.伯麦<sup>1</sup>之间的差异，他手舞足蹈，许多温切斯特学院的人还有爱德华都咯咯直笑，我感到无助和尴尬。

2. 佩吉·杰伊相信一个有关她的不好传闻正在“到处流传”，她正在试着查出是什么传闻，要找到发布传闻的源头。她见到博厄斯<sup>2</sup>，问他这个可怕的传闻是什么，然而他立刻就向她抛出九套赞美之辞。她真的觉得受到了令人愉快的恭维。坦白地说，其实这是我开的玩笑，没想到这玩笑开得很值得。

3. 奇尔弗小姐和戴维森先生<sup>3</sup>，我的天，据说订婚了，要结婚了！但是这是个大秘密，谁也不该听到。如果消息属实，这桩婚事是非常中庸而平衡的，目前为止不会招致什么反对。我得赶着收邮件去。好好过圣诞节，你母亲送我铅笔，这让我很感动。

你的  
沙耶

\*鲍拉先生在柏林狂喜不已，他说某种巨大的打击就要降临，这可太好了。

---

1 基督徒圣约翰（下文第324页注3）和神秘主义者雅各布·伯麦（1575—1624）。

2 托马斯（“汤姆”）·谢里尔·罗斯·博厄斯（1898—1974），1922—1937年任哈特福学院研究员和历史学导师（教授并考核詹妮弗·威廉斯）；1937—1947年任伦敦考陶尔德美术馆主任。据伯林回忆，他“有一只玻璃假眼，不时会流泪”（与布赖恩·哈里森的访谈，1988年4月25日）。

3 普丽西拉·奇尔弗在1935年确实和布赖恩·戴维森（1909—1995）结婚了，戴维森1928—1932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后来成为律师。

致詹妮弗·威廉斯<sup>1</sup>

[1935年1月下旬]<sup>2</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F.-W.小姐：

我和你同样相信，如果可能，我们的书信往来所遵循的那些精细微妙  
113 的原则决不能坍塌。另外，我也同意有时候即使只是有那样的企图，也会使  
人陷入无限沉闷的矫揉造作之中。因此我直接更新和确认我的请求，请你  
下个星期六和往常一样来吃午饭，尽管我不再能保证A.史密斯先生一定能  
来（我只是刚刚得知艾里克·布朗的存在）<sup>3</sup>；或者，由于你对年轻人的狂妄  
无礼深为遗憾<sup>4</sup>，因此我恢复谦恭有礼的教养，这里，我宣布我怀着迫切  
的心情盼望着你的到来。至于有趣的信件所占的比例，我能说什么，你又希  
望我说什么呢？除了赞赏你为这个媒介所作的贡献，什么言语也没有了。的  
确，我非常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你要传达的含义：剩下的只有不完全令人愉  
快的模糊的“同情”<sup>5</sup>，一种轻微的受迫害感、博厄斯化、博厄斯性、博厄斯  
症。<sup>6</sup>而且我还知道，在所有的人中，你是知道这种现象和它的灾难性影响的。  
因而，我不能宣告你的所为出自无辜的动机，从而徒劳地问自己，是什么  
使我成为了这样的行为的目标。<sup>7</sup>但这是一种非常短暂的感觉，很快就消  
弥无踪，这是一个规律，到明天我就会完全恢复。但是任何萦绕于心挥之  
不去的东西都是烦人的。你一定同意这一点。

你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1 詹妮弗·玛格丽特·威廉斯（1914—2005），1932—1935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历史专业，1936—1947年任公务员；1941年与赫伯特（H.L.A.）·哈特结婚，是伯林一生的亲密朋友。

2 詹妮弗·威廉斯的回复日期是1月31日。

3 可能是艾里克·约翰·查尔斯·布朗（1900—1962），革命社会主义小说家、诗人和翻译家。

4 据詹妮弗·哈特称，这里提到的是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

5 伯林此处原文为：nachgefühl。

6 指的是汤姆·博厄斯，詹妮弗·威廉斯的导师和主考。

7 詹妮弗·哈特记不得是什么事了。在这里和别的地方，（她认为）也许指出这点有助于理解信件内容：伯林生活中，尤其在这个阶段，有一点夸张的倾向，至少是在通信中，所以一些小插曲也会被他描绘成意义重大的事件。

致詹妮弗·威廉斯

[1935年2月初?]

全灵学院

亲爱的F.-W.!

由于我极不愿令人难堪,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故态复萌,回到了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你提议要引发一些小争执,对这样的想法我是要斥责的。我的意思是,即使你是对的,而且有必要使用这些手段,我还是不愿实施,因为它们干扰人们的平和心态,而且也不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至于暂时中止我的习惯,即沉默节制同时又轻松自如,我只承诺会这样做,因为我猜想这样的做法会遭受你的批评。我打算接受你的批评,认为它们是公正的,并采取相应的修正行为。但如果你得到了失实的报告,或者,这样的限制导致不可预测的抑制产生,我只会非常高兴地恢复我所熟悉的喋喋不休的方式。由于我低沉的嗓音,现在这种方式在新学院院长那边很是奏效,比较令人心旷神怡的个性反而不成功。我必须指出A<sup>1</sup>是阿利克而不是艾里克:这个名字不仅怪诞,甚至有点儿传奇色彩(诗人普希金写过一位叫“爱雷克”<sup>2</sup>的吉普赛英雄),但极其非政治性。很高兴你看到了他的性格之美。希望你分担我的愤怒,如果你看到有着如此敏锐鉴赏力的人却被新学院现任统治者如此对待<sup>3</sup>,你会感到这一切是惊人地熟悉。显然,从你所采取的行动看得出你确实注意到了谈吐方式,它使我一下子退却了(参见)。真的非常高兴你要来。

你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1 即“A.史密斯”(见之前的信件):关于阿利克[原文如此]·史密斯,见上文第92页注1。

2 在普希金著《吉普赛人》(1824)。

3 R.H.S.克罗斯曼,副院长,在费希尔因病休假期间代理院长一职。



此时，伯林已经习惯于一种生活模式，但是据他回忆，“教授哲学和研究马克思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相距甚远，我过着两种生活”。<sup>1</sup>他对卡尔·马克思的探究是费力的：

我读了大量资料，因为我总是非常紧张，生怕自己无知。所以我坐在那儿如饥似渴地一卷接一卷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语原著<sup>2</sup>，我的德语不好，要查字典，但是如果我可以读到任何译本，我就读，和我在学校时利用对照译文的方法学习一样。这个版本到了1933年就停印了，希特勒下令的。然后它开始以俄文出版，我从苏联的书店里面买到了几卷，所以我读了他的所有著作，全部，而且记了笔记。

作为对比，这里是一个牛津教师的日常生活：

我住在学院里，平日教书，每天五个小时，早上和下午，我和奥斯汀谈话，他是在我之后一年选上的。我和他一起散步，或者和莫里斯·鲍拉，或者和别的朋友。我每晚在全灵学院吃饭，平日吃饭的人有七八个，周末约有二十五个。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我绝对是个牛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更能融入牛津的机制，绝对如此——牛津的学术生活让我感到非常自在舒适，而且我非常非常学究气，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个超级牛津人。我和别的哲学家很友好，我过去常常见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也很舒服，我们谈论同样的题目。我过去常常和赖尔吃晚饭，或者赖尔和我吃晚饭，我会邀请哲学家们一起吃晚饭，或者一起喝茶，或者我在布莱克韦尔<sup>3</sup>书店见他们，和他们谈话。但是我主要和伙伴们在一起，过的是纯粹的教师生活，我不了解这个大千世界，不常去伦敦。在伦敦，没有谁请我出去吃晚饭。我不去乡下。这样的活动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才发生。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录音之8，上面的前言中还引用了该录音其他部分的内容。

2 伯林此处原文为：Ausgabe。

3 牛津主要的书店，1879年由本杰明·亨利·布莱克韦尔建立。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三 [1935年3月13日] 下午2: 30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你没有接电话,就像你声称打我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一样,三分钟前就是这样。许多天来,我一直有充分的理由想见到[你],我能否星期天来?你会在这儿吗?星期五我本来是愿意来的,可是我周六有课,为此,每个星期五我都处于迷糊状态,不过还好,这个星期六是最后一次课了。<sup>1</sup>上一次课,在我讲完关于同情的主题之后,一个男人走过来,安静而高贵地问:“那么怜悯呢?”我很感动他也关注这个题目,从那时起他就盯上了我,给我寄便条,告诉我他自己的经历。如果说我从事什么职业会比较危险,那就是当精神分析师,因为我没有识别力,我会快乐而冷酷地践踏人们较为细微的意思,所以我要结束和他的通信,但是这很令人烦恼。我可以星期天下午过来吗?如果你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之间的任何时间打电话过来,我总是在的<sup>2</sup>,而且下午5:30到7点之间我也基本都在。我得向你叙述一下莫里斯星期六晚上喝醉后如何胡闹。我在通读斯蒂芬·S.写的一本评论亨利·詹姆斯和艾略特等人的书的校样<sup>3</sup>,书的一些部分是不错的,但是整本书十分晦涩、非常说教、极端抑郁,而且容易诱发内疚感。晚会的快乐在你走后也结束了:斯帕洛和里斯两人之间的无礼态度令人无法容忍,里斯喝得越来越醉、越来越好斗和粗俗,斯帕洛则变得越来越卖弄学问、越来越不随和、越来越令人不快。希望这话最好别传到他们的耳朵里。

爱你的

沙耶

116

- 
- 1 以赛亚·伯林关于“休谟的道德观”的系列讲座安排在全灵学院该学年第二学期,星期六上午10点开始。最后一次讲座约在该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六,3月16日。
  - 2 和J.L.奥斯汀讨论哲学,他大多数早上都是如此安排的。
  - 3 斯蒂芬·斯彭德所著的《毁灭性元素:现代作家及信仰研究》,1935年4月由乔纳森·凯恩于伦敦出版。

致约翰·希尔顿

星期二，最有可能是3月14日 [1935年3月14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约翰：

你怎么能够这样沉默呢？这么多崭新和强烈的印象一定使你想说话<sup>1</sup>，因此你的沉默是由于我的压抑，而我其实并不怎么压抑。我保持沉默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里正在进行着某个策划，或者说是在小题大做，即为了向国王陛下表示敬意<sup>2</sup>，我们是否应该在全灵学院上空悬挂一个闪闪发光的乔治国王，如果要挂上一个，要不要用红灯，或者我们能否像皮卡迪利大街那样使用电子招牌，国王在招牌上面每隔五分钟就脱下他的高礼帽致意，与此同时，一只机械的绿头鸭子，我们学院的标志，就“嘎”地叫一声，要么，使用泛光灯是不是就可以了，国王对我们来说值多少钱，200英镑，或是只有2.1英镑，或是一文不值？而如今你和佩吉正过着美好的生活，叛乱<sup>3</sup>是否对你们有所影响？塞浦路斯人是不是就像这里的罗纳尔德·斯多尔斯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评论那样，既是肆无忌惮、令人厌倦的，但又从来都不乏味？你有没有摆平或者压制住噶尼斯先生？诸如此类。

我们正处于选举教授的混乱时期，哲学教授J.A.和乔奇姆要走了，科林伍德和普莱斯成为核心，这个劳动力市场就像一只水母一样收放伸缩，逻辑实证论者布雷思维特和艾耶尔等人正在到处制造混乱。<sup>4</sup>我让斯特宾

1 约翰·希尔顿1934—1936年是塞浦路斯的古迹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于1934年秋和妻子一起来到塞浦路斯，受命（在试用期）负责建立和指导古迹管理部门的工作。罗纳尔德·斯多尔斯爵士（1881—1955），1926—1932年任塞浦路斯总督和最高统帅，在他离岛时，任命他的副师长鲁伯特·噶尼斯为“古迹视察员”。斯多尔斯也曾在巴勒斯坦和罗得西亚供职（1917—1926年担任耶路撒冷总督）。鲁伯特·福布斯·噶尼斯（1899—1965），古文物收藏家、艺术史学家，著有《历史的塞浦路斯：村镇、寺院及城堡指南》（1936）和《英国雕塑家辞典，1660—1851》（1953），经常让希尔顿苦恼。

2 1935年5月6日乔治国王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3 由希腊前总统艾留瑟里奥斯·温尼泽罗斯发起的未遂政变（3月12日被挫败）。

4 “J.A.”是约翰·亚历山大·史密斯（1863—1939），1910—1935年任道德和形而上学哲学的韦

小姐<sup>1</sup>进入新学院的谋划也许会奏效。一位叫威斯登的先生<sup>2</sup>出版了一本杰作<sup>3</sup>，他在书中证明，如果一个人是决定论者，他就应该相信出生前的存在，117因为这个存在是由于一次偶然发生的、称为“出生”的事件而被不合理地中止了，他解释这个论点所引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的观点引起了别人的指责。与此同时，布罗德正在写一本从表面上看是关于麦克塔格特<sup>4</sup>的有趣的新书，一直在开不成体统的玩笑，如“这个可能性首先是罗素先生<sup>5</sup>提出来的，但是就像在为非婚生子建立幼儿福利中心的过程中抛弃了婚生子一样，他在为自己的不合理构想创立收容体系的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许多思想成果，而他也偏离了初衷，试图引诱一位叫做行为主义的诚实女人”。<sup>6</sup>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引述的，就是说我查阅过，但是没有很留心。路易斯·麦克尼斯在《新诗歌》上发表了一首有意思的诗<sup>7</sup>，人们对斯彭德的《维也纳》<sup>8</sup>大惊小怪：（最后记下来的句子是“现在我发现我爱女人我不再那么介意人们如何评论我的诗了”，还有“可怜的托尼[·海因德曼]，他是如此同性恋”。）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丑闻，我要让它流传。我明天要见的艾琳·莱昂小姐<sup>9</sup>是谁？我收到一封关于她的信，说她想谈谈

恩福利特讲席教授。哈罗德·亨利·乔奇姆(1868—1938)是逻辑学威克汉姆讲席教授。罗宾·乔治·科林伍德(1889—1943)接替史密斯，普莱斯接替乔奇姆。理查德·贝文·布雷思维特(1900—1990)，1934—1953年任剑桥道德科学西季维克讲师，之后成为诡辩论、道德神学和道德哲学的奈特布里吉讲席教授。

- 1 (丽吉·)苏珊·斯特宾(1885—1943)，从1933年起是伦敦哲学教授。
- 2 亚瑟·约翰·特伦斯·迪本·威斯登，剑桥三一学院道德科学讲师，1952年成为剑桥哲学教授。
- 3 约翰·威斯登：《心理与物质的问题》(剑桥，1934)。
- 4 约翰·麦克塔格特·埃里斯·麦克塔格特(1866—1925)，哲学家，他对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写了两卷本的《存在的本质》(剑桥，1921—1927)，布罗德因此写了两卷本的《检验麦克塔格特的哲学》(剑桥，1933—1938)。查理·邓巴·布罗德(1887—1971)是剑桥奈特布里吉讲席教授(1933—1953)，布雷思维特的前任(上页注4)。
- 5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1872—1970)，罗素伯爵三世，哲学家。
- 6 前引书(本页注4)，卷1，第61—62页：“没有人，就我所知，在罗素之前，提出这个重要观点，认为判断关系也许比并向量更重要；我认为，当他决定引诱一个名为行为主义的诚实女人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个观点，就像在为因非婚生的弃婴建立收容医院的过程中，抛弃了许多婚生子一样，他在为他的不合理构想建立收容体系的过程中，放弃了许多合理的哲学思想成果。”
- 7 也许是《伯明翰》，《新诗》第7号(1934年2月)，第3—4页。
- 8 一首1934年由费伯出版社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诗。
- 9 艾琳·奥古斯塔·莱昂(1891—1964)，哲学家，接受家庭教育并在罗马大学读书，1926—1930

Diamat\*, 墨索里尼<sup>1</sup>以“你”来称呼她, 她没有成为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的学生, 因为她“以罗马方式”<sup>2</sup>搞恶作剧。你听说过她吗?

夏天来萨尔茨堡吧。托斯卡尼尼将指挥《奥赛罗》, 还有交响乐, [布鲁诺·]沃尔特指挥其余的节目。西勒会说, 这将是天籁之音。你认识她的戴维[·华莱士]<sup>3</sup>吗? 他是一个坚定、可敬、可靠而又乏味的人, 除了对他的党有影响的事, 别的他什么也不谈。也许列宁也像他那样, 只是在苏联美学家关于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著作的页边空白处<sup>4</sup>, 他常常写个“哈一哈!”。告诉佩吉我爱她, 请来信, 这样我就可以更认真地写信了。<sup>5</sup>

### \*辩证唯物主义

---

年获玛格丽特夫人学院奖学金, 在那里获得文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伯林收到的信来自萨莫维尔学院古代史学家伊索贝尔·亨德森, 亨德森在信中特别写道, 艾琳·莱昂是乔万尼·秦梯利的学生, 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法西斯哲学的书《法西斯的血统: 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通俗论文》(伦敦, [1927]), 现在莱昂在罗丁中学教书。

- 1 贝尼托·阿米尔卡尔·安德里亚·墨索里尼(1883—1945), 1922—1943年任意大利首相。
- 2 “以罗马方式”, 这里伯林使用的隐喻来自烹饪术。
- 3 戴维·约翰·\*华莱士(1914—1944), 1933—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 1939年与普鲁丹斯·梅杰结婚, 在希腊阵亡。
- 4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Proletarskie kulturno-prosvetitel'skie organizatsii, 即“无产阶级文化和教育组织”)1917年2月成立, 10月被置于文化和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领导之下。它取代原有的按阶级划分的文化体系, 为苏联工人创建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教育体系, 虽然列宁经常批评它偏离了官方路线, 但这个机构一直持续到1932年。虽然伯林做了强调, 但是不能确定伯林了解某位美学家, 不过当时最主要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理论家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波格达诺夫(1873—1928), 他的著作包括《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1904—1924》(列宁格勒, 1924)。
- 5 这封信如果是完整的, 那它是没有签名的。

致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1935年3月20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F.F.:

非常感谢你的文件<sup>1</sup>。我认为，我同意每一个字。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你肯定是始终和身份较高的人生活在一起，但你说的话和我这样一般和下层人生活在一起的人竟十分相似。只有你能说得比其他人更好。我就不打算一一列举我所赞同的要点了，但是有一两点不同的意见我不妨提一下。也许它们不算是真正的不同意见，而只是侧重点不同。如果我卖弄学问、咬文嚼字，列举一二三，你会原谅我的。显然如果一个人态度很严肃，对卖弄学问的恐惧就成了最严重的恐惧。1. 英国人没有恶意，但是也并不仁慈。阁下也许是有同情心的，那三四个霍奇金、当地打零工的人、建筑师等，也许会试一下，并兴奋起来。其余的人出于本能排斥，如果他们确要采取什么建设性的策略，那也不是他们的本意，我的意思是，那是违背他们个性的，他们所做的每件事，不是屈尊俯就、不得以而为之，就是为了娱乐消遣，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斯多尔斯来这里，我想，他和马尔科姆<sup>2</sup>一起吃了早饭，并且对福斯特说（我当时不在这儿），犹太人大胆放肆，令人讨厌，但是却从来不乏味，从更低的层次上看，这是米尔斯<sup>3</sup>主义。在印度，有责任心和自欺欺人的公务员们都认为自己是某种“文化媒介”<sup>4</sup>；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显然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公务员们就无法营造道德的表象了。仅仅当交通警察是不太荣耀的，唯一可能的道德实现途径（所有传教士和温切斯特学院的学生们都拥有这种道德实现途径，除非他们其实来自我的母校圣保罗，相对要低人一等）就是把自己当成是阿拉伯人的保护者，抵抗被认

119

1 法兰克福特关于他1934年4月3—14日的巴勒斯坦之行的秘密报告（日期是1934年6月8日），他寄给柏林的副本保存了下来。

2 道格尔·欧尔姆·马尔科姆（1877—1955），古典学家，1899—191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24—1947年任英国南非公司经理。

3 关于米尔斯见上文第118页注3。

4 柏林此处原文为：Kulturträger。

为是不可抗拒地向前发展的犹太运动。这就像其他因素一样可能导致修正主义。卡普兰德<sup>1</sup>认为英格兰在那儿陷入了一场不道德的混乱局面，如果是卡普兰德来统治我，我也会变得暴力。显然如果托管意味着领土统治仅仅是让当时那里的居民实现自治，那么就没有正当理由让犹太人在那里定居了。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保证的重大权利、世界的利益，不会对阿拉伯人等带来伤害，从英国人的角度看，这是实行托管的真正道德理由，但它却不是威尔逊提出的途径<sup>2</sup>，虽然它本身是非常好的。只有当人们相信整个群体的移入是正当的，我个人才会相信它是正当的。普通的英国公务员对移入者只持有两种观点：要么恶意剥削，要么任其采取自由主义的自决政策。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不适用这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不管从哪一种政策的角度来看，犹太人都是令人讨厌的。所有思想崇高的牛津学者，所有巴利奥学院的“伦理学”<sup>3</sup>都会像那些人一样。除非派来一个视野更开阔的人，看出阿拉伯人真正的委屈——阿拉伯人说，他们强烈地希望自治，而不是被“犹太化”<sup>4</sup>，不论程度有多么温和——认真考虑这些委屈，而不是一些官员对他们的委屈让步，另一些官员艰难地忽视他们的委屈，还有一些官员鄙视他们的委屈，等等。当前在英国巴勒斯坦圈中相当强烈的负罪情结将会持续下去，它和传统政策一样，会导致决策缺失，以及对采取行动和特定步骤的普遍恐惧。至于犹太人，他们感到遭受了太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太快乐，太像占有者了，因而不能持有一种“超乎摩擦”<sup>5</sup>的立场，也不能解释他们的权利，而他们不仅仅揭露阿拉伯人是一伙收了钱的煽动者。当然如今的安东尼厄斯们和穆夫提们<sup>6</sup>是极度腐败的。但是只要再过十五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就会变成纯粹的、不可腐蚀的、十分残忍的法西斯分子。到了那时，事情就开始好玩了。除非现在做点什么，通过自我解释，否则机会就会

1 雷吉纳德·卡普兰德(1884—1952)，1920—1948年任全灵学院大英帝国历史倍特讲席教授、研究员。

2 这里指的是伍德洛·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

3 伯林此处原文为：Sittlichkeit。

4 伯林此处原文为：verjudet。

5 伯林此处原文为：au-dessus de la mêlée。

6 关于乔治·安东尼厄斯和穆夫提，见伯林1934年9月写给他父母的信件，上文第113—116页。

错过。而且，这么做而不被当成叛徒轰下台，对每个人，即使是对魏茨曼来说<sup>1</sup>，都是很难的事。劳工问题意义重大，你说得很对。

2. 不该雇用阿拉伯劳动力，但不是因为那些原因，骇人听闻的原因。政府的职责是制订某种社会法规，以削弱上流社会，并使人们不因为阿拉伯人更便宜而拒绝雇用犹太人，或者为了表示姿态而慷慨地雇用犹太人。以色列总工会<sup>2</sup>是相当可敬的一群人，我们的院长<sup>3</sup>会这么说，但是他们有官僚做派，略微有一点僵化。因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利益观是非常纯正的。

3. 修正主义者<sup>4</sup>是一群邪恶的人。他们的政治态度比那些中心人物更政治化。这就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具有灵活性、判断力和渐进观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如果持续得太久，人们就有可能变得冷酷厌世，变得很厌烦，变得习惯于温和而具欺诈性的“互相推诿”<sup>5</sup>，习惯于完全无所顾忌的政府。一个人，只有在不仅具备而且还时不时重申某些严格的原则时，才能保持(a)诚实(b)热情。巴勒斯坦劳工利益派不这么做。他们吹嘘机会主义，他们乐于被视为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梦想者。这没有吸引力且让人丧气。我希望你告诉他们别这样。为什么亚博京斯基就应该独具犹太政客们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的健全意识？也许规避法律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某些高层次的人能否清楚地申明他们的信仰，而不是陈述惯例和常规，不是攒一些印出来后令人反感、乏味、机械的东西，就像昨日新闻？

4. 为什么在巴勒斯坦就没有一个高层次的人？只有像施马尔亚·列文

---

1 哈伊姆·魏茨曼(1874—1952)，化学家、政治家，1921—1931年，1935—1946年任总统，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代理机构主席。

2 巴勒斯坦最大的犹太贸易组织。

3 亚当斯。

4 修正主义犹太复国党(利库德的前身)，1925年由泽耶夫(·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建立(下文第392页注5)，想要在约旦河两岸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占领整个托管的巴勒斯坦。该党采取的是军事策略，并拒绝让步接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愿望。这些强硬的政策导致修正主义者和渐进派劳动党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后者由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里恩领导。该党产生了两个军事组织，ETZEL(或是伊尔根)，由梅纳赫姆·别金领导，以及LEHI(利海)，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斯特恩帮，因它的创立人阿弗拉汉姆·斯特恩而得名。

5 伯林此处原文为：manus manum lavat。



这样和蔼可亲、有想象力的政论家，和像本·古里恩<sup>1</sup>这样有效率的煽动家？如果有什么是英国所尊敬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但是我认为这  
121 是不可避免的。

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语无伦次地一直说。你是很忙碌的人，总有事情缠身，不该让你从国家事务中分心，我们这学期要结束了，我感到很放松，无法收心研究伟大而令人头痛的马克思以及游手好闲却迷人的休谟。<sup>2</sup>当地有一些闲话，不过我还是要让你免受它们的干扰，我要继续和法兰克福太太说这些[事]，她比较有空，因此更愿意听这样的流言蜚语。

你这个夏天没机会回来吗？如果你能回来，我们都愿意放假后继续等你。

你的

沙耶·B.

4月，伯林和盖伊·奇尔弗一起拜访了雷切尔·“小费”·沃克<sup>3</sup>，他以前的学生，她在巴黎学习哲学。“小费”曾经向伯林表达过强烈的感情，但是此时法国哲学家让·卡瓦耶<sup>4</sup>刚刚向她求婚。在“小费”和她的闺中密友、当时也在巴黎逗留的玛丽·费希尔去法国南部度假之前，伯林、盖伊·奇尔弗和她们一起去听歌剧（贝多芬的《费德里欧》）。

致玛丽·伯林

1935年5月7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我又没有什么时间写信了，这很糟糕。我明天真得坐下来，给你写一封

---

1 后来以色列的首任首相，大卫·本-古里恩（1886—1973）。1930年以色列工人党成立，他是该党领袖；1935年成为犹太复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犹太代理机构负责人。

2 参见下文第301页注1。

3 见下文第845—846页。

4 让·卡瓦耶（1903—1944），法国哲学家，后来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被盖世太保枪杀。

像样的信。意识到周末的纪念日<sup>1</sup>爸爸将感到“很无聊”，用科洛尔太太<sup>2</sup>的话来说，所以我星期六晚是在伦敦过的。他似乎很好，看起来好极了，甚至很开心。牛津的街上挤满了人，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克制，显然在等着有人能做点什么。本科生和那些来自国外的人是如此不同，他们要更温和、更有礼貌、更愚蠢、更幼稚、更无趣、更可亲、更令人愉快、更容易相处，也更不会那么野蛮。我就是不理解，他们怎么能既有成为法西斯分子，也有成为共产主义分子的素质。所有的人，成年人和孩子们都如此幼稚可爱。我现在要和H.A.L.费希尔一起去听音乐会，我会很喜欢的。 122

爱你的  
沙耶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5年5月19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这么久没有给你回信非常无礼，但是我的确是怀着一份责任感来给你回信的，我只是不想像说话一样给你写信，也就是说，我不想把信写得零碎松散。黛安娜说你在南斯拉夫或是什么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寄到你的手里。不管怎样我在里面放了去萨尔茨堡的票，我订的。如果还想要，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话，写信告诉我，我会再买一些。唯一的差别是再买的票会差很多，但是这不要紧。你关于格奥尔格<sup>3</sup>的评论我认为完全正确，我想他是个非凡的诗人，他的《生活的织锦》<sup>4</sup>有时候是异彩华章，他其他著作中的奇特文字也是如此。关于你所引的段落，我的理解是，他是一个遭到迫害的夸大狂，即便是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为他做申辩，也不能回避

1 1935年5月6日是英国国王乔治登基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2 科洛尔夫人可能是柏林小时候的德语教师。

3 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

4 柏林此处原文为：Teppich des Lebens。即1900年格奥尔格出版的诗集《生活的织锦》。

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是一个持有使人反感的人生观或是实际上就遵循着使人反感的生活方式的人，他毁掉了许多朋友，他剥削他们，利用他们，等等，就像瓦格纳有时候所做的那样，不是像乔治·桑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仅仅使他们精疲力竭，或是像劳伦斯有时候所做的那样（我这是胡言乱语吗？），而是冷酷地利用他们，他这么做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他相信他具有这样的本性，或者至少，是出于他决心要承担的角色使命。

格奥尔格圈子的这种偏执，对里尔克<sup>1</sup>这样的人的彻底无视，这种廉价的个人权势，有时候的确会导致令人羞愧而又自命不凡的陈词滥调，或者甚至是纳粹主义。显然格奥尔格派们都忙着为他辩护，企图表明他并未造成这一切。但是甘道夫<sup>2</sup>和他的争吵，就是出于他认为可怕的政治和个人观点上的分歧。如你所说，他和叶芝都忙着支持正在崩溃和已经崩溃的体系。两个人的差异在于，叶芝这么做是根据他自己真正的自发想象，这样的想象看起来的确像是充满了神话学传统等内涵，而且如果没有拟古主义的东西，叶芝是不高兴的；然而格奥尔格就像瓦格纳，他并未直接感受到这样的情绪，而只是希望凭借智力或者情感信念来感知它们，所以，就像瓦格纳不得不问自己“什么是色欲激情？什么是妒忌？”，然后就煞费苦心地创作出精巧非凡、充满才华，然而却糟糕和不真实的结构体，这样的结构体只是一种释义，一种要描述自己从未得到过的体验的企图，是对他所不熟悉的东西的无限近似的模仿（威尔第则更天然地记录下他所了解的东西），所以格奥尔格创作出来的是俘获情感的口号，那根本就不是发乎内心的，都是第二手的创作，这似乎也是所有德国艺术家们的命运，就是歌德、席勒，虽然他们的创作确乎是直接而真实的，但有时候还是免不了如此而为。我猜想这是浪漫主义的部分特质，它能够通过虚假的东西幻想出来，只不过它们的人工斧凿痕迹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显然是低级的，以至于对更乏味但也更有自我批判意识的人来说，它看起来很奇怪，如此的创造天赋和

1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德国抒情诗人。

2 弗里德里希·甘道夫（1880—1931），德国诗人和批评家。

敏锐感受竟能和如此彻底的盲目并存，盲目到了错误地把对某种心理状态的渴望当成了这种心理状态。我说的全是一派胡言吗？可是如果不这么看，我就不知道怎么理解德国人了。我想英雄特质总是伴有可怕的愚蠢和听起来吓人的胡言乱语：非常小心严肃的法国人是避免如此的，宁可因此丧失了德国式的崇高。

换个话题：除了麦卡锡<sup>1</sup>写的那篇关于你的书的评论，别的书评我都没有读过。我能够明白他的想法，他是这么想的：我如此经常地和亨利·詹姆斯一起吃午饭，他是这么喜欢美食和富人，称他为共产主义者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一定很蠢。我不记得你对他的界定到了何种极端的程度：你说的是（也许我记错了），他对社会中的个人的分析，使得任何人读了他的小说都一定知道，社会是如此令人窒息，如此贫困，它需要来一次爆发，而后彻底改变。我想这说的没错，而且我认为，他看到了这些，他是个忧郁的作者，但我认为说他革命就不对了，因为他确实喜欢富人，喜欢和他们一起沉沦，当他看到太富裕、太粗俗、太残忍的人时，他所固有的新英格兰人品质就会促使他痛斥他们。但是他讨厌任何形式的革命，他有一种悲剧意识，但是不想寻求解决悲剧问题的答案。他是一个头脑清楚、饱受折磨、不抱幻想的反动分子。这就是麦卡锡想要声明的一切。他抱怨你没有提及萧伯纳<sup>2</sup>和威尔斯<sup>3</sup>，可是你为什么就要提到他们呢？每代人都有的官方讽刺作家和鼓吹者，这些人猛烈抨击那些更明显的反常事物。在这方面，詹姆斯和劳伦斯并没有大叫大嚷，不会像萧伯纳或是共产主义作家，或者甚至是维克多·雨果或是狄更斯那样有倾向性，而是表现了衰败的个人和社会，这是比短文和传单要严厉得多的指控。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没有使用形容词，或者引入明显的笑声和呻吟，读完萧伯纳—威尔斯，没有人体会到自杀

124

1 戴斯蒙德·麦卡锡（1877—1952），评论家、作家。这里提到的评论《毁灭性元素》的文章是《共产主义和亨利·詹姆斯：斯彭德先生的理论》，1935年5月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第8版。

2 乔治·伯纳德·萧（1856—1950）（即萧伯纳），爱尔兰剧作家、作家和社会主义者，他的作品通常体现了道德或者政治意义，1925年获得诺贝尔奖。

3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和社会思想家，见下文第172页注4。

或是发生暴力动乱的迫切需要。他们的信徒是像乔德<sup>1</sup>或是罗斯或是A.索尔特爵士<sup>2</sup>那样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的人物。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史作为宣传手段，远比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们，甚至是列宁的论著还要有效千倍，同样，詹姆斯的分析的杀伤力也远甚于在公众头上响彻的声声霹雳。所以我至少是这么认为的：麦卡锡看来像是个傻瓜，虽然我看得出他的好意。我想他说你的书比较松散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认为那是什么缺陷，虽然我猜想十年后你的书会有整体性。难道我没有把“斯宾诺沙派”校正为“莱布尼兹派”？如果不是这点，那么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想我已经这么做了，真令人羞愧啊。

T.E.劳伦斯<sup>3</sup>今天早晨去世了。他一定曾经是个有意思的人，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这么说：一个神秘的终结。可以说，他一定是唯一一个既著名又有价值的骑摩托车的人，这是有阶级觉悟的情绪。我很遗憾我没有在这个学院遇见过他，他总是大约凌晨2点才进来，差不多是我的入睡时间了。听说他很单纯，有魅力，我们也许能处得很好的。在你的书里，你说卡夫卡怀疑他的眼光，我还想更进一步说，他极尽所能地对此冷嘲热讽，拿这来开玩笑，就像由于人们非常熟悉某一处景物，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经常被提及、被嘲笑，以及凡此种种的对象了。这就是它之所以是如此清晰、如此慑人、如此自然而又不自然、如此天才、如此与众不同而又如此才华奇绝的原因。我不能再往下写了，我累坏了，我努力地工作，上很多课，就像是在香皂上  
125 面划火柴。

冯·特罗特在这里，谢拉·格兰特·达夫、黛安娜、伯纳德<sup>4</sup>，每个人都

- 
- 1 西瑞尔·埃德温·米钦森·乔德（1891—1953），伦敦伯克贝克学院哲学系主任、大众宣传家、哲学作家，因在广播节目《头脑相信》中回答问题时总是先说“这都取决于你的意思……”而出名。
  - 2 （詹姆斯·）阿瑟·索尔特（1881—1975），1934—1944年任全灵学院政治理论和基本原理格莱斯顿讲席教授兼研究员，1937—1950年任牛津大学（独立）下院议员。
  -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军人，强烈同情阿拉伯人的作家（1927年正式改姓“萧”）；1919—1926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据伯林说，他的加入是“想使全灵学院成为自由帝国主义的中心”，尽管“他从来没有在我在的时候来过学院”（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录音之8）。劳伦斯死于几天前发生的一起摩托车事故。
  - 4 查尔斯·伯纳德·斯宾塞（1909—1963），1928—1932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

在，这个周末我快要死了。《诺里斯先生》<sup>1</sup>让人很快乐。阿齐<sup>2</sup>说他不喜欢人家说他的下巴像六角形手风琴，说别的他同意。有关安排的事我还会写信。

替我向托尼<sup>3</sup>转达我的爱

沙耶

致斯蒂芬·斯彭德

星期三 [1935年6月26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我这封信写得很匆忙，你看，从此时起，我将开始连续一个星期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最后7月再回到这里连续工作五周，我盼望着这五周，无法跟你说我有多么盼望它。我希望能找到我留在同事 [伊恩·] 鲍恩桌上的你写的诗，因为我当时在那里听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会，然后它就不见了。我很快地读了一遍，记得不太清了，我甚至不记得读它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还有另外一份，我将十分感激。在《水星》上的那一首我非常喜欢，包括它的印刷错误以及所有的一切。<sup>4</sup>

---

诗人、教师。伯林在圣约翰街修PPE课程时，曾经和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起寄宿。伯林在1992年描绘他是“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句依然能在不止一部选集中找到 [……] 坚定的唯美主义者，路易斯·麦克尼斯的朋友和信徒”，引自1992年8月，第二学期，《牛津杂志》，名为“混合”的信件。

- 1 这里提到的是《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1935年出版，作者克里斯托弗·（威廉·布拉德肖—）衣修午德（1904—1986），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939年和他的亲密朋友W.H.奥登一起移民美国，像奥登一样，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这是有关20世纪30年代柏林的小说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再见吧，柏林》，1939年出版。
- 2 阿奇博尔德·亨特·坎贝尔（1902—1989），1928—1930和1936—1989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0—1935年任大学学院斯托维尔民法研究员，1935—1945年任伯明翰大学法学巴博讲席教授，1945—1972年任爱丁堡公共法瑞吉斯讲席教授；伯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奥登、衣修午德和奥登的其他在柏林的友人的朋友；同性恋者，波希米亚人；1930年将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介绍给奥登。
- 3 海因德曼。
- 4 斯彭德所写的《诗三首》：《一间小学教室》、《在晚上》、《放逐》，刊登在《伦敦水星》第187

126 费伯今天带艾略特一起来吃校庆典礼<sup>1</sup>的午餐，并介绍我与他认识。我认为他人很好，我想我和他的谈话太随心所欲了，我说得太快，又手舞足蹈地，如果你见到就知道我的样子了。他似乎想谈论严肃的话题，但是在那种场合，和主教、海军将军、勋爵们，还有我自己的客人们在一起，打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稀里糊涂地被淹没在美酒、谈话以及像托马斯·巴兹雷爵士<sup>2</sup>这样在草地上走来走去的白痴们中间。莫里斯不停地打电话来说他情绪很低落，或者告诉我最新的消息。每次他把最新消息告诉我，我就祝福他，因为这样的祝福对人而言肯定是坚定而愉快的支持，一种积极的调子，就像诗人勃洛克说每当他想到普希金这个名字，他就精神振奋，他说那是个快乐的名字。

奥登—衣修午德<sup>3</sup>的剧本不是非常好，其中插入的奥登的诗有一些的确很美，但是对话不够好。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觉得好玩，它也确实好玩，但不是非常好玩，有时候比诺埃尔·考沃德<sup>4</sup>或者吉尔伯特<sup>5</sup>的要好，有时候不如他们，在这个类型中绝非出类拔萃，可以和伯特·布莱希特<sup>6</sup>这样的相媲美，但是略有不及。我很生气，因为必须得这样：既然它很简单也很容易读懂，我想它应该有广大的读者群，所有的斯帕洛们<sup>7</sup>将得到一根新棍子，

号(1935年5月)，第8—11页。

- 1 牛津大学校庆典礼是牛津一年一度的夏季典礼，是牛津为给杰出人士颁发荣誉学位和纪念捐助者而举行的。典礼“Encaenia”一词是希腊语，意为“复兴和奉献的节日”，相当于“毕业典礼”的意思，源自拉丁语，许多北美大学学年中的重要典礼都使用这一名词。1935年，牛津大学夏季典礼在6月26日举行。
- 2 托马斯·(斯塔福·)巴兹雷爵士(1907—1997)，哈罗毕业生，1927—1930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普通学士)。
- 3 《皮下之狗：或者，弗朗西斯在哪里?》(伦敦，1935)。维斯坦·休·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批评家、散文家和剧作家；1925—1928年在基督教堂学院主修自然科学，后转学英文；1939年迁居美国，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
- 4 诺埃尔·皮尔斯·考沃德(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小说家、轻音乐作曲家。
- 5 威廉·什温克·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和萨伏依歌剧的歌词作者，阿瑟·(西莫尔·)萨利文爵士(1842—1900)为其谱曲。
- 6 贝托尔特(原名尤金·伯托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诗人、剧作家，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戏剧手法，尤其是他后期的作品，与其说激发了观众的情感，不如说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里，伯林可能指的是布莱希特的早期作品《三文钱的歌剧》(1928)，也可能指的是《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30)。
- 7 这里提到的是约翰·斯帕洛有争议的书《理智与诗歌：当代诗歌的意义》(伦敦，1934)。

这一回是用他们宣称的大众性来打败新诗人们，这是比晦涩难解还更有效的侮辱。我将非常乐于在萨尔茨堡见到你，我想那里会挤满了人。我一定会住在噶斯托霍夫酒店。《皮下之狗》的主要优点是它的可读性，但是它不够好，它甚至都不算是有野心的失败。不管怎么说失败（我很不安地意识到格言警句就要从我这里脱口而出）意味着没有树立很高的目标，却试着要说服自己（或者是愚蠢地认为）已经成功了，而实际上他知道自己还没开始呢。这是一种酸葡萄策略。为这本书辩护说它是联合阵线的一部分，我想那是骗人，感谢上帝我不必给它写书评。 127

替我告诉托尼我爱他

沙耶

你能否在你的账上再记上60先令？我记不住。

致玛丽·费希尔

[也许是1935年7月初]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有一班略微有些抑郁的学院研究员，外来的主考人，他们在公共休息室的时候总是设法要逗乐大家，精力充沛地使气氛变得活泼。在彭布鲁克的伙伴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很随和，讨人喜欢，我度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快乐的夜晚。如果佩尔斯是可信的，你也一样，据我所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表现出好奇心，想知道你是谁。我向托尼提议定在星期六，托尼承认在等你，但是我觉得让你自己来这里是失礼的。由于依照惯例不能公开探知一群人中的某一位成员的想象中的反应，或者就是知道了这种反应也不能泄露，因而无法获知他们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这一点总是显得那么滑稽可笑。同时，惯例本身是如此令人愉快而必要，为了得到快乐而质疑它们是错的：这使得对惯例本身的遵守越是无用，它们就越



是有价值。简单的结论就是，我希望你能够过来看看，待几天，如果来参加长时间的口试；或者多待些日子，如果是短时间的口试。这确乎是我对你说过的最晦涩难懂的话了。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得我用这种伪亨利·詹姆斯风格来说这么简单的事。我道歉。

你的  
沙耶

我真的和“小费”还有米尔·帕洛蒂<sup>1</sup>会面了大约六秒钟的时间。我们128 见面的时间如此短暂，所以顾不上难为情。

致玛丽·伯林

[1935年7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我现在工作勤奋而且顺利。这里绝对寂静，我偶尔见到佩尔斯（你有一次问他是不是我的学生）和你喜欢的哈迪。鲍拉先生要走了，生活很宁静。马克思具有非常典型的犹太性格。像我早先写信跟你所说的，他早年糟糕的诗作，他对社会的嘲讽，他的多愁善感、势利和学识，一切都和雅各布·夏皮罗<sup>2</sup>如此相似。二者甚至连反犹立场都相似。埃弗巴克小姐<sup>3</sup>又写信了，我想这一次我要再次忽略她的来信，或者正式地回复她。如果她想对谁倾诉心声，这不是我的错。我不是适合年轻女人倾诉秘密的对象，不喜

1 杰奎琳·帕洛蒂，雷切尔·沃克当时在巴黎的主要朋友，法国国家教育总监察官多米尼克·帕洛蒂的小女儿。多米尼克·帕洛蒂同时还是历史学家艾丽·哈雷维的老朋友。雷切尔·沃克经费希尔家人介绍进入哈雷维的社交圈，后者是哈雷维家的多年朋友。

2 雅各布·萨尔温·夏皮罗（1879—1973），纽约城市大学历史教授，写了许多关于知识史的书。

3 十八岁的希尔达·埃弗巴克主要是在1935年5月5日至6月27日期间从以色列海法给伯林写信。她说她的父亲是“你（伯林）母亲多年前的一位老朋友，来自里加”，并且补充说“我们三年半之前在伦敦见过你”。希尔达就在伦敦学习的事向伯林征求意见，但是后来由于经济原因选择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一个专业。

欢自己被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但是你可以指望我会采取行动，如果这太冷淡。你必须要有个“恢复期”<sup>1</sup>，如果是在8月初，我会来和你一起住。你要多吃点，这很清楚，否则你会很虚弱，也会很抑郁。我很好，爸爸似乎也很好，虽然他觉得烦闷。

爱你的  
沙耶

致玛丽·伯林

[1935年7月底]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非常感谢你的两封来信、贝多芬的“纪念品”<sup>2</sup>、你自己的照片（我发现很迷人），还有关于R.斯特劳斯的文章等。

我的工作仍然进展顺利。你提到马沙利克关于马克思的书<sup>3</sup>：我所认识的唯一提到这本书的另一个人，是耶路撒冷的施马尔亚·列文，他说这本书很好。我必须读到它，但是德语书尤其是大部头让我恐惧，这一本就约有四百页。也许你可以帮我弄一本带回来？或者寄一本过来更好。任何关于马克思的材料，即使是马沙利克写的反马克思的书，要从德国带出来都是不安全的。但是你能否帮我在卡尔斯巴德的书店订购一本，让书店寄给我？我会很感激的，你用克朗支付比我用先令支付要便宜。是的，牛津空荡荡、暖融融、喜洋洋的，一切都低沉而轻柔，就是谈话也变得暗淡无光。与此同时，有件事让我进退两难：最近发生了一起空难，一位五十五岁的纽豪斯先生遇难了，汉斯·纽豪斯，证券经纪人，他是不是威廉·马丁妻子<sup>4</sup>的父亲？

129

1 伯林此处原文为：Nachkur（经过在卡尔斯巴德的健康治疗之后，在此进行恢复休养）。

2 伯林此处原文为：Denkmal。可能是一尊小石膏半身像，伯林收集了许多这样的纪念品，有的他还漆成蓝色。

3 T.G.马沙利克，《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基础》（布拉格，1898）。

4 玛格丽·马丁，婚前姓纽豪斯，她确实是这场空难受害者的女儿。她后来（1962年）成为伦敦大

如果是，那我就要写封安慰信，如果不是，而我却寄去这封信，该多糟啊。我不知道如何证实这件事，但是我会试试的。我所有的学生现在都在接受口试，激动地冲进来告诉我们都遇到了什么考题。没有什么新闻，有一桩公共丑闻被揭露了，海军招待会上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有一张照片显示，法国大使给了葡萄牙大使一些冷豌豆，很滑稽。毫无疑问，现在有些重要官员要被免职。你最后决定在哪里度过恢复期呢？你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时期，我不介意这是否是当地医生扩充捷克国库的手段，它对你是有好处的。请不要急着回家，父亲很孤独，但是撑得住，我周末去看他。我现在必须走了，要去理发，我如今的外表十分体面。

爱你的，  
沙耶

我不知道斯特劳斯的儿媳<sup>2</sup>是一个犹太女人！他们都是白痴。

伯林对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因他患上扁桃体周脓肿而中断，他在私人疗养院接受治疗。康复后他前往萨尔茨堡和一帮朋友会合，后取道巴黎返回家中。

致莱迪丝·费希尔

1935年8月27日

蒂罗尔，阿享霍夫

亲爱的费希尔太太：

我早就该感谢你寄到阿克兰德<sup>3</sup>来的信。我无法对你说，当一个人患

-----  
学学院古典艺术与考古学耶茨教授彼得·科贝特的第二任妻子。

- 1 也许这场招待会的举行和6月8日签署的英—德海军谅解协议有关，该协议允许德国人建立他们的海军力量。
- 2 伯林此处原文为：schwiegertochter。理查德·斯特劳斯与纳粹党有联系。
- 3 阿克兰德疗养院，位于牛津班布里路的一所私人疗养院（后来成为医院）。

上扁桃体周脓肿时，能收到慰问信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莱福特教授<sup>1</sup>来看望我是我所得到的主要慰藉，否则生病期间是极其难过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得的扁桃体周脓肿。我开始时患上的扁桃体炎听起来还比较体面，但是扁桃体周脓肿，我总觉得是老婆婆和非常小的孩子才会生的病，而我的生活无可指责，很有规律——我估计可能是我说得太多，这是在我看来唯一合理和符合我身份的解释了。

我的身体一恢复到能够出行，我就赶到了萨尔茨堡，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座让我感到彻底快乐的城市，在那里我见到了无比健康、美丽、开心的玛丽和“小宝贝”。理查德·佩尔斯也住在同一家饭店，他也一直都是个非常友好、斯文有礼的伙伴。托斯卡尼尼太精彩了，我们都过得很开心。我们现在已经搬到湖边，住到星期六。“小宝贝”和玛丽看起来很健康，和她们在爱尔兰时一样心满意足，这已足够说明问题。这里就像天堂一样，山岭峻美，湖水湛蓝，小虫子飞来飞去，让“小宝贝”很喜欢，我们都希望克里斯托弗可以在从维也纳返回的途中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估计他的时间太紧，也许在沿途的每个城镇他都得约见学生，迅速地辅导他们一下，造访我们只能被他视作纯粹的找乐子，所以他肯定要把我们排除在计划之外了。

你的

以赛亚·伯林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二 [1935年9月27日之前不久]<sup>2</sup>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伊丽莎白：

今晚我的家人很早就上床休息去了，而我则旋弄着我的无线收音机， 131

1 罗伯特·亨利·莱福特牧师（1883—1953），1921—1949年任新学院研究员；1934—1949年任爱尔兰《圣经》诠释教授，在此期间还一度担任导师和牧师。

2 此为伊丽莎白·鲍恩回信的日期。

烦躁地想着有关自己的书的事，在我心头这本书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浓重了。我劝说自己，这样是无益的，于是我坐下来，像莫里斯一样，盘点这个夏天我的得与失。一切都有一点混乱，我想这是因为我在阿克兰德住了一些日子。萨尔茨堡之行的确非常像喜剧。我到那里见到了六个人，彼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各自加入了彼此对抗的小集团。我以前从未见到年轻女人们如此互相为难，也从未被置于如此一个位置，不得不公开保护其中的受害者。她是个严格意义上的漂亮女子，年轻，相当令人反感，她在美国很成功，但是在这里却被许多自视甚高的人所冷落，因此她就不断地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大呼小叫，大声朗读，快乐地尖叫，以为这样就很有女人味了。她的女伴是个丑陋却聪明的年轻家庭女教师，一张长脸简直像哈哈镜里的影像，二十八岁左右，复杂的法国犹太人血统（就像你的艾伯哈特先生<sup>1</sup>一样，但这方面我以后再说），有某种程度的受迫害妄想，她常在深夜造访，询问我是否知道“爱”这个字意味着什么，一个女人又如何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一个实际上并不认识的男子，如果她在森林里被“迷奸”（这个词是她的原话），那么她该怎么办？最后的这个问题实在太不现实了，我不得不一度离开房间，好让自己镇定下来。这里都是英国音乐人，还有许多在威尼斯拥有别墅的人；斯蒂芬突然闯入我们这一群冷静的人中，被男孩女孩所包围。每一年，都有惊人的美国崇拜者追随着他，但是今年他来的时候身边是一帮基本固定的崇拜者。托尼不在其中，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斯蒂芬到处游荡，身边疏疏落落地跟着两个年轻女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处女、两个滑稽有趣的小男孩，一个是“突破了边界”的盖尔斯·隆米里<sup>2</sup>，你记得的，另一个是剑桥的诗人。我现在知道什么要素能

1 麦克斯·艾伯哈特，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巴黎之屋》中的主人公，见下文第159—160页。

2 这里引用的是《突破边界》的典故，这是一本和私立学校精神特质相对立的期刊，1934年由艾斯蒙德·隆米里（1918—1941）创办。艾斯蒙德是盖尔斯·萨缪尔·伯特兰姆·隆米里（1916—1967）的弟弟，他十五岁就离开威灵顿他所就读的学校。盖尔斯是这份期刊的投稿人，在1935年11月他们合出了一本书，题目也是《突破边界》，书中收入他们的自传，讲述了他们接受教育和转变信仰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经过。盖尔斯也在威灵顿读书，1934—1936年在林肯学院读古典学专业期间，突然离校去了西班牙，一场考试都没有参加。更详细内容见1966—1967年《林肯学院记录》的第28—29页。战争期间他作为重要战俘被关在科尔迪茨城堡两年（他是丘吉尔的侄儿），后来在纽伦堡作证。

够吸引斯蒂芬了，至少是在女人方面：一张长得“诗意”的脸，蛇形拳曲的黑发。斯蒂芬在谈话间常常插一句，要么是“女孩们去哪儿了？”，要么就是“男孩们去哪儿了？”，他对着一大群听众谈论荷尔德林<sup>1</sup>，很有趣但也有点太沉重。听众中只有“小宝贝”打算安坐在那里，毫不批判，顶礼膜拜。格雷夫斯小姐<sup>2</sup>一天下午到了，根本就没有和斯蒂芬一起下来，我担心她不够诗意，他认为她太世俗了。她非常熟悉莫里斯，认为她不是适合他的类型，打算退出。她的母亲刚在德国去世，我应该写封信去？但又怎么写？音乐会上那些绝妙的音乐为我，也为所有的美国人，把粗俗的托斯卡尼崇拜给具体化了。我买了二十张有关他的明信片，怀着极其幼稚的感情看着它们。我心怀感激地逃离萨尔茨堡，来到蒂罗尔的阿亨湖，只是我被那位黝黑的家庭女教师追逐，迫使我不得一直进行有智慧的谈话，真是累死人。我去了巴黎，给玛丽·费希尔送行，她要去迪皮和她的朋友恩里埃特·努弗拉德<sup>3</sup>见面：想象一下，当我不久之后翻开你的书<sup>4</sup>，费希尔小姐和恩里埃特立刻出现，我是多么激动啊。我很享受这份激动，但同时又感到痛苦，因为在过去的两周，我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你惊人的犀利描述中的某些东西太相似了，于是真实事件和你书中的描绘融合在一起，成为更加鲜明、更加痛苦的意识状态。我至少是短暂地结束了和沃克小姐的关系。我想我的表现很自我放纵、很糟糕，她只是害怕我，而且在激情的幻觉中认为，应该为了我的幸福而奉献她的一生。我们在动物园蟒蛇馆的对面相见，兴奋极了，也痛苦极了。你关于种族间对话的严肃性和刻板性的言论是完全正确的。自始至终我都感到自己在极其努力地说话，完全不知道我的话语造成的影响（这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自始至终我都感到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最可怕、最不可理喻、最复杂的胡言乱语。我们都朝向对方，但是又总是因为引

132

1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2 伊丽莎白·雷拉·米里森特(“萨莉”)·格雷夫斯(1914年生)，1932—1935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历史专业，1937年和理查德·奇尔弗结婚，后来成为伦敦贝德福德学院(1964—1971)和玛格丽特夫人学院(1971—1979)的院长。

3 恩里埃特·努弗拉德是艾丽·哈雷维的外甥。

4 《巴黎之屋》(戈兰茨，1935)。书中的人物包括恩里埃特·芒特乔伊，一个旅行经过巴黎的英国孩子，也包括纳奥米·费希尔，小说主人公麦克斯·艾伯哈特的有英法血统的未婚妻。

力过大而偏离了目标。天哪，我不可能和她结婚的。她却认为我能。我们会立刻感到痛苦。最后，我强迫自己明智一点，干巴巴地、平静地分析形势，宣布我必须停止了，这个场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总是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开始，首先谈论的基本上是天气，然后是沉默。然后我站起身，似乎要走，我们都意识到必须说点什么，我们欲言又止、支支吾吾，我觉得自己大胆放肆、粗俗无礼。当她问到我最最近的一次声明和我与西勒·林德<sup>1</sup>分手时的有多么相似时，高潮来临了，令人完全无法忍受。但是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爱着她，此后一连数天都沉浸在触电般的兴奋之中，但是这种兴奋延续不了几周。和西勒的爱情就相对要简单庸俗一些了，我们彼此充分了解，她对所受到的冷遇的抱怨减轻了我的负罪感。（我对这一切的记录显示出我惊人的冷漠。）而沃克小姐的情形是，所有这些都比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更加真切，更加灿烂，更加令人颤抖。我，普通意义上的大叔，竟变身成为戏剧中的男主角，这样的事实常常让我感到不真实。天哪，发生了多么愚蠢的难题啊。我曾经寄给她三本介绍托尔斯泰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书，《可怕的孩子》和《尴尬年龄》<sup>2</sup>，我太不敏感了（真的，皮薄却又不敏感，这个特质和卡尔·马克思一样），从来就没有想到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会带来什么后果，这被理解成对她的种种幼稚行为的无情的含沙射影。我本来差一点就要给她寄去《论老年》<sup>3</sup>的，这本书就会比较有趣和有益。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尴尬年龄》有这样的含意吗？我只把它当成对某个历史时期的精彩描述了，小说中的两个女孩的命运——简直就是我对她的未来的预示——似乎使她疯狂到了极点。她的母亲在家里发现这本书，十分震惊，这当然令人反感，我想，我寄这本书之前并没有读过它。

任何一个以为我的所为有象征意义或者别有深意的人都错了，呜，诚实地说我不能生活这样的高山上。我总是同情和我一样的胖子，皮埃尔·别祖霍夫、桑丘，甚至是《夜与日》中的威廉，我痛恨安德烈亲王和戴

1 1931年的夏天伯林短暂而克制地爱慕着西勒·林德。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7。

2 后面提到的书分别由让·科克托和亨利·詹姆斯所著。

3 西塞罗著。

尔·冬格。<sup>1</sup>沃克小姐去威尼斯和一位A.劳伦斯爵士<sup>2</sup>住一段时间，我，就像有四肢的低等有机物，迅速地恢复了。我不知道巴黎之行是否是个错误，但是当然，我很高兴犯了这个错。奇特的是，我们从没有从兴奋的高空下降到平凡的低谷，尽管她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令人讨厌。（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汉弗莱式的格律。）我不否认，我是因为怀着某种骄傲和喜悦，才能轻视次级生物和次级的浪漫故事，就像“小宝贝”和吉尼斯先生<sup>3</sup>之间从伦敦到都柏林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那样。是的，通过写信就草率唐突地建立关系的莫里斯：观察到葡萄牙人既幼稚又非常非常绝望，在你还睡在床上时他们建起又拆毁了你卧室的四面墙，并报告说罗伊今年夏天差一点就结婚了，对方是某个身份通常被描述成介于中上和上等阶层之间的人，我们问自己，是海德勒姆·莫雷小姐吗？之后，我们必须通信。亲爱的莫里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智慧的人，艾略特先生还是认为他不会成为希腊语教授，这很糟糕。为了我们自己，他必须快一点成为伟大人物。列奥波德的表现和弗雷迪相似吗？<sup>4</sup>我肯定，作为一个孩子，他很可能如此。我突然把弗雷迪当成我和沃克小姐生的孩子，为此大笑了一场。母亲问我笑什么。我只好编了个谎，说我遇见了一个美国人，他说“有人告诉我教皇住在阿维尼翁，但是我认为那不可能，因为如果他真住在那里，我们肯定会听到有关的消息”。天啊，我变得多么傻。你读过凯琳·米凯利斯<sup>5</sup>的书吗？我认为

134

- 
- 1 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亲王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桑丘·潘扎是塞万提斯小说《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的随从，威廉·罗德尼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夜与日》中的人物，法布里斯·戴尔·冬格是斯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 2 亚历山大（·瓦尔德马）·劳伦斯（1874—1939），新学院毕业生，萨默塞特郡的治安法官。他有三个住所，其中之一在帕多瓦北边威尼托区的阿索罗。
  - 3 布赖恩·吉尼斯，在他（与黛安娜·米特福德的）第一次婚姻结束和第二次婚姻开始之间的那段时期，是“小宝贝”的仰慕者之一。
  - 4 在《巴黎之屋》一书中，列奥波德·格兰特·穆迪是麦克斯·艾伯哈特和女主人公凯伦·米凯利斯的极度善于分析、过度好奇的私生子；伯林似乎认为A.J.（“弗雷迪”·）艾耶尔有可能是人物原型。
  - 5 凯琳·米凯利斯（1872—1950），丹麦小说家，《危险年代》（1910）的作者。也许伊丽莎白·鲍恩读过她的书，并让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借用了她的名字。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麦克斯，是才华出众的法籍犹太金融家，后来自杀了。麦克斯和他所爱的英籍女主人公凯伦之间的种族界限是主要因素，因此伯林对小说做出这样的评论，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显然他在阅读的时候



她是一位在世的著名的丹麦作家，也许是个丹麦犹太女人，非常独特有趣的人，还有布雷思维特<sup>1</sup>，所有这些可爱而熟悉的名字，费希尔小姐、恩里埃特，等等，除了费希尔夫人（我想她就是你的精彩化身，对话读来令人血冷而又着迷。我和沃克小姐的未来直接而深刻地受到那本书的影响，这一定不是你有意所为，我也不会相信你能了解那本书所包含的意义）一点也不像那位写了许多友好而又令人反感的信件的海拉·费希尔太太以外。

麦克斯是一个恐怖的人物，谢天谢地，我不像他。总的说来，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就像一部戏剧，观众对剧中角色的境遇有认同感，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噩梦或是梦境，在梦中他替一个角色说台词，把角色从他们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使他们像自己的牵线木偶一样举手投足。弗雷迪·列奥波德在  
135 我的脑中久久拂之不去。但是我的确认为这是一本有趣而且吸引人的书，一旦我沉静下来，我就重读一遍，如果你允许，我会和你再谈谈它。

我希望能去爱尔兰，但是我父亲在莫斯科<sup>2</sup>，我不能离开母亲，她似乎身体不太好，虽然非常快乐。我听说普罗默先生<sup>3</sup>在你那里，人们告诉我他很可爱、聪明、愉快。我真的得回到牛津安顿下来，过平静的生活，那才是我要营造的印象。不要年轻女人。对我这种总是急切地要让别人开心的人来说，女人们很烦人。我愉快地盼望着那些空虚而乏味的日子，和莫里斯一起散步。我什么时候会见到你？现在这取决于你，你知道的。我大约10月1日左右去牛津，你什么时候来伦敦？这是我生命中最严肃的一个夏天，我只是个外向的人，讨厌真实的经历。但是与此相矛盾的事实是，正如这封信中所体现的，我似乎只能谈论自己的事。这很糟糕，我道歉。

沙耶

我问你：你是否曾经处于一种氛围，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具有象

---

想到了他和雷切尔·沃克小姐之间的关系。

1 小说中米凯利斯塔族在伦敦摄政公园切斯特街住宅的管家，有关现实生活中的布雷思维特的情况，见1935年3月14日致约翰·希尔顿的信。

2 伯林父亲在莫斯科联系木材生意。

3 作家威廉·普罗默（1903—1973），伊丽莎白·鲍恩的亲密朋友，当时在鲍恩宅邸逗留。

征意义，有可预见的重要性，惊人地严肃，有决定意义？

致约翰·希尔顿

[收于1935年10月13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最亲爱的约翰：

这是很不恰当的。<sup>1</sup>我认为，你的任命一定是由于巴克勒们<sup>2</sup>良心发现，同时噶尼斯不受欢迎。一年时间流逝了，负罪感平息了，原来的弯道又出现了。当我见到巴克勒先生的时候，我会不太友善地盘问他一番。不，我没有交新朋友。如你所想，因为要让他们彼此间和平共处，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敦促所有的人都开诚布公，我所做的事不甚光彩，但是有时候又是令人愉快的。我的这个夏天很特别：我绝望地试图写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结果发现自己（a）在准备动笔后至少一个小时内根本无法写出什么；（b）一旦开始写，我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卢梭对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然后才想起来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证明。这真是折磨人。不管怎么说，我这样度过了一个月，然后患上扁桃体周脓肿病倒了，如我所猜想和写信所说的那样。然后我去了萨尔茨堡，在那里我的伙伴们互相妒忌，我迷迷糊糊地到处逛，部分是由于我那犯病的扁桃体，部分是由于那整整两个星期的强烈感情经历。这份经历到了英格兰也没有结束，在那里我突然从这种情景的观察者，费加罗式的角色，变成了一股积极的力量。这个变化如此突然和惊人，可怕的是，我发现我无疑一直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和

136

- 1 此时，约翰·希尔顿被告知他的试用期结束，虽然允许他以辞职的方式离开。伯林这封信是回复希尔顿写给伯林的无标注日期的信，希尔顿在信中说不知道谁将取代自己，但是说“《每日镜报》八卦专栏已经提到一位‘奈杰尔·噶尼斯，塞浦路斯古迹总部主任’”。
- 2 威廉·赫本·巴克勒（1867—1952），美国律师，1925—1952年在巴利奥学院教授考古学，他的妻子是乔吉娜。约翰·希尔顿在信中写道：“通过一系列奇怪的机遇，巴克勒[……]还有比兹雷、威斯和诺曼·巴涅斯等教授知道了我。建筑物在坍塌。虽然我自认为是‘现代建筑’的先锋，但他们还同时给了我一个伯明翰的哲学教职，还有一——在由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希尔和古迹分部艺术品部的查尔斯·皮尔斯审查过之后——在塞浦路斯的工作（同时希尔还警告要留心噶尼斯）。”1991年11月7日希尔顿把这封信给了编者。

轻信。然而不管怎样，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被我抛到身后。艾丽卡·克罗斯曼太太当时也在萨尔茨堡，她把她的男人介绍给别人的方式如此奇怪：她前些年习惯称呼他为她的叔叔，但是今年她只是说“这是我的……呃……我的……呃？”，然后就会意地斜睨着他，等等。这一切都很令人愉快。托斯卡尼尼，不论如何，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昨天在邦德街遇见了费希尔院长，他问了一些关于我认为谁是最伟大的人这类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托斯卡尼尼”。他有没有可能生气呢？我想，我本应该提到一些最近去世的人。

当你回来时（你会让我知道吗？），你真正想做什么？让我向你介绍一下目前哲学劳务市场的现状吧：普莱斯晋升，得到了乔奇姆讲席教授的职位，于是三一学院就有了一个空缺；巴利奥学院正以某种方式分解；富尔顿要去美国一年；莫里斯<sup>1</sup>嘟哝着想去某个地方的贫民窟体验生活（这让我想起爱尔兰新闻界的一份关于伊丽莎白·帕肯汉姆太太<sup>2</sup>演讲的报道，她的听众是许多农夫，演讲主题是女人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在牛津只有两位学哲学的女学生，”她评论说，“这是我唯一比较了解的地方。”很奇怪），我想，在斯旺西，希斯教授<sup>3</sup>手下有一个讲师职位，在开罗也有一个教授职位，每年950埃及镑，扣除70镑左右的“印花税”。这就是我个人知道的全部情况，哈迪可能知道得更多一点。在伯明翰顶替你的人是个灾难。

137 小组剧团<sup>4</sup>的建立动摇了文学世界，产生了艾略特、奥登先生等人。第一晚演的是《肌肉萎缩》和《死亡之舞》。非同凡响的主要是观众们：他们都是1927—1928届的牛津人，还有一定数量的“漫步者”，看起来就像是唯美主义者们的《笨拙画报》上登出的常见图片。你读过《死亡之舞》，或者是

1 查尔斯·理查德·莫里斯（1898—1990），哲学家，1922—1941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和古典学导师。

2 伊丽莎白·帕肯汉姆（1906—2002），婚前姓哈曼，1931年和弗兰克结婚，1929—1935年在工人教育协会讲课。

3 阿奇·爱德华·希斯（1887—1961），1925—1952年任斯旺西大学学院的哲学教授。

4 一家创新剧团，委托一流作家从事创作，并排演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奥登、艾略特、麦克尼斯和斯彭德。这里提到的是两个同场演出的节目——奥登的《死亡之舞》（伦敦，1933）和艾略特的《肌肉萎缩》（伦敦，1932）——10月1—12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剧院上演。

《皮下之狗》<sup>1</sup>吗？后者插入了不少诗，我觉得很好，还有许多急口插词，没有吉尔伯特的好，有的略逊于考沃德。无疑，两部剧作的意图都是以某种方式帮助挣扎的人性，至于以什么方式就很难说了。行动似乎得到宣扬，于是人们沐浴在阳光下，附庸风雅地生活着，等等，等等。因为人必须行动，所以奥登先生也写道，因为人必须在做事情。别的主旨我就发掘不出来了。在《狗》剧中，有两处对纳粹分子的模仿嘲弄不是很有效，对私立学校学生的打击更重；犹太金融家和其他不真实的人物入场了；对白不够娴熟巧妙；最感人的台词是从敌人口中说出的。《死亡之舞》也是如此：尽管奥登基本上是一位爱国诗人，但是他表现模糊的法西斯主义时却口才最好，他只得有良心地把这种口才赋予剧中的敌人，因为他所尊敬的人都是左翼的。奥登和艾略特的总体竞争氛围激起了我自大的意识形态反思：这真的和我想象中的1926—1927年的柏林很像，同样急切的游民阶层观众，同样相当空泛的表演。戈培尔先生<sup>2</sup>会发现这很不健康，愤世嫉俗，威胁到了大约1942年英格兰的法西斯主义，除非它先在别的什么地方崩溃。一种很奇怪的客观趋势，一场历史共相之舞等等，我猜想有人能把这种现象描写得十分到位。或者，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这些因饱食而厌腻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摧毁了它们更饥饿也更年轻的竞争者之后，在竞争者们内部促成了左翼革命，然后它们自己就变成法西斯主义者，以此作为保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保持现状的最后手段。这样的看法是否更正统？我不理解世界运动，每个人似乎都满不在乎地讨论着即将来临的欧洲文明的坍塌，尽管我不能洞见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的信正在变得像一封托普西的信<sup>3</sup>。

在你回来之前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看看，如果可以。那里非常雄伟美丽： 138

1 《皮下之狗》是专为小组剧团创作的，该剧团1936年演出该剧，也是在威斯敏斯特剧院。

2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1933—1945年任纳粹宣传部长与国民教育部长，他试图清除德国艺术中一切与纳粹理想不相容的东西。

3 A.P.赫伯特的《托普西的审判》(伦敦，1928)收集了他虚构的托普西写给特雷克斯的信，首次刊登于《笨拙画报》。信件的风格令人喘不过气、难以理解，充满了许多荒唐的用词错误，例如第一封信“与自命不凡者的一次小冲突”的第一页(第7页)中写道：“昨晚我和安顿斯一家去了一个绝对令人失望的派对，我的天，所有的俄罗斯人和高尚艺术和胡须和一切一切啊。”

死海令人目眩神迷。至于特拉维夫，除非你也和A.蒙德的女儿<sup>1</sup>一样有返祖的渴望，否则那里除了冰淇淋之外就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了，他们说米茨帕茨是美味的橘子水。不要戴软木帽，因为你会被误认为是从布加勒斯特<sup>2</sup>新来的注重衣着的移民，或是一个阿拉伯小部族的族长的顾问，他们必须戴这样的帽子，因为他们穿别的传统衣服很容易被人弄混。我必须停笔了 [……]

告诉佩吉我爱她。你回来时，能否告诉我。我有两个关于爱尔兰人的滑稽故事要说。

你的  
沙耶

致玛丽·费希尔

[1935年10月中旬]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你指的是不是普维斯·德·夏凡纳<sup>3</sup>？一位令人震惊的画家，善于使用灰蓝色。但是我在读那本书时所感到的忧郁前所未有的，也不可能与之相同。我在给一本书写书评，这本书满是令人尴尬的玩笑，让人精神崩溃。<sup>4</sup>我几乎不想把这样的玩笑付诸纸上，如斯帕洛会说的那样：像门德尔松们、舒曼们、斯特拉文斯基们这样的词。作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英国作曲家，大约和G.N.克拉克一样像荷兰人，他的名字是范·迪埃伦。我感受不到

---

1 这里提到的是阿尔弗雷德·莫里茨·蒙德爵士（1868—1930）的三个女儿，蒙德1910年成为准男爵一世，1928年成为梅尔切特男爵。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物穆斯塔法·蒙德的名字就源于他。

2 布加勒斯特。

3 皮埃尔·普维斯·德·夏凡纳（1824—1898），法国壁画家。

4 贝纳德·范·迪埃伦，《与亡者同沉》，书评为《昔日的音乐家》，登于《观察家》，1935年11月1日，第732页（另见伯林发表在该杂志11月29日号上的信，第906页）。

的心理状态，我无法置评。我不知道，在某种程度上，那和《巴黎之屋》<sup>1</sup>的情况是否一样。虽然这不是这封信最初的结束语，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否星期天和赛小姐<sup>2</sup>一起来吃午餐？我已经给她写信了。考虑到第一批本科生们<sup>3</sup>等情况，这是否会让你母亲很不高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可以改成星期一（是她给我写信，请我邀请她的，我得要有人捧场）。我不知道还能叫谁来，理查德·佩尔斯、克里斯托弗可能会来；莫里斯说他讨厌彼得·赛<sup>4</sup>，所以肯定不喜欢见安妮，所以就只能那样了。如果我们定在星期一见，恐怕盖伊就不能来。这就太不寻常了。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人选，在你回复之前，我也不能确定。你能否在午饭前打个电话？我会非常感激的。我发现今晚自己身处女王大厅的门廊，被人挤来挤去，凝视着林克先生<sup>5</sup>的眼睛。招待候选人的结果是，我已经收到了许多反对温切斯特学院学生的新论点了。

你的

沙耶

伯林终身对音乐充满热爱，他常常写到音乐。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牛津展望》上的“音乐记事”专栏，他从1930年至1932年为这个专栏写文章，起初他用的笔名是“阿尔伯特·阿尔弗雷德·阿普力克特”<sup>6</sup>。自1934年起，他不时为《观察家》写音乐书籍的书评。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封信中提到的对无线电收音机的需要，更有可能和他对音乐会和唱片的评论有关，在1936年直至1940年他离开牛津之间的时期，这些评论文章不时出现在牛津的刊

1 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

2 安妮·赛，彼得的姐妹，1935年初在萨尔茨堡与玛丽·费希尔、“小宝贝”和伯林相遇，和他们一起去阿亨湖旅行。

3 费希尔一家通常在学期中的星期天举行本科生午餐会，这个学年第一次这样的聚会大约是在10月13日或20日。

4 彼得·亨利·赛（1910—1963），1929—1933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3—1934年为哈姆斯沃思法学学者，1935年接受聘任进入律师界。

5 乔治·阿诺德·林克（1902—1983），律师，雷切尔·沃克的一个不受欢迎的仰慕者。

6 是否可以认为这个笔名的灵感来自阿兰·艾伯特·安提斯代尔·布莱克威（上文第56页注3）？

物上。

致玛丽·伯林

[1935年11月初]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的来信。关于选举，由于我们没有自由党候选人，我会投J.L.斯多克斯爵士<sup>1</sup>一票。他是曼彻斯特的哲学教授，喜欢犹太人，持社会主义立场，实际上他是一个温和左倾的自由党。我很好，感冒已经彻底好了，我在一场音乐会上见到霍布森博士<sup>2</sup>，他温柔地询问我的情况。艾廷豪森正在慢慢地恢复。当一个音乐评论家太好了！如果你能够真正把握这个专业。至于父亲问到我是怎么知道布梭尼<sup>3</sup>的，我承认我是从可靠的拉什米利耶维奇<sup>4</sup>那里得到有关他的一切知识的。只要有可能，我宁愿不去伦敦。但是如果你担心我的健康状况，让爸爸过来，在某个工作日和我一起吃饭。他可以乘4:45的火车过来（5:15也行），晚上9:37回去，甚至星期六也可以。那样你就会相信我的健康情况了。

再见

沙耶

- 
- 1 约翰·里奥弗里克·斯多克斯（1882—1937），1906—1924年任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导师，1924—1937年任曼彻斯特大学哲学教授，1937年任利物浦大学副校长；1935年作为牛津大学工党候选人竞选失败。
  - 2 弗雷德里克·格雷戈·霍布森博士（1891—1961），伯林和许多牛津学生的医生；酗酒，声名狼藉。
  - 3 费卢奇奥·但丁·米开朗琪罗·布梭尼（1866—1924），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
  - 4 所罗门·拉什米利耶维奇（人们通常叫他“拉什”）（约1892—1953），俄罗斯犹太知识分子，生于里加，流亡在伦敦，是伯林亲密和有影响力的朋友，伯林是通过沙立特一家认识他的。伯林在关于马克思的专著的前言中，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还说：“他是第一个使我尝试了解普遍观念的人，那些原封不动的有趣观念。”（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6）另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42—44页。

我很高兴他们对竞选席位采取了行动，我从未想到我尖锐的信件会有作用，但是你瞧！

关于无线电收音机：它不会妨碍我的工作，只会使我更多地待在房间里，这是一件好事。我给圣体学院写了一封关于贝洛夫<sup>1</sup>的充满善意的信，他很感激。以赛亚·伯林。

我大约在12月15日回这里，但是1月之前不回家，为什么要在英格兰过可怕的圣诞节啊。

致斯蒂芬·斯彭德

星期三 [1935年11月1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我的脚趾头扭伤了，现在一点也不快乐，如今我一瘸一拐地到处走，十分痛苦。我读了太多关于残疾人心理的书，也想了太多这些事，在短暂的时限之内体验这种心理是多么有趣啊。但是，我会在你到来的时候完全康复的。唯一的难题是周日晚上，我已经向我的客人承诺在学校食堂请他吃饭了，我现在不能不请他在那里吃饭。莫里斯会来剑桥。我真的很想在星期天和你一起吃午饭（我可以邀请你想见的任何人，或者谁也不请），和托尼一起，和卡里特<sup>2</sup>一家一起吃午饭或是晚饭。那样可不可以？如果不行，我更希望由我自己来请你和我的客人吃饭，他很想见你，不会介意我在学校食堂请他吃饭的承诺。你能否让我知道？这是我虚假的小题大做，但是如果你能来卡里特家里吃晚饭，然后大约在10：30回去（现在牛津的出租车很便宜），那就很理想了。但是要让我立刻知道。我非常盼望见到你和托

141

1 马克斯·贝洛夫（1913—1999），1932—1935就读于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历史专业，后来被封为伍尔弗科特的贝洛夫男爵；1935年取得头等优异成绩。

2 埃德加·弗雷德里克·卡里特（1876—1964），牛津大学学院哲学研究员、讲师，有段时间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导师。



尼。[西瑞尔·]康诺利在最新一期《新政治家》<sup>1</sup>上发表的对一位牛津人所写的小说的评论,是我读过的最有趣、最聪明的文章。也许只有对一个人充分了解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但是西瑞尔的恶意确乎是一种社交能力。莫里斯因为憎恨康诺利,而拒绝欣赏他的恶意,是一件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我试图劝说莫里斯,一个人要是痛恨着两个人,那么他是乐于看见毒蛇在这两个人之间缠绕的,但是莫里斯似乎对此半信半疑。同一期的《新政治家》上还发表了达迪·莱兰兹<sup>2</sup>写的一篇关于牛津的糟糕的文章。当我向莫里斯指出这一点时,他说:“闭嘴。我自己就是这么写的。”

爱你的  
沙耶

致玛丽·伯林

星期二 [1935年11月中/下旬]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的来信和寄来的小册子<sup>3</sup>。这本小册子最初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时,我已经读到了。它很直率,但是还是没有说出一切。昨晚我对犹太社团<sup>4</sup>说:这是一次人数众多的聚会。我想我这么说很令人满意,但是我还说到一句关于特拉维夫肮脏的街道和杂乱无序的建筑的话,这句话冒犯了一些人,所以我就中途退出了,除此之外,我想他们还是喜欢我的。我必须请

1 西瑞尔·康诺利,《新小说》,1935年11月9日《新政治家》,第699—700页,开篇是J.C.玛斯特曼的评论文章《命运不能伤害我》(伦敦,1935)。

2 乔治(“达迪”)·莱兰兹(下文第256页注5),《雄心勃勃的选集》,即《英国诗歌新选集》(伦敦,1935)的评论文章的第1250—1900页,写到(亚瑟·)奎(勒一考奇)的《牛津英国诗歌选集》(牛津,1900):“奎勒的顾问是一个令人仰慕的梦想者,她的心灵是如此浪漫,她是如此毫不吝惜地奉献自己,但是对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则不屑一顾。这座美丽的城市,由于本世纪狂热的知识分子生活而得以保全,它是如此安宁;纽曼、阿诺德、乔维特和帕特的牛津。”

3 尚不清楚是什么小册子。

4 一个本科生社团。

赛巴<sup>1</sup>喝茶。我把列文<sup>2</sup>彻底忘了：我知道他要来，心里隐约想着要去看他，但是后来忘了，我很抱歉，但是只好这样了。也许，如果你见到他，你可以告诉142  
 他我的脚受伤了，那天不能行走。（这是真的，我撞伤了脚趾头，虽然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但是当时痛了两天，我甚至请了一位男按摩师帮我按摩。他做得很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受伤，我只是碰到了一块石头；我现在甚至记不起那是什么感觉了；除此之外我很好，只是有两天不能走路。）关于无线电收音机：求你一定一定帮帮我，我无计可施，在非音乐类杂志上评论音乐书籍不是充分的理由。你说什么都行，但是肯定对我不起任何作用。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我这个学期还需要用无线电收音机。求你了。至于爸爸，他是否会考虑下周六来？我要出去吃午饭，所以也许这不是个好主意：为什么他不乘坐4：45发自伦敦的火车，比如说在星期一，甚至更晚一些，比如说5点，然后在7点左右到，和我一起在这里吃晚饭，然后9：30左右回去？我肯定这个时间对我最方便。但是，关于无线电收音机，你一定一定得想点办法。

爱你的  
 沙耶

我附上了一些俄罗斯邮票，还有我的同事寄给我的一些书。

我无法向你描述此时此刻我的身体有多好。我的头发也理了，指甲也很干净，一切都好。

---

1 萨姆·赛巴（1915—2003），1934—1937年在圣约翰学院主修法学。和伯林一样来自里加，而且伯林在进牛津之前就认识他了。赛巴在牛津接任犹太社团主席。他曾在圣保罗学校就读。  
 2 艾弗莱姆·列文牧师（1885—1966），伦敦新西区犹太教会堂牧师（上文第9页注9），作家、著名演说家。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35年11月下旬]

全灵学院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真的非常好。一是关于来访的事：如果你们俩都想见到我，我也许会想办法下周一过来和你们一起吃饭；另一方面，如果爸爸确实想来这里，那么我建议他星期天来或者12月1日过来。

明天有两个犹太人，伊萨克·索尔先生和亚伯拉罕·哈尔曼先生<sup>1</sup>要和我一起喝茶。增进团结。

关于无线电收音机：我不能对当地人说，我是个音乐人，我写乐评，等等。如果你们喜欢这样，我会试试，但是如果我失败了，我能否得到你们的允许，以全价订购一台？请给我这样的权利吧。艾廷豪森更好。此时，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要告诉你们了，真的。

爱你的

143 沙耶

抱歉，如果我今天接电话时声音听起来很含糊，那是因为当时我嘴上都是剃须皂！

致玛丽·伯林

[1935年11月下旬]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现在我非常好，所有感冒的症状都离我而去了。至于麦克麦克尔<sup>2</sup>，我

---

1 阿弗拉汉姆·哈尔曼（1914—1992），生于英国，后来成为以色列外交官（1960—1967年任驻美大使），其后担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伊萨克·索尔身份尚未确认。

2 无线电收音机的一个牌子。

不能自己写信向任何人推销自己。你瞧，我不是一个音乐批评家，说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评论关于音乐的书不=音乐批评）是会因犯诈骗罪而受到法办的。我对你所做的就不负有责任，如果有必要，可以说我对于此事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你和詹克斯先生之间的交易和我没有关系。所以，请你让他给我送一台无线电，越早越好，如果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给他写信，跟他说我不在，或者生病了，你想说什么都行。我只是不能让自己和这种不精确的说法有牵连。

爱你的  
沙耶

致詹妮弗·威廉斯

[1935年11月?]

全灵学院

我在信里附上了一份文件，也许会让你感到一点温和的喜悦。<sup>1</sup>整封信温文尔雅，让我感到莫名的快乐。老人们讲究礼节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是你不同意，我想：道格拉斯这封信到了1970年会有多么不同啊。信上的铅笔题字<sup>2</sup>是鲍拉先生写的。这是他所使用的最著名的方法，意在分清读过的和未读的信件。这意思就是读过的信件可以清理掉，这样，在人家出去时他就不用为了摸出那些烦人的熟悉文字而在人家的桌上翻找不停了。

伯林

144

---

1 乔治·詹姆斯·特纳（1867—1946）的来信，律师（1937年任牛津福特讲师）、全灵学院访问研究员。他邀请伯林晚餐，在来信附言中写道：“你无疑注意到了去年夏天历史学院一班詹妮弗·F.W.这个名字。”

2 “做记号的”。

## 致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1935?]

全灵学院

[……]'<sup>1</sup>在小木屋里发生的转折。我们都同意威廉三世对他所研究的东西了如指掌,可能已经得到PPE专业考官们的祝贺了,虽然他们中没有他的朋友;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也会得到这样的祝贺;乔治二世可能会差距颇大,刚够二等;维多利亚会因为名列榜首而被高度赞扬,然而她并没有得到一等学位;詹姆斯一世作为一个聪明的傻瓜,会得到二等学位;查理二世得了二等,因为他是一个维利尔斯;斯蒂芬四等,等等。记得我非常喜欢这些。

我根本不相信麦考利<sup>2</sup>是一个反动分子。他也许是个难以忍受的角色,而且什么都搞砸了,但是他的价值观是参照正确的理想而建构的,那就是说(a)他不是科贝特—贝洛克<sup>3</sup>那种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分子;(b)他的言论不像威尔斯—赫胥黎<sup>4</sup>那样阴郁和庸俗,不像不具可读性的乌托邦社会改良计划那样是冗词废话和修饰语的集合;(c)最重要的是,不是规则,也就是说,不是说教的、不合逻辑的、令人厌恶的。你可以说他自鸣得意,自欺欺人,几乎彻底地闭目塞听,被他自己的雄辩所欺骗。也许,他真实的理想是不光彩的、粗陋的,缺乏想象力,毫无价值。你会说,任何抵制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人都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怀有不光彩的动机,即为了逃避真相,或是担心被排斥在有利的虚构世界之外,等等。这一点,我想,是很正确的。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怯懦的形式,它们极为相似,

---

1 信件开头部分遗失。

2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1800—约1860),麦考利男爵一世,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辉格党政客、政治改革的倡导者。

3 威廉·科贝特(1763—1835),记者,致力于以重建农业社会为目标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约瑟夫·)希莱尔·皮埃尔·贝洛克(1870—1953),多产作家,有法国血统,但是在英国长大,在他的《奴性的国家》一书中,提醒人们防范日益增强的国家控制(包括社会福利)的危险性。

4 威尔斯的许多小说描绘了乌托邦社会的图景,尤其在《未来事物的形态》(伦敦,1933)中,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结束之后,由科学家们统治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最著名的作品《美丽新世界》(1932)以讽刺手法警告世人,被技术所统治的社会将是什么模样。

远超过它们与其他形式之间的相似程度。柏拉图也逃避，尤其是他的《法律篇》，它是对道德问题的冷血的无视，但是他的避难所确实令人厌恶。

麦考利的美德在于，不再为他所怀疑的词汇、意象等，确切而言是理想主义的；那就是说，对他而言词汇不仅仅是词汇，不是如你所断言的那样，革命的短语变成了反动的武器（即法西斯主义），词汇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最初的意义，而且无需修改就能够服务于激进的目的。这些词汇只能以仿佛是用来描述实际事态的方式来使用，因此就产生了自我满足的感觉，而事实上它们不是，而且这样暗示是一种有罪的盲目行为。但是它们依然保持着一种被隔离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如法西斯主义这样与黑暗原因间接而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意识的污染，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解读和应用它们，因而它们没有受到腐蚀，也不会经受不住缜密思量。鲍德温根本不是思想理论家，他只是利用口号，避免不公正的政治理论赤裸裸地出现。这是常见的政治欺骗，意欲伪饰的东西甚至都不能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目张胆的反动政策，只能算是缺乏明确目的的政客们的勾心斗角。然而，麦考利的价值标准是极容易理解的，而且整体看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非人道的政治纲要，它既不推翻理性，又不使人反感，因为它是现实主义的（不像有些人的主义那样使人反感，比如说穆勒主义，它虽然要诚实得多，正直得多，也真实得多，但它也是令人抑郁的，除非人们能够提供渴望，即各种对生活、性格、色彩、姿态等自我的积极崇拜）。

145

我认为，斯特雷奇<sup>2</sup>对社会特征和社会意识都毫无兴趣，他专门研究个人、个人的情绪以及对重大情况的特定反应。呼喊出或说出带有最少个人联想的话语因此就一样容易，也因此会让他如此生气，因为这样的话是没有预设任何私人性质或个人风格。不论麦考利个人的行动如何骇人听闻，他如何与自己的作家身份背离，他还是足以传达出这样的意思：一种生活，总体看来是好的，哪怕通过它产生了多么可厌的个人，而另一种生活，

1 斯坦利·鲍德温（1867—1947），1937年成为鲍德温男爵一世，保守党政客；1923—1924，1924—1929及1935—1937年任英国首相。

2 （盖尔斯·）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批评家和传记作家。

不论通过它能够创造出如何有价值的个人，却还是糟糕的生活，这就是穆勒主义[?]。这是对斯特雷奇观点的正面攻击，这是不加掩饰的、装模作样的，使他无话可说，但这却不是敌对和轻蔑的。

以赛亚·伯林

我得穿衣服出门了，另外我该写点新鲜事儿。

致约翰·希尔顿

[1935年6月，明信片]

全灵学院

亲爱的约翰：

146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我知道，我就会给你写信，我也许会来，并完全受到激励而做出友好和善解人意的举动。这让我想到，职业诱惑者卡兹曼<sup>1</sup>的邪恶之举，全面而强烈地重新激发了比兹雷太太<sup>2</sup>对你的热情，在一场历时三到四个小时、充满喋喋不休的美狄亚式道白的集会上，我成了卡兹曼罪行的受害者。集凶悍、乏味和致命诱惑于一身是很奇特的，结果导致了幽闭恐惧症以及对独处的渴望，对我来说这种状态很罕见。告诉佩吉我爱她。

以赛亚·伯林

---

1 俄裔美国籍犹太人查尔斯·卡兹曼(1909—1979)，1934年末(持罗林斯学院的文学士学位)来到布雷斯诺学院攻读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士学位，他和比兹雷一家住在一起，通过他们认识了路易斯·麦克尼斯的妻子玛丽，即比兹雷太太和前夫所生的女儿。1935年11月，玛丽离开了她的丈夫，次年初，卡兹曼和玛丽前往美国，比兹雷太太曾企图阻止他们获得签证。详情见约翰·斯托尔沃思的《路易斯·麦克尼斯》(伦敦和波士顿，1995)，第171页和第176页，也可以参见本书第185页。

2 玛丽，1919年起成为约翰·戴维森·比兹雷(1885—1970)的妻子，约翰是牛津古典考古学和艺术学的教授。

致盖尔斯·罗伯逊<sup>1</sup>

1月20日 [1936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罗伯逊：

我满心欢喜，无比感激，再也不愿把它归还给你（除非你自己出于严肃的理由迫切地需要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无名小卒不愿归还像戈佐利<sup>2</sup>这样的画家为他的人生所画下的一个场景；但是，虽然我欣喜若狂，不愿把它归还给你，但同时也不愿让你为我承担画框和画布的费用——如果我不会失去我的画<sup>3</sup>，你就必须让我承担这些花费。而且，我非常坚决地要保存它，要每天愉快地看着它，因为在这幅画上，我也许可以获得个人的热情和情感，而这正是我的批判力中所缺乏的成分。我认为它比我多年来在美术馆所看见的画作更吸引人：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见到这幅画的每个人都被它打动。我的快乐在增加，增加。至于布伦特和伯吉斯<sup>4</sup>，他们天性如此，他们微醺时比头脑清醒时更能看到真相。如果他们的醺醺然等同于，或者应该是他们温暖的赞许，那么他们一定是支持的。如果我在那里，这会是我不非常乐于享受的。同时，我要亲自谢谢你，所以，下个星期天（1月26日）7：30你愿意过来和我一起共进高桌晚餐吗？要着正装。如果弗兰克尔教授对此确实有帮助，那么他的席位是应得的，而且，我也要感谢他。是的，你的杰作实在太好了，色彩如此充满活力，如此饱满，整个画面如此快乐，充满人情味。刚去世的罗杰·弗莱<sup>5</sup>会很喜欢它的，对我来说它太珍贵，

147

1 盖尔斯·亨利·罗伯逊（1913—1987），1933—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伯林的哲学专业学生；自1946年起在爱丁堡大学教授美术，1972—1981年成为华生·高登美术教授。

2 贝诺佐·迪·列斯·迪·桑德洛·戈佐利（1420—1497），佛罗伦萨派画家，主要以湿壁画而闻名。

3 盖尔斯·罗伯逊给了伯林一幅画（图17），画中描绘了伯林童年的一段小插曲：伯林说过，他两岁时在里加，非常危险地趴在窗台上，焦急的大人们站在楼下，怕他跌落（结果他没有跌落下去）。伯林去世后，艾琳·伯林把这幅画送给了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4 安东尼·弗雷德里克·布伦特（1907—1983），艺术史学家，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盖伊·弗朗西斯·德·芒西·伯吉斯（1911—1963），1930—1933年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历史专业。两人后来都被发现是苏联共产党的间谍。

5 罗杰·艾略特·弗莱（1866—1934），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礼物。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不论回报是多么的不足？什么是我个人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财产？我的贝多芬团体<sup>1</sup>唱片，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都可以归你。但是即使你不要，星期天还是要来吃饭。和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份恰当的铭文将被刻下并随信附上，像杜米埃或戈雅<sup>2</sup>的作品那样。我希望你能来。

你的感动的、再次充满感激的受惠者

沙耶·伯林

在这件事之后，继续称呼我“先生”有点可笑了。如果你不好意思使用没有头衔的称谓，那就根本不要使用任何呼格词。但是你一定不要再叫我“先生”了。

致黛安娜·哈贝克

[1936年2月7日前不久]<sup>3</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黛安娜：

在你的派对之后，我想立即给你写信致谢，因为我过得非常愉快，在  
148 派对上可以畅所欲言。（这是纯粹为了表示感谢而写的回忆。）我对那些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年轻人印象很好，尤其是一个叫戴维森<sup>4</sup>（？）的，他有一

1 该团体音乐作品系列是伟大作曲家作品的唱片合集。贝多芬团体系列的全部钢琴奏鸣曲由阿特·施纳贝尔演奏，1932至1939年间由“主人的声音”（HMV）唱片公司发行，该系列总共十五张专辑，其中前九张专辑列在1936年的目录中。这个发行计划还包括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由弗里茨·克莱斯勒（小提琴）和弗兰克·卢普（钢琴）演奏，专辑第一张和第二张收在1936年的目录中。

2 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法国艺术家、石版画家和讽刺漫画家，因为画了讽刺路易—菲利浦国王的漫画而入狱。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吕西恩特斯（1746—1828），西班牙画家。这封信没有附上什么铭文。

3 黛安娜·哈贝克的回复日期。

4 也许是霍华德·威廉·戴维森（1911—1995），1931—1934年就读于奥里尔学院古典学专业，后来加入殖民地公职机构。

张端正而流露出同情心的脸，像是用虽然昂贵却还没有涂上清漆的木材制成。你们那位格拉克曼先生<sup>1</sup>显然是个专家，人很好，百里挑一。这个学期你会来牛津吗？如果来，会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提前告诉我，我会确保那些不相干的事情不会干扰我们的会面。希望你的妹妹不要太讨厌我，因为我回家的路上一直都躺着，谈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非常仔细地向她解释，纤弱的牛津学子们的生活是如何充实而又丰富，甚至炫耀了只有内行才懂的见识，我希望这样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她却告诉我，对她而言，我只是个名字，并请我说说我自己，我便几乎没辙了。

写信安慰你的祖母是否妥当？<sup>2</sup>我非常尊敬你祖父这样的人，这个阶层的人太少了，很少能见到这样的英国犹太人，和他在一起无论怎样都不会感到尴尬，这实在难能可贵。

沙耶

刚刚看了我写给你祖母的信，信中的口气有点自大——比“有点”更甚，但是很真诚。我希望她不会认为这是无礼之举。

致詹妮弗·威廉斯

星期三 [1936年2月25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詹妮弗：

我今晚有点困惑，因为和G.施泰因小姐<sup>3</sup>一起度过了愉快而紧张的时光，她用清晰流畅、简洁明了的英语说话，提出极好且颇有新意的命题供

1 (赫尔曼·)麦克斯·格拉克曼(1911—1975)，南非的罗氏奖学金学者，社会人类学家。

2 写信吊唁黛安娜·哈贝克的祖父，梅尔·斯皮尔曼爵士(1856—1936)。

3 格特鲁德·施泰因小姐(1874—1946)，美国作家。杰斯帕·里德利在他2月25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和[N.O.布朗]一起去乔维特[社团]，听美国来的施泰因小姐(她面容柔和，但是声音嘶哑如公牛)的讲座，她讲的是因果相互作用，她使用的是怀特海的摄受概念等等，不可理解，但很有趣。法雷尔以一个六十岁男人肤浅地谈论哲学大道理的严肃和荒谬感来回应她。”

人思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座令人失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

149 我渴望站起来说，“请您能否稍微含糊一点，就一点点？而且放低音调，因为我们听得很清楚，您还没说我们就都明白了”；但是她对诘问者很强势，她告诉他们，他们的生活错在哪里，问他们在哪一所学院读书，然后给他们难堪，践踏他们，还常常向艾丽丝·B.托克拉斯<sup>1</sup>和伯纳斯勋爵<sup>2</sup>眨眼示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这种发问的方式自我牺牲，所以就非常随和地坐在那里，保持沉默，而我的学生们一个又一个地起来提问，结果却遭到施泰因小姐的充沛精力和天才智力的无情屠戮。博厄斯先生（我极其珍惜我和你对他怀有的同样情绪）不仅仁慈地出席了讲座，随后还跟着我来到全灵学院（顺路拜访那位比埃维耶伯爵<sup>3</sup>）。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对我们两个怀有极大的好意，这反而使他比以往更让人感到不适了。抱歉，我本不想写这些思维错乱的书信导语，只想告诉你，你的来信让我感到多么高兴，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而且重读你的来信让我的心情愈发愉快，非常感谢你。我还怀着纯粹的快乐记起那个下午的早些时候：至于那个下午的后半部分时光，我们在普莱斯教授引领下爬那座大山，虽然我们对收集到的感官素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但这还是不能减轻我所经历的艰辛，当时我呆呆地直视地平线、落日（道格拉斯发出痴迷的惊叹，命令大家观看并描述感受，迫使我不得不看。你不会介意吧，在这里我对他的介绍如此微不足道），在心里绝望地想，如果提议坐在某块形状别致的石头上休息一会儿，是否会被视为道德上可鄙以及不认真对待别人感受的证据？我要愤慨地跟你说，所有温切斯特学院派都怀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观来对待一切，他

- 
- 1 艾丽丝·巴贝特·托克拉斯（1877—1967）是施泰因的同伴、秘书、总组织者和厨师。
  - 2 杰拉德·休·特威特—威尔森（1883—1950），十四世伯纳斯男爵，作曲家、作家、怪人，著有《远离疯狂的战争》（伦敦，1941），书中人物耶利哥先生是以伯林为原型的，见马克·阿莫里，《伯纳斯勋爵：最后的怪人》（伦敦，1998），第182—184页。
  - 3 安·德·比埃维耶，一个来自古老的新教徒家庭的法国贵族，沉默寡言、自恋，同性恋（有国际影响力的同性恋秘密团体的成员），1933年，他来到牛津（没有正式职位）。他住在布罗德大街布莱克韦尔出版社楼上的公寓，在巴利奥学院吃饭，坐在戴维·华莱士旁边。他和华莱士、本·尼克森和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起成立了一个法国人社团：格特鲁德·施泰因、普伦克和（当晚施泰因对该社团讲话，伯林这封信中所说的施泰因对乔维特学会的讲话是在次日）萨尔瓦多·达利接受了邀请，达利还带去了妻子加拉。

们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这个人的好坏，他们到处给自己戴上枷锁，四处强迫那些已经自由的人获得自由，结果只是把想象中的锁链套在别人的身上，然后再由他们戏剧性地卸去这些所谓的锁链。如果我的说法有所夸大，那么这也只是在正确描述的基础上稍加渲染，每当置身于温切斯特学院学者之中或者和他们相处时，我都有这样的强烈感觉。我突然激动地向普莱斯教授说出了我这种看法，他看起来吃了一惊，于是结束了我们的散步。现在大约是凌晨3点，我从长相英俊的布兰奇<sup>1</sup>（那天下午他也说了博厄斯先生的坏话）那里回来。我对他的拜访一连四天，每晚都从午夜至早晨5点，虽然愉快，但也令人筋疲力尽，浑身无力，我现在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无精打采。凌晨2:30左右，人会产生一种无限闲遐和温柔感伤的情绪，现在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了，我必须严厉地终止它。如果你什么时候能过来一起喝茶那就太好了，比如说下个星期五。请一定不要为了喝茶专门来牛津，但是如果你真的专程来了，我会为你备好我们这里声名遐迩的好茶。

150

你的

沙耶·伯林

啊，对了，由于道格拉斯滔滔不绝地介绍你，我的同事里斯强烈表示要见你。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如此安排，除非是在你的要求之下，或者至少经过你的许可，带着你和我辈中（自始至终<sup>2</sup>）最著名的情人同行。如果你希望如此，那么这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我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要再次充当我那古老而蹩脚的女伴角色，更不用说我有可能会招致道格拉斯的愤怒（他是会采取行动的，烧人家的房子，把东西倒在人家的头上，等等），他和佩吉一起把里斯看作撒旦一般的人物。如果他果真是那样，我应该让你得到这种罕见现象带给人的快乐。不过他不是，除非你有所示意，我是不会采取行动的。我已经认为（a）使自己引人注目（b）或者使别人引

1 盖伊·罗斯特朗·布兰奇（1913—1940），1932—1935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英文专业；伯林在牛津的朋友，牛津大学戏剧协会会员；1939年和普鲁丹斯·佩尔哈姆·马奇夫人结婚；加入英国文化协会；在不列颠战役中牺牲。

2 伯林此处原文为：suite et fin。写于附言卡的开头。

人注目都是最令人震惊的犯罪。顺便提一句，你知道法语中有一个迷人的词“生活奋斗者”<sup>1</sup>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概念，我不太肯定你是否喜欢它。

以赛亚·伯林

致斯蒂芬·斯彭德

2月26日 [1936年]<sup>2</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我非常非常抱歉，这么久没有给你回信，但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忙碌的一个学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这边要写书，那边要打理开办研讨班的诸多事宜，一些很聪明的人逼得我不得不着手准备这个研讨班<sup>3</sup>，还必须写一篇在剑桥宣读的论文<sup>4</sup>，我睡得很晚，这一切让我脑力不足以进行思维、写作，以及从事除了说话以外的其他任何事，真的。我希望你能过得更悠闲一点，不要像我这样，日子过得支离破碎的。我讨厌任何打断，这只是我做事上手很慢的另外一种说法，我讨厌被连根拔起搬到别的地方，莫里斯有一次这样说我：结果我热切地为所有小社团、死板的纪律辩护，这仅仅合理解释了我为什么希望得到一个小窝（一个看得到风景的小窝，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窝，等等）。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先生<sup>5</sup>来这里做讲座。他看起来很棒，一个留着

1 Le stuggleforlifeur. 约翰·鲍尔戏仿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作《猫头鹰与猫咪》一文，其中用了“stuggleforlifeur”一词，见《笨拙画报》1954年2月24日，第264页。

2 日期依据伯林这封信所回复的、斯蒂芬·斯彭德 [1936年] 1月10日给伯林的信。

3 1936年第二学期每星期一晚5:30，伯林和J.L.奥斯汀在全灵学院讲授一门关于C.I.刘易斯的《心智和世界秩序》（纽约，1929）的课。伯林认为那是牛津首次对当代哲学著作开设课程。

4 2月28日伯林向剑桥道德科学社递交了一篇论文，也许是关于“快乐”的。

5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1864—1936），西班牙作家和哲学家。他和伯林提到的另外三个人一样，都留胡子。

小胡子的空想家，是安纳托尔·法朗士<sup>1</sup>、弗勒里奥<sup>2</sup>和马志尼<sup>3</sup>的混合体。他说，我们被我们的历史过度压迫，因而失去了行动能力，对过去的了解使我们虚弱无力，因而犹豫不决，也许卢梭是对的，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野蛮方式来卸去我们的负担。我想这只适用于高雅脱俗的当今西班牙人或是1917年的俄国人，他们生活在1848年的某个地方；别人似乎不会因为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忆的存在，对任何东西没完没了的赞成和反对，而感到负担过重，也许除了犹太人。漫长的记忆显然是丑陋的缺陷，它会以可能的腐烂味道毒侵一切。美国人似乎以一种奇异的非历史的方式具有这样的缺陷，就像是人工合成的记忆，合成酷似他们如此强烈需要的真正的记忆，这样的记忆是人工的、经过脱水处理的、虚假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乌纳穆诺先生使我想起格特鲁德·施泰因也在这里做过讲座。她无疑是头脑太清楚了，很好。她说，美国人必须去巴黎，因为他们需要神话，英格兰做不到，因为它的历史发生过了，肯定发生过了，而且可能会和美国的历史混在一起，横行霸道，侵犯他人，奴役他人，就像它对亨利·詹姆斯所做的那样；而法国的历史还没有发生（在美国时间序列中它没有发生过），巴黎没有从人们那里夺去什么，却把人们拥有的一切都留给了他们，至少是在战前，并且提供了一个神话。“在19世纪，所有的巴黎画家都是法国人，” 152  
她说，“但是在20世纪，他们都是西班牙人，这很说明问题。”还有，“事情就必须和一切有点关系吗？”还有，“我们在做的时候，并非做我们做的事，但仍在做”。有人问，“你如何表达意思？”“既做又不做？”“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的吗？”她说，“难道我们不是在做，同时也不在做我们所做的事？我的意思是难道不是如此吗？”她很会对付诘问者：“坐下，我的小伙子，你不想知道我的意思，你只想让我使用你们的语言。哎！我不会那么做的。我不是为公众创造，我是为自己，等等。”她显然非常聪明，在某种意义上是真诚的。她说，所有的美国文字在风格上都自成一类，假如你不知

1 安纳托尔·法朗士，雅克·安纳托尔·第波尔特（1844—1924）的笔名，法国小说家，古典传统的批判者，19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 艾梅·约瑟夫·德·弗勒里奥（1870—1938），1924—1933年任法国驻伦敦大使。

3 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主义领袖，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人物。

道作者是谁，你也能认出它是美国作品，甚至是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海明威<sup>1</sup>？”有人说，“为什么厄内斯特·海明威让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她说：“我教他如何写作，就像你们这里的教授那样：我告诉他做什么，如何做。当然他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我教过他。”我得说，她对我们的教授的看法纯属臆想。伯纳斯勋爵+六位贵族夫人+艾丽丝·B.托克拉斯+施泰因的组合棒极了，很像罗伊风格。总的说来，在法国胡格诺教派贵族阶层领袖比埃维耶伯爵的带领下，我们享受着完全的美学文艺复兴。萨尔瓦多·达利<sup>2</sup>今晚在这里，显然打算完成他的艺术作品，这包括把一个女人的头发剃去一半，然后在她的头上煎蛋饼，再加上许多常见的污言秽行。本·尼克尔森<sup>3</sup>害怕他可能会再做一次。在牛津的高雅文化圈，他和哈钦森<sup>4</sup>像国际象棋中的国王和王后。本举止缓慢，一次就动一步，脆弱、体面、可敬、圆胖、有深度而且又头等重要。如果他要走，整个团体就四分五裂了。杰里米尖刻、活跃、有力，在董事会横冲直撞，把想法塞进人们的脑子里，但是他绝对只是二号人物。

我像以往一样喜欢社会学。共产主义暂时陷入僵局，对政治的所有兴趣都消退了，人们又在谈论超现实主义。显然这是非常暂时的。这是现在唯一活跃的运动。由于每一个社团中都有一些残留分子，他们就做他们做得不好或者做得好的事，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做这些事，像戴维斯·加内特<sup>5</sup>和塞西尔<sup>6</sup>，或者卡梅伦太太，或者莫里斯，或者我，而且，鉴于还是那个因素在导致差异生成（无论那个因素是好是坏，无论是什么差异），像1907年的布卢姆斯伯里（那时，他们抗议对自由性爱的抗议是真切的态度，是争论不

1 厄内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记者、短篇小说家、散文家。

2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3 （莱昂内尔·）本（尼迪克）·尼克尔森（1914—1978），哈罗德·尼克尔森和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的儿子，1933—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历史专业，后来成为艺术史学家。

4 杰里米·尼古拉斯·圣约翰·哈钦森（1915年出生），1933—1936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PPE专业，在博蒙特街与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本·尼克尔森同住。

5 作家戴维·加内特（1892—1981）。

6 （爱德华·克里斯蒂安·）戴维·（加斯科涅·）塞西尔勋爵（1902—1986），1924—1930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1939—1969年任新学院研究员（1948年起任英国文学戈德史密斯讲席教授）。

下的问题等), 现在又有所谓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大多像你一样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也就是说, 他们不希望发生一场现实的流血革命, 而且也不太知道如果这样的革命真的发生,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只是觉得社会主义没有效果, 没有增加负担, 官僚主义, 不可信任, 在某种意义上是高雅的个人主义的空头理论家进行的一场高雅起义……[一场]纯粹的知识阶层运动, 只不过是因为有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加入而稍稍调和了一点。共产主义者似乎可以理解语言, 而社会主义者通常要喋喋不休得多, 也更粗俗一点。我说的这些一点都不是对二者表面的描述, 共产主义是如此真切地充斥着概念, 这对它而言是致命的。在文化世界<sup>1</sup>中, 不管怎么说, 是他们, 也只有他们似乎在前进。我想, 因为这是以高尚的神话供给饥饿的知识分子的又一个例子。我想所有那些伟大而因袭相传的诗歌都是伪神话, 只有勉强糊口的抒情诗人不需要它, 像卡图卢斯和海涅<sup>2</sup>。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诗歌表达, 不用插入一个体系框架, 一个特别建造的非日常的世界。贝多芬的音乐可以说一定含有神话, 而舒伯特的音乐则没有, 柏辽兹肯定有, 瓦格纳、穆索尔斯基也有, 但是柏辽兹之后的法国作曲家们没有。不过我认为, 法国人已经拥有一种如此传统而有序的语言, 他们不需要神话了。

你说到阅读希腊语著作<sup>3</sup>, 如果我是你, 我会读有注释的柏拉图和希罗多德的著作:《斐德罗篇》、《飨宴篇》、《斐多篇》, 也许还有《伊翁篇》; 希罗多德的早期著述, 至于悲剧:《阿伽门农》、《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酒神的女祭司》是你一定会喜欢的, 别的作品就可看可不看了。济慈翻译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我觉得很美。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很容易读, 说得上有点意思。

我本该认为牛津集<sup>4</sup>太难了——对我来说它整体上是这样的, 莫里斯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Kulturwelt。

2 盖尤斯·瓦雷里乌斯·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前54), 罗马抒情诗人。(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原姓哈利)·海涅(1797—1856), 德国诗人, 作品包括爱情抒情诗。两人都从自身的爱情经历中获得灵感。

3 斯彭德解释说, 他的终极目标是阅读希腊悲剧。

4 《牛津希腊诗歌集》(牛津, 1930)。



刚刚出版了他关于希腊抒情诗歌的大作<sup>1</sup>，我还没有读，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安排得很好：感谢上帝他得到了教授职位，如果他没有得到，我们都会很不安。<sup>2</sup>罗斯教授（在庞德—普洛佩提乌斯问题上是你的敌人）<sup>3</sup>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滑稽的人<sup>4</sup>。请再写一次。我非常非常累了，必须上床睡觉。斯帕洛发表了一篇关于N.米奇森的最后一本书的有趣而又恶意的文章<sup>5</sup>，文中引用了诸如“一块挂着的松弛美味的女性肉体”或是“一个社会主义女人应该做什么”，还刻薄地穿插了《圣经》中约瑟的故事，伊丽莎白·帕肯汉姆说她真的经常那样问自己——她日益乏味和愚蠢了。克罗斯曼正在做关于“战争罪的哲学”的糟糕的反民主讲座，他现在淫秽丑闻缠身。给我写信。

沙耶

你能否寄给我一些你写的剧本？你剧本中的一些想法确实让我兴奋。告诉我更多关于葡萄牙等地的事，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关于拜伦和洞穴的事了。<sup>6</sup>

1 C.M.鲍拉，《希腊抒情诗歌：从阿尔克曼到西摩尼得斯》（牛津，1936）。

2 鲍拉是希腊语瑞吉斯讲席教授一职的候选人，该职位后来由埃里克·罗伯特森·多兹（1893—1979）获得。多兹自1924年起在伯明翰大学任希腊语教授。另外一位候选人是约翰·迪沃·丹尼斯顿（1887—1949），1913—1949年任哈特福学院研究员和古典学导师。在希腊语方面，丹尼斯顿是最好的人选，但是当时的教授、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吉尔伯特·穆雷（下文第201页注3）认为丹尼斯顿缺乏独创性，因而更倾向比鲍拉优秀得多的多兹。

3 赫伯特·詹宁思·罗斯（1883—1961），1927—1953年任圣安德鲁学院希腊语教授。埃兹拉·庞德所译的普洛佩提乌斯诗作既可以认为是诗人向诗人的致敬，也可以认为是错误大全。例如，庞德把意思为“令人渴望的”的单词“sitiens”，译成了“坐着的”，《向普洛佩提乌斯致意》（伦敦，1934），2.6（第12页）。

4 伯林此处原文为：lächerliche Figur。

5 约翰·斯帕洛，《一个社会主义女人做什么？》，评论纳奥米·米奇森《我们被警告过了：一部小说》（伦敦，1935）的文章，《观察家》，1936年2月7日发行，第209—210页。第一句让伯林印象深刻的文中引用语是对小说中一个角色——俄国女孩奥克萨娜的描述：“一块松弛美味的女性肉体。”

6 这个剧本以标题“法官的审判：五幕悲剧”（伦敦，[1938]）出版，但是1936年3月斯彭德寄给伯林的更早的版本的标题是“法官之死”。斯彭德和朋友们在葡萄牙买了房子，他描绘房子后面的山上“有许多浪漫的岩石”，还说：“拜伦认为辛特拉是他去过的最美的地方。人们可以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那里非常像18世纪。在这些山上，人们就会明白什么是岩洞。那里有许多岩洞，现在很潮湿，在岩脊上，美丽而略微冰冷黏湿的水蛭在冬眠。”

## 题外话

新闻：汉弗莱乘船去印度了。弗雷迪·艾耶尔生了个女儿（摩尔会说，可能怀不上男孩），取名瓦莱丽<sup>1</sup>。科洛思维特太太写信询问，大意是我们这代人对容忍妻子通奸的丈夫是什么看法？<sup>2</sup>我想，科尔—米奇森会说，在事业上帮助妻子的情人是他的职责。<sup>3</sup>路易斯·麦克尼斯因妻子与一个名叫卡兹曼的美国犹太人私奔而饱受折磨<sup>4</sup>，但是比兹雷太太据说已经阻止了她和他去美国的签证。到处都是闲言碎语。罗斯令人作呕地引用兰波的诗句（我想是关于阿比西尼亚的那一首诗）<sup>5</sup>，今晚他还激烈地攻击了我，因为我对他嘲笑太过。我挠痒，他抱怨说我应该经常修剪指甲。你会同意这是一个非常不真实的大学教师公用休息室的场景，阿奇·坎贝尔也许会喜欢这样。

又及：关于陈述和描述<sup>6</sup>：陈述是否总是要使用直接的语言，而且没有神话人物，而描述则涉及始终试图提供连贯的对象征的热爱，甚至在简短地表述某一特定的神话故事时也是如此？“神话故事”这些词有太多的暗示，人们不想得到这样浮华的东西，但是毕竟私人世界，或者是私人世界的碎片，暗示了所揭示的东西还没有完成，还有无限的东西在那里，等等。

1 1936年2月21日出生，1981年去世。

2 这封信的日期是1936年2月2日，来自摩尔·科洛思维特的母亲，她信中说的是被她称为“洋洋自得的丈夫”。

3 这里提到两对已婚夫妇：（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1889—1959）和玛格丽特·伊莎贝尔·科尔（1893—1980）；他们的亲密朋友（吉尔伯特·）理查德·米奇森（1890—1970）和纳奥米·玛格丽特·米奇森（1897—1998），婚前姓哈尔丹。玛格丽特·科尔和迪克·米奇森之间有特殊的亲密关系，可能是性关系，这种关系被温和而性冷淡的道格拉斯和进步的纳奥米所接受；道格拉斯还在事业上帮助迪克。见贝蒂·D.弗农，《玛格丽特·科尔，1893—1980：政治传记》（伦敦，1986），第67—71页，以及詹妮·卡尔德，《纳奥米·米奇森的九条命》（伦敦，1997），第103页。

4 上文第174页注1。

5 法国诗人（让—尼古拉斯—）阿图尔·兰波（1854—1991），1880—1881年在阿比西尼亚的哈拉从事了一年的皮毛和咖啡贸易；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墨索里尼正在攻打阿比西尼亚。

6 在关于希腊语的讨论中，斯彭德提出“希腊诗歌总是在陈述，而我们的诗歌总是在描述”。

我很抱歉这么说太晦涩难懂，但是我的确认为，你不会被希腊语貌似无修饰的本质所欺骗，而这样的本质只在译本中存在：《圣经》也可以被译成这样，而我认为它存在大量描述。你说呢？

斯蒂芬·斯彭德3月2日回信，信中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伯林在给一位不知名的朋友的这张便条中为斯彭德的信做了注解：

如果出版，这本书必定会引发报纸上的争议和引用，等等。也许得有人告诉他现在不能写这本书。我这边的强烈抗议如何才能阻止他这么做，请告诉我你的想法[……]

杰斯帕·里德利<sup>1</sup>3月4日的日记开头一段，使人想起在这个时期伯林房间的气氛：

去了伯林的房间，用无线电收音机收听柏辽兹的《安魂弥撒曲》和《葬礼与凯旋交响曲》，读伯林拿出来的1953年的弥撒书（虫蛀过的、庄严非凡的、华美的）中的《最后审判日》[……]

盖尔斯·罗伯逊中间进来了，矮个儿，腆着肚子，体态僵直，咧着厚嘴唇笑，把一切话题都变成剑桥的八卦，像极了癞蛤蟆，难以形容，令人讨厌，伯林说如果他是一幅画就会喜欢他，可是他不是一幅画。

伯林用华丽的语言报告他怎样在剑桥宣读关于快乐的文章——尤其是哈代<sup>2</sup>对瓦勒里安·韦尔兹利<sup>3</sup>刨根问底的情形。在他桌上的显眼位置摆放着加

1 杰斯帕·莫里斯·亚历山大·里德利(1913—1943)，1932—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9年和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结婚，在战争中遇难。

2 格德弗雷·哈罗德·哈代(1877—1947)，1919—1931年任新学院几何学萨维里安讲席教授、研究员(1936—1947年为荣誉研究员)；1931—1942年任剑桥纯粹数学萨德勒里安讲席教授。

3 亚瑟·瓦勒里安·韦尔兹利(1915年出生)，后来(1972年)成为惠灵顿公爵八世，1934—1938年在新学院就读并获得历史和法语的普通学士学位。

利的照片(他觉得加利生气勃勃),这是模仿莫尔<sup>2</sup>,疯狂的智慧。别人都没有说话,但是气氛很和谐。奥斯汀中间进来过,罗素也来过——他看上去与其说容易琢磨,不如说害羞、难为情、不开心——因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对他挺无礼。然后他走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格子大衣,系着腰带,爱尔兰共和军革命者们如果丢了雨衣就会这么打扮。

3月5日,星期四

和伯林一起吃午饭——去了他的房间,发现维尔利斯<sup>3</sup>完成了他的论文。戏剧化的相遇。伯林在刮胡子,以古怪的方式播放厄尔巴赫<sup>4</sup>的唱片——从自然音阶转变成无调,最终变成华丽的呜咽声。瓦格纳如果敢于尝试,也会写出这样的曲子,因为他作品中的自然音阶过渡清楚地表明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谄媚的潘柏<sup>5</sup>走进来了,他七十四岁,白发、悠闲、英俊。佩尔斯也进来了。奥斯汀后来出现在伯林的房中,像人们预见的那样,他打开了“快乐的分量有多少?”这个话题,然后讨论了半个小时。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6年3月中旬]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你的剧本安全寄到了。我还没有读它,一旦我读完了,就会立刻通过巴塞罗纳的库克转交,给你写封稍长的信,除非你告诉我其他的地址。这里,

- 1 也许是(沃尔特·)布莱斯·加利(1915—1998),1931—1935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5—1938年任斯旺西大学学院哲学助理讲师。
- 2 乔治·爱德华·莫尔(1873—1958),1925—1939年任剑桥哲学教授。
- 3 查尔斯·海德·维尔利斯(1912—1992),1933—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后来(1976年)成为英国钢铁公司主席。
- 4 也许是作曲家菲利普·海因里希·厄尔巴赫(1657—1714)之误,他写的一些歌曲被录制成唱片,一张唱片如果放在唱盘的边上(“以古怪的方式”)播放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 5 弗朗西斯·威廉·潘柏(1862—1954),律师,1914—1932年任全灵学院的院长,1932—1954年为荣誉研究员。

戴[斯蒙德]·麦卡锡已经在写垃圾文章了,是关于里德研究雪莱的书<sup>1</sup>的;这是受到了斯帕洛写的小书<sup>2</sup>的鼓励,老一辈现在都大胆地说斯帕洛的书是“垃圾”、“无知”,等等,对普通人来说,它不太令人兴奋,不过论题还是清楚的,给人的印象是江湖骗子的虚张声势,没有危险的报复紧随其后,就像希特勒占领莱茵兰<sup>3</sup>。政治局势似乎有点令人害怕:道森在《泰晤士报》进行伟大的反俄行动,而洛克·兰普森<sup>4</sup>在散发反希特勒的宣传小册子,上面说“苏醒吧,英格兰!”、“德国的间谍在收买英国机密!”等等。在这样的气氛中,真实的战前恐慌情绪慢慢地制造出来了。我看不出能做什么,除了(a)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参战;或是(b)对德国人彻底地表示不赞成。这些都是政治层面的事,其余的似乎就是阴谋了。

把你下一步的去向写信告诉我。我可能会和父母一起去尼斯<sup>5</sup>,我希望看见法国人的敌对情绪,这甚至会影响到我这样的外侨<sup>6</sup>。我们选了一个甚至比我更不像英国人的人,即一个名叫J.佩特罗夫·普拉门塔兹的黑山人<sup>7</sup>,  
158 我希望他在学院会议上能够制造更多的恐怖主义。他来自一个古老的采蒂

1 赫伯特·里德,《为雪莱辩护及其他文章》(伦敦, [1936]),戴斯蒙德的书评《雪莱和精神分析:赫伯特·里德先生的批评》,发表于《星期日泰晤士报》1936年3月1日第8版。

2 《理智与诗歌》(上文第150页注7)。

3 3月7日,德国军队再度进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兰,此举直接违反了1925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公约永久性确认《凡尔赛公约》规定的德、法、比利时三国之间的边境线,德国保证它的军队不会进入莱茵兰。德国声称法国和苏联最新达成的军事联盟违反了《洛迦诺公约》,因此德国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上,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家同意,不论德国重占莱茵兰的合法性如何,此事件不足以成为战争的理由。

4 奥利弗·斯蒂林弗利特·洛克—兰普森指挥官(1880—1954),律师、记者;作为一战中皇家海军俄罗斯装甲师指挥官,他的业绩包括参与策划俄国沙皇的逃亡;1922—1945年任伯明翰汉兹沃斯选区保守党下院议员;丘吉尔的朋友,像丘吉尔一样,洛克—兰普森从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变成了更强烈的反纳粹者;是爱因斯坦逃离纳粹德国的主要促成者。他发起的反对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后来导致一位指控英国犹太人借宗教仪式谋杀的作家入狱。

5 去过逾越节。

6 伯林最喜欢的对自己和一些朋友的描述。“metic”(外侨)源自古希腊语,意即居住在希腊城市中的享有一些公民特权的外来人。

7 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塔兹(1912—1975),1936—1951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后来接替伯林成为社会和政治哲学齐契利讲席教授。伯林的《个人印象》一书中出现了伯林关于普拉门塔兹的讲话,伯林还在《英国名人辞典》中提供了一条关于他的条目。很明显,从这些叙述中,普拉门塔兹并没有实现伯林当初吓人的预期。

涅家族，看起来像个土匪。

爱你的

沙耶

致玛丽·费希尔（在西班牙）

邮戳日期1936年3月2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小宝贝”说她已经把理查德·佩尔斯的命运<sup>1</sup>告诉你了。我的朋友特纳先生<sup>2</sup>可能会评论说，佩尔斯堕落了。然而我真的不太乐意用我拼凑的瓦格纳唱片中的歌词惊呼“哦痛苦，/ 哦灾难，/ 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sup>3</sup>当然我并不认识鲍维克小姐：假如是像我所担心的那样，她名叫谢拉，是爱丽卡·林赛的侄女，那么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王朝联姻，在一个某些头衔会导致不可否认的联想的世界，这些化名的入侵让人感到很不方便，很烦恼。虽然鲍维克小姐显然符合我曾从理查德那里打探到的那份著名的理想一览表，她圆脸、温顺，尚属不爱外出的人，把北牛津看成是不可避免地要常住的宜人地方，在别的方面她像理想中的女黑人——牛津的女黑人，我们认定他想要这种类型。莫德太太<sup>4</sup>在得知这个消息时，说“我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莫德<sup>5</sup>”。但在说这话之前，她还说了“哦，那个红脸

1 与詹妮特·林赛·鲍维克结婚，詹妮特是（弗雷德里克·）莫里斯·鲍维克（1879—1963）的女儿；1928—1947年，莫里斯·鲍维克任现代史瑞吉斯讲席教授及奥里尔学院研究员，其妻苏珊（婚前姓林赛）是亚历山大·邓洛普·林赛（1879—1952）的侄女；亚历山大·邓洛普·林赛，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924—1949年任巴利奥学院院长，1935—1938年任副校长，他的妻子是爱丽卡（婚前姓施托尔）。伯林把詹妮特·鲍维克的名字弄错了。

2 也许是G.J.特纳（上文第171页注1）。

3 关于这张唱片，见下文第809页。

4 （玛格丽特·）琼·海·（瑞德克里夫—）莫德（1904—1993），婚前姓汉密尔顿，约翰（·瑞德克里夫—）莫德的妻子，见下注。

5 约翰·普利马特·瑞德克里夫（·瑞德克里夫—）莫德（1906—1982），1967年成为（布里斯托尔城及郡的）瑞德克里夫—莫德男爵；1932—1939年任大学学院研究员、政治与经济学导师；1933—1939年任系主任；1939—1943年任伦敦伯克贝克学院院长；1941—1944年任食品部代

的女人呀”。抱歉我甚至把这样的话语都记下来了,但是我必须把这话告诉某个会产生共鸣的人。那三个用烫金信封把电报寄给佩尔斯的人现在找到了,他们是柯蒂斯、卡普兰德和考克斯。这个名字都以C打头的三人帮不像史密斯帮那样名声显赫,讨人喜欢(我向你列举过史密斯帮的名单没有?这个不可贬低的群体包括亚当·史密斯,西德尼·史密斯们,“地址查无此人而被退回”的史密斯们,F.E.史密斯,J.A.史密斯,乔治·亚当·史密斯爵士和A.H.史密斯,所有的史密斯都是非常积极和强壮的人物,天性快乐、坚定,但是不会无礼,虽然有时候有点粗俗)。<sup>1</sup>我无法认为,像他们说的那样,婚姻会导致改变,我认为他是为了这样的改变而结婚的。我认为一切都还将是老样子,尽管如果他们突然决定,比如,明年夏天去萨尔茨堡,我承认,一切就不会全都是老样子了。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除了在她的朋友圈中突然碰见他三次,我做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评论,并被告知,鲍维克太太的确非常好,然后我就更不得体地吃吃地笑了,对方则回以可爱的简·奥斯汀式的难为情和羞红的脸,我意识到自己入侵了人家的地盘,于是有意回避更多的评论,因为我既善解人意又机敏,对方于是早早对我坦白了。如果你认为这很糟糕,我还是坚持相信我明白你的意思。他本可能变得更加尖酸刻薄,这从艺术角度来说更好,但是让人很不自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传统的美满结局,尽管这样的结局是多么粗陋,多么缺乏美感而令人反感。我想,谁也不应认为,他可能会和非凡出众或是高贵雅致的女人结婚。记住,无论如何,佩尔斯都是普莱斯—盖伊时代<sup>2</sup>的温切斯特学院校友,因此他寻求的是安稳和体面的生活,而且,作为佩尔斯,他

---

理秘书,后任二等秘书;1944—1945年任重建部大臣办公室二等秘书;1945年任枢密院长办公室秘书;1945—1952年任教育部常务次官。

- 前文中没有确认过这些史密斯的身份(这是否重要?):政治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亚当·斯密)(1723—1790);作家西德尼·史密斯(1771—1845),圣保罗大教堂教士;其他的西德尼·史密斯们可能是西德尼·古德瑟·史密斯(1915—1974),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弗里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1872—1930),伯肯海德伯爵一世,1919—1922年任大法官;乔治·亚当·史密斯(1856—1942),《圣经》学者,任阿伯丁大学院长和副校长直至1935年。
- 也许是横跨或者包括H.H.普莱斯(1899—1984)和盖伊·奇尔弗(1910—1982)在温切斯特学院的时期,理查德·佩尔斯(1902—1958)在温切斯特学院的时期可能和普莱斯的相重合。

与世无争，拥有一个名至实归的妻子。凭着这份明细单是不能得到非常昂贵的东西的，只能得到耐用、实用、体面的东西。不过我必须停止毁谤一个不认识的人了（似乎我曾经这么阻止过自己……）。<sup>1</sup>我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马克思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详细研究上面了（例如卡尔纳普<sup>2</sup>说，所有的归纳命题一定要么就是同义反复，要么就是自相矛盾，这太让我快乐了）。<sup>3</sup> 160  
我已经读了E.M.福斯特的杂集<sup>4</sup>，非常有趣，痛苦而敏锐，使读者害怕见到作者，因为作者显然敏感、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使人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难为情，而且他总是能拿出不可辩驳的理由使人如此难堪，就像人们认为的萨姆纳<sup>5</sup>（哦，他是如此虚假）那样的人。斯蒂芬也给我寄来了一本韵文剧本，他扬言要成为V.雨果那样的人，只关注“事物的眼泪”<sup>6</sup>，并坚信一句格言：诗歌的确很可悲。这永远“可怜的”<sup>7</sup>诉求，仔细地安插在每三行韵文中的“眼泪”<sup>8</sup>，太过火了一点。我打算给他写一封严厉的信，打击一下他的兴致。我不是生性如此，只是斯蒂芬总是不自觉地使我想卖弄学问，几乎立即就对他管头管脚起来。现在，我的天，是布莱克威的最后一场聚会。你不能否认（能否认吗？）他举行的所有聚会都带有一种真正宏大的令人惊惧之感，不是艾丽森<sup>9</sup>所有的矫情能够完全破坏

1 伯林后来对佩尔斯太太的评论也许会热情一些。的确，在他为佩尔斯所拟的讣告中，他提到“他的妻子对他的挚爱和关怀”，这表明伯林后来意识到这是成功的婚姻，而且，对佩尔斯太太以勇气和智慧照顾她日益丧失行动能力的丈夫，伯林和大家一样怀有敬佩。

2 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德国逻辑实证派哲学家，维也纳学会的领导人物。

3 伯林在写一篇论文（是对玛格丽特·麦克唐纳的回复），题为“归纳与假设”，发表于《亚里士多德学会公报》增刊卷16（1937），第63—102页。

4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小说家。该杂集是《阿冰格收获》（伦敦，1936），收入文学批评、散文、诗歌和小说，杂集是以萨里郡的一个村庄命名的，福斯特在那里继承了一所房子。

5 （本尼迪克特·）汉弗莱·萨姆纳（1893—1951），1925—1944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导师；1944—1945年任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1945—1951年任全灵学院院长。

6 伯林此处原文为：lacrimae rerum。该拉丁文短语来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卷1，第642页，几不可译；此为字面意义。

7 伯林此处原文为：ad misericordiam。

8 伯林此处原文为：larmes。

9 艾丽森·布莱克威（1913—1983），婚前姓霍普，1932—1935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英文专业，后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学评论员。她于1935年和阿兰·布莱克威结婚，后者1936年去世，她1938年与托尼·安德鲁斯结婚（上文第108页注5）。



的。那惊人的、蕴含激情的气氛，一切都不真实，每个人都在为着什么目的而游戏，为了制造效果，恶作剧，或是为了安全感，或者只是为了有在家的感觉，这样的气氛是对绝对独特的、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东西的称颂。很高兴我能够拒绝参加实际上的晚餐，因为有个叫戈迪的人来了，晚上11点到。这样的场景一点都不沉闷。想象一下布莱克威在圣体学院的房间，中间是一张沙发，沙发上坐着三个人物：中间是格雷夫斯小姐，有点醉醺醺的了，但还沉着镇定；她的左边是R.奇尔弗，神情专注而疲惫；格雷夫斯小姐右边是莫里斯，深紫色的皮肤，很有进攻性，喝了不少酒，对理查德嚷嚷着。他们就像打了二十七回合的拳击手，得分都已经很高，都非常非常累了，摇摇晃晃地挥着拳头，常常打不中对手，但是还是一直一直打下去。我后来知道理查德在吃晚餐的时候受了很多惩罚，如果一个人没有他那么强悍的话，可能就承受不住那样的打击了。我无法向你形容这场130°的决斗，

161 它甚至使凶猛的布莱克威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托尼坐在那里，快乐，不觉有任何不适。布莱克威通过让房间里的其他人（莫蒂默夫妇<sup>1</sup>、库克小姐<sup>2</sup>、费希尔—W.小姐<sup>3</sup>、盖伊）保持活跃，一直不断地对托尼说，“你知道克罗斯曼的弟弟<sup>4</sup>要来圣体学院了吗？我的天，等等”。到此时为止，这产生了魔咒般的效果，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指的是一句那天晚上他肯定重复说了二十遍的话，他一定是想对托尼这么说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他喜欢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刺激，然后感激地释放被禁锢的情绪。盖伊和詹妮弗站在窗里，他们是非常安静和担惊受怕的一对，却是台风中一处宁静的深潭，悠闲的群落。显然莫里斯晚上一来就太快活了，他猛烈地摇晃着莫蒂默太太的肩膀，像欧佩小姐甚至是“小宝贝”等人也许会喜欢这样，但是莫蒂默太太就不太喜欢了。然后他坐在库克小姐和艾丽森的中间，这意味着往两

1 罗伯特·莫蒂默（1902—1976），1930—1944年为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1944—1949年任大学教堂牧师，道德和教牧神学瑞吉斯讲席教授；后来（1949—1973年）成为埃克塞特主教。他的妻子玛丽（“莫丽”）婚前姓沃克，是雷切尔·沃克的姐姐。

2 也许是海伦·库克，1930年代在牛津爱慕者甚多，她是1914—1936年任基督教堂学院教士以及希伯来语瑞吉斯讲席教授的乔治·阿尔伯特·库克牧师的女儿。

3 詹妮弗·威廉斯。

4 托马斯·爱德华·斯塔福·克罗斯曼（1917—1940），1936年就读于圣体学院古典学专业。

个方向进行艰苦的上山运动。等我到的时候，他正在以令人晕眩的愤怒<sup>1</sup>复仇。他只要一移动，我就逃往相反的方向，寻求庇护所和琐屑的谈话。即使是布莱克威，也似乎为自己不明智地唤起他人的激情而感到尴尬了。真是可怕，莫里斯因为格雷夫斯小姐而沦落至此，她可以说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特有姿态（多么好的一句话），据悉，两个被她拒绝的追求者，贝尔先生<sup>2</sup>和麦克米兰先生<sup>3</sup>（在“小宝贝”的公司工作），心中燃烧着嫉妒的怒火，联合起来，在这个周末也来到牛津，要密切注视这个女唐璜的一举一动（文学中是否有这样的场景，堂吉诃德和唐璜狭路相逢？我不记得二者相遇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定需要天才的笔触来描述）。最后，我，像往常一样充当姨妈的角色，解散聚会，把盖伊和费希尔—W.小姐塞进出租车，带着大声唱歌、急着要叫醒整个全灵学院的莫里斯回去。我回到聚会，见斯帕洛和里斯正在争论生性敏感和后天形成的敏感或是别的什么之间的差别。然而，这些插曲（+赛小姐的聚会，理查德的洋相+格雷夫斯小姐+斯科特—詹姆斯小姐<sup>4</sup>，所有人都艰难地保持沉默，也没有因为忍受大量极为讨厌的人和事而得到心灵感通的回报）越来越少见了，我吃惊地发现（承认这一点很屈辱）我花了三倍于以往的时间专门用于闲谈。我相信，据安排，安瑞普小姐<sup>5</sup>将成为莫德林学院的斯蒂文斯先生<sup>6</sup>的奴隶。请给我写信（谈谈我真心渴望

162

1 伯林此处原文为：vertiginoso con furia。

2 奥利弗·西德尼·贝尔（1913—1980），1932—1935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PPE专业，后来（1949—1957年）成为《纽约时报》编辑，肯尼思·贝尔（上文第76页注1）之子。

3 1934年，“小宝贝”一毕业离开牛津就作为特约审稿人加盟威廉·海因曼出版社，周薪3英镑。她的同事约翰·麦克米兰后来赴美成为《纽约时报书评》的图书评论家。

4 在和萨莉·格雷夫斯小姐结婚之前，理查德·奇尔弗曾与作家安·斯科特—詹姆斯（1913年出生）恋爱。当时斯科特—詹姆斯为《时尚》杂志工作。虽然她在萨莫维尔学院古典文学士学位初试得了第一名，可是她没有适应古典人文学科课程的学习，因此念到第三年时离开了学校。

5 安娜斯塔西娅·安瑞普（1912—1995），波里斯和海伦（罗杰·弗莱的情妇）的女儿，是詹妮弗·威廉斯和萨莉·格雷夫斯在萨莫维尔学院的同届。1932—1934年攻读历史专业，1935—1936年攻读英语专业，没能获得学历。

6 科特内·爱德华·斯蒂文斯（原文如此）（1905—1976；由于某种原因得绰号“汤姆·布朗”并因而为人所知），古代史学家，1933—1972年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他喜欢让学生为他做实践工作，学生们也乐于默许这样的安排，因此这里提到的奴役是善意的。

去的西班牙<sup>1</sup>)，你父亲怎么样了？全灵学院选了一位名叫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塔兹的黑山人，给他研究员基金，你认为这个消息会让你父亲兴奋吗？“他是哪国人？”欧曼<sup>2</sup>问。别人回答了他。“黑山人!!!!!!”他说道，几乎要昏倒，很滑稽。海德勒姆<sup>3</sup>说，在他走进学院会议室之前，应该搜身检查看看他身上是否藏有炸弹。他支持南方斯拉夫人，因为他建议，米斯特洛维奇<sup>4</sup>为他雕塑的塑像，应该选用白色大理石，并且竖立在格洛斯特教堂的外面（教士们本来是建议画一幅画像）。普拉门塔兹奇丑无比，看起来像贩卖加仑子和海枣的商人，竟是个哲学家。你能否记得提醒我跟你谈谈：(a) 在讨论到人类学时，欧曼关于心理学的论述 (b) 欧曼关于女人在图书馆进行非正常的学习研究的论述 (c) 卡普兰德关于巴巴多斯的科德灵顿学院<sup>5</sup>的评论（“他们在那里，我现在看得见他们，十五个黑人，五个咖啡色皮肤的，五个白皮肤的”）。一句莫里斯语录：我告诉他，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谁像艾迪·萨克维尔·韦斯特<sup>6</sup>这样有这么多约会的。“约会，约会，”他说，“约会，为什么他是个约会匣子？”你说这能得β<sup>7</sup>吗？你是否会考虑去萨尔兹堡？

163 沙耶

---

1 在H.A.L.费希尔大病一场之后，三位费希尔正同莱迪丝·费希尔的姐姐和姐夫、乔治爵士和扬夫人（杰西，有时候叫“海伦”）住在一起，扬家在托雷莫里诺斯有一所房子，那时那里还只是一个村庄。

2 查尔斯（威廉·查得维克）·欧曼爵士（1860—1946），历史学家，1883—1946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3 阿瑟·凯雷·海德勒姆主教大人（1862—1947），历史学家，格罗斯特郡主教，1885—1897和1924—1947年担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4 伊万·米斯特洛维奇（1883—1962），克罗地亚巨像雕塑家。

5 克里斯托弗·科德灵顿（1668—1710），军人。1690—1697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根据他的遗嘱）他慷慨捐助建立了全灵学院的科德灵顿图书馆和巴巴多斯的科德灵顿学院。

6 爱德华（“艾迪”）·查尔斯·萨克维尔—韦斯特（1901—1965），音乐评论家和作家，后来（1962年）成为萨克维尔男爵。

7 有关希腊字母见上文第109页注3。

致詹妮弗·威廉斯

[1936年3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詹妮弗：

能够向你解释阿尔弗雷德·J·艾耶尔的书<sup>1</sup>中所犯的错误，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比此事更让我乐意做了。我坚持认为这些错误对艾耶尔的书有负面影响，尤其我要第一次亲自明确地审视这些错误。其中一些错误我会在明天开庭会时记下来，其余的我到星期天晚上再写。我怀着真诚的愉快心情期待着做这件事。同时让我向你推荐普莱斯教授写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想是1935年发表在一份名为《哲学》的杂志上，题为“神学和逻辑实证主义”<sup>2</sup>，文章也是充满错误，但无论哪一方面读来都很令人愉悦；也许不是充满错误，而是在中间部分出了很多错。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想着明天的拜访。希望等我到的时候，注定要发生的事要么已经发生了，要么就别发生。<sup>3</sup>

也许我还不能这么快就完成我的小文章<sup>4</sup>，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句话是专门为了这样结束而写的），它可以成为你的威尔士之旅中新奇的读物。我认为，这是我深夜中想到的，人类有三种区分方法

A) 托尔斯泰式的区分：有理解力的，没有理解力的。

B) 对人类事务有同情心的，对人类事务没有同情心的，以及疯子和怪人。

C) 有限却达到圆满的人，无限但毫无特点的人。

这么表述不是很让人开心，但是这么区分很有意思，很有指导意义，不是闲扯，可以认真并有创造性地应用这样的区分法。

1 《语言、真理与逻辑》（伦敦，1936）。

2 H.H.普莱斯，《逻辑实证主义与神学》，《哲学》，（1935年）第10期，第313—331页。

3 詹妮弗·哈特不记得指的是什么事。

4 詹妮弗·哈特不知道这指的是哪一篇文章。她有一封来自杰斯帕·里德利、日期为1936年3月的信，要求她读一篇伯林写的、提到他的小文章，如果就是这封信，那么信一定是写于1936年3月间或是之前。

我大胆地结束这封不对称的信。

你永远的

164 沙耶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6年4月25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很抱歉这么久都没有给你写信，我在法国，非常勤奋地工作，然后回来，我的学生乱成一团，这需要时间。我已经读了两遍你的《法官的审判》<sup>1</sup>，并且，当然，你知道，我喜欢你所写的一切文字本身<sup>2</sup>。如你所说，我们已经谈论过主题，如果我要发表有用的评论，我就必须把主题和对你作品的天然喜爱放在一边。无论你的诗歌多好，你的场景安排多么有效——剧作的渐增效果甚至和你到目前为止所写的，我认为非常动人、非常美的文字一样强烈——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危险是，剧作中有太强的道德观，蓄意的道德观，字里行间都有，有太多的眼泪，这对任何诗人都是危险的。我原本以为（请原谅我像导师般地说话），诗人就自己真正感到激动的社会问题写作，除非他像托勒<sup>3</sup>一样尖叫——这么做根本就是愚蠢的，你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像他，你其实有一部分像古德曼<sup>4</sup>——否则，就是变成雨果那样的人。你记得雨果在观看了莎拉·伯恩哈特的演出之后，送去一块未经

1 《法官的审判》（上文第184页注6）。提及法西斯对司法政治独立的毁灭，斯彭德通过描述德国司法展现主题。法官（根据法律）以谋杀佩特拉——一个半犹太半基督徒波兰人的罪名判处一伙纳粹恶棍死刑，另外三名共产主义者也因为较轻的自卫和散发宣传品的罪行而被判处死刑。法官认为出于良心的考虑，共产主义者应该被总统准予缓刑，然而发生了一场纳粹暴乱，之后内政大臣撤销了这个判决，于是只有谋杀佩特拉的罪犯获得缓刑。法官辞职表示抗议，而后被枪杀。

2 伯林此处原文为：für sich。

3 移居国外的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1893—1939）。

4 也许是理查德·哈克特·古德曼，1929—1932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和伯林共同主编《牛津展望》（上文第22页注4）。

切割的钻石，上面镌刻着“维克多·雨果的一滴泪”。我认为这是极其诚挚的表示，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这很愚蠢或是修辞化，而在于他的确成了一位善于感动和流泪的专家，而且后来以他的真实身份感动和流泪了，而不是扮演感动和流泪的角色。我想，你不像他那样，你不会垄断被政治不公和政治悲剧所激起的情绪。然而在你的诗作中使人宽慰的轻松调剂太少了，就像艾略特作品中的歌唱和朗诵，当写得很好的时候，是纯粹的诗歌，既不描述，也不陈述，而只是表达，是对他的说教和辩论内容的调剂。在你的剧本中，每一行，每一字（这么说夸张了），都紧紧揪着要害，浓缩的感情太多了，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诗歌一无所知，对戏剧一无所知，我理应认为（如果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批评者）我的批评以及建议，都毫无用处。我想说的是，我，不是别的什么人，需要某种无拘无束和抽象，一种没有先入之见的元素，在我看来，这些都被你的句子中为一时权宜而具有的目的性所淹没。我觉得，剧本中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句子，其余的部分我也非常乐意读，其实我认为剧本很好，因为我相信我的道德观和你一样。我目前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我还要做不少功课，这样才能就某个问题和你作更进一步讨论——我已经列出一个小小的修改单，需要时我可以寄给你。目前我还不知道我的信要寄到哪个地址。 165

读了福斯特的书<sup>1</sup>，我很钦佩他，但是我不断地对似乎渗透了他所写的一切的那个破碎的、充满怨恨的、自我折磨的、残疾的、爱国的、尖锐的元素感到排斥，他扭曲它，留下痛苦的味道，不客观地，充满道德色彩地，强烈地，像是浪漫主义的愤怒，或是真正的痛楚，但是又有点恶意，拘束，自恋的阵痛，这使得他的恶意，他的多愁善感，变得比例如哈弗洛克·埃利斯<sup>2</sup>的伤感（埃利斯关于瑞斯蒂夫·德·拉·布勒托尼的文章很有趣）或是例如艾略特的恶意更加难以忍受。福斯特在报复，而且使用的是一种令人恐惧

1 《阿冰格收获》（上文第191页注4）。

2 （亨利·）哈弗洛克·埃利斯（1859—1939），医生、作家、性行为研究者，他认为应该对性行为进行公开讨论。

的、扭曲的、间接的方式。但是他的书确实很好：个人的东西极其独特，充满了我非常喜欢并且崇拜的知识分子的真诚。同时，愚蠢的戴斯蒙德·麦卡锡（借用罗斯的话说）显然是受到斯帕洛的书<sup>1</sup>的鼓励，指责赫伯特·里德（里德所写的关于雪莱的书）<sup>2</sup>愚蠢、含糊、难懂、变态，等等，并且引用了书中类似“思想的轮廓”这样的语句，作为不可理解的典型（“只有群山有轮廓，思想没有”），而事实上这不过是大白话。我记得，他认为斯帕洛的书太好了，让人觉得就像假的东西，他认为斯帕洛是一个说出了在老人们心中积累多年的话的年轻人，所以，现在虚张声势的现代主义者被召唤来了，人们终于能大胆地让他们现身。这使我实在很愤怒，如果我见到麦卡锡，我想我一定不会和他说话，虽然作为人，麦卡锡和里德相比，我可能会更喜欢麦卡锡一点。

166 弗雷迪·艾耶尔说林德曼<sup>3</sup>说他看见你在巴塞罗那。我想他是个很可怕的人，罗伊非常崇拜他，莫里斯对他的看法模棱两可。你怎么看他？有消息（从格里格森<sup>4</sup>那里传来的）说，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这在我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在英格兰，你这么做是对的。在欧洲大陆，那里总是有政府迫害的传统，革命党派自动成为阴谋集团，他们在国外会面，除了战术和革命以外什么也不谈，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和艺术，就好比列宁。在英格兰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如你所说，是新自由派。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对抗工党的官僚主义和国家腐败的激进知识分子暴动，也就是说，1920年代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就是如今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真正希望革命，他们比社会主义者更高雅、更聪明，不像后者那么粗俗。西勒·林德说这只适用于一小撮不那么重要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政党是不同的。也许，只有前者真正使革命进程变调了。

1 《理智与诗歌》（上文第150页注7）。

2 见上文第188页注1。

3 弗里德里克·亚历山大·林德曼（1866—1957），物理学家，政治家，政府科学顾问，牛津实验哲学教授。1919—1956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1921—1957年任李博士实验哲学的高级讲师和基督教堂学院学者。自1939年起任温斯顿·丘吉尔个人助理，1941受封切维尔勋爵。

4 乔弗雷·爱德华·哈维·格里格森（1905—1985），诗人、评论家。

范·迪埃伦，作曲家，我评论过他的书，于是他写信攻击过我，我也回过信<sup>1</sup>。他昨天去世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像洛克哈特，他以一篇评论文章要了济慈的命<sup>2</sup>（或者像卡丹<sup>3</sup>，据福斯特说，他差一点就被斯卡利杰<sup>4</sup>杀死了），也就是说，这很了不得，很伤人；但是真的，如果我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我会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一点。莫里斯说，在戴—刘易斯的新小说里，有一个学究低级庸俗，像他一样<sup>5</sup>，让他很难为情。这我一定得看看。

我的同事奥尼尔<sup>6</sup>从德国写信来，有趣极了。他说在海德堡，英文教授做战后英国文学的讲座，选择了J.B.普利斯特里<sup>7</sup>、玛丽·韦伯<sup>8</sup>和菲利普·吉布斯爵士<sup>9</sup>。他还去了法庭，那里有个人因为向小鸟扔石头而被判四个月的监禁——他违反了戈林颁布的新《帝国狩猎法规》<sup>10</sup>，因为这种行为像野兽

1 详见上文第164页注4。

2 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1794—1854），以沃尔特·斯科特的传记作者而闻名，他被认为是恶意批评济慈的《恩底弥翁》（1818）的评论文章的匿名作者“Z”，该文章以“伦敦土话派的五号诗作”为题发表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第3卷第17期（1818年8月），第519—524页。这篇评论文章和另外一篇十分恶毒的评论文章（作者为约翰·威尔森·克罗克，匿名发表于《季度评论》第19卷第37期（1818年4月），第204—208页）激怒了济慈，虽然不能说导致了济慈的去世（1821）。

3 杰洛拉莫·卡丹诺（1501—1576），英文译名杰罗姆·卡丹，意大利医生和数学家。

4 裘力斯·凯撒·斯卡利杰（1484—1558），古典学者、文学批评家。见《阿冰格收获》（上文第191页注4），第194—195页。事实上，据福斯特说，卡丹并没有真的“被杀”，虽然因为斯卡利杰发表的抨击文章，卡丹确实深受打击，但据报道他的死讯只是一个玩笑。

5 菲利普·斯大林，“全圣学院的研究员，英格兰关于荷马文明与文学的顶级权威”（第47页），是《你的死亡之壳》（伦敦，1936）中的人物，该书以尼古拉斯·布莱克的笔名匿名出版，戴—刘易斯还用这个名字写侦探小说。戴—刘易斯的遗孀怀疑，斯大林是以鲍拉为原型的，鲍拉是她丈夫的忠实朋友。

6 道格拉斯·沃尔特·奥尼尔阁下（1912—1988），律师，1935—1946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6—1939年在外交部门供职。

7 约翰·波因顿·普利斯特里（1894—1984），英国多产记者、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出版了超过120本书，题材广泛。《好伙伴》（1929）和《天使之路》（1930）是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他的剧作《探长打电话了》（1945）经常重演。

8 玛丽·格莱迪斯·韦伯（1881—1927），英国小说家，作品多和她的家乡什罗普郡的风光联系在一起。她的小说《珍贵的痛苦》（伦敦，1924）很成功，被斯黛拉·吉布森在《寒冷舒适的农场》（伦敦，1932）一书中仿拟。

9 菲利普·吉布斯爵士（1877—1962），罗马天主教作家、记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担任战地记者，写了几本政治题材和自传体的书；因成为首位采访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1919年）的记者而闻名。

10 伯林此处原文为：Reichsjagdgesetzbuch。



一样残忍，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反对任何形式的残忍行为。他滑稽地引用《浮士德》中的句子：在“奥尔巴赫的凯勒”，大家都醉醺醺的。

所有人(唱着歌)：哦，现在我们在享受食人盛宴

就像五百只猪那样快活！

靡菲斯特：这帮恶棍无法无天……<sup>1</sup>

这很有趣，我想。他宣称(我对他的来信越来越有兴趣，但我十分尊重他)，德国就像一只巨型雌蜘蛛，懒洋洋地躺在中欧许多年，而欧洲其他的地方则徒劳地想使她受孕。他们最后成功了，产下一粒小小的蜘蛛卵。雌蜘蛛不祥地转身，无限深情地凝望她的伴侣，打算吞噬他<sup>2</sup>。请写信告诉我你的地址，关于西班牙、希腊，一切，我会给你写一封更好的信。

告诉托尼我爱他

沙耶

168

《燃烧的仙人掌》<sup>3</sup>今天寄到了，我还没有时间看。你喜欢康诺利发表在我想是《每日电讯报》上的书评吗？

-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Alle (Singen) :Uns geht es ganz kanibalisch gut/Als wie fünfhundert Säuen / Mephisto: Das Volk ist frei..., 这里是根据戴维·卢克的英文译文(牛津, 1987)翻译而来的。这里的引用有点错误, 是伯林特有的毛病(歌德写的是“Uns ist ganz kanibalisch wohl / Als wie fünfhundert Säuen!”)。奥尼尔是对的, 他给了出处(浮士德, 第一部, 第2293—2295行)。“奥尔巴赫的凯勒”指的是莱比锡的一家地下啤酒吧。
  - 2 奥尼尔接着说:“但是无疑, 这餐饭要得体地预订, 就像圣餐, 受害者将会因为他自己的善行和新宗教更辉煌的荣光而遭受苦难。”伯林引用的奥尼尔的这番话来自他日期为3月25日、发自海德堡的信, 以及日期为4月20日、发自弗莱堡的信。
  - 3 斯蒂芬·斯彭德, 《燃烧的仙人掌》(1936), 短篇小说集, 同名的小说首先在《新牛津展望》第1卷第1期上刊登(是献给伯林的)(1933年5月), 第24—42页。这篇小说早先的版本后来没有在书中提及, 也没有保留对伯林的题献, 也许是因为整本书都是献给W.H.奥登和托尼·海因德曼的。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1936年6月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安：

有这么一封信，事实上，我四个月之前就开始给你写了，当时你似乎不大可能回信，我不但没有毁掉它，反而越写越长，使它的篇幅几乎和日记差不多，更是无法寄出了，因为它写得太详细，太不连贯，太枯燥。所以写完现在这封信，那一封今晚就得销毁了。<sup>1</sup>首先，我很遗憾你们俩没有一起来，但后来我患扁桃体周脓肿病倒了，被隔离治疗，然后慢慢恢复，不能待在牛津或是任何可能见到你的地方。在那之后，我的生活呆板、精确地重复着，我像以往一样去萨尔茨堡，春天则和父母一起去里维埃拉，等等。我假装这样的重复正是我所需要的，它提供了框架，使一些小变化等成为可能，而事实是，我一成不变，不喜欢任何我不知道的事物，不喜欢被连根拔起，等等。这很丢人。结果，我的生活，或是这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变化。你会发现牛津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你离开时的那个水族馆。古德哈特<sup>2</sup>一家的确住在一所白色的大房子里，真的很白。谁都没有什么改变。自从莫里斯停止大规模地款待宾客，社交生活就不复存在（万幸）。一切事情，如果还有任何事的话，和你在这里的时候相比，都更加沉闷了，没有那么活跃，也没有那么恶意的。莫里斯自己（没法子不从他说起）为了教授职位坐立不安，我怀疑他是否能得到它。穆雷<sup>3</sup>本人就是个积极推广者，对严格的禁欲主义有天生的热情，并怀疑莫里斯不够严谨，等等。玛丽小姐讨厌他。<sup>4</sup>他手下 169

1 他没有销毁它，而且附在日期为1951年7月26日的信中寄给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2 阿瑟·莱曼·古德哈特（1891—1978），1931—1951年任法学教授和大学学院研究员，后来（1951—1963）任院长，他的妻子是赛西丽。

3（乔治·）吉尔伯特·艾梅·穆雷（1866—1957），生于澳大利亚，在英格兰受教育，希腊学者、作家、翻译家和国际主义者；1889—1899年任格拉斯哥学院希腊语教授；1908—1936年牛津希腊语瑞吉斯讲席教授；倾向和平主义，国际联盟的积极支持者，女权运动家。是萧伯纳的剧本《芭拉上校》中阿道尔夫·卡辛斯的原型。

4 玛丽（·亨利埃塔）·穆雷夫人（1865—1956），婚前姓霍华德，卡莱尔伯爵九世的女儿。她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贵族夫人，持左翼政治观点，主张绝对戒酒和素食，因为支持她的兄弟，她拒绝接受身为女权主义者的母亲留给她的家产——约克郡的霍华德城堡。

的教职人员是一群嫉妒的人，充满怨恨，私底下讨厌自己的学科。我希望这种紧张关系无论如何都要结束，因为这很折磨人。他还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吸引力的人，对每一个变音和重音都极其敏锐，但他有点太甘于接受学术失败了。不过我也许错了。艾耶尔家生了一个孩子，很快乐。有弗雷迪的地方就不会有绝对的安宁，未来的危机已经逼近，但是总的说来他们似乎安顿下来了。他们的富足，他们在伦敦的生活等，都使他们十分安定，但他们还是最稀奇古怪的人，总是千变万化，是人们可能会遇见的最与众不同的、最活跃的类型。弗雷迪对他的朋友们的执著的忠诚是孩子气的、可怜的，非常令人喜爱，总是让我感动至极。世故和单纯的混合体既非常奇怪，又很吸引人。他没有变老，似乎永远都是那个样子，还是急切地要做个像使人难堪的孩子一样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他成功了，只是现在他的同事比以往更喜欢更尊敬他。伊丽莎白·卡梅伦的最新小说<sup>1</sup>在这里获得了近乎和在美国一样的成功，我想。她住在伦敦，她的丈夫在那里工作，她重新陷入了非牛津的氛围，不完全是布卢姆斯伯里的氛围。她仍旧令人愉快，理解每个人说的话，喜欢恶棍、暴徒、鲜血和任何暴力的东西。我不常见到她，见到她时总是很高兴。她使人感到自己比实际更聪明、更有同情心、更沉着，她使人不说空洞的话，使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她从来不会对人漠然不理，而总是以某种方式回应对方说的话、做的事，这令人感觉很好。我怀着不多的快乐读她的书，读她的书就像进行高质量的谈话，但这样的谈话是静止的，没有方向，就像是一个人工建造的世界，有意地把任何大一点的东西都拒之门外。每一页每一章都很好，但是整体却比较松散，没有主题，章节之间彼此关系任意多变，同时非常拘束。我没有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我的观点是，书中没有一行了不起的文字，所有的一切都零零碎碎，总是极其死板，总是非常诡异<sup>2</sup>，几乎令人毛骨悚然。完全不像她的日常谈话。她在位于雷根特

170 公园的房子里接待了戴维·塞西尔，伍尔夫太太，那里舒适美丽，就像一件

---

1 《巴黎之屋》(上文第157页注4)。

2 伯林此处原文为: *unheimlich*。

艺术品。艾伦·卡梅伦<sup>1</sup>日益和蔼了，也更令人难以忍受了。

接着就是里斯，他比以前更人微言轻了，他和女友<sup>2</sup>吵完架，现在甚为自由快活。他就是一个顽童，非常不可靠，非常快活。实际上去年夏天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莫里斯遭遇了一些事，甚至我也遭遇了一些事，这些事我无法写信说，甚至也无法通过交谈说出来。如果你问我问题，我希望自己会回答，但是我不能保持冷静。我不喜欢如此毁掉我平静的心情，即使是对这些事的回忆也令人厌烦。不过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就必须一起散步，谈谈这个话题。

新学院的院长，我真切地景仰他的大家风范，景仰他通过艺术修身养性而形成的人品。他生病了，现在回来了，人苍白而坦诚，还是满口格言警句，运用自如。他最近向我形容一个门生，说他“有着摇摆不定和闪烁着乳白色光泽的才智，四十岁的时候也许会有趣些”。他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年轻得多，出众得多，你什么时候一定要见见他。我向你保证那会很有趣。这里主要的真正不同在于，危机已经结束。我们学院今年选出来的研究员是战后类型，或者说至少是后政治类型。显然到处都和以前不同了。社交界对莫扎特产生了兴趣，本科生们鼓捣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少，十八个月前真正令人害怕的紧张政治形势结束了。前景一点也不光明：人们变得更整齐、干净、勤奋、有序、明智、亲切、礼貌、可敬，也更冷酷无情、乏味、一本正经。对自己最好的门生，人们有一种对待奢华的铝制品的感觉。学生们是如此的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体面正派、聪明伶俐、勤勤勉勉、魅力十足。从任何方面都看不出人性的特征。我说得夸张了，但那的确是一种麻木，一种可敬的、急于为社会所用的、经过绝妙拿捏的，然而却十分冷淡呆板的优雅与得体，这让我感到十分恐怖。我更喜欢小市民，他们时不时摆出不必要的姿态。不过你自己可以去看看。我希望你能见到斯蒂芬·斯彭德，我想他

---

1 艾伦·查尔斯·卡梅伦（1893—1952），教育家，自1923年起成为伊丽莎白·鲍恩的丈夫。他近来开始为BBC工作，所以卡梅伦夫妇从沃尔登寇特搬出来，住进了他们位于牛津东北部老海丁顿的摄政公园附近的老房子。

2 可能是谢拉·格兰特·达夫。如果里斯在三周之后有了情妇（下文第207页注3），也许他美好的自由生活就要终结了。

还在希腊。他是如今有点过时的浪漫主义的象征人物，仅仅这一点对我来说就很有意思了。目前所有年轻人对艺术，对关于艺术的事实、年代、归属以及细节等，都抱有强烈兴趣。他们都享有声望、具有学者风范、充满理智，然而，他们洞察事物的实际感悟却被忽视了。你能否想象一个充斥着有知识的、宽容的、友善的、英俊的、绝对令人厌恶的人的世界？不过我总是抱有偏见地描述次要现象。将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告诉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我爱他。我要告诉莫里斯等人，罗伊状态好极了，正在写一本书，他相信这本书终将大获成功。他疯狂、快乐、古怪、自命不凡而又可爱。再见，我真的很高兴，你要来了。

沙耶

致斯蒂芬·斯彭德

6月20日 [1936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信和明信片。<sup>1</sup>读你在信中所说的一切让我乐在其中。我真的认为，如果能和你更频繁地通信，我就能从你那里获益更多，我应该这么做。你若确保可以办到，我就会多给你写信，否则，我写信的动力就太小，因为近来我没有可说。牛津的情绪又变了，你知道我对此很重视，因为，正如柯蒂斯<sup>2</sup>有一次正确指出的那样，英格兰文化的晴雨表在牛津和剑桥，而不是伦敦。尽管现在那里活动着一群持自由论观点的知识分子，都是了不起的法国人，纪德、马尔罗等人。而英国人这边的名字一开始就突然降了好几级：贝茨<sup>3</sup>、福斯特，还有赫胥黎，他们显然由于放弃共产

1 即1936年5月6日的来信与1936年6月10日的明信片。

2 人文学者欧内斯特·罗伯特·柯蒂斯（1884—1956），不过他是在什么地方说过这番话？也许是在谈话中吧。

3 赫伯特·欧内斯特·贝茨（1905—1974），英国长短篇小说家，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对英国乡村生活的赞美。

主义而紧张不安，让赫德<sup>1</sup>来做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相信他非但不是政治人物，还是个和平主义者。我刚刚才买了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加沙的盲人》<sup>2</sup>，还没有读。看起来这本书很吓人，但就像他写的所有书那样，它所包含的同情心最后能压倒人们的反感，然而他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他的人物形象很龌龊，令人恶心，而且他似乎无法阻止这种形象；一切都以一种邪恶的、轻描淡写的方式进行；我们习惯了战争恐怖，于是他制造了这样的场景：一枚小猎犬航空导弹的残片从飞机上落下，砸在屋顶上一对赤身裸体的恋人身上，弹片如同阵雨一般击打他们的身体，鲜血淋漓。安静的恐惧是上个世纪法国人的专长，但是波德莱尔和于斯曼<sup>3</sup>这么做是出于纯粹的艺术上的原因，而且他们对它保持超然的距离，仅仅表现它，而不评论它。赫胥黎，这个道德主义清教徒则对它进行了某种宣传，结果只是使这样的场景更低劣，更污秽不堪。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受到触动，感到恶心，被击穿，却不会被感动，或是受到任何深刻影响，或是因此能够洞悉什么或领悟到什么，除了抽象的普遍命题之外。他聪明，有人情味，有道德上的同情心，但怀着一份被围困的憎恨，使人读他的书时总是感到不安，正如与的确出众而真诚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内心一直慢慢酝酿着什么，时不时使他们所做的一切大为减色时，你会产生的那种感觉。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就想到这些了，读完还有更多体会。

172

莫里斯·鲍拉处境困难。吉尔伯特·穆雷已经告诉鲍德温<sup>4</sup>任命别人担任希腊语教职，莫里斯被人抛来抛去。我受命[要]极其胆大妄为地、坚决地对新学院院长发动进攻。<sup>5</sup>如果他没能获得任命，我就得离开牛津，这样

1 亨利·菲茨杰拉德（“杰拉德”）·赫德（1889—1971），爱尔兰后裔，在英格兰出生和接受教育；1930—1934年任BBC科学记者；1937年移居美国；宗教、神秘主义、人类学以及人类发展方面的作家；被称为H.F.赫德，神秘小说的作者。

2 伦敦，1936年。

3 乔里斯·卡尔·于斯曼（原姓查尔斯—玛丽—乔治）（1848—1907），法—荷公务员，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他早期小说中的自然主义精神先是被异域的颓废气息所取代，接着被他对撒旦崇拜的兴趣所替代，后来又被他所专注的引领他最后皈依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之旅所取代。

4 希腊语瑞吉斯教席由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授权委任。

5 也许鲍拉（他碰巧曾经在新学院念本科）觉得鲍德温会听取费希尔的意见，而伯林可以劝说费希尔在那个决策圈中支持他。

的压力令人无法承受。我想今年我不会去萨尔茨堡，莫尔会去的，我想。那里的氛围甚至已经开始使我感到压抑了；庞大的听众群，心怀畏惧而又十分聪明，我一点隐私都没有。说到托斯卡尼尼，人们必须为他做一点什么，而不是不倾听他，我真切想做的就是9月在耶路撒冷听他演奏，那场景定会非同凡响：他将会在一座红色的山上指挥演奏，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犹太人围绕着他，对他顶礼膜拜，而阿拉伯人的炸弹也有可能投掷过来。我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情景会被诸如斯特芬·茨威格<sup>1</sup>等人如何描述，它无疑会是我读过的最令人厌恶的段落：第七交响乐第三乐章最后的和弦，然后是一颗炸弹，等等。但是我会很乐于出现在那儿。你什么时候回英国？不论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我在，而且又逢假期，我想去乡下和你待上至少三到四天，把没有对你讲清楚的事儿再好好说说。我相信又一代人要终结了（在牛津则表现出倒退），现在不像前些年，我们这里会来一些聪明而敏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一场运动。现在有太多愚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不一定能够成功，而因为这样的乱弹而纠缠于梦魇般的精神压力是不必要的。这里有一些本科生，不，我后悔这么说了，被莫里斯或是罗伊大加鼓励，他们很友善，又聪明，没有剑桥科学家们那种强烈而狭隘的宗派骄傲。罗伊现在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我认为：他在性方面或是其他方面彻底爆发了。但此事我只能在谈话中说，这事太有意思了。康诺利出了一本书，卖50法郎，名为《岩池》<sup>2</sup>，费伯出版社拒绝出版，理由是它写了一小群巴黎的颓废派艺术家，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伦敦举行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引起了一场震动<sup>3</sup>，每个人，甚至是《标准晚报》都迫切地要避免重复那次应对后印象派时所犯下的错误。<sup>4</sup>据说这次艺术展很吸引人，气氛平和宁

1 出生于奥地利的传记作家、小说家和散文家（1881—1942），托斯卡尼尼的亲密好友。

2 巴黎，1936年，奥伯里斯克出版社。由于担心这本书会被认为是淫秽出版物，没有英国出版商出版它。

3 首届“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6月至7月在伯灵顿美术馆举行，有2.5万人观看了展览，开幕当天引发了大面积交通堵塞。

4 也许指的是1910年与1912年举办的后印象派艺术展，由罗杰·弗莱组织，这场艺术展首次为英国观众带去了法国绘画的最新发展成果，并引起轰动。《标准晚报》有厌恶“现代艺术”的倾向。

静，是安德烈·布雷东<sup>1</sup>举办的。他是个活泼敏捷、衣冠楚楚的小个子，他从硬弹簧沙发上站起来，摇晃了一下，然后坚决洪亮地吼道：“改变生活！”<sup>2</sup>这个段子来自戈伦韦。他最后抛弃了谢拉，换了一个可怕的情人，一位帕米拉·沃伯格太太<sup>3</sup>。对她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狂妄做作、邪恶堕落、令人厌烦，甚至也不漂亮。卡森<sup>4</sup>？你把好形容词浪费在他身上了<sup>5</sup>，我想。你说的没错，但是他还没有到你形容的那个程度，他完全是个无足轻重、不学无术的矮个子小丑，他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因此在新学院引人发笑，他的举止粗俗轻佻，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你说他害臊，没错儿，是这样，他的恶意只是出于自我保护，他的恶劣与卑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林德曼是个程度严重得多的坏人，他是真正可怕的，他象征着人们最憎恨的一切，他这个人方方面面城府都很深，又势利，爱给弱者施加痛苦，他仇恨自己。罗伊宣称忠[于]他，还赞扬他的聪明与敏锐，我夸大其辞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全民公敌<sup>6</sup>，而且比谁都更恨他。我想，他是我唯一迫切想杀死的人。我内心竟有这样不寻常的感情，你可以感受得到。

174

我要拿你的剧本<sup>7</sup>怎么办呢？我又读了一遍，读了并再读了你的信。我理解你说的一切，我一[点]都不认为你是个失败主义者，像赫胥黎或者甚至是福斯特，我甚至理解他为什么本该假谨慎一点，为什么害怕承认任何可能的自我认同。我所抱怨的，不是你笔下角色的悲伤，而是你有时让个人哀恸伴随着他们。你自己曾说过，诗人不该把自己塞进作品。在你的剧本里，你离角色太近，怜悯太多，过于频繁地被恐惧和痛苦扭曲；而艾略特，他则

1 安德烈·布雷东(1896—1966)，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创立者。

2 伯林此处原文为：Changez la Vie!来自《地狱的一季》(1873)中的一句战斗口号，十几岁的法国叛逆同性恋诗人阿图尔·兰波(上文第185页注5)写道：“因改变生活而产生的秘密，可能有吗？”阿图尔·兰波，《诗歌：地狱的一季》，《启明》，路易·福雷斯蒂尔主编(〔巴黎〕，1999)。这句话成为超现实主义的核心信条。

3 帕米拉·德·贝尤，弗里德里克·约翰·沃伯格(1898—1981)的妻子。弗里德里克·约翰·沃伯格是伦敦马丁·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的主席(他们于1936年4月4日出版了第一本书)。

4 斯坦利·卡森(1889—1944)，古典考古学家，1920—1944年任新学院研究员；阵亡。

5 斯蒂芬·斯彭德在明信片形容他是“虚荣、拘谨、不怀好意、害臊、健谈而又紧张的男人”。

6 伯林此处原文为：hostis generis humani。

7 上文第184页注6。



是冲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用的是一种表现癖的克制，还有挖苦的笑话。假无情也是荒唐的。但是我肯定，布莱克说“咒骂准备好了，祈福休息吧”<sup>1</sup>，除了表层的意思，他也是说咒骂变僵硬了，赐福就可以休矣，人因此必须给角色本身注入一种坚硬的、有恢复能力的、不屈不挠的特质。否则观众只会受到触动，而不是感动；他们只能看你表达同情，而不会关心你的作品，不会看见作品的内涵；你的作品会变成你和你这代人的象征，仅此而已（参见你对《维特》的评论<sup>2</sup>）。马洛，甚至卡夫卡作品中的恐惧与毁灭感（更不用说亨利·詹姆斯了，还是你帮我发现这点的），是通过可怕的外化与压抑的描述来表现的，而不是通过陈述。我的指责是，你有时忘了使自己足够冷峻精确，而有些微微颤抖了。但是就像以前我跟你说过的，我大为感动，就像我为你写的所有一切而感动那样。

175 你能否写信跟我说说你的近况呢？我要在英格兰待到8月20日，然后可能会去爱尔兰。巴勒斯坦的局势<sup>3</sup>让我很抑郁，我敢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错，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应对政策，而且总是对双方都给予安抚。人们有时要靠莫里斯说的有趣笑话来生存，最新的一个是关于博厄斯的。你知道博厄斯系列：博厄斯，波西，博厄斯眼，博厄斯—莱昂，博斯林博斯林博斯林来自荒野的小红玫瑰。<sup>4</sup>现在，给“博厄斯之眼”加冕吧，它对应于“美丽之眼”。

1 “咒骂准备好了：祈福休息吧。”威廉·布莱克，《天堂和地狱的婚礼》，《地狱的谚语》，图9。

2 在他信中开头部分，他写道：“我想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浪漫的、维特式的时期，既在我的作品中，也在我的生活中，对此我看不出也感不到轻松，除非我能通过写作来把它消耗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马斯内的歌剧《维特》即改编自这篇小说），小说赞美了光荣自杀的浪漫想法。

3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紧张关系持续了数月，之后，阿拉伯政党在4月份举行罢工，抗议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不断增多，对立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5月，英国政府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下文第293页注1）。

4 “波西”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公爵的昵称；博厄斯—莱昂是已故王太后的姓氏；“博斯林”是个新造词，仿拟歌德的诗“罗丝琳，罗丝琳，罗丝琳·洛特，/来自荒野的小红玫瑰”，引自歌德的《野玫瑰》（1771）（威玛，1887—1919），卷1，第16页。“博斯林”意指“邪恶的小东西”；“美丽之眼”原文为法语“beaux yeux”，“oeil”是法语“yeux”（眼睛）一词的单数形式。

告诉托尼我爱他。

你的

沙耶

我天性不善表达强烈的情感，但只要你寄给我你写的任何东西，在读它之前我就会颤抖，我开始读你的东西时（通常读完时也是如此），真的几乎停止呼吸。你一定要让我一直能读到你的文字，我是你最热切的崇拜者，你要留心为我对你的崇拜之火加柴添薪，这在我写自传和为你立传时会派上用场的，这都是有趣而且有价值的记录。

莫尔极其骄傲地向我炫耀他的裁缝寄来的账单<sup>1</sup>：

上衣——45英镑

裤子——12英镑

佩剑、肩带、匕首鞘等——8.8英镑

光是上衣就用了40克拉黄金，还有燕尾服后襟上的纽扣。他的生活很诱人：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5点。不过我想我的工作不允许我嘲笑或者愤怒。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西西里、西班牙或是马略卡之间的某个岛上见面。12日，即星期一，我将离开这里。如果你把信寄到伦敦，他们会帮我转寄的。对马拉加所怀的希望没有全部落空，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会把你的话报告给伯纳德·[斯宾塞？]。他正脚踏实地并快乐地拍电影，那是家又小又穷的公司，所以每个人什么都得干，齷齪，可悲，但是他非常喜欢。我还没有见到O.P.<sup>2</sup>。

爱你的

沙耶

1 英国外交部的规章详细说明了海外服役人员所穿制服的细节。伯林指的也许是科洛思维特接受接见时所穿的礼服，包括上衣、裤子、帽子、佩剑（有剑把和皮带）和靴子。虽然他的职位（三等秘书）所规定的制服饰件比更高级官员的简单，但他的上衣领口、袖口、后背和口袋盖应有绣金装饰，前襟和后襟应有镀金纽扣（上有皇家军队和帝冠图案）。

2 《牛津诗选》，牛津毕业生和本科生的诗作一年一度结集出版，1910年由巴希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首开先河。斯彭德1929至1930年担任诗集编辑，但从1932至1936年该诗集中断出版。

##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6年6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太久没有见到你了，你的电话据称不灵光，戈伦韦提起你几次，这使我的感觉更强烈了，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感觉，那么怎么办呢？我星期五上午可能会在伦敦，到时能否见得到你？或者是星期四下午早些时候？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伦敦，估计是周一，我还有一个在八九月晚些时候去爱尔兰的模糊计划，和一位准前学生（男的）<sup>1</sup>。你会在吗？在这儿我遭受着莫里斯反射给我的愤怒和恐慌的煎熬。他刚刚得到消息，穆雷推荐了一个姓多兹的人来任那个教授职务。还没有正式的通知，一场最后一刻的绝望战斗正在进行：我被告知要非常大胆而坚决地向费希尔发起进攻；罗伊对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发动了进攻；K.克拉克<sup>2</sup>很奸诈，什么也没有做。人们认为戴维·塞西尔有可能接触到鲍德温所爱的（据说如此）欧姆斯比—戈尔<sup>3</sup>，但他的反应太慢了，根本就不能采取行动，而且他还过于无精打采，不足为友。不过，如果你碰巧见到他……我肯定我们将失败，但就像

177 威尼斯起义，在审美上无愧的情况下被打败，是神圣的责任。罗斯先生写信对比利说了什么？在信封上写上你房客的住址让我很是兴奋。<sup>4</sup>

爱你的

沙耶

---

1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2 肯尼斯·麦肯齐·克拉克（1903—1983），1931—1933年任牛津大学阿什莫里安博物馆艺术部主任，1934—1945年任国家美术馆馆长，1931—1941年任职英国情报部，后来（1969年）成为克拉克男爵。

3 威廉·乔治·阿瑟·欧姆斯比—戈尔（1885—1964），保守政治家。1936—1938年任殖民地国务卿，1918—1938年任斯特福德郡的下院议员，1938年成为哈勒奇男爵四世，1913年与戴维·塞西尔的姐姐贝阿特丽丝·塞西尔结婚。

4 威廉·德·莱格勒·巴肯（1916年出生，作家约翰·巴肯的次子），1996年成为特威兹穆尔男爵三世；1934年升入新学院，但两度没能通过文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1935年离校，有一段时间是卡梅伦位于伦敦克拉伦斯街宅邸的房客，他们是在1935年8月左右入住此宅邸的。

法兰克福特一家明天要在这里发布通告了，你认为这件事重要吗？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1936年6月2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安：

我给弗雷迪·艾耶尔打电话，从而发现了你的到来，还有你的住址。我给艾耶尔打电话是为了表达我对三波接连发生的、一波比一波强的灾难的沮丧心情。我把这三起不幸告诉你，让你来判断一下它们的相对强度：

1) 一位名叫施立克<sup>1</sup>的很有价值的哲学家被刺。他是个美男子，也许是被一名嫉妒他的奥地利竞争对手刺杀的。

2) 莫里斯没有升任希腊语教授，一个姓多兹的男人得到了这个职位。消息发布，引起了真正的恐慌，但大多出于错误的原因，比如说他在战时是个负责任的反对者，或者他是个新芬党人，真正的反对理由是他对晚期和神秘的希腊作家感兴趣，身为杰出人物的他是个奇特的空想家，他不在意风格和形式这些东西，这些特质暗地里（至少是从莫里斯那里）吸引像我这样的人，但显然不适合一个希腊语教授：希腊语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它的形式特点，而不在于它说了什么。可我们都分成鲍拉派和丹尼斯顿派<sup>2</sup>，这成为无端的侮辱。我立刻冲到莫里斯那里看望他，和他待了一个晚上，你可以确信，太不容易了。我充满激情地指出，在牛津和剑桥，只有人品，而不是职位，才是最重要的，引人注目和有创新的人物总是遮盖了暗淡无光的教授们，等等。这么说有点荒唐，但他似乎需要听这样的话，因为这些话被他热切地接受了。今天他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轻松活泼、无忧无虑地和另几个失望的候选人一起吃饭去了，还带了两瓶红酒。他痛恨地抱怨[A.D.]林

178

1 莫里茨·施立克(1882—1936)，维也纳归纳科学哲学教授，维也纳学会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成员，6月22日去世，一名患精神病的学生枪杀了他。

2 J.D.丹尼斯顿的支持者(上文第184页注2)。

赛和穆雷，他们似乎与他的落选有关，肯定不仅没有把战时服役算做对候选人有利的条件——他也同意，他们这么做是对的——而且确实把这看成是候选人不利的条件了，这就很苛刻了。

第三个灾难是对巴希尔·穆雷的审判，人们一定认为他这个人不是很好，一个名叫弗拉德的本科生（至今仍被拘留）被指控破坏了一场莫斯雷集会。<sup>1</sup>那些法西斯证人都是可怕的神经质人物，都是戈培尔和戈林那样的人，警方似乎也受制于他们，不可能说真话，而且他们显然受到了女市长的鼓励<sup>2</sup>，她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死硬女人。整个审判让人脊梁骨发冷颤抖，因为人们还从没有真正面对过这样不公的审判，你的男主人<sup>3</sup>在他的书中说到的英格兰司法偏见似乎最生动地、最令人恐惧地成为了现实。

所以我今天感到虚弱和疲惫，就像经历了一次令人沮丧的旅行，充满了恼人的小事，时不时还看到可怕的景象。弗雷迪告诉我你到来的消息，这是目前这种状况中唯一的快乐因素。院长的受勋<sup>4</sup>很有趣，很不错，于人无害，没有人会不希望他得到这样的荣誉。我们都以水代酒，快活地祝他健康。你什么时候到？我希望很快，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我的长信。

爱你的

沙耶

这里我得补充一些事实：

1) 法庭上，罗伊出场时，身着他去哪里都穿戴着的方顶帽和长袍，一

---

1 5月25日在牛津卡法克斯礼堂举行的法西斯分子集会。巴希尔·安德鲁·穆雷（1902—1937），记者，吉尔伯特的次子；共产主义者贝尔纳德·弗朗西斯·卡索尔·弗拉德（1915—1967），1934—1937年就读于瓦德汉姆学院历史学专业，后来（1964年）成为阿克顿工党下院议员。两人均被指控“举止失控”并“煽动他人举止失控”。这场审判于6月23日进行，穆雷被罚为他的每一项违法行为交纳2英镑的罚款，并支付3镑3先令的诉讼费用；弗拉德的案子被驳回，不予受理。

2 市政委员玛丽·乔治安娜·唐森德太太，1935，1936（当时她是接替在任内去世的市长）和1958年任牛津市长。

3 也许是哈罗德·拉斯基，他是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长期朋友，此时持共产主义观点。

4 W.G.S.亚当斯新近被任命为全灵学院院长，并被授予荣誉侍从勋章。

旁跟着伯肯海德伯爵和夫人<sup>1</sup>、帕肯汉姆夫妇<sup>2</sup>、玛丽·穆雷夫人、莫里斯以及我那些生于富贵之家的学生们。整个法庭因他们的出现而突[然]变得喜气洋洋，仿佛牛津大学的校庆典礼。他们和那些个法西斯暴徒、蔬菜水果零售商、男女青年共产党人、（正在罢工的）公共汽车司机一道，中间零星地夹杂着几个形迹诡异的人，活像莎士比亚戏剧场景再现。既令人兴奋，又带着点恐怖（这个词在信中出现得太频繁了）。 179

另外，索尔特非常想念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佩尔斯也是。我这里有学生很想让他见见。佩尔斯已经订婚，准备结婚，说起你时，把你夸得天花乱坠。

致A. J. 艾耶尔

星期五<sup>3</sup> [1936年夏，明信片]

全灵学院

[……]我对法兰克福特夫人的评价仍是A<sup>++</sup><sup>4</sup>。给怀特海<sup>5</sup>的文章你看了吗？

你的  
沙耶

---

1 弗雷德里克·温斯顿·福诺·史密斯（1907—1975），伯肯海德伯爵二世，以及他的妻子谢拉（1913—1992），婚前姓伯里，两人均为传记作家。  
2 弗兰克（上文第77页注4）和伊丽莎白（上文第162页注2）。  
3 地址为摄政街福伯特寓所11号，但没有贴邮票，也许并未寄出。  
4 即：A两个加。希腊字母的具体用法参见上文第109页注3。  
5 F.S.C.诺斯洛普等著，《致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哲学论文集，1936年2月15日》（伦敦，1936年[3月]）。

##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6年夏]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怀着既兴奋又尴尬的心情（我想更多的是尴尬）审阅了《牛津展望》的文章。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全都措辞笨拙，拘泥古板，有时还有点粗俗不雅。没有一个句子读起来自然得体，每一句话的笔调都是那么压抑而又矫揉造作。笑话是那么生硬，思考是那么无力乏味、装腔作势。而其他人的文章读起来都那么精致美妙，如斯蒂芬写的关于《海浪》的书评；戈伦韦写的关于艾略特和“塔楼中的少年”的文章；阿瑟·卡尔德—马歇尔<sup>1</sup>写的简要感人的讣告；还有弗雷迪等人写的极具启迪意义、让人有触电般感觉的优美文章等。<sup>2</sup>随信附上载有斯蒂芬小说<sup>3</sup>的期刊一份。这个故事至今读来仍让我觉得亲切感人。文章的主要人物如下：克罗斯曼是个恶棍；小笛手是个斯文格勒<sup>4</sup>式的人物，常写些不讨人厌的诗歌；拉姆齐夫人，也就是卡里特夫人，是那位瘦弱的大学讲师的夫人；小说中的那个姑娘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与加布里埃尔·卡里特<sup>5</sup>隐约有点关系。斯蒂芬爱上了她，但是她却每隔两个学期就要离开他去找克罗斯曼，极有规律。克罗斯曼是个愚蠢、善良、有点女孩气的小男孩，他勇敢、多愁善感，并不十分英俊，是奥登的朋

1 阿瑟·卡尔德—马歇尔（1908—1992），作家，与伯林同时期就读于圣保罗学校，1927—1930年就读于哈特福学院古典学专业。

2 阿瑟·卡尔德—马歇尔写的关于诗人克赖尔·特拉弗·詹姆斯·赫伯特·帕森斯（1908—1931）的讣告，载于《牛津展望》第2卷，第55期（1931年6月），第138—140页；A.J.艾耶尔的文章《行为主义个案研究》载于《新牛津展望》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第229—242页；戈伦韦·里斯的文章《艾略特先生及其他》载于同期《新牛津展望》，第243—247页。作为奥登派的别名，“塔楼中的少年”这个名字又被罗伊·坎贝尔称为“马克斯班代”，见《野马谈》（伦敦，1946），第79页。这一名字来源于斯彭德的诗《塔楼》，见《诗歌集》（伦敦，1933）。

3 《晒牧草》（致加布里埃尔·卡里特），见《牛津展望》第10卷，第53期（1930年11月），第579—597页。下文“拉姆齐夫人”，伯林指的是格雷厄姆夫人。

4 兰德尔·克莱恩·斯文格勒（1909—1967），1928—1932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克罗斯曼的门生。克罗斯曼的诗歌发表于《牛津展望》上。

5 加布里埃尔·C.卡里特，E.F.卡里特之子；即斯彭德自传中的“特里斯坦”，见《世界中的世界》（伦敦，1951），这本书是献给伯林的（见该书第70—72页）。伯林所说的卡里特与这位姑娘的关系似乎不合情理，因为卡里特就是故事中三兄弟之一的原型。

友。这几乎令他在基督教堂学院名誉扫地，如今，我想，他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或许是因为熟悉的背景打动了我，但我确实觉得它比斯蒂芬以往发表过的小说都好，就像他早期的诗歌一样，更为简洁，更为抒情，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些狂放不羁，但就其自身而言，还是比他后来发表的那些艰深严谨、一丝不苟的作品来得要好。

发现自己是个多么自命不凡的人之后，我几乎松了口气。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例如为什么我会发明一系列关于金、银、纸等东西的隐喻，为什么我会指责莫里斯不够严谨，指责戈伦韦剽窃，等等：这分明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即将崩溃的世界的价值观辩护，而这些价值观就连处于早期健康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自身都会嗤之以鼻，也就是说，为康诺利在其书中进行道德说教的章节里所深恶痛绝的价值观做辩护。<sup>1</sup>顺便问一句，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是想让我把书寄到某处，还是把它留着等你回伦敦？抑或是让我把它偷偷地带到鲍恩宅邸？我可不敢把它拿给奥尼尔看，因为我怕这样会让他高尚而又忧郁的头脑更为消沉；我也不敢把它拿给汉普希尔看，因为他对汉弗莱充满了崇敬和敬仰之情（发现这一点让我倍感宽慰）。我想，我自命不凡的性格正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确定自己之前仰慕汉弗莱也是基于这些原因：那种了不起的个性，保守中带着狂热，有着法西斯式的严厉坚定，与我在牛津第一年见到的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本科生形成鲜明对照。我如饥似渴地阅读M.马尔罗<sup>2</sup>的著作，怀着对他身上那最软弱、最夸张的个性成分的一种特别喜爱之情，即怀抱炸弹卧于蒋介石<sup>3</sup>的轿车之下准备与他同归于尽的宿命。在我看来，这一举动显得非常坚定、高尚和值得信赖。

前几天，我见到了莫里斯，他正为你因戈伦韦<sup>4</sup>而发的指责深感苦恼。

1 见《岩池》（巴黎，[1936]）。

2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反对法国政府在东南亚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党而战，二战时参加法国保卫战，后于1960—1969年任法国文化部部长。

3 蒋介石1928—1949年是中国国民党主席。此处指的是马尔罗1933年发表的小说《人的命运》（1934年该书第一个英文版面世，名为《上海风暴》）。小说中描述了一位年轻的陈姓革命者，坚信必须通过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怀抱炸弹冲向蒋介石的轿车，试图谋杀蒋介石。

4 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鲍恩近来与戈伦韦·里斯关系十分密切，她一定是向莫里斯·鲍



如今，他认为戈伦韦已经把你争取到自己那边，而他与你之间原本平静的关系也受到了干扰。他抱怨说戈伦韦在哪里，那里就迟早会有麻烦——这一古老法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英明正确。他去了哈佛<sup>1</sup>，我对此深感宽慰，否则的话，他会用更为激烈的言辞攻击戈伦韦，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把你这个他无法攻击的对象牵涉进来。我拒绝加入其中，并已对他坦言相告。

前些天晚上我和戈伦韦共进晚餐，他真是个好人，友善、真诚又招人喜欢，我永远不会再说他的坏话。我还记得去年在牛津大学生病期间，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今我对他充满了喜爱之情，就连过去曾经有过的忌妒之心也减弱了不少。我已决定痛改前非，与他建立平和的友谊，并在他背后保持对朋友的忠诚。但这可能只是个不切实际的愿望，我知道一旦我站在那儿，手上抓着一把戈伦韦贴在我背上的五彩缤纷的字条，上面写着令人兴奋、胡编乱造的语言（“里斯，那个鬼灵精在哪儿？”猜得出来此话是谁说的吗？答案：汉弗莱），我就会重新变成恼羞成怒、一败涂地的资产阶级一员，满脑子的事后机敏之辞<sup>2</sup>，满嘴大话地发誓要狠狠报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的决心也许会持续下去。目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对他义愤填膺是什么感觉，就好比对法国人的轻率和福楼拜的好色（这一点据说屠格涅夫感觉到了）感到愤慨一样。但不久，斯蒂芬就会从奥地利回来了，又要一遍遍听他诉说渴望，富有创意的忧郁症也快回来了，新找的每一位女人都长得像沃克小姐（即便现在，我已经开始每天都生活在奇妙的恐惧中），我又要无法忍受了。非常盼望去鲍恩宅邸拜访您。哪怕就面对面交谈一次，不知意下如何？

爱你的

沙耶

---

拉说了不满他对里斯所为的话。从下文可以看出里斯引发了来自各方的复杂情感。

1 鲍拉于1936年9月上旬至1937年2月上旬在哈佛大学。

2 伯林此处原文为：pensées d'escalier，指在和别人争辩完下楼时才想到的机敏之词。

致玛丽·伯林

星期三 [1936年7月22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妈：

得知您平安抵达，非常高兴。关于我，没什么可说的。在牛津我过得很开心，每天工作，这里人迹稀少，没什么能让我分心的事情，但也不至于让我孤独到发疯。艾廷豪森夫人和沃尔特今天来找我一起喝茶，她对特拉维夫极有好感，根本听不得任何对巴勒斯坦不利的言论。您是否知道里加的布卢姆伯格这个名字？一个叫威廉(!)·布卢姆伯格的人在《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带有反犹太人倾向的文章。但在我看来，这篇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写得颇为出色。作者在文中指责犹太人一开始就没有让阿拉伯人融入他们的经济体系，也没有将阿拉伯人当敌人看待，而是根本当他们不存在，一直到阿拉伯人带来麻烦后才开始注意他们。<sup>1</sup>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却是事实。艾廷豪森夫人给我们讲述了一则发生在特拉维夫的趣事：德裔犹太人一到特拉维夫就买公共汽车的发车时刻表<sup>2</sup>，因为时刻表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事情。他们早上10点到达，却没有见到公共汽车，于是他们就问是否一会儿会有车来。一位当班的犹太人回答他们说，不，不会有车来，别指望有车来。德裔犹太人就开始念叨“可是时间表上说……”<sup>3</sup>，另外一个犹太人打断他们道：“是有犹太人为了能轻松地挣上一美元将时刻表非法卖给你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按照他所写的时间来发车！”<sup>4</sup>与通常人们见惯了的“禁止与司机交谈”的告示不同，在犹太人的公共汽车里写的却是“你们大家非得跟司机说话吗？”<sup>5</sup>或是“如将头和手伸出窗外，很快就会知

1 威廉·布卢姆伯格，《阿拉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观察家》，1936年7月17日，第96页。

2 伯林此处原文为：Fahrplan。

3 伯林此处原文为：aber im Fahrplan。

4 原文为德语和意第绪语混合：Weil en Jid will machen gutes geschäft und verkauft aich a Fahrplan, missen wir fahren wie er will!

5 伯林此处原文为：müssen sie ausgerechnet mit dem chauffeur sprechen。

道有什么后果”<sup>1</sup>之类的告示。一语双关。<sup>2</sup>

爱你的

183 沙耶

致盖尔斯·罗伯逊

邮戳日期1936年7月29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盖尔斯：

此刻了解到你的成绩，同情之心比起没看到成绩时又增添了许多。如此接近于中等的成绩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你的成绩如下：

逻辑学	$\beta=^3$
道德与政治	$\beta$
腓立比书	$\gamma\beta$
古代史	$\beta$
希腊史	$\beta?+$
罗马史	$\beta$
腓立比书翻译	$\beta\delta$
希腊史翻译	$\beta?+$
罗马史翻译	$\beta++$
即席翻译	$\gamma$
拉丁散文	$\gamma$
希腊散文	$\gamma$

光亚里士多德这一门课就完全让你应付不暇了。赖尔和哈迪两人都认

1 伯林此处原文为：Lehnen sie sich schon aus, werden schon sehen was wird passieren。

2 伯林此处原文为：Каламбуры。

3 关于希腊字母中前五个表示的完整意思 ( $\alpha=A$ ,  $\beta=B$ ,  $\gamma=G$ ,  $\delta=D$ ,  $\epsilon=E$ )，见上文第109页注3。此处的“ $\beta=$ ”指的是B—，即比B低两个级别。“ $\gamma\beta$ ”代表“GB”，也就是三等偏上的成绩。

为你是个聪明人，但不擅长考试，哈迪还特地说了他们打出这些分数时的不安心情，并且说了要是在口试时你的表现能有任何一点加分的余地，或是卷面上有任何能够加分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给你加分的。我绝对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深受德·伯格体制<sup>1</sup>的毒害，并且你一直处于它所导致的颓废状态之中，久久没有缓过气来。然而，反正你以后也不想当校长或是公务员，我想这也无伤大雅。比兹雷夫人<sup>2</sup>总说我已经对她和她的事情感到无比厌烦，这真是让我烦扰不已。她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不说无法忍受，至少也像闹剧似的荒唐可笑，让人极不舒服。然而，基本上来说，她还是个好人，也很喜欢你。她怀疑你因为她的缘故而嫉妒卡斯曼先生。请让她继续这么认为下去吧，因为这样的想法才会令她高兴，也只有这种想法才能最终满足她那些单纯的欲望。我发现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喜欢她了。

184

（杰斯帕·）里德利的成绩很棒：在逻辑学这门课的口试中表现异常出色，在哲学科目方面也得到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只是在他几乎一窍不通的历史科目方面得了一些诸如 $\delta$ 或者 $\gamma\epsilon$ 这样的成绩。<sup>3</sup>我认为你们俩都是因为不够细心才没有得到应有的名次。<sup>4</sup>M.J.史密斯<sup>5</sup>获得了年级最佳优等生，但是你们绝不愿意把你们所尊敬的任何人的思想与他交换，更不用说你们自己的思想了。说到这点，需要提出各种命题，我就不一一进行推理让你们难

1 此处大概指的是威（廉）·乔（治）·德·伯格（1866—1943），《古代世界遗产》（伦敦/纽约，1924）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要是不那么艰涩难懂的话，盖尔·罗伯逊可能会陷入一种虚假颓废的安全感，对他的考试结果毫不担心。

2 见上文第174页。

3 里德利在8月7日的日记中对情况描述如下：“莫里斯来信告诉我具体成绩：逻辑学 $\beta\alpha$ ，道德与政治 $\alpha\beta$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alpha\beta$ ，古代史 $\beta\gamma$ ，希腊史 $\gamma\delta$ ，罗马史 $\gamma\delta$ ，历史口试 $\delta\gamma$ ，哲学 $\alpha$ 。 $\gamma\delta$ 令人难以置信。正如约瑟夫[·格里蒙德，巴利奥学院同届生]所说的， $\delta$ 基本上就表示你的操作没有通过，但对获得二等学位还是大有帮助，特别是赖尔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哲学成绩一流，尤其口试成绩极好’。无论如何，我对口试成绩的幻想总算没有破灭。伯林说‘但愿你的成绩能提升到 $\gamma$ 级’。可是，活见鬼，如果我真那样，那会是一个多么惬意的[原文如此]一等。本来二等学位就要门门都不错，一等学位的成绩更要漂亮十倍。亚当·里德利爵士（杰斯帕·里德利之子）想起他父亲口试的时候，‘教古代史的老师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至少一个能让他回答正确的问题。但是他连马拉松之战的日期都记不住，他们只好作罢’。”

4 里德利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中获二等学位，罗伯逊获三等学位。

5 莫里斯·贾德森·史密斯（1913年生），1932—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

堪了。戴维·华莱士的一等成绩非常勉强，是通过历史课的口试取得的。我想，要是考试成绩有二等上<sup>1</sup>的话，他的成绩应该属于这个等级。汉普希尔是他同年级学生中哲学学得最好的。<sup>2</sup>而关于杰里米<sup>3</sup>，没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提。欧哲斯<sup>4</sup>的口试进行了九十分钟，最后还是在历史这一科目上降级了。据我判断，原因是他总体表现不佳。不论如何，他这些科目上也都没拿到 $\alpha$ ，而其他特殊科目的成绩总是给人以错觉。达尔比<sup>5</sup>的成绩乏善可陈，清一色的 $\beta$ 或是 $\beta^+$ ，显然是他觉醒后严于律己才取得的成绩。莱帕<sup>6</sup>的历史成绩很好，他一定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约翰·格里菲斯<sup>7</sup>则在伦理学科目上成绩优异，大概是得了 $\beta\alpha$ 这样的分数吧，对他而言，并不算特别满意，但还是让他感到高兴。PPE专业方面，大家的成绩惨不忍睹。麦克拉伦<sup>8</sup>不太走运，斯文格勒<sup>9</sup>则更倒霉——因为法语这一科，他降级了。可怜的罗宾逊<sup>10</sup>被指责没有阅读康德的书（史密斯要是有点良心的话……），而梅纳茨哈根<sup>11</sup>则因为回答似是而非而受到批评。我现在才意识到，总体来说，那些课程并不重要——就像能否获得奖学金这件事本身一样无关紧要，无论就最有利的一面还是最不利的一面来看，充其量只有经济方面的影响罢了。老师们的教学往往基于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这份工作的目的是制造出一批

1 即在期末考试成绩中分不同的二等。牛津大学于1986年首次采用这一体制。

2 他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中获一等学位。

3 杰里米·哈钦森在PPE专业中获二等学位。

4 保罗·兰德尔·欧哲斯（1915年生），1933—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中获二等学位。

5 萨穆埃尔·里奥纳多·达尔比（1914—2002），1932—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在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中获二等学位。

6 弗朗西斯（弗兰克·）阿尔弗雷德·莱帕（1913年生），1932—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9—1980年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任教，1940—1980年任古代史导师，获一等学位。

7 约翰·戈德弗雷·格里菲斯（1913—1991），1932—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获二等学位；1938—1980年任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员及古典学教师。

8 马丁·麦克拉伦（1914—1979），1933—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获二等学位；后当过士兵、政治活动家。

9 斯蒂芬·托马斯·斯文格勒（1915—1969），1933—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获三等学位。兰德尔·斯文格勒（上文第214页注4）的弟弟，后（1945年）成为工党议员。

10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罗宾逊（1906—1988），1934—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获三等学位。

11 丹尼尔·梅纳茨哈根（1915—1991），1933—1936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获三等学位。

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幸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要是它正确的话，则害处甚大。如今，我认为正是它的荒谬证明了你我在过去三四年里存在的价值。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你的离开带走了最后一点世代延续下来、可感可触的传统，一种由K.克拉克、凯恩，甚至是布莱特<sup>1</sup>和古德哈特—兰德尔<sup>2</sup>传承下来的传统，一种积极向上、可以用言语表达的文化，如同布卢姆斯伯里文化中心一样具体和可以检验。你会很高兴地发现，不论从一代代的传承延续还是从个人角度，你都是这个传统的一分子，它欢快有趣、生气勃勃，有时甚至灿烂夺目，达到完美的巅峰状态。对这种传统，我常怀有淡淡的恋旧之情，但如同我所有的感觉一样，它只是隐隐地存在，只有在自我反省中才会急剧放大。我对你的思念比对你的同窗都多，这一点也许会令你吃惊，但对我而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具体原因，我尚无闲暇去深究。领取学位之时，务必过来住上几天，并告知我具体日期。

你的

沙耶·伯林

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干扰，我会接着给莫里斯·鲍拉写信，让他转告K.克拉克，将你安排在国家美术馆，本安排在泰特美术馆。为什么安东尼·布[伦特]不去罗马呢？

1936年，刚刚设立了社会人类学教授一职的全灵学院（首次担任该职的是A.R.瑞德克里夫—布朗）准备任命一位心理学教授。在伯林的文件中，有一封写给学院院长（W.G.S.亚当斯）的信件的原稿，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草稿。虽然是草稿，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确定。这些材料的最终稿（如果

---

1 雷吉纳德·巴利奥·布莱特（1852—1930），厄舍尔子爵二世；自由党政治家、历史学家，1901—1930年任温莎城堡副主管和主管。

2 哈里·斯图尔特·古德哈特—兰德尔（1887—1959），建筑师，牛津大学美术学院斯雷德讲席教授。

186 还幸存于世的话)一直没有找到。此信和备忘录曾在别处发表过<sup>1</sup>,但本书信集还是收入了这封信,并认为放在这里比较合适。

备忘录似乎是在9月末开始传阅。在一封日期为10月2日的信件中,杰弗里·费伯写道:“昨晚看了你写的关于心理学问题的备忘录[……]这是我见过的对一个复杂事件的最清晰的表述。要是学院不认同这一文件,那就无可救药了。”但是提议的任命并未下达。

致W.G.S. 亚当斯

全灵学院院长

1936年8月5日[草稿]

全灵学院

亲爱的院长先生:

获悉去年由伍德沃德和费伯二人签名提交、在学院传阅的关于设立心理学教授一职的提案,眼下正由相关的委员会成员加以研究考虑。本人对这一提案的宗旨深表赞同(尽管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牛津缺乏心理学相关设施的起步阶段,研究员一职会比全职教授一职更为合适,因为后者不见得会获得高级讲师或组织有序的本科学院的支持),谨此提交一份关于目前英国和其他地方心理学研究现状的备忘录作为参考,正如您本人所言,希望它对委员会或整个学院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有所帮助。

在心理学方面,本人恐怕连业余爱好者都称不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从零散的文献阅读和与相关专家学者的交谈中获得。因此,唯恐提交的文件既不够精确也不够详尽。然而,我深信提交的材料都是确凿之言。本人已就文中提到的分类法在业已出版发行的心理学书刊上求证,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剑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和诺丁汉大学的高级讲师<sup>2</sup>,他们都与

1 见以赛亚·伯林《1936年的心理学现状》,载《心理学的历史和哲学》第3卷,第1期(2001),第76—83页。

2 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巴雷特(1886—1969),1931—1952年任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首位)教授;沃尔特·约翰·赫尔伯特(“杰克”)·斯普洛特(1897—1971),1928—1948年任诺丁汉大学高级哲学讲师。

我就该学科当前的研究范围和分类进行了探讨,但并不了解我提这些问题的动机,这一点显然目前我不便随意透露。

187

随信附上一份我自认为是根据所收集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若此材料对提案有所助益,希望您能将此信和备忘录提交相关的委员会或学院传阅,我将不胜感激。具体事宜,烦请尊意定夺。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7月份西班牙内战爆发,加剧了牛津大学校园内部政治观点的分歧,全国也意见不一。与大多数圈子里的人一样,伯林对佛朗哥<sup>1</sup>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为帮助西班牙共和党人作出了自己微薄的贡献:“我已整装待发,迫切希望前往西班牙。”<sup>2</sup>但俄国革命期间伯林在彼得格勒的经历让他始终没有像他的许多朋友那样,被共产主义诱惑。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6年8月10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谢拉:

戈伦韦告诉我你想要奥尔登夫人<sup>3</sup>的地址。戈伦韦现在出门未归,我只好把你地址寄给切尔西。地址是:维也纳八区摩尔克格斯大道5号舒茨博士转。

1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将军(1892—1975),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民族独立主义力量首领,继而成为西班牙国家元首,直至去世。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7。

3 鲁道夫·奥尔登与其夫人伊卡(1908—1940)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伊卡是乔治·哈尔彭之女。他们曾受到吉尔伯特·穆雷夫妇的款待。1940年,在作为敌国侨民被拘押后,奥尔登在纽约得到一个职位。他们与约100名英国儿童死于“贝拿勒斯号”船难。



希望你一切都好。西班牙事件<sup>1</sup>是世上最有效的石蕊试验<sup>2</sup>：人们只需问一下对方的想法，其他任何关于其政治立场的问题都属多余。此事比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事件都更加耸人听闻。清楚在事关个人安危、前所未有的紧急形势下自己准备怎么做很必要，西班牙问题是唯一来不得半点含糊的问题，赫胥黎<sup>3</sup>的立场，反法西斯，等等，但也是唯一明显虚假的问题。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例如巴勒斯坦问题），任何清晰表达的主张，必然会对某一方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我喜欢马尔罗的原因（我非常欣赏他的小说，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飞快阅读）是他总是用金子付账，从来不用纸币或者支票——他写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检验和认证，读他书的人不计其数。不知汉弗莱现在是什么样的看法？我记得他经历过一段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时期，时不时有流言说信件会被中途截获。在我听来，这无比滑稽荒谬，但对此事我确实知之不详。

我在伦敦见过（英格丽·沃伯格小姐一两次。她为人诚实，富有同情心，应该让她负责一些真正的事业。

大学生们再度变得严肃和令人尊敬，他们对知识充满渴求，对政治也有令人称道的深入了解。如同“小宝贝”说的那样，这没什么稀奇，同样也没什么好自命不凡，更不会令人生厌。一切都与1830年相仿，因此大众起义、血腥镇压、唯美主义衰败，以及出现注定会消亡或沦为反动派的理想主义一代均属正常。

真心希望你一切都好。

你的

沙耶

1 不到四周之前，一群叛军将领武装反抗左翼共和政府，导致了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英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很快表明了立场，站在共和政府一方。

2 此处伯林原文为：Farbekenner。

3 奥尔德斯·赫胥黎曾为《文人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伦敦，[1937]）一书撰稿，主张和平。

致约翰·希尔顿（在多塞特郡）

邮戳日期1936年8月18日 [明信片]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在给您带来不用说的麻烦之后，未能登门拜访致谢，对此我深感歉疚和不安。事实上，我本不至于如此无礼。只是近来赶着写一本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书，快马加鞭，难有空暇。我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恨不得尽早从中脱身。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现状愤愤不平之人，但唯有这样才能对我笔下这位令人不快的平民英雄做出公正的评价。我承认西班牙事件在这方面帮了不少忙，它使一切事情都简单化了：例如关于政治问题，一旦有人表明对当前局势的观点，任何关于其政治立场的疑问便都多余，因此这一事件是理想的石蕊试验。回到刚才的话题，我的目标是寸步不离这座房子，哪怕只是一个晚上，因为那会使我人为营造的、非自然的持续紧张状态中断。不过还是请你告知（1）在26号之前你和/或佩吉会在伦敦吗？那段时间我会去爱尔兰待上两周。如果在的话，在哪里，什么时候？我发誓我一定会飞去见你们。（2）大约9月12和13号这两天是否有空陪我？只要你稍稍表示一点欢迎，我一定会前去拜访。请回信。

以赛亚·伯林

189

请原谅。但是在乡下过周末对我而言意味着至少四天生活紊乱。目前我的自律能力少有的好。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6年8月26日之前]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伊丽莎白：

十分感谢你的来信。对一个充斥着叫嚣要坚守金本位制，无论该制度是否有助于社会繁荣兴盛的自命不凡者的社会进行反思，着实是一件让人

愉悦的事情。斯蒂芬显然就是其中一员，他昨天刚到（并且非常想见你一面）。而他的忠实好友托尼（这个阵营的另一位成员——E.M.福斯特先生，一位最需要防卫、也最具有防卫意识的人物为他找了一份工作）也明显属于这一类人。和戈伦韦一样，我现在终于有了志趣相投之人，也觉得快乐多了。让我澄清一下上封信里关于莫里斯的夸大之词<sup>1</sup>可能造成的不良印象。那些言辞不过是恶作剧的产物，这种风气十分盛行，几乎无处不在，我也受到了些许影响。事实上，他并没有为此而恼怒，而只是有一些惶恐不安。也就是说，相对于已知的事情，他更为未知的感到惶恐不安。他不相信戈伦韦会在背后不带私心地为他辩解，比如在不喜欢他的库珀夫妇<sup>2</sup>面前，而是怀疑戈伦韦的存在总会出乎意外地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间造成麻烦。我想，只是对一个已知的不忠者的不安使他感到惶恐。对他而言，攻击自然是防卫的一种方法，因此他偶尔带给人的亲切之感，比如在萨伏依饭店请吃饭等，只有在希望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之时才会显露。如今，这一切已经形成周期性的循环：首先莫里斯开始攻击，随后戈伦韦开始发牢骚，而莫里斯又把这牢骚当成是最具危险性的反攻，于是开始反宣传，组织新一轮更加严厉的攻击，从而再次引发新的麻烦。我对这场论战的缓和抱不抱希望，并且表示坚决反对，纯粹因为它本身就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无论起因如何，如今这场口舌之战可以说已经不涉及任何实际利害关系，也不关乎什么重要原则，但就是不肯停歇。因此，我希望能扮演像中立国瑞士那样的角色，营造良好关系，希望双方的弹药很快就会耗尽，进入停战期。这期间，除非被外来因素破坏，这些因素包括既无动于衷又激情澎湃的军火商们，以及那些为双方提供武器，营造恐怖气氛，并在过程中逐渐积累财富的人们（莫里斯曾认为康诺利就是这种人。不知如今他的想法如何），双方将慢慢进入报纸上所称的持久和平时期。无论如何，我都认为你是其中一支有重大作用的友好力量，出人意料地签发了一项有助于双方重归于好的外交方针。

1 指前一封致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上文第216页）中关于鲍拉的内容。

2（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1890—1954），下院议员、作家，1944—1948年为英国驻法国大使；其妻为黛安娜·库珀夫人（1892—1986），两人于1952年受封为诺维奇子爵和子爵夫人。

你说要写一封表示同情的信——哪怕只是表示一丝丝同情的温馨话语，一定会让人对你产生巨大感激之情。但若我有何夸大不实之辞，在此谨向你道歉。实际上并未出现什么危险局面，而周围的善心仁行也依然匮乏。

我于[8月]26日晚动身前往贝尔法斯特，并在那里见到了奥尼尔，接着我去了斯莱戈小镇，从那里前往布拉斯克特岛。我不害怕下雨。出生于一个有几分斯堪的纳维亚特点<sup>1</sup>的小镇，我认为淡淡的柔和色彩是最自然亲和的，而意大利—巴勒斯坦的风景，则仿佛人间仙境，如梦如幻。我唯一不喜欢的是险象环生、高耸入云的陡峭山脉，如同彼得·弗莱明<sup>2</sup>笔下的那些，还有很深的山谷、激流和白雪皑皑的山峰。自然界的壮观景色会让我很自然地联想起T.E.劳伦斯等反纳粹英雄，以及戴·刘易斯先生笔下那些关于奥登的诗行。<sup>3</sup>在诗中，他被比作凶猛的老鹰，无耻的流氓等等，不讲公理，恃强欺弱。这些想法反过来又让我产生了一些反动的浪漫主义情绪，想起了诸如德国人、骑士精神、危险之美，以及赫胥黎先生劝诫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的那种比奥林匹克竞赛还更重要的竞赛。<sup>4</sup>我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有这些想法，除非是袒护某一方让人感觉良好吧，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

如果需要，你可以把那本《牛津展望》留着，我另有一本。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一篇A.A.阿普力克特（就是鄙人）<sup>5</sup>的拙作，引起了整整一年尖刻辛辣的激烈反响，也让我获得了马丁·库珀的友谊。我认为怀旧并不是恶习，而赫胥黎先生让普鲁斯特坐在浴缸里整杯整杯地喝洗澡水的做法确实恶俗气得让人无法忍受。<sup>6</sup>

---

1 里加，拉脱维亚首都，靠近波罗的海海岸。

2（罗伯特·）彼得·弗莱明（1907—1971），士兵、旅行作家。

3 载于《磁山》（伦敦，1933年），第3章，第16节（第29页）。

4 奥尔德斯·赫胥黎，《你能做些什么？有关建设性和平的论点》（伦敦，1936），第34页：“建设性的反战主义者就像为了一个比奥运会还重要的赛事而接受训练的运动员。”

5 这篇文章名为《音乐编年史》，载于《牛津展望》第10期（1930），第616—627页。1930—1932年间，伯林用同样的标题为《牛津展望》写了五篇关于音乐的评论文章。第一篇（本篇）署名为阿尔伯特·阿尔弗雷德·阿普力克特，两篇署名A.A.A.，还有两篇用的是他本名的缩写。

6 见《加沙的盲人》（上文第205页注2），第8页。

我对到达鲍恩宅邸的确切时间不十分清楚，这取决于奥尼尔的安排。汉弗莱是个脾气温和的老好人，不管要他去还是留下，他都不会有二话。我想大约在28号或29号就会知道确切的抵达日期，到时会马上写信告诉你。我喜欢罗莎蒙德<sup>1</sup>的小说，相信森豪斯<sup>2</sup>的也不错（比起布卢姆斯伯里这个名字，我更喜欢布卢姆斯伯里的小说）。

关于我的同伴们，还有什么没说的可以告诉你呢？大致转述一下他们各自的评论也许会有帮助。罗斯认为奥尼尔很难相处，戈伦韦认为他十分迷人，莫里斯认为他生性敏感，鲍恩先生认为他傲慢势利，而博厄斯则认为他十分可爱。我很喜欢他，因他过分腼腆和安静感到压抑，又为他出众的人品所折服。汉普希尔学生气十足，莫里斯很喜欢他，认为他热爱生活，而且忠诚可靠；戈伦韦则觉得他傻里傻气；林德认为他不太合群，而弗雷迪·艾耶尔又对他赞赏有加。至于我，对他是又敬又爱，敬是因为他身上充满剑桥气质，睿智、正直、淳朴、笨拙，学究气十足；而喜爱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时，可能还因为他比起其他人更能理解我说的话题，在政治上比我更有见解。他看上去温和斯文，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刚才又读了一遍《巴黎之屋》，它让我联想起许多事情，可以说比我读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触动我和让我感伤，的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好作品。我真的认为它写得极好。我刚刚订购了你的全部作品，还有M.马尔罗的。

爱你的

沙耶

你的野餐提议着实让我充满快乐和期许。我想，我们不应该只去一次，而应该去两次。至于汉弗莱那边，我还是等见了你后再给他写信吧，不然，在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形下就热情洋溢地写信催他早日归来<sup>3</sup>，总会感觉不太

1 罗莎蒙德·尼娜·\*莱曼（1901—1990），小说家，1928年嫁给沃根·菲利普阁下（1944年婚姻破裂）。

2 罗杰·亨利·普克林顿·森豪斯（1899—1970），原为立顿·斯特雷奇的私人助理，后与弗雷德里克·沃伯格于1936年共同创办了马丁·萨克与沃伯格出版公司。

3 从加尔各答。很明显，鲍恩得到伯林的支持，一起怂恿汉弗莱早日回来，这样大家可以经常

自然。

爱尔兰之行结束后，伯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以及康诺利·奥尼尔一起到鲍恩宅邸，参加了由伊丽莎白·鲍恩和她的丈夫阿兰·卡梅伦举办的家庭茶会。在鲍恩宅邸期间，伯林发现和他同来做客的戈伦韦·里斯——这个鲍恩深爱的人——和鲍恩的朋友罗莎蒙德·莱曼有了暧昧关系。后来，莱曼将这一插曲称为“多事之周末”<sup>1</sup>。伯林没有和鲍恩说什么，并告诫其他人也千万别说，然后就前往湖区与斯蒂芬·斯彭德待了一段时间。伊丽莎白·鲍恩直到数周后才发现事情的真相。 192

##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一<sup>2</sup> [1936年9月14日]

坎伯兰郡，凯希克镇，纽兰峡谷，斯格尔吉尔农场

亲爱的伊丽莎白：

现在我心态平和而自然，可以来描述一下我们近来在此地的经历了。这儿的田园生活平静祥和。乡村风光优美但绝不枯燥，而那长长的步行道明显就是要让人用脚走的，沿途一张椅子也没有，令我望而生畏。爬山的时候我无法思考，无法说话，但或许正因如此，上到山顶时才感到无比愉悦。斯蒂芬可不这样。他对这块土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比我虔诚多了。与此同时，我们最大的乐趣来源于沃尔波尔<sup>3</sup>先生。前几天我们还去他那儿喝茶了。你还记得沃尔波尔先生吗？他说他对你写的书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位

-----  
见面。

- 1 原文为“the Weekend where a Great Deal Happened”，没用“when”，很怪：见罗莎蒙德·莱曼，《罗莎蒙德·莱曼影集》（伦敦，1985），第98页。这些事件成了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心之死》（伦敦，1938）的开篇序章，见下文第243页注1。
- 2 9月8日到15日这段时间，以赛亚·伯林在凯希克湖区。
- 3 休·西摩·沃尔波尔（1884—1941），流行小说作家，1937年受封为骑士。

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的先生，脸上有两个大酒窝，满面笑容地蹦着出来迎接我们，很腼腆地为我们倒茶，急切地询问是否需要茶里加牛奶和糖，仿佛一位害羞的乡村老处女。他先蹦到威廉·普罗默和伍尔夫夫人跟前，为自己能与他们两位相识而倍感荣幸，谈及他们时总带着一种同时夹杂着恩赐与景仰的奇特语气。沃尔波尔先生说伍尔夫夫人是位很幽默的女性，尽管总令他左右为难，无比痛苦。伍尔夫写给他的信确实十分幽默。他让大家知道，他们相处得十分随意、十分融洽，都以平和、愉快、无忧无虑的态度对待生活，两人都很出众，但属于互不相争的两个领域。他对每一样东西都极为喜爱，喜欢优秀的文学作品、好看的影片、可口的食物，对这些东西带着种天真的热情。他活像一个葛兰素公司的广告宝宝，总是与奶油、蜂蜜、果酱等相联系。他很宽容，一点也不挑剔：认为《海浪》一书很好，他自己写的书也很好。他认为自娱自乐很重要，而不应该像彼得·奎奈尔般抑郁寡欢。<sup>1</sup>对彼得·奎奈尔这个人——绝对是个案——沃尔波尔先生并不喜欢。这在一些评论中有所表现。即便是普罗默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曾有过失；所以沃尔波尔先生写了封信给普罗默先生，警告他写那些评论的可能

193 后果。从那以后他们俩就相安无事了。沃尔波尔先生谈到亨利·詹姆斯，要知道，他曾经喜欢过他，带着热忱、喜爱之情，此外还必须加上理解。他谈及和作家普利斯特利先生的关系时，显得有些难为情；谈起布卢姆斯伯里文化中心时，小心翼翼——他与那群男女结成了特殊关系；说到自己的世界时，则又满脸不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每年收入一千英镑以上，对此总的来说他有点蔑视。克罗宁<sup>2</sup>找他时得到的是一些刺耳的言语。他在凯希克镇可是个受人崇拜、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橱窗都挂着他和小狗的照片或是和普利斯特利的照片。他身后总是跟随着一大批跟他长得很像的私人侦探，一心一意地跟着他。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他们的表情：闷闷不乐、警觉多疑，或者明显不苟言笑。休本人喜欢闲聊，他为人和善，不嫉妒别人，喜欢

1 彼得·奎奈尔(1905—1993)，诗人、批评家、传记作家。

2 阿奇博尔德·约瑟夫·克罗宁(1896—1981)，苏格兰小说家，他的作品结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社会批评等多种元素，通常反映他作为医生的经历。他在第一本小说大获成功后弃医从文，如今他的许多小说已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

詹姆斯，性格可爱。他特别喜欢与年轻人交往——了解到我并没有打算搞创新性实验时，他松了一口气，这着实令人感动。他喜欢乘船游爱琴海眺望希腊古迹，喜欢去好莱坞，喜欢参加加冕礼。<sup>1</sup>他过去常去德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去“欣赏音乐”，但因为纳粹的缘故，现在不再去了。他无时无刻地喜爱一切事物，尤其喜欢蜂蜜。在配有专门向导的游学旅行中，他兴趣广泛，行程中充满了各种脍炙人口的趣闻逸事：其间，当手下隆重地高举他新拍的巨幅照片时，他虽有些尴尬，但很快便克服了矜持，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在如此豪爽的个性面前，人们怎么能不开心呢？我和斯蒂芬出色地配合了这一切：斯蒂芬对读书会严肃认真的批评文章是捍卫正直诚信的唯一有力之举；而我对评论家威廉·普罗默的表扬没有得到认同也是出于以上原因，否则的话我们都将被无休无止的阿谀奉承所包围。他用同样的方式赞扬了罗莎蒙德（我相信是出于真心）和衣修午德，并真诚慷慨地对萨默赛特·毛姆<sup>2</sup>说了许多好话，尽管毛姆曾给他带来过痛苦。他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情况，即詹姆斯对了解各种性经验的胃口贪得无厌，每个人都和他讲了自己的私生活，可是他仍不满足。他对哈罗德·尼克尔森<sup>3</sup>的性格、他妻子的作品、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绅士风度、马丁·萨克的诗歌都赞赏有加。离开时，我们觉得很温暖贴心。今天下午他来和我们一起喝茶，带来了他那一如既往的友善态度。上次忘了夸赞的人他都记得，这次带着无比的真诚对他们倍加赞扬。他很喜欢珍贵独特的东西，对那种外面裹着糖粉的胶质土耳其软糖十分着迷。我们建议他像福斯特一样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并告诉他写出来一定是反映现实的旷世巨著，这让他无比兴奋，并因此受宠若惊，高兴异常，不断地把话题往这方面扯，不时偷偷瞅我和斯蒂芬，内心悄悄猜测我俩的关系。他好几次重重地把手臂架到我的肩膀上。然后向我解释说亨利·詹姆斯常对他喜爱的人这么做。他双手都戴着硕大的宝石，雕刻成甲虫形状。斯蒂芬认为这个饰品很精美，也想买

194

1 这里可能指沃尔波尔打算参加1937年5月爱德华八世的加冕礼。

2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1879—1968），剧作家、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

3 哈罗德·乔治·尼克尔森阁下（1886—1968），外交家、作家，本·尼克尔森之父。其妻为作家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1935—1945年任西莱斯特议员（国家工党）。



几个便宜货回来自己戴。他向我们提及了他和希特维尔夫妇以及哈钦森夫人<sup>1</sup>的关系。我们刚一提到某个名字，赞美之词就从他口中源源而出。谈到伍尔夫精神失常时，他忽而欣喜，忽而慈祥，忽而严肃；谈到巴肯夫妇<sup>2</sup>时，他高兴异常；谈到我们，他深表理解；谈到衣修午德和他的儿子，他则深表同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不由得为他着迷，因为他如此兼收并蓄，又如此麻木不仁。他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却从不顾影自怜，也从未见他有不开心的时候。他有着能够包容一切复杂情感和欢乐的超能力。他和福楼拜毫无相像之处。事实上，他更像是一个美化版的布瓦尔<sup>3</sup>：我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毛姆，为什么任何尖牙利齿之人，都无法抵抗那专门为同类相食者所准备的细皮嫩肉的诱惑，而迫不及待地想咬上一口。康诺利先生可能会不喜欢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那发自内心的情真意切和纯澈透明的性格。我希望能再见到他，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像他这样远隔迫害者和受迫害者的人物已经很少见了。即便他在哪个人受到贬毁时表现出幸灾乐祸，也一样天真无邪。每当他加入布卢姆斯伯里文人圈子里时，总要受到他们的唾骂和讥讽，他是如何熬过那种痛苦的，这一点确实让人惊叹。我相信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欢乐。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昨天晚上斯蒂芬和我玩了一个新游戏，以艾略特先生的方式回答问题。一旦玩起来，你就很难停下来。回答问题时必须十分缓慢，小心谨慎，要避免明显的陈词滥调，用精挑细选的词语加以修饰。最重要的是，速度  
195 要缓慢平和，再普通平常的东西也要说出口来。比如，我说：“要充分地了解人，只有通过见面。很难有其他方法能够留下令人满意的印象。”斯蒂芬回答：“是的，伯林，此话不假。可是怎样才能了解死人呢？”等等。就这样我们来来回回舌战了三个小时，发现我们加深了对艾略特性格的了解，也加深

---

1 玛丽·巴恩斯·哈钦森（1889—1977），作家，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杰里米·哈钦森及芭芭拉·罗斯柴尔德（下文第256页注3）之母；克莱夫·贝尔的情妇。

2 约翰·巴肯（1875—1940），作家，1935年封为特威兹穆尔男爵一世，1935—1940年任加拿大总督；其妻为苏珊，他们住在牛津艾尔斯菲尔德庄园。

3 福楼拜一部未完成的反英雄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中的人物。小说写的是两个抄写员为了写一部关于整个人类知识领域的文章而离职的故事。他们最后以失败告终。

了对新英格兰散文的了解。这一切都很真实。测试的关键在于说“是的”，要用适度悲伤的心情和真诚而忧愁的语调。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虽然别扭，但艾略特先生和沃尔波尔先生的性格都很怡人，两人都忠心耿耿、富有爱心，没太多想法。事实上，我把古老的、牛津式的推论重点放在了心灵品质上。只要和斯蒂芬待在一起，就很难抵制这样的倾向。于是我力图矫正自己，想象莫里斯会怎么说，“是的，是的，是一个很好、很好、非常好的人”（我想G.霍普金斯上一次也是被这样描述的）。然而，想到这个值得信赖的特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宇宙当中，还是令人倍感愉悦。他们俩的主要差别在于，沃尔波尔先生拥有美丽的雷诺阿，而艾略特先生则没有，但他们的作品都堪称当代经典。

如果戈伦韦还和你在一起的话，请替我向他和阿兰转达我的问候。我的爱尔兰之旅在结构上就像一首交响乐，开始是一段不稳定而急促的快板，充满了零散的插曲，相互之间缺乏巧妙和谐的组织。接着是一段在鲍恩宅邸的行板，优美而充满欢乐，主题鲜明，张弛有序，变化匀称均衡，有一种令人陶醉的韵味。然后是一段无聊却开心愉快的小步舞曲和三重奏，由沃尔波尔先生，外带斯蒂芬提供的浓浓的宗教情感加入其中。我星期三回家。我的家人对悠闲自在的快板和平淡无奇的终曲总是特别拿手。

爱你的

沙耶

这封信是否写得太附庸风雅了？斯蒂芬让我向你问好。他的性格真是很可爱。为什么艾略特先生不为他专门写一个短篇小说？我必须停笔了。尽早回信！

致约瑟夫·赫兹<sup>1</sup>

1936年9月19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赫兹博士：

我谨向悲伤中的您表达我深切的哀悼与同情。四天前我才在爱尔兰<sup>2</sup>惊悉您爱子英年早逝的消息，否则我会早些时间给您写信。自从在圣保罗学校三年级开始同窗学习，我和您的儿子便已认识，虽谈不上交往密切，却相处甚好。在牛津大学时我们偶尔也会见面。我很喜欢他，他的性格、他的才华、他的生活作风、他作为一名犹太人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一直以来越来越受到我的尊敬。不论是他的同学还是老师（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我的同事），说起他时，总是喜爱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令我特别高兴的是，他得以在牛津大学读书，因为在那种地方，能够不卑不亢、与非犹太人保持适度关系而又获得认可和善意的犹太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丹尼尔独立的性格、作为科学家和人的正直，以及他的严谨和他的魅力，这些都为他在新学院赢得了众多的仰慕者。这一点也许他自己还没有察觉到，可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对此毫不在意的态度，他那纯洁的性格才得到同窗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尊敬与爱戴。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和我一样，对他的不幸去世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这种真诚浩大的同情之心倘若能够减轻您的悲痛，我敢保证，所有认识您儿子的人都会心怀同感，并将长存于心。我的父母以及我本人，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1 这封信件的部分内容出现在《纪念丹尼尔·亨利·赫兹》（伦敦，1936，未公开发行版本），第7页。丹尼尔·赫兹为大拉比约瑟夫·赫兹博士之子，是一位有成就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他于1909年出生于约翰内斯堡，1936年8月29日自杀。关于他的死，有许多传言。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将所患的腺热病误以为是淋巴肉芽肿病，还有人认为是因为在一次打网球受伤使用鸦片后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于1928—1931年就读于新学院，并在动物生理学课程中获一等学位。

2 事实上，伯林在坎伯兰郡。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6年9月23日后不久]<sup>1</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请原谅今天才归还这本书，为此我附上莫里斯的信作为补偿。罗斯<sup>2</sup>先生有些不适，因此他变得态度温和而有礼貌，总是低声细语，也不喜欢别人大声嚷嚷。您知道平时他总是让我极为心烦，所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切无动于衷也不是什么难事。说到外国佬，我觉得犹太人要比凯尔特人可靠稳重得多。他只轻狂过一次，当时他说：“这两个新来的同事我必须得要一个。我一直都有的，特别是现在理查德（·佩尔斯）就要结婚了。您想要汉普希尔吗？”你说得对极了，一个人要是与难以理喻的色情狂们待在一起，他对一切事物的估计，对每一个词语的运用都会失去理智，变得不正常。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对菲利普太太的事情表现得太软弱或者过于悲观。要想结束此类胡言乱语，这是最简便的办法。否则戈伦韦就会无休止地来信指责，而且她肯定会向斯蒂芬诉苦，我还得向他费尽口舌解释，怎么说也说不清。要想快刀斩乱麻，结束这一切，我更倾向于一旦发现有事态扩大的危险，便防患于未然，采取保护性的防卫措施。这就是我的动机（我肯定能成功），但我也很苦恼，觉得这样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忠实，即便是表面现象也不能让其横加干扰。请在星期一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好吗？

沙耶

---

1 伊丽莎白·鲍恩的来信日期，此为以赛亚·伯林的回信。

2 A.L.罗斯。

致詹妮弗·威廉斯

[大约在1936年9月30日]

写在M.V.厄尔斯特“女王”号客轮信纸上

“发自全灵学院”<sup>1</sup>

亲爱的詹妮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封信都回得太迟了，我向你道歉。整个周末我都因反胃和偏头痛而卧病在床，这病总是在一些特定的时令发作。我在床上很开心，思维很活跃，心情也很舒畅。但这种时候，我通常无法思考马克思和公务员等问题。说说前者。<sup>2</sup>你必须承认这个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今晚我会和道格拉斯一起用餐，我想除此之外，我们不会谈及其他话题，我相信他确实如你说的，高兴得要发疯了。<sup>3</sup>特纳先生<sup>4</sup>虽一贯沉静，毋庸置疑也会对此感到高兴，真希望现在就能见到他。至于我，我觉得我可以简明扼要地描述一下我的感受。我得知你排名第三<sup>5</sup>，居然是(马克斯·)贝洛夫先生告诉我的，他来找我——我真的没法用其他词语——询问有关全灵学院的情况。这则消息使人从内心由衷地绽放出微笑<sup>6</sup>，让人立刻产生一种身体上的愉悦。的确如此，我很高兴能表明这些。其他那些肉麻的套话你肯定在纷至沓来的众多信件中读到不少了(艾耶尔先生和里德利先生肯定会用那些语言)，请从中挑出最富感情又最不让人尴尬的，就当作是我写的。天啊，我真的很开心，但依照我们的习惯又不能直接表达这种感情。话能说到这里，我已然很抱歉了。对索尔特或道格拉斯来说就容易多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表达感情，就像两点之间的直线一样不拐弯抹角。(至少前者是这样，后者偶尔也会如此，或许不是什么优点。但这种自由仍令人羡慕，表达的方式简洁干脆。)您要去哪个部门呢？我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在

1 可能确实是从那里发出的信件，但肯定不是写于他之前撕下这张信纸的船上。

2 即后者。

3 道格拉斯·杰伊是詹妮弗·威廉斯的密友和仰慕者。

4 G. J.特纳(上文第171页注1)。

5 名单按公务员考试的成绩排名。

6 这句话在1936年9月23日伊丽莎白·鲍恩给以赛亚·伯林的信中也出现过，应该是之前他们中的一位曾在谈话或书信中用过。

内政部给亨德森先生<sup>1</sup>工作肯定不错。不要太急着拒绝这个美差，想想能掌握保护同伙的大权有多好。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话题。

关于马克思：我刚刚读了尼古拉耶夫斯基先生和奥托·迈恩成一赫尔冯先生<sup>2</sup>的书，从它自身提供的内证来看，我判断后者写了前半部分，而前者写了后半部分。如果是这样，前者写得更为出色。第一章不错，也没有理由不好，但并不比卡尔先生<sup>3</sup>的强多少。卡尔先生写了一本很肤浅且傲慢的书，一副施恩于人的口气。他认为卡尔·马克思是个老怪兽，有魄力，求知欲强，也很有意思。他时不时告诉别人他是天才，却又不拿出什么真凭实据。但他还是试图回答有关马克思的各种问题：关于思想进化论，以及他与赫斯、拉萨尔以及巴枯宁<sup>4</sup>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总是很肤浅，可笑到让人难以忍受，而且错误百出。但他至少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可这两个人对此就一无所知了。他们只管快乐地勇往直前，根本不去尝试询问或回答诸如“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或者为什么在柏林时他喜欢黑格尔学说的授课者甘斯<sup>5</sup>而非保守派的萨维尼<sup>6</sup>（这点很有意思而且极具启发性），或者自由党人怎样转变成革命党人，为什么恩格斯参加威利希<sup>7</sup>的民主军队属正确之举，而赫尔威克<sup>8</sup>出于相同目的在巴黎

1 约翰·F.亨德森（约1902年生），内政大臣助理，主管儿童事务。见詹妮弗·哈特《别再问我：自传》（伦敦，1998），第83—85页。

2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迈恩成一赫尔冯，《卡尔·马克思：人与战士》（伦敦，1936）。詹妮弗·威廉斯应朋友道格拉斯·杰伊的邀请在《经济学家》上为该书写评论。道格拉斯是杂志的编辑人员。詹妮弗因力所不及，请求以赛亚的帮助。她写的短评刊登在1936年12月12日的《经济学家》第56页上，没有署名，其中大部分内容出自这封信。该书于1970年修订后以法语版重新发行（添加了参考文献），1973年发行英文版；以下注释中参考文献的页码标注里斜杠前是1936版的页码，斜杠后是1973年版的页码。如382/407。

3 爱德华·哈（雷特）·卡尔，《卡尔·马克思：对狂热的研究》（伦敦，[1934]）。有关爱德华·卡尔见下文第809页。

4 摩西·赫斯（1812—1875），德国新闻记者、社会主义者，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中有论述；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著作中曾讨论过他；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思想家》中被比为亚历山大·赫尔岑。

5 爱德华·甘斯（1798—1839），黑格尔的追随者，德国法学家。

6 弗雷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1779—1861），德国法学家。

7 奥古斯特·威利希（1810—1878），革命家，曾为普鲁士军官，见第201/213页。

8 格奥尔格·赫尔威克（1817—1875），德国诗人、革命家。

组织大众支持暴动却犯了大错。我提这些是因为作者肯定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不少笔墨，却又什么都没有讲清楚。但你想了解里面有没有所谓之前未曾披露过的信息：我只知道梅林<sup>1</sup>、卡尔先生和我的新俄国年鉴<sup>2</sup>所知道的，因此什么都不能确定，但以下这些内容我认为比较新颖，要么就是我孤陋寡闻：

1) 他在波恩与人决斗。<sup>3</sup>

2) 因俄国政府<sup>4</sup>的干预，《新莱茵报》<sup>5</sup>被迫停止发行。我认为这倒是个真正的爆料，幸好马克思狂热的反斯拉夫主义还没怎么被深究。

3) 这位教授写的有关工人教育协会在伦敦举行会议的内容很有意思，  
200 我认为也是之前不曾提及的。<sup>6</sup>

4) 我之前并不知道恩格斯在不莱梅和巴门时曾经被丹麦间谍监视。<sup>7</sup>

5) 普鲁士间谍<sup>8</sup>所描述的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很好笑，但光顾路易·布朗<sup>9</sup>集会的故事更滑稽，可是书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如果一个人的书里充

1 弗朗兹·梅林，《卡尔·马克思》第5版，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译（伦敦，1936；第1版德文版于1918年出版，第5版于1933年出版）。

2 应该为卡尔·马克思的《德法年鉴》（莫斯科，1934），所谓“俄国”只是因为本书是由莫斯科的马恩列学院出版。

3 见第20/21—22页。

4 见第59/64页。

5 一份自由民主报刊，1842年初创办。马克思到10月份为止都是该报的编辑，该报于1843年3月遭封杀。

6 大概在第204—205/217页，引用了一则新闻报道，说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教育联盟的成员在南非港市东伦敦的一家德国皮毛厂给刚剥下的毛皮盖戳，他们的汗水使皮子变得更为柔软耐用。所以“贵夫人戴着毛皮的围巾和暖手筒，尽管她们并不知道，她们实际上穿戴的是民主党人的汗水”。

7 第90/96—97页。

8 第241—242/255—257页。

9 让-约瑟夫·夏尔-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为了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他于1851年2月24日在海布瑞酒馆（现位于伦敦伊斯灵顿区）组织了一次共产党人集会。马克思被排除在外，因为他属于对立派别。但马克思派了两个密探去打听。当晚其中一人回来汇报后，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封信，讲到一件事，以赛亚·伯林指的可能就是这个。聚会的人们“开始失控。他们开始叫喊‘间谍，间谍’[……]史拉姆和派普被人拖出大厅，扯掉帽子，在大厅外的院子里拷上双手，被人又踢又踩，差点撕成碎片，大把大把的头发被扯了下来。”信上日期为1851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75—），卷38，第298页（大写部分由马克思用英语撰写）。

斥着这类逸事——当然总体而言这么做不错——那就应该包括最有趣的那些，不是吗？他们漏掉了安年科夫关于马克思的描述，只摘录了一小段，而那个故事毫无疑问是最好的。<sup>1</sup>

6) 书中提到了比利时那位不太受人注意的德·帕普的一些情况，对我来说也很新颖。<sup>2</sup>这似乎在共产国际历史上颇为重要。

7) 有关巴枯宁的章节<sup>3</sup>要比关于马克思的精彩。纪尧姆<sup>4</sup>和上了年纪的弗兰格尔<sup>5</sup>的故事也不错，值得再版。目前我们看到的大都还是轻松的传记类文字。整个尼察夫的故事<sup>6</sup>本身不错，但恐怕不太相干。我觉得是因为尼古拉耶夫斯基了解俄国革命党人，所以喜欢讲述他们的故事。一定是这样的。

8) 爆料二。恩格斯曾计划帮助巴黎公社。<sup>7</sup>挺新鲜的。

9) 他们拿1927年发现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sup>8</sup>大做文章，却雷声大 201  
雨点小，对信件的实际内容只字未提。简直要让人发疯。

10) 对马克思的描述有时很可笑<sup>9</sup>：

---

1 第118/125页。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12—1887)在1846年见过马克思辩论。引用的章节出自他《非凡的十年》，第31章，1880年首次发表在《欧洲公报》第2期(3—4月)，见第497页。另见P. V. 安年科夫的《回忆与评论文集》(圣彼得堡，1877—1881)卷3，《非凡的十年，1838—1848》，第156页。

2 只是在第274/292，第300/319页粗略提及。西萨·德·帕普(1842—1890)，比利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巴枯宁的追随者。

3 第18章。

4 詹姆斯·纪尧姆，《卡尔·马克思，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巴黎，1915)，引自(以赛亚·伯林提到的“再版”)第290—292/308—311页。

5 尼古拉·依葛洛维奇·弗兰格尔男爵(1847—1920)，著名的(白俄)将军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878—1928)的父亲。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19年到1920年在俄国南部攻打布尔什维克党人，见第286/303页。“N.弗兰格尔”男爵，《传记：从农奴到布尔什维克》于1924年在柏林出版(后出版经过删节的法译本，又从该译本翻译成英文)。第285/303页上引用了有关巴枯宁演讲风格的一段文字(第61—62页)。

6 见第345—353/368—376页。

7 以赛亚·伯林似乎弄错了第318—319/339—340页上的一段文字。

8 见第258/275页。

9 第100/106页(“那个善良、有趣、谦逊、刚毅果断的家伙”)，第359/382页(马克思给他[荷兰海牙一位比利时新闻记者]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绅士的农民”)，第241/256页。



“一个真诚的好人”（弗莱里格拉特<sup>1</sup>）

“就像一个很绅士的农民”（匿名荷兰人）

“不称职的主人”（普鲁士间谍）

结论：我实在看不出来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结果。他们像避讳毒药一样脱离一切理论。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在这方面效仿他们，如今似乎自己要不变得晦涩而且夸张就没有办法讨论黑格尔或者他那些讨厌的追随者。我一直在整理概括他们的观点，但写出来的东西读起来全都像狂热的呓语，于是我把那些要点总结都撕碎了。再写出来的东西就枯燥多了，但仍在某些方面显出无可救药的愚蠢。

描写1848—1949年德国的章节<sup>2</sup>混乱得让人吃惊，整个1849—1862年这个时期也是如此。写到巴枯宁和俄国人，文风才逐渐清晰起来。而将马克思与赫斯、海涅、拉萨尔的关系整个遗漏掉简直令人无法容忍。关于这些人，书中只穿插了一些带丑闻性质的糗事。就连既傲慢又爱炫耀的卡尔先生，也写得比他们细致精彩。除了那两处爆料，我没发现任何划时代的东西，就算这两处爆料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重大意义。时不时会发现一些好笑的引语，比如有关土耳其的，参见第373页。但他们却言之凿凿地夸下海口，宣称自己阐明了共产国际的历史。我不知道他们关于共产国际海牙会议<sup>3</sup>的叙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暗杀的说法是否令你信服，我觉得他们只给原本就模糊不清的状况又投下了浓浓的暗影。

但是我以为这也算不上一本坏书。虽然它没能自圆其说，证明马克思是位伟人，但它毕竟驳斥了迪克·克[罗斯曼]等完全无知之流，他居然公开提出马克思只会纸上谈兵。但梅林毫不费力就能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我认为这传达了一种普通常识。但除了从巴枯宁开始的结尾的一小部分，这部分看起来像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的确描写得还算生动，除此之外，整

1 （赫曼·）费迪南德·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政治诗人，马克思的朋友。

2 第14章。

3 于1872年9月召开，第358—367/381—391页。

本书可谓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描写是一项重要检验，202  
写得如此单调乏味真是好比犯罪，尽管我自己恐怕也犯下了这种罪行。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就当罪加一等。我即使不是第一个承认，至少也会是第一个在意这类批评的人。很抱歉这封信写得如此零乱，而我又那么无知。但请不要以为N.O.布朗<sup>1</sup>就能做得更好。也许他能，但我无法忍受这个想法。我准备前往海丁顿的一间乡村居室，在那儿隐姓埋名，与一名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一起住到星期一。假如你回来，请一定让我知道，我很想听听K小姐<sup>2</sup>的事情。我不能给您打电话，因为我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你的  
沙耶

提起你的信，我发现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那两处爆料对我来说的确很有趣，但一点意义也没有。文献看起来倒是一手的资料，可以相信。

致罗莎蒙德·莱曼

[1936年10月初]

全灵学院

亲爱的罗莎蒙德：

这份通知发得太仓促了，原因是之前一直没有你的地址。忠诚的斯图尔特现正在我们学院参加考试，是他告诉了我你的地址。不知他是如何知道的，但他把地址给我时的样子，俨然那是属于他的私人资料。他和其他

---

1 诺曼·奥利弗·布朗(1913—2002)，共产主义者，见詹妮弗·哈特前引书(上文第237页注1)，第103页。1932—1936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师从以赛亚·伯林)；离开牛津后他在威斯康辛攻读博士学位，尽管在战时他作为研究分析员为美国战略工作处工作，但一直没有离开美国学术界。

2 指伊夫·基希与詹妮弗·威廉斯、赫伯特·哈特以及阿诺德·皮尔金顿一起去南斯拉夫度假之事。她与詹妮弗·威廉斯并不是很亲密，詹妮弗请她参加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有另外一名女孩参加。她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但人际关系方面却总是过于敏感，作为度假伙伴她当然不那么好相处。因此或许以赛亚·伯林对此感兴趣。

一些可爱的本科生——我认为个个都非常可爱迷人——正翘首盼望与你见面。抱歉我还是没有向你表达我的邀请，请你下周日到这里来吃午饭。那些本科生们——事实上他们刚刚到校——分别是戴维·华莱士和杰斯帕·里德利，他们俩彼此认识并与你也认识，是通过一位里德利太太，对吗？据说你也认识她。如果可以，请你过来，我很想跟你们说说爱尔兰和其他事情。

我刚离开一个令人陶醉的环境。戈伦韦形容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不变的  
203 图鲁兹—劳特累克姿态静坐着，他的描述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所有场景，还有那个系着黑领带的男人、罗杰[·森豪斯]戴的瑞士格子图案领带、阿兰那突出的蓝眼睛、伊丽莎白[·鲍恩]莫名的烦躁，使一切都染上了触电般的惊悚特质。外加那位美国部长<sup>1</sup>，那无比悠闲的感觉，以及对可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并将相互发生作用的预感。最后是戈伦韦上场，什么也没有带，但带来了他的天才，就像年轻的卢梭，身处一群18世纪中叶官方启蒙哲学家之间。一切就像艺术品一样美好，我永远忘不了也不可能忘记。

请你尽可能过来。

你的

沙耶

剑桥国王学院现代档案中心莱曼档案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6年10月8/9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我得出结论，一定要表示道歉。<sup>2</sup>我并不像刚刚离开的莫尔说的那样，

1 也许是埃尔文·曼斯菲尔德·欧斯里(1888—1967)，1935—1937年任派往爱尔兰自由邦的美国部长；一位健壮的得克萨斯民主党人。

2 斯彭德10月8日写信，温和地抗议伯林10月7日星期三那天没有在他自己提议的见面地点露面。

不可救药地错了，不过当然，正义肯定在你那边。事情是这样的：你应该记得，我写了信，说如果没有得到你的回复，我就过去找你。突然我忧心忡忡起来，不知信是否寄到了，倘若你没有收到我的去信，自然就不会回复，而非像我信中约定的那样，以不回复表示同意我的提议。这个念头让我坐立不安，我开始不断地打阿伯康和江滨<sup>1</sup>的电话，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的期待中，江滨的建筑工人很友善，但无法提供任何情况。星期二我按阿伯康—伦道夫的地址发了一封绝望的电报，结果仍然没有得到你的回复。我以为不论你在哪里，他们都会把那封电报送到你的手中。我给莫尔写信，他又和托尼联络，托尼说你要到星期四才能回来。如此一来，我便以为你已经忘了我们的约定了。想到可能要孤独地与难听的音乐为伴，度过一个夜晚，我就感到害怕，于是我请求[马丁·]库珀邀请我吃晚饭——特别是在斯帕洛和莫里斯在我面前描绘了一幅他与拉尔夫·瑞基茨<sup>2</sup>荒谬有趣的婚姻画面之后，库珀是一位高大温和、滑稽有趣的男人，用伊丽莎白·鲍恩的话说，像块松饼。这顿饭吃得很值得，对此我打算通过一般性的奖赏方式恶意地对待你。我留下了一张票，另一张票我以卑鄙的条件卖给了J.斯凯尔爵士<sup>3</sup>，他很讨人厌（是瑞基茨的朋友）。你没有损失什么，整场音乐会就像受难，从心理上或是病理学上看十分罕见，但从音乐角度来看却是一种虔诚、真挚、诚实的混成作品：就像文森特·丁迪<sup>4</sup>之于拉丁传统那样，范一迪[埃伦]的作品似乎是英国17世纪音乐的混种。不能确切地说它就是模仿，也不能说它比别的作品更像戴留斯的创作，虽然有一些片段的确相似。同时，它并不独立，也不具有独创性，甚至不算好，可以想象一下，一种真正自视甚高的附庸风雅，不粗俗，很拘谨，被昔日的纯真情感所影响，学习着，承受着，等等，总体来说它具备文化上而不是音乐上的意义。特纳先生没有去，倒是

204

1 江滨3990是斯彭德位于伦敦西6区布鲁克格林女王公馆11号住所的电话号码；阿伯康1763是斯彭德先前的住址，伦敦西9区伦道夫新月街道25号的电话号码。

2 拉尔夫·罗伯特·瑞基茨（1902—1998），作家，1921—1925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通过考试，没有学位）；1934—1939年任《伦敦水星》审稿人；后来成为蔬菜种植者和农场主。

3 约翰·柯林斯·斯凯尔爵士（1884—1958），乔治时代一位名气不大的诗人；1919—1934年任《伦敦水星》编辑，和约翰·劳埃德·巴尔德斯顿共同创作了戏剧《伯克利广场》（1926）。

4 （保罗—玛丽·西奥多—）文森特·丁迪（1851—1931），法国作曲家。

见到一帮姓布勒的人<sup>1</sup>，肖·泰勒<sup>2</sup>等，这多少有点让我心烦。而在另一方面，现在我已经不会因为无意中迫害了一个天才而感到不安了。<sup>3</sup>

对我的爽约我非常抱歉，坐等一个不来的人绝对是糟糕透顶的事，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糟糕。为此，你理应得到回报。回报一，库珀的晚餐具有了不起的教导作用，它让我对人类变形的可能性豁然开朗。你会说你早就看到这个过程了，没什么奇怪。回报二，那场音乐会令人痛苦。回报三，由于急着赶回牛津，我把一件外套和一顶帽子<sup>4</sup>落在出租车上了。回报四，莫尔长篇大论地好好教导了我一番。回报五，我处于更加窘迫的处境之中。你也许还不知道，罗莎蒙德和你本周日都要来这里吃午饭。我已经请了汉普希尔、杰斯帕·里德利（一个可爱的怪人）和戴维·华莱士，还有那位人也许不错、但你说他长相丑陋的格雷厄姆·哈里森<sup>5</sup>来和你会面，这样就有六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过，至少大家都很友好。现在库珀写信来，问我  
205 能否请R.莱曼星期天吃午饭，说我认识她，因为拉尔夫和他都想见她，所以到时候会过来。碰到这种事通常我总是束手无策，我能做什么呢？这纯粹是一次可怕的巧合。八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不管怎么说，你不喜欢马丁·库珀，而瑞基茨，虽然宽厚无害，但于事无补，正如莫里斯所说的，对他没必要像对马丁·库珀那么当心。要想对这两人说谎可不容易，因为最终总会穿帮，而且这么做也未免有些卑鄙。而充当女主人角色的我，只会比作为聚会一分子的我更加可笑。真希望休·沃尔波尔能在这里帮帮我。我相信他和亨利·詹姆斯一定有应付这类局势的明确法则。可这会儿我该怎么办？快告诉我（像“小宝贝”说的那样）。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即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会邀请所有人参加，聚会上将有很多人，你就不

---

1 也许指的是画家爱德华·约翰·布勒（1905—1976），为芭蕾舞和歌剧做设计。

2 戴斯蒙德·克里斯多夫·肖—泰勒（原文如此）（1907—1995），音乐评论家；此时为《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撰稿，主要是文学方面的，虽然有时候也写音乐方面的文章。

3 也许指的是柏林对范·迪埃伦的作品《与亡者同沉》的评论文章（上文第164页注4）。

4 即一顶圆顶高帽？

5 弗朗西斯·劳伦斯·西奥多·格雷厄姆—哈里森（1914—2001），1933—1937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古典学专业；1938年起为公务员，《卡尔·马克思》的索引员。

会在意库珀了，他将如我们希望的那样<sup>1</sup>淹没在人群当中。那将像一次王室聚会，也许我该把众人分为午餐和下午茶两组，让我看看这样可不可以。请告诉我你是不是绝对不能忍受马丁·库珀，如果确实如此，不论怎样这将帮我做出决定，快刀斩乱麻。我会请盖尔斯·隆米里吃饭，弄明白奥地利俱乐部的事。<sup>2</sup>快点来信。你一定会说，“这么可怕的混乱状态，亲爱的以赛亚，你怎么能让它发生”。

沙耶

### 致约翰·希尔顿

[1936年10月中旬，明信片]

全灵学院

你认识多兹吗？他外表很友善，受人尊重，实际却非常阴郁，城府很深，拘谨褊狭，平庸黯淡。如同艾略特先生一样，他相信漂白的东西。虽然没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但他长得的确很像比弗布鲁克，抑或是布莱克威？他在咽气之时，唇边还隐约嘟哝了一句对牛津圣体学院充满敌意的话。鲍拉先生从剑桥弥撒会写信来，认为这是上帝给新希腊主义者的第三巴掌，第一巴掌是佩因之死<sup>3</sup>，然后是他本人争夺教授职位失败，现在是布莱克威，这说明上帝遵循三分律。布莱克威的直接死因是肾炎+静脉炎，而终极原因则是导致他衰竭的任何因素。哈迪立誓独身，逃开了圣体学院对结婚成家的年轻研究员的诅咒，这一诅咒无疑是由菲尔普斯强加的。

你的

沙耶

1 伯林此处原文为：hoffentlich。

2 伯林受邀与斯彭德和其他朋友在一个奥地利小村庄米德斯逗留，该村庄位于茵斯布鲁克南面的蒂罗尔，但后来伯林没有参加。

3 汉弗莱·吉尔伯特·加斯·佩因（1902—1936），自1929年起担任雅典不列颠考古学院院长。他是布莱克威在这个职位上的前任，也于1936年5月9日因血中毒早逝。

致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up>1</sup>

邮戳日期1936年10月21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图尔特：

非常喜欢读到你的来信，真的。很遗憾你没有把院长也写进去，毕竟他是一位丰富多彩的奇人。此外，你也没有提到那位沉默而神经质的亨德森先生<sup>2</sup>，我把你丢下，让你和他待在一起，饱受痛苦，就为了弄清伍德沃德对你的看法。他觉得你很好。他就说了这句话。无疑，因为他是考官，其他事自会通过行动来表示，这个话题目前我真的不能说得太多。只能说你做出了自己应做的努力，那么，不公的评判就不可能落在你的头上。但谁也不敢打保票，真的，只知道你在哲学试卷中体现出来的专业优势起到了决定作用，索尔特和伍德沃德告诉我，我那该死的考题招致的麻烦在于考官们看不懂答案，然后他们就把试卷给我看，让我写报告，他们也给伍兹雷<sup>3</sup>看了试卷。我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对每一份试卷都作了独一无二的描述，对此我很享受。别离开英格兰，好吗？很高兴你见到了索尔特。他被罗斯迷住了<sup>4</sup>，认为他是同辈人当中他见过的最有魅力的男子，这种调情既令人开心又令人恶心。恶心是因为索尔特现在是罗斯和他心目中所谓权力的唯一联系人，而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索尔特在某种意义上奇怪地身处局外，他们形成了一个二元封闭结构，一种孤立的椭圆，或者也许是像儒勒·凡尔纳月球旅行那样的东西<sup>5</sup>：抛射体中间的旅行者们被发射到月球上，直线发射，直至他们遭遇了一颗小行星，小行星沿着一条模糊而非常遥远的路径

1 伦敦西南7区，克莱维尔街8号。汉普希尔刚刚参加了全灵学院的研究员考试。

2 哈伯特·道格拉斯·亨德森（1890—1952），1942年受封为骑士，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经济顾问委员会联合书记；1934—195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51年当选院长，但由于患病而未赴任）；1939—1944年任财政部经济顾问；1945—1951年任牛津政治经济学教授。

3 安东尼·道格拉斯·伍兹雷（1912年出生），哲学家，1935—1937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4 此处伯林原文为：bezaubert。

5 儒勒·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97小时20分钟》（巴黎，1865）。伯林孩童时期读过俄语译本（在他的那套凡尔纳小说中，《儒勒·凡尔纳作品全集》，圣彼得堡，1906—1907），他喜欢俄语版基于英文版（1873）；看来他保留了对小说情节的近乎完美的记忆。

运行,他们受到小行星的吸引,乘坐的飞行器即成为小行星的卫星。他们依然想象着去往月球的道路是什么模样,想象着一个以异乎寻常的高速运行着的新世界。最后,我想,他们掉进了太平洋,被捞起来的时候还在飞行器里面玩多米诺骨牌。不过也许,索尔特不像那颗流星,他不会爆炸,而是重新回到月球系。这会儿他跟人说的是,即便是副大臣的职位,也别想收买他。至于你的哲学观点,我很高兴你在思考元语言,而总的来说,你拒绝深入研究这个题目。你(正确地)说,从非自然产生的语言的意义来看,这不是同义反复,但你倾向于暗示如果真是这样,则[丝毫]意义也没有,或者,假使有意义,假使能够使感情产生共鸣,例如,发布“马是动物”的指令,如你所言,并不意味着命令“使用马,等等”,而是说明这是如何被遵守的:刘易斯先生的概念在起作用<sup>1</sup>等等。然而人们想知道的是,人是如何产生概念的;人在以任何方便并带任意性的模式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预设;换句话说,这是对于语言提出的唯一超验问题,而不是物理法则;必要性通过文字表达(“我作为人有权这么说”,里德利在某个地方这样说道),这怎么可能?语言不可能与象棋等同,否则我们只能有说话的行为而不能说出具体的内容。那么有意思的话语,换成别人,一半都写不出来。你扼杀有色—延展的东西有点儿太容易了,既然在这种情形下,通过广度和深度的二维操作,色彩的神秘(对我而言)属性看起来完全不像词源惯例:热是怎样的呢?延展的东西肯定摸上去一直都是热的,但热的尖锐刺激感却似乎不能被称为延展。

所有[H.H.]普莱斯的学生或受其影响的人(例如佩克<sup>2</sup>),兴高采烈地将事物分成淡蓝淡紫等颜色来讨论,似乎没有意识到景色的特异性。这显然是飞行员对色彩的看法<sup>3</sup>,不过很奇怪,这样的看法被广为普及并且机械化了。

---

1 克拉伦斯·埃爾文·刘易斯(1883—1964),美国哲学家,著有《心智与世界秩序》一书(上文第180页注1)。

2 安东尼(托尼)·迪尔文·佩克(1914—1987),哲学家,1933—1936年就读于三一学院PPE专业(H.H.普莱斯的学生);1938—1946年任研究员,后为公务员。

3 普莱斯的主要爱好是飞行,他是牛津城市滑翔俱乐部的主要创立成员。



关于查尔斯·莫里斯的隐喻<sup>1</sup>很令人反感,但确实如此。正如我应该记录下来,我的将PPE作为课程的提议显然是个错误。也许它属于纯粹的复制主义,也就是说,由于我自己被胁迫而修了这门课程,所以希望别人也遭同样的罪;因为我不得被迫获得自由,所以我不能理解什么是没有受到强迫的自由(早期马克思会这样胡诌“……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施加武力了”  
208 这样的话,或是别的一样恐怖的话)。不管怎样,萨姆纳等人显然是对的。不管怎么说,这或许会成为学术问题。什么时候我得向你报告一下斯帕洛和普拉门塔兹的谈话,他们的对话很奇特。

至于罗莎蒙德·莱曼,我不太知道答案。<sup>2</sup>慢着,我也不太理解这事,你说讨厌自己这样缺乏自我意识,使事态逐渐减弱,变得微不足道(你指的是缺乏自知之明还是对周围环境无知无觉?你不可能对别的什么缺乏意识),比如说,即使给你一座桥梁,你能否走过去?或者,你只想要奢侈地拒绝这么做,而不是仅仅意识到河水,意识到河对岸的人所看到的你在水中的倒影,却不知道可以走过那座桥,充分展示自己,让自己得到那些神秘人物实实在在的对待。如果你愿意,尽可以做一番解释。不管怎样,我是绝不想得到什么桥梁的,在这方面,正如[戈伦韦·]里斯不止一次痛苦地注意到的那样,我是一个狂人,一头怪兽,将去那毫无浪漫色彩的对岸做一次短暂拜访,自身难保。换言之,再次会面看来不可避免,我得确保(怪兽特性在此充分暴露)这是按照我提出的条件进行的会面。之后,我将更加精确地向你报告别人是如何看你的。我同意,你完全有权利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是很折磨人的。我将直接提问,然后直接给你答案。我肯定他们是那样。没有微妙含意就没有真正的谈话。杰里米来看望了我,本给我寄来了明信片

1 莫里斯(见上文第162页注1)在巴利奥学院的学生SNH向编辑这样描绘莫里斯,“糟糕的哲学家,后来成为出色的战后时期校长[里兹大学(1948—1963)],公众人物”,再后来(1967年)他成为格拉斯米尔的莫里斯男爵。在未写日期的信件中,SNH写道:“查尔斯·莫里斯”对我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态度,依旧是一位贝多芬之夜漫步音乐会的常客对兴德米斯演奏的态度,或者不妨说,他愿意以这种方式表现。

2 在同一封信中SNH还写道:“如果你可以告诉我在罗莎蒙德·莱曼眼里我的人格面貌如何,我将不胜感激[原文如此]。我觉得她进入了一个到处是戴着面具的人物的圆形舞台,我昨天突然想到也许我扮演了不恰当的角色。我不喜欢在我缺乏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使事情逐渐减弱,变得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情形正在发生。”

片。杰里米确实为人随和，他待在我这里，和我聊天，看来的确已经决定适应周围环境，并认为所有人都很可爱（除了博厄斯之外。我突然想到博厄斯阻挡了人们与美好事物的联系，就像比利时挡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本多愁善感，令人难以置信，他说“难道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牧场，见到被雨水打湿的牧场了吗？”或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豪斯曼还是他母亲？

你的

沙耶

致玛丽·费希尔（在巴黎）

邮戳日期1936年10月2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引以为傲的品质，我说的是一种美德。迄今为止，209  
仅有布莱克威太太和我表现出了这种美德，我想盖伊也有这样的美德，我要根据具体情况给他们（我们？）打分。一系列事件重叠交汇，而我恰处于事件的正中央。它们分别是：（1）布莱克威的去世。（2）爱尔兰之行的回响。首先，克里斯托弗激动不安地在新学院的前院走来走去，典型神经衰弱的表现，毫无必要。其次，爱尔兰的绯闻真的只让人觉得卑劣。莱曼小姐对此负主要责任，布卢姆斯伯里式的胡言乱语四起，大家相互怀疑，各自都说自己不会和别的某个人发生绯闻，滑稽的迫害由此产生。我甚至开始无法严肃对待这些事。气氛基本上是古怪的，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受苦，只有许多似真似假的行为，而且每个人都向我咨询信息，因为我被（正确地）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公正无私的旁观者。看来大家有一点不太清楚，那就是，在卑劣之事发生之时，即便是我，好奇心也有限度。最后一击来自莱曼小姐的信件，充斥着令人尴尬的语句，让人无法避而不答。她也许是个很美丽也很重要的女人，但我认为她既乏味又情绪化，而且显然不够善良。不过，正如你可能猜想到的，我从中捣乱，给每个人写安慰信，觉得自己是克里斯托弗，渴望就

这件事和某个人开个玩笑，只是唯一可能的听众似乎都成了事件的主人公。

关于布莱克威：我是从哈迪那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合情合理。这是自然法则的灾难，人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并最终标志着青春的终结。邓得斯<sup>2</sup>写了一篇很好的讣告登在牛津杂志<sup>3</sup>上，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寄一份。韦德—格里<sup>4</sup>也写了一篇十分精彩又别具特色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sup>5</sup>，你可能已经读到了，他说布莱克威是一个充满着烈焰激情的人，粗俗、直接、热情，或是类似的描述。里森<sup>6</sup>先生召集了一群温切斯特学院学生到他身边，把“一盏伟大的明灯熄灭了”的话结结巴巴地说了两遍，然后抱怨讣告内容，因为它“只字未提逝者内在的温文尔雅”。

210 很抱歉我的信变得如此怨天尤人，但是你会理解的。继续：盖伊表现极好，两星期没有假装自己不能笑；艾丽森·布莱克威的表现恰到好处，令人吃惊，既未崩溃也没有故作坚强。我想，其中部分原因是她对世态炎凉一无所知，以为自己还可以在伦敦文学界获得重要的事业发展，等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她表现出色。我肯定R.奇尔弗—格雷夫斯小姐在某些场合某个方面举止奇怪或是不当，但缺乏证据。托尼的确非常非常难以相处，但他有充分理由这样。如果有谁无依无靠，那就是他了。后来有三天他和我一起吃饭，一次也没有提到阿兰的名字，对此我有点怨恨。我认为托尼并未戏剧性地夸大自己的处境，毕竟戏剧化的夸大只是对现有事物的夸张（甚至几乎不是陈词滥调），而已经发展到了极限的局面是不可能再被夸大的，只是因为偏离了焦点，会显得有点模糊不清。不管怎样，托尼闷闷不乐，

1 伯林此处原文为：jeunesse。

2 罗伯特·汉密尔顿·邓得斯（1884—1960），古典学家，1910—1957年任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和导师。

3 一份非正式的大学杂志，那时和现在都在学期期间每周发行。讣告《阿兰·艾伯特·安提斯代尔·布莱克威》，作者“R.H.D.”，发表于第50期上，发行日期为1936年10月22日。

4 亨利·西奥多·韦德—格里（1888—1972），古代史学家，1914—1939年任瓦德汉姆学院研究员，后来成为古代史学威克汉姆讲席教授，新学院研究员。

5 《阿兰·布莱克威先生：雅典不列颠学院院长》（未署名），《泰晤士报》，1936年10月12日，第19版，文中，韦德—格里说布莱克威是一个“暴烈的人，充满火焰和精力，有着与这种性格相匹配的身体”，他还说“他将作为一个不计后果、充满活力的人而被人们记住”，以及“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斗士，粗俗、个人化、直接[……]”。

6 斯宾塞·里森（1892—1956），1935—1946年任温切斯特学院院长。

闷声离开房间，悲哀地大笑，在别人正在说无害的话时朝人喊“停下，停下”，而且几乎压根儿就没什么生活乐趣。

如果莫里斯在这里，相信他一定会采取坚决手段，让每个人都更规矩：罗伊和赖尔算不上是已故的布莱克威的朋友，却在追悼会上出现，不知其中缘由，不过他们就像国家官员出席一个获罪革命者的葬礼似的，这个革命者太伟大了，尽管发生过哗变，还是要视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丹巴宾<sup>1</sup>举止得体，突然变得英俊多了，就像某地俊美的土著人，非常典型，就像波利尼西亚人，他似乎为办公事动身去了波拉考拉。<sup>2</sup>据说，已故的布莱克威是快乐地死去的，临死之前对圣体学院说了几句含糊但充满敌意的话。你不介意这些关于葬礼的细节吧？即便是和人这样密切联系着的事件，在我眼中，也无法克制地缺乏真实性，就像艺术品之类。

顺便问一下，如何判定一个人文化品位很高呢？我只能想到对此极有品位的叙述：（事情与赫尔·科普勒<sup>3</sup>有关，他有一次被[弗兰克·]帕肯汉姆形容成迪克的黑用人，这个德国人也住在仓楼，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属于品位高雅之人，因为提出的所有条件他都符合，而他显然（在所有人看来，除了他自己以外）恰恰是与之相反的。）一个趣味高雅的人熟知（不是通过描述才知道）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那些不可定义的特质，他也可以在自然中 211 找到这些特质。当他发现这些时，不感到兴奋吗？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人把生活中X与Y的关系抽象化，X与Y相对不重要，然后做几何运算，也就是说，使它们扩展，提出问题，正如X之于Y，那么对Z如何？福斯特先生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一切事物定有相似物，这件物品像什么[我记不清了]？”<sup>4</sup>那确乎是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者的问题（也偶尔和论战场所、系列讲演、

1 托马斯·詹姆斯·丹巴宾（1911—1955），1936—1945年任雅典不列颠考古学院院长助理，1937—195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克里特抵抗运动英雄。

2 希腊考古遗址（在科林斯以北），不列颠学院当时在那里进行挖掘。

3 海因兹/亨利·科普勒（1912—1979）最近在莫德林学院读完理学博士，1937年他成为该学院享受半津贴的研究员。后来被英国聘请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

4 “一切事物定有相似物，这件物品像什么？”E.M.福斯特，《我们的娱乐》，3，《玩偶之扑》（1924）：《阿冰格收获》（上文第191页注4）第49页。“这”是指玛丽女王的洋娃娃房子。参看早前引用过的格特鲁德·施泰因的话（上文第181页），“事物就必须和一切有点关系吗？”

分配的角色等有关，它使你我两人成为一流的审美家，对此，无论如何，我感到惬意……虽然如此，省略号总是代表一般文化品位，梅格斯先生<sup>1</sup>就用得很多！感叹号是上层和下层的人用的，或者说这一切全是胡扯？我是这么想的）；顺着我们得到的思路继续探究：唯美主义者往往歪曲事物，因为他们总是把相关或具有细微差别或类似的东西抽象化，以令人惊讶的媒介运作它们；或者偏离事物可能有的样子，例如托尔斯泰，他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其中事件发生在现实生活的条件之下，这是因为他选择以这种方式表现只有他才熟悉的关系，那恰巧成为他的媒介，不过这只是巧合，因此具有一般文化品位的人也喜欢读他的书，是因为它恰好成为合情合理的摄影般的记录，对这一点的模仿，必然导致《好伙伴》<sup>2</sup>的产生，本质上它更像普鲁斯特（你父亲不会同意）。低级趣味的人或是下层人通常只熟悉感官刺激，对别的不感兴趣；品位高雅的人才能清楚了解这些情感、激情等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一般文化品位的人对此根本一窍不通，他们像孩子，只懂得把头的另一侧画成轮廓，因为他们知道那儿有那一半，当然，要做到这点也并不简单。说到法国画家马奈，他们根本就视而不见，却对此浑然不知，因此才会单方宣称（非常错误地），希望人们在作品中“就像在真实生活中”那样活动，换句话说，也就是机械地活动。例如，伍德沃德就是一个文化教养一般的典型例证。他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反对电影，因为电影没有提供信息，而是重复生活，那样过于乏味，当然，如果有新鲜内容，他还是去看。日常生活的干扰和真正有趣的事实、新闻等等，既不是为了真正低品位的人而存在，也不是为了真正高品位的人存在。比如你父亲，他喜欢看到历史上人与人之间和场景与场景之间存在生动别致、充满戏剧性的关系，巴不得它们经常发生，称赞拿破仑<sup>3</sup>是因为他很有风度（我认为这一切确实是对这最后一个品质的夸张赞歌），简直就是极端的高品位。在平庸之辈中享有既得利益的[H.G.]威尔斯并非如此。

1 罗素·梅格斯（1902—1989），古代史学家。1930—1939年任基布尔学院研究员，1939—1970年在巴利奥学院工作。

2 J.B.普利斯特利所著的流浪汉无赖冒险题材的小说（伦敦，1929）。

3 见H.A.L.费希尔，《拿破仑》（伦敦，1912）。

从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引申：冒牌的高品位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知道有一种熟悉但难以确切表达的状态需要去了解，但他们自己从未接触到它们，于是就表现得仿佛很难发现它们一样，因为，假设这些物体不可解释，人没有通灵术就不知道自己是否了解它们，那么人必须根据行为来进行推理，如果这个演绎过程完成得很有技巧（那些旧世界的牛津唯美派），就经得起严格的检验。假冒的一般文化品味者（a）萨姆纳和考克斯，不同程度地意识到真相，但他们压抑了这样的意识，用想象中普通人的不自然语言来说话；（b）鲍恩夫人，一个天生的低级趣味者，用一听就很令人厌烦的语言傲慢地说话，这些话显然是超过她的理解力的。天哪，我似乎总是在结尾说同一件事，真对不起，这封信一半是关于讣告的闲扯，另一半是审美理论，而我本来是打算好好写一封信的。这个学期过得很慢，到处是低谷，很快要选举了，也许是汉普希尔先生上（我希望）（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鲁斯<sup>1</sup>，或者是博蒙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在局外。<sup>2</sup>一旦有什么事发生，我会立刻给你写信。

爱你的

沙耶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6年秋?]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离开摄政公园后，我带着几乎是飘飘然的心情抵达学院。一群人早就

---

1 丹尼斯·阿兰·鲁斯（1912—1991），1931—1935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1935—1936年为女王学院雷明访问学者；1936—1961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40—1948年任职中央情报部。

2 罗伯特·莱斯利·博蒙特（1914—1938），1932—1935年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古典学专业；1937—1938年任圣体学院研究员，古代史导师。阿拉伯人可能是指阿尔伯特·胡拉尼（下文第347页注6）；犹太人也许是指马克斯·贝洛夫（上文第167页注1），当时是莫德林学院享受半额津贴的研究员。

等候着迎接我，他们一定对我兴高采烈的表现<sup>1</sup>大感惊讶，因为那一点不像我的作风。我被问及谁领导了16世纪的哲学复兴。后来听他们说，我当时回答是文艺复兴的那帮人，那帮意大利家伙——难道他们没听说吗？后来，我就患了旷日持久的感冒，到现在也没痊愈。因此我最好明天（星期一）不去听音乐会了。上午我试着打电话告诉你，但那边说你不在，要到晚上回来。本星期这里平静得出奇，部分原因是大雾笼罩，外出走动一下便会感到寒气逼人，无法忍受，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无助，显出貌似真实的善良仁慈。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会变得既善良又愚蠢，既顽固又随和，同时还有点自艾自怜。但也有杰弗里·费伯之类坚定不变的人。我与他进行了三次毫无意义、推心置腹的交谈，内容包括（1）现代诗歌与哲学：极其愚昧。（2）关于性罪犯的处理问题。他眉飞色舞地谈到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3）海沃德先生<sup>2</sup>，令他望而生畏的人物。他极其难得地对海沃德先生进行了异常生动的描述，长达四十秒钟，好比一只紧贴在司机脖子上的猴子。他想到这一点便兴奋无比：他，费伯，一个性格实在、缺乏想象力的健壮小伙（我的夸大其词），居然会如此无拘无束地穿行在这些出类拔萃的名流政要之间，仿佛弗拉德<sup>3</sup>周旋于印象派画家当中。荒唐可笑的是，他就像是一位年轻的老人，因为他老爱问“什么是哲学？”什么是艺术，等等，而我们都乐意给予解释。但是他出于无意的自我戏剧化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足以严肃地警示人们，这么做是多么地轻而易举却又不可救药，它多么迅速地让所有真实感都毁于一旦。它是一种诱惑，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我们，除非一个人事实上占有了某个属于自己的极其简单而且独特的位置，比如像斯蒂芬。要想抵制这种诱惑，需要保持警惕，小心提防，它会让人感到紧张，但回想起成功避免的危险和耻辱，却会给人带来愉悦。当我们遇到他人（比如像你这样的。很抱歉如此不加掩盖地把你归类。但我们在这点上有过共识，认为个性因素无论如何、自始至终都必须避免。因此，它只是一个

1 或许以赛亚·伯林发表了一番讲话。

2 约翰·戴维·海沃德（1905—1965），作家、人类学家、藏书家，患肌肉萎缩疾病。杰弗里·费伯是他伦敦小型沙龙的成员。

3 安布罗斯·弗拉德（1836—1939），艺术商人。

修辞上的搪塞之辞罢了), 这个人要么成功避免了诱惑, 要么做得更好, 有意识地对诱惑持怀疑态度并消灭它, 我们会得到一种美妙的感受。例如, 我很抱歉地列举屠格涅夫《罗亭》<sup>1</sup>中某个坏脾气的人物, 通过“聪明人万岁”的喊叫表达出来。或许只是假象, 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全副武装, 能够抵御各种一般的欺骗, 对冠冕堂皇的诱惑也能抵御一些。我或许因为太胆小或懒散, 没有对诱惑加以抨击, 但只要完全不去逢迎讨好, 甚至连表面敷衍都拒绝, 几乎到打哈欠闹瞌睡的地步, 那么, 似乎也导致诱惑自然蒸发, 这种办法一样有效, 而且留下的伤疤还可能更少。或者这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戏剧化的表现形式, 同样不堪一击? 就像魔鬼最致命的手段, 让人对自身存在产生怀疑? 我不知道。你说得对。我的确是生活在受抑制和不完全受抑制的疯子社会当中, 他们靠各种方式弥补自己: 有时循规蹈矩, 通过学习, 等等; 有时则卑鄙下作, 通过填塞空洞无物的内容或高谈阔论或自以为是, 沉溺于精美细腻的情感之中, 全然没有任何价值。对我个人而言, 214 我真的无法抱怨什么。当戈伦韦大声叫嚷抗议, 说我们的同事全都是些没有理性的禽兽时, 我明白他的意思, 甚至可以看出他的话或许在理。但说实话, 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的话实实在在, 像纯金一样不掺半点虚假。只有出于偶然我才会介入其中, 或者被人蓄意拖入一个事先并未包括我在内的复杂事件中, 那时, 我会像一个惊慌失措的游客, 慌不择路地跑到兵营之类的地方去。(就像匹克威克先生, 一不小心便卷入查塔姆的阅兵仪式。审判官一声令下: “此罪当判死刑”, 不过法庭书记员更正了他的话。他肯定做对了吗?)

爱你的

沙耶

我得写信给菲利普斯夫人, 推迟与她的约会。从内心里, 我并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拖延。

---

<sup>1</sup>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小说, 1856年出版。



##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6年11月/12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星期六我和里斯先生见了大约四分钟的面,他说你整个人很疲倦,上床睡了,又听汉普希尔先生说你准备去日本。<sup>1</sup>我对他们俩所言的权威性并未置疑,但还是希望你无论如何写封信来澄清前面那个传言,它让人十分担心。至于日本,你也许会很喜欢,和勒内·艾耶尔又有了一个新的话题,他善于挖掘发现,胜过任何其他人,就连以潜心研究见长的我也望尘莫及。我与里斯先生和弗斯科伊尔<sup>2</sup>先生的见面时间非常短暂,几乎他们刚到,我就去剑桥了。我住在罗斯柴尔德夫妇<sup>3</sup>那里,和我一样的客人还有一位,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说话时口气冷淡,带着不屑的腔调,这使他说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发牢骚。我甚至觉得他也不是太聪明,只是知道的东西不少,思维清楚。他总是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部《百科全书》(新出的哥伦比亚一卷本),离眼睛大约只有三公分,不时地读出书中内容,有关于疾病的,还有关于小说家欧仁·苏<sup>4</sup>的。我们一到,就去三一学院参加了一个由剑桥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安东尼·布伦特举办的聚会,它着实让人感觉仿佛1931年左右在牛津消亡的生活在剑桥得到了延续:在莱兰兹<sup>5</sup>先生、(雷蒙德·)莫蒂默<sup>6</sup>先生、毕肖普<sup>7</sup>先生(他非常可爱)等欣喜的目光下,一群脸蛋

1 与其夫艾伦·卡梅伦同行,后来他取消了这一计划,令伊丽莎白·鲍恩大为欣喜。

2 德里克·雨果·弗斯科伊尔(1911—1973),1932—1940年任《观察家》文学编辑。

3 (纳撒尼尔·梅耶·)维克托(1910—1990),\*罗斯柴尔德男爵三世,及其第一任太太芭芭拉·朱迪丝·罗斯柴尔德(1911—1989),婚前姓哈钦森。

4 玛丽—约瑟夫·苏(1804—1857)的笔名。她擅长写有关都市堕落生活的煽情小说。

5 乔治·汉弗莱·沃夫斯坦(“达迪”)·莱兰兹(1902—1999),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

6 (查尔斯·)雷蒙德·(贝尔·)莫蒂默(1895—1980),批评家,1935—1947年任《新政治家》文学编辑。

7 赫伯特·弗朗西斯(“阿德里安”)·毕肖普(约为1898—1942),1919—1923年就读于剑桥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同性恋者;在不同国家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多年;一场病后的宗教体验促使

红润、穿着裘皮上衣的年轻人轮番登场。大厅内四处可见与年轻小伙挽手而行的年长美国女士，他们显然无聊至极却摆出十足的骑士风度。赫胥黎先生立刻找人谈起有关尼古拉斯·普桑<sup>1</sup>的高深话题。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潇洒地在我肩上拍了拍，声音很大地说：“别听他的，老兄，别听他胡扯。这就是生活（不怀好意地一瞥），就连现在那种东西也不多见。”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但和怀旧心理又截然不同。我想，莫蒂默先生在赞扬剑桥社交生活时，指的就是这点。总体而言，这个周末过得相当愉快：住房极其舒适，主人虽然对好友和知交粗暴无礼，对我却礼貌有加。美中不足的是赫胥黎先生太过单调乏味。无论跟他说什么事情，他总会有片刻时间毫无反应，在经过吸收、消化、分类、对照等种种程序之后，才能听到他小心翼翼地给你一点迟延缓慢的回应。那么字斟句酌、有气无力地吐出几句，没有丝毫生气和内容。他这样完全不是出于害羞，说到巴利奥学院<sup>2</sup>时，他情绪激动，咬牙切齿，可一样也是那副德行，仿佛要从身边现成的反击话语中慢慢调制出一服灵丹妙药似的，不带任何神秘或不祥的气氛，甚至连语速都不太快，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了无生气。他的谈话虽然见闻广博，内容充实，却永远缺乏趣味，唯一能够在他身上擦出一星半点火花的情绪是厌恶，就像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厌恶自己的太太，巴尔扎克厌恶农民一样。他几乎可以堪称一类中学生的典范：他们聪明过人，不苟言笑，自学成材，却因为充满忌妒心而显得丑陋无比。他们诋毁一切，不是靠计划周密的抨击，而是千篇一律，通过采用软弱无力、毫无色彩的方式对一切进行描述，从而达到令人反感的效果。这么做自然会产生一种过度补偿，表现为主要针对音乐的、极度无病呻吟和柔弱的情调。这一点他也不能幸免。但我

216

---

其成为僧侣；自愿参战，后成为驻埃及和波斯的情报官员；去世前为英国驻巴格达使馆人员；鲍拉的朋友，见鲍拉的《追忆》（伦敦，1966）。

- 1 尼古拉斯·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大部分创作生涯在意大利度过。他的原则是，艺术作品在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还应该启迪心智。这一观点成为其后法国两百多年古典艺术传统的基础。
- 2 1918年奥尔德斯·赫胥黎试着向巴利奥学院打听是否能获得一个职位。他曾经在那里度过了经常郁郁寡欢的本科时光（英语专业，1913—1917）。但校方告诉他，他们在战争期间已经雇用了一位好教师，并希望继续用他。有关赫胥黎的这番描述，比较《个人印象》第191页。

想，他这种对知识的卖弄是他一个极其值得赞扬的品质，而且他很可能是一位善良之人，慷慨、敏感、令人钦佩。但想必严重缺乏同情心。

我发现阿利斯泰尔·巴肯<sup>1</sup>先生令人惊叹。不过我还是将他留到其他时候再细细述说。他让人产生奇特的联想。罗斯柴尔德先生用自己的飞机送我回家，飞行经历妙不可言。整个周末像体验了一回富人的生活，真希望我是一位作家。星期天的晚宴风格杂陈：既像伦敦西区的富人集会，又弥漫着文人聚集的剑桥—布卢姆斯伯里之风；既充满上流社会的浮躁喧闹（诸如“你是想说你闻所未闻吗？你这枯燥无味、令人讨厌的家伙！”），又不乏剑桥科学态度的严谨求实（赫胥黎先生把什么都扯到某人肺部长了某个肿瘤的事上，并且很快就被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大肆渲染，把客人吓得够戗。那里发生的一切均采取了突击战术<sup>2</sup>），而一旦有我加入，则又多了点哲学的成分。我不断地有创作冲动，觉得这些都是一部好小说的绝妙题材。罗斯柴尔德夫妇不是那么和蔼可亲，但他们极其独特，充满个性，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和他们待在一起感觉很好。我喜欢他们的程度，远远超过与人交往的原则。不过珀恩小姐<sup>3</sup>就不同了。人们都说，对恋爱中的人劝说反对是没有用的，无数事实已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这一著名假设出发，我会尽量接受伊内兹。第一步是努力帮助斯蒂芬摆脱尴尬处境，劝她将“伊内兹”改为“阿格尼斯”。她同意了。你会说那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可我们得为斯蒂芬着想。不错，她是一位女冒险家，善于投机取巧，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愿她的野心到此为止，不要没完没了，又转到艾略特先生身上。她是那么冷酷无情，那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但至少也还需要几年。你说她

1 阿利斯泰尔·弗朗西斯·巴肯阁下（1918—1976），约翰·巴肯的第三个儿子；1936—1939年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历史专业；“一位根深蒂固的苏格兰人，具有超人的工作精力以及岩石般刚硬的气节，这点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超过他的学识水平和继承自他父亲的流利的写作能力”（迈克尔·赫华德《英国名人辞典》）。他在读书时成绩平平，但1972年以后成为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

2 伯林此处原文为：par épatage。

3 斯蒂芬·斯彭德的第一任太太，玛丽·阿格尼斯（“伊内兹”）·珀恩（1913—1976），1933—1936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当代语言学专业。她与斯蒂芬·斯彭德于1936年12月15日结婚，1941年离婚；1942年她又嫁给查尔斯·玛吉，查尔斯之前曾与苏格兰诗人凯瑟琳·雷恩结为夫妻。

之所以行为如此恶俗，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你的恐惧。这证明不了什么，因为恐惧而做出的行为是一种绝对肯定的标记，如同微笑。她至少像赫胥黎先生一样单调乏味，缺乏自主性。我会尽我所能对她保持礼貌。甚至我会像过去对待托尼，以及所有和斯蒂芬有过交往、反复无常的其他该死的家伙一样对待她。我可以在海沃德先生走后来你那里待一晚上吗？在7点或7:10打电话合适吗？法兰克福特来电报说，莫里斯在哈佛获得了一份了不起的职位。如果他接受那才真是疯了。不过也可能只是为了抬高身价，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

爱你  
沙耶

致约翰·希尔顿

[1936年12月初，明信片]

全灵学院

亲爱的约翰：

现在我逐个回答以下问题。

无政府主义：有非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的后巴枯宁文学吗？就连对暴力的思考<sup>1</sup>，也更具工团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色彩。克鲁泡特金<sup>2</sup>的小书，文字温和，是纯罗斯金和托尔斯泰风格。普列汉诺夫强烈抨击名为《无政府主义和职能政府论》的小册子。我想如果翻译过来，会脍炙人口，大受欢迎。否则会只有一大帮西班牙读者。

《时代》周刊：是的，合法。但是你应该像我一样从芝加哥购买，上面有关于辛普森太太、坎特伯雷主教、辛普森先生、H.M.等的无数详细报道，给

1 乔治·索雷尔的提法。

2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1842—1921），俄国地理学家、探险家（在沙皇军队服役期间），于1876年逃往欧洲，在那里成为一名革命宣传员和无政府主义理论领袖，写下著作如《互助论：进化因素之一》（1892，1902年出英文版），但他最出名的著作是现已成为经典的《一个革命家的传记》，1899年于波士顿首印英文版。

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愉快体验。《恋爱中的国王》、《君主为美人构筑爱巢》，等等。我写的书就不要了吧，因为想不起你那里有哪些。《卡尔·马克思》明年应该会出版。

在年轻一些的教师和本科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外交政策问题意见一致。但涉及国王爱德华八世退位这件国家大事却各执己见。以下是伯林的回忆：

218 退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埃克塞特学院里，一位研究员朝另一位研究员扔酒杯，因为此人反对国王爱德华八世。大家情绪激动。罗伊·哈罗德对从伦敦到牛津的火车进行了随车调查，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询问，想知道人们在某位主教揭露了辛普森太太<sup>1</sup>的事件后，是支持还是反对国王，结果发现总体来说，大部分还都支持国王。我支持国王应该退位的观点，认为他犯下了大错，因为辛普森太太对纳粹党的支持和同情尽人皆知。<sup>2</sup>

致玛丽·费希尔

[大约在1936年12月17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丽：

我一直都想给你写信，出于各种理由，也为了写信本身。学期末总是忙得令人无法忍受，接踵而至的奖学金评定要不是有克罗斯曼和亨德森<sup>3</sup>（我们一起担任考官）交战不休，简直让人无聊透顶、心情郁闷。情况常常是这

---

1 沃利斯·华菲德·辛普森（1896—1986），欧内斯特·奥尔德里奇·辛普森的美国妻子，辛普森是她的第二任丈夫。1937年6月与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1894—1972）结婚，被封为温莎女公爵。布拉德福的主教，阿尔弗雷德·沃尔特·弗兰克·布朗特博士（1879—1957），在12月1日的演讲上批评了这位国王，使他与辛普森太太的关系首次在英国媒体曝光。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8。

3 理查德·克罗斯曼和H.D.亨德森。

样的：只要三人碰面，他们俩就必定要围绕口试的本质和目的唇枪舌战一番。克罗斯曼说：“我的目的是要尽可能选出最好的人。”亨德森（雄火鸡一样趾高气扬地咯咯回应），“奇怪了，这同样是我的目的。你想不到吧”，等等，然后由我出面调停，平息战火。

首先，请让我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托斯卡尼尼<sup>1</sup>，真是太漂亮了。我把它摆在壁炉台上，希望两者可以交相辉映。这位指挥家的衣领上有个地方令人费解，看不出到底有没有饰扣，搭襟也是。这段时间里，各种大事不可逆转地相继发生，都是些灾难性的事件：

1) 国王爱德华八世<sup>2</sup>退位。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它被看做一个私人事件。但我确定它就是私人事件。我听了他的离职演说，场面激动人心，感人至深。它对个人的意义是标志着二十岁年纪的彻底结束，代表着老一代人的胜利和进入四十岁年纪。这令人深感忧郁。他用自己平庸而又庄严的方式，表示了对魏玛共和国和自由主义的支持，并为自主行为和言论自由等叫好。教会的胜利影响了一个人的私生活，让博厄斯先生获得了名不副实的社会价值，对不值得尊敬的人也予以尊重（佩尔斯—考克斯。这未免令人沮丧，但我很抱歉地说，也令人不无同情）。以下事件加深了这种感觉：

219

2) 身在哈佛大学的莫里斯被聘请担任那里的希腊语教授职位。我出乎意料地收到法兰克福特的一封电报，上面写道“我们这里以优越条件聘请莫里斯，牛津要留住他得出大价钱了。法兰克福特”。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推断是教授职位，但不知是否如此。于是打电话给迈纳斯<sup>3</sup>、韦德—格里和邓得斯，建议四十个人联名请求他不要离开大家。弗兰克尔也表示支持。我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让邓得斯和韦德—格里给他写几封情真意切的挽留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迈纳斯火速赶到我房间，神情关切。随后我又收到法兰克福特夫人令人愉快的来信，信上证实莫里斯正在那里自得其乐，他近来的座右铭是：“美国人的麻烦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觉

1 明信片。

2 于1936年12月11日退位。

3 罗杰·奥布里·巴斯克维尔·迈纳斯（1903—1989），古典学家，1926—1944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

得厌烦。”他还精神振奋地投入总统竞选，通宵达旦守在收音机旁，不时地问：“阿肯色州怎么样了？”“印第安那州还没有消息？”他一定快活死了。我不清楚莫里斯得到什么样的聘请待遇，但我想他如果接受就一定是疯了。他肯定很快就会厌烦，而且美国人也很快就会对他那极端夸张的性格特点耿耿于怀。（三四天之后。）

我从“小宝贝”那里得知你回来了。这使我更加内疚（作为补偿，随信附上一份有关法兰克福夫人的剪报和传真），但却不能阻止我继续讲述。你可能会再次意识到，正如莫里斯说的，不论是眼前还是长远，上帝都遵守事必有三的法则。11月份的第三个打击是斯蒂芬·斯彭德和伊内兹·珀恩小姐订婚。或许你已经听说这个消息。不知我是否应该对此事多费点笔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是在我房间里碰面的。那回我邀请了莱曼小姐一行，考虑到只有她一位女士，正好碰到比彻姆小姐<sup>1</sup>和珀恩小姐代表寡妇那方前来吊唁（布莱克威），我就在铁门口很勉强地把她们两个都请了进来（这点珀恩小姐过后已对斯蒂芬如实相告）。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荒唐可笑的午餐聚会，随之而来的便是客人们琐碎烦人、肤浅低级的情感纠葛和我的文书工作。随后一次见面是斯蒂芬来牛津，他说他220 4:30要去萨莫维尔学院喝茶。我问是和谁呢？他说是伊内兹。接着，鬼使神差地，我突然问道：“你要和她结婚吗？”必须承认，当时他脸刷地通红：“是的，事实上我是这么想，我是说我想和她结婚。”他们两天前结婚了，虽然我没有正式表示反对，但是我没办法让自己去参加婚礼。我认为所有诗人的妻子都令人讨厌，她是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但是她（1）徒有其表；（2）极其无趣，对西班牙所知甚多，却虚假造作，毫无生气；（3）是个尽人皆知的女冒险家。她会满意斯蒂芬的地位吗？（他们声称彼此相爱。这些话什么时候有人相信过？）她会不会为了艾略特先生而抛弃他？伊丽莎白·卡梅伦给我写了一封关于这个女人的信，言辞激烈，说她是一个庸俗的人，吃东西狼吞虎咽，那种贪婪的样子令人恶心；还有，在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天

1 （海伦·）奥黛丽·比彻姆（1915—1989），1934—1937年就读于萨莫维尔学院PPE专业，之后曾与莫里斯·鲍拉订婚。

花板时，一旦有人跟她说话，会很不愿意地回过神来，好像打断了她颇有价值且深奥的冥想，等等。事实上信中写了她种种势利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她很适合做他的妻子，因为要是他和一个粗俗又温柔的人结婚，反而会让人惊骇。应该是像她这样的：粗俗而又强悍，普普通通却又野心勃勃。

这封信写了一半停下，重新提起笔来已经又过去了几天。在这期间，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佩吉，她告诉我（在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后。我想人们那么喜欢见到她至少有一半原因是出于这点：她是那么热情<sup>1</sup>而且诚恳，见到任何一个人人都兴高采烈），杜格尔刚刚获得一个年薪一千英镑的职位，还有私人秘书，等等；有钱的佩吉最令人愉快，她会低声告诉你她购买每样东西付出的昂贵价钱，并且由赫伯特·哈特先生<sup>2</sup>陪同，一起去印度支那或者奥里诺科河（他肯定是我们最有前途的朋友之一，斯帕洛也会赚钱，但那只意味着身上的衣服更加寒酸）；顺便说一下，卡梅伦太太希望取消之前的判断，如今她发觉斯彭德太太非常可爱；此外，《新政治家》的康诺利先生说，希望我们都可以突击攻读一番塞万提斯之前的西班牙文学，至于说去布鲁塞尔读点东西，那完全是扯淡，因为那里的公共图书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报刊新闻总体而言质量不高。总之，我的态度就像纳粹媒体对爱德华八世的态度，矫揉造作，虚假的中立，根本就是拒绝卷入任何事端。我看到拉斯基小姐<sup>3</sup>再也按捺不住，紧随格雷夫斯小姐、珀恩小姐和霍普小姐<sup>4</sup>之后，在《泰晤士报》上宣布了自己的订婚消息。她那可恶的父亲所担任的政府职位<sup>5a</sup>将在非印欧语的报刊上激起强烈抗议。想到会因此带来奇妙而有价值的小道新闻，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现在（这里会产生点贬损的联想）每天晚上都和亨利·路德维格·亨

1 伯林此处原文为：chaleur。

2 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哈特（1907—1992），1926—1929年就读于牛津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2—1940任大法官法庭律师，詹妮弗·威廉斯的未来丈夫。

3 玛甘妮塔·拉斯基（1915—1988），小说家、批评家、新闻记者、广播员；1937年与出版商约翰·埃尔德雷德·霍华德结婚。

4 萨莫维尔学院玛丽·费希爾的同窗，当时都已结婚。

5 (a) 奈维尔·尤纳斯·拉斯基（1890—1969），1930年任英国王室法律顾问，1933—1940年任英国犹太人代表伦敦委员会会长，1935—1956任伯恩利刑事法院法官；(b) 有关亨利·路德维格·亨德森见下文第809页。



德森先生<sup>5b</sup>见面。我俩的口味在餐厅和剧院里完全一致（我们看了《帕内尔》<sup>1</sup>，表演令人反感，却把亨德森感动得稀里哗啦。但我必须准确地为你重现餐厅的场景，知道吗，他居然突然从后面抱住我，嘴里咕哝着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此外，因为我在剑桥待了一个周末，还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灾难性事件。里斯先生（现在就连最亲近的朋友也常这么叫他）搜查了我的房间，发现了一封有关他的信，言辞激烈，于是便开始大惊小怪起来。<sup>2</sup>

不过，还是让我们想想这个周末的愉快之处吧。我去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夫妇，和他们待了两天。奢侈得有点恬不知耻。男仆不停地伺候我，让我心情沉重却又倍感惬意。另一个客人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我很遗憾地说他是个无情趣的人。他正患感冒，透过三英寸厚的眼镜片盯着每样东西看，不停地抽鼻子，吃维他命，一开口说话就是“想到这点真是奇妙又稀奇”或者“这是多么不同寻常啊”，而其实稀松平常。在这点上，他很像伍德沃德，在其他方面也像：完全是受伤者的形象，急于敞开心扉供他人考察，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答应会尊重他们，决不让他们烦恼。他希望发现人类行为的精确机制，甚至连朋友也不放过，不断问些科学问题，使屋里完全失去怡然自在的氛围。他是一个非常善良、敏感、温和又仁慈的人。但我不得不充满遗憾地重申，他实在是个毫无生气而又令人厌烦的人。不能说无聊透顶，但的确够戾。当我抱怨经由布莱奇利回牛津很困难时，主人问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以为他是指为什么不坐地铁之类。早上起床时，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已经去自己的实验室了，罗斯柴尔德太太还在睡觉。和我一起吃早饭的是一位弗尼夏·蒙塔古<sup>3</sup>太太（已故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的夫人，是位端庄、智慧的女士，令人敬畏。据说她的交际才能相当出众，而且十分机敏有趣，不过就是会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她有两条忠

1 埃尔希·T.夏弗勒的一出戏剧，内容有关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曾任英国议会中自治党的领袖。

2 1936年9月23日伊丽莎白·鲍恩写给以赛亚·伯林的信，信中详细描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家庭聚会上发生的事情，提到了里斯“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

3（贝阿特丽丝·）弗尼夏·斯坦利（1887—1948），于1915年结婚，令深爱她的首相H.H.阿斯奎斯大为伤心。她的丈夫埃德温·塞缪尔·蒙塔古（1879—1924）是自由党政治活动家韦思林男爵一世的儿子，在1917—1922年任印度国务卿期间，为印度实现宪法改革起到了很大作用。

犬和三架飞机，由一位出色的年轻人<sup>1</sup>驾驶，他们曾一起到过波斯和西藏等地），她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时，男管家走过来说车已经备好，我可以随时出行。我的难题似乎解决了。（这个故事可以按照史密斯—考克斯的方式展开来：有谁知道他们中的哪位首先采用了无限弹性的方法？或是预定和谐论？）我钻进车子，却被送到了飞机场。说实话，我非常非常害怕。有两种飞机供我选择，一种是有顶盖的，另一种没有。我选择了第一种。上了飞机，我又坐错了位子。费了好大劲才把我移到合适的位子。机上飞行员看上去和其他飞行员一个模样，都很英俊，修剪整洁的小胡子，极其好听的嗓音，非常帅气。我们飞越了贝德福德郡的众多乡村别墅，其中有些这位飞行员曾经待过或运送过客人到那里，总之，他问我是否到过那里，并说那些别墅一定非常舒适，因为就连像他主人那么顽固的老家伙都喜欢那里，等等。之后我们到达斯坦顿圣约翰，着陆时差点撞到树木或房子。下了飞机，城市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sup>2</sup>已经等在那里。我和飞行员握手道别，出租车司机上前问：“先生，您要去哪儿？”眼前景象很不真实，但是你看，事实确实如此。我在晚上12:10离开了剑桥，12:55就到了全灵学院。我强烈推荐这种旅行方式，从空中俯看，整个国家非常美丽，在变化极为缓慢、图案整齐的混合体（如街道、树木和汽车道等等）上空停留的感觉十分特别。不过我的耳咽管因为乘飞机出现了一些紊乱，耳朵先是听到隐约的喃喃声，接着变成持续的嗡嗡声，随后声音越来越大，让我觉得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无法协调。有关感官数据的实地考察工作（向普莱斯汇报我的所见所闻）并不足以酬劳受难的耳朵，最后还是靠麦克白医生<sup>3</sup>给我的鼓膜充气，我的耳朵才恢复过来。真是太怪异了。请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告诉他们我非常喜欢11月份的那次晚餐：品种丰富，式样美观，无时无刻不令人感到愉快舒适。务必来信。

---

1 一位叫鲁珀特·贝尔维尔（1905—1962）的年轻人，莱斯特郡帕皮隆·霍尔的继承人，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弗朗哥将军而战。

2 伯林此处原文为：Citax，由city（城市）和tax（出租汽车）两个单词构成。

3 可能指罗纳德·格莱美·麦克白（1903—1992），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牛津大学耳科医生。

我可能1月份会去巴黎。

你的  
沙耶

另外简单再说两点：

您母亲离得那么远真是太棒了；关于赛一家的突然亲近，我和你的观点一致；

223 [贝蒂·]罗素小姐如今被盖伊视为讨厌的人，她带来了许多麻烦。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6年？，两张明信片]

[全灵学院？]

讨厌以赛亚。<sup>1</sup>

亲爱的谢拉：

(以下各点按轻重缓急排列。)

1. 能否找个时间把参考休谟著作的确切出处告诉我，摘要和页码，因为我准备为你也为我自己仔细看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2. 你能不能向戈伦韦重申(用潘柏院长<sup>2</sup>铿锵有力的话语)，斯蒂芬有点觉得被骗去了一个周末，或许可以趁他在开学初来阿普尔顿<sup>3</sup>之际做点补救工作？

3. 一旦戈伦韦提出欠我一封信的问题，那么，如果他没有(他没有理由这样)丢失或销毁那封从我这里收到而导致所谓欠债的信，我想你最好不要去读它。所谓最好，我只是说如果知道你读了那信，我会极为尴尬；我并

---

1 可能指两张明信片后的图片。上面是斯里兰卡的彩绘木头面具，“驱魔舞者”戴着它治疗盲人或病人。

2 弗朗西斯·潘柏(上文第187页注5)；大概是以赛亚·伯林希望戈伦韦·里斯邀请斯蒂芬·斯彭德来全灵学院。

3 牛津西面的一个村庄。

不想收回里面写的任何内容，并重申它是一封我本人也很乐意收到的信，但还是恳求你不要去读它（毕竟，你不像我们这帮人一样那么爱打听别人隐私）（虽然你读了或没读实际上完全无关紧要，即便对我也是如此）。不过还是请你相信，为这封信我得到的回报极为不公，也远远不足。我得承认，一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受伤的感觉是多么奢侈的享受。顺便说一句，我坚持认为，我不仅感觉受了伤，而且确实受了伤害，不是作为观察者或外人，而是作为被观察的对象，作为内在或真实的自我。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想重新打造我。

最后，第四，请你将这张空白支票转交戈伦韦。

这样没完没了地让你传递消息，我深感抱歉。盼望能有机会选择一场真正重要的音乐会，花上半天时间，好好跟你解释一番它为何将对你产生如此独特奇妙的功效。在电话里，道格拉斯的笑声极其好听，被艾丽卡或《一点一点的艾力克》故事<sup>1</sup>逗的。祝开心。

爱你的

沙耶

224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7年1月中旬?]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你什么时候过来吃饭？这学期因为莫里斯不在，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工作，课也多了许多，我个人觉得蛮好的。事实上，必须承认，莫里斯不在，晚上得加班干很多事。但是，尽管有博厄斯先生（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比他更希望莫里斯留在美国），想让莫里斯回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让那

1 艾丽卡·克罗斯曼为理查德·克罗斯曼的第一任妻子（但他在《名人词典》的自我简介中没有提及），“艾丽卡”之称通常被作为笑话。由F.W.法拉尔所写的《一点一点的艾力克》（1858）是一本流行儿童书，故事中艾力克“一点一点地”逐渐变坏。

些对此事[感到]高兴的人快乐。<sup>1</sup>博厄斯表现强烈,戈伦韦表现公开,他的同事则表现一般。弗雷迪(很奇怪,没有公开承认,但却是实情。莫里斯的存在隐隐约约地有些令人不安)。还有隆登先生<sup>2</sup>和斯帕洛(态度十分隐秘)。因此你看,真让人受不了。罗伊给他写了封信,一定写得很好。你还记得那封信吗,关于莫里斯获得钦定讲席教授一职的信?他在信中称,“作为学者和才子,如今你的名望已如日中天”。还有其他挽留的话,如当不当教授实际并不重要,写到在瓦德汉姆学院的生活之美(还引用了戴维·塞西尔的话),写到重要的不是莫里斯出书或是有关那些书的评论,而是他对叶芝的见解,还有他对瓦雷里<sup>3</sup>的评论文字。总之,那封信诚挚感人,充满朋友真情。昨晚我遇见了老J.A.斯彭德<sup>4</sup>。根据斯蒂芬的叙述,别人会以为他叔叔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怪物,愚不可及、恃强欺弱、极端反动。见了面才发现,他的确十分愚蠢,但相当可爱,极为绅士,满肚子有关德国皇帝的搞笑故事,本质上极其友善而且很有教养。我相信,自己这辈的人到了他那个年纪,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如此远离痛苦,远离怨恨,乐天快活,慈祥可亲,同时按良心处世,一丝不苟,诚实坦率,令人为之感动。他的见解让人敬畏,而有关斯蒂芬的趣事又十分可笑。“斯蒂芬是个好孩子,好孩子。问题是他那些朋友,老是怂恿他干一些与他真诚善良、无忧无虑的个性背道而驰的事。我知道是奥登先生。无时不刻,无孔不入。这个奥登。就是他,我敢保证,就是他让斯蒂芬写什么烂牙之类的东西。我相信斯蒂芬自己根本想都想不到那些东西。”可是到头来,每次我一张口,他就会冲着我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哈罗德太太的那种表情——“你说帕特爱上的那个女人与斯温伯恩和梅瑞狄斯也打得火热”<sup>5</sup>,还说了其

1 这句话的实际意思为“想要他回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挫败)那些(对他留在那儿)感到高兴的人的快乐”。

2 罗伯特(“波比”)·佩顿·隆登(1903—1940),1929—1940年为基督教堂学院研究学者,1937—1940年为惠灵顿学院教师(在德国空袭学校时遇难)。

3 (安布罗斯)·保罗(—杜桑—儒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诗人和散文家。

4 (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彭德(1862—1942),新闻记者、作家,1896—1922年任《威斯敏斯特公报》编辑,斯蒂芬·斯彭德的叔叔。

5 未找到出处。

他。唯独没提自己在1908年的时候相当知名)。他的话听起来是那么哀婉可怜,还有点卑鄙下作。真是一位非常卑微的旧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你准备为麦考利小姐<sup>1</sup>和康诺利先生写关于宠物的谬误故事吗?我极其荣幸地发现自己拥有这样的朋友,但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什么艾略特先生没有包括进来?他会非常乐意的。还有约翰·海沃德。塔楼中的少年们<sup>2</sup>被排除在外倒是再正确不过。

你很快会到牛津来吗?下个星期就来,好吗?只要你方便,哪一天都行。希望你一切都好。今天上午我给你挂了电话,他们说你出门了,不知哪天回来。我想你的手术应该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后果。方便时,请尽快来。

你的  
沙耶

还有:听说你认识布里斯<sup>3</sup>先生,不知是否方便麻烦你问他一下,能否找个时间,过来给这里的本科生和老师们开个音乐讲座,看他喜欢,谈什么都行。这儿似乎没有人认识他,而我又负责一个类似音乐佛罗伦萨社团<sup>4</sup>的工作。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7年1月下旬]<sup>5</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请于星期二过来共进午餐。就你我两人,没请别人。但为了让你去除可能产生的犯罪感,或因此而希望早早离开,或许我会请博厄斯先生和汉

1 (艾米丽·)罗斯·麦考利(1881—1958),多产小说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历史学家、旅行作家。这里提到的写作工程最后似乎无果而终。

2 上文第214页注2。

3 阿瑟·爱德华·德拉蒙德·布里斯(1891—1975),作曲家,后(1953年)担任女王音乐学院教师。

4 一个名为佛罗伦萨俱乐部的沙龙。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90。

5 伊丽莎白·鲍恩的回信提到2月1日为“下个星期一”。

普希尔先生一起来喝茶。这样安排怎么样？假如你觉得有何不妥，请一定告知，否则我会邀请他们。我欠他们一份人情，不过你完全有理由抗议，不应该把你当作回报的手段。这些话深受斯帕洛—全灵学院式俏皮风格的影响，我必须尽力避免。说到讲话缺少机智，我想到了阿瑟·C-M。我会买他<sup>1</sup>和汉弗莱的书<sup>2</sup>，并打算给他们俩写信祝贺。我同意你的意见，确实有必要加以美化（我克制不住地讨厌这个词，它使波希米亚派和市俗之人大行其道，对扼杀浪漫主义的福楼拜也是，我很赞同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波希米亚派和市俗之人都是中产阶级思想的庸俗化体现），但强烈反对注入苛刻或做作的评判（即你所说的胡说八道型），同时也反对评论时任意释放作者情感，想当然地认可某种情真意切但却俗不可耐的自我表现方式，完全没有自我、夸大其词地由衷展示根深蒂固的肤浅特质。对这些，我甚至在生理上都会觉得不舒服。例如阿瑟的前几本书。但我还是会读这本以及《死点》。<sup>3</sup>星期二我们可以聊聊罗斯·麦考利的小说——我觉得它可能不太行，个别地方甚至很虚假，缺乏真实感。结果就像你说的，显出在个人品行和专业知识上的浮躁和虚荣，等等。我不知该怎么办。我这就准备去图书馆，读读T.布朗爵士<sup>4</sup>的书，我知道自己读完后会拒绝。

“希望你不要称我为Hants”<sup>5</sup>，瞪羚羊语气坚决地对我们爱随便开玩笑的麦克格雷格<sup>6</sup>教授说。他坚决认为，他人不应有强烈的情感；宇宙不应该跨越性地迅速转动；人们不应该持续不断地从一个模式跳跃至另一个模式而不留下任何碎片。他本人就极力回避戈伦韦粗俗的表述，并且对纸上游戏有一种孩子般神经质的恐惧。我经常因为讨厌变革，并且努力维护

1 阿瑟·卡尔德—马歇尔，《空头支票》（伦敦，1937年1月）。

2 汉弗莱·豪斯版的《吉拉德·曼雷·霍普金斯的笔记和论文》（伦敦，1937年1月）。

3 阿瑟·卡尔德—马歇尔，《死点》（伦敦，1935）。

4 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5），医生、作家，创作了《一个医生的信仰》（伦敦，1643）和《低级错误及众所公认的真理》（伦敦，1646）。

5 Hants为英国汉普希尔郡的邮编标准缩写。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另一个绰号的来由是因为他身材瘦小，动作优雅。

6 戴维·哈钦森·麦克格雷格（1877—1953），政治经济学德拉蒙德讲席教授，1922—194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和仔细修复人生中重大事件的古老要旨而遭人挖苦，却发现这种攻击充满高尚的精神，十分令人愉快。他们给我长者的感觉，那种既像老师，又像伯父，又像保姆，又像艾略特的仁慈之情也非常有趣。的确感觉非常非常之好。也许世上确实存在过度缺乏自怜这种东西，与正常方向相反。我相信自己正处于这一反常心态。不敢肯定你就没有这种心态。

爱你的  
沙耶

我还会跟你讲格雷夫斯小姐的婚礼<sup>1</sup>，以及弗斯科伊尔先生和德·贝尤<sup>2</sup>小姐的事。

227

致H.A.L.费希尔

新学院院长

1937年2月1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院长先生：

我谨为您获得功绩勋章<sup>3</sup>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勋章本身的高贵内涵不言而喻，而您赋予这枚勋章的特殊荣耀更是大于您可能从它那里获得的荣耀。长久以来，您获得这枚勋章的资格不言自明，我们学院的同事和我经常谈到这枚勋章的颁发是多么恰当，因为现在您拥有了它，人们才体会到价值和存在（请原谅我使用了自己的专业用语）之间的均衡，而不是将其视为世界上发生的一桩崭新而非凡的事件。我十分怀疑，所有那些无论多么真诚地表现出尊敬的人群，是否能够使您明了自己在师生们，尤其是那些能

1 她嫁给了理查德·奇尔弗。

2 可能指戈伦韦·里斯从前的情妇帕米拉·德·贝尤（上文第207页注3）。

3 功绩勋章，君主的个人赠予，成员仅限24人，1902年由爱德华七世设立，它“授予为王室服务性事业或是对艺术、学术、文学和科学及其他我所了解到的特殊领域的发展，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士”。伯林本人于1971年被女王授予功绩勋章。



够见到您并和您交谈的师生们心目中所占据的绝无仅有的地位。牛津是一个非常严密、自给自足的体系，拥有一套个人的、有时候不真实和有悖常情的象征和价值观系统，总是与外界格格不入，我不能想象，在本世纪，还有谁，还有哪个人，能够使这个镇上的所有居民产生如此无条件的、坦率的崇拜。我本可以仅代表自己说这番话，但是我深信在私人问题上以集体名义发言的好处，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的您也许不会赞成这一点。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费希尔档案74号文件，第82页

228 在患上流感引起的并发症后，伯林在疗养院调养了一个月。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三 [1937年3月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四个星期的慵懒一点都不会令人不适。最初的恐惧之后，我发现雪白的墙壁、爱尔兰护士以及无限的闲暇几乎是怡人的，我感到非常宁静和极端坚韧，处于某种绝对的休息之中。我知道自己的状况不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不想见任何人，回忆起以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也不感到痛苦，意识到自己几乎可能正处于伍尔夫太太的状态，一切都极其明晰、戏剧性地发生，不过这只是在—层薄壳之下发生，不是玻璃壳，而是冰壳，这层薄壳吸收所有原始的品质，只允许一切以图式化的、然而却非常充实和生动的形式出现。这种状态对我来说的确非同寻常，我是一个现挣现吃的人，目前的状况太让我喜欢了，这种状态的延续像是天堂。我怀着有意识的、一本正经的平静心情，缓慢地读书，每天和我的两三个访客愉快而琐碎地交谈。你送来鲜花，我很感激，它们完成了病房戏的演出场景，使一切

都很有气派、很完美。真的很好。慢慢地读书，清楚地理解每一个字，海纳百川，无懈可击，因为从科学观察者的层面来看，这是最舒适的状态。失去它，我很遗憾。我现在过着严格控制的、疑心自己有病其实又没病的生活，更早起，更早睡。下个月，我想去意大利，或者任何有炎热太阳的地方。我一时养成了弗雷迪那样的热带习性，一冷就感到痛苦，如果你想象一下，对我而言，这可是和以往很不一样的状态。

莫里斯非常快活，简直就决定不回来了。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写信跟我说，莫里斯将会得到耐心的、敬仰他的听众来听他的故事，在他面前美国没有受到贬低，他将会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此外，总而言之，等等，也许他们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适宜。显然他会留下来，我很高兴。我试图劝他也请罗杰·森豪斯留下来，他不肯。他同意森豪斯是个很不错的人，但又说他不能容忍客人，因为他们四处闲逛。博厄斯先生对莫里斯想留下来的愿望感到不悦，莫里斯回应说，博厄斯先生喜欢所有人，不过他喜欢其中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多些。斯蒂芬公开放弃他书中的观点<sup>1</sup>并加入共产党，这使我感到害怕和不安，一部分是由于感到自己受到轻视而被激怒，因为我的口才都白费了（你记得，午餐的时候）。<sup>2</sup>我认为这都是因为托尼，因为感情用事，所以这必定导致令人难堪的愚蠢之举。我收到他从布港<sup>3</sup>寄来的最热情洋溢的明信片，像以往一样，我会打击他的热情；我认为他收入多布雷的汇编<sup>4</sup>中的关于济慈和雪莱的文章非常好，约翰·海沃德关于斯威夫特的虚弱身体<sup>5</sup>的描述极其令人感动，斯帕洛所写的关于曼斯菲尔德勋爵<sup>6</sup>的自

229

1 在他的《从自由主义前进》（伦敦，1937）一书中，斯彭德认为，对季诺维耶夫和其他托派分子的所谓公审和处决（1936年8月）表明，需要在苏联以民主宪法的形式实现自由主义，允许批判苏联政府。不久，哈利·波利特，英国的共产党领袖，劝服斯彭德，让他相信那些被处决者有叛国行为。斯彭德2月16日加入共产党，2月19日在《每日工人报》上发文，收回他在书中表述的自由主义观点（斯蒂芬·斯彭德，“我加入……共产党”[省略号部分究竟是什么意思？]《每日工人报》，1937年2月19日，第4版）。

2 也许是指伯林“下跪”恳求斯彭德不要加入共产党（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录音之9）。

3 在西班牙东北海岸，离法国边境不远。

4 斯蒂芬·斯彭德，《济慈与雪莱（1795—1821：1792—1822）》，伯纳米·多布雷（编辑），《从安妮到维多利亚：多位作者文章汇编》（伦敦等，1937），第574—587页。

5 约翰·海沃德，《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同上，第29—40页。

6 约翰·斯帕洛，《曼斯菲尔德勋爵（1705—1793）》，同上，第252—264页。

传体和喜剧式的文章也是如此，但是艾略特关于拜伦<sup>1</sup>的文章——他被当成一个有着难看面孔的苏格兰宗教诗人来看待——有过度臃肿的倾向，非常棒，非常出人意料。你读过吗？很聪明的一篇文章，体现出他有多么好的脾气。

沃尔波尔先生今晚要对一个反残酷协会讲演，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件事如此滑稽。<sup>2</sup>

尽管汉普希尔是瞪羚羊，我还是得出结论，他是吸血鬼。我每次和他谈话之后都觉得自己流失了一点血液。而他的脸色就说明他是从某处汲取了鲜血。很抱歉我明天不能来，据说旅行对我是致命的。

爱你的

沙耶

接着，伯林陪同他的父母去意大利度假。

致玛丽·费希尔（在罗马）

星期五 [1937年4月9日，明信片]

威尼斯，达涅利酒店

230 你的来信给了我莫大的快乐。<sup>3</sup>我难以表达自己对罗马的热爱之情，四周群山不可抗拒的向心作用造就了它的和谐，它是唯一一座使我产生虽不高尚却很强烈的文学上的惊叹感情的城市。这绝非一座可以忽视的城市。我刚刚才读了《阿斯本文稿》<sup>4</sup>，被这里的一切所感动。我希望我能有一本恰逢其时的书，书中有人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和有说服力的事实，夫

1 T.S.艾略特，《拜伦（1788—1824）》，《从安妮到维多利亚》，第601—619页。

2 休·沃尔波尔，废除残酷运动国家团体副主席，在3月3日晚卡法克斯礼堂对反残酷运动牛津大学联合会演讲。

3 玛丽·费希尔3月29日的来信描述了她对罗马的美好印象，她的这次旅行使用的是萨莫维尔学院提供的奖学金，名义上是为了研究罗马历史。

4 亨利·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说《阿斯本文稿》（1888）的背景在威尼斯。

人，这一点不常有人注意到，有的人能够让别的地方更吸引人或者更令人惧怕”，等等。“是的，的确。”她说，然后又说了一次，“是的，的确。”你读过《流年》<sup>1</sup>吗？我在云一样的物质间飘荡，发现为《亚里士多德学会公报》写一篇关于归纳的论文可真难。<sup>2</sup>

沙耶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在布拉格）

1937年5月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谢拉：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会立即回复，如果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去普拉哈[布拉格]。但是没有，我恪尽职守，陪着父母去梅拉诺，中欧布尔乔亚朝圣的中心之一。我完全被马里昂巴德—梅拉诺的城镇迷住了。无论如何，你知道，我喜欢一切战前的东西，荷兰、爱尔兰等。然后，我去了维琴察，那里就是天堂。你知道我实际上没有什么眼力，而且也不把时间花在看风景上面，然而帕多瓦或是维罗纳是那么华丽宏伟，到处是美丽的、令人难忘的、极其古老的、非常有文学色彩的、非常迷人的建筑和街道，不过人不能因为这样的理由就住在那儿。而维琴察就是纯文艺复兴风格的了，到处是绿叶，四周环绕着长着树木的小山，欢快的帕拉迪奥建筑，连续不断的、没有压迫感的、不会导致幽闭恐怖症的拱廊，还有一座饰有远景油画的文艺复兴剧院，我无法跟你说它有多美。我应该从中国来，去听听蒙特威尔第在那里歌唱。抱歉，我所说的这一切听起来像是鉴赏家的语气，但这表达了我真实的感受。然后我去了威尼斯，但如果住在维琴察是很棒的，我也不反对死在那儿，尤其是死亡本身已经没有思想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

231

1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流年》，1937年出版。

2 这篇论文（上文第191页注3）在7月10日星期六早上寄到布里斯托大学。

思，不是生命中的一个小事件。<sup>1</sup>威尼斯很邪恶，如果真有上帝，那么它就一定会被毁灭（我真的要道歉，整个这封信现在已经开始变成有点荒诞的书信体了）。

这里是如此美丽，如此与世隔绝，强烈的幽闭恐怖困扰着人，使人想逃避许多事。而在另一方面，我开始对图画有了真正的感觉——我不记得你有没有这些画。人们往往不太讨论它们，我准备好讨论了。你读过《阿斯本文稿》吗？在威尼斯读这本书是一次最直接的文学体验，还有就是《前夜》<sup>2</sup>。然而，愉快和愚蠢的事就是登上一艘刚朵拉，穿行在一条很肮脏的运河上，意识到这就像一本二流小说，然后突然听到从一座不太美丽的大厦窗户里传来肖邦的乐曲，于是意识到这是一部多愁善感而且滑稽的电影中的场景：说实在话，这是很迷人的感受。米兰的歌剧院是无法描述的司汤达式的华丽场景，首先它有六层包厢；其次，包厢里面坐满了身着华丽礼服的市民，以及比我所见过的衣着还要更大胆更美丽的女人；第三，正厅前座区坐满了人，如果你从楼上往下看，那些雪白的衬衫前胸就像水波一样闪闪发光，包厢里的幽暗灯光营造出19世纪初最奢华的歌剧效果。唱的还是多尼采蒂的歌曲。我还完成了为亚里士多德学会写的论文，很有成就感。我希望你在那里，那是如此宏大的场景，你不仅会喜欢它，也会喜欢谈论它。歌剧名为《爱的万灵药》<sup>3</sup>，很赏心悦目。我希望，我真的希望能够对你说这一切，使用语调和手势，而不是使用形容词。在一段冷淡期之后，我们在伯克利广场的某个地方一起喝茶，我对你的感情重新被唤起，而后你的来信又使它更加强烈，现在它就像汹涌的潮水。<sup>4</sup>我很遗憾你在伦敦逗留两天时或是别的什么时候我没有见到你。后来，有人在亚当和我之间挑拨，

1 参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伦敦，1922），6.4311命题“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一个小事件”。

2 屠格涅夫的小说（1860）。

3 伯林此处原文为：Elisir d' Amore。

4 伯林和谢拉·格兰特·达夫的关系似乎经历了一系列的冷淡期和协调期。在对伯林这封信的回复（5月11日，布拉格）中，她写道：“我担心你对我的感情总是像潮汐，在这个国家时，它巨大的退潮从未因为另一次巨大的涨潮而得到弥补和平衡。也许这次涨潮是巨大的。”“巨大的退潮”也许指的是他们在1933年9月初同游外喀尔巴阡地区的鲁塞尼亚，关于那次旅行，达夫写了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在你面前，我会永远表现得美丽，并努力记住你在日利纳说的话。”

我不知道是谁，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件事上了，度过了深受折磨的几个星期后，我又发现了你的来信（但是道格拉斯说地址无效），河水又涨了起来，此时河水正没过河堤。

我去参加了简·兰德<sup>1</sup>举行的派对，每个认识的人都适时出现了，甚至 232  
你的母亲和兄弟也来了，还有佩吉等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何，但是整件事似乎极不自然，就像对过去情景画的一张友善的讽刺漫画：一点也不纠缠，非常和谐，但隐约有点傻。另一方面，有些人物，例如斯蒂芬·戈伦韦，还有，我想是莫里斯，依然可敬，不喜欢约会。克里斯托弗走了，目前不再和我们在一起。据说，他烦了。你能相信吗？我坚持认为，他将经历一次可怕的冲突，然后在夏天恋旧地回来。关于克罗斯曼的绯闻，人们大惊小怪了一场。在贝克太太<sup>2</sup>的离婚案中，他有没有作为共同被告而被传唤？有人说没有，但是皮尔金顿<sup>3</sup>发誓说他看见报纸上这么说了，亚瑟·索尔特爵士不太确定他没见到。院长<sup>4</sup>把他从政界赶走了吗？或者其实他只是辞职了？没有人知道。目前，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丑闻，不过人们对它不像以前那样怀着狂热的兴趣了。我还没有读戈伦韦的小说<sup>5</sup>，他受到不温不火的欢迎，我会读它，而且相信自己一定会感动，因为只要当我认识一个人时，我就会听到他的声音。你的生活是一个深邃的谜：你做什么？你认识谁？在世界顶端（这不是一个俗词？）你的价值几何？人什么时候才见到你？我会高兴地在7月末或者8月末去布拉格，那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不要考虑这件事了。同时，我想见你。你是否能再给我写封信？上一封太短。还有，你知道连续性本身就是我的目的。请写信。

你冬天在雪中会见道格拉斯，经他叙述，成了一段纯粹的杰伊浪漫故

- 
- 1 简·兰德（1912—1991），1931—1935年就读于玛格丽特夫人学院PPE专业，曾任圣保罗女子学校班长。
  - 2 伊内兹（“伊内兹塔”/“兹塔”）·希尔塔·贝克（1900—1952），1923年起为约翰·兰达尔·贝克（1900—1984）的妻子，1918—1921年就读于新学院动物学专业，自1932年起为大学教师，1937年任大学动物学和解剖学示教讲师和讲师。克罗斯曼1937年12月18日和兹塔·贝克结婚。
  - 3 阿诺德·皮尔金顿（在新学院和克罗斯曼在一起），也许是他的父亲。
  - 4 H.A.L.费希尔当时敦促克罗斯曼进入政界。克罗斯曼确实辞去了他的研究员职位，使学院管理层免于陷入不得不决定对离婚案做出何种反应的尴尬境地。
  - 5 《分隔他们的桥梁》（伦敦，1937）。

事。我想我应该结婚。

爱你的  
沙耶

233 此时，伯林每日和J.L.奥斯汀的哲学讨论渐渐演变成了规模更大的论坛。奥斯汀和伯林邀请了弗雷迪·艾耶尔、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唐纳德·麦金农<sup>1</sup>、唐纳德·麦克纳伯<sup>2</sup>以及安东尼·伍兹雷参加他们的活动。1937—1939年，他们每周四晚在伯林的房间聚会，这个团体的“普通语言”方式成为“牛津哲学”的典型特点。他们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奥斯汀和艾耶尔相对立的观点，就哲学而言，他们两人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促成了动态的思想交流。“[他]们总是处于几乎是不断冲撞的状态中，艾耶尔像一枚不可抵御的导弹，奥斯汀就像不可动摇的障碍物”。据伯林说，这形成了“我所知道的最有趣、最自由、最活跃的哲学讨论”。<sup>3</sup>

致阿尔弗雷德·齐门<sup>4</sup>

[约1937年6月10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齐门：

关于星期天早上召开的PPE专业会议<sup>5</sup>，以及你邀请大家写写自己的想

- 
- 1 唐纳德·麦肯兹·麦金农（1913—1994），1937—1947年任基布尔学院研究员与哲学导师，1942—1945年任牛津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军官候补生哲学特殊课程主任，1945—1947年任巴利奥学院哲学讲师。
  - 2 唐纳德·乔治·塞西尔·麦克纳伯（1905—1991），哲学家，1935—1969年任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
  - 3 《个人印象》第2版，第144页。
  - 4 阿尔弗雷德（·埃克哈特）·齐门爵士（1879—1957），1898—1902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04—1909年任古代史研究员与讲师，1930—1944年任（首位）国际关系学蒙太古·伯顿讲席教授，自1931年起任新学院编外研究员。
  - 5 1937年6月13日。

法一事,我想列出一些建议提纲,也许对讨论有利。

我的观点是——我不知道哲学系的同事对此观点有几分赞同——目前,PPE学科负荷过重,它达到的统一性常常很不自然,并因此放弃了它本该致力于实现的目的,即促进知识的积累与提高清晰思维的能力。这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实际上,没人可以把精力全部奉献给这三门科目,并希望在这三个领域都表现优秀,然而,这三门科目却都是重点。结果,本科生惯常的做法是忽略其中一门,这种做法没有哪个导师可以控制得了,因为他还不至于要求他的学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这种情况使得整个学科建立在了悲观的基础之上,因为它在个例方面的成功是以系统性地破坏一门或者其他两门科目为必要条件的。如果这些前提[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是这种局面只能通过减少科目而得到纠正。最自然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允许学生们在三门科目中选择两门,任何两门都行。这样的提议也许会遭到反对, 234 我想这样的反对并非全无道理,那就是认为当本科生上大学时,并不知道他们擅长其中的哪两门;而且只有三门都学过才知道。针对这一点,我提议如下方案:

1. 在第三或者更好是第四学期(为了不损失第一次长假),即PPE专业学习的中期,对现有的三门科目采用中级选拔考试的办法。选拔分三个等级:一等、二等以及及格。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力求上进和勤勉用功。我想,具体细节问题不需要太麻烦就能够解决。

2. 第二阶段的学习仅有两门科目,任何两门科目组合均可;<sup>1</sup>在我看来,就优先性而言,政治更容易和哲学或经济学组合,而经济学与哲学的组合就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在这点上我很可能是错的。

3. 语言,我认为是这个学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懂除英语之外的至少两种语言,没有人可以毕业,因此语言课程应该被包括在学科的第一学习阶段之内,以规定的德语或法语教材授课。现行的当场翻译测试

---

1 PPE专业双科荣誉专业自1970年10月起实行,1971年进行了第一次考试。见1969年《牛津大学公报》第91页理事会周会(负责牛津大学学术政策的制定)有关条例中篇幅较长的注释文字。



可以取消，这个做法实在没什么可取的。

4. 学生免去了其中一门课的学习之后，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学习所选的两门课，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这看来是不错的。似乎人们通常认为，学习PPE专业的学生的哲学水平要低于学习人文学的学生。对二者不对称状态[的]改变也许能够弥补这一点。

5. 尽管学生们可以在三年学习后获得优秀生荣誉学位，我认为，应该允许想要进行专门学习的毕业生获得专门学习的机会，做法是类似于BCL<sup>1</sup>专业，让他们只学习一门课程。对于任何想在某一科目学到专门知识的人而言，三年时间并不真正足够，如果提供第四年的课程，并颁发专门学位，就会吸引那些现今为了获得文学士而在犹豫中写论文的学生。一个管理有序、带研究性质的学科对他们来说会好得多，在某些领域，例如哲学，这会吸引那些学过人文学的学生，同样还有PPE的学生。最后这项计划，尽管也适用于其余方案，就其对形成日益专门化的学术金字塔塔尖的意义而言，可以被视作独立于其余方案，因为它可以被嫁接到目前未经改革的学院，

235 同样会取得成功。

这就是我的建议，还没有经过论证。不知道下个星期日在新学院讨论它们是否合适，但如果你同意，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你认为它们是否值得考虑，是否可以在其他同事写给你的建议中看到对我的建议的支持。这份零乱的文件当然不值得对别人说，但是也许可以允许我在会上就此建议说一两句话。

你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齐门档案116号文件，第67—68页。

在下面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伯林提到了1937年6月8日在牛津新剧院为牛

---

1 民法学士 (Bachelor of Civil Law)。

津大学募捐基金而举行的托斯卡尼尼与BBC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伯林匿名为这次音乐会写了评论并发表在《牛津杂志》上。<sup>1</sup>在伯林即将走完他的人生旅途之时，我请他确认他本人就是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他回答说：“我不能否认那篇关于托斯卡尼尼的评论就出自我的手笔，文中所有的情感与我如今对他的感觉还是如此一致（其他的则不会）……”在评论中他写道：

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的宏伟姿势可能会作为本世纪的这个时期、牛津大学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艺术盛事而被世人铭记。也许，自一个半世纪前，以一部著名的交响乐题名作为纪念的约瑟夫·海顿对此地的拜访以来，这是牛津所获得的最伟大的音乐荣誉。对每一位在场者而言，这都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个人经历，那些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他指挥演奏的人们发现，对他们来说，这次音乐会改变了艺术可能触及的界限，并在这一方面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音乐体验。<sup>2</sup>

##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7年夏]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几个星期前就该给你写信了，为托斯卡尼尼道歉：在最后一刻，完全出于个人原因，我无法如约：一位玛沙克博士<sup>3</sup>正在审读关于我这个学科的一 236  
 篇论文。我想没什么人会去他那里，他人很亲切、博学，还是难民，等等，所以我必须去一趟，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我让西勒·林德去见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太久没有见她，没有和她联络，而怀有强烈的负罪感。在这一

1 1937年6月10日，第719—720页。在第二天《牛津邮报》（第3版“牛津日记”）上这篇未署名文章一点不乏诗意。

2 第719页。

3 雅各布·玛沙克（1898—1977），1933—1935年任全灵学院经济学齐契利讲师，1935—1939年任统计学高级讲师和牛津统计机构主任，1939—1942年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教授，1943—1948年任耶鲁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主任。

点上,你会公平地说,让她来见你不能补偿我的缺席。这正是我道歉的原因。第二次我正同盖伊·布兰奇一起走,照你和伊内兹的话说,他是我的一位忠实信徒,德瑞克[·凯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用沙哑而轻松的声音向我们打招呼“你们好,小伙子!”,我不明所以,但是他的态度导致了我生理上的震动(这种事不常发生),于是我仓惶逃离,躲到人多的地方去了。希望他没有生气,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有别的行为表现。比[彻姆]小姐会接受莫里斯的求婚吗?我很好奇,知道不论结果如何,即使是什么也没发生,我都会感到遗憾。上星期我第一次见到卡里特太太<sup>1</sup>,那是在莫德家举行的晚会上,我们俩都很不喜欢这次晚会。我觉得她很可爱。她提到你的造访,看起来对你很关心,她谈到维斯坦和海因茨<sup>2</sup>。我还从来没有在一间传统的客厅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如此自由地交谈,并十分享受这点。如果你见到她,请告诉她我的感受。她让我给她打电话,任何一个星期天都可以拜访他们家,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我还是想以某种方式表达我的感激。

我收到克罗斯曼的书<sup>3</sup>的赠阅本。写得很好,非常令人震惊,很真诚;卖得不是很好,尽管有那些很好的评论文章。我奇怪为什么不好卖。罗斯终于带着他的书<sup>4</sup>劲头十足地着手那个领域了。他不惜花时间告诉我他是如何摆平了评论家,人永远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倾听这样的事(就像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性主义圣人的书信摘录那样),我想我憎恨机会主义者的炫耀,甚于憎恨圆滑和洋洋自得,你也一样吗?

托斯卡尼尼在这里的演出棒极了,然而勃拉姆斯第一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像汤一样,不能被他那样拆解,就像通心粉似的,我是说,它经不起这样折腾,听起来不好,而且不和谐。

为什么V.伍尔夫使用这么多套话?

237 沙耶

1 威妮弗雷德·玛格丽特·弗兰普顿·卡里特,婚前姓埃提, E.F.卡里特的妻子。

2 德国人海因茨·内得梅耶自1932年起是斯蒂芬·斯彭德的朋友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男友。在从卢森堡被驱逐期间,他逃避征兵直至1937年5月。他返回德国,并因同性恋行为被监禁。

3 《今日柏拉图》(伦敦,1937年5月)。

4 《复仇的理查德·克伦威尔爵士: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英雄》(伦敦,1937年6月)。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7年7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没有写信，我恐惧地感到有罪，星期天我也不能来吃午饭，要访问贫民区。你会见到我的客人（盖伊·布兰奇）和主教先生（现在是个宗教狂人）。我随后很快就到（我访问贫民区=厄莱勋爵<sup>1</sup>、纳米尔教授<sup>2</sup>、犹太复国主义者），请你在莫德林学院散步，并且来喝茶。萨尔茨堡的安排发生了古怪的变化，我是指房子。现在有人提供了一座古老的房子，里面都是旧世界的玩意儿，我相信那一定会讨你的喜欢，房子在老镇上的不知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最后会怎样，除非你反对，我就接受下来了，如果你有好的意见，请一定要说，我讨厌负责任。昨天约翰·海沃德和罗杰·森豪斯一起在这里露面了，在试用过罗伊牌护肤油之后，恶狠狠地给了几句评价——很令人愉快。罗杰提到哈罗德·安提帕斯，随后我们作鸟兽散，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瞪羚羊异常享受这一切。

爱你的

沙耶

致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星期二 [1937年7月?]

布莱顿，大都会酒店

亲爱的斯图尔特：

强烈反感。我想我现在的行为称得上残暴。这种时候要让你控制并调

- 
- 1 杰拉德·卢夫斯·伊萨克斯（1889—1960），瑞丁侯爵二世、瑞丁伯爵、厄莱子爵、瑞丁子爵、瑞丁男爵，中殿律师学院律师协会主管委员。
  - 2 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1888—1960），1929—1931年任巴勒斯坦犹太人代理机构政治书记，1931—1953年任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历史教授。见伯林在《个人印象》中关于他的文章。

整自己，根本就是没有为你着想。<sup>1</sup>因此，如果你留在伦敦，我在布莱顿，直至下周的任何时候再见面，这样最好。这么做有许多好处。特别是你所经历的，回头想想，它会自我安排，重要的事和琐屑的事自动归位，你将不会因为此时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强调了不重要的东西，之后又因为对其夸大、使其膨胀、甚至自我消耗而羞愧，而因此遭受折磨（我常常受到这样的折磨）。当然我会要求你告诉我，你是很正确的，告诉我一切或者什么都不说。但是你最好什么也别告诉我，直到你相信自己不会陷入尴尬或是半途懊悔。我知道，自己会决定开口，用一种装腔作势的平稳音调，假装强硬地说话，这种伪强硬我可以在奇尔弗太太<sup>2</sup>那里找到共鸣，我这么做的时候，知道这种伪强硬有同样的成分——客观化的决心，这样就能避免把主观自我的需求、恐惧投射到对事实的陈述中，以免每一次对话都成为个人的独自表演，成为前进或是撤退的信号，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次情感战役，一次个人冲突，而这正是我，还有她，无论如何都极力要避免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不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调整自己，回到我这种直线的生活方式上来。至于弗雷迪，从他的角度来看，对所处环境的麻木不是邪恶，而是美德，像他这样才能幸存下来，像一块表面擦得锃亮、什么东西都沾不上去的铁板（一块磐石也许有点愚蠢）。如果他突然开始作出反应，那么这件事就会变得不可忍受、有损尊严。他根本就不能调适，仅靠这种麻木，勒内想要多少就得付出多少，不再疑心有更多的感情存在，也不再要求什么，婚姻就有可能维持。我尊敬并喜欢他，无论怎样都是非中立的。我不写关于马克思书的时候，就读赫尔岑，他在生活和政治上的充满活力的道德标准，我是多么认同，多么钦佩，无法用言语表达。你所说的面对现实（虽然这不适用于你、普鲁斯特或是亨利·詹姆斯的情况），常常是情感中立的假面，是对明暗对照法本身的喜爱，是不确定的哈罗德式的颤抖，为了那模糊的、甜蜜的、温柔地使人心烦的事情。霍夫曼斯塔尔、斯特劳斯<sup>3</sup>是行家。我憎恶他们。伊丽莎

1 这封信是关于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与A.J.艾耶尔的妻子勒内的关系的（汉普希尔1961年与勒内结婚），伯林对此持否定态度。

2 萨莉·格雷夫斯1937年春和理查德·格雷夫斯结婚。

3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德国戏剧家，与理查德·斯特劳斯（1864—1949）合作

白[·鲍恩]喜欢让鲜血以史诗剧的方式流淌,这很不一样,和美国流派有区别。你对弗雷迪的快活感到烦躁,我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不明白你怎么没能理解,那恰恰就是我钦佩、喜欢他,却和他亲密不起来的原因,对我来说他是一组非凡特征。如果你给别人加上敏锐的感觉,你不是使他们更突出,而是使他们失去光泽,使他们变成像潮湿而揉成团的纸张一样:嫉妒、戏剧化、肮脏的景象随后就发生了。他归根结底是个二维而不是三维的生物——没有谁比勒内更清楚这一点,清楚这一点使她免受伤害,或多或少允许她像她希望的那样生活。你会希望他继续盲目下去,或者至少这种蒙昧状态延续下去,只是积极利用这样的状态在我看来是不道德的。停止吧,我开始说教了。关于伦理中立的题目,见面时我会对你做一番布道:抽象的、文学的,而且不引经据典。同时,和我保持通信,至少让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否兴奋、心碎,或是迷茫。我会试着猜测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证明的事实。我现在不能想明白,我们为什么如此愚蠢,一刻也想不到勒内会毫无必要地告诉弗雷迪一切,使这一切变成灾难,完全失控。无论如何,我想从你的描述中,由于她赋予词汇的意义和价值,她在巴黎感知到的距离比你的要小,而你已经把暗示当成四分之三的事实了。

爱你的

沙耶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四[1937年7月?]<sup>1</sup>

[发自布莱顿,大都会酒店]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住在面向布莱顿大街的一间很大的客房里,我确实很喜欢它。外面

了許多歌劇。

1 也许这封信是和上一封信同时写的,当然是在布莱顿大都会酒店,也许是在暑假。由于伯林提到没有去爱尔兰拜访伊丽莎白·鲍恩,这一点也暗示了这封信写于夏天。

那强烈的生活气息营造出一种间接的活动情景，使人不必从事任何激烈的运动，比如散步。于是我很顺利地写马克思，完全只有自己一个人，这很不同寻常。我的母亲在国外，我的父亲在伦敦。在度过充满强烈的忧郁和被遗弃感的一天之后，我的心情不知不觉调整过来了，确乎变得心满意足。一个人的时候，每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我都会重新感到惊奇。而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或是只有一个人陪伴，而这个人我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时，我才能做到愿意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真的这就是我决定不去爱尔兰的动机。我无法形容有多么想去——我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如果能给你审阅，我会感激不尽——我对鲍恩宅邸的热爱（加上戈伦韦认为如此虚假和缺乏生气的崇敬），你知道，是很强烈的。我喜欢阿兰，他和福丁布拉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你是唯一一个（不排除莫里斯和斯蒂芬），除了其他更单纯更温暖的感情之外，还让我感到绝对信任、尊敬和敬仰的人：我与生俱来的教条主义和自负（相对于并不伟大的虚荣）彻底崩塌了，对此我感到十分快乐。关于绝对信任的话语通常会导向点什么，是特别令人害怕的霸道行为，

240 是向别人施加让人特别不能忍受的负担的前奏。而在这里，我的话语并不预示什么。而且，我确实已经对我的语句中的情感感到厌恶了，请你对这些语句抽象理解，当然语句的意思不是模糊的，而且我看不出为什么就不能说出这些话来。不过，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我认为自己最好不要去爱尔兰：这确实不是因为要上演讲技巧课<sup>1</sup>（悲喜剧即将开始：如果我不能够把它转变成一种有回报的有趣的东西，我将就此打住），而是因为如果面前放着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我就无法从事任何工作了。这一点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事实证明。你说到赛西尔一家和[E.M.]福斯特先生，当然我很想见到他们。但是总的说来我的工作成果太少，所以不工作导致的负罪感恐怕会超过它带来的快乐：而且，毕竟，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待，我在其他许多方面对那些比我更年轻的同辈人表现得一本正经和严于律己（“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人是有欲望的。”奇尔弗太太如是说），所以我才时不时

1 伯林上课是为了让打字员不至于误解他的意思吗？见1937年7月31日和1938年4月15日和玛丽·费希尔的通信，见下文第290页和第321页。

对自己做一些严厉的事：也就是说，毋庸置疑，是在可能获得某种利益的时候才这么做，而不是在苦修。

那些都是我的理由：如果我认为我能坚决地和K.M.一起去爱尔兰，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了，压根儿不会等你第二次邀请。哦亲爱的，为什么我要让费希尔先生来劝说我？这里，下着灰蒙蒙的雨，加上不时的貌似艺术作品的日落，某种亨利·詹姆斯笔下的天气。我慢慢地讨厌这位伟大的作家了。受到斯蒂芬和斯图尔特的胁迫，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书，我承认他显而易见的成就，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无疑说了真话，关于虚荣和屈辱的本质、保护性面具的必要性、语言的惊人力量、非存在的各种虚构想象，例如“世界”或纯粹的行动。但是我反对他的中立态度。中立性假装没有态度，假装面对现实，不受情感和道德偏见左右：没有立场，反俄，反巴尔扎克，最后反司汤达和福楼拜（二者对浪漫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令人窒息的阴郁都持非常积极的、几乎是残酷的党派态度：司汤达对反动的仇恨、对中产阶级上层的热情，福楼拜对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厌恶、对知识分子的固执和风格的仰慕，这些都比雨果和左拉及那些“党徒们”的观点更不加掩饰：从他们身上我希望推论出，那些后自然主义者，詹姆斯、普鲁斯特，甚至某种意义上的伍尔夫太太[虽然她并没有一本正经地假装应付局势：和诗歌中一样不再追求“现实主义”<sup>1</sup>]都有意地抽象了，不是出自更细微的视角、更伟大的宽容心，或是冷静客观，而是出自于直接的胆怯，准确地说还不是因为缺乏活力，但肯定是出自缺乏安全感，惧怕承担义务，惧怕说出不可收回的话：普鲁斯特比詹姆斯更勇敢：的确，人必须更勇敢，因为

241

1 伯林此处原文为：verisme。



掠夺的，问题就在于你放弃了多少领地，再有就是因一次投入了太多赌注而产生的恐惧，害怕由于派遣了自己所有的军队去守卫一个阵地，结果却使自己在另外某个方面毫无防护。在早先的作者那里，由于构成你自身的材质，你不会彻底失败：在詹姆斯等人那里，只有你的秘密武器完好无损，你才能够幸存，你为了逃避而选择的另一种人生，这个体系永远具有双重性。也因为如此，没有人可以沿着任何方向完成四分之三的路程，风险太大了。这当然不是有意的办法，而是情感倾向，几乎是一种瘟疫。在卡夫卡的作品里，人也是无助的，他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讨厌的词语）命题：既然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不可避免，那么就应该视其不存在：它不能因为有秘密储备而被避免：确实，拥有秘密储备以及对秘密储备的需求使你在未开始时就已经有失败的症状了：你被诅咒了：所以你不妨继续下去，就好像失败可以避免，采取行动，妥善应对，知道这很绝望，但承认这一点却是愚蠢和耻辱的。这一点更真实，因为它不会以为人的力量可以彻底毁灭其他人（这是肤浅的悲观主义，恰恰是浪漫主义所摒弃的，福楼拜也否定这点：的确，人所崇拜的每个人，俄国人，甚至日本人：只是没有德国人：在这个方面歌德的东西是虚伪的修辞，19世纪的作家令人难为情，就因为他们的悲观主义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一种乔治和沃瑟曼<sup>1</sup>身上的可怕的迫害妄想症：尼采则过分强调了相反的情况：这说明那还是他的同代人深陷其中的泥淖）。但是，接着说卡夫卡，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改变了问题，摧毁廉价自怜的可能（例如，这甚至在契诃夫——至今看来都是个世纪末论者——那里都可以找到）。

詹姆斯（唉，还有福斯特先生）所关注的过度敏感的问题，逻辑上导致这个理论，那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敏感者、观察者、讨论者是残疾人，  
242 能够从任何异常的角度窥视，能够同时沿各个方向移动9/10的距离，不过因此我们就剥夺了自己的生活权利。詹姆斯含糊地把这样的权利给予了那些稀有的正常人，他们出现在詹姆斯世界的边缘。福斯特很公开地提供了五大三粗的运动员的纳粹画像，不允许我们和他们之间有联系纽带。我能明

1 雅可布·沃瑟曼（1873—1934），德国小说家，有时被拿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

白为什么斯蒂芬,或者斯图尔特,或者福斯特先生、[雷蒙德·]莫蒂默先生也许会采用他们自己的此类理论。(虽然也许这是自我辩护,可是,如果在足够的恶意和技巧的压力下,什么话语又不是自我辩护呢?)我希望认为,这种学说压根就是错的,关系是可能的,每天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是神经质,但直接,不是永久性的生成和腐化,而是人们之间的直接活动。托尔斯泰也许过度简化了,但从根本上说,他,甚至维多利亚时期的常规也是对的:人们完全地给予自己,并没有不可挽回地失去什么:除非人确实如此,信心满满,却蒙受欺骗,一头栽入、猛撞、卷入,一种封闭隐蔽的气氛将继续包围和削弱所有这样或那样稳定自己的企图,没有什么会比别的什么更是任何什么,人将无休止地滑倒,失去把握。无疑可以像普鲁斯特那样生产珍珠,不过是对男人和女人之间可能关系的极端错误理解为代价的。逐个来看,他说的一切都真实无比,但是累加起来就是错的,因为他不相信可能的格局,我认为这是由于个人原因,或者是年代环境,但不是耐心观察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甚至包括特罗洛普这个痛苦、目光短浅、技巧娴熟、供人娱乐的雇佣文人,都声称这个格局存在,甚至对它进行了描绘。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激进,需要有人挫挫我的气焰。但由于莫蒂默先生感到自己受到了年轻人的欺负,所以不断有证据表明,最好的组合是拼缝物,可能会被拆解,其他人剪去他们喜欢的部分,做成他们自己的被子,接着他们又被掠夺,又被抢劫,或者是令人厌烦,所有的安排都是临时的,每个人都在影响别的人,用别人点燃的火焰温暖自己,这些火焰也许是为了要使某些人烦恼才点燃的,温度也各不相同,总是眼见就要燃烧完了。所有这些多么费解?我是多么简单、幼稚、没有竞争力,不过很合作?整件事情距离愿望的实现有多远?因为我寻求稳定和安慰,不喜欢一次朝着九个方向突飞猛进?我不能再往下写了。请写信到伦敦,渴望见到你。

爱你的

沙耶

这里有许多胡扯的理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向来不敢重读自己写的

信，因为我害怕会厌恶自己说的话。想象一下，对一种如此低级的怯懦行为，福楼拜会多么愤怒地鄙视。如果得到鼓励，我会接着说短篇小说。

稍后<sup>1</sup>

说点隐私八卦：我隐约收集到一些消息，弗雷迪·艾耶尔和斯蒂芬之间疏远了，因为前者不妥地向斯彭德太太求婚<sup>2</sup>。这事情太齜齜，我不想再探究下去了。不过斯蒂芬对我的沉默也许是合乎逻辑的。我相信戈伦韦有权威消息，但首先他应该不知道我也听到风声了。别的可怕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弗雷迪是一个绝对的意大利人，但使我惊奇的是，伊内兹短暂的躁动也被认为情有可原。这陌生的语言啊！我还没有给莫里斯写信<sup>3</sup>，我会的，但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

致玛丽·费希尔

1937年7月31日

彼得堡，阿什顿·沃尔德<sup>4</sup>

亲爱的玛丽：

现在是7:45，很快就得吃饭了。一刻工夫都没有，有的话也已经花在采

---

1 这段话写在另外一张明信片上，被认为和这封信是一起的，因为在伊丽莎白·鲍恩去世后，这张卡片就放在这封信的后面和其他的信件一起交还给了伯林。如果这张卡片和信是一起的，那么它的日期似乎要比7月早一点，因为艾耶尔和斯彭德之间的疏远是在1937年1月间开始的，见本·罗杰斯，《艾耶尔传》（伦敦，1999），第138页。所以也许这张卡片属于另一封日期早一点的信，虽然卡片墨迹似乎和这封信的相同。

2 据斯彭德的遗孀娜塔莎说，导致两人之间疏远的原因不仅仅是“不合适的求婚”（里斯是个不可靠的告密者）。艾耶尔和斯彭德即将合作一本书，但是当斯彭德得知，在斯彭德和伊内兹结婚之前，甚至一直到求婚时，艾耶尔和伊内兹都有私情，斯彭德就退出了那本书的合作。两人的私情在斯彭德结婚后也许没有再继续。伊内兹同时还和菲利普·汤因比有私情，这些事被汤因比记在日记里。

3 也许（假如7月这个日期是对的）是为了祝贺他和奥黛丽·比彻姆的（短暂）订婚。

4 洛丝卡·罗斯柴尔德（1870—1940）的家，她婚前姓冯·沃塞姆斯坦，（纳撒尼尔·）查尔斯·罗斯柴尔德（1877—1923）的遗孀，维克多和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的母亲，后者终身住在这里。

访K.巴恩斯先生<sup>1</sup>提供的演说家以及感谢你的父母上面了。对于罗斯柴尔德的房产来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这些人不是坐飞机来的那些<sup>2</sup>,而是他们的母亲,一位很高贵的老夫人,祖上来自匈牙利。房子里都是堕落的贵族成员,例如,普鲁丹斯·佩尔哈姆夫人<sup>3</sup>,她是霍奇金一家的朋友,还有四位 244 这样的人:卡麦尔山勋爵<sup>4</sup>的名叫戈德弗雷·塞缪尔<sup>5</sup>的儿子、福斯特·菲力摩尔勋爵<sup>6</sup>、一位皮特一里夫斯太太<sup>7</sup>,等等。这房子并不像瓦德斯东<sup>8</sup>那样富有而粗俗。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是一个有着非凡管理能力的人,但是除了某种大众化的格调,对任何东西都谈不上有品位。我赞同犹太人没有好眼力[原文如此]的看法,即使他们在绘画上有正确的品位,那常常也是商业利益方面的功能而已。我猜想,这样的品位一部分是由于《圣经》中的雕刻形象,一部分则是由于中世纪他们居住的邋遢环境。我还是喜欢福斯特,不过,我想也许因为五年前就认识他,那时他基本还没有如此粗俗。

1 也许是肯尼斯·拉尔夫·巴恩斯(1878—1957),1938年受封骑士,1909—1955年任皇家戏剧艺术学院院长。

2 维克多和芭芭拉(上文第256页注3)。

3 奇彻斯特伯爵六世、乔赛琳·布鲁登内尔·佩尔哈姆的小女儿(1910—1952),普鲁丹斯·佩尔哈姆是一位雕塑家,埃里克·吉尔的得意门生和朋友,也是画家和诗人戴维·琼斯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在结婚前爱上了她。1939年她与盖伊·布兰奇结婚,后者在二战中阵亡;她后来与画家罗伯特·布勒同居,依据单方契约改姓布勒,但是没有和他结婚(她需要作为寡妇领取年金)。她称心理学家为“窥心间谍”,还教一个朋友如何倒着驾车,她的理论是,相比之下,这就使向前驾车变得容易了。她死于多发性硬化,最后眼睛失明了。她叫伯林“布勒熊”,还和E.C.霍奇金一起写了一首关于伯林的五行打油诗:“……/他不喜欢太早被人叫醒/他打探所有朋友的秘密/不过是让他们改过自新/他和新入社交圈的女孩调情。”(开头一句来自多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卡莱》中的咏叹调“Com'è gentil notte a mezzo april!”;“与新入社交圈的女孩调情”指的是人们看到伯林和帕吉特家的双胞胎西里拉和玛曼尼中的一位谈话。)

4 赫伯特·(路易斯·)塞缪尔(1870—1963),自由党政治家,1920—1925年(首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1937年受封为首任利物浦卡麦尔山和托克斯特斯的塞缪尔子爵,并被任命为上议院自由党领袖。

5 戈德弗雷·赫伯特·塞缪尔(1904—1982),赫伯特·塞缪尔的第三个儿子,建筑师,1933年伦敦动物园现代主义猩猩房(如今列为一级)的设计师(属于特克顿建筑公司)。

6 戈德弗雷·沃尔特·菲力摩尔,菲力摩尔男爵二世(1879—1947)。

7 也许是罗莎林德·维尼希亚·皮特一里夫斯博士(1907—1990),化学家,乔治·亨利·雷恩·福克斯·皮特一里夫斯上尉的妻子。

8 瓦德斯东庄园,詹姆斯·阿芒·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1878—1957)位于白金汉郡的家,他是洛丝卡丈夫的远房堂兄弟;1929—1945年任伊利岛的下院议员;1945年任供应部联合政务次官。

现在，我承认，他已经落拓不羁到了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地步。我避开了弗兰克尔太太<sup>1</sup>的问题，我确实没有向她推荐你，但是我承认为了让我自己开心，我不断拿“仓楼”<sup>2</sup>的事刺激她。关于奇尔弗太太，你是对的，她极其缺乏品位，自信、豪放，我很高兴她要来萨尔茨堡，因为说得粗鄙一点儿，显然需要有人陪伊丽莎白·卡梅伦，才能使她兴奋起来，汉普希尔或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奇尔弗太太是里斯的替补。我一点都不知道那将是什么样子，我会从那里向你汇报的。奇尔弗太太的一大好处就是，她无论怎样都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且，任何一位像她那样随和、同时又可以成行的人，我都欢迎，因为自体运动<sup>3</sup>是极为罕见的。听说克里斯托弗在英格兰，但除了“小宝贝”，他似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出生命迹象，因此我不了解他的情况。他似乎本来想去爱尔兰的，那就好了。我很抱歉，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不能去。哦亲爱的，我得下去吃饭了。从一辆车上刚刚下来了几位金发的女人，还有一位留着胡子的大个子罗斯柴尔德。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喜欢如此霸道的人，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确实喜欢。我不喜欢吃饭，我讨厌在时髦人群中谈话，也讨厌不说话，做什么都很沮丧。但回想起来，整件事情还是很有趣的，总是如此。我会从萨尔茨堡给你写信。

爱你的

伯林

至于米利亚姆·R.<sup>4</sup>，我喜欢她的老式犹太风格<sup>5</sup>的外表和异乎常人的机智。

---

1 鲁斯·弗兰克尔，艾德瓦德的妻子。

2 也许那是一位房客，伯林没有把玛丽·费希尔推荐给弗兰克尔太太，也许仓楼（见1932年10月13日致谢拉·格兰特·达夫的信）是牛津教师和他们的妻子不正当性行为的象征，因为克罗斯曼一直到伯林写这封信时都住在那里，他和一位大学同事的妻子有私情。

3 字面意思是“错觉造成的静止物体仿佛自行运动的现象”。

4 米利亚姆·路易莎·罗斯柴尔德（1908—2005）阁下（自1938年起），昆虫学家，1943年和乔治·雷恩结婚（1957年离婚）。

5 伯林此处原文为：altjüdisch。意思就是她看上去像《圣经》中的犹太人，一生如此；她同意并且喜欢人们这样形容她。

致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1937年8月23日

萨尔茨堡

亲爱的菲利克斯：

你的信经过了无数手才刚刚到我手里。如果我试图充分和充满感情地回答你的问题，不知道我的答案会有多长。可以说，所有的问题都十分火爆。我真的很高兴有机会接触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建立秩序和纪律。别忘了托斯卡尼尼，他完全占领了这一带。就连写信，我认为，也要小心翼翼不失去控制。我将开始以我迂腐的职业习惯，把事情分成A：公共消息，B：私人消息。

A. 犹太人。皮尔报告<sup>1</sup>大部分是由我们的朋友C.<sup>2</sup>写的（他希望提到他时要保持神秘）。你有没有听到他在全灵学院私底下向人提起B.K.D.等人？很好，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写了承诺的历史部分（你难道不认为这写得很可信？虽然包含着经过精巧装饰的核心谎言，我指的是那些激烈地相互冲突的承诺，例如，对犹太人承诺建立一个自治的国家，结果使他们 246 之间的关系要多不和谐就有多不和谐。于是在犹太人看来，开始时提供的比他们敢于梦想得到的还要多，而这么做是为了最后把这一切全部拿走。在伦敦，他们像折叠任何东西那样把它折叠起来，出版那天大罗素街77号<sup>3</sup>简直成了欢乐之地，他们打折出售报告的复本，真的。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份，价格很便宜，他们的车装不下了。一群不太高贵也不太聪明的人），他还

---

1 《皮尔报告》（1937年7月），英国皇家特派巴勒斯坦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由（罗伯特·）皮尔勋爵领导，1936年英国政府委任他调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2 卡普兰德。

3 1930年代至1940年代，大罗素街是英国犹太复国运动总部所在地。伦敦犹太人代理执行机构设在大罗素街77号，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设在75号。犹太代理机构事实上和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一样。

在报告最后匆匆写了建议。他对报告结尾关于三重圣地的那句话<sup>1</sup>甚为得意。他告诉我，他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意识到他会变得多么不受欢迎。他说“民族之家”这几个词的发音方式也很让人不舒服，他是一位温和老派的反犹主义者，就像雷内尔勋爵<sup>2</sup>那样，你也许已经读到 he 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信了，他引用了纳粹关于犹太人喜欢颠覆破坏的话，无言地提醒读者公元40年的犹太人是如何不受欢迎，并建议所有的犹太人也许都可以成为归化的巴勒斯坦人，“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多得到几码贫瘠的领土”。<sup>3</sup>你不可能看不到德国人快乐地尖叫着，把犹太人送上车船，遣返他们吧？然而，还是回到关于这份报告的话题上来吧。

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份报告是谁写的，除了卡普兰德，调查委员会中其他人对此也不太热心。菲尔比在《时代与浪潮》上发表文章，有力驳斥本威茨写的一篇苍白无力的东西，说到不是一半面包而是19/20的面包都已给了阿拉伯人，此话一点不假<sup>4</sup>，调查委员会着实感到尴尬。自从1935年卡普兰德和我谈话以来，他的话就没有改变过：巴勒斯坦很令人头疼，是英帝国道德形象的一个严重瑕疵，如[莱昂内尔·]柯蒂斯所辩护和理想化的那样。这继续被证明为尴尬可笑的来源，不值得继续下去。要做的事就是，哄抬价码，然后把它作为一份诱人的礼物送给一群困惑不解的聪明傻瓜，

1 这句话在报告主体的结尾，即“如果，三重圣地上的冲突和流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终结，全世界无数的男人和女人会感到深深的宽慰”（第297页）。

2 詹姆斯·雷内尔·洛德，雷内尔男爵一世（1858—1941），外交官、学者。他的来信以“民族之家：国家组织的重要性：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和护照”为题发表在《泰晤士报》上，1937年7月26日，第13版。

3 雷内尔实际上写道，如果“犹太人愿意接受”皮尔喜欢的“民族之家这个概念，即给犹太人提供的好处要远远多于另外几平方英里的领土，那么，他们对该报告适时的信奉和遵从也许可以部分消解阿拉伯人抢先占领这片土地的不利因素，阿拉伯人具有完全自治的抱负，因此应该会认同犹太人建立他们本种族合法地位的愿望”。

4 诺曼·德·玛托斯·本威茨和H.圣约翰·菲尔比，《巴勒斯坦报告》，《时代与浪潮》杂志第18卷，第29期（1937年7月17日），第969—973页。诺曼·本威茨（1883—1971），1920—1931年任巴勒斯坦政府首席检察官，1932—1951年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他持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政见，致力于建立双民族国家。哈利·圣约翰·布里杰·菲尔比（1885—1960），东方学者、探险者、阿拉伯事务专家，成为了穆斯林，当时在吉达。他说（第972页）：“用算术的方法来说，阿拉伯人赢得他们提出价码的23/24。[……]一块面包的23/24（不是委员会宣称的1/2），总比没有面包要好。”

就这样促进实现报告中写到的目标。卡普兰德肯定是这么一个人选，和期望相反，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直接地对一切负责：对我，他大力赞扬舍托克<sup>1</sup>，称他为最佳证人，他又高度称颂魏茨曼，魏茨曼编了一个关于这片被许诺给多人的土地的笑话，并宣称这片土地在他眼里极其丑陋，还说纳米尔有一次表现出政治家的机智。虽然同在一家饭店，他从不主动说话，除非别人和他说话。我最后见到了纳米尔。一个可怕的人，我认为，他必[须]发挥一点作用。如果他遭受挫折，事情会变得糟糕得多。与此同时，伦敦执行委员会威胁说，如果纳米尔加入进来，他们就准备辞职。他差一点就要加入了，在成功游说了劳工利益派成员之后——他说我总是追随贵族阶级。我以为卡普兰德个人对一切负责，因为(a)别的所有人都这么认为；(b)莫德不断神秘地暗示，在撰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卡普兰德在某些方面很不得了；(c)因为他说话算话。分治肯定是他的主意。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将会发生什么，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会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且这种形势将可怕地崩溃，直到巴勒斯坦最后被某个国家吞并。但我也许是错的。魏茨曼看起来肯定已越过议会首脑们，直接向欧[姆斯比]—戈尔承诺接受领土分治。我猜想，目前他已认识他们。你能猜得到后果吗？一座巨大的柱形城镇，从海法一直到充斥着塔里斯<sup>2</sup>贩子的特拉维夫，就像犹太男孩十三岁时举行成人仪式那样，让这个城镇在圣地获得“承认”，让一个充斥着犹太酒店店主和纪念品贩子的国家来接纳他们？那就是一个有着150万人口的国家将来一定会变成的模样。我希望我大错而特错了，而它会变成像卢森堡那样稳固的“血与土地”<sup>3</sup>。卡普兰德被认为是这个问题的历史专家。和他一起待上三个小时意味着你会稀释进他自有的、无法效仿的泛综合性酱汁，他在所有遇见的问题上面都浇上一层这种酱汁。不管怎么说，你显然为犹太人提供了他们最需要的服务：既然他优越的知识使他高兴，使他比同事们更有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总比他变成反犹主义者要好。与此同时，柯

1 摩西·舍托克(·夏里特)(1894—1965)，1933—1948年任犹太代理机构政治部负责人。

2 祈祷巾，参见上文第119页注3。

3 伯林此处原文为：Blut & Boden。这个德语短语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用来表示德意志民族(或是人民)与它的土地之间所谓独有的联系。



248 蒂斯已经在全灵学院接待沙特阿拉伯人，他们是非常英俊的一群人；“今天学院里有许多哈拉伯人，先生，”我的校工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哈拉伯人，先生，很多哈拉伯人。柯蒂斯先生，据说他对他们很好，对哈拉伯人，先生。到处都是哈拉伯人，今天。”

我想卡普兰德会得到他的爵士身份，但是他很不满意在议会的争论，他认为自己得到了欧姆斯比·戈尔一票，魏茨曼也是这么认为的，贝菲<sup>1</sup>也这么认为。我希望他们都能得到。据说张伯伦<sup>2</sup>对向他询问此事的卡洛尔国王<sup>3</sup>解释，内阁对这些建议不热心，也不在意托管委员会发生了什么<sup>4</sup>，所以没有人了解此事，而戈尔很生气，因为国会没有做出决定。赫伯特·塞缪尔<sup>5</sup>的生命受到了修正主义者的威胁，应该称他为卡麦尔山和托克斯特斯勋爵，时髦的犹太人社交圈称他为图庭勋爵<sup>6</sup>。他再一次让所有人不高兴了，除了纳沙什比派<sup>7</sup>的人以外。这是我所知道的不完全公开化的事情。如果有你认识的人想研究卡普兰德的生平，并考虑以此为题作博士论文，我很乐意提供精确的、不无恶意的描述，描述他混杂着骄傲和轻率从事的意愿、温切斯特学院的拘谨、生动描述自己进步的热情的形象，他回来后在全灵学院对我说这一切时正怀着这样的热情。他认为实行领土分治是强有力的、英雄的、非学院派的行为，是拯救英帝国的极其大胆和坚决的举动。他心底是

1 布兰奇·伊丽莎白·坎贝尔·达格代尔(1880—1948)，婚前姓贝尔福，热情的非犹太裔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家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贝尔福伯爵一世)的侄女和传记作者；1920—1928年的国际联盟情报部负责人，1932年国际联盟大会英国代表团成员。幼年时她试图念“贝尔福”时却错念成“贝菲”，于是这就成为她的昵称了。

2 (阿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起初为自由党，后来成为保守派政治家；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

3 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二世(1893—1953)。

4 即英国皇家特派巴勒斯坦专门调查委员会(上文第293页注1)。

5 赫伯特·路易斯·塞缪尔(1870—1963)，塞缪尔子爵一世，政治家；1920—1925年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1944—1955年为上议院自由党领袖。

6 伦敦一个过时的地区，也许这是暗指塞缪尔选择利物浦过时的托克斯特斯区(他的出生地)作为他封号的一部分。

7 纳沙什比家族的支持者，侯赛尼家族的主要反对派别。巴勒斯坦显赫家族(尤其是这两个派别)之间的竞争主导着托管之下的巴勒斯坦政界。侯赛尼家族由哈吉·阿明·阿尔-侯赛尼领导，他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反对领土分割，而纳沙什比家族至少在私下里倾向于接受领土分割。

真诚而幼稚的,我想,但是表面上没有吸引力。关于这方面,就说这么多了。另一个趣闻也许会给你一点快乐,赴哥廷根的代表团<sup>1</sup>因为忙乱而沮丧。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投票派我去:13票对7票(会议程序当然是非常保密的)。249 然后索尔特非常体面和出人意料地给林赛写信抗议,于是召集了另一次会议。事实上,我采取行动了,我请莫里斯和他的朋友说说,请罗伊对格莉尔小姐<sup>2</sup>说说,还请你那健谈的德比伴侣奥斯汀去胁迫帕克<sup>3</sup>,等等。那天早上(真的很激动人心)每个人都戏剧性地打了一通电话,结果决议还是被否决了,13票对12票。下一个话题是罗素,芝加哥那边似乎向(伯特兰)<sup>4</sup>提供了教授职位。于是开始了又一次的密谋、陷阱、小团体,策划让他在牛津上一个学期的课。我不能复述我和院长的对话,谈话棒极了。他十分讨厌罗素,以及和他有关的一切,但是最后,他说:“我想,从本质上看,他还是很可爱的类型?”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认为,也许我应该说:“许多女人似乎已经发现这一点了,先生。”但是我没有这么说,只有这样了。耶稣学院的院长<sup>5</sup>说,如果罗素来牛津,他会把这个地方的道德规范转变成牲畜饲养栏里的道德规范:法吉<sup>6</sup>支持这个说法:有人态度暧昧地提到阿玛努拉的品行,他在这里拿到了荣誉博士学位。<sup>7</sup>罗素得到了多数票:13比12。哦亲爱的,这一切非常令人兴奋,这些运动,但是损失的风险,还有此后造成的伤害太大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损失。附带问一句:巴勒斯坦犹太人外交代表该

1 1937年3月1日召开的理事会周会备忘录表明,会议上10票对9票同意派遣一位代表出席哥廷根大学两百周年庆典,并送去一份呈文;4月26日的备忘录表明,14票对7票决定反对理事会派遣代表的决议,但支持送一份呈文的决定。

2 (玛丽·)琳达·多萝西娅·格莉尔(1880—1967),经济学家、行政人员,1921—1945年任玛格丽特夫人学院院长;1926—1945年为理事会成员。

3 亨利·迈克尔·丹尼·帕克(1894—1971),罗马史学家,莫德林学院研究员,1928—1941年为理事会成员。奥斯汀也是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可能会接近帕克。看来他和法兰克福特一起去了德比。

4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罗素伯爵一世(1872—1970),哲学家、数学家,反战主义者及自性爱的倡导者。

5 阿尔弗雷德·厄内斯特·威廉·海泽尔(1869—1944),律师,1925—1944年任耶稣学院院长。

6 名誉晋级陆军中校亚瑟·斯宾塞·鲁特·法克哈森(1871—1942),哲学家,1899—1942年任大学学院研究员与导师。

7 阿富汗国王阿玛努拉1928年3月23日被牛津授予民法博士学位(严格意义上说不是荣誉学位)。

如何称呼？犹太部长？马图克牧师<sup>1</sup>与霍尔·别利沙先生<sup>2</sup>会说什么？

### 私人事务

莫里斯：彻底的灾难。在我看来，这是一次疯狂的选择，她<sup>3</sup>本会立即使他厌烦的，一个年轻、狂热、冲动、信奉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经过一场旋风式的调情，貌似真实的接受，朋友们庄严的审查，等等，她似乎在最后一刻拒绝了，显而易见而且正确无比，我认为，是被前景吓怕了，她  
250 要是早一点这么做就好了。现在莫里斯感到屈辱、生气，花时间回复来自欧洲各地的祝贺信。这里有他写给我的信，说奥黛丽——这样你就知道她的名字了——遭到“一连串疑虑的袭击”。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否则他不会这么写。我无法说我感到多么难过，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都是令人垂头丧气的那种。祈求上帝保佑他被选为沃德汉姆学院院长，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写信对他说什么好。他的确热切地想有位妻子，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无性的存在（他会这么说），而且他显然也不能像佩尔斯所做的那样，娶一个无足轻重的、邻家女孩般的小傻瓜（鲍维克的女儿，林赛的侄女），连批评也不值得[……]。不过话说回来：不能否认，我认为他在追求对方的过程中，缺乏急切的心意，他认为只要一次猛攻就能够攻陷村镇，并继续占领它们，他无视他想施加巨大影响力的人所作出的不太易察觉的反应。而且，他生活在聚光灯下：《夜与日》<sup>4</sup>撰稿人（私下里）的嘲讽比他们可能达到的程度还要更令人心烦：问题是，哦为什么你们不在美国为他找一个更聪明、更漂亮的妻子，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而且出身高贵？《夜与日》真的

1 以色列·以西多尔·马图克拉比（1883—1954），1912—1948年任圣约翰·伍德教堂自由派犹太教会牧师。生于立陶宛，在美国受训，他是英国自由派犹太人运动的先驱之一，该派认为犹太教教义不包括犹太复国主义。

2 （艾萨克·）莱斯利·霍尔—别利沙（1893—1957），犹太人，自由派政治家，1937—1940年任战时事务大臣及军队委员会主席。

3 奥黛丽·比彻姆（上文第262页注1）。

4 一份短命的周刊，某些方面是模仿《纽约客》，1937年7月至12月由格雷厄姆·格林主编，查托与温杜斯出版。另有一本同名选集在1985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克里斯托弗·豪特里主编。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她的姐姐瓦妮莎·贝尔的信中说，莉迪亚·凯恩斯（下文第590页注1），J.M.凯恩斯（下页注2）的妻子，喜欢《夜与日》要多于《新政治家》。

不太好。只有伊丽莎白·鲍恩和伊夫林·沃的才称得上佳作。贝杰曼写的是令人难堪的垃圾，彼得·弗莱明更糟糕。它没有一个段落，甚至一个段落的十分之一，比得上它所模仿的《纽约客》。

W.诺特斯坦<sup>1</sup>教授在全灵学院逗留，他怎么样？我还从来没有见到哪个人如此急切地要取悦他人，要使自己适应这个陌生而著名的英国。斯帕洛很喜欢他，罗斯和佩尔斯也是。我禁不住觉得他讨人喜欢但是又觉得他（a）卑鄙（b）反动，以某种谨慎而卑鄙的方式。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老学术骗子。请说说他吧。罗伊在寻欢作乐，每个星期人们都看见他在学院花园和一两个微醉、肥胖、嘴唇鲜红的年轻女人在一起，几乎迈不开步子去喝酒了。关于他的描述令人心向往之，头靠在某人的腿上，在一家低级地下饮食店，温柔而严肃地谈论商业周期。他丝毫也不会改变。凯恩斯先生<sup>2</sup>生病了，住在疗养院：如果人们去看他，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他一分钟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他的床上都是期刊杂志，周围的病房住着肥胖的同龄人，试图要减肥。每天他们开展竞技活动，并向凯恩斯先生报告结果。他管他们叫大象。1939年前后将会有一场新的艾耶尔危机。你必须原谅我对此纠缠不休，但能否在美国对他采取一点措施？他现在真的很有名了，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说话肆无忌惮的孩子。如果他出版一本巨著，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你能帮忙，那将会对整个世界大有好处，我会感激不尽，如果你告诉我。牛津诸学院荒唐地害怕他，难道他不能被邀请去美国讲学一个学期吗，在美国某个很著名的地方，即使不是哈佛？还有，他和勒内的生活也陷入危机了，我不能告诉你我现在多么佩服玛丽安<sup>3</sup>的分析，说得确切一点，是对此事的预测，在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美国也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场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取决于环境因素而非永久性的情感状况。现在我不敢说得比这更多

1 华莱士·诺特斯坦（1878—1969），17世纪英国史学家，1928—1947年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林教授。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经济学家（1942年受封为提尔顿的凯恩斯男爵），5月患心脏病。

3 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了。你们是否会都到这儿，考察一下形势，现在形势还绝谈不上绝望或是悲惨，只是在走下坡路。在全灵学院我们选拔了一位来自巴利奥学院的年轻人，名叫斯图尔特·汉普希尔，我喜欢他；另一个叫鲁斯，佩尔斯和索尔特的门生，我就很不那么喜欢了，他是个颇为得力的温切斯特学院式的雇佣文人。我吃惊地告诉你，克罗斯曼也许要离开我们。我担心对我们来说，这非但无益，反倒是更大的损失。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我们需要留住他，没有害处。如果他走了，那就将给我造成小损失。我想我能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真的必须停笔了，你知道。多语症是不太有吸引力的特质，应该受到约束。

还有一件事：我一个年轻的学生，名叫帕特·诺维尔·史密斯<sup>1</sup>，是持激进观点的哲学学者。他本人是一个机灵、有点孩子气的小个子，聪明、举止得体、勤奋刻苦、整洁、有责任心、有点做作，非常像他的父亲，一位专业的、心胸宽广的前牛津人和中学校长——国际联盟的总秘书长。帕特作为英联邦研究员要动身去剑桥，他将会受到C.I.刘易斯的辅导。我想他在你看来会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你不必为他费心，但是如果他来看你，我向你热情地推荐他。他说不上有趣，但却聪明、灵巧，而且我想，非常机灵。他今年拿了古典人文学的一等学位，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他请我把他推荐给你。他是在温切斯特受的教育，是个好孩子，受到所有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的喜爱，包括我在内。他具有讨人喜欢的魅力。

我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和玛丽安？你们何时才回欧洲？我不能相信我可以漂洋过海，尽管莫里斯对哈佛学生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热情洋溢，他们显然表示出了妥当的敬意。他对尼古拉斯·M.巴特勒博士<sup>2</sup>过分严厉，却令人愤恨地尊敬柯南特<sup>3</sup>。对此我会写信给玛丽安继续说，很快。

---

1 帕特里克·贺拉斯·诺维尔—史密斯（1914年出生），1933—1937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7—1939年在哈佛大学任英联邦研究员，1939—1945年在军队服役，1946—1957年任三一学院哲学研究员和讲师。

2 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1862—1947），1902—194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3 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1893—1978），有机化学家、教育家，1933—1953年任哈佛大学校

爱你们的

沙耶·B.

“马克思”明年面世，“休谟”1940年。<sup>1</sup>

我无法把这封信读一遍，我希望它不是过于无休止的东拉西扯，而且还能有点可读性。

致玛丽·伯林

星期四 [1937年9月初]

伦敦西1区，英国—巴勒斯坦俱乐部

亲爱的妈妈：

我们刚在这里吃了一顿不错的饭：食物很新鲜，便宜，上菜服务也很好。这里是素食主义饭店的氛围，而不是犹太餐馆的氛围。我星期二从巴黎到达伦敦。你一定要经过巴黎，看看展览<sup>2</sup>，里面的东西不是非常有趣，但是总体气氛却快活得令人惊叹。家里就不喧闹了：女佣安静、有礼貌、有效率。我在家吃午饭。在城里和爸爸吃晚饭。迄今为止我们吃的都是犹太食物，而不是什么“异邦”食物。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不是工作日，你的丈夫喜欢“娱乐活动”<sup>3</sup>，我想我们要去布莱顿度过一个长周末，在星期中间回来。菲利普太太<sup>4</sup>说霍利克罗夫特大街53号是非常体面的犹太人家家庭旅馆，也许你回来时我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直到你找到女佣。不

253

长。

- 1 从致法兰克福特的信（7月23日）来看，显然，伯林此时计划写一本关于休谟的书（参见上文第144页），但是这本书没有写出来。1940年2月13日，伊扎克·萨姆诺夫写信给伯林的父母：“他现在在写休谟吗？我希望那会是一本和《卡尔·马克思》一样吸引人的书。”
- 2 巴黎世博会（现代生活艺术与科技国际博览会），1937年5月—11月。
- 3 伯林此处原文为：развлечения。
- 4 克拉丽丝·菲利普（原文如此）（1888—1971），伯林家的近邻和朋友。她和她的丈夫奥斯卡（下文第373页注6）住在冯克罗夫特大街，毗邻霍利克罗夫特大街：从菲利普家可以看得见到伯林家，见第4页地图。

管怎样，我打算试试那里。晚饭后，我们回家，没有出门，安静得多也舒服得多。

我希望里加<sup>1</sup>很好：当然替我向所有的人问好：他们很长寿，例如贝尼斯·伯林<sup>2</sup>、沙耶·伯林先生<sup>3</sup>，等等。我的朋友罗斯柴尔德<sup>4</sup>也在这里，但是我不能祝贺他！

你的

沙耶

致本·尼克尔森

[1937年9月底?]

发自全灵学院

亲爱的本：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sup>5</sup>首先，你对威尼斯的感受，我很有共鸣，太有共鸣了，我几乎为你也有这样的感受而感到高兴，虽然我觉得这让我很难为情、很痛苦。这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最不真实的城市。亨利·詹姆斯关于欧洲客厅的说法不仅是不真实的，而且是侮辱，如果人们感觉和我一样，正如我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你和我的感觉一样。那种幽闭恐怖感，觉得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狭小、惊恐、堕落、反人道、削弱个性而又具腐蚀性的世界，不是什么东西的终结，而是惬意地渐渐沦入绝境，在那个地方，只有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来吞噬自己或是侵犯自己，那是一个封闭而阴森的同类相食的地方，庞大的人群和不希望见到的熟人使那个地方更加凶险，就像熟人

1 玛丽正在探访她在那里的家人。

2 也许是贝纳斯，伯林的曾叔公与过继的曾爷爷、老以赛亚·伯林的侄儿（大约生于1867年），在老以赛亚·伯林去世后（在伯林婴儿时期），贝纳斯与门德尔有短暂的合伙关系。门德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描绘贝纳斯是“最不可预料、不可靠、不诚实的人，撒谎者”。

3 也许是远房亲戚，门德尔、玛丽和以赛亚·伯林1920年回里加时短期住在他家，也许是贝纳斯的妹夫。

4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刚刚继承他的叔叔（莱昂内尔·）瓦尔特·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二世（在8月27日去世，享年69岁，不算高龄），成为罗斯柴尔德勋爵。

5 本的来信日期为1937年9月18日。他对伯林这封信的回信的日期是10月2日。

常常会给你的感觉那样，就像在噩梦里一样。

哦亲爱的，我像往常一样夸张了。我想要说的是，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让我对环境的反应不是很轻松的城市，感觉自己有点发疯。我一个人待了两天，然后盖尔斯·罗伯逊到了，他在外面的世界急促地跑来跑去，他的八卦消息、他那熟悉的坏心眼、他的喜乐、牛津和剑桥又回来了，于是我恢复了平静。为此我当时非常感激他，但是在他到达之前我还是发出了几封疯狂的信和电报。

254

我并不想以这样的语调开始这封信：但现在威尼斯对我是个象征了，我对亨利·詹姆斯与日俱增的厌恶是这个象征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没有不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具有骇人的特性，他们不让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寻找体验，挖掘体验，有时候还搜索体验：他们就像情感吸血鬼那样准备好吸取和积累：永远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恐惧是，这样的体验也许会不足，也许会没有足够的血液，也许血有一天会流干：而且最坏的是，他们根本就不能在这样的寻找中活下来，于是逃避。他们把躲避开的危机堆积在身后，密密麻麻，一层又一层，这些经过精心包扎的情感和智力事件数量巨大，它们被绳索迅速地捆绑好，害怕它们爆炸、导致粗俗的屈辱、高潮发生在结束之前而不引向其他情景。这些拙劣地混杂起来的死亡物质，或者不如说是死气沉沉的物质，就是读者所读到的东西。我不喜欢它，但是又崇拜它：我崇拜它，因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亨利·詹姆斯探查并确立了一个真相，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它是真的：最可怕的悲剧，最戏剧化、最刺激、最动人、最真实的灾难所发生的地方，人们什么都不做，只是谈话和理解，在别人靠近的时候拘谨地发抖，在信封上写字，或是见到帘穗举起都会引起一场混乱，比所谓的行动可能导致的混乱更为强烈。我立即承认我憎恶曙光，我不相信所有原色、所有貌似坚实的基本情感关系、所有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三维结构，在被更仔细审视时，它们分裂成无限渐变的几乎不可分隔的乳白色（参见H.A.L.F.，你还记得达尔比先生的叙述吗？）<sup>1</sup>阴影，它们融合、消失，以及它们的孤立存在都是真实的，于是仅以它们就能

1 见1936年7月29日致盖尔斯·罗伯逊的信。上文第220页。



适当地描述一切了。普鲁斯特，在他的叙述中更尖锐、更大胆，因为别人（包括你自己）已不能（或者躲避了）探究和描述情感、动机、表象，而他完成了这样的探究和描述，于是就诱使我们接受那个错误的命题，即仅仅这个是真的，因此对普通人或是普通小说家来说，别的什么都不会过于吓人或是过于模棱两可了。从一开始，我就否认：没有人生活在阳光之下，所有的关系都是掠夺性的，一个人必须吃人或者被吃，一切都处于不平衡与紧张中，敏感和仁慈因此就成为仅有的真实美德（加上在某地、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聪明），它们当然一定是在战时、在前线、在距离红十字急救站不远，在那里不能期望有和平，那些宣称的停战日不过是为了缓解紧张气氛，

255 为筹措新军备提供时间。粗俗地说，这也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假想，即每个人宣讲仁慈和宽容的必要，但对人与人之间不断的侵犯、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情感的剥削以及同类相食却无动于衷，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这些更让我不喜欢的了。

这会儿有人叫我去，虽然我不打算重读一遍我写的东西，我对自己强烈的情绪和把一封私信转变成一篇宣传文章的动机感到吃惊。让我们说回私人话题吧。萨尔茨堡总的说来很令人享受，雨、狭窄的房间等使弗朗西斯一周的期望落空了，这加剧了他天生的缺乏自信与自我折磨的倾向，也许使他痛苦。里德利们，我指的是J.和克里西达·B.C.<sup>1</sup>到了，说在他们看来，弗朗西斯很不快活，他们这话暗示我们对此视若无睹，什么也不做，简直就是怪兽，等等。我不认为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存在。弗朗西斯啃咬着自己，扭曲自己，做出种种痛苦的姿势，这些是真的。但这并不是剧变，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压倒一切的无聊感突然占据了他的心灵，这是现挣现吃、勉强应付、日复一日、不连续的紧张痛苦状态，任何事都能短时间内治愈它，但没有任何事可以对它的产生负责。我怀疑里德利在找事，不一定像罗莎蒙德·莱曼那样，是出于对他人明确的爱，而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

---

1 （海伦·劳拉·）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1917—1998），莫里斯·伯纳姆·卡特爵士与维奥拉·伯纳姆·卡特夫人的女儿，1939年与杰斯帕结婚。

现在说到那件斗篷<sup>1</sup>：这个丑陋的谣言部分是有点道理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最好称为斗篷，我拥有它至今已经五年，是受了霍奇金兄弟的影响买的，它丑陋、深蓝色、没有形状，在奥地利像热带地区一样的雨天里极其有用，很温暖，只在奥地利糟糕的天气里才穿，和它搭配的是一顶丑陋扁平的德国式帽子，这件斗篷是奥地利资产阶级城里人的外套，但帽子却是最底层的中产阶级戴的。那顶帽子，我得承认，是蒂罗尔式的，它没有毛刷式的饰物，没有羽毛、缎带，也没有什么形状，同样只有在雨天里才戴，很暖和，又防水。没有人觉得那件斗篷有什么艺术价值（它的确没有），我戴着它也没人说什么：斯图尔特和卡[梅伦]太太正式赞扬过它。而那顶帽子，由于它绝对丑陋，遭到斯图尔特的严厉抨击，但是既然我戴上它并不意味着什么，它既不是什么象征、姿态，也不表示什么心理状态，所以它也被接受了。直到里德利要了这顶帽子，使它变成了可怕的东西，如果是斯图尔特戴它，那也只不过是怪异丑陋，如果是我戴它，那也还说得过去。我把帽子给了里德利，松了一口气，十分开心，他戴着它看上去很英俊，就像中欧人，他的女伴B.C.小姐对如此突然的抢掠表示抗议，但是别人什么都不许她

256

说。我和他们的会面充满了最强烈的难为情：无法说出原因，这主要是里德利的错：他感到拘束，语速比以往快，抓住了一个话题，就绝不放弃，如果谁哪怕是稍微表示要转移一下这个题目，他都觉得自己被激怒或是受到侮辱了。B.C.小姐极为紧张，害怕有什么可怕的事，伤及虚荣或是误解，解释不当，而且不看我（斯图尔特受到的有关她的指控，我相信）。我因为尴尬而激动，网球越打越快——这实际上更像是羽毛球，球斜着飞过来，如果斜着把它打回去，打到它制作粗劣的羽毛部分，球就沿着意想不到的角度飞出去，如果它落下来，下落的姿态也很不雅，这球很晦气，它不会回弹，而是停在一边，只能让人笨拙地捡起它——和里德利一起，然后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离开，一无所得，只是表现出了我们的风格。每次见到她，

---

1 在尼克森9月18日的信中记录了“邪恶的谣言……说有人在萨尔茨堡看见你身披蒂罗尔式的斗篷，头戴蒂罗尔式的帽子，被里德利一把抢走，后来又被子德利太太重重踩在地上”。这件斗篷出现在图14中——在法国。

总是跟他在一起——我所有的调解才能都无用武之地——结果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习惯之中，只有难为情。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再没去见她，这有点讨厌。至于斯图尔特，为什么他主动对她表示好感就那么重要？我相信，他很喜欢[她]，但还是那个问题，只要单独和里德利在一起，与她见面，这出戏的舞台就是里德利的，目标以他那种奇特的方式设立了，正常关系变得不可能。如果你想让他们在一起，既不产生摩擦也不显得勉强，你得让他们去没有里德利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你和华莱士都精力充沛地包围这座不论攻占与否都无关紧要的要塞呢？请解释，我对此有兴趣。<sup>1</sup>

这件斗篷留在了一个座位上，被拿到警察局去了，斯图尔特试图领回它，但没成功，因为他不熟悉奥地利的官员，我请佩尔斯（他的妻子在萨尔茨堡比在牛津还可怕，不可言说。学术女黑人太好了）帮我取它，因为我必须离开，把这件斗篷给里德利，如果他不想要（显然他不会不想要）。但你说里德利太太要它来做什么？把它扔到地上？追逐它？限制它？你的那个词我念不来<sup>2</sup>：人怎么能限制一件斗篷？追逐斗篷我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副充满生气的美丽画面，但是那不是你说的吗？也请解释这句话。里德利和B.C.小姐简直非常不想见我们，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尤其使她难为情了，也  
257 欢迎你解释这一点。<sup>3</sup>请研究并告诉我结果：我不喜欢模棱两可的情景，我无法自己来探究这一切，不能因此改变这种状况：我就指望你能够准确了解此事。我总是不明白别人的感受。在萨尔茨堡必须使用，也的确使用了手腕：否则就有摩擦了：真讨厌。我只从舒适方面来分析一切，我认为她的情绪被严重地卷入其中，于是这种态度变得轻浮和粗鄙：也许我又错了，你还得阐明一下这件事：我非常信任你的敏锐。

比埃维耶：我本没想要见他，他对我而言毫无意义，也许只是有点好

1 本·尼克森10月2日的认真回信无法简短概括，但是开头是这样的：“这当然部分是一个人的天然喜好，想使非常不错，却又因为荒谬的肤浅理由而彼此害怕的两个人互相认识。”他还热心于防止全灵学院与伦敦大学之间产生“裂痕”。

2 在同一封信中，本·尼克森写道：“我希望我写的是‘追逐’这个好词，但实际上我用的是完美的英文词‘重击’，像咖啡或是花岗岩。”

3 本·尼克森解释说，克里西达不赞同伯林即使是在萨尔茨堡也表现得像个牛津要人：“她有一种‘全灵学院的人8月都在萨尔茨堡偶遇’[原文如此]的概念，很令人不满。”

玩而已。斯图尔特不太坚决,但是他不同意,这件事就没成:为此我也没有让我的学生来。事实上,我们不被纠缠的计划令人惊奇地成功实现了。在萨尔茨堡,这是绝对关键的。这使我面对广义上的帮伙问题。我赞成帮伙,斯图尔特反对。他正确地指出,在公众面前生活是令人讨厌的,三个人在一起就会导致混乱局面,因为即使在非情爱的关系中,假如有A, B, C三人, B可能会告诉C,他根本就不理解A,这种情况总是会有,而反之亦然,于是麻烦就产生了。所有这一切都对。另一方面,我要引用我那高贵的19世纪俄罗斯人说的话,坚持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事物才值得发展,除非一个人是非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隐士,才能通过被观察和他人的反应而取得巨大的收益,人永远都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或感受到什么,除非这个人说出来,而且是在一定的语境和地方说出来,那里没有限制,只有绝对的信心,一面无私的友谊之墙使人避免了在公开场合中约束人的一切事物,甚至独自一人,他也可以面对一个敌对的(真实的或是想象中的,这无关紧要)世界,在这个人们居住的文明地域,人是自由的、自然的、快乐的,这一切的形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自发讨论机制的建立,非自我意识,无法法规则的交流,没有可遵循的标准,人知道自己的话语受到重视,仅仅只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话语,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相关、内容、影响力与意图,于是才有了我的亲俄罗斯、反佛罗伦萨的本性。你每天给B.C.家的信在我看来——我是坚持这类学说的——十分出色,尤其是自然的叙述,不是刻意的堆珠砌玉,不是崇拜和批评,而是信赖与喜爱的累加效果。是否只有我坚持认为,如果人打算表达自己,而不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私人的、处处是鬼魂和恐怖景象的世界中,就必须能够经常向别人简单而又大量地表达自己?普鲁斯特说朋友浪费时间,真正的世界是一个艺术家得以放松地退居的私人天地。这也仅仅是那些受伤的、受辱的、有缺陷的人的观点,即使他们只热爱真理,即使他们是天才。神秘主义的偏执狂、诗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也许能够加剧自己的恐惧症以达到天才的境界,但是作为生活品质,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激烈反对的了。他们之外有其他人存在,人和人相互喜欢而不求回报,窗口才可以保持敞开。我永远都不会停止相信,因此我逃入

19世纪的文学中，就像堂吉诃德和他的游侠骑士情结，他常常说高卢的阿玛迪斯不会这么说，希腊的那个贝尔什么的会如何如何做，等等，所以我以赫尔岑或别林斯基对某些事的反应来看：你为这个目的使用了想象的斯图尔特画像（在我看来你似乎大大地把他戏剧化和理想化了，但是这只表明了以上A, B, C模式的正确性，B对C的看法在A看来总是稀奇古怪）：除非人生活在人群之中，尊重这个人群的反应（这样一个人对别人的反应才不会不可信，就像在那些令人半信半疑的情形中那样），人如何能给自己定位？不这么做是最大的灾难。至于盖尔斯，我确实很明白你的意思。杰里米会说他很龌龊：的确，他有一种吹毛求疵、嫉妒、利用他人的性格，我不介意这些，因为我欣赏邪恶的美德，那就是说，他是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能够真正同情一个人所有最低级、最琐屑的失败，而不使人对此感到羞耻，不会通过暗示在道德上使人难堪，在一个充斥着以严格标准对人进行测试的世界，他这种特质是最珍贵的。当一个人所作所为低级时，盖尔斯对他同情的，盖尔斯烦躁、挑剔、喋喋不休，但是有同情心。他的恶意是绝妙的非抑制性的，他有品位，有真正的敏感，他不一本正经，他喜欢人。他的机会主义是高尚的，而他不被喜欢和被轻视的苦恼，使人喜爱他。至于你们的关系，你也许不能真正喜欢一个人，除非你(a)崇拜并且(b)尊敬他。你根本就不崇拜盖尔斯，你只是有选择地尊敬他的几个特质，而不是他这种类型，因此你和他的关系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推理得到的，他有那些特质，值得尊敬，于是你必须尊敬。另外，你不可能认真地不喜欢或者不赞成他，因为你视为神圣的理念，他既没有真正意义上背叛，也从不顶礼膜拜。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总是保持在这种始终不稳定的状态中，牢牢地铆在悬崖边缘，你永远为危险而担心困扰，于是就可能和他发生小争吵，他因此就烦躁而爱激怒人，在小事上不怀好意，但在大事上却心无旁骛地忠实于你。我确信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永远都不可能有大事情发生，不论好还是坏：度量盖尔斯的尺度太狭小了：构成他的材料太昂贵了，不过还是有缺口，被用低劣的材料弥补了：他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时

1 有关这些思想家，见《俄国思想家》。

不时对你庄严的品德发出尖锐的叫声以及细长的微弱呻吟。他对你的依恋要多于你对他的依恋，与给予者相比，这对于接受者——或者至少是被给予者——绝不会令人完全不满。

你对H太太<sup>1</sup>的描绘，我非常喜欢。恰当地说，我还没有见过她，感觉比真的见到她还要更害怕。我必须停笔了，要去全灵学院，帮忙改哲学试卷：这场考试像往常一样是家事，有华莱士·戴维斯<sup>2</sup>、弗朗西斯等等，都在。我希望举行一次人数众多的午餐派对，这样的派对之后，总会有人和另外一个不太合适的人结婚。我希望你能在信中简要而出其不意地对我说点野蛮的事（这几乎是直接的手法了），但是不论你是否这样写，你还是要给我写信。我恳请你下学期来看我，说说B.C.的情况。显然，要消除所有的困难是容易的：把虚假的事大题小作一番，是莫大的快乐。

沙耶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37年10月18日星期一之后不久]

全灵学院

亲爱的谢拉：

我们的关系继续良好地发展。<sup>3</sup>关于午餐，我准备好了，准备得非常充分，下星期三请你和阿格尼斯<sup>4</sup>来，假如你允许我，作为回报，同时邀请博厄斯和佩尔斯夫妇<sup>5</sup>：对于博厄斯，我并不坚持，但是我请求一定让佩尔斯夫

1 玛丽·哈钦森。

2 亨利·维特克里夫（“比尔”）·戴维斯（原文如此）（1914—1942），共产主义者；1933—1937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古典学专业，1938—194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42年2月27日在爪哇海战役的海军军事行动中阵亡。

3 谢拉·格兰特·达夫在10月18日的来信中问：“我们的关系依然非常诚挚吗？”

4 阿格尼丝·海德勒姆—莫雷（1902—1986），谢拉·格兰特·达夫的政治经济学导师；著有《欧洲新民主宪法：战后欧洲宪法比较研究，包括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牛津，1928），1932—1970年任圣休学院研究员与历史政治学导师。

5 理查德·佩尔斯和他的妻子詹妮特。

妇来：麦卡特尼<sup>1</sup>似乎不在这里：如果他来了，他那恶毒的妻子也要接到邀请。260 这些情况你能接受吗？我感到这就像人们在市场上头脑清醒地讨价还价。请告诉我你的最低要求。考虑到如果你和其他客人一起走了，那这次聚会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请你留下来——让阿格尼丝小姐先走，也许你可以留下，一直到喝完茶。请告诉我你默认这一切的安排，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我将热切地盼望这次聚会。<sup>2</sup>

爱你的  
沙耶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8年1月5日

滨海博利厄<sup>3</sup>，布里斯托酒店  
发自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这个海滨避寒胜地阴郁而无趣，令人难以置信。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因为我想把马克思写完，我要完成马克思这本书，同时又不能使自己彻底与世隔绝，如果处于绝对的孤独中，我会发疯的。于是我住在豪华酒店，有强烈的小资感觉：看着西蒙爵士<sup>4</sup>和你的叔叔坐在异国情调的花园树下：不过写得很快，速度令人吃惊。天气很好，这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天气给许多讨厌的人带来公开的快乐。真的你应该来这里，了解一下这个在1880至1890年间制造出无政府主义者和炸药手的社会。你是否认识他们，拉瓦科尔<sup>5</sup>、

1 卡利·埃尔默·麦卡特尼（1895—1978），研究匈牙利的专家和作家；与保加利亚女人内德拉·玛玛切夫结婚；1928—1936年为国际联盟情报部工作（在马克斯韦尔·加内特手下），1936—1965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2 在这里，伯林写下了“戈伦韦”，但是又把它删去了，并注释说：“这是新的迫害方法，我抱歉。但我此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只是一个用于阐明问题的例子，不是真实的。”

3 Beaulieu-sur-Mer位于法国南海岸尼斯以东七公里。

4 约翰·奥斯布鲁克·西蒙爵士（1873—1954），律师、自由派政治家，1937—1940年任财政大臣，1940年成为斯塔克珀尔·艾利多的西蒙子爵一世。

5 弗朗索瓦·克劳迪阿斯·肯宁斯坦（“拉瓦科尔”）（1859—1892），荷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威兰特<sup>1</sup>等人？极端可怕的人，但也很有趣。我在读赫尔岑，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喜欢他的修辞、他的单调以及一切。他对英国人的描述的确很贴切，他坚持认为德国人把英语看做跟他们自己同样的商品的高级品牌，在完全不必要时用英文而不是德文说“是”。

如果我给你买一本《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否会读它？我对那份评论季刊还没有失去希望；<sup>2</sup>但关于这份季刊和它的运营方式，想法却乱成一片。1月到2月你是否会在伦敦？或者你会在牛津住一个晚上吗？一定要写信，因为我想见你。汉弗莱·豪斯写了一本奇怪而又吓人的小册子，题为“我用我的小眼睛偷窥”<sup>3</sup>，并通过伊丽莎白[·鲍恩]把它寄给了[威廉·]普罗默。这本小册子十分偏执，宣告它与遥远的弥尔顿之间的亲密关系，攻击艾略特对希腊语的无知。要么不是那本小册子，反对英国在印度的那本，而是附在它后面的那封信。我颤抖地想，在这个有许多低劣的穆尔克·阿南德<sup>4</sup>的同质社会，他那天生就十分丰茂的心灵容易想到许多又长又黑又潮湿的爬行动物，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老实说，我害怕右翼—左翼、神秘—肉体之间的暴力，倒转了的叶芝·布朗<sup>5</sup>。不过这也许纯属我的个人幻想。由于无法形容的、四处繁盛生长的生物，我似乎内心怀有高度恶意，如莫尔会说的那样。给我写信。

沙耶

---

1892年3月在克里希和富尔米引爆炸弹。

- 1 奥古斯特·威兰特(1861—1894)，法国无政府主义者，1893年12月9日在法国议院引爆炸弹。
- 2 1937年10月22日斯蒂芬·斯彭德的信中提到在霍格斯出版社与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就该出版计划进行讨论，并建议找其他可能的出版商。看来柏林似乎也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了计划。
- 3 来源不能确定。
- 4 穆尔克·拉吉·阿南德(1905年出生)，印度小说家。
- 5 弗朗西斯·查尔斯·克雷朋·叶芝—布朗(1886—1944)，作家，曾在印度服役，从事有关印度题材的写作；他从实施身体暴力行为(作为“孟加拉长矛轻骑兵”)转而爱好瑜伽和印度哲学。豪斯的转变方向似乎与他相反。



## 致伊丽莎白·鲍恩

[1938年1月?]

滨海博利厄, 布里斯托酒店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一直打算写信来着, 但如此低级的生活使我除了完成日常工作, 什么也干不了。我每天状态神勇地写马克思, 一本计划256页的书, 我已经写到第290页了, 仿佛要仓促地兑现承诺, 在1937年秋季之前完成这本书。

262 我一们家住的酒店很糟糕, 我不能用更简单或是更有意义的词了。它是最糟糕意义上的英国人酒店, 里面也住了一两名德国人, 如伟大的赫尔岑在19世纪初发现的(这句话真的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与英国人相比, 德国认为自己是同一台机器生产出的劣质产品, 同一棵树上结出的粗劣果实, 加上相应的行为, 就成为糟糕的英国人。这些行为是: 一个英国帆船运动员加上一个讨厌的、外表还算好看的、长得像鱼似的妻子, 一个世故的美国电影人: 查尔斯·劳顿<sup>1</sup>住了两天(极其兴奋), 以及一位前肯辛顿市长, 每天建议我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登高到拉特比<sup>2</sup>, 试着感受艾略特先生说 he 感受到的荒凉感, 喜欢在那里的感觉, 除此之外, 我感觉不到快乐。但马克思传却进展顺利, 只需再写一章半便可完成, 我忧郁地感到满意, 不过是真的满意。在这个可憎、混乱的动物园中, 很难不加入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 或是任何一派。没有感觉, 没有行为, 甚至也没有规矩: 我很喜欢小资产阶级, 在他们那里至少能发生一些事, 真的, 难以置信的事。我去尼斯看了歌剧, 很吓人, 为了和比我阶层低的邻居聊天, 他们至少提供了生活色彩。<sup>3</sup>我的父母对我很有耐心, 社会愤怒以前从来没有震撼过我: 无疑, 当我回到全灵学院, 罗斯、鲁斯、里斯等人会使我重新接受温和变革。同时

1 查尔斯·劳顿(1899—1962), 电影演员, 出生于英国, 以扮演亨利八世(《亨利八世的私生活》, 1933)与布莱船长(《叛舰喋血记》, 1935)等角色而著名。

2 博利厄的一座美丽村庄, 以罗马帝国遗迹与极佳的风光而著名。T.S.艾略特在手术后的康复期, 即1925年11月至12月住在那里的萨沃伊酒店, 并着手准备他1926年所做的关于玄学派诗歌的克拉克讲座。

3 即本地色彩。

我要大声抗议：我像一个烦躁的、领取周薪的奴隶，写着关于马克思的书，心中充满社会自卑感。这里（新闻界）每个人都提到马尔罗关于西班牙的新书<sup>1</sup>，以及塞利纳先生<sup>2</sup>出乎意料的反犹主义。我买了蒙特兰的书<sup>3</sup>，但是现在我什么也读不了，除了每日的巴黎报纸，读起来有咖啡或者是《北方车站》般惬意的苦味，。这个星期我就回来。

爱你的  
沙耶

这是一封十分愚蠢的信，我想：如果真是这样，请你原谅。离群索居使我对这种喇嘛般的生活条件感到愤怒。

致玛丽·费希尔

转递邮戳日期 [星期三] 1938年1月12日 [明信片]

法国博利厄

一切都没有节制、低俗、奢靡。哪里都听不到一个法语词。只有意大利语和英语。当地的消息提供者对贝克莱先生<sup>4</sup>的名字一无所知。肯辛顿市长 263  
日益熟稔也日益烦人了，旅店老板的儿子在夏纳学哲学，他认为在温泉小城艾克斯莱班受教育更好。我已经向他推荐了比两者都好的夏蒙尼。旅店老板宣称，他后悔没有送儿子去伊顿公学。我星期二回来，参加基督教堂学院的庆典。

沙耶

- 
- 1 《希望》（巴黎，1937），英文版为《希望岁月》（伦敦，1938）。
  - 2 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路易—费迪南德·迪斯图奇（1894—1961）的笔名，法国医生、作家。他的三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屠杀琐事》于1937年出现在巴黎。
  - 3 亨利·德·蒙特兰（1896—1972），法国小说家，还写了游记《南方的尖塔》（巴黎，1937）。这里无法确认伯林指的是哪一本。
  - 4 乔治·菲茨—哈丁吉·贝克莱（1870—1955），1889—1893年在基布尔学院主修历史，玛丽·费希尔父母的朋友；玛丽认为他此时就在博利厄或者附近，也许在写他的三卷本《意大利的形成》（剑桥，1932—1940，1968年再版），该书系他与第二任妻子琼合作完成的。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二 [1938年1月13日之后]

全灵学院

亲爱的妈、爸：

我很抱歉，我们才说了那么一会儿的话——昨晚打电话的时候，我的房间里都是学生。我9:30就起床了，11点上床睡觉。有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我在图书馆写马克思传记（例如，星期天我就从12点到1点，或是3点到5点），或者从4:15到7点，所以我的写作在进展中。汉普希尔在伦敦患了肺炎（这是受了全灵学院空气等的影响），于是我没有人可以说话，只能更勤奋地工作。

在基督教堂学院我坐在名叫克莱夫的秘密犹太人旁边，他在厄兰格银行<sup>1</sup>工作，只有犹太人，尤其是想假装自己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才会像他那样称赞布鲁姆<sup>2</sup>，我的另一边坐着一位虚张声势的BBC工作人员，他说不论我何时想得到演出票，他都会送给我。小萨彻先生<sup>3</sup>今天来接受教育了，他长得像他的母亲，有一副纤细而粗俗的曼彻斯特嗓音，我相信我们可以处得很好，至少我希望如此。鲍拉先生很好，玛丽·费希尔也很好，他们都向你们问好。杰伊和索尔特都预测了1940至1941年之间的衰退，那个时候军备热将告结束，但这种衰退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制造业（例如棉）又会发达起来。但是即将到来的衰退是可怕的，也许现在已经到来了，只是由于军备开销人为转移了大家的视线。这些听起来都很合理，因而就有了巅峰的兴盛期与压抑的衰落期的混合气氛，就像在这剂阿司匹林产生的药效之下，头痛被压抑，一旦药效消失，头痛症状就会立即重新出现：当然除非有一场战争介入，就像1914年衰落与战争同时开始一样。哈罗德·尼克尔森在

1 厄兰格家族的银行设在法兰克福、巴黎和伦敦。

2 莱昂·布鲁姆（1872—1950），第一位犹太裔（同时还是首位社会主义者）法兰西首相。

3 加布里尔·戴维·萨彻（1920—2001），1937—1940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他的哥哥迈克尔·摩西·萨彻（1917—1986，同样主修PPE专业），比他早两年就读于新学院。

这里吃完饭，坐在我旁边，非常和蔼可亲，他说做一名全灵学院的研究员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他参加选聘失败了。<sup>1</sup> 264  
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一个有趣、聪明，但是不太好的人，有点龌龊心理，像W.伍尔夫，但是没有她那么尖刻。卡尔先生，写巴枯宁的，给我写了一封很讨我欢喜的信<sup>2</sup>，我回信的时候会转寄给你们看。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强大的评论家，可怜的作者们必须奉承讨好我。很快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可怜的作者了，费希尔太太已经提出来帮我校对书稿。我很健康，很快乐。

爱你们的  
沙耶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38年1月14日之后]

全灵学院

亲爱的爸、妈：

谢谢你们来信。我还是很好，工作相当努力，又写完一章了，还要再写一章半，随信附上卡尔的来信，不要销毁，我写信写得有点累了，刚刚给他写了五页有关巴枯宁的信<sup>3</sup>：毕竟他是一位教授，也许有点用，所以假如最近没有我的信，请原谅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贝洛夫十五分钟后过来喝茶，和我说说一位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事，还有关于在内盖夫地区开拓殖民地的疯狂提议。星期天11：30左右务必给我打电话。

爱你们的  
沙耶

1 我找不到证据证明此事属实。

2 伯林在《观察家》杂志上（1937年12月31日）发表对E.H.卡尔所写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一书的评论文章，卡尔给伯林写了回信作为感谢，回信日期为[1938年]1月6日。

3 这封信现在找不到。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月30日 [1938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伯纳姆·卡特小姐：

你能否来这里和我一起吃饭，在全灵学院，下个月？看起来，在多雨和风暴的2月，邀请任何人进行一趟不太舒适的牛津之旅，似乎都过分了一点儿（被可怕的强风穿过卧室的纸板墙从床上吹起来，这种体验很奇怪，这样的形象更是稀奇古怪，就像德国的《马科斯和莫里茨》故事书<sup>1</sup>中的画面，不过这样的体会是不可言传的），而我只能保证，如果你会来，例如在9日星期三那天，3点钟有克莱斯勒<sup>2</sup>的演出，那本身就是值得一看的场面：而他，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史以来了不起的天才。节目不是太有吸引力：都是装饰音<sup>3</sup>。真的，如果你来吃午饭，我会十分高兴，在那天或是星期三以后，或者任何一个星期三，或者下个月的某一天。

你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938年2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伯纳姆·卡特小姐：

我感激之至。我没有想到马勒—阿斯奎斯<sup>4</sup>下周三来，虽然这不需要

---

1 《马科斯与莫里茨》，儿童书，作者威廉·布什（1832—1908），1865年出版（英译本1874年出版），该书为诗体劝诫故事，讲述两个男孩对他们的邻居搞残酷、危险的恶作剧，最后的结局令人毛骨悚然，这本书当时很有名。

2 弗里茨·克莱斯勒（1875—1962），小提琴家与作曲家。

3 伯林此处原文为：fioriture。

4 电影导演安东尼·阿斯奎斯（1902—1968），克里西达的叔叔，马勒的狂热情人，一位不容忽视的业余音乐家，他在伦敦组织了一次马勒的音乐会。

重新组织，但是需要重新安排一下那天的日程：这样我会心满意足：如果你也去参加马勒的音乐会，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太过度了一点？我不这么看，因为克莱斯勒的演出令人震惊：先是弗兰克奏鸣曲，很快就下降成为普格纳尼—克莱斯勒、纳蒂尼—克莱斯勒、维奥提—克莱斯勒<sup>1</sup>，诸如此类。所以我说关于他的悔恨等等似乎很不对，你还是可以拒绝来。另一位星期三在这里演出的行家是伯特兰·罗素，他的讲座<sup>2</sup>时间在5点，而要去听马勒音乐会最迟也必须乘坐5：50的火车：不过，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的演讲，也许会想去：他真的想挽救他的灵魂，而且在那一刻他也做得非常出色：他的听众很棒，[新]学院院长<sup>3</sup>用法语说他非常权威，整个演出非常庄严<sup>4</sup>，很好。至于火车车次：诚然，11：20从帕丁顿来的火车1：25到，而11：15的火车大约是12：40到，所以后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要合适得多：但是你在这两个时间到我都很高兴，而且我会去接早一班的火车，除非你告知我你乘坐的是晚一班的。

你的  
沙耶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938年2月?]

全灵学院

亲爱的克里西达：

我匆忙之中给你写这封信，向你恳求，如果书到了，千万不要认为必须致谢，真的不必要。萧[伯纳]，我不太有把握：巴塞托<sup>5</sup>，恐怕此时你已经买

- 
- 1 弗里茨·克莱斯勒模仿早期作曲家的风格写了许多作品，并假称这些都是出自那些作曲家之手，1935年他承认那是骗人的玩笑。
  - 2 伯特兰·罗素自1月26日星期三起，在星期三和星期五下午5点在考试学院做讲座，题为“语言与事实”。
  - 3 H.A.L.费希尔。
  - 4 伯林此处原文为：feierlich。
  - 5 《科诺·迪·巴塞托听到的1888—1889年伦敦音乐，及更深入的自传性详情》（伦敦，1937）（科

到了：托尔斯泰<sup>1</sup>，我全心全意地推荐：一个人生命中的插曲在书中是可无限归集的流畅插曲：它就是焦点、标准、弦。一切都与某个现实相像，等等。

我真太享受上个星期三了。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当我和一群有点恶劣的人一起回来的时候，罗伊·F.哈罗德先生和太太有点醉了，非常和蔼。华莱士想知道我们进来的时候，为什么脸上是一副要合谋对付他的表情：我以很不自信、另有含意的声音向他保证，他弄错了。我无法说我有那么开心，因为你公开信守宇宙中被太阳照射的那些部分，它们包含坚实的三维物体，而不是要求立即对之作出反应的、需要触角的光与影的快速连续变化，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而无需保留：我什么都不想坚持，这些状态不能被保留，不能被一次又一次复制，不能被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境，然后又都被拯救和重新审视，并且被重新确认，可以说，这些状态不能具有任何价值或者令人保持兴趣。没有画框的画仅仅是装饰墙纸，碎片只是碎片，而不是超验领域的标识。但是在此刻（我的仇恨在增加，我的学生在等待，在不满，这一切按照我的标准来看都非常不道德），我还是快快跟你说吧，卡夫卡被排除在一般谴责之外：他是幼稚的，并不多愁善感：他的形象栩栩如生、实实在在，没有夸大，没有变小，没有透明，没有过度流动。他的价值观是民主派中产阶级的狂热类型，这种类型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得到如此热烈的维护，看起来简直疯狂而神秘。然而神秘只是因为它们是通过自身，以一种无时间也无空间的方式，被孤立被表现的，不是因为不能表达在世界之外的所见，像真正的神秘主义那样：它几乎是我知道的最现实的宇宙，只不过非常贫瘠，对任何一种低级的触角都没有什么可以想见的用处。所以，这只是一个人朝着自己的方向的夸大，人们为这样的夸大喝彩。唉，我必须走了，非常希望我们再次见面。

你的

沙耶·B.

---

诺·迪·巴赛托后来以萧伯纳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巴赛托的化名音乐评论文章合集。

1 《童年、少年和青年》（1852—1857）。

致门德尔·伯林

[1938年初]<sup>1</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爸爸：

我很高兴，托斯卡尼尼是顶级音乐会的典范（我所欣赏到的这一场），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有一个座位，其余的票也尽可能多弄一点。剩下的很容易处理：最好弄到票，否则售票处会在下一次记起这件事，为难我们。我非常好：这里速记的酬劳是一个小时3英镑，很贵。也许我得开始自己打字？你能否给我买一台打字机并寄过来？我是认真的：我准备每晚把自己写的东西打出来，我想我会学得很快，会真正喜欢打字。下周五我回来。

268

致斯蒂芬·斯彭德

[1938年3月18日之后不久]

全灵学院

亲爱的斯蒂芬：

我希望星期五晚上演出之后<sup>2</sup>能够和你见上长于几分钟的面，但是那天晚上太交际化了：康纳利他们本来就可以让我活跃起来的，更不用说莫尔（很可爱）、伯纳姆·卡特夫人<sup>3</sup>了，她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上流社会女子回报性漫画形象，但愿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一种纽约女主人，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所有严肃的品质都被去除，喜剧的成分大大程式化了。不过我希望说说这出戏，我被它极大地感动了，不是更感动，而是和

1 1938年5月和6月，托斯卡尼尼在伦敦女王音乐厅为BBC指挥一系列音乐会，演奏许多作曲家的作品。

2 《法官的审判》（上文第184页注6，第196页注1），3月18日在群体剧院上演。

3 夏洛特（1893—1989），克里西达的叔叔埃德加·伯纳姆—卡特（1870—1956）爵士的妻子。



读到剧本时一样感动：我现在已经读了两遍剧本，所产生的累加效果很强烈。说到制作，法官有点太性格演员了，他能够把诗歌朗诵成诗歌，但正因为如此，他不能这么做：也许人必须表达出那种徒劳无益、破碎、正直、迂腐的感觉，通过别的方法，而不是使用徒劳、迂腐的声音和念台词的方式：否则就不能成为恰当的普遍象征了；但他很高贵、真诚，没有过度表演：纳粹们演得很好，尤其是他们的头子，他的残暴令人放心，因为我想，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即便是他们，也还是太男孩子气了，不够兽性：我想你不希望他们成为私立学校的受害者，通常意义上的被宠坏的形象，而是野兽般的形象：如果是这样，你就得选择更野蛮的类型。演出本身在我看来好得惊人，效果极佳：除了法官的妻子，她过早而又幼稚地开始激发出自身所有的腐败和可怕的因素：如果让她这个角色逐步发展，是否要比突然爆发，并给所有旧的、坏的、腐败的一切加上省字号更好？整出戏音乐的元素很强，具有很突出的散文剧特征，简直就像一出歌剧中的清唱部分，所以我希望演员们有更好的歌唱嗓音，以更不着痕迹的弱重音来诵读你的诗篇。我现在转而使用“计时”<sup>2</sup>这个之前真念不出来的词。我很不喜欢舞台，从来不去看戏，我更喜欢读剧本，因为在读剧本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念着台词，读这个剧本我听到的是你的声音，除了别的因素之外，要比你的演员们的声音更合适。我现在要读第三遍，所以记住了一部分：整个费德里奥一毁灭的主题令人产生共鸣，我无法言说。我在读衣修午德<sup>3</sup>：有点令人失望，但还不是太强烈的失望，查默斯是谁？有些地方他太愚蠢，对他的描述也太模式化了：还有芒若的情节在我看来太像狄更斯，了解了他是多么徒有虚名的音乐家，知道他的演奏有多糟糕，真是很扫兴。我已经读了夏多布里昂<sup>4</sup>，我认为他非常杰出：堕落，但是纯洁，贝里尼式的坎蒂列那（指旋律

1 伯林此处原文为：gâtés。

2 在第三幕（第66页），一个角色说“以原始时间计时的太阳”。

3 《狮子和影子》（伦敦，1938）。“查默斯”是爱德华·阿普沃德（1903年出生），小学校长、作家。衣修午德曾经在切尔西给比利时小提琴家安德烈·芒若的弦乐四人组当了一年的秘书，后来一直是芒若的分居妻子奥丽芙·芒若（《狮子和影子》中的“舍雷夫人”）的朋友，和她有恋情。

4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勒内，夏多布里昂子爵（1768—1848），法国政治家（曾忠诚于不同派

优美流畅的抒情器乐曲或声乐曲或其乐段。——译者注), 疏离、强化、装饰基本情感的强大能力, 尽管是新中世纪风格, 尽管是华而不实的文体, 他的散文体确实高贵、富于表现力, 具有弥尔顿的特点, 从每句的开始就创造出宏大的力量和美。你读过他的书吗? 我想见见[你]和伊内兹。这周或是下周, 甚至下周以后, 我是否可以来和你们一起喝茶? 希望你的书得到好评, 我还没有读到有关评论。我想自己从某个人那里听说, 戈伦韦很是愤怒, 因为莱昂内尔·黑尔<sup>1</sup>出言不逊: 你会这么认为, 他向来都是令人厌恶而且卑鄙的人, 是河畔唯美主义者, 为数寥寥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外行, 时机成熟时就是个基督教法西斯。

沙耶

致玛丽·费希尔

邮戳日期1938年4月15日 [明信片]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我希望我能来: 但是我的日子充斥着一种新的不舒适。我开始口述马克思传记让人记录, 我的打字员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讨厌而且让我感到羞耻: 比如, 我说“后来”, 她打下“信件”; 我说“犹太人”, 她打出“到期”: 这太糟糕了, 把“聪明”打成了“办法”: 我上的演讲技巧课<sup>2</sup>显然什么效果都没有: 打字错误不是因为我的声音含糊不清, 而是因为它是上流社会的口音。这本书太长了, 是预想的两倍半: 我也许要办一件大胆的事, 提议在不久的将来就此拜访一下你的父亲: 那天我突然把道格拉斯看做堂·乔 [万

270

别)、作家、有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伯林也许指的是夏多布里昂死后出版的自传《墓畔回忆录》(巴黎, 1849—1850), 伯林提到他在北美和欧洲的旅行, 或者是他的小说《阿塔拉》(1801)和《勒内》(1802), 他的作品中对基督教的颂扬似乎不太可能令伯林产生热情。

- 1 莱昂内尔·拉姆赛·黑尔(1909—1977), 记者、剧作家, 1937—1940年任《新闻纪事》的戏剧评论员。
- 2 见发自布莱顿的1937年7月致伊丽莎白·鲍恩的信, 以及1937年7月31日致玛丽·费希尔的信, 上文第286页与第291页。

尼],把佩吉看做唱着咏叹调<sup>1</sup>的莱波雷诺了。

两点: 1. 你下周是否在牛津?

2. 7月8日你是否愿意来参加格林德波恩音乐节, 观看《帕斯夸莱先生》<sup>2</sup>? 我有两张票。

致詹妮弗·威廉斯

[1938年?]<sup>3</sup>

全灵学院

亲爱的詹妮弗:

我承认我感到惊奇了, 当你的皮雷小姐<sup>4</sup>听到足有一两页长的句子时, 哼都不哼一声就把它记下来了, 我时不时说, “你可以加入一些括号和逗号, 等等”。她点点头, 好像她一直都认识我似的。我本该感谢你的, 不过, 她顺口说的话还带给我许多题外的快乐: “整篇一直都会这样吗, 先生?” 或是“我想威廉斯小姐是打算读您的书来着, 先生, 不过, 你可让她不太轻松啊”: 我还知道她想要什么: 她希望马克思是个富翁的儿子, 放弃了一切, 最后在距离皮雷小姐家不太远的地方死于贫困之中。我或多或少实现了她的第二个愿望, 但是对于她的第一个愿望, 我无法对她撒谎了: 有一两次她充满渴望地问我, 马克思是否放弃了自己的家庭财产而投身斗争, 我尽可能向她推荐了恩格斯: 有时候, 她会惊呼“您看起来不太喜欢马克思先生”, 我完成[了]关于马克思夫人的满篇华丽辞藻的小短文后, 她说“她似乎具有所有的美德”。“她很乏味的,”我说。“啊,”皮雷小姐快活地说,“事情从来就不是那样。”她对你的职位感到伤心, 怀疑你是否喜欢这份工作, 对

1 在莫扎特的歌剧《堂·乔万尼》中, 堂·乔万尼的仆人莱波雷诺唱给阿尔薇拉听的咏叹调, 列举堂·乔万尼的征战功绩。

2 多尼采蒂的歌剧。

3 见前一封信。

4 也许是内政部的一位速记打字员, 经詹妮弗·威廉斯介绍为伯林工作。

[J.F.] 亨德森先生很同情，在她看来亨德森是应该流眼泪的（也应该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你能否恳请她打字快一点？当我想到要让你来评判这些孤立的句子时，就感到忽冷忽热：这样的想法要排除。道格拉斯本周末在这里，安静、顺从、彬彬有礼、毕恭毕敬、谦虚：我猜想这是因为讨论哲学使他的心中充满了感伤的敬畏之情。今年夏天你会在牛津吗？你会告诉我吗？ 271

沙耶

我忘了汉普斯特广场的号码了，7月你和赫伯特<sup>1</sup>会一起来看《帕斯夸莱先生》吗？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938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克里西达：

布什四重奏乐队<sup>2</sup>、贝多芬、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属于同一个道德空间，那里有清晰划分的边界，严格的价值观体系，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反对，或者最重要的是，可以公开辩护或者攻击，知道因此会得到或者失去什么。我想，说起卡夫卡，我指的是《城堡》，而不是《中国长城》<sup>3</sup>，关于这篇小说我想说：亨利·詹姆斯和德彪西都很精确，极其正确，但卡夫卡的小说却把正常世界扭曲了不止半个音阶，那样会很可怕：在某种意义上，那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场噩梦是如此清晰，如此出乎意料，它不断产生沮丧感，不管人往哪个方向走，不管人采取何种行动，都会和它相遇，这种沮丧感不是渐生渐长的恐惧或绝望，相反，它给人宽慰，拉辛式的高贵宽慰，小

1 詹妮弗·威廉斯和赫伯特·哈特于1937至1939年一起住在汉普斯特广场。

2 在伯林（和其他人）看来，两次大战之间最好的弦乐四人组，由阿道夫·布什（1891—1952）组建，成员持坚定的反纳粹立场，在1930年代初期自我放逐，离开德国。

3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所写的短篇小说，写于1918或1919年，生前未发表。

说情节所围绕的角色和特质没有夸张也没有被扭曲，既不是恶意的，也一点儿不神经质，并且，首先它们都是可以传达的，而神秘主义不能也不愿被明确表达，无调主义者都在利用某些东西，发明新的接受方式，把旧的、稍微整理过的牌重洗一遍，因而使人震惊，并唤起被忽略的感受，等等。卡夫卡的人物是精确的、栩栩如生的，他们所承认的价值观是清晰易懂的、为人熟知的，只有当人故意忽略了他的半宗教式的答案与正当理由时，才会产生恐怖：他的意图是，如果你用他的视野来考虑这一切，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怖的。

272 这个反讽不是一个“来自外部的”<sup>1</sup>嘲笑与拙劣模仿，相反，它是任何人对他所处的熟悉的环境，这里指的是他的神秘视野，都会开的、也开得起的正常玩笑，不过对于卡夫卡而言，那些神秘的东西和公共世界的轮廓有关，而不是和私人世界的轮廓有关（尽管所有的翻译者和评论者都谈论他的私密世界，迟钝地误将他的感情深度<sup>2</sup>当作隐私。对于德彪西或是普鲁斯特或者甚至是福斯特先生，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但对卡夫卡则不然。根据事实本身，就外部事务、外交事务、共同世界而言，卡夫卡是一位道家），而且，卡夫卡的视野不像戴十字架的基督徒圣约翰<sup>3</sup>等人那样，是盲目的启示，而是一个用人类行为及其与因果客体的无生命世界之间关系的资料严谨细致地、有条不紊地构建的综合体系，这些资料是经过观察、未经篡改的。其意图是发现并宣布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描述、分析或是解释——这又是资产阶级的美德了，不容侵犯的个人权利的热切运转和贝多芬、托尔斯泰、布什弦乐四重奏等等的主题（在布什家族表演的所有吓人的急口歌中，个人的自我实现与服从法律的自由等等显得无懈可击而且确凿无疑，希望我不必如此频繁地重复布什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傻），以这些音乐进行类比，我承认，一部分在巴托克作品中，一部分在贝尔格作品中，但主要是在全部的四重奏遗作中，尤其是在A小调

1 伯林此处原文为：ab extra。

2 伯林此处原文为：innigkeit。

3 戴十字架的基督徒圣约翰，原名胡安·德·耶普斯·伊·阿尔瓦雷斯（1542—1591），西班牙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加尔默罗修士会改革者。

中,因为那些扭曲,当它们确实发生时,不是对陈词滥调的新用法,而是试图对永恒主题作更深刻、更明确的强调,这迫使人们注意它,甚至害怕它,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赤裸裸的罕见的严肃性。你是否记得在托尔斯泰的书C.A.&Y.<sup>1</sup>中与众不同的叙述?有一个学生,获得了口试中坚持让他不及格的教授的资助,或者大概差不多的那么一个情节:他是作者笔下的一个巨大的人类象征,一个纯粹的卡夫卡式的人物,毫不夸张,不感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令人厌恶,在内心深处也许很粗俗,但极其能令人产生负疚和被感动。然而,施立克的谋杀犯<sup>2</sup>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农民基督徒等等则被排除在外,他们是某些夸张的、非人类的、疯狂的、非世俗的使命的承担者,非常令人恐惧,非常神圣,但他们不是人性化的,与那些常见的、重复出现的、显而易见的问题无关,因此民主派对他们没有兴趣。

我深感抱歉,现在已是凌晨3点钟,我真的不能再往下写了,否则谁知道这封信也许会变得多么长、多么严肃,又多么重复、多么乏味?读它不难,但是说它好就难了,我必须停笔了,反正今晚会见到你。我从上星期一的见面中获取了许多幼稚的快乐:没想到我很享受和华莱士的简短谈话: 273  
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他,只是也许有必要因为他时不时故意的不当行为,以及对弗朗西斯的神圣形象赞赏不足而夸张地惩罚他一下。

我完全同意,人自有飞离未获解释的黑暗、过度赞扬光明以及重复对错的动机,因为人不能不受惩罚地做X, Y和Z,而A和B做了却什么事都没有,而且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很喜欢这样;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人宣布自己只在阳光下交易:公开、清楚地这么说,人对于月亮的酸葡萄心理就是十分可敬的,而且人把这看得太重:人有时候甚至无所顾忌、不无残酷地说,不能够承受阳光的,就根本不能承受审查。最好就不要承受审查,梦游的一方尖刻地回应。而人又对此做出回答;既然是这样的人,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根据一切等价、人不必对任何事大惊小怪的

---

1 《童年、少年和青年》(上文第50页注2)。

2 见上文第211页注1。

道理，这比伪公平更好，只要不引人注目地行动，做个好人就可以了？

你的  
沙耶

我必须立刻说，我非常喜欢读你的来信：你乐于和我讨论，这真是太好了。

1938年夏天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导致《慕尼黑协议》签订，对伯林个人来说，他的主要事件是出版商要求他缩短关于马克思的书稿。由于这本书即将完成，新学院又给他提供了研究员职位，他辞去了一年前通过考试获得、为期七年的全灵学院研究员一职（从1937—1938学年年底生效）。伯林准备搬进新学院。

致汉弗莱·豪斯

邮戳日期1938年8月2日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亲爱的汉弗莱：

我深深抱歉，直到现在才给你写信，不过有个发现让我很沮丧，不算  
274 是太出乎意料的——关于我的书，它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这个发现是，我受托为《家庭大学现代知识丛书》写5万字，结果我实际上写了8.5万字。他们没有办法，只能要求我删减，可是怎么能删去2.5万字呢？<sup>1</sup>无论如何，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到？我原打算自由发挥，有空的时候就修改一下，惬意地调换一下内容，再插入一点别的什么，现在我不幸要遭受折磨了。至少他们不会接受我的大胆计划，原定写一本书，现在变成写两本书，如果他们反对——他们怎么会不反对呢——我就不可能离开伦敦了，只因为我需要这样一个环境，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公开地表现出急躁。你也许想象不到这

1 “我的数学不好。”1988年4月，伯林接受比塔·波拉诺夫斯卡—西古尔斯卡的访谈时说。

种可能性,但这不幸发生了。如果他们真的接受把这本书一分为二,我会三天内写完第一本,然后就有空去你那里,我会很乐于和你待在一起,把这本书写完。我同意,在伦敦市区见面很不好,而且受限制,但是你为什么不过来,在西斯坐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那里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置身于山高路远的地方,而且环境极其宜人,凉爽,人不少也不多,有一两家不讨厌的露天啤酒店,那里有趣,而且不令人反感。这样的会面任何一天都行:我依然希望能去找你;如果不能,你不会过来吗?比如在星期四的下午?

沙耶

致伊丽莎白·乔奇姆<sup>1</sup>

1938年8月5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乔奇姆太太:

我无法说,《泰晤士报》上意外登出的讣告<sup>2</sup>给我带来了多么痛苦的影响。我想说,我,我们哲学界是多么尊敬甚至敬畏您已故的丈夫。早在我遇见他之前,我就意识到在牛津他拥有最杰出、最美丽的哲学头脑,他确实代表了纯粹道德力量与精深欧洲文化的结合体,仅凭他的存在,就创造了标准并使周围环境更加文明。我在新学院遇见他之后,产生了并保持着对他的个人品质的喜爱和景仰。的确,我向您担保,所有与我同时代的哲  
275  
学人,不论观点如何,是否存在认识差异,都深深地欣赏乔奇姆教授。他非凡和谐的一生、他的信念,他的品位,在所有人中,他独自教导他人,照顾他人,他的确拥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观,一[种]综合的人生观,体现在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中,并使我们都认识到高贵的人生观主体,以及在对其真正的培养中度过的一生:仅仅在某一科目上有能力或者甚至表现突

1 伊丽莎白·乔奇姆,哈罗德·亨利·乔奇姆(1868—1938)的遗孀,乔奇姆先生于1919—1935年任新学院逻辑学威克汉姆讲席教授与研究员,1938年7月30日去世。

2 1938年8月2日,第12版。



出,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就,并不能传达这种可能性。我担心我没有说出我想要表达出来的心意——您的丈夫拥有智力、道德、个人方面的高尚与尊贵品质,以及魅力与无私情怀,当别人在议论和挑剔的时候,他不仅进行哲学思考,而且使他的听众和同事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不奢望还能再遇见像他这样的人。我再次恳求您接受我最温暖、最真挚的同情。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请勿烦扰回复此信。

新学院档案

致约翰·希尔顿

[1938年8月?]

霍利克罗夫特大街49号

最亲爱的约翰:

我耐心地坐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等了一整天。所以你看调情和轻狂许诺的后果了吧。我见到了你的表妹兼堂妹<sup>1</sup>,她人很大方,精力充沛,表示出热切想见你的愿望。至于我,我无法形容你对K.马克思的评论往我的伤口上泼了什么样的醋。今天(星期一)我的确要动身去福克斯通(大都会饭店,很开心),要在四天内从我的手稿中删去3万字。<sup>2</sup>上帝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然后我去爱尔兰,在那里一直待到大约9月12日,然后也许去牛津。你什么时候会在波福德?请寄信到福克斯通或是全灵学院:有些事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只要你放弃对我的成见,以为我一般都

276 不在那里或是无所事事。向佩吉转达我的爱,我有十年没有见到她了,真

1 英格丽·沃伯格:见上文第104页注1。

2 伯林的原稿与他的第一份更长的打字稿都几乎完整保存了下来(尽管伯林自称把它们扔了)。也许完整的版本,或者是那些被删除的最重要的段落,有一天能够出版。

的。<sup>1</sup>我心里忠诚地记着她程式化的形象，并渴望见到真实的她。

你的  
沙耶

致门德尔·伯林

星期五 [1938年8月26日, 明信片]

爱尔兰, 安尼朗湖

从删除的角度来看, 我的书可以算完成了: 剩下5.8万字。现在要做的事是: 引文, 插入, 誊抄。的确很好。星期天离开这里, 也许中间会去都柏林一天。

沙耶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938年8月28日]

都柏林, 谢尔本饭店

亲爱的克里西达:

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坐在都柏林谢尔本饭店的读写室里, 左边, 是从西部来的两个渔民, 他们在谈论鱼。而在我的右边(相信我)是叶芝先生, 在角落里向一位年轻的女人以及一位像是她弟弟的<sup>2</sup>人吟唱诗篇。他念的我听得很清楚, 也许是那个女人写的诗, 因为在我听来比较生疏。我被迫独自一人在这里过夜, 在涨潮的时候, 突然见到叶芝先生, 很荒谬也很肃穆。上个星期我是在超乎寻常的原生态并且真的很怡人的湖中岛上度

1 夸张的说法, 据约翰·希尔顿说, 伯林不可能在1930年之前见过她。

2 伊索尔·伊迪斯·曼宁(1900—1984), 通俗小说家, 和她的未婚夫(她在当年晚些时候和他结婚)雷吉纳尔德·雷诺兹(1905—1958)。雷诺兹是贵格会教徒、反战主义者、作家、旅行家, 甘地的朋友。他们长得相像, 所以伯林以为他们是姐弟。叶芝, 几年前与曼宁有过情史, 和她依然保持亲密关系, 8月28日那天在饭店请他们吃饭。

过的，在那里我有机会做了我拿手的奥地利菜[?]。有个人刚刚进来，就立刻讲起话来（对着主人），“你知道我是共和党参议员：从政治角度说，我恨罗斯福<sup>1</sup>，但我喜欢有想法的人……”，等等。这些话本身不是特别有趣：但是，这座城市绝对有令人难以抗拒之处，如果你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倾向性，每个人总是清楚地或是过分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意思，甚至都到了经常撒谎的程度，为了使他们自己也使别人相信他们所拥有的特质，这个国家美丽得不可救药，就像艺术品：草绿得炫目；成行的树、河流，人们的脸庞，都极尽表现力，在这家饭店吸烟室里的人们，不论有没有长着狂乱的眼睛或是胡须，都像是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里面的人物。我事实上又快乐又怀旧，因为，当然，19世纪的一小部分得以保留，这样的事实是异乎寻常的，它本身并不这样令人兴奋。然而住在岛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热爱这样的岛上生活<sup>2</sup>——在烛光下，从容自在地，做个业余垂钓者，享受非常悠闲的感觉，这些就是我对19世纪俄罗斯小贵族们的想象，我所说的我如此喜欢俄罗斯，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指那些真正的贵族生活，那是最可怕、最腐朽也最枯燥的。这又让我们回到赫尔岑这个题目，真的很高兴你喜欢它，你到底觉不觉得它枯燥呢？你看，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法国或者拉丁文学甚于俄罗斯—德国的文学，那么他怎么会不觉得它枯燥呢？至少是在读到冗长的段落的时候？我非常钦佩法国人对第一手体验等的好奇、敏锐，以及一种非感情用事的胃口，就像在比如说狄德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中那样。但是真的，我总体而言恐惧地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没有共鸣：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删减，如此直线式迫切地紧扣要点，只说一遍，然后继续。然而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人总体而言也是如此），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总是描述长期的、实在的感情

---

1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律师、民主党人，1933—1945年大萧条与二战时期美国总统（唯一一位三次连任的美国总统），为应对大萧条，他促成通过他的“新经济法案”。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之后，他使美国参战，他在胜利在望时去世，距离他所促成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召开仅两周。1920年代，他患了脊髓灰质炎，双腿再也没有复原。美国硬币（十分币）上面有他的头像。

2 伯林此处原文为来自希腊语的新造词：nesophile。

与人物，而这不可避免地需要说教，加入不相干的言论；但在另一方面，这很吸引人，不像读像亨利·詹姆斯或是福楼拜的作品时产生的看法，人们在读俄罗斯人的作品时，并不总是意识到它们有多好，或是文字的表现力有多出色：然而在水面之下，作品继续向前发展，我所读到的被吸收与拓展了，甚至没有留意流水的质量，就这样一页一页文字、一段一段描述地读下去，或者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实际上身在水中，水有多深：这就像在读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叶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身体前倾，围坐桌边，点燃的香烟发出微弱的光芒，而他们的说话声被两个美国政客一直喧闹不已的单调声音遮盖了。我希望有勇气向叶芝先生介绍自己，跟他解释说曾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吃午餐，然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明天我去伊丽莎白·卡梅伦那里，然后回牛津。那里开始装修了。我想，艾耶尔太太突然意兴阑珊了，她的木匠不会回复我的信。如果住在爱尔兰，所有的色彩问题会轻而易举地解决。你某一天会来爱尔兰吗？真的，我向你保证，你不会像一个半吊子行家那样好奇地四处张望：你会真正地体验情感。我和考恩<sup>1</sup>聊过，但不会去他家住，我怕他的家人。在长途电话中，他的声音充满柔情，比现实中更亲切，他一直说“嗯？”，我认为，他语言生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里所有的景色。我希望美国人会停止他们的闲聊：此时叶芝先生看起来很高贵。我也收到戴维[·塞西尔]的信了，另一封是本寄来的，他显然很生杰里米的气，于是简短地告诉我他（戴维）是不会让他（本）住下来的，因为杰里米在卡斯尔巴德很嫌恶他；卡斯尔巴德是个丑陋的镇子，我很为戴维难过，他对他称之为“做过一次他母亲”的人<sup>2</sup>的态度很有趣。本对人的判断没有品位，不管怎么说。他刚刚遇见了一个可怕的讨厌鬼，却对人家表示了热烈的仰慕之情。然而，我自问并发现自己是喜欢他的，没有确切的理由，很喜欢，远远多于对杰里米的喜欢。赫尔岑对两者都不会喜欢的，我认为。哦天哪，赫尔岑，再没有别的作家，为人与文笔是我更愿意仿效的了。我同意他的每一个

278

1 考恩·奥尼尔（他的父亲是休·奥尼尔爵士，后来成为拉斯卡文勋爵）一家住在安特里姆郡的巴利米纳。

2 即？

评价与看法, 无论何时, 只要读他的十卷书中的任何部分, 我就会立即被吸引、被打动。那种纯粹的、很生硬的、道德家的态度, 那份机智、恶意、想象力、人性<sup>1</sup>、无拘无束, 只要道德情感能够持续, 就一直在文字中天马行空, 那种快乐、文明感, 等等。我无法形容对他有多么钦佩。他的短篇小说具有微弱的屠格涅夫风格, 但这样又使人更仰慕作者了, 沉闷而高贵的人物, 结尾如此令人感同身受, 对作品的考验真的不是根据读者是否会感到厌烦就可以得出结论的。我必须停笔了, 如果我不打算效法这位作家最不好的特点。三周前, 我的确给你写了信, 就在我们去过剧院之后四天, 信的内容写得很琐碎, 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我想问你是在哪里见到那些马的, 以及帘子所用的材料, 还有许多关于《颓废的巴黎人》<sup>2</sup>的事, 我才看过演出。我的信开始是一张明信片, 然后我从前面一直写到背面, 我找不到能装得下这张明信片的大信封, 于是就放进了两个信封, 我想实际上已经到了要贴上邮票的时候了, 但终究没有把它寄出去, 因为它读起来太傻了。总体而言, 我

279 相信这是一个错误: 人应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并且要甘冒伤害通信人感受的风险。收到因为想写才写出来的信, 是极令人惬意的, 那几乎是最好的事情, 我因此很感激你写给我的信。在烛光下读什么都是令人无比愉快的, 人会读得更慢, 也更享受。我相信, 当你说你的信写得很糟糕等等时, 你的确这样认为, 因为我是多么熟悉这样的感受啊: 此时, 我就在体验着这样的心情, 真的, 不过因为我是个话痨子, 而你并不是, 对我来说这样的体会更符合事实。叶芝先生走了, 美国人令人难以忍受。明天我回到烛光下(不怀好意的话语突然涌上心头——任何人都可以从戴维·W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只要有足够的酒和内尔·格温蜡烛), 我必须写完K.马克思, 现在只要再删掉7000字就行了。这绝对是可恨的过程, 每天晚上我数着一小滴一小滴的血, 读着杯子上的刻度: 所有词藻华丽的段落都没有了, 现在要处理有关事实的部分了, 对此我有报复的快感, 所以删得很高兴。关于赫尔岑, 最后再说一句: 倘若世上有谁能够像他那样说话——参见别人所写的关于他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umanitá*。

2 《颓废的巴黎人》是芭蕾舞剧, 1938年用奥芬巴赫的音乐拼合整理而成。

的回忆录——别人的话就决不会有人愿意倾听了。我对这段非常愚蠢而且又七零八落的文字感到抱歉。

沙耶

我觉得就连这<sup>1</sup>都很吸引人，它吸引人吗？或者都柏林对我而言仅仅是因为读完了《欢迎与告别》<sup>2</sup>就熠熠生辉吗？

我一个字都还没读。即使对我来说，这也绝对是一片不着边际的丛林。至于本、戴维、萨姆森和德利亚，你当然知道那种感受，怀着一种舒服的宿命感，无缘无故地说着自己知道不该说的话；甚至没有感到目眩神迷？

致门德尔·伯林

星期天 [1938年8月28日，明信片]

都柏林，谢尔本饭店

我在这里，又回到文明世界了。明天我要去鲍恩宅邸，在科克郡的吉尔多热里。马克思31日寄出。因为（出版[商]的来信说）允许我多保留6500字<sup>3</sup>，真是如释重负，乌拉！

沙耶

280

1 到目前为止，这封信写着写着，已经写到了另一张卡片上，上面印有绿色三叶草图案以及饭店的名字。

2 爱尔兰作家乔治·莫尔的三卷本自传（1911—1914）。

3 该书出版后字数达到7.5万字。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938年8月28日]

科克郡, 吉尔多热里, 鲍恩宅邸

[……]都柏林极度疯狂了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道歉。由于身处的确很古怪的环境中, [……]被置身于一种状态之中, 周围是叶芝先生, 那位[……]以及参议员们, 等等。无论怎样, 我都处于突出的状态, 就像人步履蹒跚地走完了非常漫长的旅途, 或是在斋戒结束可以进餐的时刻, 突然被所有的伙伴都抛弃了。我身处的场景再一次改变了: 我现在认真地听写自己的手稿, 在一间极其高大、空旷、漂亮的房间里, 点着四根蜡烛, 还有伦勃朗(的)一位将军[?]画像, 这种情景非常戏剧化。蝙蝠飞扑到窗上, 鹭鸟呱呱鸣叫, 人很快乐地慢慢写信。我唯一不变的是对赫尔岑的感觉, 那种公开性与私密性的结合, 既有人道主义又有庄园主式的不可一世, 对笑话以及老派的崇高心领神会。不过我又得停笔了。

伯林

[……]说到帘子, 你是否[……]——这里, 或者到全灵学院: 但是[……]爱尔兰更好, 我现在相信[……]维琴察, 还有大量提埃波罗的巨幅壁画: 你知道海斯<sup>2</sup>吗?

致门德尔·伯林

邮戳日期1938年9月8日 [明信片]

[爱尔兰, 科克郡]

谢谢您的来信。我下周回家。《卡尔·马克思》这个周末就写完了。仅仅是把无法读明白的部分听写下来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今晚在科克, 非

---

1 明信片上的邮票被剪去了, 所以相应文字空缺, 在这里以及后文中, 伯林显然在一开始就询问他8月28日从谢尔本饭店寄出的信(上文第329—333页)。

2 在肯特郡, 靠近福克斯通, 伊丽莎白·鲍恩童年住在那里。

常宜人的一个镇子。

爱您的  
沙耶

281

致门德尔·伯林

邮戳日期 [星期六] 1938年9月10日 [明信片]

鲍恩宅邸

我现在有些明确的计划：马克思星期一寄出，我星期三动身，星期四到达牛津，看着伙计给我的房间刷涂料：也许当晚回家，然后回去搬家具。好吗？<sup>1</sup>你星期一寄信，好吗？如果看上去是比较私人的信件，还寄这儿？

爱你的  
沙耶

伯林回到英格兰，当时正处于政治危机之时。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开始和希特勒进行一系列的会面，就德国吞并苏台德区的要求进行讨论，试图避开战争威胁。9月15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sup>2</sup>首次会面，唤起了战争也许可以避免的希望，但是分歧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准备一直持续到9月29—30日的慕尼黑会议，英国和法国在会议上同意捷克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Plait-il?

2 在那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因误把希特勒当成门卫而闻名。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六 [1938年9月15日之后]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千真万确，我一生中从未要表示这么多的感谢，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我在英格兰与牛津的生活、对于我的情感之母的过度补偿至今已使我所有与生俱来的直接表达个人感受的能力退化了。我必然期望，通过我说的一切别的话语所产生的某种渐增效果，能够表达出我的感激，另一种选择就是可怕的亨利·詹姆斯的迂回方式，通过间接提及某种由于过于神圣而无法开启或是描述的状态等等，来表示感激。这所有的尴尬之情，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过得极其愉快，在这样的快乐中，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回报。理论上，我谴责复杂的付出而后回报的模式，但由于我得到的一切，我感到自己欠缺回报的敏感度，我的心灵因而深受纠缠。我希望，我那众所周知的笨拙的不善适应的性格没有惹得你过分心烦，平静完成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书完全依赖于你了，我的喜爱之情、仰慕之情，以及那千回百转、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都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如果说得出来，我会生气的。我不能再说了，真心希望我表达出了我的意思。还是让我说说接下来的事吧。

——从弗莫伊<sup>1</sup>离开你们大家（我甚至渴望那苦涩的场景），如你所知，我发现自己身边有了沃尔顿太太<sup>2</sup>的陪伴，她和我说话的特别语气适用于文学中的滑稽人物和无赖福斯特<sup>3</sup>的朋友。那就是说，她谈话的语速很慢，

---

1 科克郡的一座城镇。

2 戴安娜·弗洛伦丝·沃尔顿（1904—1983），伊丽莎白·鲍恩的邻居。她的一个儿子记得她说过从弗莫伊和伯林乘火车同行，他说伯林“坚决鄙视任何往窗外看的兴致”。1920年代，她住在艾斯利普，靠近牛津。在那里，作为一位住在附近的美女，她在本科生舞会上很受欢迎。也许这就是她所悼念的“快乐的青春”，也是她为什么遗憾“她丈夫坚定地忠于他在爱尔兰的家”，而她也对这样的安排负有责任。

3 约翰·福斯特据称和戴安娜·沃尔顿的一个亲戚戴安娜·希尔（1911—1998）有绯闻，该说法的真实性也许被伯林夸大了，它可能被夸大很多，福斯特“睡过的女人无以计数，在这点上，20世纪无人可与其匹敌”（根据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0）。

一提到当地生活就道歉，哀叹她丈夫坚定地忠于他在爱尔兰的家<sup>1</sup>，哀叹她那快乐的青春和伦敦岁月；她也抱怨她丈夫头脑愚蠢，预言他在雪利酒会之后，在鲍恩宅邸吃饭并见到列诺克斯·罗宾逊先生<sup>2</sup>时，会举止失当。她猜测以后她就会听说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她厌倦了专门为此编造解释，安抚震惊的邻居们。我以一连串充气浮筒般的、莫里斯式的“是，是”回应着，这鼓励了她，她对我越发亲近了。这时，她的一位朋友来了，打破了这种亲密气氛，他肯定叫瑞吉，也许也叫斯登，或是斯蒂尔登，或是斯蒂恩。他很友善地问候了我，跟我讲侮辱外国火车站长的勇敢故事，沃尔顿太太走了以后，终于只剩我们俩了。于是我们坐下来，讨论了整整一小时的马匹交易，我询问了关于一岁的小马、狩猎用马等问题，对此我真的还不算过分愚钝，在我同伴的眼中也没有看到失望的神色，我确实感到高兴。我了解到科克养马人的许多习惯，证实了总统<sup>3</sup>的血统。总的来说，我和一个高雅的陌生人交往而没有过度丧失尊严，我很享受这份快乐。我们在那列英国火车上变得很亲密，他是个烦人的小个子——车上很挤，我们共享一间包厢。早晨6点，在某个停靠站，穿着睡袍的男人们冲出来买报纸，上面说到张伯伦的旅行。“战争推迟了”，我的马匹交易商说，然后又说了句类似“极好”这样的话，接着又睡着了。我从未，像屠格涅夫会说的那样，再见到他。他是1870年那个时代的底层小市民，维系着和过去的情感纽带，直到人到伦敦才啪地断了。牛津极其迷人，阳光灿烂，镇上空无一人，美丽极了。新学院的院长非常缓慢地散着步，戴着一顶巴拿马帽，罗斯先生很温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恭顺。我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无眠的夜晚，无处不在的不安使我漂浮不定——我肯定你了解这样的状态，处在反常的极度敏感中，无理性的强烈情感，假死状态，直至人到伦敦，这才回复到像我父母那样平淡的情绪中。第二天早上，整个第二天，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怀旧时期，这样的感觉一直还在，没有什么可以治愈它。所有普通路人的脸孔，甚至朋友

283

---

1 克里福德，在科克郡北部，景色壮丽，俯瞰黑水河。

2 (艾斯梅·斯图尔特·)列诺克斯·罗宾逊(1886—1958)，爱尔兰剧作家和戏剧导演。

3 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伊丽莎白时期开拓者的后人，1938年成为爱尔兰的首任总统。

们都丢失了光彩。我拜访了弗雷迪，他说他是多么希望去了爱尔兰——我指的是鲍恩宅邸；我碰到斯图尔特，他在等勒内，他看着我，真的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瞪羚羊，害怕她来了发现我们在一起，并要求我们给出解释，后来我离开了他；我觉得自己至少比他老二十五岁，非常严肃，留着胡子，像歌剧人物一样，忧郁而聪明。在经历了科克郡的精彩气质，流光溢彩的一切，人、物体、天气之后，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来表述。我见到了斯彭德，他几乎不再希望和某个人取得联系，他悲哀地说伊内兹悲伤地写完了一部很棒的小说，然后就不停地说西班牙的事。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感觉是如此痛苦、强烈——我想屠格涅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那时他不得不离开西方，回到他在俄罗斯的文人圈子——我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如此轻易地发生，我要制造回爱尔兰的机会，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哪怕时间隔得很久，但我一定要去，这样我的希望就会变得坚定。你也许会准确地怀疑这是又一个萨尔茨堡，也许，不过萨尔茨堡的情景总是戏剧化地重现，确实像莱因哈特<sup>1</sup>或是谁那样有意为之而且情绪化，而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与世隔绝的地方，还有在鲍恩宅邸的时光：尤其是那些宽阔的阶梯，早晨转动餐厅门把手之前的瞬间，令人心醉的生活的开始（抱歉，如果这样的表述很糟糕），举  
284 着蜡烛架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刻，安妮姑姑<sup>2</sup>房间中的严酷现实，庄严、圣洁而历经苦难的奉献的一生，之后睡床带给我的无限快乐，在烛光下读《文学奇事》<sup>3</sup>和《向北方》<sup>4</sup>（对于后者，我感觉迟钝，星期四把它留在了牛津，星期二我回来时才能读完，然后我会很快寄回给你），（我认为）与你以及戴维·C.一起散步的路程太短。我又像德·夏吕斯先生<sup>5</sup>，为什么这不能一直继续下去？在它的第二部分释放，然后让人谈论各种各样

1 马克斯·莱因哈特（下文第508页注2）。

2 安妮·马尔切利亚·科尔·鲍恩，伊丽莎白·鲍恩的一位姑姑。

3 《文学奇事》（伦敦，1791），由本杰明·迪斯累利的父亲，艾萨克·迪斯累利出版，作者佚名。

4 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1932年由戈兰茨出版。

5（帕拉梅德·）德·夏吕斯男爵，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巴黎，1913—1927）中的一个人物。也许指的是在最后一卷《寻回的时光》前面的部分写到的男妓院场景，夏吕斯感到沮丧，然后留下来聊天。

的事情? 甚至官方剧院也让我怀念: 穿着灯笼裤的欧马洪尼先生<sup>1</sup>, 在楼梯上装模作样地喝着干红葡萄酒, 以他满腹的学识、魅力款待他的同伴。晚上在打喷嚏的人群中散步, 甚至那时对我而言也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那个时候, 我无论如何都不敢把这样的感觉告诉你, 我确信), 最要紧的是一切都成为一切的典故, 我没法说下去了; 这儿是短暂的平静, 报纸读来就像廉价的连载故事, 原本形象悲哀、卑鄙、黏湿肮脏的张伯伦, 成了国家英雄; 伦希曼<sup>2</sup>一块一块地把捷克卖了, 虽然我想他本打算把捷克批发卖掉的。格兰特·达夫小姐在鹈鹕出版社的关于捷克的书<sup>3</sup>明天发行50万本——剧院空了半场, 看芭蕾舞的人更是。我将回到牛津, 松一口气, 泰然自若, 冷淡呆板。我几乎不能相信, 我像以往一样快乐。我要把阿兰的侦探小说还给他, 书很不错。把我的爱给完美无瑕的诺琳<sup>4</sup>, 也给汉弗莱, 他一来, 我就没法写完这封信了。我必须走了。

这完全不够——这些, 而不是《卡尔·马克思》, 才是我真心渴望写的, 这是一种完全真实地表达出来的情感——并且会受到福楼拜或托尔斯泰的轻视。这就像无法入睡的感觉。怀旧带来的快乐太强烈了。我现在突然记起在科克郡度过的维多利亚式的夜晚, 所有人都在包厢里出现, 感

285

觉直接而敏锐, 仿佛经过它们所发生的时代的框架过滤和强化了。我必须收尾了。当我乘坐出租车离开牛津时, 布罗德那里被堵住了, 经过瓦德汉姆学院时, 我看见莫里斯心满意足地站在入口处, 审视、赞赏着那所房子。我停下出租车, 立即被他领着把整栋房子匆匆参观了一遍, 红色的地毯、维多利亚晚期式的桌子(我想我得承认那太难看了, 对莫里斯而言, 显得古怪粗俗, 这是戴维·C.的病毒不知不觉在发生作用吗? 我必须立即找到解药)、地窖、阁楼、盥洗室、卧室、炊具洗涤室和厨房。他很好, 仁慈, 极其

1 约恩·“波普”·欧马洪尼(1904—1970), 职业律师, 极为擅长讲故事, 广播员, 经常在广播电台讨论家族历史, 经常在爱尔兰旅行, 是爱尔兰路上常见的一个留着胡子的人物, 鲍恩宅邸的著名访客。

2 沃尔特·伦希曼, 多克斯福德的伦希曼子爵一世(1870—1949), 1938年7—9月任赴捷克外交使团负责人。见谢拉·格兰特·达夫, 《分道扬镳》(上文第166页注2), 第173页。

3 格兰特·达夫, 《欧洲和捷克》(哈蒙兹沃思, 1938)。

4 诺琳·科雷, 比伊丽莎白·鲍恩小很多的表妹, 伊丽莎白的姨妈伊迪·科雷的女儿。

大方,异常快活,有点像马基<sup>1</sup>——这个我始终愿意维护并为他向别人宣战的人物。

爱你的  
沙耶

[费希尔·W.[院长]对《卡尔·马克思》甚为客气]。<sup>2</sup>

致伊丽莎白·鲍恩

星期二 [1938年9月27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现在我在这儿,在搬家,这真的是最出乎意料的忧郁过程。天上微微飘着细雨,人搬家的时候总是如此,我所有的同事都坐在我旁边,沉默忧郁,即使总在长者和自命不凡的人面前自惭的爱闹而不负责任的人也是这样。莫里斯的确一直在咆哮着,但是比往常安静,韦德·格里已经断言自由主义走到末日了,人要坚决地采取行动,他宣布;他给花园除草的动作也比以往凶猛了许多,拔草,砍伐,充满仇恨。我从我那一半已被搬空的房间逃到市政大厅,在那里,我被分派收集毒气面罩,我很喜欢这项工作。这是一幅无法形容的混乱景象。有人弹奏着风琴,众多牛津教师的妻子躬身坐在桌旁,打结、裁剪,而北牛津来的女士们,甚至是校工的妻子,由于在这场共同危险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而感到高兴,自由自在而喧哗地混杂在教师妻子们中间。我的搭档是一位可怕的、形容枯槁、脾气暴躁的老妇人,五十来岁,她说她经历了六次战争、两场革命,以及,她停顿了一下,“一场婚姻危机”,她补充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这里已经开始形成战时可怕的温情和亲密,有必要通过保留文明生活的标准来抵御。我想,我最好考虑

286

1 《向北方》中以莫里斯·鲍拉为原型的人物:下文第342页注5。

2 中括号为伯林所加。

一下让我父母撤离，也许送他们到海丁顿。谣言极为盛行，街上和所有地方的人都焦虑不安。

政府据说要来这里（这很不受欢迎），大学不会开学，人们准备着或者还不如说没准备好当难民。牛津的教师们被告知要坐着、等着，哪里也不要，每个人都在忙着填表。不过制作防毒面具使人愉快地感到自己确乎具有生产能力，就好像是医生；在用力拉扯和整平厚重的橡皮带的时候，我有左拉式的各种情感；而在另一个角落，我的朋友奇尔弗先生正在教一名从北牛津来的搅炉工<sup>1</sup>这个那个。我觉得挖矿和为人提供智力保障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我想现在情感不会被触动了。我不能不把看完的书寄给你——我请求你不要在书中如此向我致谢<sup>2</sup>——因为它们构成了我的堡垒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教养我成长的要素（不包括狄德罗，补充一句），现在糅合了爱尔兰和鲍恩宅邸的经历，那家具和地方的特别样子，在那个特别时期，对特定时间的记忆，真材实料地形成了具体而完整的19世纪，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确信我对鲍恩宅邸及属于它的一切的感情，远比和我所寻找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的在某个地点（例如萨尔茨堡）的某种形式的快乐记忆，要真实得多也现实得多，对我所做的一切的影响也更大。你对赫尔岑本人是如何看的，我很感兴趣，想听你说，比如，你是否觉得他乏味。我对他有强烈的感情，而且不喜欢他那诗意的妻子，这样的感觉比我对现实中的人或是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的感觉还要持久。他特有的绅士风范、嘲讽、不卑劣的幻灭感、不夸张的修辞，我觉得难以名状地迷人。

莫里斯又编了几个新笑话（当被问到某种深奥问题时），“对于这种情况我总是要问问谁是佩诺老爸”<sup>3</sup>，还有一些别的，这些笑话无疑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些烦恼的日子。在火车上特威兹穆尔勋爵和比利<sup>4</sup>阴郁、沉默地坐

1 牛津英语词典把这个职业定义为“为搅炼炉或是熔炉送入搅炼棒条的工人”。

2 9月30日她为“托尔斯泰的《童年》和《青年》[……][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一位俄罗斯绅士》[……]赫尔岑的回忆录、狄德罗一家、其他人[……]”而感谢伯林。

3 儒勒·弗朗索瓦·佩诺（1827—1916），佩诺父子酿酒企业的创立者，佩诺茴香酒的酿造者。

4 约翰·巴肯和他的儿子威廉。

在车厢的斜对角和我同行。斯帕洛（这是个可怕的慢性毛病）发现在和平和荣誉之间做选择很困难。我告诉莫里斯关于丹尼斯顿的事——梅纳德·凯恩斯<sup>1</sup>的谈话<sup>1</sup>，它被很愉快地接受了，丹尼斯顿得到了分数，而凯恩斯什么也没有失去。哦，天。琐屑小事越来越多了，我相信，光是这些就会拯救我们。应对这样的形势和面对现实的企图注定会导致阴郁的虚伪。你何时回来，也许最好不要回来？我明天要向北方了。[……]<sup>2</sup>

插几句话<sup>3</sup>：你能否告诉汉弗莱，如果他在那儿，我现在也许可以不受打扰地待在牛津了：他最好过来，住一个晚上，如果牛津和巴克斯的轻骑什么的<sup>4</sup>没有把我的房间都占用掉。

我非常喜欢《向北方》：马基一点也不讨厌，甚至很有同情心，埃米琳，我以为，几乎令人深恶痛绝，但沃特斯夫人更可怕，更像童年的恐惧记忆导致的令人战栗的东西，比任何现实中或是想象中的人物都更讨厌，连想到她都令人无法忍受。关于塞西莉亚，如果可以<sup>5</sup>，我想另外写信。

1938年10月，伯林成为新学院研究员。

---

1 在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的三卷本凯恩斯传记中对此没有记录。

2 信件的其余部分遗失。

3 伯林这里的“插几句话”写在一张信纸的反面，因此无法认定它应该接在信的哪个位置。

4 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骑兵，通常被称为奥克斯和巴克斯。

5 马基，《向北方》中肥胖、过度自信、霸道的男主人公，伊丽莎白·鲍恩承认，他表面上是以莫里斯·鲍拉的个人风格和形象为原型的。女主人公埃米琳是受虐狂，塞西莉亚是她的嫂子，沃特斯夫人是书中强势且爱管闲事的小人物。

致伊丽莎白·鲍恩

[约1938年10月3日]

新学院

亲爱的伊丽莎白：

谢谢你的来信和你的书<sup>1</sup>，我现在正以最佳的早期布卢姆斯伯里传统读后者，坐在打包的箱子上，在混乱中，在一间奇特的猪肝色的房间里，房间里的陈设说不上是什么式样。今天早上，我对艾耶尔太太和俗艳的装饰爆发了突如其来的义愤，我的泄愤方式就是把她手下人做的所有矫揉造作的所谓雅致的胶合板撕开，露出原先丑陋的大理石和黄铜，现在我心满意足地认为这才代表19世纪真材实料的风格。我绝对喜欢丑陋的厚重石材甚于用那些漂亮轻薄的油漆把一切都遮盖住的装修方法。你的小说掠夺了我夜晚的睡眠，它极其引人入胜，曾有一个夜晚我在近乎歇斯底里和极度兴奋的状态中读了《巴黎之屋》，我怀疑自己是否会再次经历《巴黎之屋》所带来的感受。我无法阻止院长请你来吃午饭，所以我想我们会在那儿见面。我想，你乘坐11:15之前的火车是否可能？喝茶之前，我的客人将会到达，不过也许可以在我那新开辟的、阴冷潮湿却很不错的花园里散步，那里都是重要可靠的人物，种植的花木样子好像兰达夫主教。<sup>2</sup>艾耶尔一家明天将举家到访（还有斯图尔特），我不确知我会不会高兴地在那种局面中保持高贵的孤立。我在全灵学院的最后一晚非常多愁善感。罗斯先生说他不是德·比尔先生<sup>3</sup>的好朋友，他听说比尔先生如此温柔地询问过他的情况很吃惊。我们面对面地使用的普鲁斯特式的恶意至少提醒了我，必须保持水准，以免陷入我现在正在有意识地陷入的平庸和友善、粗俗的海洋。我已经买了福楼拜的书信，希望莫里斯是个很好的角色，不仅仅只是好而已。

288

---

1 《心之死》（1938年10月3日，戈兰茨出版），小说中美丽、热切、不快乐、有潜在的神经质性格的十六岁孤女鲍西亚·奎恩也许部分取材自伯林描述的雷切尔·沃克，虽然伯林不一定被深深打动。鲍西亚所迷恋的可恶的艾迪（没有姓氏），公开以戈伦韦·里斯（他威胁要起诉）为原型，而且这个人物和戈伦韦本人非常接近，包括他动不动就流眼泪的习惯。

2 一种大丽花。

3 伊斯蒙德·萨缪尔·德·比尔（1895—1990），出生于新西兰，历史学家与研究17世纪的专家。



现在是凌晨1:15了,我要回到《心之死》中去。我们见面时,我会没完没了地跟你说这本书的。

爱你的  
沙耶

伯林所认识的全灵学院的许多老一辈非纯理论的研究员在整个1930年代支持绥靖政策,尤其是杰弗里·道森、莱昂内尔·柯蒂斯以及他们的圈子。如伯林所说,“他们不说‘万岁希特勒’”;<sup>1</sup>他们说抵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不和我们公开谈论息事宁人的观点,但他们带同情者到他们私密的房间中谈论这些看法。他们在那儿实际上召开了委员会会议。”牛津教师中的年青一代,几乎都强烈地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他们更激进。《慕尼黑协定》后来引发了复杂的反应,但伯林的态度毫不含糊:

289 自1933年起,我完全了解了纳粹恐怖,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很独特、可怕,而且我没有一刻认为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我的父亲不像我这么认为。慕尼黑事件发生时,我的父亲就说了布鲁姆在巴黎说的话:羞愧、宽慰。感谢上帝,没有战争了。我感到愤怒、沮丧,因为慕尼黑而深感抑郁。这是一次完全的背叛。在牛津,人们以很有趣的方式分成不同阵营[……]在全灵学院,有许多公开的分歧。

致门德尔·伯林

[1938年10月/11月]

发自新学院

亲爱的爸爸:

谢谢你的来信。我在慢慢地安顿下来,不断地在我的房里做这样那样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8,下面的两段摘选文字亦出于此。

的改动。楼下墙壁的油漆尚未完工，楼上实际上已经完工了。妈妈可以星期三来，如果她愿意，下午3点最好，我会到月台接她，但是请她一定在月台上等我来，好吗？我今天要去银行了解一下我的财务状况，为你开出在布朗·希普利兑付的支票而后寄给你：对吗？别的就没有什么新闻了。我真的在新地方很快乐：每个人都急着表现大方，即使是约瑟夫；在全灵学院，所有的老保守派都非常紧张，他们并不真的为张伯伦辩护。道森还是不敢现身。他们都想为殖民地而战。但他们不会的。我绝对相信有一天俄罗斯—斯拉夫集团会在欧洲形成，彻底消除德国的渗透。我心情很抑郁，所有人都感到挫败。请买下周的《观察家》，我同事赫德森为它写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的有趣文章。<sup>2</sup>

再会  
沙耶

在以后的岁月里，伯林鄙视自己当导师的能力，担心他的学生没有从他的教学中获益：“我常常肢解他们说的东西，我并没有真正教给他们积极的信条。也许我使太多学生处于支离破碎的教学状态中，那是可能的。聪明的学生还不要紧，但是二三流的学生也许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sup>3</sup>但是伯林在这个时期的一名学生，詹姆斯·道格拉斯<sup>4</sup>的回忆却对伯林十分称许，即使上伯林的辅导课也可能是令人激动的体验： 290

他是我所遇见的最才华横溢、最能激发学生的老师。他在新教学楼他的房间给我上辅导课。在那里，他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收藏，是他从街头小贩那里买来的，在那个时候，小贩们在摄政大街的人行道上卖东西。他还有一台很棒

1 伦敦的商业银行。

2 在这期间，《观察家》上有两篇无署名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巴勒斯坦问题》，1938年10月21日，第641—642页；《巴勒斯坦僵局》，1938年11月11日，第797—798页。

3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4 詹姆斯·亚历山大·托马斯·道格拉斯（1919—2004），1938—1941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

的留声机，配有一副用纸板手工做的喇叭，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高保真设备。当我把我的文章读给他听时，他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玩弄着他的收藏：一只玩具牛会从倾斜的飞机上摔落下来——“我很抱歉！请继续”；留声机的喇叭里突然爆发出威尔第的旋律，因为他无意间把指针碰到了唱片上——“我很抱歉！请继续”；我习惯这一切之前，坚信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这样的念头的确要命。“在有个地方你说到……”——接着就是对我整个论述的追根究底的审查。辅导课结束时，我筋疲力尽，但也受到很大启发，激起了很大兴趣。<sup>1</sup>

### 致约翰·希尔顿

[1938年末?]<sup>2</sup>

新学院

亲爱的约翰：

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信或是显示出你存在的迹象了：除了对我缺乏骑士风度的议论，我这里尚未听到什么关于你的谣言。随函附件会提醒你一项讨论已久的安排。不过你的来信很重要，非常重要。我现在正忙着教一班伊顿公学的赛艇运动员不完全倒置<sup>3</sup>。每当不和谐的局面使我受不了时，我就进自己的卧室待一会儿，喝水，然后就恢复过来了。好古怪。

你的

291 以赛亚·伯林

1 来自詹姆斯·道格拉斯2003年5月28日寄给编辑的一封电子邮件。

2 这封信被安排在这里，纯属猜测。

3 形式逻辑的一种现象。

##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1939年3月初]

新学院

亲爱的爸、妈：

1. 我现在以笔记形式写讲稿。

2. 请把托斯卡尼尼的票寄给我。<sup>1</sup>我保证我最多只出让一两张票，交换我没有弄到的票，这样就会（a）一场音乐会一张票（b）其中大约有三场音乐会还有多余的票，我会立即寄还给你们。你们想不想要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的票？还是只要管弦乐队演出的票？你们会订购两张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大约在6排8号）梅纽因<sup>2</sup>的票，或是三张，如果妈妈能去？（我有三张《庄严弥撒》的票。如果你们不需要，我就处理掉两张。）

我绝无新闻，如卡普兰德先生会说的那样。<sup>3</sup>在镇子上绝妙的传统主义的角落，我和艾廷豪森一家吃了饭，还念了祷告词<sup>4</sup>。要是他们不这么丑就好了，任何关于孩子<sup>5</sup>长相的念头都令我退缩。

我在安排一位本地阿拉伯人<sup>6</sup>的未来，我已经成为他的朋友。我感到很有把握，除了出于我喜爱他的缘故之外，这种慈善之举总有一天会结出某种美好的果实，我们的关系令人感动，他是一名叙利亚人，一位长老会教友！

- 
- 1 1939年5月，伦敦，在女王音乐厅，由托斯卡尼尼指挥BBC交响乐队演出一系列贝多芬作品；《庄严弥撒》在5月28日，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奏。
  - 2 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1916—1996），伯林的远房表亲，1939年4月16日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募集大笔资金援助从德国和奥地利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犹太妇女和儿童难民。
  - 3 指刊于《纽约客》上的幽默短文合集，作者莱昂纳德·Q·罗斯（利奥·卡尔文·罗斯顿的笔名），当时广受欢迎，讲述发生在一所赴美移民就读的英文夜校的故事，以“伊曼·卡普兰德的教育”为题结集出版（伦敦，1937）。在作为练习而写的一封信中，卡普兰德，故事中的犹太主人公，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你一定要来纽约读采矿学校”（《了不起的卡普兰德先生》，第45页）。
  - 4 这是指希伯来语的饭后感恩祷告（《申命记》8章10节规定的），对严守教规的犹太家庭很重要。
  - 5 戴维·理查德·艾廷豪森，沃特·艾廷豪森和他的妻子维拉（婚前姓席弗）的长子，1938年11月出生。
  - 6 阿尔伯特·哈比卜·胡拉尼（1915—1993），1933—1936年就读于莫德林学院PPE专业，1937—1939年任贝鲁特美国大学讲师；1939—1945年任职于开罗外交部；1945—1946年任职于驻耶路撒冷和伦敦的阿拉伯办事处。

(传教士)有个冯·特罗特到了这里,不能说 he 诚实,不过他很迷人。

爱你们的

292 沙耶

致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

[1939年3月中旬]

新学院

亲爱的克里西达:

我晚上过得很愉快,无法入睡的时间真的和你的一样长,我肯定。第二天一位有教养的阿拉伯长老会教友<sup>1</sup>来看我,还保证他很快会再次到访,并承诺如果我有钢琴,他就演奏美丽的萨奇尼<sup>2</sup>钢琴奏鸣曲,甚至同时可以吹奏萨奇尼更美丽的长笛曲。然后,如果我强烈请求,他会系统地演奏所有乐器独奏曲目,费什、波尔波拉还有老斯塔米茨:他觉得佩戈莱西被高估了,作为回报我将(a)寻找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的音乐和艺术起源,它与科莱里以及一般的意大利人的作品是多么不同;(b)在他事业的各个方面帮助他。这我保证做到。一段荒唐的插曲第二天晚上发生了,几乎无法描述,[盖伊·]布兰奇突然来了,要求留宿。瓦德汉姆的院长<sup>3</sup>问我们是否可以那晚10点造访,那时他将从学院举行的多慕斯餐会<sup>4</sup>回来。9:45戴维·塞西尔和科尔德斯特里姆先生<sup>5</sup>来了,我们想大家可以一起去。路上戴维·C.试图向布兰奇描绘院长的房子,说(你得加上力度,等等)“它很像,很像,

1 阿尔伯特·胡拉尼。

2 安东尼奥·玛利亚·加斯帕洛·吉奥阿奇诺·萨奇尼(1730—1786),意大利作曲家。这封信中提到的其他作曲家是荷兰小提琴家威廉·德·费什(1687—1761)、意大利歌唱教师尼古拉·安东尼奥·波尔波拉(1686—1768)、波希米亚小提琴家和教师朱安·温泽尔·安东·斯塔米茨(1717—1757)、意大利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1710—1736)和意大利小提琴家阿坎杰罗·科莱里(1653—1713)。

3 莫里斯·鲍拉。

4 为学院研究员举行的餐会,此次在3月第一周举行。

5 威廉·蒙吉斯·科尔德斯特里姆(1908—1987),画家。

实际上很像一家特拉斯特酒店<sup>1</sup>，我是说客厅尤其像”。对此我描述得非常详细。我们进了那所房子，一片黑暗，我们上到起居室，还是黑暗，有人开了灯。戴维扑到前面对布兰奇说：“你现在充分明白我的意思了，是吗？”布兰奇咯咯直笑，表示同意，这里正像一家特拉斯特酒店（对我来说这是个新词）。我指着一件特别吓人的物件，说“瞧瞧这个”。此时，角落里一扇没人注意到的门上响起了隐约的敲门声，没有人真的注意到，但是谈话停了下来。布兰奇刚开始重新说话，那如同鬼魅般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他朝前走去，还没等他碰到那扇门，它就一下子打开了，院长身穿无尾礼服出现了，怒气冲天，很吓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场噩梦。戴维表现得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若无其事地一次次挑起话头，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反驳而哑口无言，科尔德斯特里姆先生显得惶惑而不自在，布兰奇坐立不安，我深受其苦。任何人说的一切都受到冷落，不复存在。11点时，戴维起身说他必须走了，院长没有试图挽留他，而是对我和布兰奇说“你们不需要走”。我饱受可怕的踌躇不决的折磨，不知是否要和戴维团结一致<sup>2</sup>，后来我认为我还是怕瓦德汉姆的院长比怕别人更多一点，于是留了下来。随后，他变得轻松、可亲、快乐，只是有时候他的脸色沉下来，仿佛想起了悲伤的事。第二天，我的同事塞西尔疲惫不堪：“十年的苦心经营之后，一切又全部瓦解、粉碎了；真的太可怕了：但是那时候他不在橱子里窥探和偷听：我想雷切尔得给他一份厚重的礼物，不过现在那礼物不可能是用于那座房子了，是吗？”他们的关系又回到最低点了，瓦德汉姆的[院长]看着他的时候，显得很生气、很憎恨他，我在默默地思索院长愤怒的缘由，因为他偷听了吗？因为躲在门后说的那个笑话？如果只是布兰奇和我就不要紧，他已经卸任的同事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sup>3</sup>说这个笑话就令人难堪了，而在科尔德斯特里姆面

293

1 特拉斯特公司拥有的酒店，该公司于1903年创立，旨在恢复旧式驿车旅馆的传统标准。（特拉斯特公司于1970年与福特公司兼并，成立特拉斯特豪斯—福特公司。）[“特拉斯特”是英文词trust（信任）的音译。——译者注]

2 伯林此处原文为：se solidariser。

3 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她和夏吕斯男爵之间有强烈的相互爱慕之情，也许伯林提及此人物是暗指戴维·塞西尔有意恭维莫里斯·鲍拉。

前,他是高贵的瓦德汉姆的[院长],这样的笑话就令人无法容忍了。还是因为那个倒霉的词,“特拉斯特”?因为“正是我的意思”这句话暗示了深不可知的恶意?这个本埠小故事是否真需要一个严酷的背景?或者我传递了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嗜杀成性的愤怒,而我们却在这样的愤怒中聊了一个小时,谈论槌球游戏之类的话题?狭窄的环境可怕地加强了一切,不过也许是真的加强了,而不仅仅是看上去加强了。我告诉你(对这类事情),当有教授问艾耶尔太太战争发生时她会怎么做,弗雷迪突然插话,颇为无意地说“勒内在汉普希尔那里有避难所”。这话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对的,却让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大声喘气、尴尬、假装在吞咽什么东西。我把你的手套还给你,还有一英镑,你真的应该提醒我这事,我是在[戴维·]华莱士的婚礼上借的。关于托斯卡尼尼:我有一张票,也许有两张5月3日(第一场音乐会?)的票,你有第五和第六,或是第七和第八,或是第九交响乐的票吗?如果有,给我发电报好吗?(如果没有,就不用了。)你或是杰斯帕买了卡萨尔斯<sup>1</sup>的票吗?瓦雷里在这里做了一场令人愉快而干巴巴的讲座。<sup>2</sup>他说,语言就像架在悬崖峭壁之上的薄板,如果你迅速地跨过,什么也不会发生,而如果你在其中任何一块薄板上停下来,瞪视脚下的万丈深渊,你会感到眩晕,而那正是哲学家们所做的事情。

你的

沙耶

---

1 帕布罗·卡萨尔斯(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家、指挥家、作曲家,佛朗哥政权的激烈反对者,1939年3月28日和伦敦交响乐团一起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音乐会,为西班牙儿童募集善款,节目包括莫扎特、海顿、比才、埃尔加和德沃夏克的作品。

2 瓦雷里3月1日在牛津泰勒学院做了以巴希尔·扎哈洛夫爵士命名的讲座,题为“法兰西的诗歌和抽象思维”。

## 致道格拉斯·杰伊

[1939年?]

全灵学院

亲爱的道格拉斯:

关于酒店,有以下这些: 1) 凯普·马丁酒店。<sup>1</sup>叶芝先生在那里去世,但赫伯特远比我更熟悉这家酒店。它此时也许关掉了,但如果没有,那它就是理想的地方,坐落在海边树木茂盛的起伏山丘之间,不太昂贵。2) 我想,是大都会酒店<sup>2</sup>,滨海博利厄,在蒙特卡罗和尼斯之间,食物超一流,不算贵得吓人。安静,英式,入住的多是退休的将军和女王的未婚侍女。我忘了它的确切名字了,在博利厄只有两家一流的酒店,一家是法式的,叫“预约”,一家是英式的,就是这家了。你可以通过它所属的伦敦高登酒店集团<sup>3</sup>找到。博利厄太小,带着切尔滕纳姆式的沉闷。你可以散步,(a)沿着海边,走多远都可以直到蒙特卡罗或是尼斯。另外可以(b)沿着图尔比阶地往上走,经过一排排房子和街道,直到你到达山顶,从上面远眺,景色尽收眼底,文雅的游客,还有星星点点的酒店。我曾住在那儿写书。酒店附近没有车辆的迹象,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在蒙特卡罗有许多时髦的酒店,但你不会想了解它们。我建议住在博利厄,但作为一座奢华小镇,它本身很沉闷,公共汽车可以把你带到别的任何地方。门同是死亡之地,所有的酒店都一样地好或者一样地糟糕,每家都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尼斯的布莱顿酒店,就其本身而论,热闹而粗俗,非常之好。你和佩吉什么时候可能来牛津? 戈伦韦已经令人疑心地缺席了。<sup>4</sup>

295

沙耶

1 理想居住酒店,位于凯普·马丁,W.B.叶芝(上文第102页注1)1938年12月因为健康原因住在那里,1939年1月28日在那里去世。

2 伯林把它和布莱顿酒店弄混了,他在博利厄住的是布里斯托酒店(见上文第310页)。

3 伦敦多切斯特酒店的所有者,多切斯特酒店于1931年开业。

4 1939年4月,戈伦韦·里斯加入了伦敦皇家地区炮兵部队,他的许多牛津朋友对此既惊奇又不赞成,他们不甚同情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政府,而戈伦韦的行动看起来是对张伯伦的支持。



伯林的书,《卡尔·马克思》,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出版,迫使伯林以前在全灵学院的一些同事修正了他们对伯林的看法:

我曾遭受纯学术的资深研究员的严厉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个浪费时间的闲话篓子,永远也写不出什么,而且也浪费那些有可能写出什么的人的时间。我感到反对之声汹涌而来,不是来自政客们,他们对我很好,而是来自那些五十几岁的人——萨姆纳,后来成为院长,一个叫伍德沃德的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G.N.克拉克,他成为剑桥瑞吉斯历史学讲席教授[……]他们看不出我可以安心工作,拿出成果。在头三四年,这是真的,而当我写出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书时,他们对我居然可以写出东西来感到震惊不已。<sup>1</sup>

致A.D.林赛

巴利奥学院院长

1939年10月31日

新学院

亲爱的院长:

谢谢你非常有启发性的来信<sup>2</sup>,要是我能在写这本书之前就读到你的信就好了(惭愧地说我甚至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工人的知识特征)。<sup>3</sup>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我同意(1)马克思根本就没有决心了解其他一切事物。知识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无论如何,公正地追求真相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压倒其他理论家和意识形态的欲望是强大的,和对真相本身<sup>4</sup>的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5。

2 所注日期为10月15日。伯林给林赛寄了一本他所写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书,在回复中,林赛写道:“我认为你有点既夸大了马克思的经验主义方面且降低他的预言性[……]没有人可以忽略在[……]马克思身上的激情,它不是,我高兴地说,纯粹的科学的激情。我感觉你有点回避这个问题[……]”

3 格特鲁德·赫尔姆斯,《马克思主义工人的知识特征和工人教育的问题》(图宾根,1926)。

4 伯林此处原文为: an sich。

热爱不相容。

(2) 马克思既不要像边沁<sup>1</sup> (他所厌恶、畏惧的人) 那样简单和纯概念性的社会单位, 也不想使他的理论本身具有效率, 无论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认为他真的不太在意动机: 宇宙过程 (其幻象, 我完全同意, 是他观点的核心, 只不过他以为他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它的存在) 会实现某些目的, 挫败另一些目的。这个过程被强加于我们, 不可扭转: 因此, 就有了我们的目的。他仇恨笨拙者, 但对宇宙过程可以达成的目的的误解正如无效率地行使手段一样致命和可鄙。目的可好可坏, 行为可以是道德或不道德的, 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受到宇宙过程的助长和促进。这一切我都赞同, 而且, 如果我看上去不赞同, 那只能是因为我没有在我的书中清楚有力地表达出这个意思。我依然不同意的是, 我想, 关于他的情感的性质。对无阶级社会的幻想、历史的进程等, 在我看来这些似乎是形而上学而非宗教的: 形而上学而且非道德。世界在他看来, 是有序的, 受到一个永不改变、不会重复的过程的控制, 但社会是混乱的, 充满愚蠢和欺负傻瓜的无赖。他不仅对此不赞同, 他强烈地仇恨和厌恶这一切, 在他看来, 这是对人应有或终有一天会有的人性尊严的贬损,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道德感情, 但是建立在对人的所有物的骄傲之上, 而非建立在对正义的热爱之上。在我看来, 如果把马克思和那些真正为了道德激情而燃烧的人, 如蒲鲁东<sup>2</sup>或马志尼或者甚至是卡莱尔相比, 这表现得很强烈。他们很不一样, 马志尼和卡莱尔有时候是在表演, 使他们自身产生马克思身上从没有发生过的状态, 他们是以他们不可救药地为之献身的狂热理想观点攻击社会, 不论历史事实或是他们反对者的观点如何; 而马克思在我看来本身就因愚蠢、无序和自鸣得意的世界而饱受折磨, 他将自己的状况泛化, 使其适用于人类, 或者至少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成为他自身的投射, 被视为拥有潜在的自由和权力, 却被可悲的、胸襟狭隘的小人所压制。而这, 如果是道德激情, 297

1 杰里米·边沁 (1748—1832), 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他认为社会政策应该符合功利原则, 因而提倡“最大多数的最大快乐”。

2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09—1865), 法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 以在他的《何为财富》(巴黎, 1840) 的首段宣告“财富即是盗窃”而著名。

在我看来与通常人们所说的那种是不同的，它是渗透性的，但不是马克思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就像所有的雄辩那样，它能够而且已经在以不同于他的眼光阅读他的书的人们当中激发了截然不同、更高尚、更深刻的感情。我为这样说个没完而再一次道歉，但是我不能不说，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基尔大学，林赛档案，L193

林赛11月6日回复了伯林这封信，还是或多或少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致玛丽·费希尔

星期四1940年4月〔18日〕

新学院

亲爱的玛丽：

我不可能说什么了。我的勤杂工今天早晨告诉我这件事<sup>1</sup>，然后整个早上我们都没再说话。教师休息室里的谈话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谁也没有提及此事，很凶恶而且脾气恶劣的休·艾〔伦〕先生<sup>2</sup>压抑了其他人，除了莱格<sup>3</sup>，他在角落里低声谈论着安排。戴维不在这里，我只可能和他一个人说话。你的父亲是我面对面认识的唯一一位伟人，可以这么说，提起他我只可能这么说，而同事们会觉得我的话矫揉造作，是傲慢的社交辞令。为了和人说话，我也许该和史密斯<sup>4</sup>谈谈。我希望能受命写一份悼词<sup>5</sup>，发表在某

---

1 H.A.L.费希尔去世了。他在伦敦被货车撞上，几天后因伤重不治在医院去世。

2 休·珀西·艾伦爵士（1869—1946），1901—1918年担任新学院的风琴手，1908—1946年任研究员，1918—1946年任希瑟音乐讲席教授。

3 里奥波德·乔治·威克姆·莱格（1877—1962），1908—1948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

4 A.H.史密斯在费希尔去世之后任新学院代理院长。

5 伯林此处原文为：éloge。

份无名的刊物上，这样我就能静下心来，为自己勾勒出一个具体形象，好永远放在我的心中。哦，亲爱的，这听起来无限地浮夸和自私，可我希望表达的意思是，我觉得有必要为我多年以来积累所得、如今清晰地涌现出来、由突如其来的苦痛和挫伤带来的挚爱之情、深深的仰慕，以及感激等，找到可以依托的东西。对不起，我在堆砌词汇。希望你没有受到烦扰，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在某种意义上你一定考虑过这样的可能，但是我想，事情发生了，它们会产生影响，真实的影响，而先前的念头则不会这样。我道歉，我既笨拙又语焉不详，牛津对人的影响是，人失去了直接表述或是直接感受的能力，不得不兜圈子，以期传达出那不幸因不够简单而未直接说出的话语的外表轮廓及未被描述的内容。如果你允许，我会在见到你的时候告诉你我会如何描绘令尊，告诉你我对他的感激。如果你不希望这样，我就不说。如果下周我在伦敦，我会给你打电话。如果不，你能否来牛津？我想使笔下的文字不那么呆头呆脑，并能传达出一些意义，但我做不到。我不明白，老是有人告诉我深重的苦难是什么，我是在它的可能性与自己之间树立起屏障，我只能希望你感受不到苦难，或是尽早不再感受到，我认为苦难不好，可我也教不了你什么。而且，那也许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却是我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得来的唯一认识。我最热烈地相信克制和结构的价值（如你的父亲确乎相信的一样，我想），以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常规<sup>1</sup>，使自己不可能出差池<sup>2</sup>，还有，单调比即使是最小的分裂都好。因此，极端自命不凡者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保存价值观，都要好过那些极端的非自命不凡者。后者推翻一切，为了获得看到一两个劣等角色受到侮辱的快乐。我还相信，尽管不像以往那样相信，快乐、尊严、风度、文明生活的可能性，相信以激情追求的目的本身、未被不断的分析所歪曲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所有共同的设想。除了我向来爱说教的原因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时候来做世俗的布道。我还相信你甚至比我更执著地坚守这一切，而我在一些情况下偶尔会背叛它们。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enroutiner。

2 伯林此处原文为：dégringolades。

我无法说你的父亲是如何象征了这些信念，我在心中对他怀有神圣的敬意。无论和谁站在一起，他的才智总是出类拔萃。我又一次说不下去了，而如果我是在19世纪长大的人，我就可以接着说。如果我可以见到你，我也能说下去。同时，在我见你之前，即几天后或是任何时候，我要，我想，继续我的日常工作，如果史密斯先生和博尔特先生<sup>1</sup>被政府免职（后者可能在我努力的范围内），那就剩下我和莱福特教授打理学院了。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我和[……]一起吃饭。很令人感动，很温和，很圆满，但是太顺从了，就像是第二次婚姻<sup>2</sup>。根本就缺乏任何运动原理，这样的单一不是附加于欲望、希望、抱负之上，而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他们既不过多期望也不过多害怕。他们的性格很好，彬彬有礼，人们会觉得那就像田园诗一样，然而那不是。两者在某个折中点稳定下来[……]里德利一家不满得多也沮丧得多，但他们有方向，也更令人敬佩。我又说教了，所以还是停笔吧。如果你来牛津，能否说一声（或者来个电话）？我想我很快就要去伦敦。我会另外给你母亲写信。这封信很吓人，就是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抱歉。

爱你的

沙耶

## 星期五

史密斯先生希望劳合·乔治致悼词<sup>3</sup>，大家决定正式征求你和你母亲的意见。莱格先生有点担心，因为他也许会带上“政治倾向”。麦克卡鲁姆博士<sup>4</sup>和我认为，越有政治倾向越好。他会来吗？你本人会来参加这里举行的悼念仪式吗，即在下周星期四、星期五或是星期六，无论是在哪天？我想它会在2:15左右举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吃饭，或者晚一点一起喝

1 戴维·罗伯特·博尔特（1910—1944），1935—1937年在新学院主修法律，1938—1944年任研究员、法学导师，1940年起担任学监。

2 伯林此处原文为：deuxièmes nocces。

3 有两个悼念仪式，但劳合·乔治都没有发言。4月23日在圣玛格丽特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悼念会上，西瑞尔·加伯特发表了讲演。4月27日在学院教堂举行的葬礼上没有讲演。

4 罗纳德·布坎南·麦克卡鲁姆（1898—1973），历史学家，1925—1955年任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1955—1967年成为院长；自由党权威人物。

茶？你母亲是否会来吃午饭？对于到时如何安排，你一定要提提建议，我渴望见到你，莱福特教授适得其所了，他一周要参加两次悼念仪式。有人提议 [H.W.B.] 约瑟夫致悼词，他的悼词非常好，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他对你父亲的仰慕不够恰当，而且他对你父亲的了解不会超过普通公众对你父亲的理解，我认为这不够好。无论怎样，他也许会致悼词，以充权宜，休·艾伦爵士认为请P.马西森<sup>1</sup>也很得体，不过据说他的声音微弱无力。瓦德汉姆的院长渴望得到这份邀请，我无法对他说，除了其他因素，人们认为他的分量太轻，我想现在密谋很快就会开始了。我一点都不盼望这些事，我宁愿选任何人——赛顿·华生<sup>2</sup>、欧姆斯比·戈尔<sup>3</sup>，除了莫波里<sup>4</sup>谁都可以，据说莫波里笑起来，嘴巴张得像一座大教堂。你到的时候要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听到你的消息，我会在周一或是周二打电话。

爱你的

沙耶

致莱迪丝·费希尔

星期四 [1940年4月18日]

新学院

亲爱的费希尔太太：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真切而深刻地感到痛苦，校工们轻声走路，压低声音说话。至于我，您明白我的感受。我仰慕院长，他的一生，他的著述，他所主张和支持的一切，对他的仰慕超过对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人。我完全忠

1 珀西·尤文·马西森 (1859—1946)，古典学家、荣誉退休研究员，1939—1940年任新学院院长。

2 罗伯特·威廉·赛顿—华生 (1879—1951)，1898—1902年就读于新学院历史专业，1922—1945年任伦敦大学中欧历史马萨里克讲席教授。

3 欧姆斯比—戈尔 (上文第210页注3)，此时为哈勒奇勋爵，1904—1907年就读于新学院历史专业，自1936年起为学院荣誉研究员。

4 沃尔特·莫波里 (1881—1974)，1900—1903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1935—1949年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

诚于他，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他做任何事，而且感激他，您了解我有多么热忱地感激他，因为他在我非常需要的时候对我表达了善意，并间接地为我树立了生活和行为的标准，使他的牛津同龄人相形见绌。的确，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够再次在我的生命中占据院长住宅多年来所占据的位置。您和玛丽难道不能来继续住在那儿吗？目前反正没有别人住。我猜想，即使是您也不能充分了解，这所公寓不仅对您的朋友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所有人，牛津的教师、本科生们，对每一个人，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宽阔高大，它独特有趣，它多么热情好客。这个时期的结束对我有更多的含义——[我]希望它只说明我是多么不热衷政治，多么热爱家庭生活——比战争带来的变故对我有更多的含义。我想，我什么也不能做吗？我真的希望此时人们没有对您纠缠不休，没有让琐屑小事占满您的时间。如果现在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或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如果您没有吩咐我做，我真的会感到失落。他们在这里谈论邀请温切斯特的院长<sup>1</sup>为《牛津杂志》撰文<sup>2</sup>；还谈到问您是否愿意让劳合·乔治下周在教堂里讲话。我想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迫切地想让他发言，不过他们会接受您提议的任何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意。

我希望很快能够出版一本回忆录。我想乔治·特瑞福里安<sup>3</sup>能做这件事，或者也许这本回忆录应该是许多声名遐迩者所写的回忆文章的合集。我不希望听起来过于自负，不过我的确热切地认为一卷回忆录很快就会出来了，这对当前形势很重要，为了纪念，也为了让公众舆论了解他的品德和理想，似乎没有人能有足够的表现力和足够的诚挚之心，宣称自己能够描绘出我们所深信不疑的、被告知为之而奋斗的心中形象，而院长正是这形象

---

1 哈罗德·特里弗·贝克阁下（1877—1960）。

2 《牛津杂志》发表了《新学院院长》，P.E.马[西森]所写的对费希尔的赞赏性评论文章，1946年5月2日号，第286—288页。

3 乔治·麦考雷·特瑞福里安（1876—1962），1927—1940年任剑桥现代史瑞吉斯讲席教授；1940—1951年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费希尔家的朋友。

的最高贵化身。抱歉我是如此蹩脚，我的信总是写得很糟糕。

您永远的

沙耶·伯林

此时伯林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被征召入伍或是成为政府官员。伯林在出生时受伤的左臂软弱无力，他出身外籍，这些使得他不能以这两种方式在战争中效力，他为自己的边缘化而越来越感到沮丧。

致哈利法克斯勋爵<sup>1</sup>

1940年6月21日

发自全灵学院

亲爱的哈利法克斯勋爵：

我必须为在这样一个时刻打扰您而道歉，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的烦扰。我是在院长的提议下给您写信的，我把提议书交到了莱昂内尔·柯蒂斯那里；他们都认为此事值得您的留意。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三十一岁，由于一只有残疾的胳膊和其他缺陷，生理上不适合在军队效力，因此被划入征兵豁免范围，除了加入L.D.V.<sup>2</sup>之外，目前无事可做。我生于里加，接受英语和俄语的双语教育，的确，我具有双语背景。仅仅听我说话，任何俄罗斯人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在英格兰就遇到过这样的俄罗斯人，并且和他们相处甚好。而且，由于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一直在阅读苏联和流亡海外的俄罗斯人的报纸和书籍，对于俄罗斯事务我有相当细致的了解。我远非俄罗斯政治或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或者的确，我也不是研究任何国家的专家，因为我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历史和文学方面。但由于我有

302

1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1881—1959)，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哈利法克斯子爵三世，欧尔文男爵一世；1938—1940年任外交事务大臣，1941—1946年任英国驻华华盛顿大使。这封信看来并非就是寄出去的格式，不过也许是已经寄出的信件的草稿。

2 地方防卫志愿者组织(后来成为地方志愿军)。



如此广泛的阅读经历以及和人们交谈的经验，我想，我可以没有过多自以为是地宣称自己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具备相当广泛和感性的了解。也许这算不上是真正的专业知识，我极其不愿夸大我的自荐词，但可以自信地说，俄罗斯，其机构和人民的现状，是仅次于我目前学术研究方向的最吸引我注意力的事。我因此以为，我也许能为国效力，不论力量多么微薄，或许我可以以半官方或是官方的身份去莫斯科，从事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希望我做的任何事，例如，联系媒体或是此类的事情——我愿意做他们希望我完成的任何平凡小事，我甚至还曾经试图在莫斯科建立关系，而众所周知，在那里做这件事极其困难，但我愿意一试，在外省，我的口音、长相和爱好不会使我像外国人那样引人注目。在我看来，通过与文艺圈，尤其是莫斯科以外的文艺圈建立友善关系，我能做许多有用的、官方人员不容易做到的事。我以为，与极难接触到的政治圈相比，他们更好地体现了大众的情感状态。如果您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和您面谈，不管时间多么短都好，我更希望能够当面向您阐述这些。我非常明白，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提议也许是不实际的，不过如果您可以挤出一点时间见我，我想我会比这封信更简明扼要地向您提出我的建议。我记得，年前在全灵学院的晚宴上，我曾经和您就这个话题交谈过，当时我是个资历很浅的研究员，因为自己新晋的身份而非常自满，也许说了许多胡言乱语，而您非常彬彬有礼，没有太在意我的鲁莽。我真的认为这是面对当前危机，我最能报效国家的方式，于是我斗胆给您写信。我可以，当然，一接到来自您的即便是最简短的通知，马上就到伦敦去。再次为占用了您的时间而向您道歉。我和H.A.L.费希尔太太谈及此事，她也提议给您写信，因为已故的新学院院长就在他去世之前还打算亲自写信给您，这正是费希尔太太给您去信的缘故，也许您已经收到了她的信。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1940年6月23日

新学院

亲爱的玛丽安：

自从战争开始，我几乎每天，或者每两天，都打算给你写信。这变得越来越难了，从宣战的那一天起，曾经吸引我的私人关系和个人现实就被推到一边，甚至几乎被忘却了，起初取代这些关系和现实的事件发生得少而又少，后来又发生得太多。于是我陷入了，尽可能深地陷入了我学术生涯的日常责任之中。牛津的变化相对少一点：本科生比以往勤奋得多、严肃得多；在我现在批改的考卷上看不出一点战争焦虑的痕迹；莫里斯，低调地说，他还像以往一样说着笑话，重音也与从前一样。我想，他正在负责大约160名邮局工作人员，所以我们的信件无论怎样都很安全。戴维·塞西尔还是跑进跑出，说话时嗓门就像一柳条箱被驮着经过田地的鸡。我们总体士气旺盛，只是我们的难民给我们投下了忧郁的阴影，我确实希望将他们集中在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允许他们表现得像温和的吸血鬼，从而减低我们的活力。发生在法兰西的事件转移了有些人的生活中心，例如伊丽莎白·卡梅伦，她显然是通过一座想象中的巴黎来确定自己的方位的。在闪电战<sup>1</sup>发生之前，牛津是唯一不受影响的地方，即使是现在，在教师休息室和街头，我想，它还是没有失去它令人钦佩的冷静和克制。布莱克韦尔那里挤满了人。你认为这是否太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秩序与伪罗马？我对和缓地陷入衰败的事物如此恐惧，即使是假冒的禁欲和坚忍在我看来也比什么都没有强些。有一两个怪人加入到我们中间。伯纳斯勋爵，也许你认识，他是位著名而古怪的百万富翁，他画画、写作，还创作不错的讽刺音乐剧。他来这里，因为他发现住在他那所巨大的房子里<sup>2</sup>，与画中的凤头鹦鹉和虎皮鹦鹉为伴，在战时过于抑郁孤寂了，他在莫里斯那儿住了短暂而不太快乐的一段

304

1 伯林此处原文为：Blitzkrieg。一种军事战术，依靠突袭、坦克和空地协作突破防线，快速突进敌方领土。德国人成功地利用这种方法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

2 法灵顿宅邸，伯克郡。

时间,受到莫里斯的惊吓,之后,他在一个有钢琴的房间安顿下来,拜访我们所有的人,不得不让别人振奋他的情绪。他显然是我见过的最有天分的人(此时,我听到第一遍空袭警报而停笔了),不过他极其奢侈,极为不适应当前这个时期,过得很悲惨。他、戴维·C、几位阿斯奎斯和丘吉尔们,在牛津形成了某种上层阶级小团体,他们有点像薄伽丘那样聚会。莫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但我很喜欢他们,享受着他们谈话中的独立性。弗雷迪是名成功而且独具一格的士兵,在威尔士卫兵部队服役,显而易见,他非常快活:他谈及他所在的团时,带着真正的集体荣誉感:鄙视愚钝而意志薄弱者,敬佩出色而有创造力的人:他看上去就像一名阿尔卑斯猎手<sup>1</sup>,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兵,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于长期以来所追随的叛逆者与顽童之类的风格,他有点厌倦了,所以很享受没有预见到的对职责的服从。汉普希尔在等待着被征召入伍:三角恋情还在可怕地继续着,关于A.太太又有许多新丑闻了,不过人们不再在意了。[盖伊·]奇尔弗博士(你记得他吗?)在食品部。莫里斯所在的学院禁止他成为一名飞机上的机枪手,于是他还留在这里。至于我,我不适合参军,只好为政府做点零工<sup>2</sup>,这是战争开始之时我已故的院长给我找的活儿——很庆幸他去世了,不然他会不喜欢这一切,无法忍受——所以我很闲散,和巴利奥的院长一起为哲学科主考。我和他建立了温和的友谊。除了我和他彼此对对方所说的笑话都不感兴趣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之外,我们相处甚好。亚当斯院长就像个农夫,他的草堆着火了,他却更聋,甚至更慈爱了。真的,自从离开全灵学院,我变得真正喜欢他了。我还见了谁?伍尔夫太太和魏茨曼博士。她是个如此天才而美貌的女人,我几乎不能用语言形容,见到她时我感到惊恐和仰慕,每次和她会面之前与之后我都颤抖不已。魏茨曼博士是位公众人物,

305 他阴郁地说自己将在集中营结束一生,最好是在巴勒斯坦。等他的阴郁心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Chasseur Alpin, 法国山地轻步兵, 专门受训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这样的山地地区作战。

2 伯林的一位朋友为他推荐的职位, 是教育部的一个“很低的职位”。费希尔建议伯林不要接受, 但当时伯林由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 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7。

情过去，他就充满激情地谈论犹太人和他为巴勒斯坦制订的计划。他似乎很佩服美国一位叫做泽穆雷<sup>1</sup>的香蕉国王（泽穆雷？泽卡麦隆？泽麦当劳？我可以一直这样联想下去），他没能吸引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被大众都认识的有魅力的人迷住，魏茨曼、戴斯蒙德、麦卡锡、哈罗德·尼克尔森，我真的不能。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声音和他们雄辩的话语有点恶心。总的来说，我赞同人们对奥登、衣修午德、麦克尼斯的普遍谴责之声，他们已迁居美国。像有人说的，他们在招募左翼的军士，他们愉快地接受预言家、社会批评家、有良知的导演等角色。他们针对那些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的人，热情而有效地布道。竟然采取这样的形式进行生物体的自我保存是卑鄙的，使人无法相信他们的道德伤感。在这里，我的老朋友斯彭德先生就像一个悲剧性的自由派人物，不那么有灵感了，不过更加高贵了。我看不出任何人有离开的借口，除非直接为了他们所属政治机构的利益，直接得到他们所属政府的命令，或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政治上过于暴露，而且末日已经到了。

我们并未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政府没有派奥登去中国，或是去美国，个人的不满如今看来过于昭彰，无法以社会信条的形式遮掩，进行自我推广，获得更高的尊严和说服力。在个人事业中利用公共话题在我看来，对艺术家来说是糟糕而危险的行为，这样的做法已经产生了邓南遮<sup>2</sup>和戈培尔博士这样的人。个人的生存无疑是合理目的：当可以时，人就战斗，然后或是死去，或是逃亡。我不是名士兵，也当不了，在某些方面极度暴露，仅仅因为我是个犹太人而且写了关于马克思的书：我应该尽力避免自己被逮着：如果我可以怂恿美国的哪一家机构请我去，我会的。但是冷血的逃亡是可怕的，漠视一场结果将改变一切艺术和思想的冲突，是可耻而愚蠢的。

我感到我很暴烈，异乎寻常地关心民众。那也许是真实的改变。在许

1 1911年，塞缪尔·泽穆雷（1877—1961），即“香蕉人萨姆”，带领一群美国冒险家和投资者离开新奥尔良，占领了洪都拉斯，他在那里取得政权，成立了库亚梅尔水果公司，和波士顿联合水果公司（1938年他成为该公司总裁）一起建立了联合军队，把洪都拉斯变成了一个“香蕉共和国”。

2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和法西斯分子。

多地方,个人世界土崩瓦解了。我极其渴望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做点事情。我们会赢的,如果我们这里被你们和加拿大人变成了巨大的飞机场。如果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或是在俄罗斯——因为我了解俄罗斯人也懂俄语,或是在某个方面以某种方式,帮点忙,我会很快乐。而且我非常同意莫里斯对战死沙场<sup>1</sup>的渴望。唯一令人恐惧的是贝当<sup>2</sup>主义。拯救他们想要拯救的,这看来非常可鄙:我们的法兰西胆小鬼要回家歇息了。如果那样的情况发生在英格兰,我希望移民或是死去。目前还看不出有这样的迹象。如果战争很漫长,民族的复兴(在二十年迅速的衰败后急需如此)最后将很了不起,虽然社会结构被消耗和削弱了。与此同时,我无法说我是多么想见你和菲利克斯,想念和平的环境、文明的生活。也许如果我在军队里,我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而会比较无忧无虑一点,因为有份职业。因此,我充满了渴望。由于我不能见到你们,我会通过以前我父亲手下的一位叫阿伦森<sup>3</sup>的经理转达我的问候,他要从芬兰途经我国,移民到美国去。他到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不过你没有必要见他或是为他做任何事,他很厉害,完全能够照顾自己。我会尽快再给你写信。把我全部的爱都给菲利克斯,我想他正积极地从事着我们的事业。我想,你一年前还在这里,然而这一年似乎孤立在正常年份之外。我希望你非常幸福,非常健康。

307 沙耶

---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mourir en combattant。

2 指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1856—195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1934年任战争部长,1940—1944年担任通敌的维希政府首脑。他被判叛国罪,但他的死刑判决被减为无期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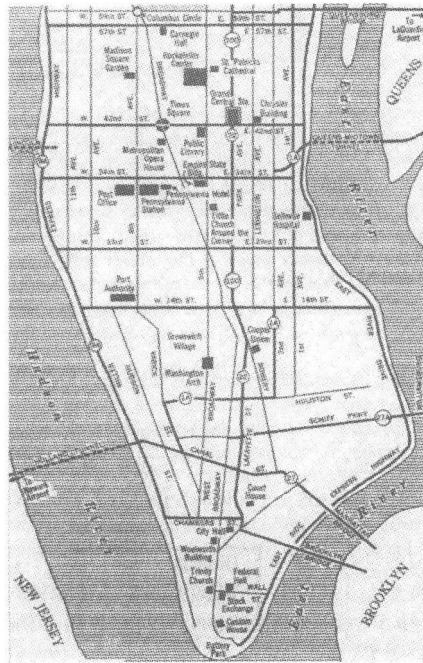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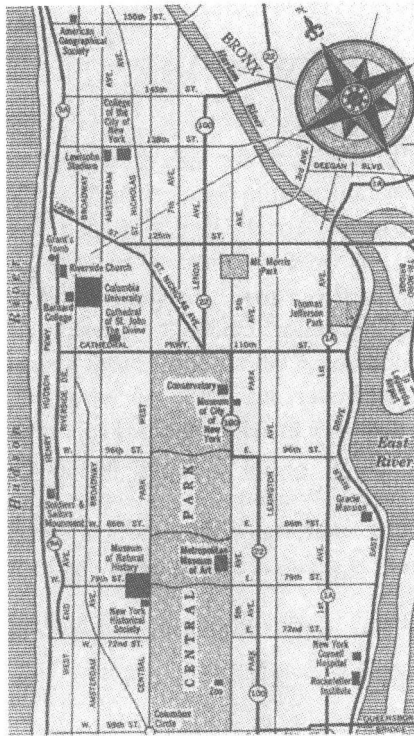
3 塞缪尔(·穆利亚)·阿伦森,门德尔在芬兰的坑木企业的前经理。

## 纽 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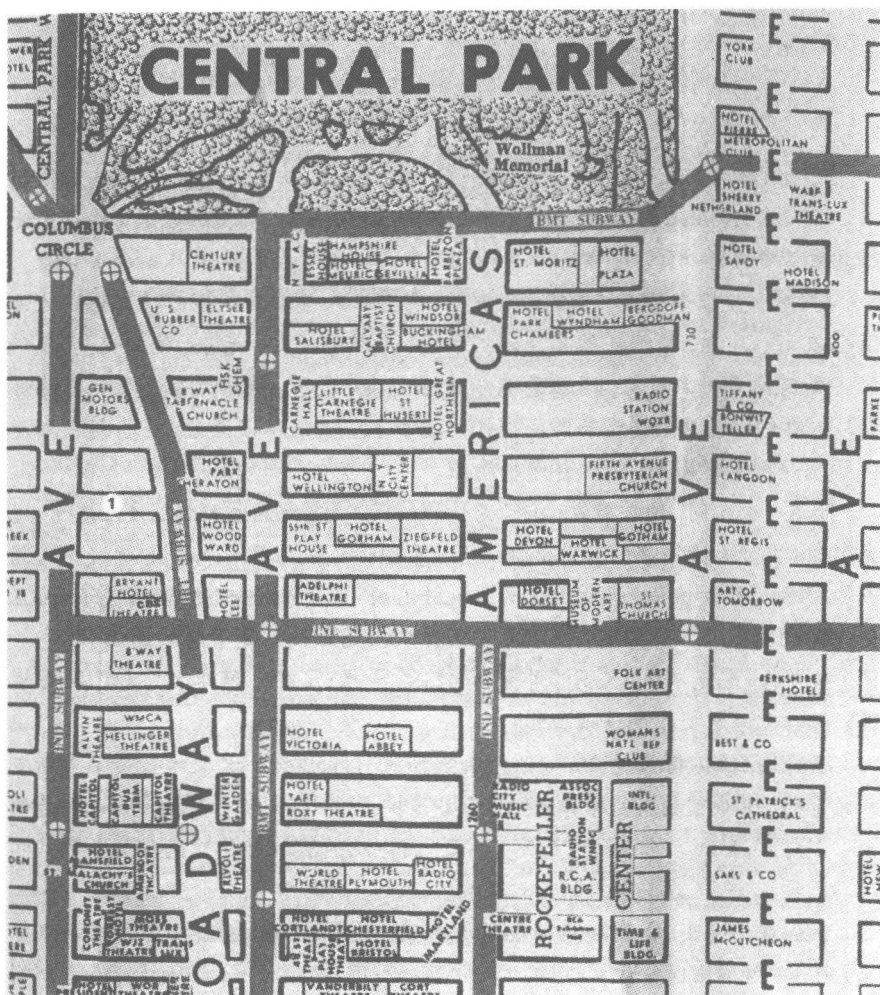
[英国驻纽约新闻处]主任<sup>1</sup>身边的济济人才中有一位星光耀眼的人物,即以赛亚·伯林先生。他1940年夏天来到华盛顿,表面上他作为新闻专员被派往莫斯科,洛锡安勋爵<sup>2</sup>说服他留下来担任新闻顾问的咨询员职位。在杰拉德爵士的领导下,伯林先生负责处理与工会、犹太媒体和名人政要的关系。<sup>3</sup>但事实上,他的深邃智慧使他在更广阔的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顾问。随后,伯林被巴特勒先生<sup>4</sup>调到大臣办公室,负责华盛顿的新闻事务,他负责所有调查事宜,尤其是编写每周的政治报告,由大使发往伦敦。

——约翰·惠勒一班纳特, 写于1946年<sup>5</sup> 309

- 1 杰拉德·坎贝尔爵士(1879—1964), 1941—1942年任驻纽约英国新闻处主任。在1987年9月29日为尼古拉斯·卡尔的书《推销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针对美国“中立”态度的战争宣传运动》(纽约和牛津, 1995)所做的访谈中, 伯林说到, 虽然坎贝尔“人很好, 但他的才智仅限于做漂亮空洞的餐后讲演”。
- 2 菲利普·亨利·科尔, 十一世洛锡安侯爵(1882—1940), 1939年8月起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 直至他在1940年12月过早去世, 在加强英美关系方面声名遐迩。在这段叙述中惠勒一班纳特夸大了他在劝说伯林留下来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 的确, 班纳特此段叙述总体来说虽然不是太可靠, 但基本符合事实, 不过, 为体现二战刚刚结束时人们对伯林战时服务的评价, 这里还是收入这段记述。
- 3 在接受卡尔的访谈时, 伯林在犹太人和工会组织之外又加上了黑人和天主教徒, 还提及“对少数团体的宣传”。英国新闻处的官方记录把伯林列为“专家”之一, “劳工和犹太利益”是他的职权范围, 他的月薪是300英镑(外交部371/30667, A /701/399/45, OEPCC/1126, 附录B, 示意图III)。
- 4 哈罗德·贝尔斯福德·巴特勒(1883—1951), 1932—1938年任国际劳工组织干事; 1939—1943年任纳菲尔德学院建院院长; 1942—194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公使兼情报处负责人。
- 5 引自《驻美英国新闻处的历史》, 未出版打字稿(1946, 纽约, 英国新闻处), 外交部文件第27—28页。约翰·惠勒(原文如此)·惠勒一班纳特(1902—1975), 1939—1940年在纽约英国新闻处图书馆任职; 1940—1941年任驻纽约英国新闻处副主任; 1941—1942年任驻美英国



曼哈顿, 洛克非勒中心



曼哈顿中城局部图，图中可见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以及第55街(1)的一些酒店，伯林曾入住这些酒店

新闻处主任特别助理；1942—1944年任驻美英国政治战争外交使团纽约办事处负责人；1944年任职于外交部情报部，1945年任副主任；1944—1945年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顾问助理。



首次前往美国之时，伯林的战前牛津生活就基本结束了，接下来的这封信记录了这次旅行。虽然写这封信时，伯林还未在纽约安顿下来，但这里自然成为他翻开生活中的新一页的地方。

6月底，一位老朋友，盖伊·伯吉斯，突然出人意料地拜访了他。他认为盖伊很友好、风趣，虽然显然品德不够端正，也不够稳定。后来，他回忆：“我不仅不知道他是一名特工，还丝毫不怀疑他是共产党员，虽然大多数人都有此怀疑。”<sup>1</sup>他们以前见面通常长时间谈论书籍和人，从来不谈论政治；当伯吉斯变得越来越醉意醺醺时，伯林会保持清醒。

而这一次不同，伯吉斯宣称自己为情报部门工作，他的大人物朋友哈罗德·尼克克尔森（当时是情报部的一位低级大臣）希望伯林成为英国派往莫斯科的新闻专员，“因为你懂俄语，而他们认为这也许有用”。虽然这个想法不够实际，而且伯吉斯的突然介入显然有悖常理，但伯林先生还是受到这个想法的吸引，先去见了哈罗德·尼克克尔森，又见了外交部的格莱德温·杰伯<sup>2</sup>，两者之前都已经被说服让伯林从事所提议的这项工作。

经同意，伯林将去莫斯科，伯吉斯会和他同行，当然，这次旅行是伯吉斯本人怂恿的，他希望利用伯林作为他自己去苏联的掩护。这次旅行的目的也许是使伯吉斯与NKVD<sup>3</sup>（苏联秘密警察）见面，因为他们驻扎在伦敦的特工当年早些时候已被撤回，无法与其进行正常联系。

于是在7月1日，哈利法克斯勋爵签署了一份情报员护照，要求给予“以赛亚·伯林先生自由通行权，前往莫斯科，途经美国和日本，并返回伦敦，负责新闻报道”。他为伯吉斯签署了同样的护照。

事情发展之神速使伯林茫然，他越来越为自己被派遣的理由感到焦虑不安，伯林和伯吉斯乘火车去利物浦，他们将在那里登上安东尼亚号轮船。他后来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7，其他未作注解而引用的伯林说过的话均引自此，下文为1940年所做的提要也引自此。

2（赫伯特·迈尔斯·）格莱德温·杰伯（1900—1996），格莱德温男爵一世，1937—1940年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私人秘书，1940—1942年任经济作战部助理大臣，1945年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1946年任联合国代理秘书长。

3 即“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1934—1943年是苏联秘密警察组织的名称；此前（1923—1934年）它的名称是OGPU，即“[为与反间谍和反革命斗争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1943—1946年）成为NKGB，即“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部”。

如此形容自己最后一刻的恐惧：“我那时想，我必须告诉某个人我在做什么，因为我也许永远也不能回来了，必须有人知道这件事。”他想到了全灵学院的莱昂内尔·柯蒂斯。

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莱昂内尔，我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或者我要做什么，但是我认为我最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去华盛顿，312 这样我可以获得乌曼斯基<sup>1</sup>给予的签证，我想如果有谁应该知道此事，那么这个人就是你。所发生的事，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告知政府成员。你是我所认识的最重要的政界人物了。”大意如此。

这封信被审查员拦截，柯蒂斯受到询问。“他害怕极了，很不高兴，”伯林记得，“认为我以某种方式连累了他，也许[有]预谋。我记得我后来见到他时，他对我抱怨此事，不过[……]当我在华盛顿成为重要人物时，他的看法突然改变了，还说我给他写信是一件多么聪明的事。如果有谁是趋炎附势的人，他就是一个。”

像以往一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伯林只字不提自己的忧虑。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二 [1940年7月9日]

康纳德“白星”号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十分舒适、自信、快乐。我们船上满员了，当然，就刚吃过的一餐而言，食物很好。我会尽快和你们联络，你们知道，不会有一个星期左右那么久。由于我们的官方身份，启程很成功。我观察到在我同行的伙伴中有

---

1 康斯坦丁·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乌曼斯基（1903—1945），1938—1941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3年5月起被委任为苏联驻墨西哥大使，直至于1945年1月的飞机失事中遇难。

(1) 伯格纳小姐<sup>1</sup>和她的丈夫(2) “隔壁的科恩”<sup>2</sup>! (至少我想那是他。就像我一样, 在船启程之前他疯狂地写信。) 我的旅伴完全在我的影响之下(虽然不是你们所抱怨的非常压抑的影响), 我已经向他传达了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对他的怀疑<sup>3</sup>, 这样可以使他规矩一点。他办公室的电话是白厅 8066 (你们要写下来!), 可以找他打听消息<sup>4</sup>。我得说, 他们很善于安排他们的官员出境, 整个流程顺畅无比。我想你们遇到危机时会发现他们很有帮助; 如果遇到危机, 他们会和我们站在一边的。我几乎不需要再次向你们保证, 我是多么注意自己的健康和举止, 等等。如我所说, 当我离开时, 想到相对于你们我自己是如此幸运, 这比别的任何事都使我感到压抑。我非常健康, 非常开心。我爱你们俩。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无论如何。

爱你们的

沙耶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三 [1940年7月10日]

康纳德“白星”号

亲爱的爸妈:

我们还没有动身。绝密。所有人都舒服地待在自己的监狱里。除了“隔壁的科恩”(我还是没有很确定是他, 很活跃的一个人<sup>5</sup>), 二十五位牛津教师的妻子, 三位我刚刚在牛津出卷考过的加拿大人; 和我同船舱的是一位

1 伊丽莎白·伯格纳 (1900—1986), 女演员, 与保罗·吉纳博士结婚。

2 约瑟夫·科恩, 不列颠与殖民地家具公司联合总经理, 卡文迪许家具公司联合副总经理。他原先住在汉普斯特的西斯大道26号, 与门德尔·伯林以前的生意伙伴、住在27号的梅耶·比克是邻居。显然, 他从这个地址搬走后, 他的绰号保留了下来, 用以区分他们熟人中其他同名的科恩, 就像威尔士人称呼“挤牛奶的琼斯”等一样。

3 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已经建议伯林慎重对待和伯吉斯的友谊; 不过这里提到的也许是她的兄弟维克多, 他当时在秘密情报部。

4 伯林此处原文为: *renseignements*。

5 伯林此处原文为: *Очень подвижной*。

舒勒教授<sup>1</sup>，我怀疑他是前奥地利驻罗马大使<sup>2</sup>，他是位马拉诺<sup>3</sup>犹太人，一度是维也纳社交圈的精英，是[伍尔夫·]哈尔彭曾经以为自己想娶的一位女孩的父亲或是叔叔。如果他是我说的那个人<sup>4</sup>，那么他就认识全灵学院的院长，而且是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我们会知道是否是这么回事。目前我们彼此交谈还不多。不过，所有客舱服务员都有把握地说，船至少需要在海上迂回航行十四天，我们才能到达蒙特利尔。最后三天溯圣劳伦斯河而上的航程安全而且景色宜人。伯格纳小姐长着雀斑，穿裤子，而且很丑。赫尔·吉纳，她的丈夫，非常喜欢她。两个人都是红头发。他看起来就像头猪，像斯特雷泽曼<sup>5</sup>。我们一等舱的女士们(牛津教师的太太们住三等舱——我很快就要像女慈善家那样拜访贫民区了)如今非常时尚，男人们就有点土了。食物和水都很好。伯吉斯先生承诺每天只喝半瓶葡萄酒，不喝烈酒。食物非常充足，令人惊叹，面包好吃得就像梦幻里的一样。我们船上 314 有几位法国人，他们听着黎塞留<sup>6</sup>的故事，心情显然很复杂。我那件橡胶雨衣要么在(a)斯特兰区布什大厦的帕克·多福商店，我在那里买过钢笔，要么(b)在摄影师杰罗姆那里，也在斯特兰区，靠近蒂沃利，我想。我真的非常开心。

爱你们的

建议你们尽快转比如说1000英镑到百慕大<sup>7</sup>，看看这笔钱作用怎样，提一下J.G.福斯特的名字，或者少转一点。为什么不呢？

1 理查德·舒勒博士(1870—197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奥地利商会常务次长；一战后他成为奥地利政府的经济总顾问；1934年任国际联盟奥地利公使；1938年底离开维也纳；1940—1952年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教授。伯林对他的进一步评论见7月16日的信件，下文第374页。

2 舒勒事实上不是驻罗马大使，虽然他确实认识墨索里尼。

3 伯林此处原文为：marrano。指受到恐吓或是事实迫害，为避祸而表面上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或者穆斯林)；由此还指试图掩盖自己犹太身份的犹太人。

4 他正是。

5 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总理(1923)与外交部长(1923, 1924—1929)。

6 法国战舰，在非完全在役状态，1940年6月18日被迫撤往塞内加尔的达喀尔。

7 为了资助玛丽在里加的家人，见8月2日的信件，下文第383页。

## 致玛丽与门德尔·伯林

星期二 [1940年7月16日]

康纳德“白星”号

亲爱的父母亲：

船上的日子虽然单调，但极其舒适宜人。明天我们到纽芬兰；星期四，魁北克；星期五，蒙特利尔。为了避开那些数不清的孩子们上岸制造的喧闹，我们也许在魁北克上岸，或者继续航行。一路过来，波澜不惊。我们船上挤满了人；船只在星期三开，行程缓慢而不确定。我们按照英国海军部的命令煞费苦心蜿蜒前行。沿途有些深水炸弹也许已经或者还没有投在我们的航线上，没有人对此有把握。我的计划是让我的同伴<sup>1</sup>继续前进，如果他觉得时间比较紧迫，而我继续逗留，直到路障碍完全清除，在大使馆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事，不论是什么。现在，我有这些熟人们作伴：

(1) 我很熟悉的三位牛津教师的妻子。总计有25+75个牛津教师的孩子。他们制造的噪音太可怕了。船上永远都有躁动不安的孩子在每件家具和装备的后面、上面、里面、上方、底下制造噪音。只有在晚7点之后才安宁下来，随后在甲板下遥远的地方，三等舱那里，再次爆发。我们一等舱的乘客与甲板下的底层世界宁静地隔绝了。可是对于那些母亲以及那些没有母亲在身边的孩子们，这样的状况真是地狱一般。牛津教师们的妻子有时上来和我一起打发晚上的时间，她们中有一位是 [斯塔福·] 克里普斯的秘书的姐姐，那人如今在莫斯科，是三等秘书。<sup>2</sup>我们聊着关于世界和我们朋友的话题，非常平静。

---

1 盖伊·伯吉斯。

2 约翰·莱欧瑟斯利·拉塞尔 (1914—1984)，1939—1942年任驻莫斯科外交官，1942—1945年驻华盛顿，1945—1948年驻华沙。其姊卡米拉·乔治安娜 (1912—1983) 嫁给了作家兼记者克里斯托弗·休·塞克斯 (1907—1986)，塞克斯实际上并非牛津教师。

(2) 犹太人们。首先是这些人：“隔壁的科恩”、“隔壁的科恩太太”，还有列维特<sup>2</sup>。公司整体迁离了。我和他们没有正式的关系。我们互相对视，洞悉一切，但没有相认。我怀疑他们是去加拿大的分公司。列维特一言不发，非常阴沉，他的妻子去世了吗？科恩也不开心。他们晚上一起玩牌，不过很沉默，没有了以前的活力和热情，看不出一点辛顿宅邸的迹象。和他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林肯先生和太太。<sup>3</sup>林肯太太立即就和我说话了，说她认识伯林太太，她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女人，她是在戈尔德斯·格林马戏表演场碰见她的。他们的儿子艾许·林肯是文学硕士、律师、犹太教饮食规定委员会<sup>4</sup>成员，他在牛津认得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是一对非常亲切活泼的夫妇，你会喜欢有他们陪伴。首先，他们在三四个小时之内就把船上每个人的底细摸清了。科恩去哪里，哪一位是伊丽莎白·伯格纳的丈夫，哪一位是她的朋友，那位加拿大将军对船长说了什么，而船长又拒绝对他说什么，每个人身上都带了多少钱（我聪明地避开了盘查，他们有点疑惑和生气，我想，不过还没有对我绝望）。晚上他们那个角落活脱脱就是布朗德斯布里<sup>5</sup>的家庭旅馆。他曾经是个教士，知道我们所有朋友的秘史，例如，O. 菲利普先生<sup>6</sup>的房子就在布莱顿旁的戈林那里，他何时离开、又为什么离开。埃尔斯里·赛林先生<sup>7</sup>上次战争时做过什么，他为什么会在纽约，后来为什么又到了中国。吉宁一家<sup>8</sup>在哪里。我认真读过他们家儿子写的关于犹太理

1 伯林此处原文为：imprimis。

2 约瑟夫·E.列维特，不列颠与殖民地家具公司主席和联合总经理、卡文迪许家具公司联合副总经理。

3 鲁本和芳妮·林肯，弗（雷德曼）·艾许·林肯（1907—1998）的父母。弗（雷德曼）·艾许·林肯，1925—1928年就读于埃克塞特学院法律专业，1928—1929年攻读民法学士；战争期间在皇家海军志愿者预备队扫雷，后来成为出色的质检员。

4 犹太教饮食规定委员会是犹太法律团体，规定犹太人能吃何种食物，以及这些食物应该如何烹饪和食用，符合这些标准的食物是“可食的”（与“犹太教饮食规定”词根相同）。

5 见上文第114页注5。

6 奥斯卡·菲利普（1887—1965），金属经纪人，住在冯克罗夫特大街，靠近霍利克罗夫特大街（见上文第4页）；从菲利普的房子可以看到伯林家，他成为玛丽·伯林的朋友。在战争开始时，他们一家离开伦敦搬到了西沃辛，靠近苏塞克斯的布莱顿。

7 埃尔斯里·赛林（1878—1959），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中国居住，是伦敦的一名律师，住在汉普斯特，是“契约之子”犹太组织伦敦分会的活跃分子。

8 来自伦敦西北部戈尔德斯山公园的吉宁一家在公园巷的格罗夫纳大厦拥有一家古玩店。

想、送给虔信家庭阅读的装帧雅致的书，我还称赞了它。<sup>1</sup>他们和其他一百名乘客吃“可食的”犹太餐，连声说好。多年来，他们每年都去美国，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在海军服役，老四在美国，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很喜欢时不时和他们聊一些闲话，他们试图把我介绍给一位从里加来的年轻女士（已婚的），我成功地躲开了。他们指出，她有一位完美的都柏林丈夫，就在船上，我什么也不用怕。但是我对芬克尔斯坦小姐<sup>2</sup>的事还记忆犹新，于是拒绝了。每天早上我都向林肯夫妇询问船上社交史的新闻（我想林肯先生是出身伦敦东区而又出生在这里的犹太人，一点也不愚蠢；林肯太太也不蠢，她过去在戈尔德斯·格林犹太会堂常坐在你旁边），他们确实是很让人喜欢的市民，虽然粗俗。最有趣的是我的同舱，舒勒博士，他的女儿曾经和哈尔彭订婚（我隐瞒了我了解此事的事实）。他在奥地利外交部待了四十年之久，签署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圣日耳曼的和平协议。<sup>3</sup>说起托洛茨基，他话语风趣。他们1907年在维也纳认识，后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再次见面，他还说起了埃伦索尔<sup>4</sup>、弗朗兹·约瑟夫<sup>5</sup>、陶尔斐斯<sup>6</sup>，等等。过去，他常来全灵学院找亚当斯，还认识洛锡安、墨索里尼、里宾特洛普<sup>7</sup>等人。他几乎不能算是犹太人，除了像福劳·卡西尔<sup>8</sup>对[H.W.B.]约瑟夫说的那样，为了希特勒，也为了我。他在美国有个女儿，七十二岁了，无疑会待在那儿，一位典型的奥地利犹太裔，傲慢机敏、中规中矩的官员。

1 F.艾许·林肯，《正统有意义吗？》（伦敦，1934）。

2 塔佳娜·芬克尔斯坦（1914—1974），来自里加，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三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之后，1935年到圣体学院（攻读国际法学学士学位），门德爾的商业伙伴迈耶·比克请伯林把她“介绍给一个品行好的朋友圈子，并且，只要有时间，就照顾她”：1935年10月9日信件。她的父亲后来被人侵入里加的纳粹杀害。

3 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3日），奥地利和其他中欧势力把严苛的和平条款强加给了俄罗斯。但是《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9月10日）导致了奥匈帝国的分裂。

4 施洗者埃罗伊斯·里奥波尔德·约翰，列克萨·冯·埃伦索尔伯爵（1854—1912），奥匈帝国外交官、外交部长（1906—1912）。

5 弗朗兹·约瑟夫（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与匈牙利国王（1867—1916）。

6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1892—1934），1932—1934年任奥地利总理。

7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1893—1946），1933—1945年任德国外交部长。

8 也许是托尼·卡西尔，恩斯特的妻子（与表妹），或者也许是艾尔丝·卡西尔，恩斯特的堂兄弟、牛津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的妻子，以及布鲁诺的堂兄弟保罗·卡西尔的姐妹。

还有军官的妻子们，带着保姆和孩子，她们对他们不太好。还有几位领事官、伯格纳一家、几名士兵、回家的加拿大人（他们人最好）、一帮法国人、中国人，等等。我们的外交身份得到了船上侍者的特殊尊敬。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危险了，这些个晚上都可能看见陆地。天气好极了，不过你们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一定已经收到了我的电报。我打算去蒙特利尔（或是魁北克）—纽约—华盛顿，到大使馆报到，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之后再给你们发电报。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在百慕大的朋友们的事。<sup>1</sup>我情绪高涨，对英格兰，317  
对我们自己，对一切，都充满自信。我希望在纽约商船队队长那里找到阿伦森的地址。如果我待在华盛顿，我会发电报告诉你们地址，华盛顿特区，英国使馆，临时地址，约翰·福斯特转交。

爱你们的  
沙耶

伯林和伯吉斯在魁北克下了船，往纽约进发，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周末。伯吉斯找到了迈克尔·斯特雷特<sup>2</sup>，后发现他亦是剑桥间谍集团<sup>3</sup>的成员。伯林拜访了住在马萨诸塞州西斯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被介绍给莱因赫尔德·尼布尔<sup>4</sup>，后者提出要替伯林接触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当伯林和伯吉斯最后

- 1 在这封信以及此后的信件中，令人困惑地提及的在西印度群岛的亲朋似乎是为了转移信件检查员的视线，使其不那么留意把门德尔的投资资金转移给玛丽娘家这件也许有点特殊的事情。
- 2 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1916—2004），美国经济学家、作家、教师、自由主义事业坚定的支持者；1937—1938，1940—1941年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学家；1941—1943，1948—1956年在他父母创办的自由主义期刊《新共和国》当编辑。（1963年，他承认和剑桥间谍集团的联系，他1937年在剑桥念文学硕士期间，该间谍集团形成，他的供认导致了安东尼·布伦特的暴露。）
- 3 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哈罗德·金·菲尔比在1930年代初期在剑桥念本科时相遇。他们和安东尼·布伦特一样，被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招募为间谍。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后来为外交部工作，菲尔比与（战时的）布伦特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多年来，他们为苏联提供高度敏感的情报，直至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于1951年暴露。布伦特1979年身份被公开，他于1964年向英国当局秘密认罪。
- 4 莱因赫尔德·尼布尔教授（1892—1971），牧师，自1928年起任纽约联合神学院伦理学与神学研究生教育荣休教授。



抵达华盛顿时，一封署名为英国大使洛锡安勋爵的加密电报寄到外交部格莱德温·杰伯手中，电报中的信息事实上来自伯林：

致格莱德温·杰伯

1940年7月24日 [加密电报的普通文字打印稿]

[华盛顿特区，英国大使馆]

这里的俄罗斯人出乎意料地合作。法兰克福特以及其他要人都很友好，准备慎重地帮我说情。俄罗斯的签证批下来了，但只有在大使正式要求任命新闻专员，并且得到莫斯科与伦敦的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出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批准。

外交部 371/24847,N6063/40/38<sup>1</sup>

318 此时，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恰好在华盛顿，听到伯林将与伯吉斯同去莫斯科的计划，她感到十分惊惧。她对伯吉斯一直看法不佳，她的密友约翰·福斯特和她一样对伯吉斯存有怀疑。在她的敦促下，福斯特催促大使馆办公室主任，德里克·霍耶·米勒<sup>2</sup>阻拦了伯吉斯的计划。霍耶·米勒同意根据情况提出意见。伯林似乎对这些策划一无所知，并且，菲茨洛伊·麦克莱恩<sup>3</sup>7月27日答复洛锡安“我们并不希望伯林或是伯吉斯前往莫斯科。伯吉斯应该立即返回英国，伯林并未受聘于英王政府，可以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时，伯林大吃一惊。

---

1 下文1940年的前言中的引文亦来自于此。

2 弗雷德里克·罗伯特·霍耶·米勒（1900—1989），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办公处处长、顾问；约翰·福斯特的亲戚；后来（1961年）成为因奇拉男爵一世。

3 菲茨洛伊·修·洛伊尔·麦克莱恩（1911—1996），外交官、士兵、下院议员、作家、历史学家；被普遍认为是伊恩·弗莱明创作詹姆斯·邦德的灵感来源；此时他在伦敦外交部的北方司；1943年跳伞降落至南斯拉夫，作为丘吉尔的私人特使与铁托会见；后来（1957年）成为敦康奈尔的麦克莱恩准男爵一世。

致玛丽·费希尔

1940年7月30日

自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

亲爱的玛丽：

今天早上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的旅行一切顺利，我们在船上，我把我想到的一切都写信告诉你。美国既是可预测的，又是不可预测的。开始时它似乎很熟悉，尤其是经过加拿大逐渐进入这个国家时，很快幻想就烟消云散了。主要的好处在于，所有人以及一切都很容易，能让人感到舒适的东西一样不缺，一切都可以预见，食物也棒极了。火车很舒服，人可以坐飞机去任何地方。温度在华氏94度到99度之间，不过即使是在有隔热设施的地方也有空调。人们性格外向、友好，要么是佩吉太太<sup>1</sup>（或是普拉斯科特太太<sup>2</sup>，或是任何美国籍牛津教师的妻子）那种类型，要么是布洛根<sup>3</sup>的类型，再就是张伯伦教授<sup>4</sup>那种类型。法兰克福太太在这里看起来更单纯了，更直接地受周围环境影响。她无需多费力气就能理解我们的复杂体系，放松了，服从本能反应。人们只能佩服她在牛津的非凡、敏锐的感知力，当意识到她——还有别的所有人——是如此不费力气地住在这里时。和我们相比，一切都换成了低速档。单调的生活、流线型的机制及可预期性使一切运转得更快。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智力的能量还是神经质的干劲都是不需要的。我很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对精密繁复的事物感到吃惊或是受伤，这在他们看来，是针对他们的简单行为方式而故意采取的复杂态度。纽约有些地方像巴黎右岸<sup>5</sup>，有些地方像现代德国城镇，无论从什么地方看都不像伦敦。它是座南方市镇，虽然有摩天大楼、室内生活等，只不过它的

319

1 凯瑟琳·伊丽莎白·佩吉，古典学家丹尼斯·佩吉（1932—1950年为基督教堂学院的研究学者、导师）的美国妻子。

2 伊迪斯·艾丽丝·普拉斯科特，H.H.普拉斯科特的加拿大妻子，普拉斯科特先生于1932—1960年任天文学萨维里安讲席教授及新学院研究员。

3 丹尼斯·威廉·布洛根（1900—1974），历史学家，1934—1939年任圣体学院研究员、导师，1939—196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4 也许是劳伦斯·亨利·张伯伦（1906—1989），政治科学助理教授。

5 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城区，即城市的北区。

街道与露天广场都是室内的，和通常许多地方都不一样。新英格兰（波士顿我还没见过）也许像荷兰，别的城镇像瑞典等地方。也许有个别内向的人、神秘的人等等，但是没有社会性的神秘感，没有特别的、原则上不能以明确图示来表现的社会性迷宫，就像牛津、剑桥、布卢姆斯伯里，甚至我想，像爱丁堡那样。这很严重，这里完全没有盐、辣椒、芥末，等等。没有火花，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一切都是明确固定、清楚阐明的。如果你省略了什么没说，他们就会礼貌地坚持请你把话说完。由于无法用这么多言语来补充说明，于是经常性的误解，对虚情假意、势利傲慢、晦涩费解等等的指控就注定要发生了。我怀疑亨利·詹姆斯之所以像他那样写作，是因为他徒劳无益地想把一切说明白，知道做不到，但还是饱尝可望不可及之苦。对美国的主要指控是它极其单调乏味，康诺利先生<sup>1</sup>无疑是个例外。华盛顿很壮美，非常正式，绿树掩映着有白色立柱的1803年帕拉迪奥式建筑，街道（他们说是大道）非常宽阔，有其明白无误、毫不含糊的目的。人们矫揉造作、非常好客、彬彬有礼。外交官、记者、政治家构成主要阶层。我绝望地靠拢英国人，热切地渴望能够[回]家。英格兰比这里能够发现的最好的东西还要无限好。无疑这正是18世纪末对19世纪的看法。19世纪要处理更大的问题，鄙视18世纪，因为它在细节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看不见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十分之九。我们理论上也赞同19世纪对18世纪的看法，18世纪主要抱怨19世纪对非常细小的差异缺乏关注。更猛烈的扫荡在这儿，而不在英国，它更大胆，与事实所要求的更合拍（我敢说），可就是缺乏品位。如果一个人的眼睛习惯了小的暗部，局部视野是很单调的。不是对那些有宏观视野、能看见更大单元的国民而言。政治上，他们紧张不安，很害怕，不过我不相信他们能够迅速行动。政府几乎和战时状态一样，至少在心理上是如此。不列颠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得到大力宣传。我们在这里的宣传攻势做得很不好。一年以前，没有采取宣传政策也许可行，可如今这样的做法不再合适了。<sup>2</sup>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派（1）斯文顿陆

1 维拉德·康奈利（原文如此）（1888—1967），1925—1927年就读于新学院英文专业。

2 这个评价预见1940年8月的重大政策变化。由于美国不信任宣传，英国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

军少将<sup>1</sup> (2) [哈罗德·]拉斯基(3)陶尼先生<sup>2</sup> (4)也许是斯彭德先生,也许是贾文先生<sup>3</sup>。前三位是法兰克福特选择的人,所以一定要跟别人说。他们都将比情报部的人能干得多。他们有听众群,上千万的学生崇拜拉斯基;我想,陶尼给《纽约时报》写了封信,反响很大;斯文顿会打动罗斯福的反对者;洛锡安非常受欢迎,随和、和蔼可亲、活络、松散、敏捷、能干,是一位即席演讲者。洛锡安和福斯特做得很成功,使馆里的其他人就很傻了。

我自己的事进展比较慢,外交部既懈怠又不太积极,但我正在搜集火药,这周结束之前将要引爆。然后,我希望往鄂木斯克与托木斯克进发。我昨天见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劳伦斯·A.斯坦哈特<sup>4</sup>,一位强硬、聪明、见多识广的犹太律师。他痛斥西兹<sup>5</sup>,因为西兹(a)既懒且蠢(b)对他很冷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英派,而且必须受点教化。如果你见到外交部的人,一定要告诉他们,克里普斯应该装腔作势地对他好一点,这很要紧。如果我到了,我会真正努力并自己搭建桥梁。他真的像他们在这里说的,因为受到的对待而暴跳如雷,而且他说了半个小时这些事,而后才开始谈我的事情。总体而言,这还好,亲英派的感情在中产阶级中存在,在深度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培养。即使是帕肯汉姆们,假使联合行动起来,也可能唤起这样的感情。我待在这里无所事事,深感厌倦,缓慢谋划,缓慢行动,不过,我肯定事情只能按照这样的节奏发展。我担心我的母亲,虽然在我离开的时候她曾非常勇敢,但我怕她随后要崩溃。<sup>6</sup>关于情感投资、权利、义务以及投资者的合适技巧的整个问题,对我来说十分晦涩难懂。我知道自己在杰

321

月采取低调政策,依靠美国的舆论主导者来改变该国原有的孤立主义的不参战心态。法国沦陷了,人们意识到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可能无法幸免,恰逢此时,美国计划给予盟军援助的意愿日益强烈。这封信后不久,英国就采取了更积极的宣传政策。另见下文第398页注2。

- 1 厄内斯特·(邓洛普·)斯文顿,陆军少将,1925—1939年任军事史齐契利讲席教授,全灵学院研究员。
- 2 理查德·亨利·陶尼(1880—1962),1931—1949年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
- 3 詹姆斯·路易斯·贾文(1868—1947),1908—1942年担任《观察家》编辑。
- 4 劳伦斯·阿道夫·斯坦哈特(1892—1950),1939—194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42—1945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45—1948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8—1950年任驻加拿大大使(在飞机失事中丧生)。
- 5 威廉·西兹爵士(1882—1973),1939—1940年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 6 玛丽·伯林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沙[耶]7月11日走了,上帝帮帮我,哦,上帝!”

罗姆拍的那些照片看上去很吓人。我不上相。因此，我自嘲地说，应该让妈妈了解这点，越早了解越好。

请向你母亲和史密斯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天晓得，向我打听新学院院长情况的洛锡安勋爵居然从未听说过史密斯先生。当地人对哈勒奇<sup>1</sup>的看法毫不留情。这里的障碍排除专家希望希钦斯<sup>2</sup>能来，并认为约翰·莫德会喜欢这么做。琼[·莫德]很快就要有孩子了。福克夫人<sup>3</sup>和伊夫林·费尔普斯—布朗<sup>4</sup>看上去都很好。我很快会再写信。

爱你  
沙耶

盖伊·伯[吉斯]今天启程回英格兰。英国外交部对我不太感兴趣，看来得自己找工作了。我不清楚自己在这方面可能有多么无能。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0年7月31日

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

亲爱的爸、妈：

我已安顿下来，而且生活优裕。约翰·福斯特对我盛情款待，让我与他同住在别人借给他的漂亮房子<sup>5</sup>里。每天，我同记者和罗斯福新政支持者们见面，从容计划着下一步的行程。盖伊·伯吉斯被召回国，他应该已经

---

1 哈勒奇勋爵是新学院的荣誉研究员。

2 威廉·莱昂内尔·希钦斯(1874—1940)，1893—1897年就读于新学院古典学专业，米尔纳勋爵在南非的“改革启蒙运动”的成员，著名商人。

3 (沃纳·)戴维·福克(1906—1991)的妻子。戴维·福克生于德国，是一位道德哲学家；1936—1938年就读于新学院PPE专业，1942—1950年任哲学导师(1950年移居澳大利亚，1959年移居美国)。

4 多萝西·伊夫林·莫斯坦·费尔普斯—布朗，新学院经济学家亨利·费尔普斯—布朗的妻子。

5 奇怪的是，1998年我去看这所房子时，感觉它并不起眼，比不上同一条街上的其他房子，至于漂亮就更谈不上了。

打电话给你们了。到里斯本的“快速帆船”<sup>1</sup>和从里斯本到英国的航空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当然，价格昂贵。假如我不得已需要飞回去，我得尽量用英镑支付。因此，你们可能会收到电报，要你们付钱给在伦敦的某个人。弗雷德·劳<sup>2</sup>和往常一样，总是和女人有扯不完的关系。他非常热情，主动提出我在纽约时，可以把酒店公寓让出一部分给我住（总的来说，比起与穆利亚<sup>3</sup>同住，更舒适也更自由）。他在菲力普兄弟公司<sup>4</sup>上班，该公司位于纽约松树街70号。他住的肖勒姆酒店在第55街。阿伦森夫妇住在百老汇附近一套小巧、舒适、价钱昂贵的公寓里。他抱怨说没有熟人关系，问我能否帮他与沃伯格家族<sup>5</sup>牵牵线。这种事，我当然不能做也不愿做。现在想来他该明白了。他白天黑夜不停地收听广播，疯了般地想念英国，完全没有必要也毫无来由。昨天，我见到美国驻苏联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先生，此人非常有趣，是一位干练、实际的律师。他热情地鼓励我，并邀请我哪天刚好在附近时到他家吃饭。他属于那种活力充沛、干劲十足的犹太人，这类人总是能取得很大成就。他对俄国以及侨居俄国、绅士风度十足的英国同胞的看法，令人受益匪浅。他对工党政治家克里普斯满怀希望。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sup>6</sup>今天要发表一个讲话，听听他会说些什么。妈妈一定会非常喜欢美国：这里的人性格开朗，充满活力，认定二乘二只能等于四，是非分明，不喜欢模棱两可、含沙射影。随处都可以吃到精美绝伦的食物。这里亲英情绪浓厚，但有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洛锡安勋爵和福斯特可谓大获

322

1 因为有“大型帆船”一说，横穿大西洋的水上飞机被称为“快速帆船”（clippers）。

2 指弗雷德里克·所罗门·劳（1906—1956），伦敦金属材料交易商德比公司的年轻合伙人。由于工作的重要性，战争时期未被征召入伍，而是来到美国积极开展贸易。他在伦敦时也很活跃。因为其母亲是玛丽·柏林的朋友（见下文第391页）而认识柏林。

3 即萨缪尔·阿伦森。

4 一家著名金属材料经纪公司，1909年由奥斯卡·菲力普以他自己和兄弟的名义创建，先是在英格兰，1914年迁移到纽约。

5 美国著名金融世家，是英格丽·沃伯格及其父母的近亲。见下文第846—847页。

6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1890—1986）的笔名，苏联政治家，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1930—1941年任俄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42年任副主席（在斯大林本人接任政府领袖之后），1942—1946年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39—1946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9年与纳粹德国就《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平条约》进行谈判。俗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粗制燃烧瓶（汽油弹）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成功。法兰克福特夫妇对我好极了，尽其所能为我介绍情况，不断鼓励我。他们认为，不管我是继续下段行程，还是打道回府，都还需要做大量的谈判工作。今天我同本·科恩<sup>1</sup>一起吃了午饭。他是罗斯福总统最亲近的新政顾问，整个国家的法律法规都由他起草。这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犹太后裔，为人实在、心胸开阔、性情爽直、诚实善良，百分之两百的美国人。古德哈特<sup>2</sup>尚未回信，可能在度假吧。我把他弟弟的推荐信给他寄去了。我很顺利地拿到了签证，因此已经没有任何障碍。我会定期发电报。我身体状况很好，睡觉、吃东西、与人交谈都比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好。就此。

爱你们

沙耶

英国大使洛锡安勋爵在8月1日又发来一封电报：

我在上一封电报<sup>3</sup>中曾经转述伯林先生的口信[……]说他已获得俄国签证的内容并不十分准确。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收到你的电报之前，我们咨询了苏联大使馆，问他们是否需要为伯吉斯准备外交签证，以便他能够携带相关文件继续前往莫斯科。他们回答说，已经接到指示，一旦收到我方准备的护照，他们不仅会为伯吉斯，也会为伯林提供外交签证。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将伯林的护照送去苏联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伯吉斯今天返回英国，伯林则急于在一两个星期内前往莫斯科。他希望能够通过这里苏联大使馆的熟人关系得到肯定答复，一旦到了莫斯科不会被当作非法居留者遭到逮捕。他认为既然已经下达指示，为他提供外交签证，这本身就已说明问题。他这么想也理由充足。

1 本雅明·维克托·科恩(1898—1983)，律师、总统顾问(自1933年起)，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新政大部分法规的起草人；1934—1941年任国家电力政策委员会法律顾问助理；1941—1942任美国大法官特别助理(处理公共事业控股公司诉讼)；1942—1943年任经济稳定办公室主任助理；1943—1945年任战争动员办公室法律顾问；1945—1947年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

2 霍华德·莱曼·古德哈特(1885—1951)，美国证券经纪人；其弟为阿瑟·莱曼·古德哈特(1891—1978)，1931—1951年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

3 指给杰伯的电报，其中转述了伯林的口信，见上文第376页。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他无论如何都有必要与克里普斯沟通一下。我会很高兴地等待通知，将伯林的护照交给苏联大使馆办理外交签证。没有我们的斡旋，似乎很难保证他们会为他办理普通签证。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0年8月2日

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

亲爱的爸、妈：

7月22日和7月25日的来信均已收到，两封信同时到达。我仍在华盛顿，很高兴你们一切都好。至于我，目前仍在耐心请求，希望大使馆同意延长我的行程。我想，这还需要一段时间。伯吉斯突然被召回国——他应该已经给你们打电话了，但是外交部的电报明确回答了英国驻美使馆的询问，说明我并非英国女王政府的官员，该做什么，我有自己的判断力。这正是我眼下在做的。

这里的英国人正想方设法，劝说美国人放弃一些驱逐舰，但总统大选却使这一努力付诸东流——因为害怕竞选对手利用这点来做文章，而无法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希特勒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但洛锡安和福斯特在此异常活跃，并享有极高声望，显然他们还大有可为。谢谢你们对牛津古典人文学科成绩报告单的处理。你们打发走《标准晚报》的做法让我感到如释重负。这不仅因为我不希望在那上面出什么风头，还因为我尚未被正式聘用，不论说什么都会极大地激怒外交部的官员，从而对我的任职心怀偏见。因此，千万别让他们找来。<sup>1</sup>我奇怪是谁给他们通的消息。暑热已经消退，天气舒适宜人。弗雷德·劳已经在纽约第55街的肖勒姆酒店安顿下来，他在那里无比盛情地招待我，因此在纽约时，我会在他的公寓套房里拥有一个床位，这比自己孤单一人要好多了。至于百慕大岛的事，有几点要注意：  
(1) 寄钱给我们家在那里的亲戚完全合法，但不可随意要回；(2) 巴特菲尔

324

<sup>1</sup> 他们大概是想采访伯林，了解他准备在苏联发挥什么作用。



德银行<sup>1</sup>或许对他们来说资产投资过大，建议使用牙买加银行，亲戚们可以很容易取到钱。不过目前最好暂时不寄，眼下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应该还过得去。尚未与古德哈特见面。我很好，每星期都会给你们写信。

爱你们

沙耶

8月3日，外交部的菲茨洛伊·麦克莱恩评论道，“伯林先生让人无法忍受”，并写了一封短信给洛锡安勋爵：“你不要再为伯林先生获得苏联签证帮什么忙了。我们已经通知他，不准备在莫斯科任用他。”

但是，伯林究竟在哪里可以更好地服务自己的国家，针对这一问题，他在美国新结交的朋友们却有不同想法。约翰·惠勒—班纳特在伯林抵达华盛顿的头天晚上就见过伯林，对他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道，伯林“抵达美国不过四十八个小时，但他对美国总体局势的看法却好似他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sup>2</sup>在他们看来，伯林的加入，显然会有效充实英国在美的宣传力量，于是，惠勒—班纳特、奥博雷·摩根<sup>3</sup>与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对使馆施加压力，请求给伯林一份工作。而伯林本人则坚持要继续前往莫斯科，否则宁愿返回

325 牛津。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星期一 [1940年8月5日]

华盛顿，翠希广场2414号

亲爱的玛丽安：

我的事仍在办理，但进展缓慢。心情陡然变得极为沮丧。我所积蓄的

---

1 百慕大主要银行之一，建于1858年。

2 见约翰·惠勒—班纳特爵士的《特别关系：和平与战时的美国》（伦敦，1975），第87页。

3 奥博雷·尼尔·\*摩根（1904—1985），1939—1940年在英国情报图书馆调查室任职；1940—1942年为英国新闻处工作（1941—1942年任英国情报处主任特别助理）；1942—1945年任英国情报处副主任和英国驻纽约情报处负责人。

浮力[原文如此]让我扬帆远航,从英国来到美国,但此时已消耗殆尽,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乌云笼罩。约翰·福斯特不断提醒我们大家,说有关驱逐舰的形势确实非常严重,这50艘美国驱逐舰事关生死存亡,能使局势完全改观。一旦德国入侵得逞,美国人会受到指责,要不是因为缺少这些驱逐舰,危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反驳:原先并没有想到局势如此严重,都怪我们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让他们充分了解,虽然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sup>1</sup>或威廉·艾伦·怀特<sup>2</sup>告知过他们。大使馆已经尽力,但作为宣传机构,它既缺乏想象力也毫无才能,等等。我想这些应该直接告知电台评论员,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至于我的个人问题,英国外交部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淡起来,说他们从未说过需要我在莫斯科发挥什么作用的话,这与当时在伦敦交谈之后对我的期望截然不同。明天上午,我要见俄国大使。但就算俄方不设置任何障碍,还有克里普斯这一关需要打通,即便这关也顺利过了,伦敦还可能制造麻烦。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有人在为战争尽力,还要将自己的麻木不仁强加给英国使馆。我个人与使馆的关系十分友好,但我慢慢开始有了反英情绪,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有了抵触心理。法国人目前已处于全民溃逃的状况,逢人便骄傲地再三重复“我们是战败国”,似乎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可以从中获得某种特权,并使拥有者免受攻击。这种状况令人作呕。不仅如此,他们还还对奥尔<sup>3</sup>战役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提起他们损失了1400个法国人。比利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在安享其乐,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唯有美国公民出于公正之心对此好奇并予以关注,进而义愤填膺。我想,倘若我的秘密计划还像眼下这样蜗牛似的进展缓慢,倒不如趁条件尚许可,坐上船返回英国更好。在英国虽然一样无计可施,至少环境熟悉,也不会有抛弃

- 
- 1 约翰·约瑟夫·潘兴(1860—1948),美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在8月4日的一次全国电台广播中,潘兴将军建议将50艘老式驱逐舰交给英国。
  - 2 威廉·艾伦·怀特(1868—1944),堪萨斯人,著名编辑,1940年任援助盟国捍卫美国委员会建会主席。该委员会的目标为鼓励向盟国提供“除战争之外的所有援助”。还有人认为,怀特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任命法兰克福特为最高法院法官。
  - 3 位于阿尔及利亚海岸,1940年7月初,英国海军曾在此与法国舰队打过一仗,阻止他们被德国接管。

家人和同胞、独自在异国无所事事的负罪感。我这么做，家人也许会反对，国人无所谓，但至少可以结束这种悬浮在虚假氛围中的、异常痛苦的华盛顿外交生活。有人提出，如果赴俄计划失败，他们会为我在当地使馆安排一个职位。但除非我要做的事真正有意义，不管国内给我什么样的压力，我都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满怀屈辱地接受。很抱歉我这样语无伦次，明天就会好了，我又会一如既往地冷静应对客观局势，不会这么软弱无力。尚未见到麦克利什<sup>1</sup>先生，因为他临时有急事需要出差十天。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倒尽胃口、组织得一塌糊涂的外交野餐会。席间，我发表了一段讲话，狂热地为我深恶痛绝的法国著名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辩护。我还见到了克洛克先生<sup>2</sup>。此人真是个魔鬼式的人物，是落后保守、一无是处、虚伪无耻、让人浑身不舒服的下三滥<sup>3</sup>，是极端的绥靖主义者、大叛徒，是这块辉煌国土上秘密犹太成员的软骨头态度的典型代表。至于说美国，我尚未见到它的全貌。但就我在这个小地方的所见所闻，我感觉与欧洲人相比，这里到处是充满活力、诚实淳朴的人们：一切都明了清晰，如泛光灯照明般一览无余。在我看来，就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在道德层面上他们似乎比我们强许多。例如，他们不惧怕发现道德重心在往哪个中心偏移，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在特定环境下该干些什么。有时候，他们也许不会去干，但很快这种不作为就会成为显而易见的背叛或欺骗。这里没有那种一半真实一半自我欺骗的腐败风气，而整个欧洲，甚至纳粹德国，都生活在这种风气之中，事情常常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还使所有的行为动机变得一样莽撞冲动、缺乏深思熟虑，从而显得不那么正当和无可非议。我本人也对这里的明晰态度感到几分惊讶，这里不存在什么理所当然，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不存疑义。没有人把暗中的添油加醋视为美味，一切都如其表象一般真实可信。有时候，这个特点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但它却胜过英国和法国的曲

---

1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1892—1982)，美国诗人；1939—1944年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1941—1942年任资料统计部主任，1942—1943年任战争情报部副主任，1944—1945任公共文化关系助理国务卿。

2 阿瑟·克洛克(1886—1974)，1932—1935年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

3 伯林此处原文为：pourri。

折微妙和躲躲闪闪。在美学层次上的确稍逊一筹，在道德层次上却占据上风。它毁灭了艺术，却有助于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对18世纪最后的幸存者来说，19世纪一定也是如此——这些耄耋老者亲眼目睹和哀叹对他们举足轻重的一切逐日逝去；而在19世纪的人看来，这些与那么多需要去做的事情相比，可能只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日光下的阴暗角落，本末倒置，主次颠倒。和你们相比，我们真是幽灵。我明白了莫里斯为什么无法继续留在这里，尽管牛津给人带来种种不快；也明白了究竟什么才适合弗雷迪，他对周围气氛不太敏感，喜欢别人说一不二，是非分明。这里所有的一切，不仅房屋、距离、财富，就连脸孔、思想和行为都是宽大豪放、清晰悠闲、通俗易懂的，虽然与多余和毫无意义的（到目前为止）欧洲式的曲尽其妙相比，有时会显得有些无聊和乏味。也许1840年的英国与法国或澳大利亚相比也是如此。我欣赏它，嫉妒它，甚至同情它，但又为其质朴所折服。没什么可为我们颓废的高雅精妙辩护的，这种高雅精妙或许可以为心怀不满的美国人消遣解闷，对我们创造的卡巴莱<sup>1</sup>歌舞表演也还不错，但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好的，它败坏生命和国家，遗患无穷。早已连点缀的功能都已不复存在，就像西班牙式的礼仪。但我已经习惯欧洲了，对目前面对的全麦面粉餐尚不太熟悉。向菲利克斯和你姐姐转达我的问候，你姐姐还住在你那里吧（不在也一样向她问好）？希望与你早日见面。

你的  
沙耶

关于男爵夫人<sup>2</sup>的几点补充：

前些天，我看到她的一张照片<sup>3</sup>，我的天，和旺根海姆老夫人<sup>4</sup>毫无相像之处，令人遗憾。惠勒一班纳特激情澎湃地为特罗特辩护，说他是优秀

1 伯林此处原文为：Kleinkunst。

2 英格丽·冯·威伦汉姆男爵夫人，格哈特·威斯特里克的秘书（见下页注1）。

3 附在信中。

4 路易丝，戈兹·冯·旺根海姆男爵夫人。

的欧洲人，等等。如此这般，我们怎么能赢得这场战争？看来威斯特里克<sup>1</sup>的工作真是做到家了。我脑海中对克洛克先生的记忆挥之不去，你们怎么会培养了这么一位滑稽的绥靖派英国绅士？这么一个胆小、腐败、用心险恶的  
328 人？此话是否说得太重了？

致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sup>2</sup>

1940年8月7日 [加密电报的普通文字打字稿]

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

获悉尼布尔<sup>3</sup>的赞誉之辞。我已抵达华盛顿，为加深英美之间的了解而来。如您认为合适，苏联政府又同意，英国会指定我为使馆专员特使。签证问题。莫斯科那边正等我过去，却因苏联大使馆受阻。已经通过非官方渠道询问苏联大使，如果申请合适的签证种类，并得到肯定答复，是否可能获准。会再联系。

外交部文件371/24847, N6063/40/38

菲茨洛伊·麦克莱恩在上面加了批注：“伯林先生试图欺骗我们。我们最好电告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

- 
- 1 格哈特·阿罗伊斯·威斯特里克，单腿德国商务顾问、企业律师、高级纳粹党人和商业间谍。自1940年3月起驻美，致力于让美国生产的产品满足德国而不是英国的战争需求。6月，威斯特里克在美国商务界同僚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华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为他举行了一场派对，庆祝法国被纳粹攻占。英国情报人员将此事告知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该报很快将其公之于众。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情报，知道他是靠隐瞒残疾事实非法获取驾照时，威斯特里克被召回德国。
  - 2 克里普斯已于6月抵达莫斯科。
  - 3 他给克里普斯的解密电报（日期同样是8月7日）也在同一张纸上，内容如下：“全灵学院充满自信的以赛亚·伯林已抵达此地，会大力佐助你，请务必予以重用。此人极为谨慎明智，才华出众，正是你需要的合适人选。菲利克斯与他私交甚密，对他赞不绝口。”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8月8日 [1940年]

华盛顿特区，翠希2414号

亲爱的爸、妈：

我目前的处境是这样的：俄国人似乎很乐意为我提供便利，但克里普斯爵士却听人摆布，改变了主意，认定他不再需要我。我会继续轻微给他施加压力，但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使馆的计划很可能化为泡影。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没有理由在华盛顿继续待下去了。这里的使馆也许会很乐意雇我做解码员，但为此留下来理由不够充足。不过有一点，你们也许还记得休·赛顿—华生<sup>1</sup>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新闻报道吧？柴尔斯<sup>2</sup>也到这里来了，在情报部工作，纽约的英国情报图书馆目前急需人手。他希望我明天（星期五）过去与他见面，因为我在联系犹太人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如果那里真的需要我，我或许会留下。因为在英国，我就连去地方防卫志愿者组织都不合适，任何政府部门也不行，到头来势必无所事事。因此如果他们需要我，我会留下，至少几个星期。明天我还将与霍华德·古德哈特初次见面，和英格丽[·沃伯格]一道吃饭。希望伯吉斯带去了我对你们的问候。这会儿，他应该回到国内了。针对赠送驱逐舰给英国一事，这里正展开激烈论战，大家都纠缠在各自的法律疑难问题或绥靖态度中无法自拔。但我们的事业无疑正在向前迈进。希望它最终获得成功。我一切都好，渴望回国。我并非真的喜欢美国。这里的英国人好比沙漠中的绿洲。一到纽约，我会（1）去查看你的猪鬃，应该已经办妥了；（2）向弗雷德咨询，如何帮助在西印度群岛的亲戚们——他对英国官方规章制度的了解程度胜过使馆里那些自以为是的官

1（乔治·）休·尼克拉斯·赛顿—华生（1916—1984），罗伯特之子（上文第357页注2），1940—1941年服务于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的英国公使馆；1946—1951年任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研究员和讲师。

2 斯蒂芬·罗福德·柴尔斯（1896—1943），先是在俄罗斯南部（1918—1920年负责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经济重建工作）、日内瓦（1921—1926年及1929年之后负责国际联盟难民工作）和南美（1926—1929）工作；后来服务于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39—1940年在贝尔格莱德外交部任职，1940年在巴黎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1940—1942年任职于驻华盛顿英国情报处使馆新闻办公室。1943年1月在从伊拉克飞往伊朗的途中因飞机失事罹难。

员。另外，我在这里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金融家，此人名叫斯多福<sup>1</sup>，曾在布拉格的伦希曼委员会<sup>2</sup>工作过。

爱你们

330 沙耶

致克里西达·里德利

1940年8月11日 [明信片]

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

写地址时感觉很怪异<sup>3</sup>，因为又记不清地址了。我仍然在徒劳地艰难东行，无法告诉你搬动了哪些大山，总之事情不顺，但我相信最终肯定能在某个地方找到松散的接头，将这个结打开。否则，我很快就会灰溜溜地回去。希思科特·阿莫利夫人<sup>4</sup>（或许是加诺？）向你问好。我会向你和杰斯帕讲述我在华盛顿的生活，非常奇特。美国人倒是十分支持盟国，但又因不清楚情况，惊惶失措。我无法忍受——我是说可以忍受但却讨厌——待在这个地方，丢人现眼、沮丧恼火、孤单无助、不知身在何处。

你的

沙耶

---

1 罗伯特·杰米特·斯多福（1895—1978），银行家，1938年为以伦希曼为团长的赴捷克外交使团成员；1940—1943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财政顾问；1943—1945年任职于国防部。

2 以伦希曼为团长的赴捷克外交使团（见上文第339页注2），目的是向捷克政府施加压力，后来导致慕尼黑事件。

3 指通过她的父亲莫里斯·伯纳姆·卡特转交。

4 （玛格丽特·伊雷娜·）加诺·希思科特·阿莫利阁下（1919—2002），沃尔登的霍华德男爵八世之女，1938年成为理查德·弗兰克·希思科特·阿莫利的妻子，阿莫利先生1939—1942年在华盛顿使馆工作。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一8月12日 [1940年]

纽约市,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爸、妈:

已近夜里12:30,我坐在宁静舒适的酒店客房里,悲哀地遥想你们,不知大家是否一切安好。就世界的状况而言,我自己的情况太好了。目前谈判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俄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障碍在S.克里普斯爵士这里,他的理由是(1)没有住的地方(!)(2)没有适合我干的工作。与我付出的努力相比,这些理由听来未免令人恼火。我会继续跟他磨,同时这里也会有一些工作让我干,柴尔斯(赛顿—华生发来的快讯中提到过)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他要我留在这里,帮他在英国情报图书馆做点事。确实,我可以在协调犹太人方面发挥些作用,让他们协助这个伟大事业。他们都非常热切——我忙着约见犹太复国主义者、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工会组织,等等——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对自己的热情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颇有不满。因此,还是有可为之处。我还到纽约城附近的斯坦福德与威尔玛斯夫妇<sup>1</sup>共度了周末。威尔玛斯是劳的老朋友。劳是莫斯科和波兰罗兹皮货商艾廷贡<sup>2</sup>家族的成员,说俄语,人很好。下午,英格丽·沃伯格过来看我,在与犹太人打交道方面她帮了我许多忙。

小劳夫人<sup>3</sup>目前在此地,据她说,老劳夫人<sup>4</sup>在蒙特利尔满腹牢骚,什么都看不惯,指指点点,话语尖刻。婆媳俩似乎关系不太好。阿瑟·劳<sup>5</sup>好像去北威尔士度假了,你们为什么不也去那里或是湖区玩玩?打听一下新学院福克博士的下落,他说他知道湖区有一家很好的酒店,并推荐我们去。我会

1 查尔斯·科斯曼·威尔玛斯(1909—1980),伦敦人,一家比利时公司的总经理;与其波兰出生的妻子赛西尔·艾廷贡(1907—1999)在横穿大西洋的客轮“阿奎塔尼亚”号上初次相遇,当时她正与叔叔莫蒂·艾廷贡(见下文第397页注5)结束访俄之旅,一道回国。

2 艾廷贡家族企业几乎垄断了俄罗斯皮草出口业,在美国和数个欧洲国家均有分公司。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位最亲近的同事是艾廷贡家族成员,一位苏联内务部将军,在此信写后没几天,组织暗杀了托洛茨基。

3 弗雷德·劳的妻子,乔汉娜(汉娜/娜提亚)·劳(约1911—1957)。

4 弗雷德·劳的母亲,凯瑟·劳。

5 弗雷德·劳的兄长,阿瑟·阿隆·劳(1898年生)。



在这里待到星期四，然后去华盛顿，到使馆交一份简短报告。福斯特已经来加利福尼亚度假，所以我会使馆的一位英国老同事那里借宿，他叫艾姆斯利<sup>1</sup>，邀请我过去，可能会待上几天。这样的话，从15日到19日之间，我的地址无法确定，不过寄到翠希广场2414号或者大使馆艾姆斯利，我均可收到。我真的无法再同阿伦森一起住了。尽管他一直邀请，范妮也确实很好客，但他们的房间不仅闷热吵闹，地方也太小，又有小孩。弗雷德·劳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从各方面给我忠告。明天我要去布朗·哈里曼银行<sup>2</sup>，还要同霍华德·古德哈特一起吃晚饭。另外要分别约见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领袖们。<sup>3</sup>中饭和阿克金<sup>4</sup>一起吃。亚博京斯基<sup>5</sup>的离世令人悲痛。他是一位丰富多彩、富有同情心的人，虽然就他的年龄而言，有点放荡不羁。有段时间没见菲利克斯了。伍尔夫夫人<sup>6</sup>让人感觉真好。至于我的2000英镑，随你们怎么处置好了——投资到你们乐意的地方，如果可以，请提及约翰作为推荐人。我还没空去游览世博会呢！

爱你们的

沙耶

我渴望回家的迫切程度难以言表。英伦是多么美丽的国家。支持英国的宣传活动在这里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我无法相信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不卷入这场战争。但宣传必须加强。

与此同时，欧洲发生的事件使伯林作为英国官员留在美国的争论更加激

1 威廉·格雷·艾姆斯利(1885—1956)，1939起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荣誉使馆随员。

2 美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合作制银行。

3 所罗门·戈德曼拉比(1893—1953)，1938—1940年任美国犹太复国组织领袖；或者所罗门·马库斯·司徒克(1874—1945)，时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

4 本杰明·阿克金(1904年生)，里加人，宪法律师、政治科学家，早期支持修正主义党，1936—1941年任新犹太复国组织政治部负责人，1945—1947年任政治顾问，美国犹太复国紧急委员会秘书。

5 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1880—1940)，俄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修正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奠基人。8月3日在美国去世，当时他正在视察贝塔组织，一个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党青年组织。

6 伯林这里应该是重提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他寄邀请函的事，他因为人在国外，无法接受邀请。

烈。以下是他自己的话：

之后，他们开始让我在华盛顿做一些与英国相关的工作。我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间已是8月中旬，著名的不列颠之战已经爆发。他们肯定想，“嗨，德国人会赢，他们会入侵英国”，那样的话，如果我在国内，我会被捕，遭到严刑拷打，甚至被处死，因此必须救我。这话谁也没明说，但我很清楚，这才是秘而不宣的日程表。我很感动，但无人提起此事。他们开始给我各种职位。<sup>1</sup>

332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8月16日 [1940年]

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

发自纽约第55街肖勒姆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的晨报通篇报道了轰炸克罗伊登机场<sup>2</sup>等地的新闻。大家更相信英国的说法，而不是德国人的。

我的处境几乎没有改变。由英国使馆提议设立的新机构正在建立，他们希望把我充实进去，法兰克福特也表示同意，让我一边干一边等俄方做出决定。我怀疑他们这个决定永远做不出来。当然，这个话最好跟谁都别说，不论我在做什么，都最好保密，没必要跟伯吉斯说，也没必要向《标准晚报》透露，谁都不要说。只要人们一把消息传开，就必然会走样，引来官僚机构方面的麻烦。所以人们问起来，就说不知道，说我很少来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威尔基先生<sup>3</sup>明天要发表总统“提名”演讲。之后，罗斯福在

1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7。

2 克罗伊登机场是8月15日德军派出数量庞大的战机狂轰滥炸的目标之一。但德军在该行动中遭到重创，德军飞行员称其为“黑色星期四”。不久之后，德军又误把进攻的主要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伦敦，从而使英国皇家空军得以从损失中恢复元气。德军的这一错误最终决定了不列颠之战的败局。

3 温德尔·刘易斯·威尔基（1892—1944），1940年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1944年重新提名候选人；反对新政，崇尚自由，赞成公民权利和国际主义。

外交政策上可能会更加敢说敢干。目前他是过于沉默了。我住在纽约的肖勒姆酒店，因为以下几个原因：（1）我必须有个地址；（2）劳住在那里，他不在时，我可以用地他房间，花费可以少一些。毫无疑问，这儿的生活昂贵无比，但总有善良的人让我时不时<sup>1</sup>与他们分享住所。昨天我和豪斯廷<sup>2</sup>通了电话：索菲不在家，度假去了。他十分和蔼可亲，对我热情洋溢，很想帮助我，并邀请我到海边同住。总之，是一位好心人。阿伦森不用说也是不断坚持让我和他一起住在纽约，但他的卧室太小，同时又十分闷热吵闹。再有，他打鼾的声音比我听到的任何人都大。但是，我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去适应这些朋友。西奥多·加斯特<sup>3</sup>在这里，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由富人组成的反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如果我留下来，会说服他们与我们合作。

333（珀尔兹韦格<sup>4</sup>预计在8月底过来，我肯定会见到他。）和阿克金一道吃了午饭，他向你们问好。我觉得他把自己当成了亚博京斯基的继承人，此人是个小人，自负虚夸、虚伪做作、油滑偷巧，但绝不愚蠢。这里听不到里加<sup>5</sup>的消息，想来在伦敦也差不多。我应该想办法找到罗斯金夫妇<sup>6</sup>，但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也许可以通过威尔玛斯—艾廷贡夫人和皮草行的人打听。布朗·哈里曼银行的先生们都很有礼，答应提供所有鬃毛集装箱<sup>7</sup>的清单。他们说这应该是在保险范围内的。如果你对清单有什么看法，或觉得有必要确

1 伯林此处原文为：de temps en temps。

2 沃特·豪斯廷（1895—1968），在纽约成立了世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现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其妻索菲于2002去世，享年一百岁。

3 西奥多·赫泽·加斯特（1906—1992），犹太教、比较宗教学及民俗学专家。

4 莫里斯·L·珀尔兹韦格（1895—1985），英国战前自由主义犹太人运动领袖之一，曾在伦敦数家犹太教堂事奉；1936年为世界犹太大会创始人（英国区的首任主席）；1942年提名纽约世界犹太大会国际关系部主任。

5 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发自里加、寄给伯林父母的书信来自玛丽的父亲，日期为1940年8月8日，大约在苏维埃接管里加两个月后。他在信中说他们一切都好，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我亲爱的孩子们，请多保重，父亲在此祝你们一切都好，希望早日见到你们。”更早的一张明信片，日期为1940年1月9日，在寄往伦敦途中被德国哥尼斯堡的纳粹信件审查官盖上了德国鹰盾图案章，这是一个可怕的预示：1941年6、7月间，德军全面占领里加，在短短几个月里，纳粹党屠杀了城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

6 罗斯金一家，从事皮草生意的俄国移民。居住在伦敦芬奇利路大厦，但常到纽约出差。他们的儿子直接从俄国移民美国，还有一个女儿罗莎，战争期间来到纽约，父母去世后移民美国。这里指的应该是罗斯金夫妇。

7 可能是指运输鬃毛用的集装箱。

认，请发电报给我，我会帮忙核对。不过也许没必要这么做。这些天我周旋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相信爸妈精神愉快。我非常好。

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地址最好是写纽约，第55街肖勒姆酒店，当然，翠希广场或英国使馆也能转给我。

8月18日，英国外交部给斯塔福·克里普斯发了一封电报（相同内容也发给了华盛顿）：“获悉伯林先生在从华盛顿发给您的电报中说，我们原则上同意他归为你的部下。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们不断告知伯林，我们无意在莫斯科聘用他。”

这一插曲在1941年的伦敦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特别是菲茨洛伊·麦克莱恩为此发表言论：“如果早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定会就（伯林先生）派驻莫斯科一事发表意见。”<sup>1</sup>大家询问不断。接着，在护照管理处<sup>2</sup>一位J.N.汤宁森上校<sup>3</sup>的要求下，护照签发下来了。麦克莱恩为此发表评论：“在我们尽力阻止伯林先生前往莫斯科的时候，汤宁森上校居然亲自派遣伯林前往那里，未免令人感觉奇怪。我确实认为应该征求我们北方司<sup>4</sup>的意见。了解D<sup>5</sup>究竟打算让伯林先生和伯吉斯先生在莫斯科做什么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对此的回复是（发自J.M.艾迪斯<sup>6</sup>）：“汤宁森上校不过是代表上司<sup>7</sup>打了一个电话而已（幸好我听说如今这个问题已不存在）。他根本记不得那件事了。”

1 请看伯林9月15日给父母的信中对此的评论。下文第410页。

2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码。

3 显然是从皇家工兵部队借调的。

4 英国外交部负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和阿富汗的部门。

5（爱德华·）休（·约翰·内尔）·达尔顿（1887—1962），1940年7月他建立了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将军情六处的D科（D为英文“毁灭”一词的缩写）合并其中（此举只是巧合，但再合适不过），后来该组织由劳伦斯·格兰特上校负责（伯林离开前见过他一面）。

6 约翰·曼斯菲尔德·艾迪斯（1914—1983），1933—1936年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古典学专业；1938—1974年任外交官，后任驻老挝、菲律宾和中国大使。

7 所指不明。

整个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8月20日 [1940年]

纽约, 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爸、妈:

没什么事可向你们汇报。我的处境依旧, 还是飘忽不定。可能过几天会发生变化, 稳定下来。至于(布朗·)哈里曼银行, 除了原先说过的, 也没什么新的好谈。我们成天抱着收音机, 不停地听: “虽然来晚了, 最终还是来了。”<sup>1</sup>这话是坎波<sup>2</sup>就英国在一战时的表现说的, 用于形容美国人也十分确切到位。法兰克福极为和蔼可亲, 此话可以形容这里的每个人。我现在已经能胜任各种外交事务, 之前为我设置各种障碍的人们如今在工作中与我关系融洽。所有的非外交官们——洛锡安、福斯特, 以及财务部、经济部、贸易部的成员, 全都比那些喜剧小丑般的外交官们高效一千倍。他们这里需要的只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瑞丁侯爵<sup>3</sup>的经济独裁——威尔弗雷德·格林<sup>4</sup>能做得很好。他们的办事效率真是太低了。布力特<sup>5</sup>的演讲令人叫绝, 激情洋溢, 明显是为了消除人们因他从法国回来说的那番话而产生的疑虑。自然, 会有主张美国不参加世界大战的呼声, 诸如“战争贩子, 叛

1 伯林此处原文为: ils arrivent lentement mais enfin ils arrivent。

2 朱尔斯·马丁·坎波(1845—1935), 法国外交官, 1907—1914年任德国大使; 1920—1922年任《凡尔赛公约》执行大使委员会主席。

3 卢夫斯·丹尼尔·伊萨克斯(1860—1935), 瑞丁侯爵一世, 1913—1921年任首席大法官, 一战期间受雇执行政府特种任务, 负责助战; 1915年任驻美、英、法贷款使团团长; 1917年任驻美特使; 1918年任驻美高级专员兼大使。

4 威尔弗雷德·阿瑟·格林爵士(1883—1952), 律师, 分别于1907—1914, 1932—1952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1941年成为格林男爵一世; 1937—1949年任上诉院保管案卷的法官。

5 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力特(1891—1967), 1933—1936年任美国驻苏联首位大使(后来猛烈抨击苏维埃); 1936—1941年任驻法国大使; 1941—1942年任无固定任所的大使; 1942—1944年任海军部长特别助理; 1944—1945年任自由法兰西陆军少校; 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作撰写了《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汤姆斯·伍德罗·威尔逊: 心理研究》(伦敦, 1937)。

徒坏子!”等呐喊,但效果肯定会超过林德伯格<sup>1</sup>。关于后者很奇特的一件事是,人们认为他实际上更喜欢法国而不是纳粹德国,只是过于高傲不愿承认罢了,害怕听起来仿佛在向对手让步。据说他的影响如今已消失殆尽,他的妻子<sup>2</sup>为此忧心忡忡但忠诚如故。总之,不论我走到哪里,到处弥漫的都是亲英情绪,真是太好了。据朋友们说,主要的反英分子是爱尔兰人——卡德锡<sup>3</sup>等人。

据说珀尔兹韦格会来这里传达外交部的官方指示,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纳胡姆·戈德曼<sup>4</sup>告诉我的。或许到时候你们可以告诉他你们的近况,还有是否打算留在伦敦。这样会比信件快,电报又写不了什么内容。之前曾向你们说过,我正在考虑豪斯廷邀请我去他家住的提议,他的和蔼可亲以及他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忙的许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昨天我遇见了皮货商莫蒂·艾廷贡<sup>5</sup>,一个十足的在美国的伦敦汉普斯特式俄罗斯犹太人。我得查出罗斯金一家的下落。一定记住给纽约写信。我好得不能再好。到目前为止,从英国来的消息十分令人振奋。<sup>6</sup>

爱你们的儿子

以赛亚·伯林

- 
- 1 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1902—1974),飞行员、发明家、作家,1927年孤身连续飞行,第一次创造了人类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奇迹,从而在国际上一举成名。又因为1938年接受德国的勋章和在二战初期坚持孤立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而引起广泛争议。他坚持美国保持中立立场的宣传(后来还作为反对援助盟国的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还使他招致反犹指控。
  - 2 安妮·史宾塞·莫洛(·林德伯格)(1906—2001),作家、飞行员,德怀特·莫洛之女,奥博雷·摩根妻子的姐妹。1929年与林德伯格结婚,1932年他们的儿子遭绑架杀害。
  - 3 约翰·克莱伦斯·卡德锡(1887—1943),1937—1940年任美国驻爱尔兰公使。
  - 4 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纳胡姆·戈德曼当时负责纽约犹太事务局工作。伯林后来为他写了传略《纳胡姆·戈德曼(1895—1982):个人印象》,发表在威廉·弗朗科尔主编的《犹太事务综述,1983》(拉瑟福德/麦迪逊/提内克及伦敦/多伦多,1985),第238—243页。
  - 5 莫蒂·艾廷贡(1885—1956),俄罗斯出生,大规模皮货批发商。
  - 6 在日益激烈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军在上周派出数量庞大的战机狂轰滥炸英国南部,但德军飞机遭受的损失超过英国皇家空军。写此信的当晚,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著名的致英国空军的贺辞:“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像这次一样,以少胜多,保护如此多的生命。”《温斯顿·S.丘吉尔演说全集:1897—1963》,罗伯特·罗兹·詹姆斯编(纽约,1974),卷6,第6266页。

致玛丽·费希尔

1940年8月21日

纽约,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玛丽:

我还是一样凄惨。不但没能以个人独特的(这里人都这么说)方式意气风发地报效祖国,反倒屈辱地被困在这儿,等待着日益确定的失望到来。此外,他们还坚持让我去英国情报图书馆干些杂事,我不好拒绝,但在我看来,这份差事根本不值得我坐在这儿孜孜以求。新来了一位柴尔斯先生,带着鼓舞士气的目的而来,由斯特朗萨兰勋爵<sup>1</sup>,佩思勋爵的儿子陪同,企图向目前寂静沉闷的观望态度<sup>2</sup>中注入一丝生机和活力。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事都存在障碍。因为无所事事,我开始试着在使馆和犹太人之间建立一些联系。他们可以也应该但目前尚未得到利用。美国人眼下已开始恐慌,他们如果充分相信我们,自然会全力以赴帮助我们,而不是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对我来说,以任何方式留在这里都好比噩梦。这里遇见的人们,甚至包括最友善的那些人,全都无一例外地丝毫不留任何欧洲生活的痕迹,哪怕是压抑的残留也荡然无存。它本来是起着一种背景的作用,人们身在其中,浑然不觉,一直到被迫从它身边离开,来到这个伟大广袤、阳光灿烂、人们开朗外向、一切都清晰易懂的国家。我带着伤感之心,对欧洲文明中哪怕最卑劣的代表人物也充满留恋。这种心情在艾耶尔夫人那里完全找不到共鸣。就连我一直敬慕、挚爱的法兰克福特夫人,在这里也失去一半的神秘色彩。我对罗斯福的敬仰与日俱增,特别是意识到他所面临的粗俗和愚钝。深切地喜爱美国人,而不是敬仰、尊重、欣赏和相信他们,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灵魂的缺失;提到对激情、洁净、勃勃生机和一种粗犷开放态度的热爱,对此,我心中突然涌上一股无名之火,别指望我会喜爱和欣赏。

1 约翰·戴维·德拉蒙德,斯特朗萨兰子爵(1907—2002),1940年任情报部队陆军中尉,1942—1943年任职于战争内阁办公室,1944—1945年任职于工业部,1951年成为十七世佩思伯爵。

2 指1940年夏天整个英国加强了战争宣传(上文第378页注2)。

我收到了父母的一封来信，信中斗志昂扬，对你赞不绝口。一定告诉他们你收到了这封信，他们会高兴的。

337

我现在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朋友<sup>1</sup>按照美国政治术语进行分类：莱福特、克里德博士、沃森博士、约瑟夫、邓得斯、玛斯特曼为坚定的共和党；史密斯、克里斯托弗、费尔普斯—布朗属于左派共和党，1932年推选罗斯福上台，如今则倒向威尔基；你、我、巴利奥学院院长、莫里斯、比拉、盖伊、韦德·格里为罗斯福派和新政派；麦克卡鲁姆博士、约克、托尼、多兹、希姆、W.J.特纳属孤立主义派；詹妮弗、“小宝贝”则忙于各种与美国特色格格不入的活动。我不清楚自己还要在这里拖上多久，我孤独无助地只身待在酒店客房里，等着我的案件结束。我读了很多狄更斯的书，自我感觉就好比一个可笑的诉讼当事人，被各级法院折磨成一个邋遢搞笑的小丑。我恨不得马上回去，但又怕什么时候会突然被某种奇妙的神力点中，派往俄国。再说，尽管日子单调烦闷，我在这儿还是比在英国更有用处。记住多来信，没人来信会让我更觉孤独沮丧。报纸上一片喜人的亲英之声。他们崇拜胜利。倘若英国皇家空军继续如此辉煌，他们很快会坚决支持我们的。

向你母亲问好

沙耶

---

1 这份名单中之前没有提到的人有：理查德·斯蒂芬·克里德（1898—1964），生理学家，1925—1960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和导师；西德尼·沃森（1903—1991），1933—1938年任新学院风琴手，1938—1945年为温切斯特学院音乐硕士；约翰·塞西尔·玛斯特曼（1891—1977），历史学家，1919—1946年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欧内斯特·）亨利·费尔普斯—布朗（1906—1994），经济学家，1930—1947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威廉明妮（“比拉”）·哈罗德（1911年生），罗伊·哈罗德之妻；埃里克·塞西尔·约克（1901—1997），古典学家，1927—1969年任新学院研究员和导师；罗纳德·希姆（1903—1989），古代史学家，1929—1949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沃尔特·詹姆斯·瑞德芬·特纳（1889—1946），诗人、音乐和文学评论家，在联合广播委员会（由希达尔·马西森负责）与玛丽·费希尔共事，该委员会专门为各海外电台提供支持盟国的新闻。



致谢拉·格兰特·达夫

1940年8月22日

纽约, 肖勒姆酒店

我想信件审查官会要求我这么写: 发自I.伯林先生, 东进途中, 被官方进展缓慢的公文程序耽搁。我的天。

最最亲爱的谢拉:

我的处境扑朔迷离, 十分悲惨。俄国人已差不多要被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 就连很难说话的大使也已被我明智的想法争取过来。美国国务院更是极尽全力。但使馆还是对我不感兴趣, 里面虽然不乏善良、能干的个人, 但作为整体, 那个地方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程度之严重, 就连巴洛夫<sup>1</sup>也要为之惊叹。洛锡安人确实很好, 福斯特先生和兰博德<sup>2</sup>先生(他认识亚当), 还有整个财政经济部门的人也都不错。刚刚结束了伦希曼外交使团捷克之行的斯多福先生也到了这里, 为人可爱亲切。自从开战以来, 这里经过精挑细选新增进来的人手个个都风趣、能干、精力充沛、事业成功。采购供应委员会看来运作顺利。唯一令人讨厌的是外交官。我们无法将英伦三岛的优秀人士吸引到英国外交部来。客气地说, 我的不幸处境就是由外交部和斯塔[福·克里普斯]的消极态度造成的。因此也才会有我现在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我仍在努力争取。纽约到处是像巴洛夫, 像我, 像你, 像考雷特<sup>3</sup>式的人物。没有人长得像希尔<sup>4</sup>或比利<sup>5</sup>或道格拉斯。佩吉属于普通人类型, 但样子长得像德国人, 文弱一些。赫伯特更像是中西

---

1 托马斯·巴洛夫(1905—1985), 经济学家, 1938—1942年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院, 1940—1955年任职于牛津统计局, 后(1968年)成为汉普斯特的巴洛夫男爵。

2 (霍勒斯·)安东尼(·克劳德)·兰博德爵士(1911—1983), 1937—1942年任驻华盛顿外交官。

3 不清楚这一带污辱性的绰号指的是谁(“考雷特”是纳粹党恐怖机构的头目)。

4 (约翰·爱德华·)克里斯托弗·希尔(1912—2003), 历史学家; 1934—1938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1938—1965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和历史导师, 后(1965—1978年)担任院长。

5 哈罗德·比利(1909—2001), 1931—1935年就读于女王学院, 主修历史; 1939—1943年任职于国外研究与出版处; 1943—1945年任职于英国外交部研究处。国外研究与出版处是巴利奥学院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分支机构, 成立于1939年, 负责人为阿诺德·汤因比(下文第579页注2), 1943年迁往伦敦, 与外交部的政治情报部合并, 成为英国外交部研究处。

部地区的人。我在华盛顿的外交圈子里度过了凄惨的两星期（法国人比较可怕，英国使馆里至少职员为人诚实、勇敢、可敬。他们的错误——差不多有五个人有类似错误——只是愚蠢和内部争斗。法国人则为人卑劣）。这座城市遍布着克拉克<sup>1</sup>式的人物，还不时地有拉方夫妇和拉萨姆夫妇<sup>2</sup>之类的人点缀。克里斯托弗属于稀有种类，几近绝迹。你我这种人在这里还算行，大家都习惯了我们各自的行事方式。你在这里为捷克人做事会比在伦敦更有前途，我是说真的。他们通常都十分富有，有钱有势，但缺少和英国人的交往渠道，虽然有扬·马沙利克<sup>3</sup>在此。你可以向惠勒一班纳特打听，如果他还在英国，但他很快要到这里的英国情报图书馆工作。此人极为和善，平易近人，对大家都很好，是亚当·冯·特罗特的坚定支持者。英格丽·沃伯格<sup>4</sup>正以她一贯的严肃作风，脚踏实地地从事难民工作。她很想见你。我希望很快能前往东欧，但如果你真来了，我们或许还能聚聚，虽然这几乎不可能实现。说不可能，是因为俄方一旦反悔，我只能回去，除非这里强烈需要我留下，强烈到事实明摆着，与其在牛津一事无成，还不如在这里干点实事。当时我因为受不了华盛顿众人的善良好客，也不想同法兰克福一家同住，才选择到纽约来，如今孤身一人住在酒店客房里，成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远离你、胡拉尼、卡特可夫<sup>4</sup>和我的家人，前途未卜，忧心忡忡。如果情况无法改观，这份凄惨真是难以弥补。我的惨状无以言表，人身安全也成了重负，受尽折磨。如果你身在我的处境中，一定也会有同感：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面对哪怕是最微弱的危险。我觉得这个国家太支持英国了，尽管爱尔兰人还存有敌对情绪，德国人及其报纸也会来些绝非愚蠢的活动。你会非常喜欢那些记者的。我忘了补充，继巴洛夫之后最常光顾各类娱乐

339

1 这里或许指的是A.C.克拉克。也可能是G.N.克拉克与肯尼斯·M.克拉克。

2 指罗伯特·乔治·达尔林普尔·拉方（1887—1972），历史学家，1939—1943年任职于国外研究与出版社；1943—1946年任职于英国外交部研究处。另一人为理查德·托马斯·埃德温·拉萨姆（1909—1943），1931—1933年为莫德林学院法律系罗氏奖学金获得者；1934—1943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35—1941任职于外交部；1942年在皇家空军服役，1943年被射中坠机。

3 扬·盖利格·马沙利克（1886—1948），托马斯·马沙利克之子；二战期间任捷克政府驻伦敦外交部长。

4 乔治（格奥尔基·米哈依洛维奇）·卡特可夫（1903—1985），1940—1946年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后（1959—1971年）任牛津大学苏维埃研究院讲师，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

场所的就是凯斯<sup>1</sup>了。他们俩成天流连于饭店、影院、广场、地铁和海滨。费歇尔—威[廉斯]小姐越来越有波士顿人的做派，既反英又亲英。牛津上层社会的样子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她身上一半是现代的伍尔沃斯百货店的气质，另一半则是巴利奥学院。因此如果你来，一定会过得很开心，因为能做许多支持盟国的事，例如到捷克或英国的妇女俱乐部举办讲座等。只要你来，这些都很容易安排。

爱你的

沙耶

[在信封背后他写道]一定要来信，我会收到的。

伯林终于得到聘用，负责一项具体事务，虽然只是临时性的工作。他回忆道：

他们终于对我说：“那么，你愿不愿意就为我们做一件事？”“什么事？”“整理美联社的所有快讯，看他们是否持反英立场，是否宣扬失败主义，和我们唱反调。我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问：“办公地点在哪里？”“在纽约英国情报图书馆，负责人名叫安格斯·弗莱彻<sup>2</sup>。”我又问：“要干多长时间？”“可能要两到三星期。”因为数量浩大，不仅仅那些从英国发来的新闻，还有发自法国、德国的，因为美联社在许多国家都设有分社。[……]我担任了这项工作，并呈交了证明他们确实不够友好的报告，这正是他们想了解的。

1 赫伯特·摩根·罗格·凯斯（生于1913年），1934—1937年为巴利奥学院研究生（主修英国文学），1937/8—1946年任巴利奥学院研究员。

2 安格斯·萨默维尔·弗莱彻（1883—1960），1922—1928年任驻纽约英国情报图书馆副主任，1928—1941年任主任；1941年受封为爵士。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星期五 [1940年8月23日]

纽约市西55街33号, 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玛丽安:

目前我已多少恢复元气, 尽管这里的气候比起牛津更让我不适应。和你在电话中的交谈也让我心情大为愉快。我不知道这股高兴劲从何而来, 或许是因为对我而言, 与你交谈就像是这块巨大沙漠中的绿洲吧。我给勒内<sup>1</sup>打了电话, 听到我的声音, 她似乎很高兴, 这是我们之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她说尚未收到我的信, 很难受, 催我赶快去看她。我打算明天就去。我还采访了英国情报图书馆。他们说我会见到一位板着脸的老板, 极其霸道, 什么在他看来都不顺眼。他的名字叫弗莱彻。只有这点说对了。不错, 他是叫弗莱彻, 却是个萎靡不振、愚蠢乏味, 再加上忸怩作态的家伙, 迫不及待地要和我谈伪哲学问题, 诸如教育的最终目的, 为什么斯大林<sup>2</sup>不是基督徒, 甘地感化斯大林使其不侵略他人的可能性, 等等。这类话题我知道是那些年长的政府官员们在他们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面前喜欢卖弄的, 用来抬高自己。真是难为情, 我和他谈得挺好, 但确实想不通怎么会任命这样一个人来实施文化渗透的动态政策。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教授, 名叫阿拉戴·尼科尔<sup>3</sup>, 来自耶鲁大学, 在伦敦时隐约听人提起过此人。他好像也属于英国情报图书馆, 不断邀请我去纽黑文看他。他们两人都暗示我说, 即将发生重大事件, 局势危急, 英国情报图书馆面临着重组, 也就意味着混乱。我务必在周一前去报到。我不清楚他们言下之意是什么, 但我一定会照办, 也去看看局势究竟有多么严重。之后, 我会去新米尔福德<sup>4</sup>。 341

周一下午茶后或周二, 选个合适的时间, 不论结果怎样我都会发电报。假

1 因为害怕德国入侵, 勒内·艾耶尔将孩子带到美国。弗雷迪则在桑德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校受训, 准备担任军官。

2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本姓朱加什维利(1879—1953), 1922—1953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来成为事实上的苏联独裁者)。

3 (约翰·兰姆赛·)阿拉戴·尼科尔(1894—1976), 1942—1945年为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人员; 1945—1961年任伯明翰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专长为戏剧史研究)。

4 法兰克福特在康涅狄格的家。

如安排得太差，只是让我陷入官僚之气中，那么，即便有柴尔斯在——此人堪称新一代善于叫嚷的演说家和希腊神话中奥吉厄斯国王的牛棚清洁工的混合体，我也不会留下。但只要有机会真正做些有用的工作，特别是能够针对目前当地犹太人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的愚蠢的巨大鸿沟，发挥桥梁的作用，那我就考虑，或许我会暂时在这里待上两周左右。希望这些在周一能见分晓。我想在这些问题明朗之后去看你，而不是之前。因此我打算明天（周六）去纽黑文看勒内，然后在星期天回到纽约。她似乎已经在纽约找到了照看她孩子的人。对于自己该怎么办，我现在头脑一片混乱：我尚未完全绝望，还想继续努力说服冥顽不化的克里普斯，这一点周一或周二与菲利普克斯见面时也要向他请教。我躺在床上，满怀荒唐的沮丧心情，猛然为自己一味地纠缠于个人道德危机而倍感羞耻，因为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也许正在经历更加艰难的日子，这种意识使我难过到顶点。奥登先生不请自来，他奇特的观点也无法使事情有多少改观。我想，他之所以来，是受孤独以及麦克利什突然退出同盟所导致的犯罪感的驱使。因为他和我并不很熟，也不太喜欢我。我们的交谈拘谨做作，没有任何内容。第二天，我出门看了场电影，感觉才好过些。之后，我又和艺术家夏皮罗<sup>1</sup>先生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夜晚，同时也对自己在这种非常时刻还耽于享乐而深感内疚。我希望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勒内批评我胆小，不愿面对痛苦和伤脑筋的事情，看来她是说对了。确实，我这人只有感觉到绝大多数我所尊重的人都团结一致地和我站在一起、支持我时，才会感到快乐。而目前，我被隔离在这个同盟之外，因此才会表现出一些摇摆不定。一旦明确了方向，又有值得信赖的人们以坚定的信念支撑我，我会从黑暗走向光明的。

爱你的

沙耶

---

1 梅耶·\*夏皮罗(1904—1996)，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学家。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8月26日 [1940年]

纽约市西55街33号, 肖勒姆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今天上午收到你们的电报, 语气轻松乐观, 令我大感宽慰。这里的报纸总是喜欢用骇人听闻的字眼大肆渲染。我知道自己不该去相信他们, 但是这种累积效应很难避免。我正在催促俄国人, 不管哪种决定都请尽早做出来。当然还有克里普斯需要去说服, 诸如此类。与此同时, 柴尔斯的机构尚未安排妥当, 眼下也正等着点火启动。总之, 一切都在波动当中。我今天咨询了有关巴特菲尔德银行的情况, 填了表, 还写了几个签名以备不时之需。我对希普利银行也有所了解。除非上面明确指示, 它不会出面帮任何忙。今天, 我同一位年轻的比利时银行家见了面, 他名叫菲利普森<sup>1</sup>, 娶了一位来自莫卡塔<sup>2</sup>家族的太太。他曾经在比利时军队和英比联军中服过役, 之后叛逃, 经历十分惊险刺激。他对几个不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状况很感兴趣, 例如, 荷兰人比法国人富裕得多, 两者根本无法比较; 但其马提尼克银行却得依靠法兰西银行。关于现金还是投资、储藏钱财还是投资、听凯恩斯还是听其他经济学家的争战永无休止, 唯有那些投资、抵押、按揭或组建社团的人才免受损失。这一点颇有指导、启迪作用。换作是我, 在同样的处境下或许也会这么做。此地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各种教导, 但未必全是忠言。<sup>3</sup>英国人在这里名望很高, 在金融、政治、道德和社会等方面都鹤立鸡群。美国人看来终于准备也为战争出一份力了。我仍在想方设法躲开与阿伦森同住, 但为了不得罪他, 很快我就会这么做。所有人都对我非常好, 我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爱你们的

沙耶

1 指保罗·路易斯·菲利普森。

2 安·玛丽安·莫卡塔(1919年生), 来自银行世家。摩西·莫卡塔在1671年创办了莫卡塔金行, 成为伦敦黄金交易市场最早的成员。

3 这里删去了一句: “但我认为你太谨慎了。”

告诉玛丽·费[希尔]和其他人,我正在为向东欧进发不懈努力,结果怎样就看他们了。重重障碍真是令人寒心。

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凌晨两点[1940年8月26日]

纽约市西55街33号,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玛丽安:

343 很抱歉这页信纸如此脏,但它是我在夜里这个时候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纸片。我的境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柴尔斯,就是那个希望我留下来的人,使自己 and 英国情报图书馆陷入是非之中,充满混乱和牢骚,而他原本是奉命前去进行改革的。他们给伦敦的电报被误译;与当地的联系每天都出问题。因此,他们请我至少等到星期五,等他们安顿好,决定好(抑或是我决定好?)再去。没办法,我想只有在纽约继续待到至少星期五上午了。那时我再去新米尔福德可以吗?如果事情在那之前解决了,甚至只要相对有个结果,至少弄清楚自己的职责,或者知道自己要干哪些事,那我就早些去,周三或周四。这种混乱简直令我无言。一切过错都是因为人事部门效率低下,因为那些无精打采、懒惰涣散的家伙。不是其他的。

勒内昨天来纽约了,和我待了几个小时。她很直率,无所不谈。她嘴里说着莫里斯,实际上是在指弗雷迪,并说她想回国,原因如下:

(1)她受不了耶鲁的气氛,不论是它的善意还是偏见都令她无法忍受。她觉得自己在那里活像在台上演戏。受不了被人问那么多有关英国的问题。她在那里还遇到了一些纳粹科学家。她听到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反犹言论,不敢对他们说她的丈夫哪怕是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另外就是经济问题。即便她添加了很多美化渲染的成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她过得不好。对那种精致巧妙的欧洲式的高雅情调我也深表认同。那是一种伤感、怨恨和精致做工的结合体,与她如今所处的极端讲究实际的环境格格

不入。但是，我得说，纽约比起伦敦更像是她的家乡，不过或许是我错了。

(2) 然而，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汉普希尔从部队发来的信件。他过得很不好，精神焦虑，几近崩溃，希望她能够回国。“性”，用她的话说，“可以管点用”。她相信弗雷迪不管在哪里都会过得很快活，他需要肉体而不是精神安慰，对后者他没有需求。显然她只是将他视为迷失在认真的世界里的玩偶。这个人过去欺骗了她，现在她不会再上当了。现在她把汉普希尔当成流经她家花园的涓涓细流，在这样一条小溪旁边可以生活一辈子。就为这个她想回国。下一艘康纳德游轮明天（星期二）起航，之后就没有从纽约出发的了，一直要到9月10日左右。她觉得从这里走比从加拿大走安全。或许是这样吧。她认为我应该留下，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可以解救大家。我做不到这点，即便我能，也没有理由，她是知道的。她想和我一道旅行，我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不免又感到难过、沮丧。如果可能，星期三我会发电报给你们，代我向菲利克斯问好。

344

### 沙耶

勒内认为她的孩子们和雷伊镇<sup>1</sup>的那位太太——我记不得她的名字——在一起会很快乐。她一想到瓦莱丽不知哪天会脱口而出自己有两个爸爸就感到害怕。我曾经对朱利安<sup>2</sup>的美貌和瓦莱丽抱着他时表现出来的溺爱有过生动流畅、充满激情的描写。我想，如果有必要，她会很乐意让他们在美国像美国人那样长大成人。她希望你从未认为她想把孩子们扔给你，我安慰她说你头脑里从未有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科恩医生<sup>3</sup>给总统特使威尔基的信写得很好。可惜这里买不到罗斯福徽章。

我为柴尔斯先生写了三份备忘录并口述让人打出来，从打字效果看，人们会以为当地英国圈子里人人都是文盲。真令人扫兴。他们全都是共和

1 纽约城郊威斯彻斯特县雷伊镇的哥得里夫妇收留了艾耶尔一家。

2 1939年1月出生，2004年在海啸中去世。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之子。

3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科恩（1879—1957），医生、科学家，文化兴趣广泛，与法兰克福特信件来往频繁。



党，崇拜罗杰·迈纳斯，对莫里斯闻所未闻。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9月3日 [1940年]

纽约市西85<sup>1</sup>街33号，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父母亲：

出于礼貌，我准备在阿伦森家里住上几天。信件等最好还是寄往肖勒姆酒店或华盛顿特区翠希广场2414号。这里是西85大街250号，有点吵闹，离百老汇大街太近了，车辆的噪声不绝于耳。同霍华德·古德哈特又吃了一顿饭。他和我不是同一类人，有点势利。曾经招待过温莎公爵<sup>2</sup>的尤金·罗斯柴尔德<sup>3</sup>也在场，因为忙着写一本有关文艺复兴艺术家提香的书，看上去很疲倦又有些堕落（据美国报纸报道，他来时带了一整袋的珠宝，并声称值100万美元）。我的处境是：柴尔斯希望聘用我（我是这么想的）作为使馆和当地犹太人的中间人。这项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一旦他下达任命，此事几天内会见分晓，我会回英国一趟，作短暂停留，见一些人，像劳埃德勋爵<sup>4</sup>、魏茨曼等，与牛津做些安排，然后再回来，最好是乘坐跨洋飞机。345 因为钱不够，想请你们在英国帮我付票款，至少是里斯本—英国的往返机票。从伦敦到纽约没问题，但从纽约到伦敦我就没把握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机会能够乘上克莱尔<sup>5</sup>号，它是前往爱尔兰的，乘客都是些比我重要的人物。当然，这些我得等到和柴尔斯把事情落实之后才办，他为人极好。目前我在英国情报图书馆工作，很有意思。我给哈罗德·尼克尔森寄了一份关

1 这里应该是55；85是阿伦森家的门牌号。

2 “前国王爱德华、现在的温莎公爵，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尤金男爵邀请，将在尤金男爵位于维也纳南边25英里处的恩泽菲城堡作客一段时间。”《曼彻斯特卫报》1936年12月14日第9版。

3 尤金·丹尼尔·德·\*罗斯柴尔德，埃德蒙、詹姆斯和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维也纳远房堂兄弟。

4 乔治·安布罗斯·劳埃德，多勒布兰的劳埃德男爵一世（1879—1941），1940—1941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5 跨洋飞机。

于该机构的报告，他可能会奇怪我在从事些什么工作。你们可以通过电话本，给住在吉米·罗斯柴尔德家里的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打个电话（一定要打），因为她似乎很关心我在做些什么，告诉她我手头的工作一结束，差不多就是你们接到信的时候，就立刻启程回国。这里普遍看好英国皇家空军的抵抗力量，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我们。今天上午的新闻报道了（1）驱逐舰正派往英国，真令人高兴；<sup>1</sup>（2）关于组建一支犹太军队的消息。这是修正主义者们一直在煽动要成立的。但从报上看来，这个提法不是来自英国政府，而是来自伦敦一位名叫亚伯拉罕<sup>2</sup>的先生。他具备什么权威？是否想通过这种方式号召全民皆兵？但对美国，似乎有点不够成熟，有点准备不足。你们能否帮我打个电话给玛丽·费希尔（电话簿里，联合广播委员会）和克里斯托弗·考克斯（殖民部）？首先，告诉他们我打算很快就返回英国，另外问他们史密斯9月份是否在牛津，因为我得见他。我必须确认这里的安排肯定能兑现，这样才能在回来之后立刻投入工作。法兰克福特非常支持我的计划，认为我会有重要价值。希望你们收到了我有关贝塔姨妈的电报，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应该把她送去牙买加<sup>3</sup>，她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阿伦森夫妇向你们问好，他们对当地生意人不专心做生意、缺乏吃苦精神以及坑蒙欺诈的行为颇感失望。似乎他们更喜欢英国。

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劳到蒙特利尔去了两星期。他对我非常亲切，帮了不少忙。只要对他态度友好，不摆出恩赐的样子，他就是一个极好相处的人，尽管有点粗俗。 346

1 9月2日，美国同意为英国提供50艘老式驱逐舰，交换为期99年的西印度群岛、百慕大和加拿大军事基地的租借权。

2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1887—1955），二战期间任伦敦持修正主义立场的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政治处负责人，1940—1948年担任《犹太标准报》编辑。

3 不太清楚伯林是否在这里用牙买加作为代码指其他某个地方。总之，到头来贝塔和其他亲戚还是留在了里加，并在1941年遭纳粹杀害（见上文第394页注5）。

以赛亚·伯林对美联社快讯的分析，用惠勒—班纳特的话说，“是一份文笔熟练巧妙，富有敏锐洞察力，内容风趣的报告”。<sup>1</sup>这份精彩报告为继续讨论让伯林在美国获得一份长期职位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9月15日 [1940年]

纽约市西55街33号，肖勒姆酒店  
有时换成西85街250号（阿伦森家）

我亲爱的父母亲：

收到你们的信和电报，令我倍感喜悦和宽心，特别是发自海滨胜地兰迪德诺的那封。很高兴你们终于决定去了。路边的嘈杂声音一定很折磨人吧。你们是一直住在维多利亚路3号<sup>2</sup>，还是爸爸仍然时不时得去伦敦一趟？全部要靠电话联系吗？我收到哈里曼银行的信，称我是绝无仅有的大主顾，如果我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会很乐意委托布朗·西普利银行帮忙。我按照要求提出什么也不做，此事才没再提起。听说索伯尔<sup>3</sup>从马德里来这里了。但只要可能，我不想跟他联系，因为和他无话可说，也不想代表除了你们的哪位和他说什么。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里的报纸出色地配合了伦敦轰炸事件，将其烘托到了不起的高度。不过今天打下170架纳粹德国飞机的战绩确实令人惊叹。<sup>4</sup>直截了当地要求美国参战的呼声开始出现。我们正在开展的宣传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英国外交部目前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态度，好像他们从未想过派我去莫斯科。这意味着那里一定有人欺骗了我。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们有意要对我能做的事情视而不见，我也无可奈何。我眼下的处境是：目前的庇护人柴尔斯是达夫·库珀派来重组使馆，对其进行改

1 见前引书（上文第384页注2）。

2 伯林的父母在兰迪德诺度长假休养。

3 蒙特利尔的鲍里斯·索伯尔维茨与门德尔的伦敦贸易公司和海外贸易公司均有生意往来，公司在俄国的鬃毛交易上欠了他5000多英镑，11月还清。

4 那天派遣轰炸英国的飞机达1000架，这些飞机是其中的一部分；据报道，英国仅损失了27架。

革的。我让菲利克斯请我们俩在纽约吃了早餐。此举提升了我在柴尔斯眼中的地位，并产生了如下效果：他执意要我为他工作；他将花上14到20天时间，也就是从10号到10月1号，把新成立的新闻处带入正轨，这需要与伦敦 347 发生大量电报往来。他愿意付一笔钱——差不多200英镑——作为我离乡背井、来到这个无比昂贵的土地上的安家费。他提出一年给我5000美元。这个数我觉得合适。学院会付给我200到300英镑，剩下的我可以按普通方法从银行取。一定要确保钱足够支付我的行程。我之前说过了，我想回国逗留，然后才正式开始工作。当然前提是他同意我先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好。菲利克斯对这个安排表示高度赞许，柴尔斯说因为我不是正式员工，必须把我的名字发电报给情报部。此事他会在9月25日左右连同预算要求一同办理。我希望他们不会从中作梗，不过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是没有先例。于是我满怀希望地暂时留在这里。胡拉尼、比利·玛丽·费希尔（她对我们霍利克罗夫特的人防工程非常满意）、戴维·塞西尔和马摩斯坦等都给我来了信，转达了你们的口信和问候，为的是让我开心，一个个全都像老道的宣传家。劳去蒙特利尔了（明天返回），我讨厌孤独，于是搬来和阿伦森一家住，付一点点房租——只有一小笔，这样比较好。和劳一起住的好处是，可以和他合住一个套间，房租分摊，这样省得多。我17日要去弗吉尼亚州三天，看一位记者朋友，他名叫约瑟夫·艾尔索普<sup>1</sup>，是总统的表兄弟，我认为总统会再次当选。威尔基完全靠不住，罗斯福才称得上英明绝伦。这里的犹太人相当棘手，但我希望为了英国政府的利益能够制服他们。请继续来信。

爱你们的

沙耶

顺便说说，我身体很好，这里的食物、凉快的天气以及英国情报图书馆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都很适合我。这两个地址<sup>2</sup>我均可收到。我认识了一位

1 约瑟夫·赖特·\*艾尔索普（1910—1989），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

2 在原信中，这段附言在信头，还有一个箭头指向两个地址。

来自布鲁塞尔的银行家，名叫菲利普森，人很不错，娶了位来自莫卡塔家族的太太。我和英国情报图书馆（位于纽约洛克菲勒广场50号）的同事相处融洽。

又及：阿伦森因为在这里缺乏信用记录，面对那么多可以与英国和南美开展的业务望洋兴叹，情绪低落。他发出的电报很少有回音，这让他感到  
348 有点受伤害。他们夫妇俩向你们问好。

巴特菲尔德或是加拿大皇家银行，你们觉得怎么样？纽约是个粗俗的城市，非常乏味、无聊。

几件事汇报一下：（1）目前我正在寻找罗斯金一家；（2）不是感觉乏味，而是想家；（3）明天送艾耶尔夫人坐船回英国。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9月23日 [1940年]**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道2100号，费尔法克斯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因为你们不在伦敦，所以没有理由不继续给你们写信。或许你们的信件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这里，不过你们还可以发电报——我不常发是因为条件不许可，而你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再就是，恕我直言，因为我这里发电报比你们那儿贵。我的固定地址是：纽约市西55街33号肖勒姆酒店，因为英国情报图书馆位于纽约。今天我到这里来见我的资助人柴尔斯。目前我的工作已大致有了着落，薪水是这样安排的：政府出一半，我自己解决一半（即新学院加上其他个人渠道筹集），总共为1200镑。这就很好了，而且工作也合我的心意。我现在的情况是，我会获准回英国一周或十天，然后直接回来开始工作。整个安排现在就等着情报部批准了，得他们同意才行。一旦

他们首肯，我会在月底乘跨洋飞机回家一趟，争取和克莱尔号一道返回。今晚福斯特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所以我住在酒店。信可以寄到纽约的肖勒姆酒店，或由使馆的福斯特转我收。最好寄往酒店，我在那里同弗雷德·劳合住一个套间。最近他母亲来纽约，她和法兰克福夫人向你们问好。这里日子太单调，没什么日记好写。明天我会回到肖勒姆酒店，设法与罗斯金一家和豪斯廷取得联系。是我自己乐意这么做，并非为了你们的威望。我在阿伦森家住了十四天，因为便宜（一天付一美元）。他们装出不爱钱的样子，可照样还是要了。伦敦沉默的指指点点触怒了穆利亚，尽管奥瑟曼<sup>1</sup>给他写信安慰也无济于事。祖父的信我没有附上，因为信的主要内容不外是他们很好、你们怎么样，等等，其他便没什么内容。如果我乘跨洋飞机回来，我会让银行付款给位于爱丁堡干草市场7号的美国航运公司。从道德感出发，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一周左右。

爱你们的

沙耶

349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0年10月5日星期天

纽约市西55街33号，肖勒姆酒店

我最最亲爱的父母亲：

新年好<sup>2</sup>，感谢你们的来信和电报。它们带给我的喜悦无以言表。我在这里的工作基本已定，直属英国情报图书馆柴尔斯和弗莱彻两人领导，并在外交部和情报部间接管辖之下。收到一封哈罗德的来信，充满善意，告诉我为什么前往莫斯科不现实<sup>3</sup>，叮嘱我诸事都要信任柴尔斯。我正是这么做

1 安娜·奥瑟曼，门德尔和玛丽的远房亲戚施内尔森家的表妹，嫁给扎马克·奥瑟曼，可能同时也是生意伙伴。这个时间他们住在伦敦，与伯林一家和萨姆诺夫一家来往甚密。

2 见上文第113页注2。

3 在日期为9月9日的一封信上，尼克森声称，克里普斯反对额外增加人员编制以及格莱德温·杰伯从外交部调往经济事务部是外交部态度转变的原因。

的。虽然我的道德感一如既往，我还是打算现在回国，原因如下：

1. 1月份更不容易，天气更冷，机翼上容易结冰，飞行更加困难；

2. 史密斯发来了电报（信中无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当然我还得让外交部通知他们一些事情），勉强同意等到1月份。但我在这里的工作正好是那段时间，到时新学院一定会因为我缺席而感到不快，可没办法，那个时间正是我最忙的时候。因此，我最好现在就全都安定下来，开始干活。在总统大选之后事情会更多。

因此我计划：

1) 让柴尔斯催问一下外交部和英国情报图书馆，或者请大使帮忙问问，他们是否准备立刻重新将我派出；

2) 让这里财务处的人通知英[国银]行，让你们或牛津银行向美国航运公司支付我的飞机票款。我想两次飞行都经过葡萄牙，由里斯本往返，即搭乘纽约—里斯本—伦敦航班，然后再从伦敦到里斯本，之后乘跨洋飞机或美国客轮回纽约。目前航行显然要比1月份来得安全。这场战争会是一场持久战，美国很快会加盟进来，并有可能发起进攻。但这一切最早也要到11月5日总统大选之后。我这个分析想必你们一定也会认为不无道理。启程那天我肯定会发电报。在收到郑重其事、全面肯定我重要性的官方文件之前，我不会成行。

珀尔兹韦格已抵达这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但在纳胡姆·戈德曼的支持下，对他进行了气氛十分友好的采访。在犹太事务方面，我会始终寻求  
350 与中间人的合作，而不是敌对。哈伊姆·魏茨曼显然暂时还不能来，部分原因是法国贵族们的挽留，或许也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正在参战，薇拉<sup>1</sup>不愿离开。索伯尔维茨<sup>2</sup>没来找我，我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现在就固定住在这儿了，不是和阿伦森住，常伴其左右我可受不了。前段时间之所以和他住，一是为了省钱（不过还是付了钱，虽然不多，洗衣、吃饭全都包括在内，

1 薇拉·魏茨曼（1881—1966），哈伊姆·魏茨曼的妻子，儿科医生，1920年与丽贝卡·西弗（下文第492页注2）和其他人一道成立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WIZO）。

2 见上文第410页注3。

大概一天一美元)；二是为了不拂他的好意。和劳一起住这儿也很便宜，而且感觉舒服——他是一位朴实憨厚的人，过去在我面前总感到自卑，但现在好了。他对伊卡的死颇感伤心。你问我每天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早晨，我通常喝咖啡，吃点酸奶油<sup>2</sup>、面包卷、吐司什么的，9:30左右出发去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英国情报图书馆上班，五个街区的距离，走路七分钟可到。在那里工作到午饭时间，然后与某个“工作”上的朋友，犹太新闻记者或能起作用的美国人，或者是同事，一道吃午餐。主任<sup>3</sup>很喜欢我，偶尔也会带我出去吃饭。点的菜是欧洲大陆风格的，我觉得很好吃。就战时而言，这种食物可以说是美味得有些过分了。回到办公室我继续工作到6:30左右。之后找人一起吃晚餐，若没有别人，就和劳一起上犹太餐馆，要么同西格尔<sup>4</sup>或波里雅科夫<sup>5</sup>或其他人一起吃。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霍华德·古德哈特了。他这人有点势利，又表现得过于愚笨，但我在走之前还是要见他一面。和豪斯廷夫妇吃了饭，向他们转告比克的问候，却被告知他已不在人世。那种沉默真是令人难堪。沃利很喜欢伯林先生，主动提出如果需要，可以借钱给我。他真是一个好人。索菲比较内向但很友好。沃利这个人完全可以信任，他比一般的富人要慷慨大方得多。我还拜访了罗斯金一家。里加的罗斯金夫妇<sup>6</sup>也在那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开心惬意的夜晚。维克托[·沃什诺克]给阿伦森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他很好，很安全，一家大小也都平安。这是第二次听到来自里加的消息。两位罗斯金太太对我都很亲切。晚上，我偶尔会去看电影。每两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我会去一趟华盛顿，住在福斯特家里，或者就是使馆里一位叫欧毕<sup>7</sup>的牛津教授家里（他娶了一位美国太

1 伊卡·奥尔登（见上文第223页注3）。

2 此处伯林原文为俄语：smetana。

3 阿兰·阿维斯·达德利（1907—1977），1930—1940年任纽约英国情报图书馆副主任，1940—1942年任纽约英国新闻处和英国情报处主任，1942—1949年任职外交部。

4 可能指路易斯·西格尔（1894—1964），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工人领袖，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和犹太机构领导人。

5 亚瑟·波里雅科夫（1909年生），皮草富商，以赛亚·伯林在圣保罗学校的同学。

6 可能是伯林父母的朋友的兄弟及其太太；另见上文第394页注6。

7 雷德沃斯·欧毕（1900—1984），1931—1945年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和经济学导师，1936—194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参赞兼经济顾问，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



太, 战争爆发就到这里来了), 要么就是其他朋友那里。我的一名葡萄牙学生也在纽约, 准备为我介绍一些里斯本的情况, 以防万一我得在里斯本等  
351 上一两天, 需要人帮忙或消遣。[雅各布·]玛沙克也十分和蔼可亲。我一点  
都不孤单。劳可能要去南非, 这样我又得找个人合租房间, 当然要找一可  
靠熟悉的老朋友。

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我想你们的办事处是在拉什家里, 即老牌伦敦北方公司<sup>1</sup>, 对吧? 这里的英国人以及我打过交道的犹太人都很善良, 令我为之倾倒。唯有一些富人不那么好相处。

10月中旬, 以赛亚·伯林启程回国, 途经葡萄牙。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五1940年10月18日

埃斯托利尔皇宫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已到达葡萄牙, 乘跨洋飞机来的, 现正等候转机伦敦。希望你们没有为我的胡作非为感到担心, 真的没有必要——我确实需要回国一趟。不跟学院开诚布公地彻底安排清楚, 我无法全心投入工作。我想我不会在伦敦逗留太长时间, 我身上带着给外交部和情报部的信件, 这些都要求我火速赶回。葡萄牙非常舒适宜人。这里到处是来自各国的难民, 绝望地等候着

---

1 以赛亚·伯林的父亲刚刚与莱昂内尔·沙立特合办了一家木材公司, 就建在沙立特家原来的公司——伦敦及北方贸易公司摩基特办事处(已经坍塌)的旧址上。所罗门·拉什米利耶维奇同时在两家公司为其表兄莱昂内尔工作。

有船将他们送到美国。<sup>1</sup>限额已经放开，例如，原先给拉脱维亚人的配额已满，现在放开后便有很多来自巴黎的拉脱维亚人迫不及待地守候在这里，每天去旅行社打听。我住的是豪华酒店，非常舒服：食物美味，观看各色各样的人也很有意思。俊美的面孔和漂亮的建筑在里斯本随处可见。这里的使馆因为接到了华盛顿关于我的电报，很客气，但无法肯定下一班飞机什么时候能来，或许要等到周四。豪斯廷夫妇非常聪明能干，完全可以依赖。我向他们转告了比克的问候，却被告知前不久[他]已离开人世。这里一个从巴黎来的名叫罗森塔尔的人说认识你们。他是雷布先生的朋友，准备去美国。埃斯托利尔是一个海滨度假胜地，有各种游乐设施，距离里斯本仅个把小时的路程，比城里安静舒适得多。去见官员时我乘坐短途火车。我觉得这里最常听到的语言是波兰语。一到英国我会直接去牛津或兰迪德诺，要看到达地是哪。我很好，甚至可以说心情愉快。我认识这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和其他人，时间很好打发。我会在这里写一份有关美国局势的报告，以防情报部要我完成一份才让我走。

352

深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我希望10月24日能够出发，但恐怕难以遂愿。从纽约与我同机<sup>2</sup>的英国大使洛锡安勋爵无法带我同行。不过和个人乘客还是有所不同，我享受到了政府随员的航空优先服务。

你们能否立刻替我给牛津的史密斯（还有西85街250号的阿伦森）分别发电报，告诉他们我会在这里待到25日，不是我的错，而是飞机因天气恶劣延期。

---

1 葡萄牙当时是中立国家，与同盟国相对比较友好。里斯本港是欧洲大陆唯一一个前往美洲的出发港。逃往美国的准难民们为了得到移民签证以及乘船费用，必须面临漫长且往往毫无结果的繁琐手续。尽管由于欧洲局势的影响，要求放开限制的压力日益增长，基于配额的美国移民法仍然复杂且限制严格（参见下文第428页注1）。

2 以赛亚·伯林出发时与洛锡安勋爵同乘一架飞机，后者赴伦敦参加磋商会议。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0年10月19日星期六

埃斯托利尔皇宫酒店

亲爱的爸、妈：

[……]收到此信后，请你们一定给我发一封电报，葡萄牙埃斯托利尔皇宫酒店，告诉我你们一切都好，儿子将感激不尽。这里电报很贵，我又没多少钱。我很好，根据葡萄牙的报刊报道，英国即将入侵，偶尔也刊登消息，披露聚积在这个豪华酒店的各国难民数量已达到惊人数字，让淳朴的葡萄牙人诧异不已。我希望很快就能与你们团聚。本来不想跟你们说我要回去的，知道你们会反对，但这一耽搁逼着我向你们透露实情。法兰克福夫妇和其他人都赞同我回国一趟。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必须仿效凯撒之妻，洁身自爱，不该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瞒住您二老。不论在美国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都必须安排好回国一趟。祝好。给我发电报，写信也行。

让你们烦心却茁壮成长的

353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终于搭上飞往英国的跨洋飞机，在英国西南部港市布里斯托尔着陆的时刻富有戏剧性。但对迄今为止一直远离战争危险因而深感内疚的以赛亚·伯林来说，却如释重负：“我们到达时正赶上空袭，我简直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就是为之而来的。我感觉好多了[……]随后我乘火车从布里斯托尔抵达牛津，回到原先生活过的新学院，重新开始生活[……]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我开始重执教鞭。”但这一昔日生活的回归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之后，11月底，我接到英国情报部发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亲爱的伯林先生，您的休假似乎超期了。能否请您解释目前在于什么？”我回信说，据我所

知，情报部并未聘用我，也没有别的任何人聘用过我，因此我并不认为我有假期。信上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噢，是这样，我明白了。可能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你能否到我们这里来一趟？”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去了伦敦的英国情报部。见到一位喝得有点醉醺醺的记者，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对我说，“瞧，你已经被派到驻纽约英国情报处工作了。”“什么时候？”“噢，三星期前。”“可你们没有告诉我！”“我以为我们跟你说了。”知道我为什么被任命吗？原因是我整理撰写美联社快讯报告的那段时间里，遇到了两个对我产生好感的人：一个名叫奥布雷·摩根〔……〕另一个叫惠勒—班纳特。他们俩都在英国情报图书馆工作。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某种宣传局。他们对我颇有好感，很是喜欢我，认为我能派上用场，并向情报部推荐我，让他们给我安排职位——他们两人希望我回去。真令人高兴，可是居然没有任何人向我透露过任何消息！<sup>1</sup>

## 致哈伊姆·魏茨曼

[1940年12月]

伦敦公园路，多切斯特酒店

我一直在设法与您联系，但终归徒劳。他们在酒店里找不到您，据说2.0号客房的电话号码<sup>2</sup>也出故障了。我星期五[1月3日]出发，走之前的晚上 354  
我会住在伯恩茅斯（皇家巴斯酒店），周二和周三在牛津。我会定期从那里给您电话。我的行程有可能被葡萄牙领事馆耽搁，他们对中转签证总是拖了又拖。倘若真是如此，我会尽量争取在走之前再去看您一次。上回您和劳埃德勋爵的会谈<sup>3</sup>，还有上星期一与您促膝交谈的整个夜晚，那么精彩，

1 这里的说法和以赛亚·伯林在前几封信中说的他一定要返回美国工作的话有明显出入。或许他给父母的信只是谈及一种尚未确定的安排，为了打消他们对他回到战事纷乱的英国的担心和恐惧。1941年1月3日致莫伊拉·加斯特的信（见下页）对真实发生的情况作了合理的解释。

2 魏茨曼夫妇将多切斯特酒店的210套房作为他们战争期间在伦敦的固定住所。以赛亚·伯林的“2.0”可能是“210”的笔误。

3 劳埃德勋爵在9月13日与魏茨曼会面，转达英国政府的意见，同意于适当时机在英国军队内成立独立的犹太军队。长期以来，犹太事务局一直在促成此事，但受到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阻挠。1940年5月丘吉尔任首相后，对犹太复国事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终于在9月份有了突破性进展，魏茨曼“隆重当选”：布兰奇·E.C.达格代尔语，见《高尔夫球棒：布兰奇·达格代尔

那么趣味盎然，令我印象深刻，激动不已，难以用语言形容——唯一遗憾的是没能见到魏茨曼夫人，在这里，请转达我对她的挚爱之情。您能否在牛津给我发个信或电报，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您会在里斯本，我可以向谁打听您的行踪？非常感谢。不仅为此事，还为其他许多事情。

您的

沙耶·伯林

致莫伊拉·加斯特<sup>1</sup>

1941年1月3日

伯恩茅斯，皇家巴斯酒店

最最亲爱的“小宝贝”：

你完全有权表示抗议，我唯有满怀愧疚，情绪低落，伤心难过。有谁能曾告诉你我充满悲情的冒险经历？我曾认为自己受命两个政府部门，可以作为新闻界的随员前往莫斯科（可以想象这种期待令我多么欣喜若狂——此事就连费希尔夫人也出了不少力）——在目前这个时候，或者也可以说在任何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比莫斯科更让人神往。除此之外，7月中旬牛津无所事事的生活更加深了我的苦恼。我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这场战争，任何方式都可以（你还继续支持吗？也许改变态度了）。于是我以信使身份，背上挎包，毅然出发。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海上航行后，抵达华盛顿，却就此搁浅。既不召我回国，也不派我继续前行，只是让我等候，没有任何指示。美国是个极其乏味的地方，这一点无需多费笔墨。这里的居民没有灵魂，最多只有心脏。每个人都是那么干净彻底、不可救药地了无情趣，远远超

.....  
 日记，1936—1947》，N.A.罗斯编辑（伦敦，1973），第175页。但是这一协议不断引起争议，始终没有确定下来。劳埃德与魏茨曼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又会谈过几次，专门讨论实施细节问题。魏茨曼的情绪也随着会谈的结果时阴时晴，喜怒不定。达格代尔日记没有记载这里提到的会面情况，但显然结果令人满意。后来，由于军队里和巴勒斯坦官方的不断反对，此事便一次次耽搁拖延。一直到1944年，犹太军团才得以成立（1946年解散）。

1 莫伊拉·林德的丈夫杰克·加斯特（1907年生），律师，1938年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过了“乏味”这个概念的内涵。他们充满内疚感，心神不宁，紧张恐慌，恬不知耻，而且糊涂愚蠢，大多令人难以忍受。过了两个星期后，我歇斯底里地向法兰克福特提出我要回国。随后官员们给我提供了各种与英国相关的工作，出于良心上的考虑，这些我都小心谨慎地拒绝了。后来，一个犹太人来找我。他让我做的事似乎现实得多，重要得多，更让人无法拒绝。我说我可以接受，但必须满足一千个条件，同时允许我返回英国，问问大家，看是否在英国有我可干的事。这时候，我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愚蠢难堪，无所适从。于是我返回英国，却立刻遭到英国外交部和英国情报部的轮番袭击。情报部是个快活、轻浮、缺乏工作效率的地方，里面全是些老朋友，走走看看挺好，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很乐意成为其中一员，因为这里的官员一点不像公务员。正因为这里对效率要求不高，至少显得人情味十足。我很快成为某号人物，在标有“密级”标志的官方文件上签字，并让我即刻返回美国。我犹豫不决，一个劲地拖延以争取时间，但全都枉然。我越是提要求，他们答应得就越快。我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在英国谋取一份工作，却一无所获。于是我现在重新出发，以“英国新闻处下属专家”身份，准备到纽约洛克菲勒广场30号上班。实在难以形容我目前这种可怕的悲惨处境。首先，我根本不想离开英国，这几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开心的。其次，现在已确信无疑有我要做的工作，我无比崇拜的新偶像魏茨曼博士不断热切地怂恿我干。第三，每当在美国报纸上读到来自英国令人痛苦的消息，我就变得神经质起来，恨不得立刻返回英国。也因此在美国——你不会相信的——落下了多愁善感和神经质的美名。毫无疑问，就我个人而言，要想影响事态发展，不论是以多么微小的方式，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莫斯科或是纽约。我当然更愿去莫斯科，可他们不让。看来俄国人倒无所谓，反而是白厅对此耿耿于怀。俄国人和犹太人是唯一和我有关联的公众主题。在纽约我还有另外两项工作，和犹太人无关，但其他任何人都都能干。我还必须在800万左右的美国家犹太人建立起各色各样的关系网。其中500万是地道的犹太人，300万是齐门那种的。<sup>1</sup>我非常不开心。人人都说我

1 这里列举了阿尔弗雷德·齐门（上文第278页注4）。虽然出身犹太家庭，却培养了国际化视野，

356 责无旁贷应该去美国。只有莫里斯除外，他不愿我去。事实上我即将走马上任，从此要饱受折磨。目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接受并遵从某个原则。我希望能够为赢得这场战争出一份力。这是我的唯一出路。但总的来说还是要请你为我祈祷。相信你能够感同身受。谢谢你寄来的孩子的照片，相信在你眼中他一定可爱如天使。终于，连我都有了韶华已逝、悔之莫及之感。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亲爱的“小宝贝”，任何普普通通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都将令我感激涕零。希望能够立刻见到你。一生中我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飞灰般普普通通（这个词老是奇怪地冒出来）的消亡。

上帝保佑你。

沙耶

任何时候有空就给我来信。你无法想象，人在被放逐之时信件能产生多么大的效果。一旦这里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否责无旁贷，我都会立刻飞奔回国。我希望人不要这么死心塌地念念不忘自己的小天地和熟悉的景物。在三十一岁的时候迷失了方向，真是莫大的耻辱。收到戈伦韦的来信，他（我还是这么喜欢搬弄鸡毛蒜皮的琐事）和一位叫莫里斯<sup>1</sup>的小姐结了婚。这位小姐酷爱爵士乐。另外，在部队服役的汉弗莱也寄了信来。克里斯托弗始终都在催促我去美国。向杰克问好。

以赛亚·伯林

门德尔在家庭回忆录中写道：

1941年1月1日，你前往伯恩茅斯，从那里乘飞机到里斯本，再从里斯本（坐船）去纽约。我们陪着你，因为气候原因，飞机一直无法起飞，一连有八九天我们都待在一起。你在那里不太开心[……]当然，充满危险的旅程也让我们忧心忡忡。你前往美国的决定非常明智而且合乎时宜。试想一下如果整个战争期

---

并不特别将关注焦点集中于犹太人的利益。

1 玛格丽特（“玛吉”）·艾温·莫里斯（1920—1976），1940年12月与戈伦韦·里斯结婚。

间你都待在牛津，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担任一个不喜欢又无足轻重的职位，那样的话，你不仅会受到压制，还很有可能让你巨大的活力消耗殆尽，使你从内心里消沉枯萎，或许还会将你变成唯命是从的庸人。而现在，多亏了你的才华和个性，抓住了机遇，在美国得到了极大发展。你一定为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或许你并没有为此得到赞扬和感谢，但这份贡献也是为你自己的。你拓展开阔了个性，与更大更广的世界接触，不再局限于牛津狭小的学术圈子[……]使自信心得到极大加强。你获得了从政的知识，外交方面也得到锻炼，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引入歧途，而许多学者却很容易受骗上当，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如此。

357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1年[1月]<sup>1</sup>10日下午2:30

葡萄牙阳光海岸<sup>2</sup>

埃斯托利尔皇宫酒店

亲爱的爸、妈：

蔚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海面平静无波。我的船舱里只有两个人（与其他25个旅客不同），同住的是一名非常友好、为人实在的美国财经记者，同时也是英国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为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贸易统计数据。他名叫斯科力文，之前和我们同住在这家酒店。他熟悉半个美国，谈吐极为风趣。皇宫酒店将我当作久违的朋友般欢迎，给我安排了一间舒适的双人间，让我美美地睡了14个小时。整个飞行一路颠簸，实在累得够呛。几乎每个人都晕机了，究竟是吐掉好呢，还是强忍着不吐，为此大家还争论不休。想得到吗，这是我有生以来参与的最最恶心，但在当时的状况下，又不无智慧的讨论。我好不容易才不失体面地脱身出来。飞机一着陆，呼

1 日期误为1941年12月10日。

2 该信写于“埃克斯坎宾号”客轮上，用的是酒店提供的信纸。就是在此次旅途中，伯林初遇并注意到他未来的妻子艾琳·斯特劳斯，她正从法国旅行归来。但写信时两人尚未相遇，向父母汇报整个航程的下封信中也没有提起她。



吸到了新鲜空气，大家便顿时感觉神清气爽，真是神奇。我和斯科力文享受了一顿美餐（顺便说一句，[伊恩·]鲍恩也认识他。应该是因为在统计方面兴趣相投吧），然后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昨天）过得相当愉快。里斯本是个可爱的城市，充满生气。泛美航空公司的作风还是一如既往，疏忽马虎，极不负责任，居然说什么要等3月份才会有航班，让我转搭国际运输公司的航班。即便如此，我还得另外支付40美元，这简直无异于雪上加霜，让羞辱又多了伤害的成分。

听说轮船很舒服，但到纽约整个航程要八九天。我同使馆一位名叫英尼斯的官员吃了顿饭，不过幸好并不需要请使馆帮什么忙。一切都很顺利。我买了一套极其柔软舒适的法兰绒睡衣裤，很暖和。今天天气寒冷但晴朗无风，碧空万里。轮船在五六点出发。皇宫酒店蜂拥而至的难民数量并未减少，疲倦但满怀希望的面孔一如既往，每天照样围坐在英国或美国领事馆外面等候。卡迪什<sup>1</sup>还在此地，但住在里斯本主干道上一幢很气派的大房子里，家里有两个帮佣。他马上就要拿到美国签证。他的太太<sup>2</sup>打算在美国开办家庭作坊，制作巧克力，她还让我品尝了一块样品。谁都认识他们。他们一点也不贫穷，待在这里就很好。可是卡迪什渴望在商界大展宏图，他将自己视为美国工业领袖，梦想着用商业巨头的魅力、天才以及坚强有力的逻辑征服整个美国。这是一片充满快乐的国土，离开它真有点不舍。英国在与意大利人的交战中取得的胜利在这里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意大利人的仇恨甚至超过了德国人。英国人的战绩全都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在各种报刊上转载。希望美国的报刊也一样友好。

我极好，真诚热切地期待着投入我的工作、生活甚至这次旅程。我准备去买些好吃的干果在行程中吃，抵消一些旅途中不可避免的暴饮暴食和缺乏运动。如果有账单寄到新学院，请帮我支付。在美国我无法支付，也不希望布莱克韦尔书店认为我漏了支付这段时间的账单。常写信，写长信，

---

1 即卡迪什·緬杰列维奇·阿普特（移民后改名康斯坦丁·马克维奇·阿普特斯），门德尔的表兄。

2 拉希勒·阿普特，婚前姓别林基。

寄到肖勒姆酒店或我办公室都行,告诉其他人也务必这么做。

希望你们与亚当斯夫妇的茶会开心愉快,也希望牛津和之前一样不受外界影响。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寄上我对你们所有的爱。上帝保佑你们。

你们的  
沙耶

哈伊姆说他要走,15日吧。道声别,祝他旅途顺利,他会很高兴的。不过也不一定非得这么做。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二1月28日 [1941年]

英国情报处

我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也许难以相信,我一到岗位就陷入没完没了的紧张忙乱之中。繁忙、焦虑、快活,冲劲十足,没个停歇。与过去八九月份学校放假,无聊漫长、心情阴郁的日子完全不同。到里斯本的空中飞行很不好受,碰到强风,机上除了我和美国朋友斯科力文,所有人都晕机了。在葡萄牙过了两天舒服自在的日子,从里斯本发去的信中都跟你们说了。接着便是在“埃克斯坎宾号”轮船上连续度过九天九夜。第一天好大的风啊,你们的儿子平生第一次晕船,晕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剩余的航程都过得很开心。同一艘船上什么人都有,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有公爵夫人,还有许多流亡国外又被遣返回国的美国富人。一位从里斯本返回的胖乎乎的《纽约时报》记者,名叫弗里达·沃格尔,是来自日内瓦的犹太姑娘,她坚持说自己是土耳其人,来自一个土耳其世家,把大家逗得不亦乐乎。这种航行基本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任何变化,我猛吃猛睡,据这里的人说,与10月份离开美国时相比,我

的脸色好看多了。这里和华盛顿的所有同事都热烈欢迎我的到来。如今我在这里过得非常开心。身边的同事都特别善良，乐于相助。英国情报图书馆的老朋友们甚至为我设宴接风。华盛顿的菲利普斯·法兰克福特夫妇也非常亲切，热情款待了我。我甚至用俄语跟柴尔斯夫人<sup>1</sup>交谈。使馆突然开始重视我，邀请我和使馆各级成员共度了几个晚上。我还参加了华盛顿巴勒斯坦联合呼吁组织举办的午餐会，认识了斯蒂芬·怀斯<sup>2</sup>、利普斯基<sup>3</sup>，以及德·索拉·普尔夫人<sup>4</sup>（哈大沙组织领袖）。怀斯很讨人喜欢。尽管有时显得滑稽可笑、前后不一、变化无常、吵吵嚷嚷，给人靠不住的感觉，可他同时又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宽宏大量，头脑聪明，精通世道，不仅富有勇气和想象力，同时还心地善良。利普斯基不值一提。德·索拉·普尔夫人温柔文静，性格恬美，所罗门夫人<sup>5</sup>式的女性，但更能干，更有智慧，也更漂亮迷人。我与她相处甚好。

很快我会去拜访布兰代斯<sup>6</sup>，在这里，他被视为圣人加绅士，和犹太人贝尔福伯爵差不多，但更为优秀。他不断催促其他人与我联系，想必又是菲利普斯·法兰克福特的主意。我的下一个目标是那些百万富翁。我必须迅速穿遍美国犹太丛林，熟悉他们的社会生活。哈伊姆会过来，但还没到。听说他和布兰代斯不和，不过我在让相互嫉妒的朋友维持友谊方面可是个老手。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一切都好，忙碌却心甘情愿。我搬出来是因为肖

- 
- 1 之前名为拉丽莎·丘玛科夫（生于1903年左右），俄罗斯血统，1922年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与斯蒂芬·罗福德·柴尔斯结婚。
  - 2 斯蒂芬·塞缪尔·怀斯（1874—1949），改革派拉比，社会改革家，犹太复国运动领袖；1925—1949年任美国犹太代表大会主席。
  - 3 路易斯·利普斯基（1876—1963），波兰出生的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新闻记者，作家；1922—1930年任犹太复国组织负责人。
  - 4 塔玛·德·索拉·普尔（1890—1981），1939—1943年任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大沙领袖，该组织成立于1912年，在募集资金方面力量强大。
  - 5 弗劳拉·所罗门（1895—1984），俄国百万富翁格里高利·贝纳森之女，嫁给英国军官哈罗德·所罗门，定居伦敦，曾在耶路撒冷短期居留（1920—1924），其间丈夫因车祸终身跛足；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和薇拉·魏茨曼的朋友。1931年贝纳森破产之后，她加入玛莎百货连锁店，制订了员工福利计划。
  - 6 路易·丹比兹·布兰代斯（1856—1941），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16—1939），极具影响力。

勒姆酒店就其提供的设施而言有点太贵了——我需要的是一套提供勤杂服务的公寓房间。现在我住在西55街70号的德文酒店，离上班的地方仅两步之遥。这里不仅花钱少还更自在。刚下了一场大雪，四周白茫茫一片，晶莹闪亮，就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从我办公的44层楼向窗外望去，整个纽约尽在眼底，景色真是美不胜收。<sup>1</sup>这里的政治舆论，即亲英情绪，自我来之后迅速蔓延。犹太事务局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夫<sup>2</sup>目前在这里，他从巴勒斯坦过来。据他说，德尔拜克将军<sup>3</sup>对在希腊执行任务的犹太空军非常赞赏。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阿伦森一家近来不太好，先是他自己，然后是他太太，接着是孩子，轮流患上了流感，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只有小阿迪尔·阿伦森还有些发烧。范妮很可怜。他们已经坚强地放弃了希望，不以任何方式代表父亲开办什么企业。我已经成功地让他意识到，目前真正需要关注的事是落实A.R.P.<sup>4</sup>。至于生意，可以等战争结束以后。这个观点他已经接受。如果妈妈有空给范妮写信，她一定很高兴。目前她需要有人提供一些温情暖意。他们似乎很喜欢我，并没有流露出要剥削我的意思。伯纳德·约瑟夫博士讲了个有意思的笑话。在特拉维夫的一次空袭警报中，发现一个犹太人未进防空洞，空袭警报哨赶紧催他进去。那个犹太人反问道“为什么我要进去？我又不是特拉维夫人，我是耶路撒冷人。”他说，如果巴勒斯坦遭到进攻，会走芬兰反法西斯的路子，而不是像法国维希城，拱手相让。我相信确实会如此。

360

哈利法克斯在此受到隆重欢迎。<sup>5</sup>从威尔基<sup>6</sup>那里传来的消息似乎不

1 第44层差不多在当时洛克菲勒中心大楼（洛克菲勒广场30号）的半中间位置，位于东面的第一和第二台阶之间。关于从英国情报处看到的景色在弗兰克·泰斯特尔思维特所撰《我们的战争，1938—1945》（剑桥，1997）中也有描述。见图31，32。

2 伯纳德（后改多夫）·约瑟夫（1899—1980），生于加拿大，律师、政治家和作家，1936—1945年任犹太事务局政治处法律顾问。

3 约翰·亨利·德尔拜克（1894—1963），1940—1941年在希腊任英国空军指挥官。

4 防空措施（Air-Raid Precautions）。

5 12月12日洛锡安勋爵去世后（他得了尿毒症，身为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他拒绝治疗），哈利法克斯勋爵于1月25日抵达，接替英国大使的职位。

6 罗斯福1940年11月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威尔基作为竞选失败者，致力于联合整个美国，支持向英国增加军事援助的政策。他还全力支持罗斯福的租借计划（下文第434页注2），反对孤立主义。其间，他正为支持借贷计划出访英国。

坏。总之，情况越来越好。我很快会再写信。

爱你们

沙耶

361 在纽约，以赛亚·伯林的第一个任务（很快便延伸开去）是争取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犹太人对英国的支持。他与美国的官方通信中，留存下来的最早信件是写给纽约州州长的。

致赫伯特·亨利·莱曼<sup>1</sup>

1941年2月5日

英国情报处

亲爱的莱曼州长：

请允许我随信附上我朋友阿瑟·古德哈特为我的事写给您的一封信。此信是一个多月前我离开牛津时他给我的。我毫无思想准备地置身于这个崭新的世界里，不用说，内心充满了疑虑和困惑。假如您允许我就目前面临的问题向您请教，我将不胜感激。我知道，比起给一个急需教诲的年轻人提供忠告，您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关注。因此，能否请您告知什么时候方便，让我把自己介绍给您，我将感谢不尽，当然，下星期的任何时间我都适合。给您添麻烦，非常抱歉。

您忠实的

以赛亚·伯林

---

1 赫伯特·亨利·莱曼阁下（1878—1963），银行家，1932—1942年任纽约州州长。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任总干事（1943—1946）；该组织于1943年11月成立，旨在为被解放的地区提供援助。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后，莱曼强烈要求美国成倍增加给德国犹太人的年移民数量。罗斯福总统表示支持，但移民法仍保持不变。

致赫伯特·亨利·莱曼

1941年2月27日 [打字稿]

英国情报处

亲爱的莱曼州长：

感谢您2月24日的回信，同时也感谢您随信附上的致各界知名人士的介绍信。这些人将对我的工作起到重要作用。我想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见面时我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进一步做些解释——我们的主要目的，不论是整个机构还是我所在的部门，均为替英国收集情报。因此，我们急于消除任何目前围绕这个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色的机构所流传的错误看法，真实充分地呈现它。与此同时，我们也十分注意，不直接进行任何支持同盟国的宣传，或施加压力。那么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令人不快，对待犹太人则更是如此。 362

在此谨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腾出那么多宝贵时间陪我，并就我们讨论的问题给予指导——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指导对我极具价值。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您忠实的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2月某日，可能为27日 [1941年]

纽约西55街70号，德文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一切均好，没有任何问题。见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度。生活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时尚一面，一切都靠人工提供——灯光、暖气、音乐、艺术、爱情，就像提供用水。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头脑单纯、不精世故、反应迟钝、没有教养，仿佛乡野农夫，粗鲁多疑，同时又多愁善感、慷慨大方。不过你们肯定想了解我的生活。我住的客房宽敞暖和，空气通畅。9: 30

起床穿衣，在屋里喝完咖啡后去上班，途中吃早餐。工作到中午，之后通常出于工作原因约见某人，共进午餐。犹太人的生活充满嫉妒猜疑，和他们打交道必须小心翼翼。前天我见到了莱曼州长，温和善良，让人感觉十分舒服。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小棕熊，坐在椅子上晃荡着两条腿。真诚、勇敢、慢条斯理、个性鲜明。我还见到了哈大沙领袖德·索拉·普尔夫夫人，为人极其和善，邀请我吃饭。这里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伦敦人。其中，在一家酒店里上来搭讪的伊斯特里克<sup>1</sup>似乎是个不错的人，精明伶俐，讲了不少有关他几个上司的趣事。我还参加了一个公开宴会，见到了吉尔德斯格姆<sup>2</sup>，伊斯特里克说他曾经在法庭上击败过他。此人倒是很平易近人，但不太友善。利伯曼<sup>3</sup>人挺好，托人向我问好，并希望能和他的朋友一道为同盟国做些事。我和他吃过一次午饭，觉得此人可以作为朋友。施内尔森拉比<sup>4</sup>希望通过他的女婿拉沙格与我取得联系，并向我致意。阿普特一家已经抵达这里。不急着去看他们。别担心他们会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剥削我。阿伦森找不到工作，情绪低落，每天听25个小时收音机。豪斯廷夫妇非常友好。前些天我还拜访了布兰代斯，印象极为深刻：典型的清教徒，信仰狂热，令人望而生畏。八十四岁的高龄，在宗教界人人对他肃然起敬，特别是受到谴责的犹太富人。他说话和长相都像是一位反对派<sup>5</sup>圣人。沃伯格家族的爱德华·沃

1 根据以赛亚·伯林在亚历山大和沙罗美·哈尔彭（下文第433页注2）传记中的记载，伊斯特里克是“一家犹太复国主义银行的总经理，当时名称为‘犹太区信托行’。30年代末，我认识了与伦敦犹太复国运动有关的伊斯特里克。他当时在纽约从事金融业”。

2 皮埃尔·吉尔德斯格姆（1903—1981），马卡比世界联盟（国际犹太人体育组织）主席。与四年一次的世界马卡比运动会关系紧密。世界马卡比运动会为犹太运动员参加的赛事，在形式上和标准上都与奥运会类似。

3 此处可能指亚历山大·利伯曼（1912—1999），雕塑家、画家、电影制作人、作家，后来（1962—1994年）成为所有“旅行者”杂志的总编，包括《时尚》杂志。他和母亲于1921年从俄罗斯移民到伦敦，之后又在巴黎待了几年，1941年来到纽约。这期间，他的父亲西蒙·利伯曼（见下文第595页注1）为柏林父母的朋友，和门德尔·伯林一样不定期地从事木材业。

4 优素福·伊恰克·施内尔森（1880—1950），伯林家的远亲，第六代犹太教仪式派（路巴维切）拉比，即犹太教哈西德派中恰巴德教派领袖。其长女恰娜嫁给拉夫·瑟玛利亚胡·格瑞里，简称“拉沙格”。仪式派拉比们的名字来自小镇路巴维切（在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之间），那里是恰巴德教派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领地。该教派观点独特，将人类对神知识和对圣典的学术尊重与早期哈西德派推崇的情感狂热的祷告方式和宗教戒守结合起来。

5 原文为希伯来语，指“反对”哈西德派，强调犹太人精心研读律法《塔木德经》的必要性，反对哈西德派的狂热情感表现。该词后来通常用来指重学术、重理性、重分析、反神秘主义的

伯格<sup>1</sup>是一位迷人、颓废的年轻人，整日陷于沉思默想，因作为犹太人的责任感备受折磨，自我做茧。迷茫的犹太富家子弟。言归正传，回到我的每日生活上。我工作到7点，吃饭，通常找人一块儿吃（仍是跟犹太社会名流一起）。有时吃完饭后继续工作。我的办公室漂亮安静，从44层望下去的景色美轮美奂，妙不可言。希望我此刻在伦敦。

沙耶

致门德尔·伯林

邮戳日期1941年3月5日 [残缺信的结尾]

英国情报处

收到史密斯的一封信，说新学院无论如何都不会再付给我任何额外薪酬，并让我将您目前住房的低租金<sup>2</sup>视为补偿。很好。他们说，如果这笔钱由您给我，我就不会再因为每年从您那里领取作为研究员补贴的300英镑而假惺惺感到羞愧了。我已经申请在这里上同样的课，柴尔斯也已写信给伦敦，推荐这门课程。希望1945年前能得到财政部或外交部或随便什么人的同意。一个名叫艾德尔鲍姆的宗教学犹太人讲师说他认识你，此人来自伦敦，目前正在这里设法延长出境签证<sup>3</sup>。这里的犹太人愚钝得很，一点都不比其他市民更了解欧洲，听起来确实奇怪，最最基本的常识都要用最最简单的语言一遍遍反复解释才行。我竭尽所能这么做了。我在哈大沙妇女协会里人气很旺，比在男性组织机构受欢迎得多。我和男人们相处是不错，但热情就谈不上了。战争一结束，我会心存感激、满怀宽慰地重新回到我的

364

立场。

- 1 爱德华·莫蒂默·莫里斯·\*沃伯格（1908—1992），收藏家、艺术活动赞助人，英格丽·沃伯格的美国堂兄，菲利克斯·沃伯格的儿子，也即英格丽父亲弗里茨的侄子。
- 2 从1940年末到1945年初，以赛亚·伯林在新学院“新大楼”朝东的房间一直由门德尔住着。只在生意需要或轮到 he 值勤任空袭警报哨时才去伦敦。玛丽只能住在荷里维尔大街（“新大楼”就在其南侧）一家赫尔夫人开的家庭旅馆里，不过利用新学院的厨房为两人做饭。门德尔因为在战争期间多年患胆囊炎，不得不严格按照规定控制饮食。
- 3 战争期间离开英国要求办理此许可。



个人生活中。目前的工作虽然很累,但也十分有趣。美国的食物,特别是弗雷德劝我吃的那些,比以往任何东西都更适合我的胃口。

奉上所有的爱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3月15日 [1941年]

华盛顿特区,

卡尔弗特街与康涅狄格大道交会处,

肖勒姆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我再次来到华盛顿。城里非常拥挤,恰逢一个新的美术馆开馆——梅隆<sup>1</sup>的遗赠(大部分艺术品来自冬宫)。这是一个规格很高的艺术活动,酒店全都客满。你们就我的生活问了许多问题,我无法一一记住,简单说吧,我从早到晚都排得满满的。不停地接电话,还要应付好奇的访客,要做的事堆积如山。早上9:30起床,喝完咖啡,穿衣上班。途中我会拐进一家杂货店,买些东西:一杯咖啡、一根法兰克福香肠或一个三明治,再加一杯咖啡,有时则喝些番茄汁。10:30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1点。然后吃午饭,通常是和同一座楼里的同事一起,下午2:30继续工作。我的秘书<sup>2</sup>终于弄明白我说的每个字。了不起的胜利。下午茶时分,会给我们这些有英国身份的人供应茶点。美国人不喝茶。我通常工作到7:30。然后吃饭,还是跟人一块儿吃,之后如果能够找到机会不失礼貌地脱身,就再回去办会儿公。

---

1 安德鲁·威廉·梅隆(1855—1937),美国律师、银行家、慈善家、艺术品收藏家,1920—1932年任美国财政部长,1932—1933年任驻英国美国大使。1930—1931年,他从位于列宁格勒的冬宫购买了21幅名画,由此引来对他奢侈铺张的批评之声;加上随后进行的税收调查,迫使他从财政部辞职。1937年,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捐赠了这批名画,成为今天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主要藏品。

2 这期间由一位艾丽丝·B.欧文夫人担任。

通常那里还会有三四个人，打字员和接待员都走了，大家愉快地交谈直至深夜。12:30前我会上床睡觉。我从伍尔沃斯百货店买了全套的炊具和餐具，这样必要时我就可以自己烧饭吃了。总之，这里任何食品都可以做成罐头，应有尽有，特别干净卫生。目前我尚无机会培养经济独立的能力。劳回来了，我可能会请他与我合租一套公寓，就是一个小套间。这样比住酒店来得便宜而且舒适，还有种种其他好处。我尚未见到他本人，因为他去加拿大看母亲了，但听别人说，此次非洲罗德西亚之行让他晒得很黑，看上去十分威武。我身体一直以来都超好，听说爸爸患上流感我很难过（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幸亏现在好了。可怜的穆利亚情绪非常低落，我希望他能尽快找到工作。目前他似乎是在靠资本生活。我来这里是与英国使馆商量：约翰·福斯特（告诉卡路瑟丝小姐<sup>1</sup>）对他们越来越重要，我正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把他从使馆挖出来，弄到英国新闻处来，我觉得他在这里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使馆显然拿他当宝贝，不肯放手。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善良的老先生，亚历山大·哈尔彭<sup>2</sup>（我想他1917年曾经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政府里任职），他是伦敦“贸易和农业劳工协会”<sup>3</sup>主席，到华盛顿来募集资金。我想，他一定是把美元交给英女王政府，英镑则留给英国的难民。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属于旧时代的人，高贵而有教养，是广大流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朋友，包括莫里斯·巴林、本肯多夫家族<sup>4</sup>和里德利家族。尽管他

366

- 
- 1 约翰·福斯特从前的家庭教师，福斯特父母离异后，是她将其抚养成人，之后她一直住在他家里，并终身得到他的照顾和赡养。
  - 2 亚历山大·亚科夫列维奇·哈尔彭（约1879—1956），圣彼得堡人，律师，1917—1918年任临时政府书记助理，之后移民伦敦。战争期间，他在纽约加入左翼俄罗斯移民圈子，在那里为“（俄罗斯犹太人）贸易和农业劳工协会”（见下注）做了大量工作。他以认真的工作态度为掩护，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英国特工，也就是说，在写这封信期间，他负责监听波士顿一家独立短波电台的各种外语广播。他的妻子沙罗美（1888—1982）是革命前圣彼得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文艺圈内人。见以赛亚·伯林的《亚历山大与沙罗美·哈尔彭》，刊于米哈伊尔·帕尔霍莫夫斯基主编的《海外俄罗斯文化中的犹太人：论文集、刊物、传记和杂文》，卷1，1919—1939》（耶路撒冷，1992）一书。目前只在这个俄文集里出版了俄文翻译。
  - 3 原文ORT为该组织俄文名称“Obshchestvo remeslennogo i zemledel' cheskogo”的缩写。“（俄罗斯犹太人）贸易和农业劳工协会”，后更名为“劳工传播协会”。
  - 4 杰斯帕·里德利的母亲娜塔丽（1887—1968）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本肯多夫伯爵（1849—1917）的女儿，1903年起任俄罗斯驻伦敦大使，一直到去世。本肯多夫家族为侍从世家，长期服侍沙皇。娜塔丽的丈夫为老杰斯帕·里德利（1887—1951，1946年封爵士）；其女凯

有点势利，也不无浅薄，但仍然不失为一位完好保留了旧时代优雅气息的高雅之士，精雕细琢，在纽约的沙漠里就好比一块绿洲。他不久就要回英国，现在正归心似箭。亲英的情绪在这里高涨无边，只要选择这个话题，任何人——甚至包括你们——即便口才再怎么不好，也能够稳操胜券。一提起英国，提起丘吉尔，提起伦敦，马上就会欢声雷动，群情沸腾。想想德国人在这块土地上花了多少金钱和精力<sup>1</sup>，看来收效甚微。真正的考验体现在美国对盟国的《借贷法案》<sup>2</sup>是否通过。当时，整个内阁、使馆、我们大家，以及所有正直明智的人，说实话都感觉到有点紧张。反对之声那么嚣张，似乎充斥了报纸广播，随后惠勒<sup>3</sup>（此人真是个好蛋）在参议院做了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萨松家族与沃伯格家族<sup>4</sup>”的讲话，把那个话题也扯了进来（普鲁斯特在某个场合是这么称呼的），借机大做文章。没成想，到头来罗斯福以绝对多数票大获全胜，英国举国上下顿时如释重负，庆祝，欢呼，其乐融融。回到我的个人生活。哈伊姆下星期会来这里，我肯定他的到来会令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我现在十分注意形象，作为英女王政府的代表，我将自己视为官方代表，循规蹈矩，而这些换作其他时候我是绝对不会恭维的，就连假惺惺都不会。我的头发经常修剪，西装熨得笔挺，皮鞋在街角热情的黑人手下被擦得锃亮。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夜晚都是在独特另类的犹太记者群中度过的。他们头发纷乱，举止仿佛是意第绪剧场里的二流演员，身穿绿色的家常宽松吸烟衫，或者是红色的和服，或二者混穿。但这些人确实精力充沛，浑身洋溢着一种生动风趣、尖锐敏捷，同时又朴实无华的过人智慧，这些在欧洲已基本消亡。和[雅各布·]玛沙

---

瑟琳嫁给基尼尔·兰帕特。

- 1 参见上文第388页注1。
- 2 所谓借贷或租借，是指美国帮助盟国的一种方式，向盟国出租他们无力用现金支付的战争装备和物资。罗斯福于1940年提出借贷政策，1941年《借贷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允许还贷方式可以是“资金、财产，或任何其他总统认可的直接或间接的福利方式”。
- 3 伯顿·肯多尔·惠勒（1882—1975），1923—1947年任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分别于1935—1940，1943—1946年间任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早先支持罗斯福，后转为孤立主义领袖，强烈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卷入战争，并且公开批评借贷政策。
- 4 一个富裕并有影响的犹太商人家族，遍布于印度、中国和英国。该家族许多成员同时也是慈善家和研究希伯来文化的学者。

克吃了一顿午饭，他对离开英国不太开心。可他的工作非常明确具体，负责在大学生当中进行亲英宣传，这个工作很有必要。这里有一个学生班级，情况就像在一战前的俄罗斯或在德国，立场比较偏向孤立主义，既精明又愚蠢。我很高兴自己不用教这个班级。他们怀疑公众舆论，在事实面前却表现得天真幼稚，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完全拧了。和牛津相比，哈佛简直就是沙漠。但我喜欢这里一些年轻美国人的蓬勃活力，他们不知疲倦，对生活充满热爱，还有他们巨大的胃口和孩子般的任性。尤其是那些有南欧血统的年轻人，都是头脑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情感强烈、慷慨大方、充满生气。这样一群年轻人，只要他们肯让自己接受我们半球高雅品位的哪怕一点点熏陶和影响，而不是成天只会一股劲地喊叫，重复了再重复，把别人全当作傻瓜和聋子，一个崭新的世界将完全有望建立起来。

367

前些天我见到了布罗尼斯洛·胡伯曼<sup>1</sup>——之前告诉过你们了吗？非常特别的好人，唯一的麻烦是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看你还是看你身旁的人。此人情感丰富，经常有一些高尚的见解。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正在跟西弗<sup>2</sup>吃饭。西弗似乎是来这里推销商品的，也许销路不太好，看上去不太开心。当时他带着读法律的女儿，小姑娘来自布鲁克林区，一个低级庸俗的地方，头发染成白金色，指甲涂成紫色，一副见钱眼开的模样。再一次见到这位小提琴手，他正同阿瑟·罗里<sup>3</sup>吃午餐。罗里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谦虚的犹太复国主义官员。父亲是黎巴嫩人，母亲来自瑞士的库尔迪加，又是一对罗斯金式联姻夫妻。他属于老派的库尔兰区<sup>4</sup>犹太人，在南非赚了钱；她则是一位有教养的妇人，纤细温柔、多愁善感，可谓典型的传统白人女性，嫁给了一个可爱的北极熊。他们在南非居住了三四十年，但他还记得一些俄语。我猜想她肯定是一点不懂，不过希伯来语倒会一些，而且两人都

1 波兰小提琴家（1882—1947），十一岁起开始在全国巡回演出，公开反对纳粹对犹太音乐家的迫害，后成立巴勒斯坦交响乐团，聘请托斯卡尼尼为首任指挥；二战期间居住在美国。

2 伊斯雷尔·摩西·西弗（1899—1972），玛莎百货公司商人（该零售连锁店由其岳父创立）；慈善家、犹太复国主义者。

3 阿瑟·罗里（1903—1978），南非律师，1933—1948年任伦敦犹太事务所政治书记（其间一段时间由哈伊姆·魏茨曼领导），二战期间为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积极分子。

4 北欧国家拉脱维亚的一个地区。

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和胡伯曼用俄语交谈了几句。他说他学过，俄文是他的一门外语。想不到吧<sup>1</sup>，他仍然是一位爱国的波兰人，说自己最精华、最完美的艺术经历是在里加获得的，比在彼得堡或莱比锡获得的都多。我发现自己用于听音乐和参加音乐会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们的老朋友伊斯特里克，就是那个最喜欢嚼舌头、飞短流长、搬弄朋友趣闻丑事的人，硬拽我去听霍洛维茨<sup>2</sup>的钢琴演奏会。因此你看，我现在是在一个“中立”的和平国度里，只要想起你们在英国黯淡沉闷的生活便无法忍受。我知道这种生活既不恐怖也不艰苦，但就是沉闷。随着每一位从英国返回的美国游客带回的故事，这里对英国的信心与日俱增。本雅明·科恩是维南特<sup>3</sup>那里的老师，同时也是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好朋友，我让他有机会去牛津时，一定给你们打电话，转达我的问候。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苟言笑，慢条斯理，但十分能干，身材魁梧，目前还是单身。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我发现有一封给你们的信一直没写完，被我的秘书从一堆纸中间找出来（我还是不够整洁），因此我才说是写了一封信，但没寄出去。

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致门德尔·伯林

1941年4月9日 [明信片]

英国情报处

我认为丘吉尔先生郑重庄严 [的] 讲话<sup>4</sup>会令美国人加倍努力。如今他

1 伯林此处原文为：figurez vous。

2 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1903—1989），乌克兰出生的钢琴艺术家（娶托斯卡尼尼的女儿旺达为妻）。几年之后，于1940年重新开始在美国举办钢琴演奏会。

3 约翰·吉尔伯特·维南特（1889—1947），教师、自由共和党政治家，1935—1940年任瑞士国际劳工组织助理干事，1941—1946年任驻伦敦美国大使。后自杀。

4 在他2月9日主要面对美国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强调了英国急需“大量和持续的战争物资和各类技术装备”。这些根据《借贷法案》准备的物资，当时在国会中仍有争议。在讲话结尾，丘吉尔向罗斯福直接呼吁：“给我们工具，我们自然会把工作做好。”引自《温斯顿·S.丘吉尔演说全集》，卷6，第6350页。

们已经渡过了道德上的卢比孔河，不会再回头。我身体很好，虽然工作繁忙。常常工作到凌晨1点，但早上就睡得稍微迟点。我无法形容多么喜欢读你们的来信。一定要继续来信。哈伊姆和菲利克斯两人虽然不和，但对我都很好。生活很有趣，只可惜与你们相隔太远。

沙耶

能否让布莱克韦尔书店给我寄六本我自己写的那本书？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28日 [1941年4月]

英国情报处

我亲爱的父母亲：

最近去信少完全是因为工作中需要写太多东西，过于劳累和精力分散，使我无法坐下来好好写一封信。但我身体仍然很棒。没有感冒也没有头疼。据我所知，我和大家的关系，不论是长辈、晚辈或是朋友，都十分融洽。哈伊姆和菲利克斯两人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在他们俩不愿直接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偶尔也扮演缓冲器的角色。这两位都是杰出伟大的好人，但各自都因为所处的显要地位，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不愿意向对方让步。前些天我见到了路易斯·金斯伯格<sup>1</sup>，犹太神学院<sup>2</sup>一位很可爱的教授，他出生于科夫诺市，《塔木德经》专家，写过一部很好的有关犹太人传说的书。此人学问非常精深，是一位饱学之士，但风度儒雅，谦逊温和。这位快乐的老先生，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乐在其中，甚至对自己那位可怕太太<sup>3</sup>的坏

1 路易斯·金斯伯格（1873—1953），杰出的犹太学者，生于立陶宛的科夫诺市（即当今的考那斯市）；1899年移民美国，1900—1903年任《犹太百科全书》中希伯来语部分编辑（纽约/伦敦，1901—1906）；后半生在美国犹太神学院（见下注）任《塔木德经》教师；保守犹太教的杰出人物，致力于将民族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相结合。他的主要著作《犹太人的传说》于1909—1938年间以六卷本陆续出版。

2 美国犹太神学院1886年成立于纽约，旨在保存历史上犹太教的相关知识和习俗。

3 阿戴尔·金斯伯格（1886—1980），婚前姓卡岑斯坦因，1908年在路易斯·金斯伯格去柏林途中

品质都视而不见。还有沙尔曼·肖肯<sup>1</sup>，耶路撒冷大学校长、出版商，一位真正有教养的人，喜欢诗歌，我和他相当投缘。在华盛顿，我见到了各界名流政要，都很有趣，一两个小时的匆匆见面便会在心里留下他们的身影，这些人物使历史事件回忆起来平添了许多生动色彩。读报纸时，这些人的笑貌会跃然眼前，声音在耳畔回响。美国是一块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有趣国土。总统英明地治理着这个国家，正一步步使它走向文明。今天它还是童子军，明天就会成为护卫队。他能够准确判断公众情绪，从不会在阴谋诡计面前上当受骗。民意调查表明，目前已有23%左右的民众支持美国全面参战，如果英国离不开美国的话——这在三个月前根本无法想象。只要他在任，我们就不必担心。我还同劳特帕齐特夫人<sup>2</sup>，那位剑桥法律教授<sup>3</sup>的太太一起吃了午饭，她撤离英国来到这里。真是一位非常可爱、巴勒斯坦味十足的女性，希望人将她牢记在心。我准备离开德文酒店再搬回肖勒姆酒店，就在对面，同一条街上，不仅是因为劳在那里，还因为那里上上下下更友好热情。我一搬过去就通知你们。约翰·福斯特很好，在这里特受欢迎。他在牛津的阿姨<sup>4</sup>似乎对他准备从纽约移居华盛顿坐立不安，大惊小怪地给他发了好几封电报，把他弄得烦死了。看来这个阿姨非常关心他，但言行实在有点轻率。希望你们写信给美国大使馆的本·科恩，告诉他下次若有机会到牛津甚至伦敦，希望能去看他。他说话不多，不苟言笑，身材魁梧，是一位善良好心的出色人才。他虽然不善交谈，但和他待上一小会儿会让人很愉快。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他是菲利克斯的好朋友。我尚未写信给胡拉尼或比利，但这周会写。目前只有戴维·塞西尔和玛丽·费希尔来过信。我对他们的思念与日俱增。鲍拉先生可能生气了，因为我在9月份曾对他的来信发牢骚。我

与其订婚。这一消息使金斯伯格的红颜知己亨丽埃塔·索尔德（1860—1945）大为惊愕。索尔德是他大部分著作的翻译者，也是犹太神学院的第一位女生。她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生活，并最终于1912年成立了哈大沙妇女组织。

- 1 沙尔曼·肖肯（1877—1959），波兰出生的商人、出版商、艺术家、书籍收藏家，犹太复国运动积极分子，在柏林、特拉维夫和纽约成立出版社；1934年从柏林移居耶路撒冷，1940年移民美国；1934—1945年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
- 2 拉切尔·劳特帕齐特，婚前姓斯坦伯格。
- 3 赫施·劳特帕齐特（1897—1960），1938—1955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
- 4 卡路瑟丝小姐（上文第433页注1），只是称呼上的阿姨，并非真正的亲戚。

已经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他。听说斯蒂芬·斯彭德又结婚了<sup>1</sup>。我和表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阿普特夫妇]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也不太远。只要不过于信赖他,此人倒没什么害处。塞缪尔[·阿伦森]有一个月没见到了。我非常忙,但很好,很快乐。

听说阿瑟·古德哈特准备到这里来看看。我会争取去见他一面。像他这样的人来得越多越好。

尚未见到A.索尔特先生,但他绝对干得十分出色。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1年5月17日

纽约西55街33号,  
英国新闻处

我亲爱的父母亲:

此刻究竟该给你们写些什么东西好呢?我的生活模式你们已经很清楚。每天的工作时间为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下午2:30到7点,晚上10点到12点。你们的前一封来信很有意思,让我十分开心,特别是那些八卦新闻。立特文小姐(斯彭德新娶的太太)至少有一半的犹太血统,这是鲍拉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的。他还说,为什么斯彭德这么热衷于结婚?关于这场战争,鲍拉引用了[一位]剑桥教授夫人说的话,可谓精彩至极。这位夫人名叫弗雷德贡德·肖夫<sup>2</sup>,是玛丽·费希尔的亲戚。她是这么说的,“这场战争揭露了所有外国人的本来面目”。

1 妻子是娜塔莎·立特文(1919年生),钢琴家、讲师、园艺家及作家。

2 弗雷德贡德·肖夫(1899—1949),诗人,玛丽·费希尔的大表妹,著名法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和佛罗伦斯·梅特兰(H.A.L.费希尔的姐姐)的女儿,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侄女,他曾为她写的部分诗谱上曲子。她的丈夫杰拉德·弗兰克·肖夫(1887—1947)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及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



魏茨曼夫妇对我非常好，偶尔单独邀请我一人与他们共进晚餐——这份荣幸当地不知多少人求之不得，然后带他夫人去电影院。走遍美国和加拿大把他累坏了，但他依然活力十足。他在电话里和某个我不认识的人交谈的情景非常滑稽。他一边甜蜜地微笑着，一边说：“您好海涅曼先生，是啊，我们一定很快会见面的，见到您一定很高兴，我们一定好好安排……”然后在对方说话的时候转过脸对着我，小声却清晰地说“钱”，然后又转过去对着电话道：“和您见面一定很愉快，您的女儿好吗？”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问他：“这人有钱吗？”魏茨曼就会回答：“太有钱了。是个糟糕的家伙，但绝对有钱。”两天前，我去了耶鲁大学，同一些很有学识但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学生进行了交谈，几番交锋后，他们突然才思枯竭、理屈词穷，开始一遍遍对我喊共产主义口号。明天我要去普林斯顿大学看望老朋友伊莱亚斯·洛厄，他是那儿的古文书学教授。<sup>1</sup>他答应带我去见爱因斯坦。<sup>2</sup>

得知本·科恩经常去看你们，我非常高兴。介绍我认识他的艾尔索普（也可能是菲利克斯？）是《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他是总统的表兄弟，一个狂热的亲英派，聪慧、年轻、势利，还有点虚荣爱炫耀。他是我在华盛顿的固定主人。今天我同[阿瑟·]古德哈特与威尔弗雷德·格林一道吃了午饭。格林对英国大使馆随意应付他的简慢态度很是生气。约翰·福斯特单独会见了美国人。他抱怨说，其他人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弄糟了整个行程。他还说，上诉院保管案卷的法官是个重要人物，如果使馆没有认识到这点，应该有人向他们说明，诸如此类。为了安慰他，我带了两位脾气超好的同事请他吃饭，甜言蜜语，哄他高兴，并聊了些有关全灵学院的话题。希望他回去时心情能平静一点。他与众多国会议员的会谈大获成功，事实上是自洛锡安勋爵去世后最成功的一次。他抨击英国官员的方式让美国人感到很兴奋，这么做我觉得反而间接起到了有利于英国的良好效果。本周我要去朝拜凯恩斯和索尔特。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一天工作

1 伊莱亚斯·艾弗里·洛厄(1879—1969)，美国古文书学家，1913—1948年任牛津大学古文书学讲师和高级讲师，1936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古文书学教授。

2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相对论发现者、犹太复国主义者，1933年起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成员，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2小时，脸色好，觉也睡得好，什么也不想。

爱你们的  
沙耶

以赛亚·伯林的家书有选择地记载了他在纽约的生活，字里行间透露出孤独之感。后来他回忆道：

我在纽约很不开心。经常独自站在洛克菲勒大楼的第44层，俯视下面的大街，几次都有某种企图自杀的冲动。这些如小蚂蚁般挪动的人流，多一个少一个 372 一个不会有任何区别。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数字，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毫无个性可言。在华盛顿则感觉完全不同。

此外，由于注意到父母对他的身体健康特别敏感，伯林总是小心掩盖这方面的任何问题。玛丽和门德尔一直到好几个月后才得知伯林曾经住过院。下面这封信就是在他康复期间写的。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日7月31日 [1941年]

佛蒙特州，南伦敦德里

我亲爱的父母亲：

这么久没给你们写信，我内心充满自责。无法形容目前的处境是多么不利于写信。每天尽是阅读和口授各类信件、文件，找人谈话，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完全写不了什么东西，最多只能是几行问候。不过你们说得对。一是情况不至于那么严重；二是随便写几个字也比什么都不写要好，哪怕是明信片呢，也胜过杳无音讯。我会改的。而且我会找出约翰·福斯特快速

1 1941年的7月31日实为星期四。

投递技巧的秘密。你们说想知道我生活的详细状况、个人交往等等。我每天的生活想必你们已经了解，早上10点钟起床，夜里12点或1点上床睡觉。10:30到办公室，阅读信件，打无数个电话，到1点左右。然后吃午饭，自己吃，大约半小时左右，或者跟“客户”或同事吃，2:30或2:45回到办公室。继续采访、阅读文件，参加数不清的会议。我的工作范围已经扩大到相当规模。雷蒙·格拉姆·斯温<sup>1</sup>把我当成中东问题专家（胡拉尼听了或许会很不高兴），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因为我和他唯一的一次长谈，话题就集中在伊拉克暴乱。<sup>2</sup>而且，在他谈得兴起、对英国的前景颇为悲观的时候，是我——办公室里唯一一个对中东局势还算有一点点了解的人——给了他信心，为他消除了顾虑。因为英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出色，他对我的看法也大为提升。总共我们只见过一两次面，他是一位十分可爱的人，真诚严肃，情操高尚，脚踏实地，迫不及待地希望帮助所有正义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方面，美国记者和电台广播评论员中的那批好人（最坏的那些则坏得无法想象，报道失真，危言耸听，尽写些低级粗俗、耸人听闻的玩意儿）拥有强烈的道德信仰，并公开表露出来。斯温、莫瑞尔<sup>3</sup>、多萝西·汤普森<sup>4</sup>

---

1 雷蒙·格拉姆·斯温（1887—1968），1924—1934年任《费城公告报》和《纽约晚报》伦敦记者，电台评论员；1935—1945年任职BBC，是当时有影响的（反纳粹）电台评论员；1936—1945、1942—1948年分别任职于美国相互广播公司和ABC广播公司。娶女权主义者贝蒂·格拉姆为妻，并采用了她的名字。

2 1930年伊拉克从英国获得独立后，英国仍保留其前往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部队在伊拉克的中转权。同时伊拉克有义务在战争期间为英国提供援助，对英国开放，并保护从伊拉克北部油田通往地中海以色列港市海法的石油管道不受破坏。军队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对两个皇家空军基地继续留在伊拉克的敌视情绪，与现在巴格达的耶路撒冷前宗教领袖大穆夫提强烈的反英、反犹太热忱结合起来，促使亲德、意、日轴心国的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盖拉尼于1941年4月废黜了四岁的国王及其叔叔摄政王。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英国紧急调配军队和空中力量保护伊拉克的英国基地，并且赶在轴心国援兵抵达伊拉克之前，平息了暴乱，恢复了原来的政权。

3 埃德加·安塞尔·莫瑞尔（1892—1977），曾获普利策奖的外国记者。任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激烈反对纳粹（后来同样激烈地反对共产党）。因为所写报道，他被德国、意大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驱逐出境；据传，戈培尔曾扬言要派专门的兵力抓捕莫瑞尔。美国加入战争后，他成为美国经济概况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为阿奇博尔德·麦克什。

4 多萝西·汤普森（1894—1961），作家、记者和电台广播员，公开表示反对纳粹；嫁给辛克莱·刘易斯。

(她参加了查尔斯的逾越节家宴<sup>1</sup>，是一个精力充沛、身心健旺的女人。她跟人说话就像是在集会上作报告，态度暴烈地反复灌输她的信条，其余人则一言不发，哈欠连天，就连多少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派的查尔斯，也发现她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剩下的时间就以一种类似对话的形式被他们俩平分了。我们几个则干坐在一旁，根据脾性不同，要么被催眠一般，要么不知所措)，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都是慷慨激昂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把自己视为献身正义事业的人，不是超然物外、事不关己的评论员，而是指引美国人民的宣道者和预言家。总统也持同样看法，他向这些人咨询，将他们称作道义和政治上的盟友，有时还促使他们说出不本人不能说的话。这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在英国的任何同行。或许贾文在其鼎盛时期也曾产生过相类似的影响，J.A.斯彭德也是。但我对此怀有疑问。晚饭后我经常继续工作，从9点一直到子夜。因为这个时间四周很安静，没有电话铃声，可以不受打扰地看书写东西。我的同事也常常这么做。到了夜半时分，大家会聚在一起聊聊天，从天下大事到小道消息，无所不谈。12:30各自散去。

我目前的工作除了犹太事务，还包括工会和其他特殊团体。<sup>2</sup>他们为我配备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助理<sup>3</sup>，与一个叫唐纳德·霍尔<sup>4</sup>的共同负责新闻处的一个部门，两人合作融洽。他性格随和，敏感聪慧，小说写得超烂，交往的也全是些蹩脚的小说作家。不过他是一个温柔并富有同情心的好人。总之，我喜欢与他共事。

374

你们问起我和上司们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关系极佳。你们在报纸上一定也都读到了，最近发生了太多的变动。G.坎贝尔爵士如今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不在的时候就由约翰·福斯特从华盛顿过来代理)。但所有这些变动、拉帮结派、官僚们之间明争暗斗，以及各类人事变迁，都一概触及

---

1 哈伊姆·魏茨曼有时被称作查尔斯。逾越节家宴是犹太教庆祝逾越节的方式，在犹太年中非常重要。

2 特指摩门教、罗马天主教和黑人组织。

3 J.阿兰·贾德森，后成为华盛顿的以赛亚·伯林班子中的研究员。

4 唐纳德·约翰·霍尔(1903年生)，旅行作家、小说家，1941年任驻纽约英国情报处主任助理，1945年任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

不到我。在最近一次周期性的内部动荡中（平均一年要发生一次——作为总体安定和谐的嘉奖），我可能得到提拔，在新的位置上，我可与相对于新闻处的G.坎贝尔勋爵办公室直接联系，新闻处目前是他负责协调的机构之一。但这一切既不会改变我的工作性质（非常有趣），也不会影响我的住所（我会继续住在纽约），更不会改变我的工资（还是900英镑加自筹的300英镑）。所以我并不太关心究竟此事能否变为现实。艾尔索普以美国官员的身份<sup>1</sup>被选派到印度，让我很是难过，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在纽约，虽然出于工作需要，我认识了许多身份显赫、也颇为风趣的重要人物，但还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犹太人的世界分成几个阵营。一个阵营由出身高贵但虽生犹死的人组成。这批人为德国后裔，无聊乏味，虽然仁慈和善，喜欢炫耀，但缺乏勇气，不愿付诸行动；虽然有钱却不够慷慨，要么像塞缪尔[·阿伦森]那样乏味得要死，要么就像艾尔坎·艾德勒<sup>2</sup>，生性乖僻。就连本威茨都对他们缺乏公共精神感到失望。莱曼州长在他们中间出类拔萃，勇敢、真诚、精力充沛、坦率正直。剩下的全都是面貌丑恶、木乃伊式的人物。

另外一个阵营充斥着生气勃勃的谋士。一些人很杰出，另一些则一般般。犹太复国主义者活力充沛，目标也很明确，可是内部勾心斗角太厉害，同时也缺乏吸引年轻人加入他们队伍的技巧。美国的犹太人共有500万，基本上由中低阶层人口组成，和捷克人差不多情况。他们在情感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我敢说至少有90%的人持赞成态度），但缺少领导，除非发生了与巴勒斯坦有关的公共事件或政策变更，促使他们为之兴奋或愤怒，平日里他们始终保持静止不动，只是在内心里往好处想，企盼一切顺利。很难让他们真正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他们在其间的义务，因为他们最害怕被人指责为战争贩子。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不愿考虑整个美国人的利益。如果将他们好好团结起来，加以正确引导，这些人会成为一支了不起的

---

1 约瑟夫·艾尔索普应征加入了美国海军。

2 艾尔坎·纳桑·艾德勒（1861—1946），英国律师、图书收藏家、作家，前大拉比赫尔曼·艾德勒的儿子。

力量。

再有就是各类犹太工会。几个领导人——希尔曼<sup>1</sup>、杜宾斯基<sup>2</sup>等人都很好，也很勇敢顽强，可就是不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把所有的赌注都投在罗斯福身上，万一他失败，或者民主党下台，他们的影响也会随之消失。

所有这些组织都非常支持英国，说起在巴勒斯坦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更多是带着悲切，而不是愤怒。倘若不是来自外界的力量让他们回忆起这一切，他们已经准备将其淡忘。魏茨曼说，这些人对英国的态度就像一种失恋的情绪。

和这些人一起工作很有意思。魏茨曼和他的追随者的关系完全就像帕内尔<sup>3</sup>及其追随者——这些人一方面对他满怀怨恨，恨他目中无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专横跋扈，高高在上，从头到脚透着一股傲慢劲儿，恨他在美国和英国统治者之间独特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自己离不开他。他们敬仰他，崇拜他，忍气吞下他所有的轻慢态度。他在美国各地发表了一系列精彩演说，基本上包括以下几个内容：(a)盟军的胜利是各地犹太人的唯一希望，其他所有问题则应先搁置一边，暂缓考虑。(b)即便英国获胜，欧洲犹太人的未来还是看不到光明，目前的现状无法改变。因此，要考虑其他方法和渠道。巴勒斯坦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希望。(c)抨击英国人有关巴勒斯坦的政策和绥靖主义等做法是愚蠢之举，尤其在目前状况下，简直无异于自杀。如今，英国代表着世界的良知。犹太人完全可以信任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

他有关(b)犹太人未来的演说激怒了德国难民，比如马科斯·沃伯格<sup>4</sup>，我和他一起吃过午餐，他是一位典型的霍亨索伦时代的犹太人<sup>5</sup>，无法

1 西德尼·希尔曼(1887—1946)，1914—1946年任美国服装与纺织业工人联合工会主席，罗斯福和新政强有力的支持者；1940—1942年任国防顾问委员会成员和生产管理办公室副总干事。

2 大卫·杜宾斯基(1892—1982)，1932—1966年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

3 见上文第264页注1。由于帕内尔在其追随者当中的巨大影响，有人称他为“爱尔兰的无冕之王”。他的事业因为1890年的离婚丑闻而葬送。

4 马科斯·\*沃伯格(1867—1946)，银行家，德国犹太人领袖，1938年移民美国；艾比、保罗、菲利克斯和弗里茨的兄弟，英格丽和爱德华的叔叔。

5 霍亨索伦皇帝统治时期，富裕的德国犹太居民享受到高度的社会安全感。这里指仍然保留着这种安全感的犹太人。

忘怀与德国皇家的亲密往来，他们都希望重新回到欧洲的舒适生活中去，将魏茨曼的悲观态度视为失败主义的危险论调。这里大部分的难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种族，在政治上都很盲目，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与他们所预想的相反情况往往会发生。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不可救药的鸵鸟。魏茨曼这样取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所有1.35亿美国居民都是乘坐着‘五月花’号客轮来到这个国家的，唯有犹太人除外。他们坐在‘诺曼底’和‘玛丽女王’号上拼命追赶，虽然快得多、大得多、装备好得多，却始终未能赶上，费多大劲也无济于事”。

回到我的个人生活。每三周左右我会到华盛顿出一趟差，每回总是在大使馆先办完正事，就去看全灵学院的同事，比如鲍勃·布兰德<sup>1</sup>，他现在是英国粮食外交使团团团长，还有索尔特、安东尼·兰博德（现在是安东尼爵士了），他是使馆里我的同辈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还有约翰·福斯特，偶尔还包括肯尼斯、柴尔斯、一两个工会领导、本·科恩，我想他应该不会返回英国，还有菲利克斯夫妇。再就是在美国政府办公室做事的各类年轻官员，也有一两个年长些的。这些人精力十足，充满理想，坚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而这在欧洲是难得一见的。过去我都是找约瑟夫·艾尔索普一起住；现在我则打游击，有时找过去的同事，约翰·斯帕洛上尉，他现在这里任我们军事外交使团成员；或者去兰博德<sup>2</sup>家；偶尔出于情感原因，我会住在艾尔索普的房子里，现在是一位使馆人员在租用。他名叫艾姆斯利，非常好客，硬留我和他一起住。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同来访的英国人交谈，他们全都异口同声，惊叹英国人士气如何高昂，和1月份我离开时一样；政府部门更加高效，各部门之间协调得也更好；还有就是对美国人参战态度的虚假印象。温特<sup>3</sup>说，英国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妇女都在日夜加班为英国军队

1 罗伯特·亨利·布兰德（1878—1963），商业银行家、历史学家，分别于1901—1932和1937—1963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1941—1944年任英国驻华盛顿粮食代表团团长；1944—1946年任英国皇家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1946年成为伊顿的布兰德勋爵一世。

2 安东尼·兰博德的妻子是菲丽西蒂·安（1917—1984），婚前姓贝里。

3 （弗兰克·）盖伊·阿瑟顿·温特（1910—1969），行政人员、历史学家、（后成为）记者；1928—

赶制背包行装，男人们则迫切渴望上战场。可是我得说，虽然这里亲英情绪高涨，他们所说的离真实状况还是有很大距离。不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我们这些驻美英国代表，前面都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不过你们肯定更喜欢听我多说一点我的个人生活，但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下次我会努力多说些。

爱你们的

以赛亚

377

致莉莲·夏皮罗<sup>1</sup>

[1941年8月初]

斯塔特勒酒店<sup>2</sup>，

但发自西55街33号，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夏皮罗夫人：

这么长时间没有去信，深表歉意。一回到纽约，就像进了桑拿浴室，整个人被一成不变的日常事务包裹起来，熬到凌晨才睡的昔日恶习重又拾起。目前我正深陷在曲折复杂的工党政治生活中，这对我而言既陌生又压抑——包括类似此次拜访“重要”人物的差旅。当年在你们家工作的快乐似乎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回忆。那时我真的非常快乐，不管你怎么看，我确实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讨厌，特别是在我康复期间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一点还请您原谅。同时我还要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不知道怎样才是最好的物质<sup>3</sup>表达形式。我打算买一本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传记，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成为我学识和道德方面的参照指南。但寻遍纽约，也没能找到，似乎只有一些翻译得很蹩脚的章节。我还在继续寻找，一有就给您寄

---

1931年就读于奥里尔学院，主修PPE专业，后到柏林大学进修；1932—1936年任国际联盟研究秘书；1937—1940年获利华休研究奖学金；1940—1946年任职印度政府国外事务部；《印度与民主》（伦敦，1941）的作者（与乔治·舒斯特合作）。

1 莉莲·米尔格兰姆·夏皮罗（约1903年生），儿科医生，梅耶·夏皮罗的妻子。

2 位于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一部分）。

3 伯林此处原文为：sachlich。



去。记忆最深的是户外野餐时玉米的喷香可口，还有就是厄尼斯特<sup>1</sup>在溪中岩石上玩耍的情景。向他和米利亚姆问好。渴望着和梅耶继续那天一早开始的讨论。很快我要去华盛顿待三个星期，9月会再与您联系。好羡慕梅耶天凉时穿的那件漂亮夹克。再一次表示感谢。

您的

以赛亚·伯林

内疚感纠缠着我。我是否应该留下点什么给你们那位善良的女佣？我很喜欢她。您替我作些补偿好吗？

378 尽管伯林的工作名义上包括保护黑人、天主教和摩门教等小团体的利益，他在纽约期间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还是犹太人和有组织的工会。犹太人的世界他当然十分熟悉，而且他在英国就已经与其中的几位领袖见过面。偶尔他会在对谁忠诚的问题上产生矛盾：一方面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作为英国官员他必须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总的来说，他努力做到对双方都保持忠诚。有组织的工会则不同：这是一个于他完全陌生的环境，他必须学会掌握其中政治方面的微妙之处，特别是不同工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关系。它们中有的同情英国，也有的因为长期对不论是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均抱反对态度，继续坚持孤立主义立场。

致玛丽·费希尔

1941年10月25日

纽约，肖勒姆酒店

亲爱的玛丽：

你保持沉默没有丝毫过错，因为我也一样。不过请相信我，在这里绝

---

1 厄尼斯特和米利亚姆均为夏皮罗的孩子。

对比在英国遭到狂轰滥炸的时刻更加无法写信。就连临时挤出写一封信起码需要的30分钟时间也做不到。一切都是人造的，由某种塑料制成，坚固耐用，却质量低劣，始终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我与大约两位年轻的美国新政派成员建立了适度的[原文如此]友谊，但这与欧洲平稳安定的背景格格不入，因为稳定与充满危险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很不真实。逢到去华盛顿，融入英国人中时，我会自艾自怜地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过马上便会谴责自己，不该沉迷于这种情绪，并重新回到我工作所处的纷乱嘈杂的世界中来。克里斯托弗因为身上具备英国人的种种习性，很有可能干得更为出色。我佩服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真心话。他们身上有用不完的精力，坚信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除恶扬善，扭转乾坤。能量大得惊人。他们(美国人)效率低下，脑袋糊涂，野蛮迟钝(但神经质)，缺乏深度。可从另一方面看，他们说话直截了当，虽然不乏原始直接的格杀搏斗，却充满了孩子般的幼稚天真，那种冷酷、粗野、生涩，无一不显露出惊人的稚气。民众中慷慨激昂的情绪，还有对高高在上但却软弱无能的老牌英国人的愤懑积怨，也全是以此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我目前常和工党打交道，见过几位杰出的英国工会领袖，都是些久经沙场的约克郡暴徒，目光炯炯、穷凶极恶，但我与他们相处甚好，真是不可思议。今天有一些从英国劳工部来的公务员参加眼下在此举办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相比之下，我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更显得出类拔萃。我们那些人长得一副怪模样，枯燥无聊，比起清爽干净、始终面带笑容、热情欢迎的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广场上的盛大奇观，比起那些剪着短发、清洁卫生、充满自信的人群，不知低了多少档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希腊和捷克的外交使团。(记得吗，有一次你父亲以为鲍拉先生要写一本关于捷克文学的书，因为读错了词，在祝贺他多才多艺的同时，说他题材显然太窄的事?)如果你见到莱福特，一定记得转达我的问候(他完全有理由心怀疑虑地接受)，还有尼布尔夫人的问候，她曾经是他的学生，过去叫凯泼·康普顿<sup>1</sup>的小姐。她不论走到哪里都口不离牛津大学，但真正待在那里却又感觉不爽，这就是文明。罗伯特·霍尔夫

379

1 厄休拉·凯泼—康普顿·尼布尔(1907—1997)，莱因赫尔德·尼布尔的妻子。

人<sup>1</sup>让人受不了。我上次见到她是在未婚妈妈义卖会<sup>2</sup>上。她在华盛顿工作，忸怩作态，傲慢无礼，举止粗俗，总是喜欢发表和别人意见相左的观点。她对拉姆齐·麦当劳一家忠心耿耿，弄得人家十分难堪。希姆<sup>3</sup>目前在哪里？土耳其吗？听说你的表妹也到了这里，科勒律治司令官夫人<sup>4</sup>和斯帕洛一样是驻华盛顿英国联合外交使团成员。她看上去和蔼可亲，但我太紧张，不敢靠近她，因为她是英国人，我不能用美国方式向她致意，只要不受到某些正宗英国因素的干扰，这种方式我现在已经做得相当熟练，真是不好意思。司令官很受欢迎，在众人心目中，他是一位好人，包括法兰克福特也这么认为。费希尔夫人穿着白色缎子拖地长裙，失神落魄地赶来，向我们诉说有关伍尔夫夫人死讯的点点滴滴。我迫切地想返回英国，这种心情难以言表，就像我在给史密斯那封臭名昭著的信中所述，还有给威克姆·莱格、宾尼<sup>5</sup>、休[·艾伦]爵士的信也一样。可见这份心情多么迫切。你不能设法通过外交部来这里吗？或者协助效率不高的BBC广播公司？或者以其他方式？换作是我，我会想方设法也要办到。对我而言，只要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安排妥当，一切也都能按部就班地完成好。而且你会在工作中发现，只要是在妇女群体当中，便存在巨大的可能性。和她们打交道的卡丽斯教授<sup>6</sup>，

380 还有一位名叫M.沃尔特斯小姐<sup>7</sup>的前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对此都深有体会——无知和势利达到极点，而你恰恰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我觉

1 劳拉·玛格丽特·霍尔，婚前姓林弗特，1932—1968年是罗伯特·洛厄·霍尔（1901—1988）的妻子。霍尔先生1926—1947年任三一学院经济学讲师，1939—1946年任职供应部，1942—1944年为驻华盛顿英国原材料外交使团成员，1969年成为罗伯特霍尔男爵。

2 这些活动由莱迪丝·费希尔每年在新学院举办，当年曾经是人们的笑柄（费希尔夫人在1918年成立了未婚妈妈及子女全国委员会，现改名为单亲家庭全国委员会）。

3 罗纳德·希姆于1941—1942年作为英国使馆新闻随员派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4 罗莎蒙德·科勒律治，玛丽·费希尔的堂妹，海军上将W.W.费希尔爵士（下文第506页注3）的女儿，理查德·科勒律治公爵（1905—1984）之妻，其夫后封为奥特里·圣玛丽的科勒律治男爵四世。她于5月加入驻华盛顿英国联合外交使团。

5 阿尔弗雷德·莫里斯·宾尼（1901—1986），1933—1944年任新学院工程学讲师。

6 威妮弗雷德·克拉拉·卡丽斯（1875—1956），生理学家，1941—1943年任纽约英国情报处妇女部主任。

7 玛乔丽·沃尔特斯（1915—1989），1938—1940年为萨默维尔学院研究生（1941年研究弗朗西斯·培根的博士），1941—1942年任职纽约英国情报处，1942—1945年任职伦敦英国情报部（美国司），1945—1949年任教育部负责人，1942年与帕特里克·林斯达爵士结婚。

得自己就像西比尔，为这封信深表歉意。真希望信中内容不是这么空洞无物。

沙耶

这封信恰恰证明在美国的确无法好好写信。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1年10月26日

纽约市，肖勒姆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不要责怪我。在这里写信真的很难。而且我确实连续寄了大约三张明信片。我的工作范围如今已扩大到工会和盟国相关事项，变得有意思多了。大家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在纽约待了两个半星期——早出晚归，和弗雷德·劳只能在早晚见个面，还是我要求的，让他别一整天没跟人说话便独自上床睡觉——然后在华盛顿住了五六天。由于那里的酒店太吵，我就好好利用了使馆人员的热情好客，到他们那借宿。这些人当中，有使馆二秘A.兰博德爵士、三秘艾瑟林顿·史密斯<sup>1</sup>、约翰·福斯特（他在这里依然得到高度赞誉，尽管听说哈利法克斯勋爵不太喜欢他，在英国的名声也一败涂地），还有柴尔斯夫妇，他们喜欢我的程度超过我喜欢他们。我的生活实在没什么可说的。我那个愚蠢的秘书欧文太太一直对我忠心耿耿，却不知怎么突然歇斯底里<sup>2</sup>发作，觉得我在她背后眨眼取笑她说的某句话并提出辞职。当然没有被批准，现在她变得像奴隶一般顺从。就连对我不规律的坏习惯也不再生气了。我发现在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些年轻的美国知识

1 （雷蒙德·）戈登·安东尼·艾瑟林顿—史密斯（1914年生），1940—1942年在华盛顿从事外交工作。

2 伯林此处原文为：crise de nerfs。

分子，他们曾经是菲利克斯的学生，一个叫格雷厄姆<sup>1</sup>，一个叫普里查德<sup>2</sup>，还有一个叫劳尔<sup>3</sup>。这几个年轻人都非常出色，思想开明，性格可爱，和我持同样观点。如今我已将他们视为老朋友。像女主人一样的艾尔索普先生到中国去了。本·科恩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这在他已经司空见惯。目前他正  
381 向政府提出辞职，并希望有人拉他一把，将他拔出困境。但是没有人准备这么做。大家都忙得要死，还有些人自己都不开心，哪还有心情去管别人。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很看不惯他这样放纵自己，沉沦于抑郁情绪不能自拔，对他很不客气。菲利克斯依然精力充沛，活动积极，有人写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口气很不友好，题目叫“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保守派”。<sup>4</sup>问问鲍拉先生想不想寄一份给他，如果需要，我可以寄，只是千万不要让法兰克福特夫妇知道。这是一篇文思巧妙、不怀好意的文章，作者过去曾做过他的学生，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sup>5</sup>，还是一位犹太人。犹太人仍然继续保持着这种谨小慎微和义愤填膺兼备的特点，这两种品质的结合是最不道义的。乌西斯金和布兰代斯的死讯令人悲痛。这两人都如岩石般坚定，充满自尊，是两颗不肯屈服的高傲灵魂。乌西斯金来自东欧，有权有势；布兰代斯则

1 菲利普·莱斯利·格雷厄姆（1915—1963），律师、记者、出版商，1941—1942年参与制订借贷计划，1942—1944和1944—1945年参加美国陆军航空兵团，1944年任职美国情报部，1946年起接替其岳父尤金·梅耶负责出版《华盛顿邮报》。患躁狂型抑郁症多年后自杀。

2 爱德华（“爱德”）·普里查德（“普里奇”，原文如此）（1915—1984），知名律师，1948年因在肯塔基波旁县将一只投票箱塞满而臭名远扬。该犯罪行为使他被捕入狱。

3 约瑟夫·路易斯·劳尔（1911—1992），律师，1939—1942年受聘于美国政府，1942—1945年加入美国陆军；后成为著名民权活动积极分子。

4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保守派》，作者为弗雷德·洛德尔（1907—1980），原姓洛德海姆，1939年起为耶鲁大学法律教授，1941年10月刊于《哈泼斯杂志》（第449—459页）；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之间学术观点长期存在分歧，法兰克福特属于哈佛派（自1939年他被任命担任最高法院法官以来，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便远不如他对司法约束的忠诚表现得那么明显了）。洛德尔的朋友、来自耶鲁大学的法官道格拉斯和布莱克经常就他的法律、政治和个人立场问题提出批评。洛德尔是一位专门抨击律师、法律制度和法律语言的批评家，以口气严厉无情而闻名。他尖锐犀利、反传统的立场在以下这句话中得到典型体现：“几乎所有法律文本都存在两个谬误：一个是文体，一个是内容。我认为这一现象差不多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见《再见，法律评论》，《弗吉尼亚法律评论》卷23（1936—1937），第1期（1936年11月），第38—45页，此话出自第38页。他尤其反对使用脚注，认为它是导致“思维零乱、文笔笨拙和判断错误”（同上，第41页）的罪魁祸首。

5 伯林此处原文为：ausgerechnet。

是波士顿的清教徒，滴酒不沾，对各种思潮都不感兴趣，极其单纯，只看重事实。全世界都敬仰和尊敬他们。菲利克斯的悼词有点过于充满维也纳情调，读悼词时很紧张，不太自然。我和法兰克福特夫妇的关系非常友好。玛丽安穿着白色丝绸裙子，来回穿行时优美的步态仿佛一位高贵典雅、同时又不乏神经质的女灶神维斯太<sup>1</sup>。哈大沙组织的普尔夫人邀请我去苏克棚<sup>2</sup>吃饭，并对艾德礼陆军少校<sup>3</sup>回复她邀请的粗暴态度很是不满。近期内我将邀请12位犹太编辑与杰拉德·坎贝尔爵士共进午餐，他是我的上司，一个不错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亚伦式<sup>4</sup>性格十足的小人物。因为哈利法克斯也不像摩西，我们的生活还算平静。米利亚姆·罗斯柴尔德给我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新年贺电，别告诉卡路瑟丝小姐，她讨厌她。哈利法克斯夫妇现在和我们相距遥远，哈利法克斯正在担任的总督职位，距离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遥远。哈利法克斯夫人在华盛顿地区颇受欢迎，而他则无人知晓，也没什么人喜欢。偶尔我会与他碰面，他还是那么英俊潇洒，但问题是他和公众之间似乎永远无法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正式说来，我的“顾客”包括英国各工会领袖，他们真正由男子汉中的精英组成，在素质上远远超过当地人。在这群人当中，搭建桥梁似乎容易得多。这里人人都在打听哈罗德·拉斯基的消息，认为他是一个极其重要又危险的人物。我发现很难让他们相信他不过是个没有害处的夸大狂。明天会同金斯伯格教授一起吃饭，他是这个土地上杰出的犹太学者，一个性格可爱、学识渊博、开心乐天的“利塔维克”<sup>5</sup>。他有一位来自菲尔特<sup>6</sup>的太太，大嗓门，但头脑聪慧，像白雪般晶莹

382

- 
- 1 在古代罗马，维斯太贞女是女灶神维斯太神殿圣火的保护神；她们行使的职责被视为对罗马帝国的安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2 一种临时搭盖的棚舍，用来庆祝犹太人的住棚节。该节日纪念从埃及放逐后犹太人四处流浪的生活。在住棚节期间的七天或更长时间内，庆祝节日的犹太人在苏克棚里进餐。
  - 3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后（1955年）封为艾德礼伯爵一世，工党政治活动家，一战期间英国陆军少校；1935—1940年任反对党领袖，1940—1942年任掌玺大臣，1942—1945年任英国副首相，1945—1951年任首相。
  - 4 在《圣经·旧约》中，亚伦是其兄摩西的喉舌，摩西为当时犹太民族的领导人。
  - 5 该词经常用来指立陶宛犹太人；有时带有学术和理性的隐含义，因为立陶宛曾经是学术中心。
  - 6 指巴伐利亚州的菲尔特。

剔透。星期三和《圣路易斯邮报》的主编<sup>1</sup>吃饭；星期四与韦伯斯特<sup>2</sup>吃饭，就是曾经在牛津被你们当作流浪乞丐的那位，还有托尼，我们新来的工会杰出人物；星期五要和两位美国广播电台评论员吃饭。你们看，我的生活真是够多姿多彩的。收到伊斯特里克的精彩来信，很高兴你们喜欢本威茨。我没有给戴维、玛丽、莫里斯·B.写信，因为写信需要有一种平和宁静的氛围，既不太疲倦，也没有什么事赶着要做。而美国的文明，至少在纽约，无法提供这样一种氛围。我一切都好，充满活力。睡得好，吃得好，按时剪头发，每天刮胡须，近期打算去照张相。弗雷德向你们问好，他老觉得他弟弟在说他坏话。

爱你们

沙耶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1年11月18日

底特律，布克—卡迪拉克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由政府举办的产业工会联合会<sup>3</sup>的工会大会正在这里召开，我是对此感兴趣的听众之一。美国工会界正处于原始粗糙却令人振奋的状态。我为自己处在一个能够记录下它所发生的种种大事的位置而兴奋不已。国际劳工

1 可能指奥利弗·科比·波瓦特（1872—1945），《圣路易斯邮报》的主编。

2 查尔斯·金斯利·韦伯斯特（1886—1961），1932—1953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历史教授，1939—1941年任职国外研究与出版处，1941—1942年任驻纽约英国情报处主任；1943—1946年在外交部研究处工作。

3 产业工会联合会（1938年起使用该名称），原先为美国劳工联盟的一部分，1936年起成为独立组织，并开始与美国劳工联盟竞争；该组织的最初目标是联合钢铁、汽车制造业、电力、橡胶、玻璃、纺织及类似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工人加入工会。

组织的卡特·古德里奇<sup>1</sup>告诉我说，在亚当斯的家里见到你们，外交部（和全灵学院）的罗杰·迈金斯<sup>2</sup>刚到美国来过，如果你们问起，他会告诉你们我的身体状况有多么好。我还见到了艾德礼，人很好，就是太害羞，缺乏热情。产业工会联合会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也见了，其中有几位身材高大威猛，可谓英国男子汉中标本式的人物。明天我会前往芝加哥，这个城市我去过——得找时间了解整个美国，而不只是纽约和华盛顿；之后回华盛顿。产业工会联合会今天上午通过了支持罗斯福外交政策的决议，真是激动人心。所有出生在德国，来自密尔沃基、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州的代表都购买了英国战争救济处的“翘大拇指”徽章，卖给他们徽章的是一位其貌不扬的犹太人，他后来带我去一家“可食”犹太餐馆就餐。这是一个疯狂愚蠢的世界。我得赶紧走了，去见一位英国领事<sup>3</sup>，他说很想认识我。我一切都特别好。你们说K.克拉克生活在罪恶当中！一定是指肯尼思·贝尔吧！诽谤！

你们的

沙耶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星期六11月29日 [1941年]

纽约市西55街33号，

肖勒姆酒店

我亲爱的父母亲：

还能跟你们说些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呢？你们强加给我严格的限制。我

1 卡特·古德里奇（1897—1971），1931—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41年任驻伦敦美国大使馆特别助理；1936—1946年任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政府管理机构成员，1939—1945年任主席。

2 罗杰·梅勒·迈金斯（1904—1996），后（1964年）封为南安普敦洛登—谢菲尔德的谢菲尔德男爵一世；1925—1939年为全灵学院研究员；1942年任外交部参赞，1945年任职于华盛顿英国使馆（1945年5月任公使），1953—1956年任大使。

3 西瑞尔·修伯特·凯恩（1891—1959），英国外交官，1939—1943年任驻底特律英国领事，1943—1945年任总领事。



未再收到你们的信。戴维·塞西尔现在信写得比你们勤得多，却“并不期待得到爱的回报”，这是斯宾诺沙解释知识分子对上帝的至爱<sup>1</sup>的话。最近我走了几个地方。先是到了底特律，这是一座丑陋的大城市，拥有一百多万人口，不像英国工业小镇那样其貌不扬却不乏温馨舒适之感。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大会正在那里召开，约翰·L.刘易斯<sup>2</sup>的缺席引起极大关注。那里到处弥漫着亲英情绪，而共产主义者们居然还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强迫外交使团的剩余成员转变态度，改持亲英立场，他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持该立场。那番景象十分滑稽可笑，卢梭称之为逼迫人们获得自由。<sup>3</sup>接着我去了芝加哥，这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密歇根湖畔的景色十分壮观，宽阔的堤岸，摩天大楼的设计充满想象力，给人一种辽阔、曲折的感觉，以及汉萨同盟城市的富裕之感。在它后面，便是连绵数英里的丑陋喧闹的贫民窟，那里满是有轨电车、高架铁路、公共汽车、小汽车，以及川流不息、按部就班的人流，还有混乱的电子信号灯一闪一灭，刺人眼目——和这个地狱般的所在相比，星期六的基尔本商业大街<sup>4</sup>简直就是安谧的世外桃源。但是这里的人们比起东海岸那里的人，更加简朴，也更加慷慨大方、朴实敦厚——就像战前，比如1890年的老莫斯科和当时的圣彼得堡。这里人们愚昧无知却热情好客，它离大西洋、离欧洲、离战争相距上千英里，人口主要由农民组成——捷克人、波兰人和爱尔兰农民，带着典型农民语言的粗俗、清新和多姿多彩。一夜过后，我又重新回到庄重、华贵、刻板的华盛顿。我得上床睡觉了。

爱你们的  
沙耶

1 伯林此处原文为：amor intellectualis Dei。

2 约翰·勒维林·刘易斯（1880—1969），工会领袖，1920—1960年任美国联合矿工工会主席，1936—1940年为产业工会联合会（最早为委员会）首任主席。早年为共和党员，曾经连续两个任期支持罗斯福，但在第三个任期内开始反对他的主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的外交政策过于干涉他国内政），并威胁说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他将辞去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职务。

3 见《社会契约论》（1762），卷1，第7章。

4 在伦敦西北部。

对不起，信纸有些破，现在是凌晨1点钟，找不到其他的。我的秘书欧文太太说，如果你们来，一定要和她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区（布鲁克林区等于伦敦的斯坦福德山。'就像犹太人说的“随我来”）。

以赛亚·伯林在美国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定期给父母发电报（通常每周一次），让他们放心，说他一切都好。对此他们基本上不愿相信。他极力想让他们相信的努力透着幽默和无可奈何。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用“健壮成长”这个词来说明他的状况，这也是以下这封电报的由来（信件检查官老是跟这个字过不去，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代码，从而常常导致电报延误）。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1年12月2日 [电报]

纽约

请提点建议，换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替代“健壮成长”=伯林

385

以赛亚·伯林对罗斯福总统的景仰并未蒙蔽他的双眼，他看清总统不愿将美国军队卷入欧洲战争。他后来回忆道：

罗斯福的意图是要在这场战争中不战而胜。[……]他的意图是为英国提供物资装备，但并不真正宣战，这样美国的年轻人就不会丢掉性命，[……]到头来，他就可以以中立国的地位，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个世界。<sup>2</sup>

1 这两个区都居住着众多的犹太人口。

2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伯林录音之20。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终于将美国卷入这场战争。至此，英国新闻处也完成了一个主要任务。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1年12月12日 [打字稿]

英国情报处

我亲爱的父母亲：

这封信充分展示了政府配备的荣耀。对多数收到我正式信函的人，这是我呈现自己的方式。我想，用这种方式给你们写一次信，也许会给你们带去一些小小的愉悦。真的很抱歉，最近给你们的信写得太少了，但我基本已经扔掉了用手写信的习惯，更喜欢口授的巨大享受。我现在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编写规范漂亮的官方文件，在这类信函中，浮夸的文字和拘谨生硬的公文文体，被我发挥到了极致。我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理由要重新回到自得安逸的个人生活中去。说实话，这几天发生的大事<sup>1</sup>把大家震得晕头转向，感觉仿佛是一叶小舟，被一艘飞速前进的摩托艇牵引着——一个事件紧接着一个事件地频频发生。但是就我的观察，这些事件并不像1939年发生在英国的类似事件，没有对普通纽约人的生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据说这同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的纽约情景极其相像。在俄罗斯和利比亚的胜利<sup>2</sup>大快人心，美国如今意志坚定，万众一心。总统在实施国内政策方面的天才真是无与伦比——他不仅聪慧开明，拥有极高的智商和情商，而且从不惧怕未来，在它来临时主动去驾驭它，这一点使他比起所有那些胆小、谨慎、持孤立主义态度的人，显得出类拔萃，拥有了极大优势。当然他们是看不惯他那种势不可挡的劲头的。丘吉尔在这里继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应

1 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开始入侵马来亚；12月10日，日军击沉了两艘英国船只，开始入侵菲律宾。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

2 11月18日，英国在利比亚展开攻势（十字军行动）。12月5至6日苏联发起声势浩大的反击行动，阻止并击退了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

该是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挪威发言者的发言引来了阵阵掌声。他说，不论挪威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至少因为受侵略<sup>1</sup>，成功地将丘吉尔先生推上首相宝座。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令人庆幸、也是最为重要的事件。

现在来说说我的个人情况。我同时收到了你们从10月中旬到11月底发来的六封信，也就是说航空信可能跟海运平信一样不牢靠。我对鲍恩用如此愚蠢的方式让你们对我所谓的病情表示担忧深感不安。他自己成天疑神疑鬼，担心得这个病那个病，对各类疾病和医院感兴趣，实际上什么都不懂，自然喜欢在谈话中说这类话题，就好比一位恶俗老朽的家庭旅馆的店主。替我把这些话转告给他。事实是，我确实患上了鼻窦炎，这事劳在7月底给你们电报中已经说了。和往常一样，就是普通感冒引起的。一感到不舒服，我就以一种你们认为我决不可能拥有的智慧，立刻前去医院就诊，并在那里的单人房里舒舒服服、没痛没痒地住了五天。很多人前来探病，还有机会看书，让我开心死了。这里的服务比起英国高效得多，有求必应。所有可以想象出来的技术都派上了用场：一个医生用电子射线扫描我的前额；另一位用纤细精巧的器具轻触我鼻孔，弄得我痒痒；第三位医生给我按摩；第四位则负责漱口。在如此这般闪电战术的包围下，我的身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很快恢复，转到佛蒙特州疗养，当时我在那里给你们写了信。然后就在华盛顿过了一段炎热但毫无痛苦的日子。此后，就再也觉得哪里痛或不舒服了。不过我发现，时不时地来一番无病呻吟，声称自己不舒服个一两天，对逃开我避之不及的某些人穷追不舍的关注，倒是很有用处。这套伎俩我通常在星期天使用，因为周末我确实常常会睡得特别晚才起床。不想见的人中包括极其不可爱的鲍恩夫人，她不停地追在我后面，任何借口也聊胜于无。对这一点，最近抵达的陆军中尉阿尔弗雷德·J·艾耶尔

387

---

1 盟军在阻止德国入侵挪威的战役中失败了，随后内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5月辞职，这些直接导致丘吉尔被任命为首相。

院长说，目前在西非的塞拉利昂<sup>1</sup>——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她能干什么？我实在想象不出。她不是能过寂寞生活的人。很抱歉，这句话与伯纳斯勋爵的小说《远离疯狂的战争》中别人让我说的话惊人的相似。这本书刚刚到达此地。我郁闷地注意到我成为书中一个人物的至少部分原型，此人叫耶利哥先生。<sup>2</sup>一定要读读这本书。戴维·塞西尔会告诉你们其他人物是谁。毕竟这本书是献给他的。

很高兴你们见到了格林勋爵。他是一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物，看待人类的观点深刻尖锐。格罗斯特的主教<sup>3</sup>是一个邪恶的老家伙，对任何话题都有惊世骇俗的见解。但是很遗憾，我和他个人关系非常好，尤其喜欢听他对教会和普通信徒中的同事一针见血的评论。你们关于里斯太太的看法得到艾耶尔的证实，他用鲍拉博士的口气，也认为她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保证不会把关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那篇文章寄给他，我同意你们的观点，他不会充分或以对社会完全无害的方式好好利用那篇文章。

我并不觉得孤独，不过偶尔出于礼貌会对人这么说。为了不使人觉得我过于玩世不恭。我的确思乡心切，每过十天就想着返回英国与你们团聚。但真的一点也不孤独。要做的工作很多，在这个如今令我着迷的国度里，各类活动需要占用的时间远远超过我所拥有的时间。我答应你们冬天不再乘飞机。希望以下两人会向你们转达我的问候。(a)彭布罗克学院的R.B.麦克卡卢姆教授，他途经美国去中国，但没去成，返回英国了。你们可以往彭布罗克学院给他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没时间让他跟你们联系；(b)另一个有可能与你们联系的是杰克·琼斯<sup>4</sup>，一个威尔士矿工兼小说家，我赞助

1 在经过军事训练后，汉普希尔作为炮兵部队的一员，被派往塞拉利昂，负责组织输送当地人入伍的新兵至缅甸。在那里，大量来自西非和东非的士兵组成英国军队的一支力量，试图阻止日本入侵（失败）并保卫通往印度的陆路（成功）。他于1942年初回到伦敦，在休·特雷弗-罗珀（1914—2003；1979年受封为格兰顿的达克勋爵）的鼓动下，加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也称军情六处。

2 至少可以说，伯纳斯小说（伦敦，1941）中的耶利哥先生明显是以以赛亚·伯林为原型的。

3 阿瑟·海德勒姆。

4 杰克·琼斯（1884—1970），威尔士工会领袖，代表英国新闻处访问美国。琼斯是英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但一段时间后作为奥斯瓦德·莫斯利新党成员，成为自由党的支持者。他写的小说《赴宴》于1938年出版。

他作为工会专家来此地演讲，获得巨大成功，效果胜过自贝尔福伯爵之后来访的任何一位英国人。他答应说给你们电话。一个很好的人，请他和戴维·塞西尔一起喝茶，他们俩会一见如故的。我想你们一定参加了在院长家举办的万灵节宴会吧，那可是牛津城北居民最盛大的社交活动。等我理了头发后会尽快照张相寄回去，到时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生活确实没发生什么变化。向戴维和玛丽问好。

388

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c)另外，我刚刚听说约翰·斯帕洛上校回国了。他一定会找时间回全灵学院。前不久我刚见到他。〉

以赛亚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1月2日 [打字稿]

英国情报处

我亲爱的父母亲：

看到这么正式的地址，希望你们没有产生反感。它无疑会使整封信带上浓浓的维多利亚气息。我天性中的懒惰使我更愿意口授而不愿意花哪怕一点点力气拿笔在纸上写东西。你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我的基本习性没有改变。

你们的来信不断给我莫大的快乐，让我为之兴奋不已，特别是那些家长里短和各种之前没听说过的趣闻轶事。伯林太太在格罗斯特主教耳边大声咆哮以及同格林勋爵侃侃而谈的情景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来，并为此忍俊不禁。收到玛丽·费希尔（为此请代我谢谢她）和理查德·佩尔斯的来信。我还遇见一个人，说是与你们25年前就认识，1908年左右失去了联系。他名叫德拉克，还说当年在世纪初的时候，曾经在华沙或是里加对现在的

伯林太太献过殷勤。我感觉他人不错，温柔多情，很有学者风度，对年轻时代的记忆念念不忘。他在纽约犹太人办的报纸《新闻晨报》<sup>1</sup>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激动万分，他好像是那里的编辑。我反复盘问，看他究竟对我们家了解多少，没想到他应答如流，想起了好多重要和不重要的细节，比如当年伯林太太的美貌，关于这点他曾经对我的一个助理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这个助理从前与他共过事。你们记得他吗？他对遇见我似乎感到特别高兴，同时又极其害羞，除非我找他出来，就再也没出现过。我是准备要这么做。你们还想听些什么内幕新闻？

鲍恩太太，就是那个嫁给伊恩·鲍恩的护士，想起来了吧，也就是传播谣言，说我身体欠佳，害你们凭空担心了这么久的罪魁祸首，在纽黑文过得快活得很，显然一点都不急于回到之前与鲍恩先生单调乏味的生活里去。总体而言，这一对穷困潦倒的夫妻对生活充满仇视情绪。本不该这么说什么人的，但他们的情况确实如此。

艾耶尔先生过得似乎也很快活。他太太如今人在英国，不愿意来美国和他团聚，并要求把当初带到美国的孩子送回去。这让他觉得既没面子又为难。因为要想在返回英国的人当中找到愿意在整个海上航行中负责照看几个从两岁到四岁孩子的人，实在不是件容易事。但是，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夫人）认为，艾耶尔太太绝对会想方设法找到这么个人的。她一点不想见弗雷迪，而他则恰恰相反，迫不及待想与她见面。我夹在两个人当中，只能扮演我时常扮演的大众朋友角色，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两不得罪，左右逢源。看来我的脾性并未改变。

毋庸置疑，美国宣战改变了一切。尽管大机构的惯性以一种半自动的方式带着我们继续运转，我们显然不可能再继续发挥和过去相同的作用。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就此解散，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策略，各种意见都有。但有一点很肯定，那就是在英国和美国公众舆论机构之间要保

---

1 《犹太新闻晨报》于1901年创办，是一份意第绪语报纸，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宣扬传统的犹太教价值观。以赛亚·伯林对犹太人的兴趣使他开始接触这家有影响的意第绪语报纸，并且为该报专门安排人将英国新闻处的材料翻译成意第绪语。

留某种联络，这就好比一对正处在蜜月中的新人，蜜月结束后，婚姻实实在在的各个方面才会真正呈现出来，不管双方如何体谅和理解对方，还是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摩擦和误解，只有周围的人才能帮助他们化解矛盾。谁也不知道这个观点能否得到上级的赏识，能的话又会以何种方式实行。

这期间，首相的来访<sup>1</sup>产生了神奇的效果。由于最初的战争冲击波和在远东遭受的惨败，美国正经历一段相对萧条的时期——1939年10月我们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这样一个时刻，丘吉尔的到来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效果难以形容。他身穿一贯的海军制服，抽着派头十足的雪茄，看上去仿佛是他本人在舞台上的化身。不论是在言语还是行动上，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要他一出现，他的周围便立刻充满生机和活力，并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你们也许已经听到他在国会的演讲，在内容和公众效果上都极具感染力。在加拿大的演讲也一样。总统和他显然颇为投缘，不论在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两人互相欣赏，志趣相投。两人都喜欢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生活，都喜欢使用自由奔放的表达方式，都具备敏锐的历史感。在充满戏剧色彩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敢说敢为，以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证明他们具有广阔的历史洞察力，并且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无数个舞台上大展宏图。在这样一个时代，当芸芸众生由于身在其中，大多对身边所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无法理解，或即便理解，也只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身边至少有两个人胸怀未来，时刻准备迎接狂风巨浪的冲击，坚信自己能驾驭时代潮流的人，真可谓万幸。我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兼收并蓄的胸怀，这种认为生活所带来的一切都能够被吸收、消化、为我所用的态度，鼓舞了世界各国和民主人士。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靠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他们的坚强意志和过人胆略，而这些只能来自他们洞察全局、把握时机、从容不迫面对各种猖獗势力的才能。很奇怪，

---

1 丘吉尔于1941年12月22日抵美，由参谋长们陪同，参加开战后的第一次大会——“阿卡迪亚会议”。12月26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19至31日访问加拿大，12月30日在加拿大议会做了题为“有人做懦夫，有人做英雄”的演讲，1942年1月14日乘飞机回国。有关内容见《温斯顿·S.丘吉尔演说全集：1897—1963》，罗伯特·罗兹·詹姆斯编（纽约，1974），卷6，第6544页（上文第397页注6）。



斯大林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或许同样强大，但整个给人一种乏味盲目的印象。

好好抒发了一通深刻思考之后，现在可以回到轻松一点的话题上来。恳求你们按要求支付所得税，可能还有新学院的膳宿费，应该不多，因为不包括租金，那部分钱说好是由未付给我的研究员津贴充抵的。我很好，健康、富足、繁忙、快乐、身兼数职、马不停蹄，和每个人都相处甚好，这是因为我们始终缺少野心，就连最激烈的内部竞争对我也没有丝毫刺激作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人一旦生来就是情感上的素食主义者，看到鲜血只会令他更加坚定信念，而不是动摇。好了，这些深刻道理<sup>1</sup>说够了。

爱你们的

391 以赛亚·伯林

致玛丽和门德尔·伯林

1942年2月14日 [打字稿]

英国情报处

我亲爱的爸、妈：

谢谢你们之前的两封来信，昨天又收到了第三封。在对更加有趣的话题展开讨论之前，先解决一些常规性的问题：

1. 我非常健康并继续保持着健康，这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
2. 款项问题。

(a) 你们能否与伦敦图书馆联系，不过也许不用，我好像记得很清楚，当时是说好了的，我在国外时停止付款。看来我得给银行寄一张通知，告知相关事项。

(b) 学院的膳宿费。我想你们得继续支付他们要求的款项，但我确实认为不说别的，他们至少会替我交了保险费。不过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

---

<sup>1</sup> 伯林此处原文为：pensées approfondies。

学院起什么纠纷,我想你们也一样,因此最好还是由他们去。好,关于绅士风度就此打住。我会以你们的名义找一位律师,尽快与你们联系。总的来说,请把所有的账单按照你们觉得合适的方式处理。另外,请跟布莱克韦尔书店说一声,让他们给我寄罗汉·巴特勒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起源<sup>1</sup>的那本书,还有伯纳斯的著作以及其他你们认为适合我阅读的书籍,另外再寄六本我自己写的书。你们建议我在美国再版这本书,我觉得目前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为时尚早。还是让我们保持耐心,等将来<sup>2</sup>再好好出一本众口称道的修订本,“增补了新的内容”,如同犹太人的祷告书<sup>3</sup>常说的。

请代我向[莱迪丝·]费希尔夫人表示感谢,她的来信真让人高兴。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一个字<sup>4</sup>都还没空看,这点你们没必要告诉她。等哪一天工作清闲,又没什么书报可读的时候,我会坐下来好好拜读。同时,我会尽量回一封信,让她觉得我已经读过信了。我还收到了戴维·塞西尔的信,非常有意思,代我表示感谢。他很想知道在目前新形势下,我的作用是否还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我自己也想知道。最近,思乡的愁绪不时地会袭上心头,越来越难以抗拒。当然,我们不断地被告知,目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是什么工作,都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保持英美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和睦亲善关系至关重要,而要做到这点,只有在掌握情报、保证信息畅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此话不错,但对久别故国的人来说,实在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

392

至于伯林先生生意的未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在五十八岁的年龄就退休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爸爸说打算和加拿大搞木材出口,木材公司由以下这些人经营:包括未提名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沃伯格家族的人

1 即罗汉·道利尔·巴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1783—1933》(伦敦,1941)。罗汉·道利尔·巴特勒(1917—1996),哈罗德·巴特勒之子,1935—1938年就读于巴利奥学院历史专业,1938—1984年任全灵学院研究员。

2 第2版(共4版)于1948和1949年分别在牛津和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没有太大修改。

3 《大英王国联合希伯来教会钦定每日祷告书》的新译本由塞蒙·辛格完成(伦敦,1890),是英格兰犹太人统一使用的祷告书,通常称之为“辛格版祷告书”。该书经过多次再版,一些仅为重印,但新版本通常会宣称增加了内容,也即“增补了新的内容”。

4 她的文笔确实糟糕,不堪卒读。

(关于这些家族爸爸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参与的肯定都是些名列前茅的企业);私人银行家本森先生(该银行的成员之一是我们在华盛顿的军事专员,他是一位很随和的人,交际广泛,但没什么天赋。我对他了解不多,但约翰·福斯特和他很熟。此人名叫雷克斯<sup>1</sup>);还有迈尔肯·斯图尔特爵士<sup>2</sup>,对他我完全不了解。我得说整个计划看来相当周密。我对您打破常规、求新求变的做法举双手赞成。哪怕这里预言家们的一致看法只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性,与加拿大建立贸易联系,如同与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一样,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极有可能会带来很好的收益。但是,目前的海上航行切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是爸爸您,我会等上一两个月,然后带着全体人马,万事俱备,整装出发。我想伯林太太一定急于陪伴您的左右。真希望这一计划能够顺利实现,那样我就可以在蒙特利尔见到你们,你们也可以来纽约看我,这种迫切心情不说你们也明白。另一方面,想到要再一次面临分别,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我的未来去向目前有点模糊不清:可能去华盛顿,也可能返回英国。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打算请假回国一趟,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时间。可怜的劳特帕奇特近来无比沮丧(他的太太也一样),眼巴巴地等着乘坐比较舒服的交通工具回国,但显然很难得到这种机会。与此同时,因为是四十四岁以下,他必须在美国报名服兵役,为此他寝食难安,不停地向我请教。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只能叫他斋戒祷告,希望有好的结果。我不用登记报名,因为我是英国官员,属于“英国总部的人”,使馆专门列出的名单

393 上有我的名字。查尔斯好像因为听到消息,说他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儿子失踪<sup>3</sup>,推迟了到达日期。我知道他非常疼爱这个儿子,因此他一定感到万分悲痛。很遗憾德拉克先生居然在1908年时向你们借过50卢布。我再也没见到他,据我所知,他也没想要见我。他实在太害羞、太内向,不像是有胆有谋、

1 雷克斯·林赛·本森(1889—1968),1941—1944年任驻华盛顿军事专员;英国情报特工,社会名流。

2 (珀西·)迈尔肯·斯图尔特爵士(1872—1951),实业家,伦敦制砖公司董事长。

3 哈伊姆·魏茨曼的二儿子迈克尔·奥萨·魏茨曼(1916—1942)为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2月11日在比斯开湾执行任务时失踪。儿子的死让魏茨曼深受打击,他的夫人薇拉始终没有从这一事件中恢复过来。

能够如此轻而易举从你们那拿到钱的人。要么就是在谦卑畏缩的外表下，暗藏着狡滑奸诈、无德无行的本性，但我觉得极不可能。弗雷迪看来已经抵达南非，此刻毫无疑问正在同我们的殖民地公职人员开怀畅饮。我想念他，但显然未及我认为自己应该达到的程度。<sup>1</sup>

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平静无波。我想，你们的生活大致也是如此吧。总之，我实在不明白，人怎么能够长期在纽约生活，除非把自己封闭在某个社会、种族或知识分子的孤立小圈子里，在此过着完全相互隔绝的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可以看到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以及犹太人的文化完全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食物、餐馆里的墙纸、报纸、兴趣，整个从欧洲全盘照搬过来，并没有被同化。这种情况只有在外部环境文明不够强大，或极为包容，不去强迫移民同化的地方，才有可能发生。

前些天，我去犹太法庭听了两场官司<sup>2</sup>，由戈德斯泰因拉比<sup>3</sup>和奈尔法官<sup>4</sup>主持。这两人我都不太认识。很精彩的案件。一名犹太乞丐，蓄着长长的胡须和鬓角，一副来自1880年俄罗斯的模样，装着一条木头假腿走进法庭。他一本正经地控告：犹太医院里的医生当初要对他的腿施行截肢手术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将它埋到离他不太远的圣地底下。但是出于疏忽，那条腿被用其他方式处理掉了。待救世主耶稣弥赛亚来到，所有死去的人都会死而复生，得到拯救。手脚等各个肢体会重新组合安装，但被毁坏的肢体就永远丢失了。“我愿意用木制的假腿走五十年，”此人说，“一百年，甚至走两百年。但在永生里怎么办？”法官们显然被弄糊涂了，问他：“你希望法庭能为{你}你做些什么？”“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法庭能为我作些什么？”乞丐回答。整件事确实令人唏嘘。正如此人所言，一个人不  
394

1 从这里开始打字稿换成了手写稿。

2 这种法庭（犹太宗教法庭）常用来听取宗教辩论。

3 伊斯雷尔·戈德斯泰因（1896—1986），拉比，犹太复国运动领袖，1943—1961年任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组织主席。

4 塞缪尔·奈尔（1893—1949），1944—1948年任纽约最高法院法官。

甚至没有人面带微笑，自始至终，法庭都被一种紧张肃穆的气氛笼罩着。法官宣布休庭，谁也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这期间，那个乞丐（我想他有八九十岁的样子）始终一言不发，愁容满面。最后，法庭决定，只要把一个象征性的物件——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根头发或一个指甲，按照特定仪式掩埋起来，法庭便庄严宣布该物件为腿的替代品，发挥同样的作用。那么，全能的上帝就一定会认可纽约法庭做出的宣判，在需要时制造出一条腿来。乞丐心满意足，案件宣告结束。掩埋头发和指甲的仪式一定特别离奇古怪。

接下来的案件有关一个女人，她的小叔子不许她从婚姻誓言中解脱出来——事实上是一桩婚前协议<sup>1</sup>案。她坚持说，除非这个兄弟发慈悲，否则她死去丈夫的灵魂将永远面朝地下——所有犹太人对此笃信不疑，因此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试想，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42年的纽约，所有相关的人都以一种特别庄严肃穆的态度面对此事。真是有趣。我就用这种方法自娱自乐。我最近在读罗斯<sup>2</sup>为英国犹太人所做的篇幅浩大的祷文<sup>3</sup>，其目的是要让他们保持信念，洁身自好。不过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它怎么样。如果遵守犹太教义意味着要和塞西尔·罗斯保持永久联系，那么，我就太想放弃信仰了。近来我没去华盛顿，因此没见到菲利克斯夫妇。<sup>4</sup>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位乐天、开朗、轻浮的20世纪初的维也纳人，乐善好施，当一名维也纳自由主义报刊编辑或者作为自由主义的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家们的至交倒还称职，但绝不是一个锐志改革创新、带着清教徒色彩的新世界美国人，像布兰代斯那样。他不是一个伟人，却是一个好人。

艾耶尔夫妇的婚姻生活随着汉普希尔返回英国而再次变得复杂起来。她提出要求（a）要孩子；（b）要离婚。这对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的

---

1 希伯来婚姻契约规定了新郎对新娘的义务，即拉比法中的婚前协议。它为离婚的女人或寡妇提供了经济保障，通常用阿拉姆语行文。

2 塞西尔·罗斯（1899—1970），1939—1964年任牛津大学后《圣经》时代犹太研究高级讲师，1936—1945和1955—1956年任英国犹太历史学会主席。

3 可能指罗斯写的《英国犹太人史》（牛津，1941）以及/或者他在《犹太纪事》上发表的文章。

4 指菲利克斯和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虚荣心和未来过上舒适生活的希望都是一个重击。至于S.阿伦森目前在做什么，只有天知道。我得找到罗斯金夫妇。最近除了我过去的恩人使馆官员S.L.柴尔斯，没有人回英国。他在这里的表现很快就令他遭到众人的一致 395  
 厌弃，就连我也发现自己无法再保护他了。实在没什么可写的了。我的生活乏善可陈。睡觉、吃饭、工作，诸如此类。我照了一张相，但实在太难看了，不好意思寄。你们清楚我多么爱面子。

爱你们的

以赛亚·伯林

致哈伊姆·魏茨曼<sup>1</sup>

1942年2月25日 [电报]

纽约

一直在等待确切消息，向你们表达我所有的爱与悲伤。坚信你们不会丧失希望。获悉你们近日有望抵美，感到由衷高兴。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我难以形容自己是多么迫切地想为你们尽力，尤其在此时此刻：以赛亚·伯林

396

---

<sup>1</sup> 他下榻在多切斯特酒店。

贯穿所有信件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他甚至热衷于飞短流长。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

——亨利·哈代

---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书信作者之一，他机敏、坦诚、热情、睿智、无拘无束。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纪历史中的一些特殊时刻，并记录在其书信中。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

[伯林]对一切人一切事充满了洞见，他是一位顶级的闲谈者，天才式的，与他的交谈充实而富有智慧，你绝不想结束。

——迈克尔·派